1986年组团访问云南，同时也去滇缅公路走了一趟，慰问被历史遗忘了的一群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们的遭遇及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本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不多赘述。

三千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其中一千多人在抗战中为国牺牲，战后复员回返南洋的只及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一分散在国内各个省份，幸存者剩下一百多人。

1987年陈毅明老师把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所写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的蔡汉良》一文出示，于是特约他来会谈。林先生对南侨机工的专题特感兴趣，福建省方面已访问了一些尚健在的老机工，我为了不使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湮没无闻，于是就鼓励和资助林先生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对一百多位幸存机工及部分家属，作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资料。他经过了两年的奔波跋涉，四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整理出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把南侨机工为国牺牲所经历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流离失所、痛苦悲惨的史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为教育后辈珍贵的历史教材。在华侨大学陈觉万校长、郑民所长的推动与大力支持之下，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才能付梓问世，希望将来能够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永留青史。

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历史悠久，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华侨是和平移民，是开拓者、建设者，和当地人民肩并肩，互相学习，携手合作，同甘苦、共患难，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使华侨备受屈辱，成了任人宰割的“海外孤儿”。华侨切身感受到弱者的悲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兴衰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华侨盼望中华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保障自己的合法地位。华侨情系故土，许多人倾其所有辛苦积蓄，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华侨有功于革命，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华侨在这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亦尽其天职，功勋卓著。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但中国上下为之震荡，而且激起了海外华侨的无比义愤，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更是爱国热血沸腾，民族义愤填鹰，同仇敌忾，抵制日货，出钱出力，源源不断地向祖国输送捐款、药品、服装、汽车、飞机，并把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推向世界各地。

1939年，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刚修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战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著名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为此发出号召，组织三千二百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回国支援抗战。

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事迹令人感动，尽管各人的经历各异，但他们都是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共赴国难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他们忠于职守，技术娴熟，工作相当出色。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们从南洋回来，所经受的困难确实很多，包括工作条件差，水土不服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骤变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但艰难险阻何所惧？他们不愧为项天立地的英雄汉，他们之中有一千多人为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约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滇缅公路是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军事运输线，南侨机工的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本身，而更在于他们回国抗日建殊功的英雄壮举。

南侨机工的英雄壮举，雄辩地说明了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南侨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其赤子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精魂。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南侨机工满腔热情为抗日而归，竟遭到了当时有关当局的苛求苛待。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当局无视南侨机工抛家别亲回国效劳的实际情况，突然宣布解散，使广大南侨机工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非常关心南侨机工。他不仅亲自率领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调查机工情况，向当局提出保障机工能正常工作的要求，并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议，派刘牡丹、庄明理，侯西反向当局进行交涉，敦促头等机工。抗战胜利后，经陈嘉庚先生的有力交涉，才使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复员南返。

战后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亦逾千人，他们刚欢呼抗战胜利，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的痛苦之中。这些抗战救国的有功之臣，渐被遗忘了。新中国成立后，南侨机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以火热的激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过上了一段开心的日子。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们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遭到不同程度迫害。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1986年11月，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公路访问了留居云南的南侨机工。这一行动，代表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愿望，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我被邀请，本应随陈共存先生参加考察团活动，可惜于由某种原因，而错过了机会。

在陈共存先生率团考察滇缅公路的同时，华侨大学（泉州）青年讲师林少川先生，从已迁回福建的南侨机工史迹入手，进行专题调查。当时，社会上已刮起“向钱看”、“讲实惠”的热风，而他却不改初衷，矢志搜集、整理资料，研究华侨史，确实难能可贵。

1987年春，他在厦门调查时，经我的推荐，在宾馆受到陈共存先生的热情接见。他写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一文，得到陈先生的重视与好评。随后，在陈先生的鼓励下，他继续在福建全省进行调查。9月，陈共存先生建议扩大范围，由于福建扩展到大西南各省以至全国范围，争取写成南侨机工专著或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并资助了专题调查经费。

同年11月，林少川先生背着简易的行装，带着录音、照相器材，持着陈共存先生致全国各地地侨联的亲笔介绍信，只身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贵、川、湘等省城乡进行采访和调查，直至农历除夕才回家过年。龙年春节刚过，他又匆匆上路了，继续南下粤、桂、琼，寻踪觅迹，访遍海角天涯，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一百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详细的专题采访，抢救并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南侨慰劳团锦旗，还有华侨先锋大队别具一格的老式“结婚证书”及殉难机工的碑铭墓刻，亦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了！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如此全面、系统地搜集国内健在及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专题史料，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是五十年来第一人！

今天《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正式出版了，它填补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史上的一段空白。让我们永远纪念南侨机工，长思缅怀这群赤胆忠心为抗日救国、为民族解放而牺牲自我的无名英雄！

陈毅明

1993年9月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土沦亡，生灵涂炭，广大海外侨胞，同仇敌忾，不仅从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回国参军参战，滇缅公路上的三千多南侨机工的辗转战斗，浴血牺牲，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星移物转，半个世纪过去了，为缅怀抗战史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实，笔者在海外知名人士陈共存先生（陈嘉庚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和华侨大学校长陈觉万教授的热心支持下，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及海南岛，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100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比较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以及“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的锦旗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见本书《南侨机工图片集》），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由于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1938年动工修筑，1939年1月10日正式通车），成为战时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内可联川、康、黔、桂四省，外可通曼德勒、仰光，成为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均赖此路输入。新抢修的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崖壁陡峭，山路崎岖，沿途要翻过海拔三千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还要穿越亘古荒凉、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象这样恶劣的行车环境，非有熟练的机工难以胜任，因此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司机与修理工。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致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企望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于1939年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二、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当地（侨居地）汽车驾驶执照者。三、略识中文，略会讲普通话，无不良啫好（尤其不嗜酒）。四、凡应募者，须持该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知其平素确具爱国志愿。招募广告附告：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考验合格者报南侨总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南洋华侨的热烈响应。南侨机工赤诚报国的壮志情怀，是十分动人的。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据笔者到滇缅公路实地寻访，《南侨回忆录》所记载的这位机工，就是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当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而王文松却抛弃200坡币（折合国币近700元）的月薪，自甘牺牲，并带领一批伙伴，自备全副机修器具回国。由此可见，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操与奉献精神是何等高尚！王文松在滇缅路上任下关修理厂厂长，为抢修抗战军运车辆贡献殊多，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殉国。同伴中幸存者韩利丰、黄守琛老人向笔者追述半世纪前与王文松“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将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而铁心参战的新加坡华侨机工许志光，他仍珍藏着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先生亲笔签署的一封信（见图85），信上写道：“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足钦佩。现伊母亲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希予以特别优待。”从这封历经半世纪沧桑的珍贵信件中，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机工队伍中，也有几位热血的华侨女青年。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现为广州师院副教授），瞒着双亲报名参加机工队，临行才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以有用之躯，在有用之日，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自已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的此生无负于祖国！”信的全文发表在1939年5月19日的《光华日报》上，现在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另一位被何香凝题词誉为“巾帼英雄”的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李月美（见图65—72），女扮男装与弟弟李锦容一起回国参战，则更富有传奇色彩。有一次，李月美在滇缅公路翻车受重伤，幸亏及时送医院抢救才脱险，人们也才知道“他”原来是女郞。后来，李月美与一位对她精心护理的海南籍华侨机工杨维铨在患难中结成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被当时海内外报章誉为“当代花木兰”。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当时这些海外赤子，有的是放弃海外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回国；有的年仅十七八，却虚报为二十岁才够条件回来；有的惜别未婚妻而奔赴抗日疆场，并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有的已经结婚却毅然别妻离子投报祖国；有的因家长不同意，则改名瞒着家庭秘密参加机工队伍……总之，踊跃报名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无法尽述。仅在1939年的半年内，前后共有9批机工回国，总数达3200多人。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修理工，又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但都在爱国号召下不落人后，共赴国难。正如《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所报道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军事、业务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分第一、第二大队），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服务。修理工除部分随队维修外，其余都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的修理厂。南侨机工开车的地方很广，四川、贵州、湖南、两广以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滇缅公路上。据南侨总会《大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可见，南侨机工成为“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的一支主力军。

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副理事长王亚六（见图95）回忆说，当年他们刚从海外回来，一下子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要闯过种种难关。首先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自五百至三千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流，令人惊心动魄，满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如此险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找不到，南侨机工的无名英雄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次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至雨季，泥泞粘滑，行车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塌方险情，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南侨机工早有精神准备，每人都随车带有厚木板，遇到险路段则随时铺垫，冒险通行。第三，还要闯过“瘴疟关”：由于滇西至缅北一带，是世界上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对每位机工构成很大威胁。据《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病，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此外，还有“空袭关”：日寇为了封锁滇缅公路，时常派飞机空袭、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滇缅路重开之后，敌机的轰炸，愈演愈烈。但华侨司机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自动踊跃地参加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在敌机机翼下拼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以加紧运输来为死难的同胞复仇！整个滇缅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引文同上）。当年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南侨机工却风趣地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表述了其革命乐观精神。

由于滇缅公路的运输不断补充了抗战实力，对日本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构成巨大障碍，因此，日寇将切断这一国际要道作为重点目标。1940年，日本玩弄外交手腕逼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7月18日至10月18日）。消息透露时，南侨机工组织一次突击“大抢运”，夜以继日，将大批军火赶在封闭前抢运国境来，立了功勋。当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日机则更疯狂轰炸功果桥与惠通桥，企图切断滇缅路的咽喉。据统计，自1940年10月18日至41年2月27日的130多天内，日寇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的重点桥梁20多次。其中严重的有，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遭到9架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广播“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使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东南亚。1942年2月，南洋群岛各地先后沦陷，日军由泰国入侵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派贵遣10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并肩作战，但因种种原因，战事失利。3月8日仰光沦陷，4月下旬，日军占领腊戍，随即以装甲车为先导，用汽车载运步兵先遣队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推进。5月3日，日军占领我国边陲城镇畹町，4日攻下龙陵，5日挺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为阻止日军东进，国民党军队自炸惠通桥，致使数百名南侨机工、近千辆汽车及数万名缅甸华侨难民未及过桥而被阻于怒江天险。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冒险渡过怒江，有的上山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惨遭杀害。至此，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终于被切断了，国内运输只剩昆明至保山之间的路段继续运行。

随着战局的恶化，南侨机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三年多来（1939年1月10日至1942年5月5日）发挥过重要作用（抢运45万多吨军火）的滇缅公路一切断，西南运输处（此时已改为中国缅运输局）竟然对回国参战、屡建功勋的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一小部分被留用外，多数机工被遣散，突然间成为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而国民政府竟无一部门过问。当时南洋已沦陷，侨汇中断，有家归不得，许多机工无依无靠，只得四处飘零，流离颠沛，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尽管处境艰难，但南侨机工仍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积极做好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根据在东南亚开展敌后斗争工作的需要，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被盟军选派进行训练，然后潜往南洋日军占区担任地下情报工作，侦察日军动态，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泰国华侨机工蔡汉良（见图37—47，今退休在泉州），曾出1944年被派往泰国，侦察拉温日军基地。由于他熟悉当地情况，深入虎穴，巧妙周旋，终于摸清敌情，配合盟军一举摧毁拉温日寇军事基地。另外，也有数百名机工奉命随盟军赴印度服务，他们协助盟军搞军运后勤，并为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的修建奉献了力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历尽艰辛流落在国内各地的南侨机工，他们都尽力参加收复滇西的战斗以及各地的对日反攻，坚持到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亲历抗战征程的南侨机工欣喜若狂，其心情的亢奋，有如杜诗所描述的“剑外忽传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抗战胜利了，南侨机工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于是要求复员南返。可是国民政府当局却拖延阻挠，致使机工迟迟未能南归与亲人团聚。

抗战刚结束，在重庆的潘国渠、庄明理、白仰峰等人，即多次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南侨机工复员事宜，却无效果。据《星州日报》1946年5月30日载《庄明理谈华侨机工现况》称，庄明理曾向当局提出八项要求：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作为奖励，另一方面作为南返生活费；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在抗战期间，或行动有失检点，或因怨谤而被禁锢的机工，请政府从速提审，分别轻重，迅速遣送回南洋。

庄明理向国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上述要求后，1945年10月，侨务部即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所提要求极为合理，即席通过。但此次会议之后，直到11月底至12月初，当局仍未公布任何正式实施办法。到了1946年3月，庄明理再到侨务部交涉，当时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从答应请政府拨款国币一百万元，交华侨机工互助会负责人办理紧急救济。不久，庄明理返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请示协助机工南返问题。但两个月过去后，政府一百万元紧急救济还没着落，至于遣散机工事，更如石沉大海。

为机工复员事，设在云南的“华侨互助会”亦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进行华侨机工总登记。据华侨互助会《南风》半月刊记载，第一期总登记，机工人数共1203人，其中新、马有1061人，占87%，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证书的有1144人。当年3200余名机工回国，胜利后登记入册者竟不足半数，其余的不是牺牲、病故就是失散，可见损折是相当大的。为使劫后余生的机工早日南旋，1946年3月2日，华侨互助会派代表白清泉、邱新民，携带机工名册和公文从昆明飞往重庆，奔走了行政院、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社会部等部门，甚至还跑到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请愿”，最后才由善后救济总署复示优先遣送华侨机工南返，但仍没着落。过后，华侨互助会又派代表一行四人（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与龙历文），于5月21日启程南下，经越南、泰国抵达新、马，为复员南返做了许多工作。

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为交涉机工复员之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众所周知，华侨机工回国是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的，陈先生对机工的命运一向极为关心。早在1939年8月，他就派刘牡丹到滇缅公路调查考察，后又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1940年陈先生又亲率南侨慰劳团前往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后来在南洋沦陷、玛琅避难的三年间，陈嘉庚先生著有《南侨回忆录》一书，其中多次叙及华侨机工。抗战胜利后，他更强调原本为抵御外侮而回国参战的机工，决不能留下参加内战，应当复员南返，并为此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6年6月16日，陈嘉庚先生在吉隆坡福建会馆主持召开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关于遣送机工南返事，交由驻新加坡伍伯胜总领事全部负责办理，并选出陈嘉庚及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五人于18日“晋谒”伍总领事，以策进行；2、遣送机工南返限期两个月办理完毕，另在昆明已登记的失业机工400人，应早日将他们遣送新马；3、以全马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通电行政院，请速遣送机工南返；4、一部分被扣机工，应请政府提早审讯，如无罪，立予释放；5、如两月内遣送工作未能完成，应请伍总领事返南京向中央请求力争。随后，6月19日，陈嘉庚先生一行五人，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三点办法，伍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两个月期限已至，仍未见机工南返，陈嘉庚先生又连续二次致函伍总领事（见图35、36），要求遵守诺言，“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伍总领事先后于8月24日及9月3日函复陈先生，报告了经总领馆与国内政府有关机构接洽及与当地政府交涉的结果。至此，稽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共1144人，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200元，订于1946年10月1日起发给。

为表彰赤子功勋，侨务委员会特颁发奖状，内容是：“华侨机工□□□，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_\_月\_\_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_\_月\_\_日。”

为庆祝南侨机工胜利复员，1946年10月26日启程之日，云南各界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1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29日启程。总之，复员机工被视为民族英雄，所经之处，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迎送。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时间前后也拖得较长，据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了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这项义举，总算是有始有终，没有辜负华侨父老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南洋华侨在祖国抗战史上，写下令人难忘的光辉的一页。

在整个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过程中，为抗日战争而牺牲宝贵生命成为无名英雄的达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复员返回南洋的也有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其余的三分之一，则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国内，人数将近一千人。这些留在祖国的机工，经过战后40多年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目前全国幸存的仅100多位。他们当中，最高龄的是海南岛宋扬才（杨材），年93岁，最“小”的是四川宜宾洪华民（18岁回国），而今亦已年逾古稀。

战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有的是已在抗战期间成了家，不愿或不能南返的；也有的因来不及办理复员手续而失去南返机会的。他们大都在云南一带落户安居。到新中国成立时，留在西南及滇缅公路沿线的还有300多人，其余的则已回原籍闽、粤家乡，也有一小部分星散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南侨机工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各地机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技术专长，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工作者（仅笔者对100多位机工的专题采访，就见过他们珍藏的奖状上百张）。全国劳动模范黄步云（见图96，昆明总站司机）等，还光荣出席北京群英会，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5年，陈嘉庚先生到云南、贵州等地视察，看到南侨机工安居乐业，甚感欣慰。

毋庸讳言，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许多机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的经历而受尽折磨。在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多数华侨老机工都戴着各种不光彩的“高帽”，诸如“特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机工”、“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光荣的历史被抹黑。当代“花木兰”李月美，宁死不屈，被迫害而死。尽管各地机工们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仍不动摇，坚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光荣史实终究会得到历史持平的公论。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侨政策得到重申和落实，抗战史上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的南侨机工历史，终于得到公正的评价，冤案得以平反，名誉得到恢复。1986年9月，云南的70多位老机工在昆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南侨机工团体——南侨机工联谊会。这个“机工之家”为机工战友办实事，排忧解难，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同年11月间，陈嘉庚先生之侄陈共存先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率考察团到滇缅公路慰问考察，专程调查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迹，给这一群把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海外赤子、抗战遗孤以极大的抚慰和鼓舞。同年年底，我国政府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以保障幸福的安度晚年。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3200余名南侨机工共赴国难，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虽然是一些无名英雄，然而海内外炎黄子孙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贡绩。

早在1946年7月7日，为了追悼回国参战华侨烈士和死难同胞，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见图108）。三角形的纪念碑分成两段，下段有三面不同内容的刻石，一面是林连登书写的“浩气长存”，一面是刘玉水题写的“忠灵不朽”，正面是碑记，由黄严管撰、周曼沙收、蒋清室刻，碑记内容如下：

**慨自滔天祸水，起于卢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募机工，大收骊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竞树蜚刍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颁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羁缧绁；嬴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扬白旆，虽远竖于东瀛；而内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岘首，空怀坠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竭。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借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阡；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理石无忧；庶几取义成仁，亘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万古而常昭。**

这篇情真意切的碑文，寄托了对抗战英勇献身的机工的悼念，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

为表彰华侨机的爱国精神，1947年11月30日，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特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见图110），使机工参加抗战的忠勇事迹，长存人间，该碑刻下了以下的文字：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辎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材，须尽量搜罗，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劬，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缩谷。祸生陡变，丧身寒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纪录。勒诸丰碑，良志芳躅。**

1989年“7·7”，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了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树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见图112）。纪念碑矗立在西山公园滇池之滨，碑身以汉白玉石砌成，显得飒爽英姿，浩气磅礴。碑前两层台阶均为七级，象征“七·七”抗战；碑的上端雕有“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四条墨石横带象征当年四万万同胞齐心抗日；碑的下面镌刻有“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十一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碑身的两侧砌成两面旗帜形状，象征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旗帜上雕刻三个“七·七”纪念章，代表着回国抗日的三千多名南侨机工；碑身高九米，碑座高三米，体现着“九·三”胜利节；碑座的正面刻着四个大字：“赤子功勋”，是对南侨机工和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高度赞誉；碑座的侧面和背面镌刻着碑文，碑刻全文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鹰，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淋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

综上所述，半世纪前，正当祖国民族处于最危急关头，三千多南侨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大规模回国参战，这是华侨史上的一大壮举。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方面。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记载，从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这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另据《华侨先锋》第2卷第9期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的水平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此外，他们还在其他军运线（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地）以及中印公路抢运军火兵员，并积极配合盟军对日反攻。总之，南侨机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意义，不仅直接增强了祖国抗战能力，而且也以他们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壮举，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信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仍将继续激励与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关头，有众多的海外赤子自愿抛弃侨居地安稳舒适的生活，毅然回国参战。现居住在泉州的泰国南侨机工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员。1985年，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笔者首先在泉州采访了这位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幸存者。年逾古稀的蔡老先生回顾了抗战时期在滇缅公路的不平凡历程，将这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可歌可泣的史实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出示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以及“荣誉证书”等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记述的是一位当年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的经历，作为南侨机工的一个缩影，为华侨抗战史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见证。

蔡汉良，原籍福建南安。民国初年，南安山区土匪出没，民不聊生。汉良5岁时曾被土匪绑票，其父倾家荡产花了450元银圆才将他赎回，结果背了一身债，无力偿还，日子难熬。在汉良7岁时，父亲便服毒自杀了。由于家贫上不了学，他刚8岁就得帮人放牛，尝尽了艰辛。幸亏闽南一带是著名侨乡，有海外关系，不少人在家乡活不下去就出洋“过番”，蔡汉良的家族也是这样。他父亲有兄弟9个，就有8人到泰国谋生，其中八叔蔡铁民，靠经营锡矿渐渐发迹，后来在乃佛及弄宣拥有“吉兴”、“吉利”、“泉南”、“铁民”四个矿务公司，自己铺筑铁路运输产品，还开办酒厂、火砻厂、大戏院、百货公司等。到抗战前夕，蔡铁民已跻身于南安县大富侨之列。

1928年蔡汉良10岁了，五伯父蔡兴普从南洋回家探亲，便将他带到泰国读书，上午学华文，下午学泰文，读了6年，小学毕业后便在叔父蔡铁民的吉兴矿务公司开火车及修汽车。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全由叔父供给，因此月薪50元便可全部寄回家赡养母亲。在1934年至1937年的四年间，月月如此。

可是，正当他家日子开始好转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民族灾难降临了。当时，南洋广大侨胞虽然安居海外，心中却时刻惦念着祖国和家乡，大家每天最关心的是抗战新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七·七”以来华侨社会最普遍的口号和行动。蔡汉良在泰国弄宣，也参加当地华侨商会组织的“人民抗日军青年宣传队”，经常上街卖花筹赈，抵制日货，还积极投入当地筹赈分会的活动，并将月薪捐出10%，直至回国参战为止。

1939年，由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批熟练机工，经陈嘉庚先生一号召，南侨总会登报招募，极大地激发起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在新加坡，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非常踊跃，有的机工已经“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在泰国，华侨热血青年也跃跃欲试，大家不当亡国奴，急着回国抗战。蔡汉良觉得自己符合条件，既是熟练司机又是机修工，更应发挥特长回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回国。

可是，考虑到家庭大概不会同意，该怎么办呢？十多年来，叔父的养育之恩，蔡汉良铭记在心，现在要说服叔父让他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觉得不好开口。然他爱国心切，且血气方刚，干脆就来个先斩后奏，便偷偷地由弄宣乘车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去报名。在董里什呈，竟遇到一段小小的插曲，差一点被留下改变他的命运（如果是那样，本文历史自然将重新改写）。原画，在那里报名时，偶然被叔父的一位老朋友王联辉（惠安籍）看到。王是个开店的侨商，一向对蔡诸多关照，并且早就有意将其读中学之女许配给蔡，因此当得知蔡要回国抗日时，便设法挽留，于是好心好意地让他选择几条道路：（1）让蔡留下与其女成亲；（2）若暂时不结婚也不勉强，可租一间店铺让蔡独立开店，做收购橡胶生意；（3）若是喜欢开车，可将其16部汽车让蔡挑选所满意的，自己去经营一个客运公司亦可。尽管上述几点都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蔡汉良认识到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于是婉言谢绝了叔父的这位老友的一番美意，铁下一条心：“报名回国！”

与蔡汉良同时报名的有30多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走不了。经过一番周折，才由当地筹赈分会的一个负责人自费带领他们一行人到槟城，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在离泰前夕（1939年8月8日），蔡汉良才给家中伯父、婶婶（叔父铁民已于38年病逝了）及王联辉各留下一信告别。三人接到信后不约而同地追到槟城。婶婶（是泰国人）对蔡说：“今天是特意来追你回去了，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认了！”王联辉随后也赶到槟城，见挽留不住了，便在“天天酒家”设宴为其饯行。后来，当伯父托着拐杖匆匆赶来时，船却已离开槟城了（此乃1944年蔡回泰侦察日军基地时，一个堂兄告诉他的）。

当他们由高头廊乘车到达槟城时，受到在槟城留学的泰国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现仍珍藏着这张近半世纪前的照片（见图37）。蔡汉良一行7人分别为前排：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邝天祥（后改为邝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五蔡惠文。险蔡汉良与陈潮海为闽籍外，均为粤籍。

1939年8月12日，他们由槟城启程，到达新加坡又受到隆重的欢迎，14日开始由新加坡搭“丰庆号”轮船出发，17日到安南（即越南）西贡，20日改乘火车，尽管车厢内闷热难受，但大家有一股爱国热情，心情是舒畅的，一路高唱着激昂的抗日歌曲，终于在8月23日到达昆明。

第九批的华侨机工一到昆明，先被西南运输处安排在潘家湾进行短期的军训，因战事吃紧，很快被分配到各个运输大队，蔡汉良分配在第15大队45中队。1939年10月，南宁战役危急，他与南安同乡洪本霖同被抽调编入第十六兵站，赶到南宁投入前线运输。经过激战，南宁不幸于11月24日失守，他们随即又投入昆仑关战役。其时白天战火激烈，只得改在夜间出发运输，每夜赶开三趟直至天亮。不久昆仑关亦沦陷，只得退入武鸣，又被包围了三天三夜，幸而援军打开了一条血路，他们才退入柳州。后又转移到安南境内的高平。西南运输处在安南设有分处，在安南的最初几个月内，他们突击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回国。后来，由于日寇占领安南（1940年），他们在安南的整个特别大队的车全部被封去，人员百多人全被集中在安南“南生旅社”，然后分三批返回昆明，他属第二批回来的。

当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重新开放后，蔡汉良被编入第二大队，行驶在这条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线上。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高山（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穿过大河（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行程需七、八天，特别是需经一段原始森林“烟瘴之地”，毒蚊袭人，疟疾时有发生，再加上日机常来盘旋轰炸，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可是广大华侨机工，自甘吃苦，苦中有乐，有的人还风趣地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对祖国河山大加赞美，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

蔡汉良在滇缅公路期间的经历，最值得一提的大致有这么几件：

①被推为机工代表，二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特地到滇缅公路慰问华侨机工。当时，蔡汉良被保山第二大队“华侨互助会”推选为三位代表之一，两次见到了陈嘉庚先生，并用闽南语当面汇报了华侨机工的情况。第一次是汇报“南侨总会”发给华侨机工的物品被贪污之事。因当时陈先生曾组织“南侨总会”向每个华侨机工赠送九件物品（包括蚊账、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可是竟被一些贪官污吏加以克扣，到华侨机工手上有的只领两三件，有的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为此，他据实向“南侨慰劳团”反映情况。第二次是向陈嘉庚先生汇报华侨机工与第五军打架之事。起因是由于第五军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见鸡抓见菜摘，还到市场随便压价买猪肉，致使当地群众叫苦连天，这引起华侨机工的愤慨不平，于是仗义执言，与之争吵。可是第五军自称他们横行七八省，从无人敢管，在滇缅公路竟被这群“番仔兵”（华侨机工）来教训？于是，双方打起群架。经陈嘉庚先生的调解，此事得以平息。

②接送远征军，参加入缅作战的运输

日寇偷袭珍珠港之后，分兵进犯东南亚，并直指缅甸。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失利，远东又兵力薄弱，因而希望中国出兵共同防御滇缅公路。于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在第五军、第六军出兵进缅作战期间，蔡汉良担任分队长，直接运送兵员、军火及其他补给品进缅。可惜远征军入缅过迟，处境被动，指挥不协调，战事不利，致使一部分退入印度，一部分溃退回国。后来情况更加危急，当日军攻至滇缅线的要冲惠通桥时，1942年5月5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兼局长俞飞鹏不得不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军切断在怒江西岸，而华侨机工队也有不少被截在那边，仅蔡汉良这一中队，就有6辆车不能回来。这些机工大都遇难，仅剩一个潮州籍华侨机工奇迹般地逃回来。原来那些人被俘后派去当杂役，有一次在杀牛时被差出来挑水，第一担水先挑回去，而挑第二担时就趁机跳入江里，从惠通桥边泅水过江归队。

③“五·四保山惨案”历险

在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前一天，蔡汉良还亲身经历了“五·四保山惨案”。那天上午，他的好友钟少伟（粤籍华侨机工）特地邀请蔡一块上街赶墟，因为钟妻刚生一女孩才三天，准备买鸡做“月子”。而蔡汉良刚好有任务，需去领车队的蓄电池，于是与钟少伟分手，不料竟成永别。当天中午12时，日寇飞机突然来炸保山，蔡汉良与另一老华侨机工邱建和（此人亦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从驾驶室下来，就近疏散到田岸沟里，幸而脱险，而在赶墟的钟少伟却被炸死了。这一天，正逢举行“五·四运动”纪念集会，学生、难民与无辜百姓被炸死数千人。蔡汉良他们将华侨机工车队疏散到大理之后，又奉命回来掩埋死难者。其时成千上万腐尸遍野，臭气熏天，惨绝人寰。这是他有生以来目睹的最大惨剧，直至40多年后的今日，犹有余悲。

④滇缅公路切断后，华侨机工竟被草率裁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在发挥了三年多“抗战输血管”的巨大作用之后，终于被日寇切断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当局竟草率地将华侨机工裁掉了事。其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南洋沦陷，海外侨汇断绝，许多华侨机工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甚至沦为乞丐。当年冬天，就有十多位老弱华侨机工，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蔡汉良的一个同乡侯合意，走投无路，也只好当乞丐。与蔡汉良同一批从泰国回来的邝天祥，失业后只好蜷缩在小西门防空洞里过夜。汉良本人在车队疏散时还代理副中队长，可是几个月后在石塘山“整训班”时，也被裁掉，失业三个多月。后经友人介绍到西南运输公司开客车，走下关至昆明这一线。当时汽油奇缺，只好开“木炭车”，林新李（华侨机工）还当蔡的助手。

后来，还有一部分华侨机工，被盟军总部昆明分部选调去进行特种训练，潜往东南亚日军占区做侦察工作，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个。

蔡汉良原先侨居泰国，熟悉当地情况，经选调进行一番严格训练之后，于1944年5月被盟军总部派往泰国，任务是侦察日寇在泰的拉温军事基地。他先乘专机到南宁，再步行由东兴进入安南，经芒街、海防、河内等地，然后经老挝湄公河到达沙湾拿吉，雇小船渡到泰国边境穆达汉，在那里办理入泰手续。其时有个裔官员对他严加盘问，并用泰语表示怀疑，可是另一泰官员却认定蔡是个乡下佬，说他不懂礼貌，进门不懂脱鞋脱帽，也不会鞠躬，后来终于办理手续让他入境（见图39，蔡汉良化名为蔡坤，奉派前往泰国侦察日军情报时的证件）。

当他从乌汶乘火车赴曼谷时，车上就有特务前来盘问，被他巧妙周旋应付过去。来到曼谷，他先在过去熟悉的耀华力大街歇脚，当夜便住进“大华百货商店”楼上的“东亚旅社”。第二天当蔡在街上行走时，忽然有人拉一下他的衣角，示意进小店喝咖啡，他便警觉地跟进去。奇怪的是那人留下自己的“大白笠”，而顺手将蔡相同的一顶“大白笠”戴走了。蔡觉得这里必有奥妙，随即溜至僻静处取下大笠仔细看看，里面果然有一张字条，内容是提醒注意该旅社有三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登记处的，一个卖眼镜的，一个是按摩师。蔡判断此人大概是奉派暗中对他进行保护的，于是随即设法离开旅社。

当蔡汉良辗转来到离侦察目标——拉温基地还有93英里处的春蓬时，这里开车出入的全是日本人，每五公里便设一个检查站，难以进入。他只得暂时到附近一个堂兄那里再想办法（此时，堂兄才告诉他回国之时伯父曾追至槟城而船却开走了的情况）。在堂兄家中呆了一个月，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原来，有个曾在叔父厂里做工的泰国侨生郑阿隆，时下正给晶本人当杂货采购员，蔡通过他介绍进拉温当杂役。蔡汉良与郑阿隆一起乘日本人的卡车进入了拉温，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菜馆找到一份杂役差事。在这家菜馆工作，消息灵通，可以趁机了解基地的有关情报。原来这个军事基地是设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的，武器弹药一堆堆垒成三、四层楼高，并用篷布遮好，日军驻在地道里，几千名被抓来的华工及土著在修筑工事。蔡汉良还混进禁区与民工聊天，边走边用脚步测量并故意对一个民工说：“我们在这里做工，又是军事基地，飞机一来，那可无处跑了。”可是那人却说：“你可能初来不知，没啥可怕，这里及对面山上都有高射炮，飞机一来，高射炮就会响起来。”交谈当中，问者有心，答者无意，便探听了不少情况。经过几次侦察，他利用日文旧报纸绘制成秘密图纸，然后准备离开。可是进来不易出亦难，他只好对老板诉说在此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要回家拿蚊账及衣服。老板便派一人跟踪并交待要“快去快回”。那人是槟城土生华人，跟踪蔡一天一夜才被甩掉。那夜他们同住进春蓬一家旅店，次日清晨4点蔡刚起来，那人马上追问：“天未亮干什么？”蔡连忙说昨夜着凉拉肚子，并故意从箱子里取手纸上厕，还留下箱子迷惑他，然后从后门溜出来，立刻雇了三轮车赶至火车站，买了一张抵万伦的长途车票，而实际上只乘两个小站就下了车，以躲过那家伙的追踪。

在回国途中，又经历了种种风险。在途经安南海防时，适逢滇越铁路的桥梁被盟军派机轰炸，日寇因此进行大搜捕，见生人先抓起来再说。蔡在一家海南华侨开设的“大同旅社”也被捕了。幸亏他懂得海南语，冒认是该店老板的同乡，经老板的尽力营救，终于获释。

可是刚离开“大同旅社”，第二天在海防轮渡码头又遇上了麻烦。这里日本宪兵搜身很严格，蔡汉良便将密写情报的晶日文报纸当作废纸包裹着皮鞋置之箱底，当日兵开箱一看是臭皮鞋，便顺手扔到老远一边。待搜身之后，他才匆匆捡起报纸包住皮鞋，顺利地过了关。

当抵达安南芒街与我国东兴交界的国境线时，他却被边防军检查站扣留了，被送到东兴镇公所。经他说明后，镇长马上给他松绑并向他作了解释。此时，正值南宁第三次失守，归途再也无法乘飞机了，钱又花光了，只好暂时困在东兴一段时间，并向总部发电求援。不久，总部汇来安南币一千元，寄在芒街办事处。在东兴镇公所派人掩护下，蔡汉良到芒街办事处从一位五条杠的法国军官手中领了款。过后，又有几位派出侦察的华侨机工回来，蔡也帮他们通过这条途径领了款，然后七、八人结伴步行回国，先穿过十万大山，再步行十六天到广西百色，然后经贵阳回到昆明，这时已是1945年5月了。

蔡汉良将出国侦察所得向盟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经过核实之后，盟军总部从昆明和印度调了大批轰炸机，将拉温基地的军火仓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阵地、停港战舰全部摧毁，大火燃烧达六、七天之久。轰炸前后，均拍有照片证实。总部特地让他看二张照片：一张是炸前拉温基地全景，另一张则是炸后整个基地变成一片浓烟火海的景象。

出国侦察任务完成之后，总部又派他去印度当空降兵，但因病未能去成，便留在战时运输局开车，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这些亲身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终于亲眼看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给蔡汉良一张奖状（见图40），内容是“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 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见图41），内容是：“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 日”。此外，他还荣获二枚珍贵的南侨机工纪念章（见图42、43），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赠的，号码是1457号；另一枚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的“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号码为266号。（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了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缅怀华侨对抗战的历史贡献，蔡汉良特将这些珍藏40多年的荣誉证书及纪念章等宝贵实物及照片捐赠给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展览，引起了海内外参观者的关注与兴趣）。

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初，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可是由于政府当局的拖延，致使他们迟迟未能返南洋与亲人团聚。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次出面交涉，并亲自为机工复员事致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终于使华侨工在1946年获得复员南返。复员时，每位华侨机工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蔡汉良这批复员时的领队是白清泉（见图6，白先生也是1939年第一批回国南侨工“八十先锋”的领队），行程由昆明经香港回南洋。沿途受到热烈的欢送，情景十分动人。这时，因接到母亲的急电，蔡汉良便从香港转厦门回到南安老家，从此定居国内。

战后，蔡汉良复员回到原籍，在泉州“泉安汽车公司”当驾驶员，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工会活动，临解放接受分配护车任务，刚解放即被派为新工会骨干，参加接管工会工作。接着，他即奉派随军加入支前运输，由南安向同安、厦门推进，并参加大、小嶝岛及金门战役，到停攻金门才调回泉州，编入“泉州支前运输大队”（“泉安公司”蔡若水任大队长）。其后，1953年参加东山岛战役，1955年转入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蔡汉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技术精益求精，坚持节约用油，做好“四勤”保养，保障安全行车，超额完成任务，在运输生产上创造了好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生产能手”，至今仍保存很多奖状（见图44、45、46、47）。

可是，“文革”十年浩劫，黑白颠倒，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光荣经历，却被歪曲为“历史污点”。蔡汉良参加南侨机工到西南运输处，是国共合作时期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支援抗战军事运输的，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别是他曾受盟军总部的派遣往泰国侦察日军基地，是国际反法西斯的特殊战斗，却又被打成“国际特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蔡汉良被揪出去游街示众，头上戴的并不是文革“最时髦”的纸糊高帽，而是一架铁条焊成的十几斤重的“定时炸弹”，其发动机部件还会旋转，尤其引人注目。尽管被套上铁制高帽游斗，并被关进“牛棚”迫害，但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从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蔡汉良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1986年，国家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的退休金待遇；1989年，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 - 1989）之际，云南人民政府特在昆明建立一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南侨机工无名英雄们！

新婚别 别离为救国——记永春南侨机工刘瑞齐

刘瑞齐的新婚别，是南侨机工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中鲜为人知的真实而生动的史实之一。他的事迹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广大热血的华侨青年崇高的爱国情操。

刘瑞齐，1914年出生于闽南侨乡永春东郊留安塔下留安村。据传说，该村虽小，但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五代清源节度使、晋江王留从效、南宋连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都是该族显要人物。后来为避政迫害，不得不改“留”为“刘”（据族谱记载，宋末元初被迫改“卯田留”为“卯金刘”）。该村村民出洋“过番”的历史亦悠久，谱载明永乐年间，该村族人刘孟福即随郑和下西洋，后卒于印尼苏门答腊。刘瑞齐生于民国初年兵荒马乱时代，3岁丧母，12岁又失去了父亲，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堂兄从南洋回乡探亲，便将他带往马来亚谋生。

刘瑞齐起初在大山芭割橡胶，后来在一家永春籍华侨商让当学徒。由于为人敦厚，刻苦耐劳，渐渐赢得店主的信任，让他学开汽车，为店里运载橡胶及各种货物。有一回，街邻失火，殃及该店，刘瑞齐不计个人安危冲进火海，冒死抢救出一箱箱的货物和帐簿，保住了店里的财产，而他却被无情的火焰烧得遍体鳞伤而入院医治。为此，店主颜先生深感其德，将次女许配给他，并拨出部分业产（包括商店一间、卡车一辆以及橡胶树一千棵等）由他独立经营。

1939年春，报上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的消息，南洋各地血气方刚的青年都踊跃报名。刘瑞齐也有一颗热爱祖国殷红的心，他被星马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决心报名参加。可是此时，他已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温柔贤慧的妻子当然舍不得让新郎奔赴烽火连天的战场，岳父的四间商店也正需要他继续帮助经营。怎么办呢？刘瑞齐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认为“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下决心瞒着家人，“先斩后奏”！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刘瑞齐不在本埠报名，而是悄悄开车到另一埠头芙蓉筹赈分会报了名，待体检、驾驶考核以及一切手续办好之后，于启程回国之前夜才回家。按照要求，他与机工同伴集体理了光头，顺便在街上买了顶毡帽带上。当他跨进家门时，新婚妻子见从不戴帽的丈夫突然带上个毡帽，上前好奇地掀开，顿时露出一颗闪亮的“和尚光头”引得岳父母以及小姨子们的哄堂大笑。岳母关切地探问原因，他只好临时撒了个谎，说是因治疗头疼，让番仔医生敷药时剃掉的。但细心的妻子似乎从他神秘的举动中猜出了什么，当夜悄悄地问他：“莫非你想回国？”为了明天能够顺利启程，此时他仍不敢以实相告。半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金戒指和一些贵重东西连同写给妻子的告别信凑成一包，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只取走一套衣服，把钥匙放在梳妆桌上，默默地离开了温暖的家。此时此刻，妻子仍然在温馨的睡梦中。这场“新婚别”，竟成了他与妻子的终生别离！

偕刘瑞齐同行的还有永春籍的林广怀（领队）、颜世国等人，他们由芙蓉埠出发，前往新加坡集中编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用闽南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大家回国后应好好拼搏，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第八批机工队伍三百多人回国后，先集中在昆明进行军训，经考试合格便陆续分配到滇缅公路沿线服务。刘瑞齐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44中队，开赴广西前线。队部驻扎在镇南关附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到安南将汽油等军用物资运回南宁，同时，从国内运出桐油、猪鬃等物资去安南。

1939年11月底，南宁失守，刘瑞齐随车队退入安南高平，编入特别运输大队，日夜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在海防至广西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穿梭行进。日寇占领海防之后，特别大队撤回昆明。经过重新整编，西南运输处集中力量投入滇缅公路抢运，刘瑞齐被调到“华侨先锋大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岳父从海外给齐瑞齐来信说，自从他不辞而别回国以来，其妻日夜思念，忧郁成疾，终于病倒在床。老岳父急切盼望他能有一个机会南返团聚，无论该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可立即汇来。读着海外来信，刘瑞齐流泪了，预感妻子将发生不幸，但为了民族大义，他只好擦干了泪水，在回信中写道：“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

接下来，太平洋战争很快爆发了，日寇疯狂南进，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刘瑞齐奉命运送远征军入缅，经历了一段最艰难的战斗岁月。

后来刘瑞齐才得知：妻子病危时，老岳父关掉商店特意回国寻找他，因遇太平洋战争爆发，回不了南洋，便辗转回到老家永春，滞留至战后才重返马来亚，可是其妻早已病逝了。

忍痛辞别新婚的妻子，离开温暖的家，千里迢迢回来共赴国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妻子病了，岳父来函催他回南洋关照一下，救妻子于垂危。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抗战胜利，刘瑞齐有家不回。昔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佳话。今朝，刘瑞齐为了抗战救国，置新婚妻子于不顾，这种公而忘私的襟怀和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也当载入史册，传之千秋。

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抗战胜利，多少华侨青年作出了牺牲，多少南侨机工的妻子、亲属作出了奉献。

广大华侨青年，千百万海外侨亲为抗日战争付出的代价，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是一张南侨机工李飒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是华侨青年与傣族姑娘姻缘结合的珍贵文物，它蕴含着海外赤子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神奇般的爱情故事，也是南侨机工李飒回国参战的实物见证。

这张“结婚证书”颇具特色，它既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展示了百年好合的祝福；又有爱神丘比特红箭，象征千里姻缘一线牵，可谓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神奇传说相结合，真是“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它伴随主人历经沧桑，从烽火连天的滇缅公路的抗日军运线上，到抗美援朝硝烟弥漫的战场，又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折腾。辗转近半个世纪之后，“婚书”虽已有些残缺脱落，但文字大都隐约可辩。

**试考订如下：**

**结婚证书**

**民国□□年十二月初二日生，福建安溪县人**

**民国□□年四月初四日生，云南省龙陵县人**

**今由**

**刘攸齐  陈东山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

**日上午十二时，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婚礼**

**恭请**

**连文瀛先生证婚。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

**年瓜瓞绵绵，尔唱乐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结婚人   李飒  刘学义**

**证明人   连文瀛**

**介绍人   刘攸齐  陈东山**

**主婚人   李清倩  刘仕书**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五日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婚书”标明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时间为1941年2月15日，即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期间，使这张“结婚证书”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华侨抗战历史见证。

“华侨先锋大队”，是由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于1940年组成的一支军事运输车队，全大队200多辆各式车辆全部由海外华侨捐赠，200多名成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清一色由海外侨胞组成。大队长为麻埠华侨机工刘贝锦（永春籍），该“华侨先锋大队”是“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朝气蓬勃的一支抗日队伍，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战线上的神行太保”。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的统计，在滇缅公路畅通期间，每日平均输入军事物资不下300吨。“婚书”上的证婚人连文瀛，就是“华侨先锋大队”的大队副，系莆田籍新加坡第四批回国机工；介绍人刘攸齐、陈东山，亦均为南侨机工。

新郎李飒，又名李石飒（李屑），是马来亚吉隆坡热情奔放的侨生，原籍福建安溪龙涓乡。1939年他呼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舒适安稳的生活，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服务，分配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当驾驶兵，每天满载着抗日军火穿梭在滇缅公路的下关（常刮大风）、祥云（有美丽的茶花）、苍山（终年积雪）、洱海（明月逗人爱）之间，南侨机工戏称为“风、花、雪、月”之境。而新娘刘学义，则是云南龙陵县的傣族姑娘。正是由于抗战期间在滇缅公路上的奇特遭遇，使万里之外归来的海外赤子与傣族姑娘在烽火弥漫的战斗空隙中（1941年2月）喜结良缘。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前夕，笔者来到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年逾古稀的李飒、刘学义老夫妇，据他们的追忆及退休在泉州的几位古稀老华侨机工的补充介绍，举行婚礼的那天，数百名南侨机工战友欢聚一堂，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里，大家举杯痛饮，载歌载舞，把婚礼办得喜气洋溢。热火朝天。

抗战胜利之后，李飒复员回到家乡安溪，并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50年代中期转业至福建省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5年光荣离休。如今，李飒、刘学义夫妇正在泉州安度幸福的晚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于1942年4月由缅甸入侵云南，沿滇缅公路进逼惠通桥。5月5日，国民党守军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寇阻拦在怒江西岸，结果使大批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陷入敌手，幸存者廖廖无几。不久前，笔者有幸在福建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当年炸毁惠通桥的现场目击者——南侨机工郑天赐，他是断桥之夜泅渡怒江天险归队的幸存者。

年逾古稀的郑天赐，个子矮小，红光满面，行动举止敏捷，记忆力很强。他原籍福清，1918年出生在新加坡，后随父母迁居马来亚柔佛居銮，小学毕业即在自家开设的修理行修车，20岁开始开车。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参加第四批机工团，并将自家的修车工具也一起带回国。他编入西南运输第14大队，行驶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

郑天赐回忆说，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惊险遭遇，而他至今印象最深的则是惠通桥（见图28）炸断之夜泅渡怒江天险的经历。

那得从1942年滇缅公路的大撤退说起。由于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入侵云南，抗战大后方突然变成抗日最前线。滇缅公路作为抗战期间我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进口物资由缅甸输入，其中以军用物资汽车、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为最多。当日寇入侵缅甸之后，南侨机工抓紧抢运，力图将大量军用物资撤运入国门畹町。此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满了就沿路边堆放。从畹町到保山、下关一带，沿途成千上成的汽车，往来不绝，紧张抢运。迨腊戍仓惶失守，所有的车辆载物资、难民撤退，接踵于道途，争想逃难，惊惶混乱。5月3日，日寇占领畹町国门，战局突然急转直下，这些重要军用物资已无法抢运，又不忍心把它留给敌人，于是南侨机工就放火焚烧。

郑天赐一行四人，小队长陈文芳、南侨机工王亚十，以及一个姓李的广东人（被称为李广东），行车由缅甸回国，遭空袭时陈文芳被炸死，只剩三人随着溃退的车队撤退出畹町。此时，日寇穿着中国军装夹杂跟踪而来，利用我们的混乱，企图跟着大批撤退车辆偷混过惠通桥。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一行从腊勐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时，已经传闻要炸掉惠通桥以阻敌，大家急着抢超车，有时几辆车挤在一起，进退不得，结果互相阻塞，走走停停，欲速不达。当时车子过桥是一辆一辆地过，人拥车挤，行动非常缓慢。大约上午9点左右，敌军占领腊勐，发炮将怒江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住，惠通桥两头的车辆停满公路上。郑天赐的车子在桥西几百米处挤不动了，从驾驶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惠通桥上两个中国士兵，已将炸弹摆在桥板上，正在忙于摇发电机的接线操作。同时，守桥部队挥舞着旗子，催促人们尽快跑步过桥，慌忙当中，忽闻枪声，混在车队中的日军先头部队以为被发觉，当即抢占有利地形，开枪向东岸射击。守桥部队立即炸毁惠通桥，“轰隆”一声，整座惠通桥坠入江中，连桥上的汽车行人也掉入江中，车毁人亡，凄惨万分。从郑天赐的记忆，时间是5月5日的中午。

惠通桥炸断了，郑天赐匆忙离开驾驶室，躲进山林中，等到天色已黑，才撬开汽车轮胎，用口吹气，与王亚十、李广东三人合抱这个“救生圈”横渡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底下还有漩涡，三人冻得浑身打颤，直起鸡皮疙瘩，大约漂了近一小时，才登上对面沙滩上，已经精疲力尽了。

郑天赐三人泅水过来，又急忙爬山上了公路，走了一程，到了“老鲁田”，对岸日军阵地开炮过来，好危险，郑天赐他们只好绕过这段路。原来此处地形呈一U字形大弯，从惠通桥至老鲁田相距数公里，敌人在腊勐山炮击桥东岸并封锁老鲁田西边的一个拐弯处公路，只要弯内的车一露头，炮就打过来了，致使挤在弯内的汽车无法通过这一封锁线。郑天赐三人好不容易绕过这段路，在路边看到一辆军车，驾驶兵已被打死，就拉开那个死者，发动一下，车子还可以开。便开着车子朝昆明撤退。半路上，有一宪兵连长拦车，将他从缅甸带来的一个部属让郑天赐载回昆明。郑天赐向那人开了一张证明，便于路上通行，就将车子开回昆明黄土坡。交车之后，有关当局竟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至此，大家就莫明其妙地失业了。

现居住在厦门的退休驾驶员庄霖助，是福建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他原籍惠安，1920年出生在马来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在他读小学时，父母因事回国，他被安顿到槟城大姐家中。小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学修车。出师后，当了汽车驾驶员。在当时，司机的待遇较高，月薪足够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七·七”事变后，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祖国大地。庄霖助身居海外，深知华侨与祖国的依存关系，深感一旦祖国被日寇灭亡，华侨将一个个成为海外孤儿。激于爱国义愤，17岁的庄霖助积极参加槟城筹赈会的工作，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并参加青年歌咏队，上街义演、卖花筹赈，以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唤起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笔者专程前往录音采访之时，他追忆难忘的往事，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悲壮的抗战歌曲来！

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之后，急需大量驾驶人才，陈嘉庚先生发出爱国号召，立即得到南洋华侨青年的热烈响应。按规定应20岁才符合条件，而瞒着家人前往报名的庄霖助年仅19岁，他便多报了一岁。经过体检、驾驶考核并办好一切手续之后，直到回国前夜他才悄悄告诉大姐。这可把姐姐急哭了，因为父母回唐山时，就把他托给姐姐照料。姐姐培养他上学读书，又帮他谋到司机职业，正期待他好好工作，成家立业，可现在却突然要回国参战，此去安危未卜，当姐姐的实在不放心。可是庄霖助认为，国难当头，眼看祖国军事运输正急需熟练的司机，自己又具有这项特长，理应回国报效。姐姐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只好同意，并连夜帮他整理行装，但附加一个条件：抗战一胜利立即回南洋。

启程前，槟城回国机工队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送，槟城筹赈会主席刘玉水（惠安籍）发表讲话，筹赈会总干事、汽车司机公会主席庄明理（泉州籍，解放后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亲自授予南侨机工队旗。槟华抗敌后援会赠给庄霜助一面“为民先锋”的锦旗以及天赐他们幅绣着“杀敌光荣”、“为了祖国踏上征途”的绢绣。庄霖助至今仍珍藏一张当时的回国纪念照片，上面写着“槟城萍羽球队欢送回国抗日机工  民国廿八年七月五日。”

庄霖助一行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从槟城乘轮船到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他用闽南方言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鼓励华侨机工回国后勇敢战斗，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给每位回国机工以莫大的鼓舞。

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计330多人，乘“丰庆轮”先到西贡，然后转火车抵达昆明。经过军训之后，1939年10月，庄霖助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第45中队。当时大队部设在广西凭祥，而中队部则设在镇南关的一个寺庙里。南侨机工车队主要任务是从安南的谅山、同登运汽油等军用物资至南宁、柳州前线，从国内则运出桐油等。该运输线山路崎岖，且时常遭敌机突袭，沿途处处是险境。

1939年11月14日，庄霖助从安南运军火至广西龙州，回途车子被敌机炸坏了，等了好久才搭上同大队华侨机工李则权的车子回队。由于路基不固，加上雨天路滑，在一急转弯翻了车，庄霖助头部被撞伤流血，右手肘部，李则权也受重伤。幸亏后面车队战友及时抢救，分队长林己茂（厦门籍南侨机工）连夜开车送往南宁美国教会医院治疗。三天之后，庄霖助虽然脱了险，但手臂崩折却接错了位，疼痛难熬。此时因战事吃紧，眼看南宁朝不保夕，美国医生考虑到日本人打过来后连自身也难保，只好让庄霖助裹着绷带匆匆出院离开南宁。南侨机工林己茂平素喜欢摄影，这一天还特地为庄霖助抢拍了一张断臂挂着绷带的纪念照片，上面写着“翻车后第四天，1939年11月17日摄于南宁”。庄霖助从南宁撤至柳州，住进一位民间武林高手的诊所治疗，断臂很快就接正了。没过几天，便传来南宁沦陷的消息。

1940年春，庄霖助伤愈后，立即去找车队，可是原来的车队因南宁、昆仑关、武鸣等地失守而退入安南境内的高平，另组成特别大队。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大队部，随即投入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主要路线是由海防运进广西的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然后转运至国内各地。日寇占领海防后，该路被切断，特别大队撤回国内。经过重新整编，1940年7月，庄霖助被编入“华侨先锋第二大队”，开赴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两个大队的大卡车全是由海外华侨赠送的，装备新士气旺，成为滇缅公路军运线的一支生力军。此时，恰逢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问，陈老先生亲切勉励南侨机工坚持到底。庄霖助作为华侨机工代表，还当面向陈嘉庚先生表示，南侨机工一定不辜负海外父老的殷切期望，坚持抗战到底，为华侨争光，为祖国争光。

南侨机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庄霖助回忆，当年战斗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每个人都必须闯过种种难关，他曾亲睹许多机工战友或因险路翻车而牺牲，或因瘴疟侵袭而病逝，或因敌机突袭而殉职。庄霖助本人虽以娴熟的驾驶技术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险阻难关，但因过度劳累而患了严重胃病，却仍咬牙坚持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入侵缅甸，按照中英协议，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庄霖助奉命在运送远征军入缅的途中，因胃出血而被送回昆明惠滇医院治疗。不久，远征军战事失利，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惠通桥，中国守军自炸此桥，以阻抑日军的进犯。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至1942年的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万多吨，即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达300吨以上，可见南侨机工在抗战运输线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惠通桥炸断后，中缅运输局（原西南运输处）竟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留用一小部分外，其余均放任自流。庄霖助从昆明医院出来后，原来南侨机工车队已解散了，幸遇一位在华侨中学读书的好友，便一起到侨中继续读书。后来，侨中亦遭到突袭，他又失学了，在抗战后期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与许多华侨机工到处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结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庄霖助回到厦门市立医院开救护车。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被选为厦门市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同年被选为厦门第二届人大代表。1954年，他响应政府的号召，赴云南参加支援边疆运输，在沾益汽车站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转到同安县汽车队后，这位当年抗日南侨机工就一直默默地奉献，直至八十年代才退休。

庄霖助退休后，为解决居住厦门的危楼搬迁之事，以一个老南侨机工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很快得到陈先生的复信。陈共存先生1988年特地致函厦门统战部，指出：“庄老先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响应‘南侨总会’征募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呼吁，为爱国热情所驱使，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抗战物资运输工作……他所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希望贵单位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协助，解决他的困难，是所企盼。”在福建省和厦门市侨务部门及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庄霖助的搬迁得到了落实，照顾搬进一套新房，地址就在华侨博物院旁边。现在，庄霖助正安度幸福的晚年。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滇缅公路新开辟通车之际，三千多华侨热血青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安逸的生活，奔赴祖国大西南烽火漫天的抗战疆场，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陈嘉庚先生家乡或陈嘉庚公司的人员，现居便设一在集美郊区后溪乡的李荣竹，就是当年积级响应号召起表率作用的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不久前，笔者在陈嘉庚故乡采访了这位默默奉献的古稀老人。

李荣竹出生于同安潘土村，今属集美郊区，自小就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小学读书。1928年前往新加坡，起初在陈嘉庚创办的橡胶制造厂当学徒，后来转学开车，当了驾驶员。由于他性情敦厚，刻苦耐劳，勤奋上进，得到公司的赏识，屡被加薪，待遇优裕，过着小康生活。

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先生及 “南侨总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热潮。李荣竹居安思危，挂念着祖国抗战的命运，积极参加新加坡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卖花义演，宣传抵制日货，并坚持捐出月薪的10%，集中交南侨筹赈总会汇回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动和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李荣竹便带头热烈响应。与李荣竹同为第五批回国的南侨机工计530多人，如今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他仍叫得出许多机工战友的名字：李亚三（与他同乡同厂）、林水咸（厦门籍，任领队）、刘志仁（厦门籍，今在云南）、陈武烈（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郑天赐（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邓文聪（南侨机工联谊会副理事长，今在云南）等。此外，他还记得同来自陈嘉庚先生故乡而先后回国的南侨机工：许成瑞（同安籍，任第二批机工团副总领队，已在抗战中牺牲了）、洪华民（同安籍，今在四川宜宾）、林己茂（厦门籍，战后留居成都，已逝）、陈友国（原籍集美，第九批回国机工，战后复员返新加坡）等。

据李荣竹回忆，当时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的南侨机工共有三千多人，先后分九批回国，经过昆明集中军训之后，便陆续编队调往各个战区从事抗战运输工作。南侨机工先被编为西南运输处第11、12、13、14等大队，后来，又专门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大队”（分为第一、第二大队）。此外，有的则混编于第1、3、5、9、15大队当中。车队均按“三三制”编队，即三班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外加一个补充中队）为一大队。每一个大队约有200多人，配备150多辆卡车。南侨机工的车队，组织军事化，纪律严明，被誉为“抗战运输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李荣竹经昆明军训考试合格之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任驾驶兵，奔赴滇缅公路抢运军火。初到滇缅公路，使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该路之险要，令人咋舌。滇缅公路横跨横断山脉，途中高山峻岭，迂回重叠，连绵延布，其海拔高达三、四千米，而低谷则深五、六百米。两峰之间相望近在咫尺，而汽车盘旋上下要花大半天。车队盘旋上山巅，只见层峰叠嶂，云雾迷蒙，一侧悬崖峭壁，一侧深谷大川，沿途陡坡急弯，令人迟迟动魄。在这条路上抢运军火，随时随处都有翻车的危险。李荣竹曾亲眼看到许多南侨机工战友车毁人亡的惨景。但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再陡再险也难不倒。为了战胜险路关，南侨机工想出许多办法，譬如最陡处上不去时，后面车的司机便下车用垫术垫住后轮，然后继续往上爬。又如上下陡坡又碰上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处架上渡板，前轮过后，后轮靠外边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渡板上滚过，避免后轮悬空翻车的惨剧。

由于滇缅公路这一条国际运输线不断为中国抗战“输血”，因此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出动大量飞机重点轰炸功果桥及惠通桥，企图扼断咽喉。有一次，李荣竹开车到功果桥，目睹日机轮番俯冲轰炸，江面水柱冲天，桥面被炸断了，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用钢丝拉到西岸，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运过江，日夜不停，保持这条军运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李荣竹与南侨机工战友们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抢运任务，曾受到上级的嘉奖。他至今仍珍藏一份民国三十年（1941）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汽车运输第十四大队奖状（奖字第037号），上面有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边是孙先生的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奖状内容为：“查本大队第十四补充中队驾驶士李荣竹，品技兼优，服务勤谨，应予发给奖状，以资鼓励，此状。发给李荣竹。大队长陆绍康、大队副冯翠富。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

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侨机工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李荣竹复员南返新加坡，受到陈嘉庚先生及海外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赞誉他们为祖国争了气，为华侨争了光。

1948年，李荣竹再次回国，在老家定居。1949年，他在家乡积极参加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荣立三等功，1950年福建军区给他颁发奖状，同时，还荣获“支前光荣证”。1959年，李荣竹参加杏林建委材料运输工作，任驾驶员。1961年下放回家参加劳动。1986年，我国政府特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目前，李荣竹在家幸福地安度晚年。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1939 - 1989）前夕，笔者在莆田县侨联访问了原马来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他是1939年参加第九批机工团赴滇缅公路服务的，战后复员南返。50年代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长期从事侨联工作，直至1978年退休在家。余汉洲回忆录，为我们编写南侨机工史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史料。

余汉洲于1913年出生在莆田山区一个小村庄，因其父患病未能下田劳动，靠母亲辛勤操劳，难于维持生活。5个姐妹不得不先后送给人家，4个兄弟最后也留不住，不得不将最小的弟弟送人。余汉洲只念了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便跟人学制棕衣手艺，18岁时到涵江一家客栈当杂工。21岁时（1934年），他向亲友借了路费，前往南洋投靠二哥。他二哥是早几年到马来亚的，在柔佛新山开一间理发店。他由二哥介绍，找了修补车胎的工作。不久，他跟朋友学开车，考取驾照之后，生活开始好转起来，能汇款接济家用。

经过几年的辛勤积累，正当他准备与朋友合股做生意时，不料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海外华侨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余汉洲也热心参加卖花募捐等爱国活动，并且愿捐出工资的一部分，统一交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危急关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登报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余汉洲看到好几批华侨青年参加机工团回国的动人情景，也产生报名回国的念头。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借路费南来的，如今有了司机职业，安稳舒适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还可以经常汇款帮助家用。回国要吃苦，甚至流血牺牲。他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日军侵华暴行，得知祖国同胞遭受蹂躏，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寇愤怒的心情，便下定决心报名回国。

余汉洲拿定主意后，便到柔佛振林山黄梨厂找当地筹赈会报名。但按规定还要商店担保。他因原来拟办的合伙商店还未开张，第一次未能报上名。于是，他回来找一个朋友介绍请振林山振兴食品公司作担保，由该公司老板带去办理报名手续。接下来，他们集中在黄梨厂进行训练，不久，全体到新山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一关一关顺利通过了，可是，最后一位医生却突然通知余汉洲留下，其余的先回去。这使他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妙，于是忐忑不安地望着医生。医生问：“家里还有兄弟吗？你为什么要回国？”余答：“兄弟有三个，我属老三，回国为了抗日救国，虽然有危险，但家中有兄弟，没有关系！”医生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志气，你合格了，让你回去救国吧！”说着，又从裤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余汉洲觉得奇妙，走出门口就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哥余玉清写的，目的就是阻止他回国。二哥早几年来南洋，赤手空拳谋生不易，如今已开了一间不小的理发店，他曾多次劝弟弟不要回国，希望弟弟珍惜时机多赚些钱寄回家赡养父母，做个孝顺儿子。可是余汉洲偏偏听不入耳，故写信请求医生留人。信是这样写的：

“医生：我只要求您说一句话就好，余汉洲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回国，附上二百叻币给您吃茶，谢谢！余汉洲之兄弟托！”

当天晚上，余汉洲带这封信及二百叻币去找二哥，讲明回国的决心，至此，二哥亦不再强留了，只是抱着弟弟大哭一场，然后交代今后应自己保重，抗战胜利应及早回来。

告辞了二哥，余汉洲等一行集中在振林山黄梨厂待命，等待南侨总会通知返国日期。他们这一小队，选出队长陈友国（原籍同安集美），副总长陈聪明（同安籍），队员是李祥发、陈仁坛、林兆坤等20多人。

余汉洲等一行由新山到新加坡统一编入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这批人数最多，达500多人。1939年8月14日，他们由新加坡启程，数天之后抵达昆明。

余汉洲刚到昆明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感到很不习惯。首先是伙食差，但华侨机工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次，觉得军训内容枯燥无味，机械死板，华侨机工普遍反映，回国参加军事运输，只要能熟练驾驶及维修就行了，不必那么呆板地操练;此外，还有打架的问题，机工曾与昆明军校的学生在街上因口角而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

1939年12月训练结束后，余汉洲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时第五大队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运载的都是抗战军用物资。敌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曾有一个时期，白天不能开车，改在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停车，只靠夜间抢运。

有一天，余汉洲出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桐油站三公里处，突遇敌机突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亏人未受伤。还有一次十分惊险：余汉洲一组三车由毕节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坂桥附近，敌机扔个炸弹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水沟里，余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泥土，汽车报废了。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几乎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余汉洲也是这样。他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还有许多亲眼目睹的惨剧：

第12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杨金清，原籍莆田大洋乡。1941年由保山开车来昆明，停车在西站修理，因紧急警报由车场开出避突袭时，在西山公路急转弯处撞车死亡，遗体由西南运输处就地埋葬。

第5大队补充队有个新加坡南侨机工，土名叫黄番仔，亦是莆田籍。1941年5月间由贵州运钨沙出发，车经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被云南平彝弯检查站哨兵开枪打伤，因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经第5大队13中队发现，报告大队派人去处理，结果只好就地掩埋。

1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陈玉蕊，也是莆田人。1942年4月间，由下关出发去缅甸八莫抢运汽油回国，因该路是单程线窄路，从八莫开夜车的途中不幸翻车，掉入深谷，连车带人不见踪影，加上天黑无法抢救，连遗体也无法收拾。

后来，西南运输处改为中缅运输局，下关第二大队的新加坡机工方九十，原籍福清，1943年12月间，由下关出发往贵州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大队部派人前往收尸就地埋葬……仅余汉洲记忆所及，车毁人亡的南侨机工，现在还得叫出名字的有十几个人，还有更多的是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历史是不会将他们遗忘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陈亚清，祖籍莆田，属第9大队。有一次由保山出发到腊戍武器返回，行驶至惠通桥边，不幸由半山翻入深谷，幸而及时发现，经抢救头部缝了21针，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一条命，这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战后他留在云南，直至不久前逝世。

1942年5月由于日寇入侵，滇缅公路切断了，余汉洲与广大南侨机工一样，度过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进入滇西收复失地的反攻战斗中，南侨机工继续投入运输工作。1943年底，重庆派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滇缅反攻指挥，南侨机工又归入十一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协助运兵员、武器奔往前线。在紧张的松山反击战中，余汉洲曾连续十几天日夜抢运。夜里没有机会睡在床上，只好在驾驶室打盹。有一次，余汉洲的车出故障，暂停放在保山修理，搭别人的车回下关队部，在离保山30公里处，因车开太快而转弯翻入路边，四轮朝天，他的脚受了伤。幸好治疗及时，康复后能继续开车。

1945年8月，余汉洲出车到昆明，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车子交昆明中缅车场，便到昆明华侨互助会，准备等候办理复员手续。但是好事多磨，复员工作被拖了一年多，经陈嘉庚先生在海外奔走呼号，国内机工选代表多次到重庆交涉，最后才办理复员手续。

余汉洲参加第一批复员机工，由昆明出发，取道贵州，经广西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经乘轮船经安南抵新加坡。在新加坡登岸时，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不久，南返的机工在陈嘉庚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正式组织建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余汉洲作为首批基本会员，担任该会交际职务，积极奔走为复员机工谋福利。此时，他还参加兴安会馆、司机工会、柔佛州理发总会等各种社团的活动。为了开展各地交际工作的方便，他开着一辆小轿车四出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在海外联络各界人士热烈庆祝，并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0年代初，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更给海外华侨以巨大的鼓舞。祖国，象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海外赤子回归到她的怀抱。一批批青年学生回国升学，一批批科学家、技术人才从世界各地冲破重重封锁回国报效。余汉洲亦决心回国，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5年3月22日，余汉洲启程回国。回国之前，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写了四封信由他带回。一封致北京中侨委，一封致陈嘉庚先生，另外二封分别给汕头海关及莆田侨委会。其中致陈先生的信，是全体南侨机工职员写的，拟组织发动一批海外华侨技术人员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船到汕头，边防部队派人前来，余汉洲取出致北京中任委和陈嘉庚先生的信，他们立即与北京通电话，得知陈先生近日在福建集美，便送余汉洲到集美。

余汉洲到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说，海外拟组织南侨机工等技术人员回国参加工作，现时对这批人不大适宜，因这批人年纪都大了，解放军队伍是十八至廿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叫汉洲写信给南洋，不要组织机工回国，理由介绍给他们听就可以。陈嘉庚先生又问：“你要回南洋，还是要留下？”余汉洲说，要留下来工作。陈老先生便对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今后本地政府会通知你的。”

余汉洲回国后，定居在故乡莆田，1955年7月间，他到县政协报到，担任华侨组工作，并任莆田华侨新村筹委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县侨联会选他为华侨代表，连任华侨代表至今，又当选为历届侨联委员，并选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70年10月，余汉洲调到县干部招待所，直至1978年退休。

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经历，余汉洲老人感慨地说：“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青春无悔。最近政府又专门下文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还在云南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这不仅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心满意足，而且更可以告慰那些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了！”

现居诏安县梅岭乡玄钟村年近八旬的张章胜，是目前国内唯一幸存的砂拉越南侨机工。他6岁之时随母亲到砂朥越，少时即进华文学校读书，课余则帮家庭收燕窝。小学毕业后到美里坡“亚细亚煤油公司”学开汽车。经过磨炼，不论是驾驶技术，还是机修都很熟练。1939年，陈嘉庚先生代表南侨总会登报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激起冲天巨瀾。张章胜与一群热血华侨青年热烈响应，认为国难当头，正是报效祖国的时机，理应将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为避免家庭的阻挠，他索性不告知父母，悄悄地跑到古晋坡姑妈家中，打听到设在轮渡码头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报名处”，然后改名为“张志强”报名应征。他走后，家人不知其下落，直到1957年夏，才知他尚在人间！

报名的第二天拂晓，张章胜举着一面题着“华侨抗日回国服务团”的大旗来到码头，与方亚力等16名应征者一起登船赴新加坡集合。几天后，等候马六甲、爪哇等地的人员到齐后，才启航回国，当时全队计117人，组成第七批回国机工队伍，领队是广东惠阳籍的廖萍。队员当中印象较深的有现留居福建龙岩的黄礼归等。

张章胜一行到达昆明后，在潘家湾训练所仅受训十余日，即转到贵州唐家培训近半年。他编入“后方勤务部辎重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驾驶一辆二吨半的福特牌卡车，车号为：19445。八连是个“华侨连”，人员主要由南侨机工组成。他们奉命开赴滇缅公路及各个战区从事军事运输。张章胜还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南宁之战，昆仑关之战等，他与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输弹药和军粮等，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张章胜作为机工代表在柳州晤见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代表南侨总会向劳苦功高的机工致以亲切的问候。当陈先生听到南侨总会送给机工们的一批慰问物品（每位机工可得九件）被某些贪官污吏鲸吞时异常气愤。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之后，张章胜与同营机工陈玉水（星州一富翁之子）就流落在江西会昌一带，数月之后又辗转到湖南衡阳、广东韶关、广西桂林。在桂林五华山，他拜访了宗亲张贞（诏安人，时任军委会战区风纪第四巡察团上将主任委员），汇报了回国为抗战服务的详情，得到嘉许。由于张贞的介绍，他被安排在桂林“江南盐务联运处”开车，后来该处改设在江西赣州，即随之抵赣。因其技术高超，他特别被安排为处长宋毅华（福州人）驾驶福特牌小轿车。抗战胜利后，“江南盐务联运处”撤销，张章胜再度失业，只好到处替人临时开车。最后辗转回到诏安老家。

张章胜当年甘愿舍弃海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国参战，是广大侨胞为抗日战争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历史见证人。

抗战期间，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数千名南侨机工毅然抛弃海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疆场，在华侨史上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篇章。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中，竟然有女扮男装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便是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人物之一。

李月美已于“文革”动乱中的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笔者于李月美逝世20周年之后的阳春三月，前往广东英德华侨农场采访她的几位女儿，承蒙提供第一手资料及珍贵的历史照片，谨以此文献给这位“当代花木兰”的在天之灵！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父亲李荣基，是一名华侨商人，为人豪爽正直。母亲梁凤蝉，善良贤惠。李月美兄弟姐妹计九人：锦伦、锦全、月明、月美、锦容、锦和、锦圆、月琴、月平，她居第四。

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文学习成绩优异，幼小的心灵向往祖国。随着岁月的递增，她长成一米七十多的高个子，象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文娱体育，能歌善舞，吹口琴、弹吉它，样样拿手;更爱好游泳、打球、骑马、赛自行车，还学会开汽车。正因为她会驾驶汽车，参加了机工团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乃谱写出名闻海内外的传奇故事。

“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宣告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亦震惊了海外华侨的心。战争初开，日寇咄咄逼人，长驱直入，祖国的锦绣河山大片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难，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忧心如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李月美和同学们热血沸腾，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宣传队进行义演，上街卖花，抵制日货，还组织女蓝球赛，将募捐到的款项交给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

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1938年底，广州沦陷，香港通道被阻，积存在港的大批军火，除部分改由安南运入广西外，大部分移往仰光，准备由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运入云南。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奇缺，因此，西南运输处致电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广大华侨青年闻风而动，踊跃报名参加，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李月美被这股爱国热潮所鼓舞，也兴致勃勃地前往筹赈会报名，却被拒绝，原来不招收女机工。怎么办呢？难道女人就报国无门吗？李月美心里不服气。她想起在华侨学校读到的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自古就有女扮男装上战场的巾帼英雄，千古流芳，难道不正值得后人效法吗？

终有一天，李月美瞒着家中父母，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到一个不熟悉的埠头报名应征。她的体魄和声门，她对于运动的嗜好和泼辣个性，谁也没觉察到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侨工。

她终于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来。

李月美没有把回国的事告诉家人。为了祖国的亿万人不受倭寇凌辱，不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李月美将自己豁了出来，顾不得儿女情长了，横下一条心，悄悄离开家门，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1939年2月，李月美一行经过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在安南上岸，又经过陆上几天几夜的颠簸，乘火车到达祖国大西南重镇——昆明。在昆明经受军训，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李月美既有男子的粗犷，又有女子的精明；既有男子的豪爽，又有女子的细心，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都没有让同伴怀疑到“他”是个女子。李月梅在感情深处，更以一个女性的全部温柔，表现在她所进行的救死扶伤的行动中。战场抢救伤病员，军运线上抢运医药、武器，到处都有她的足迹到处都有她的嗓音。在红十字会里，谁都认识“他”，赞扬“他”，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女扮男装！

1940年某日，李月美因公在滇缅公路一急转弯处不慎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幸亏过路的南侨机工车队及时发现，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把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急救。

杨维铨是个朴实的汉子，论个头，比李月美要矮一截。而当他人危急时，他奋不顾身地帮助别人，显得精力过人，神采奕奕。他与李月美素不相识，他救下李月美，又亲自送“他”入医院。救人救到底，他甚至留下来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终于，李月美再也没能隐瞒自己的真相，她把自己的真相向这邂逅相逢、热心仗义的男子汉和盘托出，并要他为之保密。杨维铨满口答应下来，仍象小哥哥一样护理她，而且更加尽心尽力。

一个月后，李月美康复了，她对杨维铨的诚实和善良深有感触，也渐渐理解了他的真挚感情。他们这两个司机伴终于相爱了。当杨维铨带着还她“女儿装”的李月美来到队长面前，队长和南侨机工战友们无不称奇。这一段滇缅公路巧结的传奇姻缘，这一位花木兰式的巾帼女子，在海内外顿时被传为佳话。

星马报界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加以渲染报道。

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彰其爱国精神，特地题“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李月美作永久纪念。这面红绸锦旗，李月美一直珍藏在身边，视为至宝，（可惜在1966年红卫兵“大破四旧”狂潮中，被抄家至今而下落不明）。

从此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白衣天使”。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护理、照料为国负伤的抗日将士，以热情的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凡是经她护理过的南侨机工伤病员，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对笔者回忆此事之时仿佛就象昨天一样，记忆犹新。从一张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面题的正是：“白衣天使李月美”。

李月美的弟弟李锦容，亦于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在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有机会经常会聚一起。夫妻恩爱，姐弟重逢，那是李月美最幸福的岁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亲身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姐弟，与幸存的南侨机工战友们，怀着无比欢乐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为表彰南侨机工赤子功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了奖状，文为：“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也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李月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

1946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当年她乔装打扮不辞而别，曾使母亲老泪纵横。而今“花木兰”重着女装奏凯南返，全家团聚，欢天喜地。李月美特提议多拍几张照片。

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之后，李月美便与丈夫杨维铨带着孩子定居缅甸，开设一间咖啡店。数年之间，她连续生了十个孩子，把精力倾注在培养孩子方面，忘不了对孩子进行中华文化教育，牢记华族之“根”。

李月美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到祖国读书吧！”李月美把总理的教导铭记在心，为此，她计划将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翻译人员，为中缅文化交流和友谊贡献力量。于是，她有计划地开始实施培养子女学习中、英、缅多种文字。

1965年，李月美首先将四个较大的孩子（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送到广州侨校补习。结果，善国和玲美双双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消息传至缅甸，李月美非常高兴，提出将家中另外四名小孩也送回国读书。

可是，在继续将子女送回国读书的问题上，李月美曾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杨维铨希望留几位在缅甸身边。而李月美则坚持全部送回国。最后，李月美说服了丈夫，并决定她本人带孩子全部回国定居，以培养子女读好书。1965年11月，李月美带着另四个小孩（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薏和幼子善中）又回国了，只剩丈夫留在缅甸。

没有想到，李月美回国才几个月，即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迅速地卷入漩涡。她初住广州，却很快被下放至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文革”浩劫一开始，农场开始对归侨划分“成份”。以下是一次让她极为伤心的对话：

“工作组”：“李月美，你知道你在海外是什么成份？”

李：“不懂得。”

“那么你小时候是干什么的？是否给地主放牛？”

“我小时候在南洋读中国书，没有给地主放牛。”

“那么你小时候生活很好？”

“是的，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好。”

“那个时候（1949年以前）生活很好，肯定是资产阶级。”

“？”（李月美一愣，不懂如此“逻辑”，没有回答）

“你长大干什么？”

“我长大时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日，参加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军事运输和‘红十字会’工作。”

“西南运输处是国民党的，你知道吗？你是国民党残渣余孽！”

就这样，李月美被划为“资本家”成份，再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

下田劳动就下田劳动，李月美二话没说。可是，奇怪的是当时全国流行“政治评工分”，身强力壮的李月美拼命出工出力，出了十分力只能评五分工分，她想不通了。接下来，有人竟怀疑海外亲友寄来给八个孩子读书的钱是“特务经费”，迫得子女没权利读书，也得下田劳动，每天挣正常劳动力工分的1/4。海外经济来源断绝之后，李月美一家生活发生困难，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挣工分所得却填不饱肚子。为此，李月美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处于困境中的一位缅甸归侨的来信后，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接到总理复信的李月美，这位一向具有男子汉坚毅性格的巾帼英雄，泪水湿透了枕巾。

有了总理的亲笔信，照理问题该好解决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人妖颠倒的特定的历史年代，给总理写信反而成了李月美的罪名！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更大的灾难在后头等待着她！

造反派气势汹汹窜入住宅抄家了，所有海外带回的信件、书籍、南侨机工历史照片等，全部被搜去，连何香凝题的“巾帼英雄”红绸锦旗、周总理亲笔的信，也不例外。其中能证明“好人”身份的何香凝题词和周总理亲笔信则被弄得下落不明了;而穿着西南运输处南侨机工制服的照片，却又作为“坏人”的罪证。

迫害一步步升级。开始搞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每天强迫李月美敲锣游斗。所到之处，人们拳打脚踢，小将们高兴时随时揪着头发来回折腾。不多久，李月美的身体垮下来了。瘦得皮包骨头，再也经不起长期间的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她时常昏倒过去。李月美再也忍受不了，决心以一腔热血，为祖国人民也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作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抗争！

1968年8月28日深夜。

经过数月的政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者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刚烈的女子，以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转身到隔壁窗口，朝着黑暗中的迷惑星光，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在一片血光中，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把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土地，她如此壮烈地、用自己一腔热血，对“文革”暴行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和示威！

她，就是这位1939年女扮男装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

李月美死得真壮烈，死得象个不屈不挠的烈女英雄！

李月美壮烈牺牲了，她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之下，她没有死在异国他乡;她死在号称“最最革命”的人手里，她死在她梦寐以求的故国家乡;她热情如火地从异国他乡归来，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如此归宿;这是一个无限执着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李月美走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次日早晨，当孩子们醒来之际，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哭声招致“专政队员”上门，在床头开了批斗会，勒令孩子们应与母亲划清界线，不能有一滴眼泪。

●人死不能复生，尸体总得埋葬。“专政队员”就地召集了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省侨委的几位“牛鬼蛇神”，在茶场后山随便挖一个坑，用缅甸带回的那件尼龙蚊帐裹着草草埋葬。

●李月美死后，殃及子女，定量口粮早已吃光了，自留地种的一些菜又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孩子们走投无路，从墙角边捡起抄家时遗漏的一张信封，上面写着父亲老家的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于是，在一个深夜，八个孩子悄悄向母亲坟墓最后磕了头，抄山路步行几十公里到英德县城，因无钱剩车，只得继续步行，饿了就咬几口辣椒配路边的凉水，经几天跋涉，来到广州车站，准备投奔海南故乡。

在汽车站，最小的孩子善中手持信封向陌生人打听海南路途，幸亏遇上信封上所写地址的乡亲。这位乡亲听说过同乡杨维铨及李月美的名字，就出车船费将八个孩子带回乡。

当地政府及众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安置了这群孩子。小的继续读书，大的则进厂或下田参加生产劳动。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回来为母亲拾骸。

●物转星移，八年光阴过去了。1976年，孩子们来到英德农场后山，竟找不到母亲的坟墓。怎么办呢？经寻访当年下放农场的省侨办的“牛鬼蛇神”、现已官复原职的老同志，在他们的指点下，才挖出李月美的骨骸，还认得那件包裹着的尼龙蚊帐是1965年由缅甸带回的，因而确证无误。

●1979年10月23日，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召开了为李月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见图71）。平反通知书全文（见图72）如下：

**《关于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1966年我场四清运动后期，亦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在归侨中全面进行评划阶级成份，李月眉同志被划为资本家，并扣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为了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根据英德县革命委员会（1978）第197号《关于取消原驻英德华侨农场四清工作分团结归侨评划阶级成份的通知》精神，现决定：**

**一、公开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强加于李月眉同志的所谓“资本家”、“国民党残渣余孽”应予推倒，有关评划归侨阶级成份的材料应予销毁。**

**三、通知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有关亲友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原发出的有关材料应予收回销毁。**

**四、李月眉同志因以上原因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八日被迫害致死，已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三日召开追悼会。**

**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四日**

在广东陆丰，我循着友人提供的线索，寻访年愈八旬的南侨机工张光旺（又名张万森）。他参加第9批机工团回国，曾在滇缅公路翻车负了重伤，头破血流，右眼暴出，耳朵震聋。经抢救得以死里逃生。我起初猜测，这位负过重伤的老机工，或许已经迟钝，担心能否记得往事了。可是在访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能如数家珍地讲述当年回国参战的全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的回忆，能够精确到几时几刻。例如他回国的日期是1939年8月14日，早上6时在同济医院集中，10时全体507人出发到丹绒百葛四号码头登船，下午三时“丰庆轮”正式启航，8月23日抵昆明。对胜利复员这件事，他清楚记得他们第一批复员机工220人，连家属计421人，于1946年10月26日启程，12月3日回到新加坡，历时39天。这与我从云南档案馆查录的有关史料丝毫不差。我惊叹不已，一再表示敬佩。张老笑着说：“好记性不如勤笔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写日记。当年从回国参战到胜利复员南返的全过程，我都写在日记上。”他转身回卧室从箱子里取出一本珍藏半世纪的日记本。

这是一本泛黄的日记簿，从深浅不一的墨迹及断断续续的记录，可看出主人坚持写日记是费尽苦心的。尽管作者文化程度不高，但他记录真实，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迹佐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侧重摘录“回国参战历程”和“胜利复员南返经历”两段手稿，以飨读者。

**民国廿八年（1939）  八月十四日**

今天，我们五百余司机同志，全体早上六时正到同济医院集中，准备上船开往中国打日本（侵略者）。到了十时许，全体由同济医院出发，到丹绒百葛四号码头。老早就从人山人海的同胞兄弟姐妹等候着我们登船。一队一队登船。同胞们鼓掌欢送。同时，我们“青年抗敌后援会”到来一车同志，欢送并请我到码头摄影留念。在码头上，各位侨胞不愿散去，他们在码头上受太阳（曝晒）。下午三时正，“丰庆轮”将开了，欢送者唱起抗日歌曲，我们皆唱歌答谢。船开了，再会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

**八月十五日  离星加坡的第一天**

下午七时许，本船因有人中毒身亡，情形未明，结果检查本船小贩（即水手），在厦门办有各色酒：三星酒、五加皮、玫瑰露、红米酒、白啤酒，当场查出（有问题）。全体司机同志气愤要打倒汉奸走狗，将小贩处包围，想将小贩丢落海。总领队追来，警笛一吹，将五种色酒交队长转给本船库房化验，然后本队即派纠察队维持，结果查清是日本制造毒酒。被毒死者送落海，事情由船主去办，然后将情形呈星加坡南侨主席办此案。

**八月十六日  第二天**

今天，我们就离开了可爱的马来亚，在船上顺风而漂。上午十时半，天色已变，大风大雨，船身摇动，物件乱翻。同志数百，同时没有一人晕船，皆是铁胆铜人。至十二时十五分，风波更厉害，但是大家都不害怕，一队一队唱歌、做游戏、吹口琴。直到下午二时，才得见风平浪静，只见海中凸出一片大山，海里鲨鱼游来游去，每条都有数十斤。过了好久，天将晚矣，大家准备安睡了。

**八月十七日  第三天**

上午一时，抵安南海，停泊一刻，马上查关，电船驶过来带路。早晨七时四十分抵安南岸。当地政府不许我们司机同志登陆，大家感到失望。我们总领队亲自到中国领事馆，请问当地政府是否许可我们登岸，得到答复：“登岸可以，但要住他们的机关，不准出街，若要上街，衣帽徽章要先交当地政府，要离开时才交给你们。”大家得知这一消息，一概不愿登岸。

**八月十八日  第四天**

丰庆轮仍停泊，本来今天要开往香港，因司机未有登岸不得离开。本早船主与总领队再到领事馆交涉准后，马上打电到河内，特请专列火车运送我们到云南省，结果下午三时十五分，我们一队一队登陆。经过检查关口查毕，中国旅行社派大罗里车送到火车站。而我们士乃队带来大帆布廿二张并药品一箱，被关口扣留，报告中国旅行社转由领事交涉矣。罗里车驶由安南街道经过，安南人穿的服装中国式，男女都穿长衣，没有领子，裤头是白的。言语安南话，口食藕菜，牙齿完全乌黑。车马均靠右边行驶，与新加坡不同。马路边全部种树，电车行铁轨，商店低矮。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安南华侨战地服务团派数十人来维持秩序，以免汉奸混入。旅行社送来供几百人食用的干粮，是订做的长面包，共余千条，罐头鱼二千余罐，中国茶叶数十罐。直至下午六时一刻，快车启动了。华侨战地服务团唱《全国总动员》的歌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东洋鬼子！中华民族万岁！”再会吧，我们专车前进矣！

**八月十九日  第五天**

火车开了一夜，今天上午五时半抵“芽庄车站”休息。八时又向前行进，此地山太多，又进三座暗洞才抵“大岭车站”，再过五座暗洞，十二时半，方到平原。此处一望无际皆是禾田，居民房屋皆是草盖的，或是一种风俗。又经“东作车站”，再过一座吊桥面，有三、四英里长，然后抵“浽和车站”。这个车站房屋商店都没有，只见四周都是铁道，没有停，继续前进，得见大山。火车进入暗洞经五分钟才出山洞口。下午五时抵达“瑶池车站”，此地的警察皆是穿中国装，脚打绑腿，穿黑鞋，头戴安南雨笠，背着长枪，立在车站旁。晚间十时五十分，火车又向云南方向前进矣。

**八月廿时  第六天**

今天我醒来时已六点廿五分了，连过二座铁吊桥，每座都有同新山（柔佛）一样长。七时三十五分到达了“土轮车站”，八时四十五分又到达一车站，增加一节车头（助推），过了一段危险山路之后，后面的火车头就撤下来了。十一时安抵“化化车站”，有粤南顺化救国会欢迎我们华侨青年司机，赠送“保卫祖国”的锦旗，并送中国茶、各种果品，鼓励上前线多杀敌。天气不景，下起毛毛雨，又穿过暗洞、铁桥……到了晚上八点，没有再记，各位同志安睡了。

**八月廿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六十四十五分，我们的快车到达河内，转换火车又前进。天下着雨，附近有乡村，完全被水淹了，不过每家都有一小舟可以避灾。这一路低洼处，都是被水淹的。下午六时半到达“安沛车站”，站上很多热心华侨欢迎。站上有警察维持治安，一位安南警察写有法国文字给我们看，说要同我们回到中国去出力。想此警士明白中日战争的情形。忽然就快到十时半了，我们火车就要开了，他向我们告别、行礼。留在我的日记簿上的这行文字是法国文字（略），是在安沛车站警察写给我们的。意为：祝你们回到中国的时候要达到最后的胜利！再见，再见吧！

**八月廿日  第八天**

今天早上四时半到达河口的法国关口检查站，这边是法国国旗，那边是中国国旗。我们全体司机同志皆穿上军装，戴着军帽，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和走狗！”“我们的领土决不能丧失！”然后，火车分开二列，每列拖六节。早上九时半即开车，穿过许多山洞与急弯，下午四时才到达“芷村车站”。因前面的铁道山高路险，又增加一节火车头（助推），直到后边的路较好，接上的车头才撤下来。……下午六时十分，到达“大庄车站”，逗留一刻，又向前进。七时廿分到达“开远车站”，自大庄到开远经过十六个暗洞。火车停于开远站时，各位同志从未看过云南省的风光，都下车往市内游览。因抗战期间没有建设，街道商店不成样子，街道边都有种树木，不过一丈余高，街道两边非常阴凉。市内的东西百物高涨，但米酒不贵，因本处多出产粮食。忽然时间已到八时半，我们全体同志返火车安睡矣。

**八月廿三日  第九天**

早上七时由开远站动程。在车站边的居民房屋用竹木建的，外面以泥浆涂之，也是一特色。但此地的平民百姓穿着大都破烂，好比难民一样。我们见了，将面包从火车上掷下去给这些同胞，他们非常喜欢。接着，又经过“巡检司”车站、“拉里黑”车站、“西扯邑”车站、“盘溪”车站、“糯租”车站、“禄丰村”车站、“徐家渡”车站、“宜良”车站、“可保村”车站、“水塘”车站、“呈贡”车站，直到晚上八时正才到达昆明车站。从“巡检司”到昆明站，共入暗洞四十二个。到达昆明车站时，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派来很多大架罗里车，将我们送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

自民国廿八年（1939）8月14日离星，23日抵滇，历时整九天。

**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廿六日  胜利复员第一天**

今天是我们胜利复员的日子，第一批复员同志都到西站第四区车场集中。各机关长官、各团体欢送大旗甚多，整个车场都挤满了人，共数千人。八时开会，各长官训话及赠旗。十时完毕，马上开车由武成路经正义路、金碧路、拓东路向东站行进。下午六时抵马龙县，岗哨卫兵说：“曲靖有土匪，你们车子不要前进了。”我们立即交出“委令”，官长看见之后，马上派兵护送至曲靖县，幸平安无事，九时三刻抵曲靖矣。

**十月廿七日  第二天**

我们很早就起来，整理行装，上车待发。命令一到，车子就开，一路平安，下午四时抵达盘县。

**十月廿八日  第三天**

清早全体集中，因一位同志不小心，护照被茶房盗去。我们立即向当地追究，将老板扣留，令其将护照及证件交出来，然后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贵州境内下了很大的雨，大众都受了大雨之苦，下午五时多才安抵永宁镇。

**十月廿九日  第四天**

今天很早就起来，由永宁镇出发，抵达贵阳市三桥时，我们十二辆车子集中排队出发，浩浩荡荡由大街流行至车场。

**十月卅一日  第五天**

因有一辆车抛锚未到，大家就逗留贵阳市。伙食每餐要1000元，房租每晚1300元。

**十月卅一日  第六天**

我们六时起床，全体去参加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贵州省主席杨森向我们全体赠旗：“为国为民”。十时多散会。下午一时半，由杨主席率领全体华侨机工到贵州市运动场、抗战门、胜利门等游览。在中小学大礼堂，杨主席向我们演说，并问及回来服务情形、经过，会毕全体合影。

**十一月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全体向杨主席献旗，锦旗绣着：“惠我侨工”。杨主席说：“明天请你们看戏，太太小孩都带来。”

**十一月二日  第八天**

看戏的时间到了，同志们带太太小孩一起到新声大戏院。“贵阳市各界欢送侨工复员大会”由周市长主持，各界人士赠旗：“胜利荣归”。周市长演讲：“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能达到最后的胜利，运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你们华侨同志担任运输抗战，辛苦八年，今天达到最后胜利，工作完毕，光荣南归矣。不过今天贵州省没有好好招待，请各位多多原谅吧。敬祝各位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会毕，立即演戏：《薛平贵征西》。十二时演毕散场，回旅馆交四天房租，共5200元。从昆明至贵阳计四天路程，在贵阳逗留四天，总计房租伙食50000元。

**十一月三日  第九天**

早上我们将行李搬至车场，十二辆车子排列甚齐，马上出发，下午六时到了马场平。

**十一月四日  第十天**

今天特别早，五时四十分由马场平动身，经过都匀县，那个地方日本鬼子到达过，变成焦地，十二分可怜。下午五时半到达南丹县。

**十一月五日  第十一天**

我们很早由南丹出发，天气很好，大家感到很舒服，梦中就到了宜山县。

**十一月六日  第十二天**

全体五时到车场，先派二辆到柳州通知救济总署，十辆随后，到达大塘查车站，要我们交现款养路费，否则扣留司机。我们华侨复员司机要找站长交涉，卫兵见我们动怒，马上提枪出来威胁。我们不服，发生冲突。结果，站长只好向各位说好话，放车通行。十时一刻抵达柳州城。

**十一月七日  第十三天**

今天到柳州“联合国救济总署”办手续及领路费，由柳州至梧州路程五天，每天发给国币1000元，共计5000元。

**十一月八日  第十四天**

当局又派新道奇车十二辆送我们，十时由柳州出发，下午六时到达宾阳。

**十一月九日  第十五天**

各位很早起床，大家心想赶快到达目的地，下午五时抵容县。

**十一月十日  第十六天**

天未亮四时许就开车出发，一路顺利，天气甚佳。下午三时半抵达龙圩县，在岭南大酒楼住宿。房租每天2500元，伙食每餐1200元，每天平均要花几千元才够矣。包一船去梧州，每位500元。

**十一月十一日  第十七天**

今天到“联总”办手续去广州及领路费，每天500元，三天共1500元。

**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八天**

天亮后，全体将行李搬至“珠江码头”，从第一至第十二队排列整齐，顺序搬上船，验关，下午三时才正式开船。

**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九天**

天未亮四时四十分船抵肇庆，停留一刻，继续航行。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安抵广州，仍未登岸。

**十一月十四日  第廿天**

早上七时许，全体登上同安码头。总领队及顾问先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办理手续，直至下午二时派车来送我们到三元里村，即广州市私立中德中学，内设临时招待所。

**十一月十五日  第廿一天**

今天休息，因身体有病到广州取药及打针，仍未好。

……又连续停留四、五天，每天旅馆费3500元，连医治病用10余万元才愈矣。

**十一月廿二日  第廿八天**

今天七时三刻火车由广州开发，十一时一刻安抵九龙车站，验关后由电船送到香港海口，登丰庆轮前往南洋。

**十一月廿三日  第廿九天**

各位同志都在丰庆船上休息一天，因运南洋的货物未装完。

**十一月廿四日 第卅天**

在船上休息无事，登香港一游。下午未到三时马上返船，等待启航。想不到四时十分船头货仓发生火灾，英人消防船及时赶来，火灾马上被扑灭无事。六时正船开了，向安南水域前进。

……

经过三天，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安南海口，停泊休息。

……

**十一月卅日  第卅六天**

我们的一位华侨机工同志在途中生病，医治不愈，抵安南时一命归西，结果交法医生开刀检查，办理安埋。他的名字叫——“陈荣”（第四批回国的雪兰莪南侨机工）。八年艰苦抗战他都坚持过来，可是南返与家人团聚只剩三天航程，却来不及了……

**十二月一日 第卅七天**

七时一刻船开至九十九湾，突然发生危险，方向盘铁链断了，船身转头，马上落锚停泊，换新铁链。修毕继续前进。出了安南港进入大海，大风大浪又起，二层舱窗皆吹入海水。复员机工同志们的家眷及小孩子，没有见过这种情形，叫苦连天。

**十二月二日  第卅八天**

今天天气好，风平浪静，机工同志与几天来被风浪吓坏的太太们，都起来看海景。早上七时许，得见星加坡海口。七时三刻抵港，停泊验关。

**十二月三日  第卅九天**

下午，船才泊丹绒百葛码头，天又下雨，前来码头迎接的有“华人机工工会”、“琼州会馆”、“三民主义青年团”、“男女服务队”等团体。总领队看见今天我们这些打不死的南侨机工回来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很少，就将我们由昆明出发一路各机关团体赠送的锦旗挂在船上，忽然，观众越来越多，整个码头全满了……伍总领事亲身抵码头欢迎，脱帽向各位招手，登船慰问。然后，这批男女服务队帮助搬行李带小孩，用罗里车送到后港五条石亚答厝暂住，天色已晚矣。自十月二十六日由昆明出发，到达星加坡为十二月三日，计三十九天。

我们终于胜利复员南返了……

1940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一辆救济车风风火火地由保山驶向惠通侨边。据车队报告，晚上九点多钟，有辆从腊戍满载汽油回来的卡车，未知何故而翻了车，车上两名南侨机工翻入山沟底。该救济车就是奉命前来找尸体的。

救护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位驾驶员脖子被玻璃割伤，因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查看证件，死者邓丁元是从泰国回国服务的机工。另一位司机受重伤，右眼暴出，脑壳和头皮破裂，浑身冰冷，但还有一口气，查看证件是“第9大队第6中队班长张万森”，当即用毛毯包裹起来，连夜送往医院抢救。到达保山医院时，天快亮了，经紧急施行手术，暴出的右眼被装了回去，脑壳和头皮缝了好几针，但伤势严重，大小便不通，仍处于昏迷状态。

一星期之后，伤员才甦醒过来，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只见医生和护士在晃动。向护士了解，才知道翻车的过程和抢救的情况，才知道是医护人员把他从死神夺了回来……

这位伤员原名张光旺，祖籍广东大埔。他14岁只身到马来亚谋生，后来在柔佛州士乃埠当裁缝师。抗战爆发之后，报上登载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他便与“青年抗敌后援会”的伙伴们一起去报名。可是，南侨总会要的是汽车司机，自己不懂开车，怎么办呢？他毅然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掉，买了汽油拜一位姓杨的师傅学开汽车。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突击训练，他终于学会了开车。为防止家人反对，他化名“张万森”，报名参加了柔团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

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南侨机工立即投入紧张的大抢运。由于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晚上行车都不敢开灯。那天晚上，在惠通桥畔的险要地段，由于刹车出故障，而发生了本文开头那惊险的一幕……

为了进一步治疗，张万森被送往下关医院，住院达18个月之久，直至1942年仰光告急时，虽然伤未痊愈也只好出院回昆明。抗战胜利之后，张万森于1946年复员南返新加坡。1948年再次回国，定居于故乡大埔。从1958年起，他一直在陆丰华侨农场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张光旺（万森）还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他用那架老式照相机拍摄的数十张记录机工生涯的历史照片，仍珍藏至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年抗日烽火岁月之中，他能够坚持写日记，忠诚地记录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实，为华侨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南朝是，陈国驸马徐德言因兵荒马乱与妻子乐昌公主各持一半铜镜而走散，后来凭着信物——两片破开的铜镜夫妻团聚，世称“破镜重圆”。这是一千多年前传奇式的故事，被历代传为佳话。在当代，也盛传着破镜重圆的真实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是王支峰和阿莲。

下面是南侨机工王支峰的录音记录：

我叫王云峰，1916年出生，今年70多岁了。青年时我参加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起初主要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1942年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在炮兵团服务。1945年回国，仍在炮兵团，1948年淮海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时，在金堂岛火线上入党，随后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1952年复员回海南岛工作。文革期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落实中央关于南侨机工政策，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我的老家在海南岛琼海县一个乡村，家境中平，属于小康之家。1934年，我在家乡与阿莲结婚，次年生下一个男孩。我俩男耕女织，孝敬父母，一家过得和睦美满。我的家乡是侨乡，每年都有不少人出洋过番。20岁那年（1936），征得父母的同意，买了一张船票（100元光洋），离乡出国。

我告别了妻、儿，由海口搭船赴新加坡。在海上五、六天的航程中，首先碰上一场霍乱风波，差一点被丢入大海。原来初次离家出远门，家中硬给多带一些月饼，不知不觉中竟染上霍乱，吃了饼之后，又吐又泻。幸亏一位医生极力抢救，而同船中竟有人染上霍乱被抛入大海葬身鱼腹的。

到了新加坡，我首先学割橡胶，埋头苦干，经济收入还不错。不久，我积下一笔钱，打算过一段时间把阿莲及小孩也接来新加坡。

正策划着，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我虽安居海外，可是胸怀祖国，关心着抗战时局。我觉得，祖国一旦被灭亡，我们海外华侨就无脸见人，难以立身世界。因此，我积极参加筹赈分会的活动，上街卖花，参与义演，踊跃募捐，竭自己绵薄之力支援祖国的抗战。

1938年，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中国海上对外交通被日寇封锁隔断，因此，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即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当时国内网正缺少熟练司机和修理工，西南运输处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嘉庚先生立即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各地的华侨都积极响应。有一位海南籍的华侨王文松，是新加坡一家英国公司的工程师，月薪达200多元，亦自愿放弃优厚待遇，带动一批徒弟并将自备全套设备回国效力。我当时虽不会开车，但激于爱国主义热情，也前往筹赈会报名。可是，筹赈会要招的是能够从事抗战运输的司机，没有技术的不录用。第一次报名就失败了。难道报国无门吗？我不甘罢休，想立即学习驾车，争取机会投报祖国。

不久，海南岛沦陷的消息传来，我痛失梦中的河山，我怀念家乡的父母、妻儿及乡亲们，眼前呈现一片日寇的铁蹄下挣扎、呻吟的情景，我恨不得立即飞身回国参战，亲手痛歼敌寇，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我与几个好友，凑了一笔钱，合租了一辆小包车，到公园草场上学习驾驶。我们请了一个马来人当教练，大家轮流学开车。由于大家胸中燃着抗日烈火，憋足了劲头，争分夺妙，结果学得很快，收效大，短短时间大家都“出师”了。

学会了开车，我再去报名，经过体检，驾车考核，终于批准参加了南侨机工第九批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我们从新加坡启程，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乘“丰庆轮”，在海上航驶了三天三夜，经安南上岸，转火车到达昆明，进了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

经过短期的军训，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开赴滇缅公路，从事抗战军火的运输。当时的滇缅公路，可以称得上世界最惊险的运输线。道路盘旋于原始森林与陡峭山岩之中，坑洼不平，尘土飞扬;雨天山洪横溢，泥泞难行。南侨机工驾车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在滇缅公路的艰难历程，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自己的难忘经历。我们车队要穿行“烟瘴之地”的原始森林，毒蚊横虐，有一次我被叮上了，随即发生严重的“寒热症”，幸亏战友们用“金鸡纳霜”及时抢救，才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

我真正的死里逃生应该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大撤退”时的遭遇。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尚有几百辆卡车，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大量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物资。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上人车混杂造成堵塞，南侨机工驾的车像蚂蚁在爬行，慢还不打紧，最可怕的是一经阻塞就得停下车来，拨开人群，挤出一条缝，车轮刚刚滚动几圈又被人群堵住了。临近惠通桥，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的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击。我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炸毁惠通桥的爆炸声。当时，许多机工战友与无数难民，来不及过桥都落入日寇魔爪，少数人侥幸泅水过江，大多数惨遭杀害。我有幸脱险，但汽车出了故障，只好徒步绕道回昆明。

惠通桥炸断了，虽然将日寇阻拦在怒江天险的西岸，但是，在抗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滇缅公路中断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为中缅运输总局），竟然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有的机工失业了，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外汇断绝，有家难回，致使南侨机工陷入困境。我在云南举目无亲，便与海南籍机工王亚昌等一起报名前往印度。由于滇缅公路中断，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只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输送。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往机场，这又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我怀着继续抗日的决心，应召前往印度协助盟军搞运输工作，后来，还参加炮兵团。

1945年，我由印度返回昆明，又调到贵阳等地，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同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都盼望着复员回南洋过和平生活。可是，我又被编入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抽调上内战战场。过去我们是为抗战而回国的，枪口对外，共同打日本侵略者，身上有劲；日本投降后，让我们打自己的同胞，心中难受，不想干了。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炮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我与几个华侨机工悄悄开车与解放军联系，终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后，在解放军部队中，通过政治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我在解放军炮兵部队中担任了教官。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舟山群岛时，在解放金堂岛的战斗中，我在火线上入了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住入党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把我从一个爱国华侨机工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我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时，突然接到命令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了国门，投入抗美援朝正义战斗。在志愿军中，我继续在炮兵团中开汽车，还担任副排长的职务。有一次，在战斗中被敌机炸伤，于1952年回国治疗。养好伤之后，同年6月正式复员。当我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时，油然产生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感。这也许是海外燕子归来时的共同感受吧！

那天旅途乘船转车，回到家乡已是晚上了。当我踏上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椰林道路时，不由思绪起伏，浮想联翩，一草一木都显得特别亲切，家乡起了很大的变化，旧时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走走停停，终于摸到自家门口了。我轻轻叩着家门，门好久不开，正觉奇怪，突然，门打开了，老母亲刚一探头见到我，顿时“啊”了一声，她惊呆了！母亲上下打量着我，迟疑地问道：“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见母亲惊恐不安的样子，连忙跪下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是云峰！我回家了！”这颤动的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堂亲叔侄们都围了过来，终于看清是我，于是迎进了家门。老母亲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拨开众人，只见她双手颤抖地把为我设置多年的“灵牌”打碎了！（后来听说这是我们乡村除凶祈吉的一种举动）原来，家中早认为我已死了，今天突然“复活”回家，怪不得家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的“鬼魂出现”，喜的是我终究“活人回家”！这可真是悲欢离合传奇式的一幕！

原来，1942年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时候，我已经侥幸过了桥，后来因车子出故障而徒步翻山绕道回保山，再辗转参加盟军赴印度，而同伴当中确有许多南侨机工在惠通桥殉难，幸存的人找不到我，便以为我牺牲了，于是给家中稍信。既然我已经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了，家中便为我“引魂”，建了坟墓，又请和尚做了“功德”，母亲还特为我设了“灵牌”，每逢祀日便烧香祭祀。这已经是多年的事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母亲不知为我流了多少泪水。

我“死”了多年，又活回来，这是传奇。我破镜重圆，更是传奇。

原来，我20岁出洋到新加坡时，留下阿莲及未满周岁的小孩在家中。1939年，日寇占领海南岛，阿莲带着小孩乘船出逃，从此杳无音迅。我复员返乡后，母亲悲伤地告诉说阿莲走失的情况，对此，她抱着莫大的遗憾。我与阿莲婚后十分和睦，对于她的走失，我有揪心之痛。她的景况如何？十几年了，杳如黄鹤，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日复一日，我就当她早已离开人世了。

可谁也没料到，在我复员不久的一天，一位从新加坡回来探亲的乡侨，听说我大难不死特地登门访问。当他证实这一切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场宣布一条特大喜讯：阿莲现时还在新加坡！

原来当年阿莲带着孩子，乘船往香港辗转到新加坡。她到处打听，企望能找到我。没有料到我已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了。在新加坡，她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同乡华侨收留了她。随着战局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疯狂南进，新加坡也沦陷了。后来，又传闻说我在抗战中牺牲了，阿莲在悲痛之余，不得不嫁给那位好心收留的乡佬，又生下一男一女，连同她从海南带的去男孩，已是二男一女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悲喜交集，悲的是日寇侵华害得我家破人亡，喜的是阿莲她还活在人世。说实在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活下来已经是多么不容易啊！既然她已在海外成了家，我也为她有了依靠，能在新加坡安居乐业而放了心。我并不奢望能再见到她。

可是过了不久，奇迹又出现了：

有一天，阿莲突然带着三个小孩（二男一女，其中只有长子是我亲生的）回家了，这一切真是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原来，那位回乡探亲的华侨返新加坡之后，将我的传奇新闻告诉了阿莲。这可给阿莲出了一个难题了。从感情上讲，她听到消息后，立即就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那位乡侨，带念在乡亲的份上，在抗战最艰辛的岁月中收留了她们母子，结合之后又生下一男一女，现在怎能忍心抛下人家呢？如今，这一妻二夫的尴尬局面使阿莲蒙受巨大的精神打击，真不知如何是好！

至于我呢，我当然不敢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从抗日烽火到朝鲜战场过来的人，多次负伤大难不死，能活到胜利的今天已很难能了，而且复员后还安置一个正式工作，多年单身汉的日子已过惯了，只要阿莲在海外能够安居乐业，也就好了。

而阿莲呢？她可就不同了，她更多地想着回乡破镜重圆。但这又身不由己啊，实在不好开口。自从得知我的消息之后，她左右为难，情思仿佛，当然瞒不过患难之际收留了她的那位同乡侨亲。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豪爽的乡侨，他天生一副侠骨义胆，竟然是他主动提出让阿莲回乡破镜重圆的。

于是，阿莲怀着感激之情告别了新加坡，带着两家的小孩（二男一女）一起回到海南岛。我当时在海口一家工厂工作，她被就近安排在海口军区的幼儿园。我的一家，又过上了欢乐和谐的日子。值得欣慰的是，阿莲教养了来的孩子个个都挺懂事，对我孝顺，使我体味到家庭的温暖。即使在“文革”造反派横行的日子里，我被揪出来批斗，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回家去拣牛粪，孩子们亦仍始终对我敬重。

死里逃生，破镜重圆，确实是传奇。但这没有半点虚构，它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我王云峰——一个普普通通的南侨机工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

小林同志，您瞧瞧，今天这位用三轮摩托车载我来侨联（口述机工历史录音）的，不是别人，正是阿莲后来在新加坡生的女孩，今年算来，也已有40多岁了……

**附记：**

**1988年4月，笔者专程赴海南岛寻访星散在海角天涯的17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在海南侨办吴开进同志（厦门大学历史系校友）以及南侨机工罗杰（第九批机工）的热情陪同下，来到五指山下、万泉河畔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嘉积市，登门造访了南侨机工王亚昌（批二批机工）。经当地侨联取得联系之后，76岁的王云峰拄着拐杖由其女儿用三轮摩托车送来侨联参加座谈会（见图75）。本文所记述的就是王云峰的口述录音。**

**林少川  记于椰林掩映下的海南侨联大厦**

1988年4月，笔者前往海南岛拜访了十几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其中定居在东方（八所）的刘源，是战后复员南返的重要成员，曾任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主席。刘源老人已年逾古稀，个子不高，精神矍铄。虽然饱经风霜，但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心直口快，真诚坦率。

提起难忘的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分。他那悲欢交集的叙述，时而低沉，时而激扬。他说：“我原籍海南岛文昌县龙马乡大惠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家。5岁之时便失去父亲，母亲被迫改嫁。我自小就是由姐姐抚养的，到十几岁才上小学，因考试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叔叔知道了，资助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后，于1935年前往新加坡谋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到新加坡后，最先当学徒，勤快好学，又肯吃苦，不怕脏累，几年功夫，白手起家，开始有了积蓄，正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七·七事变’爆发，激起我的民族义愤，我不愿当亡国奴，于是加入新加坡茶业工友互助会，又加入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筹赈救国工作。”

“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毅然报名参加，决心回国报效。我当时是个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凭着自己的一股爱国热情，说回国就回国，于1939年7月回到昆明。经过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贵阳后方勤务部，编入汽车六团三营八连。这是一个著名的‘华侨连’，司机都是海外归来的健儿，连长梁志坚。队部驻唐家山，专门从事搞战军事运输，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部队给养运到前线。”

“1939年底，南宁失守，为了收复失地，我们华侨连也积极配合，穿梭于前线与后方之间，主要走柳州、宜山、河地、三旺、东兰、靖西、百色一带，负责运送兵员粮食和武器。当时拉锯战异常激烈，我们穿行在这条新开的运输线上，时常遭到日军炮火的袭击，不少华侨机工为国殉难。”

“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之后，日寇从广西桂林一直打到贵阳。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汽油，我们就改用木炭车，千方百计作贡献。在1943至1944年反攻阶段，盟军开始配合反击，美军用飞机运载汽油起落于云南的沾益与陆良两个机场，我们华侨机工继续驾车运送汽油至各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准备复员返回南洋。由于国民党当局有意阻挠，使复员工作拖延，进展缓慢。海外陈嘉庚先生，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呼吁，终于促使机工复员南返。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有的已在国内成家了，有的不想回南洋了，有的则因失去联系而留下，我则抓住机会，办理复员南返。复员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一张奖状，文为：‘华侨机工刘源，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此外，我还荣获两枚珍贵的纪念章，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另一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1946年底，我们复员回到新加坡，受到侨胞父老的热烈欢迎。战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生活艰苦。我继续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与英殖民当局斗争。1954年被选为新加坡司机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新加坡电车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我们还于1947年成立了‘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公众推我为互助会第四任主席等职。50年代中，新加坡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罢工频繁。我因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于1957年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共党暴乱分子’，囚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关禁期间，电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1958年，我全家四口被驱逐出境。”

“祖国派船把我们接回，从此，我在国内安居乐业，积极工作，多次受到表扬。1946年，调到海南岛东方盐场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灾祸降临，我因参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挨整。由于南侨机工隶属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因此被戴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又加上华侨‘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牛棚’。”

“值得庆幸的是，粉碎了‘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改革，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南侨机工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肯定，我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39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黄迎风，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还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由驾驶兵提升为少校翻译官。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在缅甸会师之时，他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奏凯归来，受到热烈的欢迎。

黄迎风，又名黄万全（见图77），祖籍海南文昌，自幼与父亲到泰国，12岁时随外婆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努力读书，以英文为主，也学马来语、福建话和广东话。为适应当地的生活，他在语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1930年，黄迎风到马来亚吡叻州太平埠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当学徒。公司的顾客大都是欧美人，因此，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与洋人一起工作和接触中，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他的工作受到好评，1933年被升为售货员。从此，他经常随车送货上门，还学会了开车。由于平常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为公司赚了不少利润，他个人待遇也随之提高，家庭生活得到改善。

当南侨总会征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黄迎风在是否报名的问题，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他为抛弃目前堪称满意的职业而感到惋惜，因为年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弟都靠他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同时又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能坐视祖国于危难而不顾。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在？当一个没有祖国的侨民，怎能立足于世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毅然报名，弃家赴国难。

出发前，公司为他们特制了金质纪念章，勉励回去之后要为国立功，为华侨争光。送行的队伍，有老一辈亲友，也有依依难舍的知己。但是为了抗日救国，他终于挥泪而别了。

1939年7月3日，黄迎风参加由廖萍领队的第七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于7月11日抵达昆明，经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短时间学习后，便整批地分配到后勤部汽车第31团第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这是在荒山坡上搭起的草屋营房，离贵阳十多公里，离村落亦远，其住宿之简陋和生活条件之艰苦，是他们在南洋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大家为了抗日救国，家都弃了，生活苦又算得了什么？

八连的连长梁志坚是广东梅县人，是早些年从南洋回国，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军人。他带领全连驾驶员，安顿了生活，再领来了新车，大伙驾车往返于广西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1940年，日军占领了南宁，企图侵入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兵力反攻，集中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抢运兵员，奔赴前线。双方争夺异常激烈。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在这次战役中，不少华侨司机光荣牺牲，为祖国献出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华侨司机勇敢赴敌的精神，上级特发给奖状，以资鼓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南洋各地，并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企图切断了滇缅运输线。为了保卫这条运输线，我国组织军队入缅，协同英缅联军作战。谁知英军一见日军就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而被包围。此时，我国第38师前往救援解围，击退了日军，救出了以亚历山大上将为首的英军7000多人，还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美传教士500多人。这次战绩，使中国的军队声威大振。为了表彰战功，英国女王向第38师师长孙立人授了勋章。

八连在远征军入缅时，承担了运输任务，因此，也一度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仅是昙花一现。由于英军不顾大局，再次撤退，会战的计划破产了。中缅战区司令部只好部署退却，一部分撤入云南，一部分撤往印度。

1942年，为了协同盟军反攻缅甸，我国扩充了驻印军事力量，八连被调入汽车六团入驻印度，经常要与英美军联系，从领车到领料，从修车到装配运载，从问路到去市场购物，都需英语翻译。黄迎风早年学习过英语、广州话和厦门话，在这里竟派上了用场而被重用。不久上级批准他为三级英语翻译员，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校官，并领校官在印度服务的津贴待遇。

中国入印远征军是由前从缅甸退入印度的38师与22师为基础，外配两个工兵团、汽车六团、高炮营和坦克营组成的。经过近年的休整、充实与训练，并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1943年，驻印远征军开到上利都，在野人山原始森林的掩护下筑路前进，美军两个机械化工兵团、一个步兵旅、一个宪兵团及后勤部队协同行动。

开辟中印公路是项艰苦而伟大的工程，它既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又要与蚊蝇、蚂蟥、毒蛇、猛兽作斗争。当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患霍乱和伤风等疾病而丧失了生命。尽管如此，官兵们仍日夜辛勤地施工，还铺设一条油管沿着公路向前延伸，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当时，汽车部队经常要与油站、修理厂打交道，为了方便司机们与美军交往，黄迎风教司机们用英语讲汽车的各种零件和油料的名称，以及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方便了司机们的工作，受到司机们的欢迎和称赞。

1943年年底，公路通过野人山进入缅甸境内时，这里已被日寇封锁。为突破封锁线，每天天一亮，美军飞机便一批批飞来前线，在日军阵地上轰炸扫射，我国的炮兵也随着向敌人开炮轰击，此时士兵们勇猛地冲上去，用冲锋枪、喷火器射击，一个一个地把据点夺下来。

前线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在后方工作的官兵更为振奋，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前线杀敌，以发泄久积心中之恨，报仇雪耻。

打通中印公路运输线，是盟军在亚洲战场上一个重要战略。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和缅甸战场的胜利，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的协同战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下密支那、八莫、南坎和腊戍，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1945年春，远征军与盟军在滇缅路上会师。这时，外援的汽油源源输入昆明，成百上千辆汽车又开动起来，每天都有成百吨的物资运入祖国。

这时，第38师升为新一军，继续向南追击穷寇。人们欢欣鼓舞，期待着最后胜利的到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汽车六团尚在缅北执行任务。消息传来，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是无数英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这时，盼望已久的回国时间到来了。各营、连都把车辆重新整理换新，以备几千公里行车之用。1946年春，汽车六团550多辆十轮大卡车和20多辆中小吉普车，排成几公里长的纵队，浩浩荡荡地由中印公路开入老滇缅路，经过昆明，安全到达贵阳。在祖国大道上，受到沿途市镇、村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和迎接。其时的激动自豪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回到祖国后，上级要把黄迎风留在部队，继续当军官，但他探望母亲心切，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办理了复员手续，离别了战斗多年的部队。后来因其母亲病逝，加上其他原因，黄迎风在长沙开商业汽车，直至海南解放才回到海南家乡。

返回家乡后，由于人们对黄迎风这段经历不理解，他竟受到“管制”处理。后来，在土改划分阶级时，他被划为贫农，人民政府还批准他考取驾驶员执照，并介绍他去海南劳动局分配工作。从此，他犹如枯木逢春，重获新生。黄迎风怀着高度工作热情，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从1953年初开始，他相继在海南汽车运输公司，海南建筑公司、东方县商业局、东方县建筑公司、东方县综合厂和东方县农机厂任汽车驾驶员，直至1979年光荣退休。

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华侨农场，凭着友人提供的一丝线索，我找到了蔡如秋先生——一位鲜为人知、当年自费从泰国回来参加抗日运输的南侨机工。尽管岁月的逝水无情地将他的鬃发冲刷得雪白，但从老人坚毅的脸上，我仍然寻找到当年热血青年的身影。

与众多南侨机工统一组织回国服务的经历相比，蔡如秋的经历更为独特些，他是目前硕果仅存的自费返国南侨机工中的一位。

蔡如秋，原名蔡美光，祖籍海南，1919年出生于泰国。1937年卢沟桥抗战的炮声，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巨大震荡。1938年就有许多旅泰侨胞纷纷回为请缨。

“当看别的华侨青年满怀壮志地回国参加抗战时，我也坐不住了，”蔡美光告诉我：“1939年从报纸上看到新加坡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我们非常激动。当时滇缅公路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为了报效祖国，应该有一技之长，因此，我便与同学文永丰去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由于当时泰国尚在銮披汶高压统治之下，华侨抗日救国活动不能像新加坡等地那样公开。蔡美光等人苦于报国无门，于是求助于当地《华侨日报》主编老丁，询问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方法和路线。经弄清前往昆明的路线并筹备旅费之后，他与文永丰又邀集了五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郑庆光（郑亚泉）、沈世成、吴镇初、陈如陵、和章文育，按照老丁介绍的路线，于1939年8月3日离开曼谷，途经柬甫寨金边、安南河内，于8月15日抵达昆明。一问，才得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第9批人员也是近日到达昆明驻扎在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的。他们一行当即前往要求参加，遇上了大队值星大队长郭清。在说明来意之后，郭大队长答应去与该所的教育长张炎元及总队长联系，很快被接纳，顺利地编入第9批机工服务团一起集训。

在潘家湾训练所，他们与南侨总会集中组织回国的机工队伍一起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他们7人当中，章文育是搞机修的，安置在修理厂，其余6人编在第二大队。蔡美光与文永丰同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孙仲汉，印尼棉兰华侨、第9批机工总领队吴福华任中队副。除了一般的军事训练之外，他们还投入适应山区崎岖道路的驾驶训练。三个月之后，蔡美光与文永丰经驾驶考核合格，文被分配前往广西，他则被分配到安南海防的西南运输处分公司。在海防，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码头抢运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运回广西镇南关，然后由其他车队接运至昆明。

1940年10月，蔡美光一行奉调回昆明，此时正值滇缅公路封锁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第9大队即将开赴芒市，他们便编入第9大队27中队出发了。这回的任务是接“大道奇”新车，从缅境分段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内的遮放仓库，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仓库。这一时期，是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的高峰期，南侨机工全力以赴，闯过滇缅路上的各种险阻难关，穿梭往来，为“抗战运输管”的畅通作出重大贡献。

接下来，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运输局，第9大队与12大队合并为第15大队，驻扎在保山，此时的运输路线，主要行驶于保山、下关、昆明之间。

1941年，蔡美光又转至缅甸腊戍西南运输处分公司车队。谈到在国外的运输生活，蔡美光说：“在腊戍的任务主要是赴仰光将外援就地安装的各类汽车驶回国内遮放、芒市一带。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局势一天天严峻起来，为了赶在沦陷前尽量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南侨机工再次掀起抢运热潮。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局势并未挽回，仰光很快失陷，日军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境内。当日兵追到惠通桥时，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断此桥，凭借怒江天险固守，滇缅公路从此中断。“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我也失业了，只得靠早些时候撤回昆明的旧友文永丰、沈世成等人的接济维持生活，这是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

与多数南侨机工的遭遇一样，蔡美光开始四处飘零。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到了柳州考取了驾驶执照，于1943年进入捷和钢铁厂开车。后来，由于日寇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许多工厂迁至河池、独山，一时无法复工，工厂解散，蔡美光随着人流又流浪到了昆明。1944年，好不容易经泰国同埠朋友黄拔如介绍，顶着别人的名字进入川滇公路运输局陆良机场驳运队开车，将美国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物资驳运进仓库，凭仓库的远近发给油票，然后每日按实用的油料扣除，剩余的折价发给油票奖金，勉强维持着半饥的生活。直至日本投降，驳运队才结束机场运输任务。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要求复员南返。经过多方交涉，1946年7月，蔡美光才在昆明侨务局领得200美元的复员费，又变卖衣物等作路费，取道河内，由老挝渡河返回曼谷，与离别多年的母亲和兄弟见面。在泰国，他仍操本行，开车为生。

屈指算来，从1939年至1945年，蔡美光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七年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海外侨胞深受鼓舞，1953年，蔡美光举家回到广东汕头。当我问蔡老先生为何再次回国？又是怎样回到海南岛定居的，有些什么考虑？他答道：“当时的想法就是看到祖国建设需要人才，同时感到寄人篱下终非久远之计，于是再次返回。1954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加强农业生产建设，来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就一直在农场汽车队当司机，1980年才退休。”

整个访问过程中，老人没有过多地提及这几十年来所受的风风雨雨，也不愿多谈自己的贡献，语调仍然那么平静，但我强烈感受着他那颗跳动着的至诚的赤子之心！在他所在农场，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位平平凡凡的老人有过不寻常的经历与贡献，因此笔者愿借这一访问记录，让后人了解并永远铭记住他和他们——一群热血沸腾的南侨机世所创下的业绩！

（1988年）

**附  记：笔者在海南岛寻访这位自费回国参战的南侨“编外机工”蔡美光之后，又继续前往云南档案馆查阅西南运输处档案，果然发现了关于蔡美光、郑庆光等七名泰国回国机工编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并与其他华侨机工一律待遇的档案：**

**该档案编号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收文滇兴第9862号文，训字第2079号。**

**事由：准越南南圻救国总会理事会介绍司机郑庆光等七名投所受训已予编队并与其他华侨学生一律待遇呈请备案由。**

**拟办：准予备案。**

**公文内容如下：**

**窃职所准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理事会介绍司机郑庆光、吴镇初、陈如陵、章文育、沈世成、文永丰、蔡美光等七名来所受训，已於八月十五日到所，十六日即行编入华侨第二大队第七队训练，并与其华侨学生一律待遇，所有接编该生等经过情形，理合呈请**

**钧处鉴核备案，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   宋**

**副主任  龚、吴、刘**

**兼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  宋子良**

**兼副所长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二十八日**

1989年“7·7”之夜，在祖国广西山明水秀的一边陲古城，一位年逾古稀的马来亚老华侨，打开电视按键忽然一愣：突如其来的电视镜头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花眼了，连忙呼来夫妻一同“证”“视”现实。他揉了揉双眼，定神仔细一看，“对了，全是真的！绝不是做梦！”老人乐了，饱经风霜的脸上锭出久违的笑容。

这是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剪彩镜头引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下面请听本文的主人公——南侨机工殷华生的自述：

今年（1989）7月的一天，我偶然从电视中看到南侨机工纪念碑在昆明落成剪彩的镜头，这对我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的原南侨老机工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记得在抗战时期，我们就希望能为死难的南侨机工战友建一座纪念碑。半个世纪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能有这一天，是我们在“文革”关在“牛棚”时所不敢想象的。我仿佛一下子又年轻了20岁，高兴得彻夜难眠。半个世纪来的悠悠往事，如同电影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蕉风椰雨的南洋风光——如火如荼地筹赈救亡热潮——报名参加机工团的狂热情影——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的惊险镜头——抗战胜利之时的狂欢场面——战后的风风雨雨以及坎坷的人事沧桑——粉粹“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一起涌上了心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老妻匆忙登程，前往省城南宁，找侨务部部门谈我的南侨机工情况。广西自治区以及南宁市侨务部门非常重视我的来访，不但查到南侨机工名册档案。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殷华生”三字，而且还查出三年前（1986年）国务院侨办、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出的侨政会字第23号关于给予南侨机工生活补贴费的文件。

为了落实政府对南侨机工照顾享受100%退休金的政策，南宁地区侨办特别为本人致函我所在的林业汽车运输公司，给本人补发了从1986年以来的补贴费四百多元，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大喜事。回到家，我买了一串鞭炮放得震天响，引来周围人们的围观。一些熟人得知缘由后，亦为我庆幸。为了重温我过去的光荣，我和老妻便决定到昆明去瞻仰纪念碑。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与老妻怀着回娘家的兴奋心情，风风火火地来到当年战斗过的故地重游。如今赶上开放改革的时代，昆明变化太大了，重新腾飞了。在昆明，我们受到“娘家”——侨联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热情招待，陪送我俩来到西山公园，瞻仰纪念碑。当我下车抬头一看，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眼前，比在电视上匆匆一瞥的印象高大多了。望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感到一股强劲的暖流从我的身上通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限光荣，无比幸福！我觉得有了纪念碑就是对我们南侨机工的爱国之心的最充分的肯定。

时间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由于日寇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祖国大地燃遍抗日烽火，远在海外的华侨，亦出钱出力，掀起抗日救国热潮。那时，我随祖父母和父母在马来亚谋生，在彭享文冬埠的一家公司开车，过着舒适的生活。当陈嘉庚先生号召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唤起了我立志报国的决心。当时，我也想过，父亲有一辆40座位大客车，有60亩果园，都很需要我，而且我已结婚并有了女儿，祖父母、父母和妻子是不会同意我走的。如果在本埠报名，家里肯定会发觉，我就悄悄地跑到吉隆坡报名，瞒着家里。等至出发日期，我才悄悄地离家去新加坡。当父亲发觉后开车追到新加坡来阻止时，我已坐上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轮船了。父亲没有找到我，我们就这样连最后的一面也没有见上，生离竟成了永别。我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之下，毅然不顾家中年迈的祖父母及疼儿心切的父母，甚至割断了朝夕相处的夫妻情。时至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做了祖父，才能切身体会到当年我的祖父母、父母、妻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假若时光能倒流，我真愿意再次跪在祖父母及双亲面前，再说一声“再见！”然后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不至于给他们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古语云，忠孝两难全。当年我满腔热血回国抗战，一片忠心可对天！如今，只能求我那已逝的祖父母、父母的在天之灵原谅吧！

1939年4月，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途经安南抵达昆明，编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龙陵第12大队，大队长是谭江柏，分队长谭英祥。从此，我就在滇缅公路上日夜开车搞运输，满载枪支弹药由遮放运回昆明。当时滇缅公路刚从高山险谷中开辟出来，路基不坚固，道又窄，坡又陡，弯又急，下起雨来成泥坑，出太阳时变“搓板”，崎岖曲折，坎坷颠簸，难走极了。来往的车又多，都是赶任务，稍一疏忽，就出事故。天上还常有敌机来轰炸，沿途常翻车，令人惊心动魄。我曾亲眼目睹许多机工战友翻车滚下百丈深谷，有的连尸体也找不回来……我告诫自己，为了安全完成运输任务，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开起车来，专心致志，不超速，不超车，看准路。碰到对面车，主动让道。平时爱护车，常检查。加上我从来不抽烟，出车不喝酒，我做到了在滇缅公路上安全行车几十万公里，没有出过任何一件大小事故，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的一片心意。

1939年11月，我驾车从重庆返回昆明，正值广西昆仑关战火纷飞。我们奉派立即驾车转赴南宁，在宾阳——柳州之间，救运伤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出生入死抢救伤员。任务完成后回昆明，学习了两个月，驾驶英产8吨大卡车后，被派往下关，抢运军需物资回昆明。

有一次，队部派我们两人运载步枪子弹赴亦龙。车开到马龙山间，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土匪，扬着手枪堵车。车停了，车门打开了。土匪逼着我俩立即交出钱来，否则开枪。我吓了一跳，随后陪笑回答：“对不起老哥，我们穷司机没有钱。 ”“没钱，立即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不然，要你的命！”“好，好，我们脱。”我俩边脱边交换一下眼色。我脱下大衣，在交接的一瞬间，突然出其不意，张开大衣，往土匪头上蒙盖下去，随即连衣带人紧紧死抱住他，我的助手随即冲上来，夺下土匪手里的勃郎林手枪。可是山上还有几个匪徒，还在挥枪指着我们大骂，向我们冲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运送新兵的车子刚好到来，山上土匪见势不妙，只好逃之夭夭。我把匪徒连枪交给新兵连带走。

1941年，有一次队长派我专车运汽油去重庆，车上装了21桶汽油，我小心谨慎地运送到重庆南岸，才松了口气，还未卸货，敌机突袭的警报突然响了。只见男女老少慌乱躲避，我就地隐蔽起来。空袭警报解除之后，我卸完了汽油，搭渡船过江，到重庆市区观游。走到一个防空洞附近，只见街道两人旁三步一岗地站了两长排宪兵，阻挡着不许通行。我随人群涌到宪兵背后向前看去，只见防空洞口停着几辆大卡车，多少人在忙着从防空洞里抬出尸体，一具具往车上丢，车装满了立即开走。不久，开来了两辆小车，从车上下了十几个人，走向防空洞口，走在前面的那个全副军装，光头没有戴军帽，另一个身穿长袍，胡须很长。他俩看了一会儿，问了几句，穿军装的铁青面孔，说了几句，挥了几下手。我旁边的人议论着，说那两个就是蒋介石和林森，宪兵还回头瞪了一眼。我还听他们议论说，防空洞可装几万人，里面空气缺氧，平常警报解除，立即打开洞口大门。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警报已解除好久了，大门还不打开，结果，造成窒息大惨案，除了近洞口的一部分外，里面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大部分窒息死亡。从尸体上取下的手表、戒指、手镯、钢笔等，堆积多少箩筐，旁边的人还说，蒋介石说的大概是，把管门失职的人立即抓来枪毙。这就是重庆防空洞的大惨案，真是惨不忍睹，这也是日寇在我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1942年5月，日寇由缅甸入侵滇西，守军炸毁惠通侨，将日军阻隔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实际上只管惠通桥以东至昆明的军运。而被遗弃的怒江西岸的数百辆卡车和南侨机工，则陷入敌手。他们大多惨遭杀害，只有小部分泅江归来。管理局军运任务锐减，车辆残破，车队瓦解，南侨机工人员星散。失业、饥饿、贫病交加，不少南侨机工露宿街头，冻死巷边，暴尸荒野。我看到形势如此凄惨，也动了思乡之念。有人劝我趁早回马来亚。我想念家里既有高龄的祖父母，又有年迈的双亲，还有妻子女儿。我也盼望着有机会回去一家三代团圆。但是，摆在面前，更使人揪心的是，保山遭日机轰炸的大惨案，滇西日寇的大屠杀，国土未复，日寇未灭，我怎能回家？我记得陈嘉庚先生的叮嘱：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抗日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我深感报效祖国的任务尚未完成，决不能打退堂鼓，而应咬牙坚持下来。但是，我还能干什么呢，此时，已无汽车需要我开了。

1943年，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参加了“美国陆军炮兵游动修理队”在昆明干海子修理各种大炮。我既会修理汽车，也可把修理技术用到修大炮上。经数月完成了任务之后，随即出发到保山，分成两个分队，每队十多人，分头开展工作。我编在第二分队，队长徐汉生，也是海外归来的技师，专门修理望远镜及指南针，兼当翻译官。我则负责专门修大炮。有的大炮炮筒炸烂了，就换一个；撞针断了、秃了，要换，要磨；炮身因弹簧失灵，进退运转失灵，要调节；瞄准器失调失不准，要调整。经过我们抢修完毕，立即当场实验。官兵们都很满意。我们先后到了下关、大理、凤仪、弥渡、巍山、云州、祥云等处，为第5军、第6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36师等部队修理各类大炮。到处都有专车接送，很受重视，每地修完他们都要颁发给我们纪念奖状。我们到处抢修，大概搞了四、五个月，主要都是在怒江以东工作，条件方便。此后，由于工作需要，就进一步西挺进。

第二分队有五个美国人，由一个名叫克罗纳的中校带队，中国人中挑选出我们四人，一共九人，每人配备卡宾枪、子弹、食宿用品都是美军军用物资，由骡马驮着，就向西步行，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在山林里，天黑了就在两棵树间挂起睡袋，远离地面，能避蛇蝎野兽，又能防止蚊蝇叮咬，还不怕雨淋。

到了怒江边上，我们早有准备，拿出了橡皮艇，顺利渡过怒江。又经四天跋涉，到达了象达。前面三、四公里处，就是同日军作战的阵地。日夜炮声隆隆，前线把大炮拖回来，我们就马上抢修，修好立即就送上前线。有时，前线作战紧张，或者大炮太重，不便拖来拖去，我们就赶到前线抢修，一边修理，一边作战，截断了日军的退路。当时日军企图由龙陵向畹町撤退，我国在印度的新一军，巧妙地包抄过来，两面夹攻，炮火震天动地，打得日寇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我们九人小组不断修炮，痛击日寇，不觉过了三个月。这时已是1945年8月，突然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的消息，抗战八年终于最后胜利了。我们欢天喜地，喝酒放炮都难以表达胜利的豪情。记得胜利的那一夜，我们狂欢到天亮。我们在潞西，加紧把打坏的大炮统统修理好后，然后高兴地开车回到保山，把积存在保山地区的大炮、机关枪等修好，交回军部，这样才最后完成任务。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军中美军民合作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当美国人要转道昆明飞回国时，我们就在保山依依惜别。临别时，美军中校特别颁发给我们一张奖状，并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说：“这不仅仅是一张奖状，而且是一张美国特殊通行证，只要你拿着它到美国大使馆，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美国来，后会有期。”可惜，这奖状连同其他奖状，在“文革”期间，全部被付之一炬了。幸亏我的老伴胆大心细，把三枚纪念章保藏下来。第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第二枚是“华侨互助会会员证章”，第三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纪念章上刻着：“保卫祖国”、“捍卫祖国”，今天看上进心来，倍觉珍贵；闪闪的金光，更显示了我们海外赤子的赤诚之心。

抗战胜利之后，除了复员回南洋之外，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主要分布在滇缅公路沿线以及返回闽粤家乡，但还有部分星散在祖国的天南地北。现居住在湖北葛洲坝的谢耀南，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吉兰丹的各界华侨在聚春酒家隆重举行宴会，这是专门为欢送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而举办的。当地中华总商会负责人马奇杰站起来讲了话，他勉励南侨机工回国之后，要不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出力，为华侨争光。说完，他将两块特制的铸有“抗日救国”四字的金质纪念章分别挂在谢耀南和何纪良胸前。

欢送宴后，谢耀南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而最使他费心的是母亲从泰国的来电。原来他是瞒着唯一的亲人——母亲，报名参加机工团的。

谢耀南原籍广东惠阳，1919年出生于泰国北大年，1934年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到吉兰丹益昌百货商店当学徒，后来学会了开车。这次他没征求母亲的同意，就与好友何纪良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他母亲从华侨报纸上看到“谢耀南”的名字之时，便从泰国来电，要求儿子回去见面。谢耀南回到泰国见到母亲时，母亲泪飞如雨，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深怕他回国后在烽火漫天的战争前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实在放心不下。但是，谢耀南回国抗日的决心已定，无论母亲如何劝说，他总是不动摇。他耐心地等母亲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恳切地向母亲保证：抗战一胜利，就马上回家团聚。母亲通情达理，终于同意了。

告别了母亲，谢耀南加入南侨机工第二批回国服务团的行列，被委为该队文书（总领队为钟运熙）。这一批共207人。1939年3月13日，乘“丰庆轮”经安南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直奔祖国西南大门——昆明。虽然连日来在旅途上车船颠簸劳累，特别是启航后的第二天早上，曾遇到一艘悬挂日旗的舰船，为防止其袭击，全船上下都紧张了一阵；然而大家都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精神仍然十分饱满。

谢耀南经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第11大队33中队任分队长，住在云南保山，担任滇缅公路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他和战友们跋山涉水，穿梭险路，备尝辛苦，历尽艰险。1940年，时局紧张，当时在安南境内有一批军用物资急需运回国内，他带领33中队，开赴广西整编，成立了“红牌车”大队，住进平马，车队往返于安南的海防、谅山等地。这条公路路面狭窄，桥梁简陋，每往返一次，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一进入国境线，又随时可能遭到日机的突袭。一旦有空袭的警报，车队就要迅速分散隐蔽。记得曾有一次警报后，日机已经临空，有两位司机来不及驾车隐蔽，汽车被炸毁，司机也因此牺牲。另一次，车队到了平马，司机把汽车隐蔽在郊外，然后到平马镇吃饭，敌机在上空找不到汽车目标，便对平马镇进行狂轰滥炸，虽然车队幸免于难，但平凡镇几乎被炸成废墟，百姓伤亡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就在日机经常空袭的情况下，大家仍精神焕发，勇往直前，坚持了数月的突击运输，终于完成了任务。

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安南，封锁了我国通往安南的公路。谢耀南带领的第33中队又回到云南保山，担任滇缅一线的运输任务。但保山也连续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他们的车队刚离开保山不久，住保山的部队和惠通桥便遭敌机的轰炸，许多房屋被炸毁，伤亡很大。在滇缅公路上行车更艰险。这条公路的许多地段是从高山密林中穿过的，有的地段悬崖峭壁，路面狭窄，陡坡弯急，加上敌机时来骚扰，稍有不慎，就有车翻人亡的危险。他们除运汽油、药品之外，每天还要运输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在这坎坷不平、硝烟弥漫、风云不测的运输线上，大家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战越勇，一直坚持到抗日结束。

抗战胜利后，西南运输处交由云南输公司管理。谢耀南被分配到中国柴油公司开车，后来调到重庆劳工协会任司机。1946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筹划南侨机工复员，他被指定负责重庆市的登记工作。在领取了新加坡的入境证件和旅费后，谢耀南等复员机工到昆明集中，分乘三架运输机经桂林到广州，再由广州经香港乘海轮回新加坡。到达时，受到新加坡以及原侨居地吉兰丹各界华侨人士的迎接，并发一笔“胜利奖金”和生活费。随后，谢耀南被安排在南洋烟草公司修理车间工作。

1954年，谢耀南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建设正在飞速发展的报道，不由怀念起他为驱逐日寇而浴血战斗的祖国，怀念起在大西南共同生活战斗的父老乡亲。当时，他在新加坡领的工资胜过国内好几倍。但他想，日寇侵华八年，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践踏破坏了。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正需要人才。于是，他放弃优厚的工资待遇，放弃舒适的生活，再次投入祖国的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谢耀南再次回国，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被分配到武汉水利局工作。他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工会组织委员、华侨组组长。1958年，武汉支援“三线”建设，他被调往丹江水电工程局修配厂工作，先后担任检验员、车间主任。1973年，谢耀南又调到国家重点工程葛洲坝工程“三三〇技工学校”任教员，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直至1979年退休。他常说：在祖国工作，钱虽不多，但生活可过得去，且领导信任，同志关心，心里十分舒坦。

1988年1月26日，笔者在成都访问了被誉为“八十先锋”的第一批回国机工幸存者——吴璋。吴老先生祖籍福建南安，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现虽已年逾八年，但身体硬朗，记忆力很好，讲话声音洪亮，只是患哮喘症未愈，谈话过程不时被咳嗽声打断，却仍十分健谈，兴致极浓地讲述了当年参加机工团的难忘经历。

1939年，本来在马来亚福兴汽车公司开车的吴璋，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参加了峇株巴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该埠中华商会暨各社团、各热心人士资助下，他们一行48人，于2月27日由峇株巴辖启程，浩浩荡荡开抵新加坡集合。当时在新加坡《星州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对华侨机工返国服务给予高度赞扬，在他发表的《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一文说：“这48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半个世纪过去了，吴璋至今还记得该机工团48人的名字：正团长廖国雄，副团长刘谭福，以及团员叶修青（见图7，今在广州）、徐元镗（今在昆明）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亦集合了第一批南侨机工32人，正队长是白清泉，副队长是傅瑞生。新加坡和峇株巴辖两地机工共80名，共同组成南侨总会统一正式遣送的首批回国服务机工团。吴璋还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俱乐部召见了全体机工，并发表演说。陈先生说：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劳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无愧。”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八十先锋”正式启程，他们乘搭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赴法属安南，途经西贡，由海防登岸，再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胜利抵达昆明。然后编入西南运输处赴滇缅公路服务。

吴璋回忆说，滇缅公路是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抗日运输线。他们天天在滇缅公路险恶的路段与死神打交道，与瘴气斗，与毒蚊斗，还得与日寇的飞机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常处于死亡边缘。其中最惊险的经历，则是大撤退时惠通桥虎口脱险之事。下面，就是吴璋的讲话录音：

1942年5月初，我们车队一行9人，到芒市运汽油。当时因日本占了缅甸，大量难民回国，我们也奉命一起撤回。滇缅公路上挤满了各式车辆，两旁尽是逃难的侨民，他们扶老携幼，秩序混乱。车子走走停停，有的开不动了，就被推下旁边的深谷。日本兵也化装（穿第五军的军装）尾随而来。到了惠通桥边，检查站查到了装在卡车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于是当局下令自己炸断惠通桥，把日寇阻截在怒江西岸。

我们的车子开到临近惠通桥边，突然听到“轰隆”的爆炸声，惠通桥随着爆声被炸断了。走在桥上的难民以及拥挤过桥的卡车都掉入江中，惨不忍睹。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我们连忙煞车，躲到旁边山上。又一想，汽车上装载的汽油不能落入敌手，于是，又回来点燃汽油烧毁卡车。我们正在烧车，日本兵看见了，就包围过来，一看到我们是驾驶兵，也许认为对他们有用，就抓了起来，关在一间破篱笆墙的屋子里。我们9个人被捆在一起，遭到一顿毒打，第二天，日本兵开始分配我们作苦力了，有的被派往砍柴，我则被叫去挑水，到了晚上，又将我们捆了起来。外面留一个日本兵站岗。我悄悄与大家商量，应抓住机会连夜逃跑。半夜，日本兵抱枪睡着了。我们挣断绳子，互相松绑，就朝江边跑去。不知是哪个驾驶兵碰到东西，碰出了声音，日本兵醒了，马上开枪射击。我们分散逃亡，只有我与李五安跑到惠通桥下游处，其他人被冲散了，至今不知死活，也许一个个都牺牲了。

滚滚的怒江横在前面，水流湍急，虽已是五月初了，依然冰冷刺骨。但为了逃离虎口，我俩还是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只将驾驶证含在口中，跳入江中泅水归队。江流很急，又有漩涡，把我俩冲散了，我只好随着江流漂着，大约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漂到下游斜对岸。

泅水过江后，已经精疲力尽，被岸边我国驻军发现了，以为我身份不明的危险人物，另眼看待。我连忙说我是华侨机工，刚从日本兵那边逃回来。驻军人员检查了我的驾驶证之后，指着一条山路说，那里有一座庙，里面有逃难的。于是我吃力地攀登着前往。当时又冷又饿，再加上刚水泅时严寒的刺激，一直咳嗽，结果，留下气喘后遗症。在这座古庙里，住满了逃难的缅甸华侨，大多是福建，广东人。我用闽南话与他们交谈。他们得知我是南侨机工，一位老华侨马上拿出一副西装给我穿上，并给一些饼干充饥。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结伴一起徒步回昆明。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脚底磨出了血泡。走了两天，路上没有东西吃，只得在路边喝凉水。结果染上了痢疾，一边走，一边拉，病得快走不动了，才到达了保山。

当时，保山城已被日军炸得一塌糊涂，电线杆上还溅挂着同胞们的血肉，触目惊心。我忙着找过去住过的机工车队，但已经撤退了。再到过去的加油站看看，还有一些抛锚的军用卡车，我就去挑选，将几部破车零件拼凑起来，终于“组装”成一辆可以开动的汽车。于是，我载运同路回来的难侨，一起返回昆明。

从保山颠簸开着破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天半才到昆明。回到西南运输处，再也无人管了。于是，我随着几个机工朋友开始四处飘流……后来，到四川、贵州等地谋生。抗战胜利后，我在四川结婚，便留下来了。解放后，在四川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到过岳池、南充、泸州、雅安、甘孜等分公司，直至1979年才退休。

1989年7月7日，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内举行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瞿铄的老人健步登上台阶，深情地抚摸着石刻碑文，两眼情不自禁地流淌着泪花，沉浸在回忆之中，以至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走过来与他握手时，他竟还反应不过来……这位老人便是当年马六甲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之一——洪华民，是专程从四川自费赶来的。

这是个颇有传奇经历的人物。不久前，笔者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专程对他作了录音采访。洪华民原名叫洪六爻，“华民”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回国参战时取的，目的为着激励自己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一）**

洪六爻祖籍福建同安县新店乡东坑村，但他却是个中日混血儿，父亲洪启昌是个侨商，母亲宝玉子是个日本人。1926年，洪六爻5岁时，父亲突然病逝，母亲只身返回日本，他成了孤儿，被叔父带往安南抚养，在河内读至小学毕业。12岁时，四叔父又把他带往马门甲并收为养子。

在马门甲，洪六爻到一家英国人办的道奇汽车大修厂当学徒，白天做工，晚上与堂兄学文化。养父曾在泉州少林寺学武术，到南洋继续练武，以弘扬国术。见洪六爻诚实可靠，养父便将全部武艺传授给他。由于少年时代的勤学苦练，他不仅练就了“童子功”等少林功夫，而且培养了良好的武德，他那不沾烟酒的习俗及宽容刚毅的性格，为日后的成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那年，他转入英商亚细亚货运公司开汽车，月薪40元叻币，过着安稳舒适的日子。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祖国遭难，也给洪六爻平静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他深感故土的安危与华侨的境遇密不可分。于是，他积极上街卖花，募捐义演，投入当地筹赈会的活动。同时，盼望有机会回国参战，报效祖国。

有一次，洪六爻出车到新加坡，正逢夏之秋、项堃率领的中国“武汉合唱团”赴新义演。那凄婉悲壮的歌声，那激昂慷慨的召唤，使全场侨胞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尤其是“救亡三部曲”，更令人热血沸腾，使得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回国抗日的决心更为强烈了。

回马六甲不久，又看到报上“南侨总会”招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洪六爻感到这正是天从人愿、报国有门了，随即跑到筹赈会报名应征。

养父得知洪六爻报名回国抗日，深怕他年纪太轻，难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便多方劝阻。养母更是泪如雨下，苦苦劝留，甚至托人物色一个18岁姑娘准备从速为其成亲，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洪六爻认定，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养父见此，只好肯定他回国抗日的良好愿望，但又表示救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华侨多出钱也是支援抗战的表现，并愿意立即出一笔钱给他成家立业，实业救国，仍不失为爱国之举。总之，养父母为了不辜负六爻已去世的父亲的嘱托，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平安地留在身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实话，洪六爻也有些舍不得离开亲人，不忍放弃海外安稳自在的生活而孤身回国，到战争环境中过意料不到的艰苦生活。但眼看祖国有难，作为一名具有驾驶技术的华侨热血青年，理应挺身而出。于是，他恳托筹赈会侨领协助动员说服。经过一番波折，养父母终于同意了，不过，还再三叮嘱一条：抗战一结束，必须立即返回。就这样，年仅18岁的洪六爻，为达到需20岁才符合条件的规定，自己多报了两岁，才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抗战的征途。

谈及这段历程，洪老先生记忆依然清晰，他激动地回忆说，与他同一批回国的马六甲华侨机工有20多人，其中原籍同安的许成瑞，已在抗战中牺牲了，还有戴新菊（今在四川）以及余英沛（今在昆明）等人。他们一行乘船抵新加坡加入第三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他还被推选为领队。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了全体机工。他说：“我虽与陈先生是同乡，还有亲威关系，对于陈老的崇高声望早有所闻，但直接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当时陈老已经60多岁了，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留着胡子，戴一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从他敏捷果断的言谈举止中，给人一种刚毅坚韧的印象。陈嘉庚先生用浓重的同安口音演讲，他对我们说‘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抗战运输线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这次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救亡，是非常光荣的，希望大家高兴而去，胜利而归，为祖国争光，为海外侨胞争光！’陈先生的慷慨陈词，使全体华侨机工激动不已。为表达这种爱国心情，我当即将自己的名字洪六爻改为‘洪华民’，以示报国之志”

第三批回国机工共590多人，总领队是麻埠侨领刘贝锦（永春籍，后来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许成瑞任副总领队，洪华民任马六甲支队长。1939年3月27日，他们从新加坡启程，乘轮船抵西贡，后转火车到达昆明。在西南运输处经过几个月军训之后，洪华民被分配到第12大队第10中队（谭江柏任大队长）从事“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

**（三）**

滇缅公路由昆明通往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苍山、怒山、高黎贡等高山峻岭，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天堑，不但迂回曲折，坡陡路险，而且有些地段属于单行道。在这条路上抢运抗战军用物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消息传到南洋时，海外亲友都为南侨机工担忧。洪华民的表哥从安南寄信寄钱来，劝他回南洋，叔父还寄给入境手续，以便机遇不顺之时能有退路。但洪华民却抱定必胜信念，即日寇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返南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抗战运输工作上。他给海外回信，总是对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充满信心，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海外亲友放心。这些信件及照片在海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鼓舞了不少机工又陆续回国抗战。

在机工生活中，足令洪华民感到骄傲的是一段义演活动。1940年，云南芒市一带发生特大水灾，难民流离失所，南侨机工为此组织了文艺义演，筹赈救灾。自幼练就南少林武功的洪华民，在义演中竟大显身手。他表演了“汽车过人”的硬气功，惊险的场面博得热烈喝彩。在集体表演叠罗汉节目中，又是他运用轻功跃到最上面。他还与马来亚机工莫才合作，成功地表演了被日寇“活埋”后获救的气功节目，在当地义演中引起轰动，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在滇缅公路经历的许多惊险事件中，洪华民至今印象最深，也最感痛心的是1940年四月间的遮放军火仓库爆炸事件。遮放是靠近我国边境畹町的一个小镇，西南运输处在这里设立仓库，存放着大批由仰光抢运入境的军工弹药和器材。那一天，洪华民刚卸货离开仓库不久，便发生了大爆炸。这些兵工署急需的军火物资，是华侨机工经历千辛万苦抢运来的，却由于当局管理不善，使千余吨弹药毁于一旦。对此，每位机工无不扼腕叹惜！

随着战局的恶化，1942年5月初，侵华日军沿着滇缅公路直逼国门，南侨机工车队奉命东撤。洪华民目睹了一幅最恐怖的战乱场面，至今，他仍记忆犹新：“当时滇缅公路上，各种车辆首尾相接，互相超越，走不动的车子就被推下深渊，两旁逃难的人们，肩挑手查，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不少行李衣物散落在路上。日寇追兵在后，当我随着混乱的军队刚驶过惠通桥，随着一声‘轰隆’巨响，桥被国民党守军炸毁了。日寇虽然被阻拦在怒江西岸，但未及过桥的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则沦入敌寇的魔掌。”

惠通桥一炸断，三年多来（1939.1 - 1942.5）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滇缅公路国际军运线终于中断了。此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中缅运输局）竟然不管南侨机工的死活，南洋又已沦陷，有家归不得。洪华民不得不四处飘泊，辗转各地，最后到云南盟军机场当苦力。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结束。

战后，为表彰赤子功勋，当时的侨务委员会发给奖状，军事委员会也发给证明书，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在洪华民家中，洪老先生还展示了他精心保存40多年 前的奖状及证件。

**（四）**

新中国成立后，洪华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章。他被分配到重庆运输公司当司机。1950年，洪华民奉命随军支援进军西藏的战斗，在领队运送军用航空汽油途经四川资中县时，突遇土匪围追，由于他当机立断，沉着指挥，率领车队避免了一次汽油大爆炸事故，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军部的记功嘉奖。

长期以来，洪华民在汽车运输岗位上，对技术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不过，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与许多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一样，洪华民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浩劫中，他因曾参加抗日南侨机工在西南运输处的经历，被诬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关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尽管如此，他那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仍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洪华民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他当选为四川宜宾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此后，又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洪华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给安全行驶一百万公里以上的《荣誉证书》，该证书写道：“洪华民同志，截至一九八四年底安全行驶116万公里，特予奖励”。1984年退休后，洪华民还担任家宾侨联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继续奉献余热。

在第八批回国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吉隆坡华侨陈昌雄，在抗战结束复员时，因交通受阻等原因而滞留大陆，现居四川泸州兰田镇，是一名退休驾驶员。尽管年事已高，但只要一提起在滇缅公路从事抗战运输的往事，老人的情绪立即高涨，谈着谈着，有时竟激动得情不自已。他说：

“前年十月份，省侨联召开‘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川人员座谈会’，接到通知后，我激动非常，按期搭车去成都。不巧的是汽车沿途抛锚，身体不适，不得不中途折回，未能到会与昔日同伴相会叙旧，实在遗憾！”

陈昌雄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清澜乡良友村（原名友河村），14岁时由堂兄陈昌珉带来马来亚，找到了在吉隆坡给一家英国商人当厨师的父亲。在那里，父亲将他送入尊孔学校读书。父亲虽是个厨师，但见多识广，尤其崇敬孙中山，常给他讲述当年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形。父亲常说“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主义不断地用武力侵略我们”，希望他努力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出力。可是，因家里负担太重，陈昌雄小学未毕业就停学了，到宗叔陈家耀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当汽车机修工的生涯。4年后，在他21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他随同三叔陈家灼，到新加坡七马路联友电器公司当工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空前高涨，陈昌雄也卷入新加坡华侨抗日募捐热潮，脖子上挂了一个“救国捐”箱子，到处募捐。每天晚上把捐满钱的“救国箱”送到筹赈会，第二天又背着箱子四处募捐去了。1938年，“武汉合唱团”来新加坡义演募捐救国，新加坡华侨一致捐出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但遭英国当局的阻挠。华侨非常愤怒，大家团结一致，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公共汽车停开，经过好几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当局同意华侨捐献活动。陈昌雄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当即将45元叻币月薪，除留下9元作伙食费以外，其余的36元全部捐献出来。

24岁那年，陈昌雄奉母命回文昌与同乡姑娘黄玉花完婚。新婚之际，时局紧张，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海南岛，保长要来抓壮丁，陈昌雄告别了新婚两个月的妻子，搭船返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进了德国人开的“美邻闽电器公司”，学习柴油汽车修理技术。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陈昌雄报名参加考试，电工技术考的是实际操作，同时也检查身体，结果两项都合格，便被录取，参加第八批机工队伍。回国前，他们在广肇会馆，由南侨总会派人来训练，每人发给一套黄色制服、一顶大盖军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7月17日，南侨总会派黄景镇来当邻队，机工们都清一色穿上黄制服，威武雄壮，前面还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横幅，每人拿着一面三角旗子，大家在“保卫祖国”、“回国抗战”的口号声中前进，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华侨的热烈欢送，其情景十分动人，机工队伍登船出发了，码头上欢送的人群还久久不愿离去……

轮船经过几天的颠簸，当驶到安南堤岸时，当地的华侨早已在码头等候、欢迎了。可是，法国当局不允许靠岸。经过当地侨领与法国当局交涉，第二天才让船靠拢码头，此事引起机工们的极大义愤。他们整队举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高呼口号雄纠纠地开进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直抵昆明，住进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开始进行集训，每天早上集队操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并通过技术考试合格后，陈昌雄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当时每大队有3个中队，1个补充中队和1个修理班。每个中队有50部车，全大队有200多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崭新的3吨“GMC”和2.5吨的“小道奇”。他的修理班主要负责修理，起初都是新车，修理工作不太忙。后来，战事一天天紧张，汽车日夜奔驰，损耗很快，修理任务也繁重起来，连夜突击抢修，更是家常便饭。虽然工作辛苦，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都精神振奋，毫无怨言。

在昆明半年之后，17大队奉调西南运输处重庆分处，住在黄山路口。此时运输任务更繁忙，日本飞机又不断轰炸，几百部汽车摆在一个地方，目标很大。为避免挨炸，机工们想出了办法，汽车一进站立即调去运货，需要维修的抓紧维修，修好后立即开走。夜间修车也不开电灯，只用修车的小电瓶灯照明，以免暴露目标。

机修班的工作地点，紧靠一片坟地，石砌的古坟成了机工们天然的防空洞，警报一响，就往坟地里钻。有一次，敌机连续七天七夜轮翻轰炸，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死伤多人。一天，陈昌雄正埋头修车，三道警报拉响了还来不及跑开，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子弹嘎嘎扫射在机器上，他连忙从抑制板上，滚进了水田里，浑身沾着泥糊，死里逃生。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中了，许多汽车包括刚从香港才买来的新轿车都被炸坏了，他从新加坡带来的那箱工具也毁了，到处燃着熊熊大火。但警报一解除，大家又毫无畏惧地朝各自的岗位跑去。在重庆修车近一年，17大队又奉调到泸县，修理班住在三岩的一座庙里。不久，又调到宣威、毕节等地。最后，又调到18大队，住在兰田坝。

1941年，陈昌雄从逃到重庆的侄儿陈时炯的来信中得知，妻子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对此他悲痛欲绝，未想到新婚的暂别竟成了永别！大家纷纷前来安慰他。第二年，在大伙的介绍和催促之下，他与四川姑娘金先凤结婚。她是初中毕业生，抗战时的中学生在泸县还是不多的。金先凤被陈昌雄的遭遇和爱国情怀所感动，给他很大的安慰与照顾。

1944年，陈昌雄调到川滇东路第四区运输处，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往往未到月底早就囊中告罄。但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咬牙坚持下来。

抗战终于胜利了，传来南侨机工复员的消息。陈昌雄与新加坡机工蔡志强一起赶到昆明，登记复员，并领到200美元（折67万国币），陈昌雄把5万国币捐赠给昆明侨光学校。在昆明，他未赶上头两批返南洋的队伍，但听说复员南返的道路曲折艰难，十分不顺，“华侨互助会”的人就劝他待平静之后再南返。就这样，一等再等，拖延未能回南洋，直等至解放。

解放军派军代表对他们说：“中国解放了，今后的建设还需要您们这样的人才，您们就留下来吧！”于是，陈昌雄便留在四川。与他同时留在四川的还有：福建籍的张天赐，在四川省运输公司任驾驶员；洪华民，在宜宾运输公司当驾驶员；海南籍的符利华，在四川省轻工业局，已逝；广东籍的陈苏，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郑志南，调去南充任驾驶员；还有潮州籍的卢国龙，前年在兰田坝交通机械厂病逝了。

1972年，陈昌雄收到文昌且老家的来信，告知95岁的老母病逝，他回老家治丧，才得知道玉花牺牲的详细情形：那是海南岛沦陷之后，从新加坡返回文昌的陈时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玉花积极参加妇联抗日活动。一天，游击队在乡里的一座庙里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引来日本鬼子包围袭击，玉花在突围时牺牲了。

昌雄老人1972年退休之后，在家安享晚年。与老人交谈，令他梦绕神牵的事，还是与滇缅公路有关的人与物。至今，他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西南运输处发给的一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他对纪念章图案尤其熟悉，连纪念章的号数都清楚地记得：1453号。

另一件却是憾事：1939年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在宗祠文昌会馆与欢送宗亲的纪念合影，上面写着：欢送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张照片他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文革”时，有人要抓他的“尾巴”。他才忍痛烧掉。谈及此事，老人连声说：“可惜，实在可惜！”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马来亚华侨林广怀，原名林江海，“广怀”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为瞒过家人避免阻拦而改的，并包含着“心怀祖国”以激励自己之意。

1919年，林江海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小山村（土角楼），未满周岁就由父母抱着“过番”到南洋，侨居在马来亚丹绒马林开杂货店的祖父家里。当时，祖父开了几间商店，家境殷实，父亲协助经营，生意更加兴隆。后来，祖父逝世，父亲便接手经营“成美”号，而叔父则在实叻务经营“谦美”号，若论财务，叔父在当地华商中还可以摆在前几位。江海自幼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全家弟妹八、九人，他居长当“孩子王”，在华侨学校读书时便对体育运动特别兴趣，还组织一个“小蓝球队”。他刚满15岁时，其父不幸病逝，全家便和祖母搬迁到实叻务叔父家。他开始在叔父“谦美”号学习经商，帮助处理财务，让弟妹全部上学读书。

“七·七”事变之后，祖国军民的浴血抗战，进一步唤醒了海外侨胞的民族意识，报纸上也天天报道国内的局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各地筹赈分会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星马一带还流行用青纱做袖章，上面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每个爱国侨胞都争先佩带。当时林江海组织的“日光蓝球队”队员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大家都带上青纱袖章走上街头游行宣传，卖花筹赈，还通过蓝球比赛进行募捐，先后共募捐二千多元，悉数上缴森美兰筹赈分会，统一汇往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2月，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林江海立即响应，兴冲冲地赶到芙蓉筹赈分会报名参加首批回国机工团。不料当地报纸马上登出林江海的名字。年迈的老祖母便赶到筹赈会阻拦，她说：“你父亲不幸病逝了，放下一群弟妹八、九个，你是长子，要好好维持这个家庭！”筹赈会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只好将他留了下来。第一次报名没有达到目的，林江海在失望之余，还故意与家庭斗气，不回叔父的公司工作，自己到巴刹做菜摊生意，并另租铺面开设糖果店。由于商务关系，他经常去吉隆坡、马六甲和波德申等地，看到南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深受鼓舞。尤其是短短的几个月内，各地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已达数千之众，再一次激起他“弃商从戎”之决心。有了上次家人阻挠的教训，他便不用原名，而改名“林广怀”，再次到芙蓉埠报了名。经过考核，芙蓉埠计有20多人合格，其中有永春籍的刘瑞齐、颜世国、林财（林广怀之堂弟）等，大家推选林广怀为队长。这一回，家里要反对也来不及了。老祖母为他的决心所感动，鼓励孙子回国后要好好效力，不要半途而废，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抗战一胜利，就要马上回来，老祖母等着最后见你一面！”就这样，林广怀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回国征途。

在林广怀的带领下，芙蓉埠的20多名热血青年，乘船前往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全体机工，勉励大家要团结一致，尽忠报国。这批回国机工共330多人，编为七个中队，林广怀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领队。

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集训之后，林广怀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华侨补充队，当即奉派前往腊戍等地接运军车，然后运送武器到广西柳州前线。接着，又奉命运军需品上迁江前线。行车途中，无论白天黑夜，常遭敌机袭击。为了安全，车队规定，夜间运行不准开灯，只能摸黑前进。在此期间，前线炮声不绝于耳，满载军火的车队行驶在险要的山路上，这对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毫无怨言。林广怀回忆说，当时运送部队兵员及武器到前线，然后又运载伤员回后方治疗，往返过程，历尽艰险，南侨机工总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至于饥饿口渴，就更置之度外了。

1941年，林广怀随车队调往宣威，运送军需物资到泸州、贵阳等地。经过叙永训练班的培训之后，林广怀奉派回昆明，在第三大队任少尉分队长。

1942年，林广怀又奉派前往仰光抢运，殊料刚到腊戍，仰光已告沦陷，便改在腊戍转运华侨难民回昆明。这时滇缅公路沿途车辆拥挤，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惨死在路边。一路上，机工车队与各式车辆因抢道而互相堵塞，走走停停，有的车辆走不动就被推下深谷，情景令人心寒。日寇在后面步步进逼。林广怀刚撤过惠通桥不久，即传来该桥被炸毁的声音，一同回来的堂弟林财以及一批未撤过桥来的南侨机工车队不幸罹难。

惠通桥炸断之后，滇缅公路无法通行了，众多南侨机工只好在昆明待命。林广怀回到石塘山司机训练所，但该所一片混乱，没人负责，比难民收容所还不如，失业机工便四处星散。在失业、生活断源的困扰下，林广怀跟着友人来到重庆，找到原西南运输处第三分处，经熟人介绍得以到兵工署汽车运输处开车，运输器材，往返于昆明、贵阳、湖南等地。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贵阳时，林广怀参加战斗运输，夜以继日地运送第九军、十三军部队兵员到独山前线。有一次，车队被日军包围，他守在车上两天两夜，度日如年又吃不上饭，第三天早晨才奉命调头运送伤兵回贵阳。

抗战胜利结束后，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促成下开始复员南返。林广怀却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待他回到重庆时，已错过南返机会。林广怀只领到“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他把这枚历经抗战血与火洗礼的纪念勋章寄回南洋，让家中亲人们分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从1951年起，林广怀一直在重庆国营运输汽车公司开客车，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对技术精益求精，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特级驾驶员”的称号。

岁月匆匆流逝，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1984年林广怀与妻子双双光荣退休。退休后仍得到单位领导的关怀照顾，在落实华侨政策中，又安排他们搬进公司新宿舍。1986年，林广怀与全国各地幸存南侨机工一起，享受国家专门制定的新政策，领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1987年8月，林广怀申请前往新加坡探亲（见图82），作为战后留居在中国的南侨机工南返代表之一，受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的亲切接见。在陈共存先生的关怀下，8月16日，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李永乐专题采访了林广怀。10月24日，《联合晚报》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大特写《久违了，南洋！——留居中国的机工近况实录》，介绍了这位抗日南侨机工的事迹。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公交公司退休驾驶员颜世国，是永春籍南侨机工之一。不久前，笔者在嘉陵江畔采访了这位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参战的幸存者。

颜世国于1914年出生在永春。5岁时便随父母前往马来亚怡保，先在当地华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即学会开汽车。16岁开始在其父朋友的“春成”布店当司机，月薪优厚。后来，应叔父之邀，到马口埠叔父开设的“成发”杂货店协助经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成发”商店生兴隆，盈利颇丰。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难当头，海外华侨群情激昂，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当时颜世国在叔父“成发”店经商，个人虽然安稳舒适，但他情系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筹赈活动。除了带头将该店每月盈利捐出10%之外，他还带动筹赈分会成员组织起来，主动向当地的橡胶园包工头及各商店开展卖花募捐，将筹集的义款交南侨总会统一汇往祖国。

1939年春节，颜世国在马口埠举办婚礼，他与妻子双双将结婚金戒指捐献出来，连同喜宴所节俭下来的一笔款交给当地筹赈会，表达了海外赤子爱国之心。当地华侨报纸对其爱国行为作了褒扬。

不久，陈嘉庚先生在报上发表了《南侨总会通告》，号召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服务。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正急需大量熟练司机，颜世国认为，自己刚好有这项特长，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产生了报名应征的念头。可是考虑到已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妻子已有了身孕，他又感到已经不能象其他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说走就走了，怎么办呢？他设法先将妻子送回槟城岳母家中安顿妥当，然后瞒着母亲和弟妹前往报名。他考虑到本地马口埠熟人多，一旦声张出去家人会来阻拦，便特地赶到芙蓉埠筹赈会报名，待一切手续办好之后，才回家悄悄告诉弟弟，连母亲也没让知道，就与芙蓉埠机工队出发了，前往新加坡加入回国机工团。

颜世国随第八批机工团回国后，于1939年底分配到重庆黄山路口的西南运输处分处任驾驶兵，主要任务是从事重庆至柳州之间的军事运输工作。当时柳州已成前线，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颜世国与机工战友们冒着炮火投入抢运，当日军由柳州头塘攻至二塘时，他们已将大批抗战物资移入四川了。不久，独山失守，颜世国则随机工车队调到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是举世闻名的险要路线，该路是战时紧急抢修的，许多地段不合标准，山高路陡。颜世国在滇缅公路上历经了无数艰险，亲眼看到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殉难。有一次，颜世国与战友们运载一批军火到达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边，突然遇到日机轰炸，桥面已被炸得坠入江中，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军火运过江，使这条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颜世国在这段戎马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上大撤退之惨状。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大量物资。尽管几乎每天都有车辆在翻越陡峭急弯的山路时坠入深谷，但整个车队没有退却。司机们机智加勇敢，前仆后继，战胜艰难险阻，战斗在运输战线上。

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沿途哀鸿遍野，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惨死路边。整条公路上人车混杂堵塞，南侨机工车队走走停停，不断地按着破喇叭，有时还得跳下人往前拨开一条缝，才勉强让车轮滚上几圈。临近惠通桥时，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上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兵。颜世国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惠通桥断毁的声音。

惠通桥一炸断，滇缅公路便切断了，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就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到机场，这就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颜世国与200多名华侨机工，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毅然应征前往印度，参加盟军反法西斯战斗。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南侨机工曾在滇缅公路开过车，技术很高，救国心切，因而入印不久就受到盟军的赞赏。颜世国在印度阿山省地普罗加飞机场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以及大锡锭等，他们经常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坚持抢运，直至1945年胜利才回国。

抗战胜利结束后，颜世国荣获了侨务委员的奖状，继续留在重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分配到重庆公交公司开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评定为一级驾驶员。颜世国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发挥余热，他担任区政协委员、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89年，正值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之际，四川省侨办、侨联特为全省十几位劳苦功高的南侨机工颁发了《荣誉证书》。颜世国也获得这一殊荣，领到了荣誉证书（见图84）。证书上写道：

**颜世国同志响应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半个世纪以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发此证，以资表彰。**

**四川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荣誉证书眉既表彰了以颜世国为代表的幸存南侨机工的特殊功勋，也褒扬了数以千计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海外赤子的奉献精神！

第五批返国南侨机工中，来自新加坡的程龙庆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他脑海中，不仅有滇缅线上的烽火，更有重庆红岩村的终生难忘的回忆！

1939年，年仅18岁的程龙庆，在一股爱国热潮的推动下，经过一番曲折的报名过程终于搭乘第五批回国机工团的轮船，踏上回国参加抗战的征程——这是1939年5月22日，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新加坡红灯码头格外壮观，回国机工团登轮启程，各界华侨人山人海，热烈欢迎，启锚时，岸上口号声震耳，机工队伍唱起《告别南洋》的雄壮歌声，但见无数人激动得热泪横流，无数的礼帽被抛向空中，抛向海里，蓝色的海面上，顿时漂浮着好多好多帽子，帽子代表着亲人的心愿——陪伴机工队伍一道回国！

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四个昼夜，才到达安南西贡。在安南，属于西南运输处的机工团先乘火车直抵昆明，而程龙庆一行17人，却又搭原船驶向香港，因为香港还有一批属于“海员工会”的华侨等在那里，在香港上船的归国华侨约40多人，多数是机工，也有回国赴延安求学的华侨青年，（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新华社名记者的王唯真，当时年仅十七岁。）途中经过海南岛时，听说海南岛已被日寇占领，船长在大家的要求下同意绕道，可是就在快要绕过海南岛时，却与日本舰相遇。船上面通知旅客准备接受日军检查，大家赶紧把身上穿的中山装脱下来藏在煤堆里。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并没有上船来，这才闯过了危险的一关。

轮船驶至安南海防，程龙庆一行便转乘火车、汽车进入离镇南关不远的广西边陲重镇凭祥县。在树林中，那里早有二十几辆汽车等着他们了。这些汽车，有的是美国、加拿大华侨送的，其中一辆德国制造的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车身上标有“宋庆龄送”字样，尤为引人注目。在新加坡，程龙庆和方川如（方毅同志的堂兄）等十几人就已确定分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香港由办事处派龙飞虎科长接洽，所以，次日便分别驾驶着这些汽车直驶重庆。

凭祥到贵阳的公路也是运输各种物资的咽喉要道，但路面狭窄破烂，坑坑洼洼。当时没有防空设备，常遭日机狂轰滥炸。一天，在南宁附近躲敌机轰炸时，车队一辆汽车钻进了国民党军的高射炮阵地。蛮不讲理的士兵，硬说是刺探军情的汉奸，将司机五花大绑，关了一天一夜，随后押赴南宁市，扬言要杀头。正当紧急的时刻，办事处的龙飞虎同志赶到，经过一番交涉，才救回了人和车。

经过一番艰辛历程，1939年10月，华侨机工车队终于抵达重庆。当山城的万家灯火出现在眼前时，海上的风波、日机的轰炸、通路的坎坷，霎时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一个个笑出声来。

按照事先安排，回国的华侨机工大部分都分在西南运输处，只有程龙庆等人去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报到，暂住土湾的办事处仓库。五、六天后，即出发到离西安六十里处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训练班，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训练班对青年学员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并开展丰富多采的文艺活动。1940年3月，程龙庆等九个华侨司机返回了重庆。

当时车队临时组成，所在地四周都是农田，宿舍和车库都用竹子和篾席搭架起来的，相当简陋，修理间是茅草棚。这地方吃水困难，煮饭、洗东西都是用田里的水。一至炎夏酷暑，田里干涸了，吃水更加困难。由于水土不服，华侨机工经常生病，至于打摆子，冷一陈、热一陈，成了家常便饭，但大家从不叫苦叫累。

办事处坐落在化龙桥的一个山沟里，同志们很注意勤俭节约，自己挖地种菜，男女同志都是一色的军服，每月生活费很少，给华侨机工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在处长办公室闲谈，程龙庆说起钱不够用时，刚好周恩来同志从外面走进来，听了大家的谈话，风趣地说：“是啊，我们处长每月也才五块钱哩，你们华侨同志每月发三十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想办法解决嘛！”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当时回国的大部分华侨青年，只是为了抗战，爱国热情很高，但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区以及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缺乏认识，总想几年以后再回南洋去。由于生活艰苦，加上家中音信杳无，因此也有些不安心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的言传身教，使他们深受教育。一次，一个华侨司机开着小车送周恩来同志，汽车发动不起来，周恩来同志立即下车去亲自推车。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养伤回来后，在办事处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还让华侨同志一起去听，给程龙庆留下很深的印象。

程龙庆在办事处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那时重庆是陪都，日本飞机常来空袭。起初，车队一听到警报，就把车开到郊外躲起来，后来，跑警报跑厌了，有时索性呆在屋里。不料，在一次轰炸中，程龙庆正在屋里，听到“丝丝”的声音，才急忙趴在乒乓桌底下，右脚被弹片划了一个大口子。

程龙庆受伤的消息一传到办事处，医生很快从办事处赶来，周恩来还派另一位华侨机工来专门照料。幸亏没有伤着骨头，半个多月即痊愈了。有一次程龙庆去办事处看球赛，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人群中一下子就认出他，连连招呼道：“小鬼，又来了！伤好了吗？”并嘱咐好好休息。

程龙庆回忆说：“两年多时间里，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共产党人对归国华侨的热情关怀和对参加抗战的归侨青年的热情鼓励，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作风和为人，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服务的两年多时间里。程龙庆除了到西安等地出远车，还三次直接到延安。车队每次出征少则五、六辆，多则十来辆。运输任务除了国民党政府拨给十八集团军的给养外，还运送各界进步人士捐送的药品、汽油等急需物资。另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运送一批批去延安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并秘密捎带党组织从港澳及各地转来的材料、文件、电台等。

由于重庆到延安这条公路，是当时我边区与国统区联系的唯一的地面交通线，十八集团军重庆、西安办事处的车队是这条线上引人注目的共产党车队。为保证行车安全，周恩来同志操了不少心，每次出车之前，都是他亲自与有关当局交涉，办理手续；出发时，他要一一清点人数、物资，还对我们华侨司机和修车工再三叮嘱。

当时，国民党一路上层层设卡布哨，每道关卡都配有军、警、宪、特人员。由西安通往延安的路上，检查哨就更多了，车队每到一个县城或大镇，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甚至连汽油桶也要伸进细棍搅一搅。即使如此，车队还是在他们的眼皮下带秘密物品进出。办事处的同志巧妙地将文件单本和电台部分紧紧夹藏在大油桶底下，装满了汽油的桶太重，检查人员是不会抬下来查看的。

历尽艰难险阻之后，每当车队一进入陕甘宁边区，车箱里的沉闷空气就一扫而光，大家心情大快，精神为之一振。在这两年里，程龙庆他们的车队就曾运送几百人去延安。

车队每次到达延安，都受到边区军居的热情接待，每次总在宝塔北面的兵站里休整一、二十天。因延安太冷，滴水成冰，华侨司机每人都得到一件羊皮祅，这是从封锁圈子来的礼物，得之不易，温暖了华侨的心。程龙庆不由对比刚来重庆时的情况，由于刚回国未带寒衣，陈嘉庚先生发动南侨总会向每位回国机工赠送一批寒衣及其他生活用品，竟被贪官污吏侵吞了，华侨机工连一件寒衣的影子也未见到，结果被冻了好些天。两种情况一对比，大家对延安的感情更为亲切了。

在延安，程龙庆他们还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为毛主席开车的司机，也是位马来亚华侨，姓梁，海南籍的。毛主席乘坐的那辆老式的黑色雪弗莱小轿车，是美国洗衣馆的华侨工人捐赠的。

抗战胜利后，程龙庆留居山城重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阻挠，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一事一拖再拖，为此程龙庆与其他19名机工联名致信陈嘉庚先生。陈先生将该函转载于1946年5月31日《南洋商报》上，全文如下：

**返国服务机工**

**致函陈嘉庚先生**

**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

**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

**【按：当我国抗战之初，热心机工回国服务者达三千余人，服务至今，经已多年，入伍者多已复员，惟一般机工，因种种关系，尚未能南旋。在失业贫苦中，兼以物价飞涨万倍，屡次请求，均遭拖延，其中有程龙庆者（原住马六甲街）本月六日与其同事联函致其友人洪水星，转托本报记者呈交陈先生。】**

**嘉庚先生大鉴：抗战胜利，万民腾欢，遥悉先生安然返星之息，无任欢感，第以关山阻隔无以言达为憾耳。**

**民等均系抗战初期受先生伟大爱国精神所感召，激於义愤热忱，不畏艰难困苦，毅然舍离妻儿，参加回国服务团回祖国服务，其时悲壮之情绪迄今仍映眼前。回国之后，民等莫不以乘忠竭诚之本志努力工作，周遭处境，最不免有令人灰心之处，总以一忍度之，皆盼抗战早日胜利，俾使凯旋海外，度安谧和谐之日子。如是一日终于到来，诚足庆幸，奈胜利迄今，将届一载，国内复员工作殆已完成，独民等此回国服务机工仍滞留内地，度失业穷苦之生活。据民等所知，前次太平洋战事后归国难侨，政府尚且发给每人二百美元之旅费，而民等回国服务者刚闻无所闻，似此未免令人心灰。以数年来之努力献身祖国，而令在海外父母子女度凄苦之日子，其报答竟是如此。现民等滞留重庆，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经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侯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先生乃侨界之宿望，素以关心侨民一切苦况□□，且此事又直接与先生有关，诚盼能予协助，或敦促政府当局迅速办理遣送事务，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以先生在国内之硕望，必能达成佳果，殷望之至，恳祈速予指示免再受痛苦，不胜铭感。赐复寄“中国重庆小龙坎第廿四号信箱程龙庆”，专此**

**敬祝康安**

**星洲华侨回国服务团机工：张荣生、程龙庆、黄金水，第九批卢松深、林渊元、杨木深、张永隆、林金狮、曾杏存、严亚国、伍书旺、伍瑞添、林英侨、蔡成贵、黄金堆、黄□□、江咏源、方俊卿、张木隆同上，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

当时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遂答应解决护照和办理复员手续。恰在此时，程龙庆的岳母不幸病重，为了照料她，只好留在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程龙庆被安排在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全行车标兵。1956年，程龙庆递送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海外关系复杂”，被一拖再拖，但他毫不气馁，坚信理想一定会实现。直至1983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程龙庆先生退休在家，经常参加市、区侨联的活动，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的一员，由海外声援抗战到亲身回国参战，在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中，至今依然铭刻在脑海中的有如下几件往事：

**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消息传来，广大华侨人人为之震惊，个个义愤填鹰。当得知故乡厦门沦入日寇魔掌时，我更加怀念故土与亲人，积极参加星华各业工人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抗敌后援会在郑青剑的领导下，组织了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经民主选举，我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表示对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我们以木业工人互助会的名义向筹赈会共捐箱三个，并将卖花所得之钱交筹赈会。以后，我们又将老板认购救国债券的钱，以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的名义寄回祖国，支援抗日，慰劳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将士。事后，我们收到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两人盖章的收条。

**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1939年5月，我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5月22日，我们第5批机工从新加坡红灯码头出发，计500多人，大部分将赴西南运输处跑滇缅公路军事运输，仅十几名被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我是其中一员，同行的还有程龙庆（现仍留居重庆）等人，领队是李振华同志。

我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安南西贡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侨机工先下了船，转火车去云南。而我们一行17人，继续搭原船去香港。途中，为了躲避日寇军舰的搜查，绕道经菲律宾才驶到香港。在香港，又有40多个机工以及回国赴延安的华侨青年（其中有菲律宾的王唯真）上船，然后驶向安南。

在海防，我们办好入境手续手，转乘车进入广西凭祥。紧接着，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开着海外华侨捐赠的二十多部汽车，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冲过一道道关卡，出南宁，翻独山，经贵阳，终于在1939年10月抵达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亲驾新车送给新四军。**到重庆后，我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任中士驾驶员。当时，祝会同志（后在北京商业部任职）是我们车队直接负责人。他在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开车，并负责处理车队的日常事务。我曾驾车在重庆延安之间往返几次，还为新四军送过车。

1940年春，我和余枝同志由贵阳到桂林办事处去接香港运来的卡车。那两辆卡车是叶挺军长的弟弟押运回国的。当时敌机频频出动封锁公路，只能夜间行车，结果在离南宁不远的八塘，一辆卡车翻了车，叶挺之弟失事身亡。我们在桂林得到消息，连忙赶去救援。我把另一辆卡车开回桂林。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命我把车开到安徽省岩寺新四军办事处。我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个是新四军的副官，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驾着卡车，冲破种种封锁，终于安全到达岩寺，亲手把车交给新四军。第二天，我和新四军副官乘军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回桂林办事处。

**运物资赴革命圣地。**在重庆办事处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曾多次运物资送人到延安。而令人难忘的是最后一次赴延安。

1940年底，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公路运输线封锁得更加严密。那次我们五辆卡车，两辆小车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走到川陵交界处的宝城时，国民党检查站借口查武器号码与持枪证是否相符进行刁难，强逼我们把车开到汉中。到了汉中，又胁逼我们把车开回宝城。宝城检查站无事生非，要扣押车队的一个军医（该军医原在白崇禧部队做过事），几经交涉才准许离开宝城。途中的一个检查站又故意找麻烦，在扣押一个参谋后，才让车队继续前进。几经波折，车队才进入边区。当我们远远望见延安宝塔山时，大家都高兴得唱起歌来。

我们刚到延安，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我从延安返回重庆，龙飞虎同志随车同行。我们再次冲破重重关卡，才达到目的地。回重庆后，办事处及汽车队人员多已解散，南侨机工队员中我是最后的离队者。离队前，祝华同志带我去见办事处钱之光处长。钱处长非常关心我离队后的生活，给我发了路费。斯时，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我叫陈寿全，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所属南侨机工服务队里，大家都叫我“歌全”。这是为什么？话还得从当年苏门答腊码头说起：

那时，刚满21岁的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报名参加了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为了抗日救国，我不忍告诉年老体弱的父母，我知道这一次飘洋过海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以后有没有相见的日子是难以预料的。我悄悄从家里跑出来，在邦加岛客属公会的保送下，来到苏门答腊码头，准备登船回国。码头上簇拥着无数送行的同胞，个个脸上流露出眷恋惜别的表情。乐队奏响雄壮的欢送军乐。我悄悄地看了四周，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孔！这下我放心了，随着队伍大步登上轮船。

“呜——”告别的汽笛拉响了，船慢慢离开了码头，前方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随着海浪一阵阵的撞击，我的思绪随着巨浪翻腾起伏：今晚，当爸妈发现我再也不回家时，他们该怎么为我担心呢？还有那一直跟在身旁的弟弟呢？……正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形忽然闯入眼帘，我拼命睁大眼睛捕捉它：就在那里，是他，是我那12岁的弟弟！一见轮船已离开码头，小弟弟便扑跪在码头上，一边呼唤着“哥哥！”，一边放声大哭。

“小弟，小弟……”我也声嘶力竭地喊叫他，我叫他赶快回去告诉爸妈，我回唐山去抗日救国，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会马上回来的！……可是，海风吹散了我的话，小弟仍然跪在码头上痛哭！渐渐地哭声听不见了，他的身影也看不见了！我心情沉重地回到舱里，看到同伴们和我一样，仍然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我呆呆地望着大家，心想：难道就这样带着眼泪上战场吗？可是，怎样让大家高兴点呢？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仿佛听见空中飘来了为我们送别的雄壮军乐声，不由精神一振，引吭高歌起来：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

**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唱着唱着，我看见有的同伴眼里露出刚毅的光，有的同伴已在轻声跟唱。慢慢地，变成了全船机工的大合唱。

这首歌，激励着我们从印尼到新加坡，又领着我们踏上国土，奔向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因为我常常领头歌唱，鼓舞了同伴们的斗志，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歌全”。

贵州之行前，我读到南侨机工许志光的一份史料，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决心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同时，将其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莆田安置。他本人的爱国举动，以及老母和妻儿的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能可贵，十分感人。至今他仍珍藏着一封1939年陈嘉庚先生介绍回国参战的亲笔信。

循着这一线索，在贵州省侨联的帮助下，我在贵阳公园路44号找到了许志光老人。见到有人专门收集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老先生显得十分激动，愉快地接受我的录音采访，话题就从海外家世谈起。他说：

“我是191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祖籍福建莆田，6岁时开始在兴安会馆创办的宏文小学读书，13岁时到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厂当学徒，学习机修，维修制鞋机器。15岁时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16岁开始学开汽车，领到驾驶执照后开了几年车，20岁就自己买一辆‘的士’。当时在新加坡，司机的收入较高，经过几年的奋斗，经营出租车，还建立了小家庭，家境逐渐好起来了。‘七·七’抗战爆发，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将出租车让人开，自己出来义务作一些救亡工作，参加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宣传筹赈救国。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南侨机工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参战。”

当我问起他是如何把全家老小送回国而独自轻装上阵时，许志光笑了笑说：“当时我已26岁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一家五口，我已不能像其他快乐的单身汉那样屁股一拍就走，我必须将家属妥善安置才行，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回莆田乡下老家。母亲深明大义，妻子贤惠通达事理，她们都非常支持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我又动员妻弟陈光明（潮州籍），一起报名参加机工队，他也非常乐意，并愿意将其母（即志光之岳母）送回国内老家。这样一来，我与内弟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了。”

“当得知我打算将全家老小送回国而铁心参加机工团，陈嘉庚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叫南侨总会秘书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亲笔签了陈嘉庚三字……”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后来陈嘉庚先生这封信呢？”

“还在！还在！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许志光说完转身进入内屋，取出一张虽已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完好的信件。信的全文如下：

**迳启者：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令钦佩！现伊母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所有沿途经过祖国关隘码头，一切行李检查手续务希军政长官予以特别优待，实为至盼。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三日**

当我取出照相机翻拍这张不寻常的信件之后，许志光继续说：

“我们是第二批回国机工队伍，总数200多人，总领队是钟运熙，我被任命为副总领队，兼任新加坡中队负责人。回国时，新加坡《星洲日报》派了随团记者李志达和我们一起出发。启程那一天（1939年3月13日），码头上到处彩旗如林，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一片热烈景象。新加坡‘和丰’轮船公司派出海轮送我们踏上征途，同船回国的母亲、妻子及两个孩子，亦享受特别铺位免费同行。她们后来转车回到福建莆田定居，我则随机工队伍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一大队的补充队当班长，从事芒市到保山之间的军运任务。随后，又调到第9大队27中队当中队长，驻扎在保山。滇缅公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初是险路和疟疾。当时该路刚抢修完工，遇到雨季，使我们尝到‘山大王’的滋味；有时呆在山上两三天，没有吃的，只好上山采野果子充饥；又时常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奎宁丸），才转鋢为安。”

许志光回忆说：“我们南侨机工团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回到祖国的，大家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离开了海外温暖的家庭，许多人还抛弃了原来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前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后，按照当时的货币核算收入，月薪远远不及在南洋时的半数，而且衣、食、住、行、工具及药品都十分缺乏，工作条件极差。但是，无论在运输线上还是在机修厂里的华侨机工，大家都毫无怨言，自觉地勤奋工作。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滇缅公路上每日平均运入三百吨军火，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可是，华侨机工的爱国热情，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冷遇，分配到的尽是一些老掉牙的杂牌车，行车路线也尽量环境恶劣的危险地段。加上当时滇缅、滇桂黔一带气候多变，疾病流行，使回国华侨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人因翻车事故及疾病献出年轻的生命。鉴于这些情况，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9年8月派发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慰问，并将了解到的有关实际情况向总会报告，总会立即着手改善回国服务人员待遇。1940年初，在海外侨胞的资助下，南侨筹赈总会首批将一百辆美制‘GMC’牌新货车运到仰光，我们组织机工把车接回来，并按照总会的意图，组成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一大队，事隔不久，南侨总会又将一百辆美国新制的‘大道奇’货车经仰光运来，于是又成立了华侨先锋队第二大队。两个运输队的人员全部都是华侨。后来，由于时局发生变化，总会原订分批给运输队送车的计划被迫中断。1940年底，华侨先锋运输一大队和二大队在缅境腊戊、八莫一带执行任务以后合并，原一大队队长刘贝锦任大队长，连文瀛任大队副，我担任了第三中队长，继续在中缅边境的遮放至保山一带担任紧张的运输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初，日寇由缅甸进逼云南边境。许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时期，心情十分觉重：

“当时我们中队奉命由遮放撤回昆明，一路上塞车难行，我于5月4日天亮时开过惠通桥，当时刚到保山时，那‘5·4保山惨案’被炸尸体惨不忍睹，事后得知，仅我们中队就有十几辆卡车在龙陵一带遇敌后下落不明，有的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可能牺牲了。”

“滇缅公路断绝后，在混乱的时局中，南侨机工团的成员四处流散，许多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白天外出自行谋生，晚上就住在防空洞中。本人也历经一段失业流浪的生涯。尽管如此，机工队的大多数成员，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向困难作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当我问及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的境遇如何时，许老先生说：“抗战胜利后，已改名为中缅运输局的原西南运输处移交给云南运输公司。南侨机工纷纷要求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别有用心的阻挠。为此，陈嘉庚先生于1946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要求政府做好机工复员工作。随后，各地机工来到昆明登记，截至当年年底，只剩一千多名机工前往登记，陆续返回南洋者仅千余人。大家遥想当年共有三千多人回国参加抗战，如今已有三分之一牺牲了，我们虽然为此伤心落泪，但也因为替祖国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新中国成立后，尚有数百名机工留在云贵高原一带。而如今，贵阳只剩下三人，且都年逾古稀，已垂老矣。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战斗经历，常常又觉得回到青春热血沸腾的时代。”

贵州，有一位为了“驱除日寇，还我河山”而改名“李山河”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他是第九批回国服务的，曾在滇缅公路立下汗马功劳，不料却遭受冤狱磨难。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机工的辛苦回忆：

我原名李成业，祖籍海南岛。1927年共产党在家乡闹革命，我也参加了儿童团。不久，地主还乡团回来了，革命受挫折。1928年我13岁时随亲友到新加坡。而父亲与二叔留在家乡，不幸于1932年被反动派枪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侨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在新加坡加入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社长为吴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每逢星期天或假日，总是参加南侨总会举办的卖花募捐筹赈活动。当时，南侨总会主在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援助祖国抗日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南侨总会宣传委员侯西反的宣传演说特别吸引人，鼓动性极强，每次演讲，我总是到会聆听。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起号召，南洋华侨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为了表达“消灭日寇，还我山河”的壮志，我改名“李山河”，满腔热情地去报名。可是，南侨机工团要求有开车技术的，我不懂开车，结果报名未被批准。但我没有泄气，我下决心学开车，终于通过了考试，加入第九批机工队伍回国。

8月14日，我们乘轮船经西贡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考试合格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不久即参加南宁战役的军火运输。当年11月底，南宁第一次失守，我们奉命撤回昆明。此时，陈嘉庚先生派南侨总会刘牡丹前来慰问南侨机工，我们才得知南侨总会送来给南侨机工大批的物品（衣服、药品等），都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得知之时，我们非常气愤；但为了抗日救国，也只好忍受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为抗日军事运输和贡献，无暇去计较。

后来，第九大队调往滇缅公路抢运，大部队设在芒市。我们行驶在芒市至下关一线，有时直接到昆明。经常冒着敌机的空袭，闯过多少次滇缅路上的风险。我亲眼看见不少机工战友翻车牺牲。但大家抱着抗日救国不怕牺牲的决心，埋葬战友的尸体后，又悲愤地投入新的战斗。

谈起本人在滇缅公路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冤狱：

1941年4月，我在保山与当地一个女青年小王（保山中学生）订了婚。有一天，未婚妻的哥哥王富民（保山师范学院员工）搭我的军车去下关参观大理花会，车子刚开到保山大板桥就被稽查站扣留了，说我稍客带货违反军令，属于贪污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关了起来。我怎样解释也没用，就被关押在保山二个月，然后转送昆明看守所。西南运输处军法处不进行调查核实，判我两年六个月徒刑，送入昆明线局街第一监狱，这是含冤坐牢的。我被带上脚铐，受尽折磨。

当我被送进监狱时，还看到几十位南侨机工也被捕入狱，其中有九大队的陈家标，十二大队的吴国栋、符和明、林宏英、戴新菊等，有的现在已记不清名字了，他们也被带上脚铐。当时国民党的监狱里，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天王”。他们是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犯人，这些恶棍凶得很。我们这些海外归来抗日的侨工，含冤入狱，竟要受这些恶棍的欺凌。他们要索取什么东西都得给，不然就得挨揍，有理也说不清。这些人在狱中横行霸道，反动当局从不过问。一间牢房只有十平方米左右，要关十多个人，只能挤在地板上睡，又脏又臭，还得受“四大金刚”的敲诈。我们侨工原来每月只有30元国币补贴，生活费用大都靠侨汇。被关入狱后没钱了，就更受欺负。每人一天只吃两餐，每顿只有二小碗带沙的糙米饭，没有菜。当初大家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而回国，如今却落个悲惨的下场。许多南侨机工都想不通，就在狱中开展斗争。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侨工向看守要求工作，于是弄来一些布鞋来纳，每双一角钱，每天可纳两双，便可以买一些菜来配了。令人痛心的是，日机常来空袭，警报一响，看守人员就逃跑了，竟不顾我们这些为抗日救国而来的南侨机工的死活！牢里的铁窗生活是暗无天日的，生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只得听天由命，能活下来是侥幸的。与我同牢的九大队陈家标，就在1942年患霍乱症死于狱中，年仅20多岁。这一次，狱中“犯人”因得不到医治，5天内就死了100多人。死了人还要叫我们抬出去埋葬。抬尸者也染上疫症，死于非命的。我亲眼看见外面有三间专门放置死人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尸体，有的机工今天还被派去抬死人，明天则由别人抬出去埋葬掉。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曾写道，华侨机工无罪被关在暗房，写的就是我们的情况。陈嘉庚先生还派侯西反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们。侯西反在新加坡时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他是一个爱国侨领，热心抗日，宣传鼓动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抵制日货。他的爱国行动惊动了英国殖民政府，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在重庆中侨委继续做抗战护侨工作。当他看到狱中看望我们时，安慰我们说：“您们是爱国华侨机工，是含冤坐牢的，我要去重庆向政府当局交涉！”后来他为机工事到重庆交涉之后，不幸在返昆明时飞机失事殉难。我们每个南侨机工都放声痛哭，并为侯西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我于1934年出狱，此时，惠通桥已炸断，滇缅公路断绝了，许多机工都失了业，我只好到昆明同仁街友联荣店当工友。此时曾亲眼看过有的机工战友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街头，而我本人也自身难保。1945年2月，我转到美国陆军执行所当工友抗战胜利后，经熟人介绍，我到后勤总部汽车连当驾驶员，调往重庆，与我在一起的还有侨工刘瑞齐（永春籍，今在福建）、周学锦等人。1949年，我在四川参加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见图86）。新中国成立后，我转到贵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时光流逝，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当年参加南侨机工的经历，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是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回来的，尽管受到一些挫折，但仍不违初衷，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一个南侨机工幸存者，我有责任将这段亲身经历写下来。同时，我还有责任将所熟悉的已故南侨机工战友的无名英雄事迹记录下来：

南侨机工符平，有一次运军火回来，因病车停在龙陵站，结果死在停车站上，年仅27岁。

颜振生，也是南侨机工，病死在永平站，那时大家推运繁忙，他生病时我们都不知道，等到病死了，站上才通知我们去为他埋葬。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位侨工战友黎锡宽，他也是海南籍。他没有死在日寇的炮火下，倒是被国民党第五军开枪打死在云南马龙。当时，他开车跟在军马之后，慢慢地走了几公里路。军马不让路，黎锡宽性急，按了一声喇叭，军马惊跳一下，他及时刹车。头刚伸出驾驶室外一看，“砰”的一声枪声响了，正好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年仅26岁。他的坟墓还留在马龙。

南侨机工抗日有功，纪念碑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曲靖沾益汽车站，我拜访了当年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邝振声。当我说明来意之后，老人面对沙沙转动的录音机，略一沉思，便滔滔不绝地讲起40多年前的往事。夕阳从窗台上透射进来，在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涂上一层古铜色。

“我原名叫邝天祥，现名‘邝振声’则是1942年滇缅公路断绝后，因失业不得已而冒名顶替的。”

“我出生在泰国董里什田埠，祖籍广东，从小就亲眼看到华侨在国外受到各种歧视和压迫。11岁时，一次见到卖鱼的华侨商人因事与当地人吵架，泰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华侨拖出去，如拖死狗一样。那件事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到祖国不强盛，海外华侨才受到如此歧视。祖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当时泰国华侨社会反应强烈，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但由于当地政府禁止华侨进行抗日的政治活动，因此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是秘密进行的，自费悄悄回国，如林犹兴、岑金洪等人，就是历经曲折自费到昆明的。而我们一行七人，则在筹赈会许先生的资助下回国，1939年8月8日启程。临行前，董里华侨团体给我们送了一面三角锦旗，然后由许先生领队，从什田乘汽车到高头廊，再转乘国际快车前往槟城。在槟城，我们受到在此留学的泰国董里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该校师生带领包车游览了槟城的一些名胜古迹，还与留槟泰华师生一起摄影留念。”

说到这里，邝振声转身到房里取出一张珍藏近半世纪的发黄照片（见图37），前排七个机工为：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即本人邝天祥（后改名为邝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一蔡惠文。

接着，老人继续回忆：

“8月12日，我们到达新加坡集中，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受到隆重的欢迎。陈嘉庚先生接见了机工团，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8月14日，满载华侨机工的‘丰庆轮’起航，三天后抵安南西贡，受到当地侨团的热烈欢迎，送来了上火车吃的面包和罐头食品。8月23日，终于到达昆明，驻进潘家湾训练所。经过短期军训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18中队，驻扎在贵州关岭场。”

谈及回国后的首次行车经历，老人对所走过的路线与地名的记忆，竟是如此清楚：

“那次我们由贵州关岭到昆明接柴油车之后，转运军用物资到重庆。因为头一次远程行车，对国内公路不熟悉和不习惯，从昆明到重庆竟走了一个多月。返回时，队部已经搬到广西柳州了，驻在马鞍山。由于南宁告急，上级命令我们突击抢运浮石兵工厂机器，转移到柳州。当任务完成之后，南宁已失陷，我们车队就搬回六寨。此时，大塘到南棕的公路已切断，改由车河新开一条公路，由车河到东兰，经田东、福昌、天保，靖西到岳圩。该线连接安南国境，从境外的同登、重庆府一带，抢运外援军用物资入广西，我们队部奉命调驻东兰，穿梭行驶在中越运输线上，经常受到敌机的猖狂空袭。南宁沦陷后，敌机从南宁起飞，每天都来轮番轰炸，企图扼断该运输线。为了避开敌机空袭，车队被迫改为夜间行驶，白天将车停在树林底下隐蔽起来，太阳落山后才出动。有时候任务紧张，只得冒着敌机轰炸，白天也出车。好几次，我们的车队在行驶中被日机追上了，便迅速将车开进山洞躲起来，敌机追至洞口，无可奈何，只扔几个炸弹又飞走了。幸亏广西的天然山洞很多，有利于躲避敌机的空袭，所以我们的队部住地都选择靠在山洞边。”

“从田东到福昌过河需搭渡船，每当等候过渡军车摆成长龙之时，敌机总要趁机来轰炸。没有轮到过渡的车上人员，只好先离车寻找躲藏的地方。接下来，队部又搬到安南边界的地方，抢运境外转运来的军用物资。当时不知是谁的主意，在安南境内支着一匹很大的白布，上面用英文字样写着‘安南地界’，日机空袭时见到安南地界就不炸了。有一次我曾见到敌机来了，只好转开回安南境内，竟保平安无事。1939年底，当日军准备在安南登陆前夕，我们驻岳圩的队部已经撤退了，当我由越境重庆府装运汽油回交界处时，该路已被民工挖了半边，一段一段地破坏，我们艰难地驾车撤退，稍一不慎，则可能翻车爆炸。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一路上小心翼翼，开过遭破坏的公路，退回六寨待命。”

“1941年，在贵州甘巴哨新成立第10大队，其中156中队是清一色的华侨机工，中队长是林君凯，中队副是白清泉。当时长沙再度告急，我们奉命将湖南晨溪兵工厂的全部机器搬迁至四川东溪，前后将近运了一年，才全部运完。第二年，整个大队调往昆明，住黄土高坡保养场。主要任务是继续到畹町、遮放等地抢运，跑滇缅公路运输。由于西南运输处驻缅甸办事处中印大队缺驾驶人员，印籍王亚能任大队长，于是我们由林经光带队加入中印大队，开赴腊戍。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日寇入缅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我们奉命撤退。在撤退时，有许多华侨难民要求乘我的车撤退，于是我载着汽油又搭了20多人连夜开车，天亮时开到畹町。当时退回昆明的车队摆成长龙。过惠通桥到达老鲁田吃饭时，抬头望见一群日机飞往保山方向，当天下午我们到保山时，只见保山已被炸成废墟，有的大腿被炸飞到电线杆上挂着，真是惨不忍睹。这便是举世震惊的保山‘五·四惨案’，时在1942年5月4日。”

“我将车子开到保山站报到，要求卸货，而车站一片混乱，根本无法卸，只好开到下关才卸了。随后，我们奉派到凤仪乡下疏散，待命一个多月。接着，我们接到通知，中印大队的车全部开往昆明西站停车场。交车后，当局便撒手不管了，因为惠通桥已炸断，滇缅公路切断了，许多华侨机工竟失了业。”忆及此事，邝老先生至今心情仍很激愤。”

“刚开始，我们还有点钱，而钱用完了，便卖衣物，衣物卖完了，连每天吃一顿饭都成问题了。夜间只好蜷缩在昆明小西门城脚的防空洞里。每洞有一米宽，可勉强容纳二人，盖的是稻草和麻袋。白天到金碧路和祥云街，见到熟人讨点钱，但见到的都是失业者。有的机工就因连讨几角钱吃饭也讨不着而饿死。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同我第九批回国的雪兰莪机工邝松登，与我同住一个防空洞里，睡到半夜又冷又饿，就双脚一蹬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南侨机工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度日如年，究竟死了多少人，都没有准确的统计。那种艰难日子是怎样度过来的，至今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还能活下来。对于多数南侨机工来说，这也是最难捱的时光。情急之中，我跑到黄土坡请求大队长王健存、胡凯军、白清泉相助，在白泉清的帮助下，暂时收留下来。过了个把月，中队长胡凯军对我说，查到队上空了一个名额，此人开小差离开了，名叫‘邝振声’，于是，我就顶了这个人的名，把原名邝天祥改为‘邝振声’了。”谈到此，邝老先生惨然一笑：“我这个冒名顶替的假名，竟一直保留到现在，可是，查南侨机工的档案，只有记载‘邝天祥’才是真正的我啊！这是不得已的事，当日若不去顶名补缺活下来，也许早已饿死在防空洞了！”

“在此期间，我跟华侨机工朱松胜（后留居在广西）当助手，开的是‘木炭车’（当时缺乏汽油，只好靠烧木炭发动），帮他摇木炭炉，路线主要由小西门至黑林铺。过后，又跟另一个机工黄和平（见图14，今留居在福建漳州）开客车，亦是木炭车，跑昆明至下关一线。”

“1944年底，有关当局调集部分失业机工到晋宁盘龙山集训。集训所所长为葛丰，副所长扬友柏，大队长是马风岗。在盘龙山主要是修路，也听听技术课。几个月之后，又回黄土坡156中队，然后分到昆明巫家坝滇缅运输局空运站驳运飞机运来的物资。有一次，敌机轰炸巫家坝机场，新加坡一个南侨机工遇难。我们在这里坚持到日本投降，飞机场工作结束之后，才调到曲靖开大道奇车，从四川泸州运盐巴到曲靖。不久，我又调去跑滇缅路。”

“1946年南侨机工复员，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发给每位机工200美元（折67万国币），我捐出7万元国币修理福建会馆。当时复员来去自由，我便继续留在昆明，驾车行驶下关、保山一线。后来，在华侨机工黄辉庭的帮助下，自制卷烟售卖，也做一些小本生意，一直度到昆明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侨务处特别关怀华侨机工的失业人员，尽快地向各单位联系，安排工作。”录音机磁盘在继续转动，老人的声音里充满着激奋和喜悦。

1950年10月，侨务处通知失业机工人员到黄公西街川藏公路报考司机，邝振声被正式分配到黑林铺小团山工作，整修旧万国车，修好之后，就装运筑路材料到下关等地。在以后的工程建设中，他积极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1952年光荣地出席云南省第一届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1955年，他调到沾益运输总站，工作十分出色，连续得过安全先进工作者奖状。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老人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政治迫害，但他坚信祖国最终会了解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以平反昭雪。现在，我虽已年过古稀，退休在家，但我心情舒畅，继续贡献余热。单位领导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最近还分配给我一套新宿舍，宽敞明亮，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满意。看到我们为之奋斗过的祖国一天天强大，我们这些老人可说青春无悔了。”

现居住在云南玉溪汽车站的退休驾驶员郑文通（见图87），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叫“黄亚涛”呢——说来话长，那还得从50年前讲起。请听他的讲话录音吧：

我原名郑文通，祖籍福建莆田，“黄亚涛”这个名字，是为了避开家人的阻挠，完全是为着抗日救国，参加新加坡第五批机工团回国而改名的。

1939年，正当祖国抗战进入最艰难岁月，急需大量熟练司机从事军火运输。南洋华侨青年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新加坡起程分批回国抗战。在广大侨胞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我也报名应征。大哥知道后，向筹赈会捐献了500元，却不让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大哥要我为郑家后代着想，认定此去必九死一生，故千方百计阻止。我与大哥争辩，他却说：“大道理谁不懂，为了抗日救国，每次募捐，我们从不后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华侨主要是有钱出钱嘛。”说完后硬是要把我留下，让我去学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可是，我的决心已定，不到黄河心不休，一气之下，和我的老板商议，将自己的姓名郑文通改为“黄亚涛”，祖籍福建改为广东，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第五批回国机工团。当我大哥见我剃了光头，换上军装，要再阻拦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变态度支持我回国。

1939年5月22日，我们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后，我被分配到芒市接车。当时滇缅公路刚开通，滇西芒市一带路段最差，坡陡路险，更糟的是汽车运输需经原始森林的“烟瘴地带”，毒蚊成群，恶性疟疾不断奔去华侨机工的宝贵生命。当地流传的民谣：“要上潞江坝，先把老婆嫁”，就是滇缅公路险恶的真实写照。有一次，我从保山到芒市，顺便带一位熟人，当晚因风雨大作无法行车，在龙陵住下，结果被检查组查出，随后被押往昆明五华山拘留所，被法院判了两年半徒刑。其原因是军车不准带人，带人则违反了军令，也不管是熟人。我怀着抗日救国的赤子之心回来，却被卷进监狱受折磨。幸亏同乡华侨的鼎力相救，我只蹲了半年牢。所剩下二年徒刑以每天一元折算，付出很高的代价，才把我赎了出来。

吃了这次大亏，出监之后，我吸取了教训，又到下关华侨十四大队报到，把憋了半年的劲头全都投入抗战军事运输中去。为了多拉快跑，我们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虽然吃不好睡不好，但为了抗战胜利，谁也没有怨言。

由于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火，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实力，被日寇视为眼中钉。于是日军出动飞机重点轰炸惠通桥和功果桥，企图炸断该路的咽喉。有一次，我经惠通桥回下关，行驶途中遭敌机轰炸，我前面那辆车上的机工陈天生不幸牺牲，而我右脚也受了伤，鲜血直流。但我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先把牺牲的战友拉在车厢后，继续将汽车发动起来，开到旁边隐蔽处，并通知后面随车人员继续将该车开回，然后才开着自己的车子前进。到了“老鲁田”我才抽空包扎伤口。车到“七0七”时，由于我的右腿流血过多肿胀发麻，后面赶来的分队长发现后，当即将我拉上别的车送往昆明治疗。

我在昆明金碧路陆军医院治疗时，医生知道我是华侨，就说治疗要花很多钱，否则要把整条腿给锯掉，其意要我多花钱。恰好此时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侯西反先生来医院探望侨工伤病员。我把情况反映给侯先生，经他出面疏通，医院才对我进行认真诊治。经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出了院，但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还有些跛脚。

1942年5月，惠通桥炸断之后，我们许多机工失了业，我回到昆明南强街华侨互助会，因生活无着，到处漂流打工。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我随500多名机工及其家属复员返回新加坡。由于生活环境改变了，处境不好，因此五十年代我再次回国定居云南，在玉溪汽车站工作直至八十年代退休。

在风景如画的云南大理，我登门拜访了一位被机工战友们称为“无名”英雄的南侨老机工——李伟庆。他为什么被称作“无名”的呢？原来，“李伟庆”的名字并不是直接记录在南侨总会统一组织回国的一至九批南侨机工名册上，而是收录在民国历史档案馆的“荷属华侨救护队”档案中。年逾八十的李伟庆老人，根本不在乎他的名字收录在“荷属华侨救护队”（1938年）档案与南侨机工名册（1939年）档案有何区别，反正都是回国参战，并肩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他说：“赤子报国，回国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机工老人的回忆：

我叫李伟庆，原籍广东梅县，因祖父参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遭到清政府的迫害。父亲只好逃到印尼谋生。我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明古粦。

1938年，我告别了老母亲，参加“荷属华侨救护队”回国服务。这个组织是由巴达维亚养生院院长、著名医学博士柯全寿等侨领发动的，带着印尼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救济品和救护车，来到祖国的抗战疆场。我们一行40多人，是乘轮船经马尼拉、香港回国的，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我们这批救护队员被分散到各个战区去救护、运送伤病员。因此两湖、两广、川陕都有我们救护队的足迹。我和林坤良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当时，必须绕道安南的海防，经广西才能转到贵阳。为了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将救护车进行了伪装，昼伏夜行。用了五天时间才到达图云关。图云关设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是新加坡著名医学博士林可胜（侨领林文庆之子）。

1938年武汉、广州失陷之前，我带领七辆车组成一个救护车队，往返于贵阳和海防之间，运送各种物资。1939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总队”把驻在湖南的救护车队部分车辆调回图云关，准备派往刚开辟的滇缅公路去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由于该车队的驾驶员都不会说普通话（通常只讲英语、印尼语等），于是我受命带领这支车队前往云南畹町。

滇缅公路是应抗战急需而建成的泥巴路，穿越滇西海拔3～4千米的高山峻岭。其惊险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由于路基不固，时常塌方，尤其遇上雨季，泥泞路滑，车子陷下去便难以自拔。为此，在龙陵地段原始森林处，两旁都备放一些大树杆。如果车辆陷下去，就将这些木头作为枕木垫上去。如果再陷下去，又铺上枕木。我们作为滇缅公路首批运载军事物资的车队，被称为“开路先锋”，历经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意料不到的险境。

1939年雨季的一天，我过了惠通桥，汽车在一处急弯险路上翻车，左大腿被汽车大梁下一颗5寸长螺丝穿入，至今仍留下一处伤疤，是我一生中经历最危险的一次，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那一次，我们的车队刚从畹町运载一批药品到贵阳，随即奉命两次抢运一批重要物品。于是不顾疲劳连续出车，出车时特从贵阳运载桐油出口。我们红十字车队一行五部车子，每辆车载18桶桐油。我当领队，带车殿后（四辆在前）。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惠通桥只能在下午三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前才准通行。我们车队来到惠通桥边，便排队等到下午3时才通过。当时桥面只能容单部车辆过桥。我们约定当夜在腊勐车站集合，于是前面4辆先过桥了，我在后面办理公文手续（检查通行证）。当我开过惠通桥之后，刚刚爬上一道陡坡，由于路基不固，车子突然倾覆，翻了几滚，在距离江边几米处被一块石头挡住了，车门自动打开了，我被甩出车外，压在大梁底下，被汽车底盘一颗大螺丝钉穿进左大腿，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我才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被压在车底下，一棵特大螺钉穿进我的大腿，螺钉又顶在底下一块石头上，动弹不得，我才明白已经翻车了。此时天快黑了，过路的车辆也不易发现我翻车在深沟底，成群的毒蚊嗡嗡嗡轮翻来乱叮乱咬，我也无可奈何，只盼望着同事们开车至腊勐之后回头来找我，也得几个小时，我还能挺得住吗？我隐隐预感到这回难免一死。但抗战未胜利，我不能死！我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坚持住，同志们一定会来救我。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帮助我也，下起了一场及时雨。“下关风，龙陵雨”，这里的气象变化莫测，瓢泼大雨说来就来，多亏这场大雨的冲刷，使得原来顶住我大腿下面的那块石头渐渐松动了。我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用手一直扒开周围泥土，终于使这块石头掉下去。我的左腿才从螺钉穿压之下拔了出来。

这时，大约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的助手彭莲贵（下关复兴村民，当时在红十字会车队当勤杂人员，现住大理州汽车总站）与其他同事开车赶来救援，我远远看到他们提着汽灯在叫喊，我担心翻车的汽车及车上的桐油爆炸，马上叫他们不要提汽灯下来。于是他们只好摸黑下来，把我抬上车，急忙开往腊勐一个卫生所。医生察看之后说伤势严重，于是立即转送到龙陵县医院。当我在滇缅公路惠通桥翻车受伤的消息传出后，附近的老百姓都来探望，有个小脚的老大婶提着一蓝鸡蛋送来，口中不住地祝福：“先生您命长，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第三天，我因伤势太重，只好转到昆明白龙潭医院诊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痊愈了，只是在左腿上留下一处螺丝钉穿过的大伤疤。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云南成家立业。解放后，我在大理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1945—1985）之际，我珍藏的一张“荷属华侨救护队”的照片（见图88），被送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展出。1986年，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亲自到大理与我们这些南洋华侨机工座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还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随后，国家制定了政策，照顾我们这些尚健在的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目前，我正在继续写一些回忆录，贡献余热。

1988年1月8日下午，笔者在滇缅公路大理段的沮华洞汽车保修厂下车，按照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提供的档案名单和有关线索，径直来到厂区宿舍采访了退休在家的75岁南侨机工林树容。

林树容是海南岛文昌人。当他尚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往泰国谋生去了，一去未回，后来病逝在南洋。6岁那年，母亲又不幸病亡，他便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幸亏堂兄从海外回乡探亲，就将他带到新加坡。先在华侨小学读书，12岁时就入修车店当学徒，15岁时学会了开汽车。起初为一个英国人开车，月薪50叻币，三年之后，自己筹集了一笔资金，买了一辆汽车载客，收入还不错。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学生们上街卖花义捐，筹赈救国，他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每次用车子接送学生上街义卖，都不收钱，尽自己的一份爱国情义。

1939年初，报纸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林树容满腔的热血沸腾了。他得知祖国滇缅公路军运输线正急需司机，便前往筹赈会报名，经体检及考核之后，被批准参加机工团。他将自己的汽车送给朋友，并特别交代那位朋友：送学生上街卖花不能收费。然后加入第五批回国队伍，于1939年5月启程，抵达昆明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几乎每一个南侨机工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惊险而悲壮的经历。林树容当时主要行驶在保山至下关地段，这是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之一，沿途一边是高山峻岭，另一侧则为峡谷深渊，他曾经历无数的惊险，多次死里逃生，身负重伤，至今仍留下许多不顽疾。可是林树容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回国参战，出生入死，能活着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易了；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摧残，现在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国家还制定政策照顾南侨机工安度晚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比起那些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算是值得庆幸的。

我特地问他，在滇缅公路印象最深刻、终身难忘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是战友！是一位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吴世光！”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林树容夤夜护送机工战友遗体归队的事迹，虽然时隔近半个纪世，但他接受笔者的录音采访时，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按下录音键，记录了林树容的口述：

那是1940年夏天一个炎热的黄昏，我刚完成军运任务由保山开车回队部下关，途经永平加油站时，站长对我说：“林树容，你把这位翻车牺牲的华侨机工运回队部。”我连忙问道：

“是谁？”

“是吴世光！”

一打听，原来是海南籍南侨机工吴世光，今天下午在永平一公里处翻车滚入悬崖深谷，当场不幸身亡。附近的修路工沿着峭壁下去抢救，竟无法将遗体抬上来，只好想出一个办法，用长绳子捆住尸体拉了上来，然后将尸体停放在加油站旁，等待着过路的机工车队运回队部安葬。

吴世光，是我的机工战友，与我一同编入第五批回国的，在老家海南岛还有妻子儿女。他青年时旅居新加坡，当了汽车司机，激于爱国义愤，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

吴世光殉职时大约30来岁，而我仅21岁。我在南洋，从来未接触过死人，而这天傍晚时分去抬尸体，难免增添几分胆怯。但想起战友，想起世光与我的友情，事到如今，容不得我犹豫与害怕了，硬着头皮也得上了。说来奇怪，我突然鼓起了勇气，仿佛已经向谁借了胆子一样，虔诚地把吴世光的遗体用毛毯包裹着，请人帮抬上了车，安顿好之后，我开始开车，此时已天黑了。永平距下关不到100公里，如果一路顺利，大约几个小时就可归队。

可是，事不凑巧，当我开出几公里之后，爬上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峭壁陡坡路时，车子却抛锚了。原来刚才忙于折腾，竟忘了加水，由于天气炎热，水箱又没水了，烫得直冒烟，若不及时添水面继续开车，则有爆炸的危险。可是，在这段险要路上上哪儿去加水呢？一边峭崖绝壁，一边是百丈深渊，虽然漾濞江的江水滔滔奔流，然而无路下去取水。如果冒险去找水，万一碰上毒蛇猛兽，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怎么办呢？在这寂寞的夜晚，在漾濞江畔的滇缅公路上，周围的群山在银色的月光下仿佛在为海外赤子孤魂默哀，偶尔还传来猫头鹰凄凉的叫声，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守着一位为国牺牲的战友遗体，心里怦怦直跳，悲恐交集。我素来小胆，在南洋时常听老人家讲鬼故事，脑海中残留一些恐怖的幻觉，什么“妖魔鬼怪”啦，“无常鬼”啦，“勾魂鬼”啦，“催命鬼”啦，还有什么“阴间十八地狱”啦，刹时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一浮现……要是在往常，还有机工战友们作伴，心中不会害怕，而今晚却独自与尸体同车，说实在话，心时确实害怕极了。我无可奈何地把车门关紧，坐在驾驶室里，望着窗外悲凉的月色，听着松涛江流的交响声，只好默默地向我身边的“上帝”——“吴仙人”祷告：“吴世光呀，我的好兄弟！我俩是同一批回国的，又分配同一中队，如今您不幸先归天了，小弟有责任把您护送归队安葬，以慰您的异乡孤魂，将来也好向家人交代。吴世光呀，您可要保佑我，让我驾车平安顺利地回队！”我恭恭敬敬地与死者对话，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以壮大自已的胆子。

过了一会儿，摸摸水箱还在冒热气，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让发动机水箱自然冷却，然后再开一程另找水源加水。此时，夜更深了，滇缅路上更加谧静了，我一边与战友尸体对话，以爱国的浩然正义将过去残存在脑海中的妖魔鬼怪、恐怖幻影驱散，一边焦急地等待水箱早点自然冷却。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原先发烫的水箱终于冷了下来，总算可以勉强地开了一程。可是开了不久，水箱又发热了，车子又开不动了，附近还是找不到水，只好再次停车等待冷却。

过了一段时间，又勉强开出一程，水箱又冒烟了，我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小便给水箱“加水”，然而，“杯水车薪”，仍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再停下来。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至临近下关的地方，在一处桥边好不容易痛快地加了水。当我赶回部队时，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钟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难以意料的，有时一件事情的偶然发生，虽是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当时仅21岁的我，由于受怪异故事的影响，一向是怕“鬼”的。然而，在抗战烽火中夤夜护送战友遗体一事，却根本改变了我的概念，只因心中有了爱国正气，有深厚的战友情谊，自然而然就压倒一切“鬼崇邪气”。我想，这也许是海外赤子为国捐躯的忠魂在感召吧！从此，本来胆小的我，竟然成为一个胆大出奇的人。归队时，由于天还未亮，我为了不惊“醒”这位长眠的机工战友，便将其遗体留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开始筹办明天早上治丧事宜。

第二天早上，我向14大队的大队长汇报了昨夜的经历，大队长说：“我们要为这位为国牺牲的华侨机工立碑，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随后，他又问：“小林，你一个人深夜运尸体，还怕不怕？”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山路上，本来是恐怖的，可是有战友的忠魂相伴，就由可怕变为不怕了！”

为了悼念这位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特举行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追悼大会。是日，连老天爷亦有情，下起一场细雨，苦雨凄惨，充满无限哀悼情绪。我们抬着吴世光遗体，把他安葬在下关附近的董家庄。在坟前，华侨机工献上了自己动手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记得当时，我们还特意为吴世光立了一块墓碑，这是一块60×40厘米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

**归国抗日南洋华侨机工吴世光之墓**

**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立**

**一九四0年   月   日。**

我立在墓碑前，默默地哀悼着，泪水像雨点滴在碑石上，吴世光为抗日救国在运输战线献身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1986年11月7日，陈共存先生率领新加坡赴滇缅公路察访问团来到保山，在访问原南侨机工的座谈会上，有一位从马来亚回来的南侨机工老人——孙其文，他以沉重的心情，讲述了当年隐瞒着父母与妻儿参加机工回国抗日的动人经历之后，还泣不成声的噙着老泪，痛述了他至今仍不被海外亲人所谅解的一段近事。老人说，不久前，他经辗转托人与马来西来的妻儿去了一封信，但遭到妻舅回信痛斥，说他无情无义，拒绝再与他通信和联系。在座的陈共存先生甚为关注此事，当即向他问清了其妻舅的通信地址，表示回去后要协助做其妻舅的工作，以求得谅解。

时隔一年，当我采访南侨机工史迹前往保山，拜访寓居仁寿门3幢203室的这位孙其文老人时，孙先生已75高龄，这时因患病正在家治疗。我登门探望，只见他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铄（见图92）。提起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千。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痛楚悲伤的叙述其经历，很快就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不平凡的岁月。

孙其文说：“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事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事件有关，那就是终身难忘的。”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了，但老人说到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往事，仍象述说昨天的事一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南洋后，激起了侨胞的无比愤怒。”

“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在马来亚的一家工厂开车，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积极参加筹赈会的抗日活动。我们常常带领着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揭露日寇屠杀祖国同胞的滔天罪行。在宣传活动中，我们高唱《张老三我问你》、《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唤起侨胞的抗日爱国热情。”

“到了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那时，广大的华侨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爱国热情极其高涨。当看到同伴们一批又一批参加机工团回国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知道自己若报名，家庭肯定会千方百计出来阻拦的。因为我的父母从永春来麻坡定居后，只生我一个独子，而且我又是已经娶了老婆，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必须承担照顾老人、养活老婆孩子的责任。我若一走了之，这个家庭怎么办呢？”

老人沉浸在回忆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之后，搓了搓双手，又继续谈到报名不但要过家庭关，而且首先是要过自己的思想关。“说实话，当时我在报名还是不报名的问题上，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首先，我想到自己已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一份满意的职业，回国后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庭由谁管呢？不过，再想一想，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要看实际行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以报效自己的祖国。”

“主意一定，我便瞒着父母，也瞒着妻子，独自一人离开麻坡，直接来到新加坡报名。”

“由于我是悄悄离开麻坡的，没有声张，不敢宣扬，也没有像其他人在当地登报，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全家没有一人知道。”老人讲到这里，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像在对我说，又像在问自己：“你看这是否太过份了吧？是的，我想这是太过份了。”

显然，老人在经半世纪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情是何其复杂，而心潮更是翻腾不已。他看到我深表同情的目光之后，又点点头说：“这就是妻舅至今还记恨的原因，难怪他说我无情无义，至今还不原谅。”但紧接着，老人又连忙摇了摇头，自我申辩地说：“不！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爱国无罪，我是为了爱国而回来的。如果当时让全家人知道，那我还能回得来吗？”

老人发自肺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当时海外一千多万侨胞赤诚爱国的心声，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据了解，去年（1986）新加坡访问团来到保山访问，孙其文请陈共存先生打听马来西来的家庭情况，现在得到了可靠的信息：孙其文回国后，其妻就气疯了，不久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后来他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儿子被舅舅家收养，起了舅舅家姓郑的名字。

老人继续回忆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经安南转火车到昆明的，然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13大队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我先后参加过三次接车，第一次接大道奇，第二次接GMC，另一次是接小GMC。第三批车接回后，我参加了‘华侨先锋运输在队’，被提拨为少尉分队长。先锋队的任务是从缅甸的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抗战军用物资回保山。自39年至42年5月，我们亲手运载了大量的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沦陷，孙其文无法南返团聚，加上惠通桥炸断后，他滞留保山，经机工战友的撮合，在保山又成了家，并生有一个女孩（名孙惠云，现在保山工商管理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孙其文到过西藏、四川等地从事运输工作，1962年回保山工作，直至不久前从芒宽糖厂退休。最近，又接到上级通知，为关心每位南侨机工安度晚年，国家特照顾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当我踏着月色告辞时，老人再次表示他的最后心愿：愿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留在南洋的儿子，并能够得到海外亲人们的谅解。我默默地为老人祝福，祝福他早日康复，祝福老人所热切盼望见儿子的心愿能够实现！

南侨机工陆续回国服务后，陈嘉庚先生于1939年8月派南侨总会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滇缅公路视察，调查战勤运输和机工生活情况。当时任《南洋商报》的记者张楚琨（现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随行报道：南侨机工都是这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的爱情故事是机工运输生活的外一章。他在《南洋商报》上如此报道过：“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还有一张棕色健康的脸……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

在我所采访的留在云南的南侨机工中，就有一段因答谢傣族姑娘帮助而结成的良缘。他就是祖籍惠安的马来亚华侨蔡文兴先生。

蔡文光又名蔡大头，出生于马来亚太平埠，自幼在华侨小学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唐山”有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到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由上街宣传、组织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卖花筹赈，到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3月，蔡文兴加入第三批机工团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集中在昆明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战事紧张，训练提前结束，蔡文兴与队友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第16中队当驾驶兵。当时，广西、贵阳一带军火奇缺，运输力量严重不足，第6大队即调往贵阳、广西一线抢运军火。此间生活相当艰苦，地形极其复杂，日夜兼程，还常常遭受敌机空袭。

1940年，第6大队调回云南，从事滇缅公路的抢运、蔡文兴被编入“华侨先锋大队”。该大队有200多辆车辆，全部是华侨捐赠的。全大队200多个成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全都由华侨组成，队部就设在芒市。

芒市是风景秀丽的边疆重镇，这里山明水秀人情好，兄弟民族的民风淳朴，尤其是傣族姑娘，美丽纯洁，热情大方。她们对于千里迢迢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怀着崇高的敬意，总愿意帮助“华侨先锋大队”的华侨机工做点什么，彼此关系比较融洽。有一次，蔡文兴开车驶过芒市附近的原始森林地带，被毒蚊咬伤，不幸得了恶性疟疾。由于运输任务紧张，加上年轻气盛，认为挺一下就可以挺过去。没料到，当汽车行驶到一座傣家村寨旁，他再也坚持不下去，“打摆子”恶性发作，浑身冷得发抖。就在此时，一群傣家姑娘经过此地，看到这种情况，马上用当地一种秘方施行抢救。其中，有位姑娘特地赶回家抱来一床花棉被盖在他身上，待到脱险之后，才让蔡文兴继续上路。对此蔡文兴非常感激。过后他带上一些礼物，特地登门致谢。蔡文兴这一行动，按汉族的习俗，是件正常的事。可是按当地傣族的风俗，送礼即聘礼之意，傣家便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蔡文兴却不知底细，大大方方地将点心吃完。此时，家长高兴地宣布女儿与他的婚事定了下来。蔡文兴非常诧异，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在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战友们的帮助下，蔡文兴了解到这位傣族姑娘确实是个善良可靠的人，便正式向华侨先锋大队部申请办理《结婚证书》（该证书保存至今）。大队部撮合这桩婚事，择个“吉日”（即抢运工作暂告一段落的休息日），在大队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全体机工战友欢聚一堂，痛饮欢庆一番。当年年底，蔡文光“升了一级”当了“爸爸”。

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为了赶在日寇入侵国门之前焚毁畹町、芒市一带的军火仓库，蔡文兴与几个机工战友奉派前往执行这一惊险、紧张的任务。当蔡文兴亲手沿途焚毁几座军火库之后，日兵已经尾随而至。他来不及进家门便驱车撤回，汽车被阻在龙陵808公里处时，惠通桥已炸断了。怎么办呢？他躲进深山避难。从此，蔡文兴就在龙陵、平达、象达、景坎一带流浪。几个月之后，有一名从日本留过学的土司代翻译了日本人的“安民告示”，告示说要让所有在外的人员回来“安居乐业”，蔡文兴才趁机潜入傣家。起初不敢露面，生活问题全靠妻子负责。后来，才陆续探头出来做点小买卖帮助养家糊口。

抗战胜利后，经过多方努力，蔡文兴于1946年办理了复员南返手续，当局给他发了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胜利奖金”。蔡文兴本来想返回马来亚，但妻子、孩子不愿意离开芒市傣家，于是全家留了下来。他将这笔“胜利奖金”在芒市开了一间“闽兴旅社”。

1956年公私合营时，老蔡离开了旅社，重操旧业，分配到昆明汽车总站任司机。不久，又被调回边疆芒市，直至1979年退休。现在蔡老先生正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

从一名热血青年至白发苍苍的老翁，蔡文兴将自己的大半生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我探问他对此有何想法时，蔡老先生说：

“回想四十多年前，年青力壮，血气方刚，目睹祖国处于危难之中，即满怀赤诚报国之心，毅然辞别亲人回国参加抗战，当年在滇缅公路运输线上和抗日前沿阵地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依然激荡着我的心怀。”

1988年元月2日下午，经德宏州侨联同志的引路，我来到芒市跃进巷8号，拜访了海南籍南侨机工谢川周。这位当年回国仅17岁的热血青年，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年龄最轻、个子最小的一个，近半世纪的沧桑岁月，已使他双鬃染霜，却仍透露出一股刚毅、豪爽的英气。当他得知我专程采访的来意后，情绪非常高涨，迅捷地取出珍藏在箱底的“侨务委员会奖状”。这张发黄的奖状，是抗战胜利时颁发的，上面写着：“华侨机工谢川周，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慕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这是对海外赤子谢川周的历史评价，亦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文物见证。

根据云南同志的介绍，我得知谢川周是与哥哥谢森周一起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战后哥哥复员回新加坡，而他却一直留在云南，于是，就请他从家世谈起。

老人仿佛又回到了抗日烽火的年代，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谢川周于1922年出生于海南岛万宁县，兄弟姐妹7人，哥哥谢森周比他大5岁。谢川周是14岁时到马来亚太平埠落脚在伯父家的，起先给人当杂工，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当学徒，学会了修车与驾驶技术。

“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太不平埠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浪潮。谢川周认为，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已虽然拿不出多少钱来，但年青力壮，可以为抗日出力奔波。于是他报名卖纸花，为抗日救国募捐，整天拿着花沿街叫卖。纸花本没有用处，但不少华侨同胞仍解囊争购，涓涓之水，汇成巨额筹赈义款，源源不断地汇往祖国。

有一天，一位卖花同胞跳上街道的高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号召华侨青年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听了演讲，谢川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迎上前去问道：“阿哥，你说参加机工团回去打日本鬼子，这要出多少钱？”那人回答：“只要你愿意回去，不用你自己出钱，费用由筹赈会负责！”于是，他便请那人介绍前往报名。一周之后，他就接到了回国服务的通知。这件事，谢川周是一直瞒着伯父的，怕老人知道后不让回国。离别的前夜，他辗转反侧，心想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伯父了，偷偷地流了泪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他独自悄悄地跑到太平埠筹赈会集合，登上开往新加坡的火车。只见车站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有年老的父母来送儿子，有新婚妻子来送丈夫，有的机工含泪吻别襁褓中的孩子……情景实在令人感动。突然，有个小妹妹递上一束小花对他说：“阿哥，你回国要多打几个日本鬼子！”川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要多打胜仗！”各埠机工汇集在新加坡之后，乘轮船经安南转火车抵达昆明。

初抵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时，谢川周迫不及待地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前线？”不料队长却笑了笑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上前线打仗，而是搞运输。”队长解释说：“军队打日本鬼子不能没有武器，我们运送武器弹药给他们，军队有了武器，就能更好地打日本鬼子！”性急的谢川周又问：“那到哪里去运输呢？快点让我们去吧！”队长说：“你先不要急嘛！大家还要经过训练才能去驾车呢。”

经过短期的训练，谢川周结业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在云南潞西县三棵树。从此，他便开始了滇缅公路紧张的军运生涯。那时，沿海各地已相继沦陷，滇缅公路成为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大批的外援物资由水运或空运至缅甸，再由该线运回国内。滇缅公路沿线分驻几个运输大队，分段接力转运。起初，他先到遮放，负责往返畹町、遮放、芒市间的抢运任务。后来，行程更远了，差不多滇缅线都跑遍了。

西南运输处每月发给南侨机工的津贴是法币36元，出车费每天八角。比起海外优厚的待遇，这点补贴是微不足道的。但机工们凭着回国报效祖国的热情，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家最大的心愿是：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谢川周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我最初在滇缅公路开的车，车上有一对特殊的标志：车灯两边各插一根小竹竿。”他最初开的是美国小道奇卡车，载重两吨半，那时刹车装置还是油刹，应急刹车时往往一下子刹不住，下雨行驶时就得更小心。由于他当时个子矮，看不见车窗外近旁的路，为此，爱动脑筋的谢川周想出这个办法，在车灯两边各插个小竹竿。很幸运，行车中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后来年龄大了，人长高了，这个土办法就不用了。

车队虽然有队部，但由于经常跑车在外，根本没有时间回去。一般是随车行至哪里就住在哪里，或者干脆在驾驶室里睡着。雨季，公路时常塌方，阻车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有时没带干粮，便饿是眼花身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实在忍不住，就跑到农民地里啃生包谷充饥。夜晚，则常常一个人蜷缩在黑洞洞的旷野里，四周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令人心惊肉跳。接受饿肚的教训，以后出车，他们干脆带上铁锅和粮食，一旦车子抛锚，就埋锅做饭，肚子不再受委屈了。

谢川周回忆说，自从1939年冬至1942年夏，他运载军火物资穿梭往返于滇缅公路的险路上，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时时刻刻都得格外小心驾驶。他的车子之所以能保持安全，不出事故，这不仅仅是因为驾驶技术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爱护汽车，精心保养。每次出车前，总要先仔细检查各个部位，消除隐患，带齐零部件及机修工具，稍有故障便及时维修，因此，任务完成得很好，即使在难以意料的艰苦条件下，车子也很少出故障，保证抗战物资按时、安全地运到前线。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小事，谢川周经常遇到路面冲坏或陷进泥浆，车子像老牛拖犁走不动，有时要等救济车来拖，影响抢运任务。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车厢里装上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冲坏或稀陷时，就把木板垫在上面，让车子顺利地从木板上开过去。这个办法还真的解决不少问题。以后，这个办法还推广到各个车队。有时遇上塌方，大家把自带的木板一起铺垫上去，还可以解决大问题。

当时出车一般没有太严格的时间要求，多数情况靠司机们的思想觉悟，若想在途中休息或在集镇上玩玩，不会有人知道，但他们从不这样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热情非常高，他们深知抗战时期“一滴汽油一滴血”，于是提出响亮的口号——“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有一次，谢川周车到下关染上了疟疾，只得住进当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一星期，可第二天他刚感觉好了一些，就悄悄跑出医院，医生追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顿，非让他回病房不可。但他软磨硬泡，硬是不回去，最后跳上车子开走了。

在滇缅公路国内路段跑了一年多，谢川周被调往仰光，每天负责将装卸军用物资的工人运到码头干活，并参加抢运军火，直至1942年初，日军占领仰光前夕，才撤回到八莫，继续将堆积在八莫的物资抢运到畹町、芒市，并运送远征军入缅作战。局势越来越紧张，由于各种原因，远征军入缅失利，节节败退，日军则长驱直入。1942年4月底的一天，拉着一车军用物资的谢川周从缅甸八莫出发，刚翻过一个山坡，车子就被堵塞了，前面的难民哭天喊地。原来勐汝已被日寇占领了！勐汝地处滇缅公路缅境一侧，是通往八莫和曼德勒的贫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退路已断，开车回芒市已不可能了，但总不能将这车物资留给日本鬼子。于是谢川周把汽车倒到崖子边，将汽车推下山谷，机工战友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毁车而逃。此时，身在异国，举目无亲，只好跟着大批难民向东北方向的山坡爬去。崎岖的山道，挤满看不见头尾的难民，惊慌喊叫着，向山路上涌去。

步行逃难回国，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历程。当他18天后摇摇晃晃回到腾冲时，体力几近耗绝，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身上肮脏不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非亲身感受者是难以体会的，他回忆说：

“18天里，我有整整15一没粮食吃，只靠野果及凉水来维持生命。刚开始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一些罐头、面包、干粮，3天后就全部吃完了。偶尔经过一个山寨进去要点吃的，但村民早已逃光了，而且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难民去寻找过食物，哪里还有吃的！有一天经过一间磨房，碾槽里早被饥肠辘辘的难民扫清了。我仔细一看，哟！槽缝里还剩一点点碎米渣渣，便小心翼翼地收拔起来，放在空罐头盒里煮了吃。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吃到这一点点‘粮食’，真算是幸运极了。”

“为了抗日，这个强烈的信念使我没有倒下，忍着饥饿，昼夜兼行。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路旁歇一会儿，喝点冷水后继续走。一路上，亲自目睹多少惨绝人寰的景象：逃难的人们开始都带着不少东西，挑的、背的、抱的、挎的，什么都有，连日艰苦跋涉及粮食罄尽，再也无力携带沉重的东西了。为了逃生，只得丢弃。我本人也是如此，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的。一路上，到处都可见到扔掉的各种物品，草丛中、山沟里、遍地狼藉。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由亲人拖着拉着走，再不行，就只有被弃置道旁，听天由命了。最惨的是那些拖着婴儿的母亲。我并不是不愿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可是，力不从心，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记得到后来，许多父母不得不忍心将自己的孩子丢下了，路边树丛里，时常传出婴孩的哭声，听了真叫人心如刀割。”

“快到腾冲时，当地有关部门在路旁摆出一些米汤，救济逃难的人们，每人给一碗，我也要到一碗，几大口一下子就別光了。在腾冲时，还遇到几个机工队员。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走到怒江边。怒江天险隔在前面，江水湍急，汹涌澎湃，惠通桥已被炸断了，并被日军占领西岸了，我们避开日寇的视野范围，来到一处僻静地段，出钱雇了一个筏工，冒险乘着竹筏渡到对岸，继续向保山方向艰难迈步……”

当他们回到保山时，这座抗战时期的滇西重镇已变成废墟一片。原来是日寇制造了“五·四惨案”，炸死保山平民成千上万，加上瘟疫流行，原来的部队早已不知转移何方了，只好搭车回到昆明。

在昆明，由于滇缅公路已切断了，南侨机工便失业了。谢川周到驻曲靖的一个辎重兵团那里，也没有车子可开了。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从广东调来的一个石城炮兵总队，队长刚好是他的同乡海南人，名叫云昌贵，于是谢川周到部队找他，要求参加他们的远征部队到印度去，老乡同意了，就让他随这支部队乘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不料，他却被分到一个“骡马团”里，负责养马。他想不通，自己是开车的，为什么变成养马的？于是跑去问长官，但长官根本不理睬，只说这是上面决定的，他们管不着。以后他才知道，这是顶替一名逃兵的缺额，他甚至连自己的“谢川周”的名字也没有了，而成了另外一个连他都不认识的人了。点名时，叫到那人的名字，他还得大声答到“到”。不久，他跑到附近一个炮兵五团，但这里亦相当艰苦，整日操练跑步，搞军事演习。印度的太阳特别炎热，晒得人们受不了，晒脱了皮后每人差不多都变成“黑人”。他一心想开车操老本行，又跑到加尔各答，参加了英缅政府军的运输队，在那里继续开车运输抗日物资，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谢川周准备回国之际，恰逢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馆陈总领事招募驾驶员，打算将一批“GMC”卡车送回国内。于是，他参加了送车，沿着新开辟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一直将车开到昆明黑林铺交车。

交了车，他便失业了。此时南侨机工开始复员南返，国民政府发给每个机工一张“侨务委员会奖状”，并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复员奖金，愿意回侨居地的由政府送回，不愿回去的自谋生活。谢川周因与芒市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愿再回马来亚，就在芒市定居下来，靠帮人接送汽车维持生活，直到云南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川周在芒市街上摆小货摊过日子，其中有一阶段患病，整整在家休息了五、六年。病好以后又继续摆摊，修理小五金。1960年，当地政府把他们这些摆摊搞小修理的人员召集起来，成立五金小组。经过数次变迁，几易其名，成了现在的潞西县五金厂。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很多东西都被颠倒了。华侨机工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被诬为“里通外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打击。1969年3月，谢川周也被通知进“学习班”，失去了自由。他被强加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的“罪名”，还被诬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当作“牛鬼蛇神”处罚体力劳动，罚挑砖瓦，罚扫厕所。关在“牛棚”的日子里，虽然他没怎么被吊打（据红卫兵说是怕把他打死，以后就得不到什么材料了），但精神上却遭到严重折磨。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明明是满腔热血，为报效祖国而从南洋归来参加抗战的，却被一口咬定成“特务”。就连以前老岳父在缅甸腊戍送他的一件黑毛呢大衣，也被当成罪证，说是“当国民党团长时穿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最使他感到悲痛的是，不仅对他个人的诬陷、迫害，而且波及他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南老家。造反派说他曾用飞机运了三大蓝大洋回去，硬逼他家里人交出来。他的一个弟弟因此被关了七天七夜，最后实在受不了，偷偷跑到山上自缢身亡。得知这个噩耗，他悲痛欲绝。

1972年下半年，他才出了“学习班”，但没有做“结论”，只得到一句：“你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经历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机工们在文革被极“左”路线迫害的冤假错案得到澄清与平反。谢川周老人虽然退休在家，但政府从各方面加以照顾及帮助，连家属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及就业，都得到妥善的安置。

尤为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人民政府还组织他们这批南侨机工的幸存者到首都北京参观游览。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谢川周老人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说：“做梦也难以梦到会有这么一天啊！我想起九泉之下的兄弟和曾并肩战斗过的机工队友们，若冥灵有知，也该欣慰了！”

“孩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爸爸支持你回国报效祖国，不当亡国奴。你勇敢地去吧！给我们全家争光，为我们华侨争气！”

父亲嘱托的这段话，始终铭刻在谢金标的心中，伴随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

1939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谢金标，是一位出生在马六甲的第二代侨生，虽然从未回过故乡，但从父亲的口中，知道他的祖籍是广东。与其他一些南侨机工回国要隐瞒家长不一样，谢金标要回国抗战，则是得到其父亲的全力支持与鼓励的。

父亲是一名修船工人，月薪不高，但爱国热情很高，坚持捐出月薪的10%支援祖国抗日。谢金标也是一位好样的爱国热血青年，令他至今难忘的是，当年他曾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提着一桶稀牛粪泼到几家日货商店墙壁上，警告售卖日货的奸商。1939年，当谢金标打算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时，他刚一开口，父亲竟毫不犹豫地加以赞成。“给我们全家争光”、“为华侨争气！”这是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中。

谢金标登上轮船启程时，父亲以及亲威朋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送行。当船开走了，只见父亲还在码头上摇着三角旗……

谢金标带着父老的嘱托，踏上祖国故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进行短期军训之后，便分配到下关11大队，开始其在滇缅公路的抗战军运紧张生涯。

在南洋习惯平坦道路上行车的南侨机工，一下子面临举世闻名、惊险出奇的滇缅公路，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征服这个难关，不仅要靠娴熟的驾驶技术，而且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谢金标回忆说：“当时，主要是靠一股爱国热情，为着祖国的生存而战斗。因此，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甚至出现过奇迹，化险为夷！”初到滇缅路，他开着美制小道奇卡车，在昆明、下关、保山、畹町以及缅甸的腊戍、仰光几个站之间往返驰骋。滇缅公路的滇西路段，路面狭窄，凸凹不平，坡陡弯急，龙陵以下的南天门、芭蕉窝等处，不啻是一个个“鬼门关”。尤其是刚开始行车时，路况不清，应急反能力差些，他曾在老鲁田那里翻过一次车，幸亏人未受伤，车子也仅受到一点轻微损坏，拉起来仍照常行驶。而另一个华侨机工李水师，则没有这般幸运了，有一次他拉着一车驾驶员到畹町接车，在凌就翻到山崖下，一下子死了28人，其中有15位是南侨机工，水师本人也为国捐躯。

来自天空的威胁则更不可意料，行车时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袭击。谢金标遭空袭的经历不计其数。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仰光抢运军火时，忽遇敌机来袭，炸弹就落在身边，他连忙翻滚着，躲进附近一座大金塔里，拣回了一条命。

南侨总会以及海外侨胞始终关心着南侨机工，时常从精神上、物资上给予援助。1940年，陈嘉庚先生主率领慰劳团回国考察，亲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在保山南门街口，谢金标见到了陈先生，陈先生慈祥地拍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回国抗战，辛苦了。你们肩负着南洋华侨的重托，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陈先生的话，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

1942年5月初，谢金标从仰光运载军火撤退回国，当时战局很紧张，听说日本兵从后面追上来了，可是滇缅路上到处是抢运的车辆和逃难的人流，根本无法快行。车子走了几分钟又得停下来，等待着前面蠕动，有时比步行还慢。人群中，缅甸华侨难民最多。公路边随处可见到被遗弃的东西，有的还较贵重。可是这种时候，也无人去拣了。

5月5日下午，他好不容易将车子开到怒江边，可是已经晚了，惠通桥已于中午炸断了！只见排成长龙的军车、商车遗弃在桥西路上，无数人群挤塞在江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有的捶胸顿足，有的仰天哭泣，更多的则躲向山野隐蔽起来，寻找着脱险的途径。

滚滚的江水成了生命的分界线，仅仅是一江之隔，这里已是沦陷区了。四周不断地响起枪炮声，日军已混在人群之中，他们正向对岸炮击，并向那些试图渡江的难民们射击，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怒江！在混乱之中，谢金标碰见机工队友邓奇，两人商量一下，决定找个隐蔽的地点游过江去，决不能落入日寇魔掌！

待到天色渐晚，两人便摸到断桥的上游岸边，只见江水哗哗地流淌着、撞击着，显得阴森可怕。幸亏谢金标自幼在蕉风椰雨的马六甲常与伙伴到大海中游泳，练就了好水性，还曾在水中救出过好几个人，邓奇的水性亦不错。尽管如此，他们的心还是不踏实，一是不了解水情，二是担心日军和汉奸发觉。

天黑了，他俩慢慢顺着陡岸下水了。江水刺骨，真能把人冻僵，他俩尽力划着双臂，朝着对岸游去。江水表面还平缓，但水底怪石嶙峋，犬牙交错，形成无数个强劲的漩涡，不一会儿，两人就被冲散了。谢金标独自一人搏击着，不时从上游漂过难民的尸体，不慎触及，令人毛骨悚然……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拼搏，谢金标顺水漂至下游的地方，终于爬上了岸。不久，邓奇也游上来，他俩亲切地拍打着，庆幸着虎口脱险，同时，想到江那边的无数同胞，他们正在遭到日寇的摧残，心中充满了悲哀与愤怒！

他俩吃力地爬上江坡，沿着滇缅公路蹒跚而行，此时又冷又饿，只好在路边喝了点水，不幸却染上痢疾，一路上拉肚子，行至老鲁田时病倒走不动了，只好躲到一家姓杨的老百姓家中，经过治疗，仍未痊愈。后来，回到部队，机工队伍已散伙了，但谢金标侥幸地被留了下来，编入守军部队军运行列。此时，我军与日军隔江对峙，部队调动频繁，曾发生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谢金标奉命运载军队、武器到达指定的地点。

1943年底至1944年初，为了配合远征军即将进行的反攻，谢金标又开始从保山运送工兵团及其所需军备、器材到惠通桥，准备驾设浮桥渡江。

在怒江东岸行车是危险的，常常遭到对岸日军炮火的袭击，许多汽车被击中毁坏。有一天，正在江边休息待命的谢金标，忽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呼啸声，紧接着就是猛烈的爆炸声，日军的炮弹落在不远处工兵排的宿营地，当即炸死十多个人，他的熟人李排长也同时遇难了。谢金标算是命大，又躲过一次恶运。

1945年抗战胜利了，政府当局给南侨机工颁发了奖状和一些安置费，不少机工南返回南洋。而谢金标失业后在保山拜著名雕刻家“神刻”李石疾为师，跟他学艺，1946年在保山成家，住在书院街，摆摊给人刻图章，有时也到畹町、九谷替茂恒商号接车、运货。

1956年4月，云南德宏自治州成立，谢金标任刻印社主任，带着一个徒弟到芒市，为刚建立的各部门刻公章，以后就留在芒市，在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在“文革”中，谢金标与其他机工一样受到迫害，被戴上“华侨地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在手工业系统办的学习班呆了三年，不时遭到揪斗、吊打、强迫他承认“里通外国”的罪名……在逆境中，他时常回想抗战返国的经历，自问无愧于祖国。他还想到姐姐谢金水，为了抗日，回国参加新四军，最后牺牲在前线。拳拳报国之心，何罪之有？他相信自己的问题是会得到澄清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谢金标老人冰冷的心渐渐复苏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对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爱国举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谢金标老人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他最感到欣慰的。

现居住在云南边陲遮放的沈治平，是第二批回国南侨机工队的一员。1911年他出生在广东惠阳淡水市东门街，14岁时与二弟随父亲出洋。在马来亚，他做过橡胶工、裁缝小工、造船工，后又在联商巴士公司开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入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热潮之中，一次次地上街斗参与抗日示威游行，抑制日货，卖花筹赈。

谈及抗战往事，沈治平说：“国难当头，我们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支持祖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能当亡国奴！——这就是当时我们华侨的心愿！”他依然清晰记得，1939年2月的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位学生模样的热血青年站在人群中演说。那位青年用那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慷慨激昂地痛拆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大声呼吁：“目前祖国抗战正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服务，现在不怕没有钱，只怕没有技术人才！”沈治平听完演讲，犹如心底的一团火烧上了汽油，熊熊燃烧。于是，他当即下了决心：回到祖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意一定，沈治平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团。为了表达抗日救国、维护中华民族神圣权益的强烈愿望，沈治平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沈护权”（该名字现仍留在云南档案馆的南侨机工第二批花名册中）。经过考核和体检之后，他于1939年2月，告别了父亲与弟弟，随第二批机工团回国。抵达昆明，他们马上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班，训练班的军事生活是很紧张的。由于抗日前线急需大量军需物资，而运输军事物资急需大批汽车机工，因此仅培训了两个月就分配了。沈治平被分配到第11大队，大队部驻扎在保山，大队长是温天一，大队副是谢传胪，陈光强任中队长。

最初，沈治平奉命到遮放接车，把从美国买来的大卡车开回昆明，接着，将武器弹药运往贵阳。属他们中队运输任务的地段，山路险峻，路基很坏，道路难走，特别是雨季，路面泥泞不堪，形成烂泥路，还时常出现塌方。贵州的山路俗称“七十二弯”，加上当日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行车分外艰难。贵阳的冬天特别冷，车到那里，都要赶紧把水箱的水放掉，第二天走时再装上水。当时人们都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南侨机工车队，迎着困难上，满载着军火弹药，在艰苦的运输线上穿梭往返。

随着战局的发展，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迫封锁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开放。为了加速抢运，沈治平奉调由贵州赴腊戍，加入“华侨先锋运输第一大队”，从事滇缅公路抢运工作。滇缅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军运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在该路上，南侨机工车队付出巨大的代价，因车祸事故或遭受敌机空袭而死伤者不计其数。

有一次，沈治平与好友钟烈冒雨行车，因前面道路有险情，钟烈来不及急刹车，连人带车翻下山沟，幸亏果断地跳了车。沈治平连忙下山抱起身受重伤的钟烈，送到下关医院抢救，才把战友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钟烈翻车后，所在车队的人因找不到他，还曾报了死亡名单。而另一个名叫李禹的机工，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水平翻车时当场死亡，尸体就埋在那里。更为不幸的是，还有人翻车掉进怒江激流中，则连尸体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次，那是在支援广西前线的抢运途中，当时正值雨季，洪水泛滥，运输车队在漾濞桥受阻，等待过桥的车队排成长龙。突然，日寇飞机超低空进行空袭，连飞行员的模样都可以看清楚，沈治平连忙躲进路边的大石头洞中，幸免于难。而另一个机工临时躲进车底下，被日机机关枪射中油箱，引起爆炸，该机工即为抗战运输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疯狂南进。42年春，日军由缅甸长驱直入，沈治平的中队在缅甸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先从腊戍退至木邦，后由木邦退回遮放。由于时局恶化，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眼看遮放也保不住了，沈治平等人还奉命焚毁留在遮放仓库的武器及汽油，以免落入敌手，然后撤回昆明。回昆明后，滇缅公路断绝了，南侨机工车队被解散了。

沈治平31岁时，经分队长的撮合，与遮放当地一个傣族姑娘结了婚，妻子只有18岁。撤退时，他带着她一起到昆明，因机工队伍解散了，生活无着落，便来到下关，在朋友的帮助下，做卷烟买卖度日。后来，与几个机工朋友创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中南烟草公司”，生产廉价的“钥匙”牌香烟。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南侨机工开始筹办复员工作，沈治平因成家立业了，便带着妻子和一岁多的儿子回到遮放。

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干扰破坏，沈治平遭到迫害，被抄过两次家，也挨过斗。令人气愤的是，在批斗会上，竟有无知的家伙责问他：“帮谁救国？”尽管当时他不理解，心里有怨气，但总相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家中安度晚年的沈治平，谈起近况，老人显得信心十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神州在地带来了春风，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的家庭生活宽裕了，子女亦成长了，作为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亲眼看到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过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可就心满意足了……”

陈嘉庚先生在著名的《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其中在《华侨司机回国》一文中记载：“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岁月流逝，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赴滇缅公路采访南侨机工史迹，查证出《南侨回忆录》记载的这位无名英雄，就是海南籍的新加坡华侨工程师——王文松。

王文松已于1943年在云南滇缅公路上殉难了，而当年“并招同伴十余人”也大都陆续作古了，目前尚健在的只有云南的韩利丰和海南的黄守琛、何启凤等人，且都年愈八十了，但回想起当年“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亲身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韩利丰、黄守琛等老先生的介绍，王文松原籍海南万宁县，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任工程师，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深为陈嘉庚先生所器重。王文松的英文程度很高，技术精良，在海外工资待遇优厚（月薪二百多叻币折国币七百多元）。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抛去安稳舒适的生活，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带领十多个同伴，并带全套修理工具和机器回国效力。

1939年3月，王文松参加第二批机工团回国，全队207人，他任副总务。在王文松一行启程回国前夕（3月12日），陈嘉庚先生特地再次致函西南运输处（见图93）：

**迳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员，计有207人。其中……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一百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二日**

3月13日，王文松一行应时代的召唤，带着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的嘱托，搭乘丰庆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轮船缓缓地离开码头，南侨机工队伍与送别的亲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中依依告别。王文松站在甲板上，望着码头上不停挥手致意、越来越远的妻子儿女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这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斗歌曲。当王文松深沉地唱起“再会吧，南洋”之时，全船的南侨机工战友们都合唱起来了：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王文松一行抵达昆明不久，便奉命率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海南籍南侨机工）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缅甸的仰光汽车修理厂担任厂长。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汽车，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五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全体侨工积极努力，苦干加巧干，既讲高质量，又求高速度，终于创出奇迹，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安装十辆以上。这种惊人的速度，连美国工程师也连声赞誉“OK、OK！”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闻讯后，特地前往接见并嘉奖他们。

在仰光胜利完成装配任务之后，王文松又被调往下关任第八修理厂厂长，继续为抗战而抢修军运车辆，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前，1943年的一天，王文松不幸因车祸以身殉职。

王文松工程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放弃南洋高薪职位，告别亲人，离开温暖的家庭，奔赴祖国的大西南，为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贡献自己技术才干，直至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南侨机工的典范，是南洋广大华侨青年的典范，也是中国人民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第一次见到韩利丰，是在云南南侨机工的联谊会办公室，时在1988年。这位当年与王文松“结伴回国”的第二批南侨机工老队员，是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简略提到的无名英雄中尚健在者之一。他的记忆力很好，详细地追忆了那已远逝的机工回国抗战历史，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我写了《青春作伴好还乡——王文松的老战友韩利丰访谈录》一文。转眼几年过去了，1993年我又赴云南补充修订《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的文稿，再次见到了韩利丰，尽管他已84高龄，却依然精神矍烁，行动敏捷，毫无老态龙钟的样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机工联谊会来。

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风趣地说：“小林，上次你访问韩利丰未完的故事，如今有了新的续篇了啦！”原来，当年韩利丰不惜抛妻别回国抗战，如今，经历半世纪沧桑的海外结发妻子终于回到昆明团聚了。这一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尤其是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理应在南侨机工史上补上一笔。为此，我与南侨机工联谊会顾问刘宝全先生一起，再次来到位于潘家湾原西南运输处机工训练所旧址的新宿舍区，登门拜访了韩利丰的一家。

我们刚踏进韩家，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婆热情地出来接待，原来都是韩利丰的妻子。新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而韩利丰怎么会有两位妻子呢？这当然是半个世纪前抗日战争历史所造成的。这三位老人（见图94）向我们诉说了一段既辛酸又动人的真实故事。

韩利丰是海南岛文昌县地灵村人，12岁就跟堂兄飘洋过海到马来亚投靠在柔佛谋生的父亲，起初在“宽柔学校”读书，小学未毕业就进一间修理厂学机修，掌握了一手修车技术，后来与人合伙在新加坡开了一间“明新汽车修理厂”，收入颇丰。在他24岁的时候，奉父母命，回国娶了海南家乡的姑娘周亚妹为妻室，随后，带着“过埠新娘”返新加坡。一年之后，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急需大量的司机与修理工，经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南洋各地华侨机工热烈响应。当时王文松已是新加坡著名的机修工程师，月薪二百多元坡币（折合国币七百多元），但他毅然带头抛弃优厚的待遇，与好友韩利丰、黄守琛、何启凤等一群海南籍机工结伴，报名应征。此时，韩利丰已有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抗日救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妻子女儿，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救亡歌曲，并自带一整套的机修工具，离开新加坡到了昆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批机修工具已在抗战烽火中陆续散失，可韩利丰却奇迹般地仍保留着唯一的一把螺丝刀。该螺丝刀钢水很好，数十年了仍很坚固，最近已捐献给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专题展览的珍贵文物）。

韩利丰回国赴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服务，成为”王文松队“的得力技术骨干，曾任“技术总检”，发挥技术特长为抗战作出贡献。不久，新加坡沦陷，韩利丰担心着妻子女儿的安危，想方设法联络，结果杳无音讯，他的希望完全破灭。多年以后，经机工战友的撮合，他与云南姑娘李瑞萱结婚，从那时起夫走妻随，跑滇缅、闯险关，抢运抗日物资，过着出生入死、颠沛流离的生活。

留居在新加坡的周亚妹，日思夜盼，希望韩利丰早日胜利归来。有一次，日军来搜捕，气势汹汹地问：“你丈夫作什么去了？”她镇静地回答：“几年前出去做生意，得病死在外边了。”而后来盟军问及此事，她则自豪地说：“丈夫回中国抗日去了。”她有个坚强的信念，生是韩家的人，死是韩家的鬼，为国效劳是光荣的，即使他不在人世，也愿为他守寡，再艰难也要把孩子拉扯长大。就这样，她守了半个多世纪的活寡。

新中国成立后，韩利丰被分配到云南一平浪矿山车队工作，为矿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和修理工。他继续搞技术革新，不断取得新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并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汽车队长。李瑞萱也当了小学教师，一家生活得和和美美。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韩利丰两口子也不能幸免。韩利丰这小小的车队长也被打成“走资派”，要“靠边站”；李瑞萱因为出身于旧军人的家庭，竟被打成“军阀”。1974年韩利丰心灰意懒，携妻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海南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在家乡时，才偶然从一位华侨口中得知在新加坡的前妻还活着。回到昆明后，这消息他一直没有告诉李瑞萱。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老韩在新加坡的妻子还活着的消息，最后还是被李瑞萱知道了，开始她有意见，怪他当年没有告诉她。但随后，她认为这是抗战历史造成的，不能怪老韩。有一天，李瑞萱对老韩说：“你这个死老头，就忍心抛下她们母女，几十年不管，人家为你守了50多年的活寡啊！想必她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不知她生活得怎样？有没有人照顾？还不快写信去联系，把她接过来一起过晚年。”李瑞萱说出了老韩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老韩听了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1991年9月，八十高龄的韩利丰到新加坡探亲，和周亚妹白发相逢，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找到了前妻，悲的是他女儿过早辞世。老韩在他女儿墓前失声痛哭：“女儿，阿爸来晚了，原谅阿爸吧，现在阿爸看你来了，你能叫我一声阿爸吗……”，在场的亲友无不流下眼泪。周亚妹在新加坡除了有外孙，亲人并不多。老韩看到周亚妹孑然一身，十分难过，遂向亚妹提出：“跟我回国吧，瑞萱她希望我接你回去，我们都已七老八十了，也不图别的，让我们一起相依为命吧。”亚妹欣然答应，跟老韩一起回昆明。当周亚妹踏入家门时，李瑞萱满腔热情地迎上去：“老姐姐，你终于来了，欢迎你呀！你看，这是儿子、女儿，这是孙子、孙女，他们都很孝顺，会照顾你安享晚年。”亚妹早已热泪盈眶，颤抖着双唇，叫了一声：“瑞萱，阿妹哟……。”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三位老人泣不成声。

从此，这三位老人相扶相助，相处格外融洽。特别是李瑞萱和周亚妹，好像亲姐妹一般。周亚妹经常对人说：“我福气真好，能遇到阿妹瑞萱，算是有缘份。”老韩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人们看到都羡慕，都敬佩，在海内外的南侨机工中传为佳话。

我刚20岁的那年，就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曾有人问我：抛弃海外舒适的工作，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滇缅公路，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见图95、右三）回答说：情系中华，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

“情系中华”，并不只是一句寻常的口语，而是蕴含着我们家庭四代的艰辛经历：

我的曾祖父是太平天国的先锋兵。太平天国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株连九族的暴政，他带着18名族人，坐上一条木船，在海上漂流了四个月，才到达了新加坡。后来，我们这个家庭便在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埠定居。我的祖父曾怀念祖国，怀念家乡，但他与曾祖父一样，客死异国他乡，连“魂归故土”的权利都没有。我的父亲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贡献了力量。我于1919年出生在马来亚，是在海外特定环境中成长的。可是，我的根在中国，祖辈、父辈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驱逐日寇时，我得到父亲在同盟会的挚友沈汉初的推荐，瞒着我大哥报了名。就要离开相依为命的大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第二天绝早我便不辞而别了。

我是参加第8批机工团的，在新加坡编队时，我被选为副秘书长。陈嘉庚先生在“南天酒楼”的露天台上设宴为我们饯行，大有“与子同戈袍，共赴国难擒敌酋”的古风。

船抵安南海防码头时，我们还未下船，便有一批注奸走狗先挤到船边，散布谣言，妄图阻止我们回国抗日。他们的无耻行径激怒了我们，霎时间，酒瓶、罐头瓶、汽水瓶横飞，砸得汉奸们抱头鼠窜。

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滇缅公路，把汽油枪支弹药等抗日军用物资从缅甸运回再送往前线。经过西南运输处训练所作了短期山地驾驶技术训练后，我被编入第9大队26中队任班长。我们的车多数是六排档的“道奇”、“福特”、“万国”等牌号的大卡车。从昆明至缅甸腊戍，沿途要经过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区，地形险要，路况很差，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每跑个单边顺利时也需七、八天。

后来成立了“华侨运输先锋大队”，我被任命为第2大队4中队尉队副。有次车子方向盘失灵，一边前轮滑出公路，车子无法开动了。我拦住一辆车打算回队部救援，不料这辆车开出不远便翻了，我见势不妙急忙跳车，车子翻下山，我滚到半山腰抓住一棵树干才幸免于死。

不久，敌人发现了这条交通线，天天派飞机骚扰。我们车上装的全是汽油、枪支、弹药，特别是装有烈性炸药TNT，若有一辆被击中起火爆炸，便会波及一大片。有一次，我驾车运送18桶汽油去龙陵。车到怒江上的惠通桥就遇到敌机轰炸，我急忙刹车，停在一个石洞下面。这次来了9架飞机，轮番向大桥投弹，河水被炸起巨大的水柱，连大鱼都被炸上了岸。桥上铺设的木板着了火，伤亡情况惨不忍睹。我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只有采野果充饥。以后我们干脆白天休息，夜里行车。一到夜里，车灯一齐亮，盘山公路上便会出现一道道光圈，缓缓移动，十分壮观。

滇缅公路所经的深山老林和热带坝子，是疟疾流行的瘴疟区，许多侨工染上了这种病丧了命。1940年底，我也患上了恶性疟疾。发起烧来，恨不得剥下一层皮，冷起来时几床被子也不顶用；肚痛拉白痢，折腾得我有气无力。虽然住进了西南运输处医院，但病员多床位少，再加缺医少药，医院硬把我赶走让我自己求医。幸遇在生活书店供职的女朋友，征得书店经理同意，把我接到书店精心护理调治，我才再度战胜死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奋战在西南运输线的南侨机工，都是情系中华的英雄儿女。不少人已为国捐躯，长眠荒山。当时许多人连西南运输处的津贴也不领，完全靠海外汇款来维持生活。尽管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发怨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激励我们为抗战的胜利而拼搏奋战！

我名黄友镐，是新加坡侨生，原籍广东。“七·七事变”日寇入侵中国，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激起我们海外华侨的民族义愤。于是，我于1939年参加陈嘉庚先生组织的第九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抗战。

我们这一批机工共有500多人，由新加坡乘船到安南，然后转火车到昆明。在昆明集训三个月后，我奉命前往芒市接运新车，专门负责运送军火物资。我编在9大队27中队当驾驶员，大队部设在苏州市。我们车队主要任务是由遮放军火库运至保山，在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穿梭往来。这条滇缅公路是世界出名的险路，我们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牺牲，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前仆后继，抢运快运，一心把军火和军需物品运往抗日前线，好让前线将士早日将日本兵驱逐出国境。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我个人就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劫难：

第一次，我运载一车炸药，行驶在距惠通桥约二公里的地方，路旁一位养路工指着天空，叫我停车。此时，我才发现敌机在空袭，立即跳下车来，躲在大树底下。这次，敌机来炸惠通桥，炸弹落在桥的周围，弹片横飞，江面炸起水柱。如果不是养路工提醒，我那辆汽车正好通过惠通桥，要是中弹片引爆运载的炸药，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被炸死事小，惠通桥被运载的炸药炸断，所酿出的灾祸则是巨大的。

第二次，我满载一车汽油，刚通过功果桥不到三分钟，敌机又来轰炸，江面被炸得水柱溅起几丈高。幸好我的汽车与功果桥有一段距离。要是靠近些，车上汽油点燃起来，我当然不能幸免。

第三次，我们车队尚未过功果桥，敌机在桥的上空轮番轰炸，功果桥被炸断了，怎么办呢？敌机再狂，炸弹再凶，也泯灭不了我们南侨机工救国的忠心。我们这些“神行太保”，借用了“智多星”的智慧，连夜将汽油桶扎成大浮桥，冒着风险，战胜艰难险阻，终于把军火运过澜沧江。这种奇迹般的运输，如果没有“抗战救国”火热的心，那是办不到的。

第四次，我在保山历险，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驾车回保山，由于患上了“打摆子”，便在车队休息。当时，敌机一批九架来轰炸保山，我一时无处躲藏，只好跑到老百姓的菜园子里躺着。敌机丢下炸弹，就在身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卷着泥土把我埋了半截，我用力将盖在身上的泥土掀掉，望着飞机离去远远的，才回到车队，不知怎么搞的，“打摆子”竟也“忘记”发作了，也许是给炸弹硝烟“治”掉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历险，但战争的洗礼使我“不驱逐日寇出中国境，誓不回南洋”的决心更强。1941年，我调昆明受训之后，编入第五大队，主要任务是由曲靖运汽油到贵阳。不久，西南运输处改编为滇缅运输处，我们60中队部设在禄丰，运输任务更为繁忙。

1942年，我奉调回楚雄，还到畹町接一批雪佛兰新车，并装运军火回昆明。不久，缅甸沦陷，日寇入侵国门，我们撤回黄土坡。当时，无车又无汽油，只能改装一批“木炭车”。1944年，我参加川滇东路运输局，地点在曲靖，负责陆良机场由印度运来物资的装卸任务，一直至抗日胜利结束。

日寇投降了，被日寇侵占的大好河山又还于我大中华，海外赤子赴国难，救中国的壮志如愿以偿。我的心，比在领取“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时还高兴。

杨保华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创始人、连任理事长，被云南侨界称为“国宝”。近几年来，南侨机工历史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他和联谊会同志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每当海内外热心人士来访，人们就高兴地通报：又有客人来看望“国宝”啦。因此，“国宝”也是人们对健在的南侨机工的尊称。试想：三十年代自愿从南洋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壮士，在抗战中有一千多名为国牺牲，战后又有一千多人复员南返，留在国内历尽沧桑的，至今健在的只有近百人了，出于敬重，人们便尊称为“国宝”了。

1993年10月，杨保华率领南侨机工联谊会代表团应邀飞往厦门，参加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80周年庆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福建省以及厦门市党政部门领导亲切地会见他们；陈嘉庚先生家族代表与他们合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教授与他们亲热情握手致意；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先生与他们一起座谈；印尼华侨李尚大先生邀请他们到自己创办的安溪慈山学校作报告。更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第一次瞻仰了陈嘉庚先生的故居与陵园，并荣幸地出席了华侨博物院专门新开辟的《赤子功勋——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专题展览》。这个专题展览，以大量的实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功绩，引起了海内外的热切关注。有关报社、电台、电视台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使这些幸存的南侨机工壮士们在有生之年倍感荣耀……

华侨博物院的同志们久闻杨保华深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是唱《热心救国歌》，于是请他唱一唱。杨老酝酿一下情绪，便声情并茂地唱道：

**一**

**热心救国是应该，                                              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                                  无钱出力“将伊刣”（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二**

**阿婶阿嫂阿姐妹，                                              莫要日瞑（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期，                                              应该为国做“大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杨保华是广东人，却用闽南话演唱，而且语音纯正。加上他身材魁梧，体高一米八十米，体重八十多公斤，原以为他该是声如洪钟，歌似海嘯，可他却细声细调地轻唱，唱得那么有感情，那么有吸引力。大家惊奇他记性好，他却说：这歌是半世纪前从我们心坎里唱出来的，道出我们的心声，当然终生难忘。

回昆明后，人们笑着说：此次南侨机工代表团厦门之行，可真正体现出“国宝”的价值呢！杨保华听后笑了笑，他说：“国宝”就是陈嘉庚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在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办公室里，我们再次访问了杨保华理事长。下面就是访谈记录：

我的祖籍广东中山，父亲20多岁时跟同乡到马来亚吉礁谋生，当建筑工，母亲理家务，兄弟姐妹共八人（四男四女）。由于大哥被蛇咬伤，花去很多钱医治无效，后来蛇毒发作而死，大嫂改嫁，家境越来越贫困。我只读了两年书就失学了，给一位银匠老板当学徒，每天天未亮就得起床烧水、扫地。老板娘生了个宝贝儿子叫阿狗，每天还得带阿狗玩，伺候吃饭。端午节那天，我才八、九岁，就要忙着杀鸡伺候老板一家。后来终于病倒了，发热发冷，躺在楼板上发抖。老板上楼，拿起鸡毛掸柄，噼哩啪啦地猛抽楼板，吓得我病更重了。母亲见我病成那样，瘦骨如柴，要接我回家。可是当学徒未满三年提前离开要赔伙食钱。母亲气愤地说：“病成这样还不让回去治病，走，赔钱就赔钱，人命要紧！”好在老板娘因我平时老实勤快而发了善心，说是治病走的，不用赔钱啦！

我在家养病约一两年，病渐好就闲不住了，到客外附近车场玩，熟悉了海外各帮人（闽南、潮州、客家等），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觉得蛮有趣。车站招徕乘客很热闹，帮忙拉一个乘客还可得20%的报酬，我也学着招徕乘客，被称作“带鱼头”。学着各种方言招呼乘客，一天可以挣几角钱。有一次，我招徕一位50多岁的妇女，很有礼貌地喊：“伯母、伯母……”可她就是不理，使我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大伯指教我说，妇女怕人家说她老，你应喊嫂嫂。我改口亲热地用客家话喊道：“阿嫂，您回不回去？”她随即回头笑着问我：“你的车在哪里？”我就带她上车了。我尝到了语言文明礼貌的甜头，从此，更细心地学说各种语言，不仅学华侨的各地方言，而且也学当地的马来语等。在车场学，在车场用，在车场挣钱，结果，越用越熟练。童年时代的艰苦磨练，学会了多种语言，在后来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不同场合竟派上了用场，解决了困境中的问题。

我在车场帮拉客，和司机、售票员、老板都混熟了，就勤快地帮洗车、加水、打扫卫生等。有时，我坐在驾驶室里，学师傅的样子摹拟操作程序。师傅见了，顺便叫我来试试。我在13岁时第一次自己开动汽车。从此想开车简直入了迷，作梦也想当个驾驶员。

由于家里人口多，房子窄，我只好住到二姐家。二姐夫见我有礼貌，又勤快懂事，便对母亲说，小鬼在车场这样混下去没出息，倒不如买辆车让他去跟车，将来学开车。姐夫果然买了车子，我高兴极了。洗车时，我把车开进开出。姐夫一见大为惊奇，问我是从哪里学的。我说是悄悄学的，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呢。15岁时，我已能熟练地开车了。16岁就领取了驾驶执照。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画报，上面有一伙日本兵公然侮辱一位中国老太婆的照片，我气愤极了。日寇如此野蛮凶残，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我决心亲手杀死这群野兽，为祖国同胞报仇！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便积极报名回国打日寇。

报销的消息传开后，家里竭力劝阻，但劝不住我，就请来干妈帮劝说。干妈说：“‘唐山’很艰苦，抗日战场很危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好好想想。”我接过话题与她摆道理：“日寇打咱中国，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一旦国家被灭亡了，大家都变成了亡国奴。那时，你即使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家里一向对我好，但为了救国，我还是应该回去！”干妈一时说服不了我，却暗地里想新招。

有一天，干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金戒指有点毛病，我取下帮你修一修。”我虽舍不得，但还是让干妈取走。她还向我要了一张相片。我盼着戒指早日修好，可干妈却送来另一个戒指说：“这个先给你带上，那个等修好以后再送来。”过些日子，干妈说我车子开得好，她要买辆新汽车让我开，果然买来了一辆“威力士”77型的。

另一天，干妈带来一位中年妇女，我还不知该怎么称呼，那人却指责我：“没良心的，刚与姑娘订了婚，竟要一走了之。”我莫名其妙，连声说我不知道。干妈连忙示意制止，原来是她暗中替我“订”亲。沉默了一会儿，老“岳母”通融地说：“你爱国要走可以，但应这么办吧：今天先结婚，明天你可走。”我想这不妥，过几天就要回国了，在抗战烽火中，万一有个意外，就会耽误人家一辈子啊。于是，我再三恳求：结婚之事还是等抗战胜利归来再说吧。

临出发前，未婚妻也来看我，使我很受感动。但为了抗日救国大事，我顾不了个人私情，我不能动摇，我要坚决回国抗日。我们约定抗战胜利之后再相会。启程回国之日，未婚妻一直送到码头，我们登船了，她与岸上欢送的人群仍不断地挥手，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路线，与前三批不同，不是经安南转乘火车入滇，而是搭船到仰光，再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的。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中队的任务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间抢运军用物资。在此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暴雨，道路被冲垮，车队被困在芒市附近的荒山野岭中，连续挨饿受困一星期，尝到“山大王”的辛酸。过去每次出车只带三天粮食就够了，而这次可惨啦，粮早吃完，只得冒雨上山找野菜挖竹笋充饥。祸不单行，偏在这时候，我与几个机工战友又染上了疟疾病。这病发热发冷，有时热得像火烧，有时候则冷得像掉进冰窟里，即使盖上几件棉被仍然发抖。好容易出了一会儿太阳，大家歪三斜四地靠在车轮边晒太阳。附近虽有傣族村子，但人家好像有意避开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亦无可奈何。

熬到第七天，终于有两三个傣族小孩慢慢走过来，惊奇地看着我们说：“车人为什么不吃饭？”我听懂了意思，因为我在马来亚时，学讲一些泰国语，就与这话差不多。我赶紧振作起来，用傣语和他们打招呼：“小孩过来。”小孩惊奇地问：“大哥是傣族？”我连忙回答：“我是广东傣族。”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来与我们亲近交谈起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吃饭？我摊开双手说：“大米没有，菜没有，肉没有。”他们说：“等一下”，便跑回村去了。当他们回来时，各拿一小篾箩米饭说：“大哥您吃饭。”

一见米饭，十几个战友蜂拥而来，一人仅吃了几口。小孩同情地问道：“您没得吃啦？”我说：“我们个个都没得吃啊，你们回去给爹妈说说好吗？”不久，村里就来人了，他们说过去曾被当兵的抢怕了，买米买肉不给钱，有时只给一些没用的纸币，还打人呢。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南侨机工，是从南洋回国来抗日救国的，买米买肉一定给钱。只是救济车未来，没有现金。于是，我从傣族村里借来了一些粮菜，断粮危机终于得到解决。后来当救济车赶来时，我立即把欠款送到傣家亲人手上，他们都高兴地说：“南洋华侨机工好！”

事情传开了，南侨机工的车队在傣族村寨附近一停，傣家男女老幼就高兴地围上来。后来，还有傣家姑娘与南侨机工恋爱结婚的呢。

有一次，我们车队到缅甸腊戍，每人可补贴几元零星缅币。可是，我去领回的却是一百元的一张，让我去街上换开再分发。起初未知当铺老板是什么人，我就先用刚学的几句缅甸语礼貌地说：“老伯，换点零钱。”没想到对方回答“没有啦。”我碰了钉子回头走，有个好心人指点说，老板是台山人，若讲台山话就好办。我想起在马来亚时，曾向一位家在白水老潭的友人，学讲一些台山话，就大着胆试试。我转回来亲热地说：“阿伯，帮忙换点钱。”老板一听到台山话，马上问我是台山哪里的，我说是白水老谭。接着老板又问：“你到过唐山？”我怕露出马脚，赶忙说是听我阿爸说的。老板高兴了，他说“难得他乡遇乡亲。你们从南洋回国抗日，真不容易啊。”不但立即换开大票，还热情地留我跟他吃一顿饭，并鼓励我狠揍日本鬼子，早日胜利回家团聚。饭后又送给我一个怀表，说：“跑车要准时，这个表对你更有用。”后来，这个表日夜伴随着我，成为我的亲密伙伴，接触它，耳边仿佛就响起了：“跑车要准时”，“狠揍日本鬼子”的声音！

1942年5月，惠通桥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盟军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就只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这些军用物资必需从仓库运往机场。因此，印度丁江机场，急需一批汽车司机，盟军便在昆明招募华侨机工前往印度。我们这些刚从滇缅公路撤退下来的机工们都踊跃报名，我与50名战友被批准第一批赴印，领队是李卫民，于1942年8月乘美军飞机达抵丁江机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跑短途运输。我们这些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和开过车，技术很高，因而受到盟军的赞赏。不时在印度机场搞运输，时常遇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拉空袭警报时，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到防空洞去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才响，日本飞机就已升到上空了，这时，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刚开进机场，情况非常危急，万一被炸，会造成对机场的威胁，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的这位南侨机工战友，并没有弃车逃命，而是调转车头往外直冲，目的是将敌机引往别处，以便保住机场以及其他车上的物资。车子加大油门呼啸向前飞奔，黄土尘烟滚滚象一条黄龙翻腾，敌机发现目标立即尾随追击。当飞机追上黄龙背后射击时，这位机工却来个急煞车，车停了，但黄龙却继续滚滚向前，飞机追着黄龙疯狂扫射，以为汽车已被炸个稀巴烂了。其实，司机又调转方向，把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蔽起来。飞贼绕个大弯回来不见汽车踪影，以为得手了，就洋洋得意飞走了。由于这位机工的英勇行动，机场上的物资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种宁可牺牲个人而保住其他人的英雄行为，都连声称赞。

我们在印度机场完成了运输任务之后，即乘搭美国空中霸王号，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回到了昆明。

春城虽温暖，我却举目无亲。我天天去找工作，终于碰到一位老乡，他正在美国陆军部队后勤部当采购蔬菜的站长。于是，我就与刚从印度回来的李卫民一起合伙经营蔬菜，总算有条谋生活路。李卫民对我说：你年近三十的人该找个女朋友啦。我说不行，我已订过婚了。他说“南洋沦陷，战乱多变，恐怕……”我则坚持待写信回家问问再说。不久，家中回信说，她已结婚了。李卫民一再动员我找对象，并介绍我认识一位小学教师，她叫韦碧茵，在重庆任教，正好放假在家。我登门去拜访她父母时，才发现韦老伯是熟人，在我去印度前就已认识了。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于1946年在昆明结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儿。人多一口，我又失业，日子非常艰难。于是我帮一位老板开车去缅甸搞运输，积累了一些钱。后来，内战激烈，社会动荡不安，滇缅公路上土匪、强盗抢劫猖獗，车子难以行驶了。老板把车子卖了，回缅甸去了，我又失业了，留在昆明。日子熬到了1949年，物价猛飞涨，货币大贬值，喝一杯茶竟要几千元。我赴缅甸赚的钱，早已花光了，家里又添了小孩，生活就更困难了。南侨机工战友黄辉庭见我无米下锅，就叫我去他家拿一些米，一次又一次，老岳母还以为我在银行里尚有“存款”呢。

好容易熬到卢汉起义，昆明解放了，但南侨机工失业的问题一时还未能根本解决。在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陈嘉庚先生，想起了抗战期间成立的华侨互助会，心里亮了，该给陈嘉庚先生写封信。

我走街穿巷，四处寻访连络机工战友们，还找到郊区村子，先后登记了40人，通知他们到原华侨互助会的会址——侨光小学聚会。开会那天，40个人都到了，真是一次南侨机工团聚会。难得的是缅甸归侨热心人士陈实甫先生，看到我们这么团结、这么齐心，他表扬我们，让我们以后开会就去他的“新厦公司”会议室。我们要给陈嘉庚先生写信，他就叫一位副经理帮我们写，直接寄北京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交陈嘉庚先生收。

我们没有想到，陈嘉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拍来急电给昆明侨务处。侨务处王一知处长到处找我。当时我仍忙于联络华侨机工，王处长三次没找到我，就让张同志再次到我家。我爱人看到背枪的军人来找，怕我已出事，不敢多。后来见我平安回家，以为无事了，就没说有人找。过了一个月，她才问起：“你闯祸了没有？”“没有啊！”“那怎么有个带枪军人来找你几次？”“咳！解放啦，背枪的是革命干部，与过去不同啦。”“人家说请你去侨务处，我怕你闯祸，才没给你说”“哎呀，这可是好事！”我哭笑不得，立即赶往侨务处。门岗说：别慌，先登记。当我写上“杨保华”时，他高兴地叫起来：“杨保华就是你！我们处长找你多少次啦，不用登记了，快进去吧！”

王处长高兴地对我说：“一个月前陈嘉庚先生就拍电报来了，非常关心你们南侨机工，指示说云南任何单位需要司机，首先要录用南侨机工。”王处长接着说：“我看你们生活确实太困难，先给你们一些救济好吗？”我说：“我们要就业，不要救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为了修建滇藏公路，资源委员会来云南招聘司机，我们40个南侨机工全部应聘。1950年9月，我们先集中到小团山集训，考试全部合格，然后奔赴滇藏公路工地。

我先分配到大理以北的牛街地段，运石头，修涵洞，公路不断往北延伸。后来，调洱源，到剑川，修到石鼓，再推向中甸。

1952年，我们车队合并前往修建昆洛公路（即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从峨山修到澜沧，修到勐海，苦战几年没有休假。只是在送民工、石匠回家过年，才顺便回一次家。昆洛公路修成后，改属第六公路工程局。

当进行肃反工作时，南侨机工遭到牵连。过去，侨务处常叫我们开会学习政策，讨论搞好工作。可运动一来，有人诬蔑，这是“开黑会”。于是，一顶“特务”的帽子突然从天而降，戴到我的脑袋上。我为啥突然成为“特务”呢？原来是这样：有个南侨机工叫郭六成（与我同为第四批回国机工），听肃反报告，没有弄清政策，他想坦白一下，可以立功，免得人家说我们“开黑会”，搞“特务活动”。就在会上说：“我郭六成是一号特务、杨保华是二号特务。”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没人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被送进“老虎队”，天天写交代材料，写了一叠又一叠，写了九个月，我的字也就练了出来。

九个月后，上级干部下来了解情况，看我写材料，天天写的都一样，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自相矛盾。找我谈话，说我记性真好。我说：我做的，我记得；没有做的，不能乱写。乱写会搅乱组织，反而给敌人钻空子。上级干部问保卫科长，经查问，严厉批评他乱来，万一出事，害人一辈子。最后，叫保卫科长给我扛行李，送我回车队。上级干部还说：阶级斗争很复杂，郭六成不懂，回去给他讲一讲，不要背思想包袱。

后来，我又调到昆明总站八车队，司机都是华侨，队长是南侨机工林新李。他工作做得出色，成为云南省劳动模范。记得我们华侨车队热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家一心一意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干劲冲天。我们小组的竞赛对手是黄步云（见图96）小组，他是省劳动模范，后又成为全国劳模，出席北京群英会，为我们南侨机工争了光。

1958年10月，我出车到永仁，忽收家信说妻子病住院，我立即赶回。我一家十几口，上有两老，下有七小，全靠她照料，她还要忙教书，而我四处跑车，难以分担她的重担。她病倒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我到医院，只见她在哭。她说：已住好久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当时搞“大跃进”，老师带学生下五家摊修路，冒雨苦战，她感冒、发烧，仍不下“战场”，终于得了伤寒病。老医生没敢告诉她，怕她急坏了。

为了赶任务，我不能多停留，交代老医生多加关照，就赶送一车货去芒市，然后装上空油桶回来。谁知道在最陡险的麦庄丫口突然抛锚，我迅速搭车赶回拿材料把车修好，继续赶路。车到羊老哨，实在太累了，车一停下，我就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天刚蒙蒙亮，我被修路工的泼水声惊醒，这时迎面飞来的一辆解放牌带拖斗货车，我赶快让车停到路边上，来车却急转弧弯，车斗一摆猛击到我的车头左侧，大梁给打弯了，我踩车的脚负了重伤，下不来了。后经医院包扎完，我忍痛要去医院看妻子，老岳母说：“不能去，她看到你这模样不更急死了吗？”还说她病已有好转，能起来走动，锻炼身体啦。我稍放心。没有料到才过几天，1958年10月24日晚上，老岳母突然从医院哭了回来，说“她死了！”天啊！我坐上三轮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她已被送进停尸房。无灯，漆黑，摸着走，脚绊了一跤，擦亮火柴，是个孩子尸体。掀开纱罩，又是个长满胡子的老倌。再摸进去，才找着她。她面煞白，还睁着眼睛看我，我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大姐赶来了，拉扶我回家。后经了解突然病故的原因：自从“反胡风”、“反右”到“大跃进”，老医生先后调离岗位去学习、接受批判、参加劳动，接手给妻子治病的年轻医生缺乏经验，说她卧床时间太长了，应该下床活动活动，出外面走走。她听医生的话，支撑虚弱的身子下了床，出病房外面散步，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慢慢走回病房，走到床前突然昏厥扑倒，腹部撞在床角上，伤寒重病的薄肠子受此冲击断裂了，终于抢救无郊。我的老岳母为女儿、为一群孙子里外跑，跌跤把脚掼瘸了，而我的儿女，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九个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想该给小孩买点吃的。想去富春街，却昏错沉沉地走到了西站。恰好被一个朋友碰见了，他见我痴痴呆呆地，把我送回家，叮嘱家里说：“以后老杨出去，一定要有人跟着。”

我家祸不单行，接下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那可是艰难岁月。当时吃、穿全部定量，凭票证购买。我的脚伤养好了，头脑也清醒了，面对困难，想出办法，全家分工，共度难关。老岳父母总管家务，岳父的婶婶老太帮扶养最小年仅9个月的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上学去，老四带领老五、老六。我赶快去上班。车队长期补助我家30元。我是一级驾驶员，工资90元。全家同心同德齐奋斗。我的车跑山区禄劝、武定等地，拉活猪回昆明。屠宰站老板说，每次拉猪一头也未压死的，可将七、八元。我格外小心，从未压死一头猪，得了一些奖金。我告诉老板，不用给我奖金，给些猪肉好喽，老板一高兴，一刀砍了一大块，足有10斤重。当时每人每月定量肉只有2.4两，而我家吃肉却意外丰富。我们家渐渐走出了困境。

我也在苦难中，总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而看到他人处于困难境地，我也主动伸出援助的手，助人一把。南侨机工汤耀荣（见图99）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其妻潘女士抚养三个孩子，力不从心，磨难多年，只好重新组建家庭。潘女士决定从云南赴山西结婚，她说：“杨叔，三个小孩无法带去，怎么办呢？”“送来我家吧。”“你家已有七个小孩，韦姐比他走得更早，你负担太重啦，怎能再加重担呢？”“没关系，咱南侨机工是一家人嘛。7+3=10，可以组成一个班呢。”潘女士和三个小孩从此走出了困境。汤耀荣之女汤小梅回忆在我家幸福成长的情景，激动地告诉大家：“杨伯父对我们真太好了，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给我们小孩子喜欢的东西，首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然后分给他的七个孩子，他关心我们超过了爱自己的孩子。”后来，小汤恋爱结婚时，她告诉爱人说：“你真正的岳父老泰山，是杨伯。”

“文革”开始，大揪“牛鬼蛇神”。南侨机工抗战时期在西南运输处的那段经历，被当成大问题，大揭大批。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检举我，要我坦白交代罪行。他们天天审，天天问，就是要我交代“罪行”，查一个多月，仍无问题。最后，他们抛出了我的“罪行”。说我1948年在空军招待所开汽车，有一天所长叫我开吉普车到南屏街拉进步人士去黄土坡枪毙，逼问我拉几个，名叫什么。并说人证俱在，还不快坦白。我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能拿出证据来，该劳动，我自扛行李；该枪毙，我站着不闭眼睛。第二天，集中了几百人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大声逼诃我，要彻底坦白交代。我仍说我没有罪。他大声喊：“褚秦真出来！”，当众问禇是否说过“所长派车拉人去枪毙之事？”“是不是杨保华送的？”禇说：“这事杨保华帽子不得！”全场几百人都听到了，会议主持人气急败坏地把禇推了下去。

问题解决了，我回车队，但又不让我开车了。叫我钻在坑道里换车梁钢板。人家问我现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在搞地下工作。”后来，见我工作细致，又叫我搞机务员工作。有人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桌子上工作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光荣退休了，却又闲不住，车队留我继续工作，当教练指导。

1984年，我从玉溪车站回到昆明，与儿女、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经常与南侨机工战友们聚会。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张智源（见图97）热心联络南侨机工战友，我积极参与活动，共联络了昆明20多人，举行座谈会。后来，张智源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我牢记他的嘱托，继续组织机工联谊活动。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共同问题，就是落实南侨机工的政策。我想昆明老机工多，生活有困难，认为应好好组织起来，于是写报告给北京全国侨联。1986年9月，“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机工云南联谊会”（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

紧接着，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代表团访问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先生也从北京赶来接见我们，并与云南省领导商定建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989年7月7日，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纪念，“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终于在昆明西山正式落成。

今天，《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所有健在的南侨机工都感到无比欣慰。现在海内外许多热心人士称我们南侨机工是“国宝”，说句心里话，我们不是“国宝”，但我们心中确有“国宝”，名副其实的国宝是陈嘉庚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在云南南侨老机中还有一位“年轻人”，实际上他也年逾古稀了。可为什么还称他“年轻人”呢？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幸存的南侨机工，大都年近八十或已逾八旬了，故战友们喜欢亲昵他为“年轻人”；二是他身体确实好，热情特高，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联谊会的各种工作，他都抢着义务去做，干劲不亚于小青年，故荣获这一“美誉”。

这位“年轻”的老机工，就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副理事长王亚六（见图95、右二）。他祖籍福建莆田，现居昆明，我曾多次登门拜访，可是他每次谈得更多的都是机工战友逸事。他说，一些已故战友的事迹，如果我们活着的知情者不讲，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就难免失传了。当他将其所知的战友故事一一谈完之后，这次我出个题目，让他谈谈自己“在滇缅公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终于从自己谈起了：

我是参加第三批机工回国的。1939年3月27日乘“丰平轮”出发，4月3日抵达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卡车把我们接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初到训练所已是深夜，最深刻的印象是给我们三个“下马威”：第一个“下马威”是当夜寒流袭击，令人冷地发抖。我们是从长年炎夏的星洲来到大西南的，一下子急剧降温，挨冻的滋味是前所未有的，确实难受。不过，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无人有怨言。因为大家明白，这次回国要到滇缅公路的深山野岭开车，要上战场，为的是运输救国，绝不是回来享清福的。第二个“下马威”是睡稻草地铺。我们在南洋都有舒适原安乐床，初来到训练所却无床无帐，用稻草打地铺。但大家以苦为荣，还津津东道地评价说：这稻草铺并不比弹簧床差到哪里去！次日大早起床，就集合跑步到潘家湾稻田水沟里舀冰冷的水洗脸、漱口。面对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现实，我们彼此之间做鬼脸，开玩笑称：新鲜味呐！当时大家想的是抗日救国，因此，早就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现在回想起来，“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字字千斤，真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法宝。第三个“下马威”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这群在南洋自由惯了的海外“游子”，一下子从老百姓变成军人。要成为真正的军人，得投入严格而紧张的军事训练。军训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开始，非常刻板，大家都不太感兴趣。接下讲军事课，如战略技术、安全常识、伤员抢救及自救和防空知识等。记得教官说，碰上敌机空袭投弹时，应立即卧倒，两手曲臂放在胸前，撑胸离地面，同时张开口，这对于炸弹在附近爆炸，可以三防：一防被弹片杀伤，二防地面震伤心脏，三防声浪震聋耳朵。起初，我们讨厌军训，认为搞训练没啥用。但没料到，军训竟派上用场。有一次，我开车到腊戍火车站装货时，突遇日本飞机空袭，我立即跳下车，冲向田坎趴下，按防空要领去做。敌机炸弹就在身边轰隆一声巨响，多少“弹片”往我身上落下，我以为这下子可完了，但镇静一下，分明还活着，原来满身覆盖着的是泥巴。我庆幸自己按防空要领去做，确实好用，安全无恙。我领悟到，军事科学知识确实有用。后来，我曾在重庆亲眼看到防空洞闷死数万人的特大惨景，罪过当然是日寇的狂轰滥炸，但是当场的人们如果多掌握有关防空的科学知识，也许可以减少损失。

功果桥与惠通桥是滇缅公路上最重要的咽喉。为了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减少损失，守桥部队在桥头悬崖上挂上红灯笼报警：挂一盏灯笼，预示敌机将来空袭；挂两盏灯笼，告知敌机已临上空；挂三盏灯笼，则警告敌机正在空袭。同时，守桥部队配备高射炮，严阵以待，以阻击敌机，保卫大桥。

1940年10月，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由安南河风频繁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的重要桥梁——功果、惠通两桥进行重点轰炸。

同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分队驾驶着15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从保山返回下关，途经功果桥时即遇到敌机空袭。我开第一辆，刚行驶到桥头，宪兵阻止前进，我看到已挂两个红灯笼了，立即跳下车。猫着腰钻进路边石崖下凿好的防空洞。霎时，功果桥那边由远而近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短暂间歇之后炸声又响。原来是敌机27架分三批轮番轰炸，炸弹爆炸溅起水柱高达几丈，连江中的鱼也被炸死，翻起白肚浮在水面上。功果桥终于不幸被炸中了，桥身一边的铁索断了，整个桥面吊板往下坠。江两边的汽车也有被炸坏的，我那一辆的车头盖板亦被弹片射穿。

这次空袭，造成桥断，江两边堵塞的几百辆车子，排成了长龙。机工们十分焦急，个个义愤填鹰，切齿痛骂日本强盗。为了尽快设法抢修功果桥，机工们与桥工们积极出谋献策，联想到橡皮艇打气在水中漂起来的浮力原理，提出利用空油桶供替浮船使用。这个临时抢修渡江的施工办法很快决定下来了。同胞们个个奋勇，齐心协力，投入这场紧张的战斗，出现了一个沸腾紧张、激动人心的场面。保山汽车运输分处马上作出反映，派了一个伙食团赶来支援。

南侨机工和当地桥工连夜突击抢修，从附近仓库征集了几百只空油桶和大批板材，用钢索结，捆成一只长方形大浮船，上铺木板，船两头用钢丝绳拉到两岸的滑轮上，由两岸汽车轮流对拉钢丝绳，浮船便来回把两岸的汽车送过江。前后仅花几小时便可通车了。这确实是一大奇迹。起初，每次只拉一辆车，太慢了。随即进行改装，多搞几个浮船，连成浮桥，汽车通行就快了。为了防止敌机，浮桥还搞成活动式的，空袭时可将浮桥左右分开，隐蔽于两岸树木划丛之下，避免暴露目标。欲通车时，再拉出来连成一条浮桥。敌机炸断功果桥那天，日本电台曾幸灾乐祸地广播：“功果桥已被炸断，滇缅公路国际孔道，三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可是，日本侵略者哪里知道，南侨机工个个是英雄汉。他们都有颗火热的爱国心，用火热的心筑成的运输线，是炸不断的。

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铭记着追悼符气籫烈士的情景：符气籫是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在国立暨南大学肆业后，曾任上海公安局督察，后来返回南洋，曾任麻坡中华公学教员、新加坡育英中学教员。1939年，他是第四批机工团秘书，回国后任西南运输处第13队大队补充队少尉分队长。在拯救民族危难中，他一贯服务勤恳，工作出色，深为南侨机工战友所敬重，却不幸于同年11月在云南永平境内翻车殉职。

云南永平县筹赈会及各侨团的侨胞，特选定在1940年“五·九”国耻纪念日，为符气籫烈士举行追悼会。十四个侨团侨校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了追悼会，巴罗益群学校铜乐队吹奏哀乐，有关人士致了悼词。符气籫烈士73高龄的父亲符振弟老先生专程从南洋回国参加追悼会，他在致词中大声疾呼：“余生二子，俱为国牺牲，余希望各位侨胞应以国家为重，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工作，出钱出力，打倒日寇，打倒汉奸汪精卫，争取民族的自由……”与会者对符老先生的爱国热情深表钦仰，纷纷表示，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

“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这成为三千南侨机工的共同誓言与行动准绳，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镌铸了这一顶天立地的誓言，谱写了海外赤子的不朽篇章！

南侨机工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上，不仅是抢运军事物资，有时还得执行特殊任务。下面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邓文聪讲述的一段经历：

“1940年10月，我被抽调到新组成的运输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运钞票。队长是李卫民（南侨机工），驾驶员都是从各大队调来的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技术的尖子。汽车也都是崭新的道奇牌，车厢是经过改装的，像冷冻车一样封闭着。

“车队运载钞票的行动似乎很神秘，当我们开到新腊戍仓库里装车时，见到民工队在荷枪实弹武装人员的严密督察下，将一箱箱钞票搬上车，清点完毕，立即严封起来，每辆车都配备武装警士随车押送。早晨，我们从新腊戍出发，当晚到达我国边境小镇遮放，停车场戒备森严。我到附近的馆子里吃过饭，夜里就睡在驾驶室里。沿途经过保山、下关、楚雄等地，亦都食宿在车上。第五天即到达昆明。卸车时，亦是武装人员如临大敌，逐一清点核对。卸车之后，我们当晚到西南运输处报到，然后很快装上一批出口物资，诸如桐油、水银、钨砂之类，于第二天大清早启程回运，再经五天才返回新腊戊。每趟来回历时10天。我一共执行五次特殊任务，都顺利地完成，然后回国到第13大队继续抢运军用物资。”

据邓文聪回忆，他是1939年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的，在昆明短期军训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起初在遮放至保山地段，后在曼德礼到畹町段运输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还接送过许多新组装的各式卡车。当时，任务紧迫，不管多苦多累，他都争先接受，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枪林弹雨的考验中，他的驾驶技术越来越高，滇缅公路上再险再难也阻挡不了。由于他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因此被选调执行上述的特殊任务。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从事军事运输，人人要闯过三个严峻的生死关——险路关、瘴疟关及敌机空袭关。此外，还有一个无形关口随时在考验着，那就是能否有自觉性、纪律性、责任心和警惕性。若稍许松懈，马虎了事，那可就要出大漏子，或者坐牢，甚至送掉老命。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见图98）谈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是参加第五批机工回国的，分配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说起我在滇缅公路的惊险经历，尽管山路险峻，却被我一一战胜，化险为夷；倒是一次被指责为丢失一箱子弹的惊险风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0年春，我任分队长。有一次，负责带领六辆载着子弹的车队由保山来昆明。当车子开到楚雄时，队里张启麟的车子掉进路边沟里去，进退两难。如果等待下关救济车前来救援，也许还得等一两天。六车弹药在此荒山野岭过夜，万一出事可不得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将掉进沟底的那车子弹，平均分摊加到另外五辆车上，超载赶路，只留下一人看守着空车等待救援。

当我们五辆满载子弹的车队赶到昆明大板桥军用仓库卸货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清点弹药箱的人员突然说：子弹少了一箱。这还了得！我们早听说过，已经发生过因丢失子弹而被判坐牢的先例，横祸怎么突然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可真令人不寒而栗。我再三回忆，这次发出一路上够小心的了，连在楚雄盘移装箱时也格外谨慎，那箱子弹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再仔细地清点一遍，还是少了一箱。这可急煞人，但光着急又有何用？只有冷静地思考：从出库、上路、过夜到这里进库，都没有任何疏漏，会不会是卸货搬移时放错了地方，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警觉起来，立即找仓库负责人说明经过，然后继续里里外外仔细侦察，终于惊奇地发现仓库那边垒得整整齐齐的弹箱上面，高出了一箱，会不会正是这箱？然而，是这一箱又该有什么根据呢？当我走近认真察看，心中有数了，这一箱果然是我们的。仓库负责人问，弹箱都一模一样，怎么能说这箱是你们的呢？我请他仔细看：仓库原来的弹箱面上都有一层灰尘，唯独上面这箱无灰尘，与我们新运进来的一样，正说明这一箱就是我们的。他信服地点点头。我理直气壮地把这箱搬了过来，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此后，我们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都保持了更高的警惕性和责任心。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历史事迹，日益受到海内外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院等特派人赴各地征集南侨机工历史文物，将这批珍贵的华侨史料作为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开辟专题进行展览，南侨机工联谊会的老同志，都把此事记挂在心，常说：翻箱倒柜发现当年实物史料，要赶快献出来。

不久前的一天，罗开瑚老人送来一件毛毯，展现在云南机工联谊会诸老面前：

毛毯呈灰色，上面有黑条格子，已经破破烂烂，四边的须条已磨掉了。当中破烂处，补上一块块方形、矩形的白布、针脚整齐。但由于年久月深，整件毛毯已磨得稀薄，到处穿洞，补不胜补了。

在场的老机工看了之后，异口同声地说：“这确实是当年陈嘉庚、南侨总会赠送给南侨机工的毛毯！”

“对！我领到的也是这样的！”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说。我则好奇地问：“罗老，你是怎样保管到现在的？”

罗开瑚老人笑着说：“它，已经陪伴我五十多个春秋了。”接着，他满有兴致地讲述这条毛毯的特别经历：

“1939年，我参加第八批机工回国。从长年如夏的南洋热带地区，一下子来到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很大的横断山脉高山地带，身体一时感到不适，时常感冒。正当我为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发愁之时，陈嘉庚、南侨总会及时送来一批慰问品，其中就有寒衣和毛毯。这条毛毯质量很好，我一见就非常喜欢。从此，我开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每逢风雨交加，特别是霜雪袭人严寒之夜，这条毛毯给我带来了无限温暖。如果没有它，我恐怕早就冻坏了。我深感陈嘉庚先生与南侨总会考虑得周到，也很实用。这件普通的毛毯，在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宝贝。我把它装在提包里，随车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1942年，我们车队奉命到仰光抢运，当时局势很紧张，日寇飞机日夜来空袭。由于那里没有防空洞，警报一拉响，人们只好跑进一座坚固的大厦里。这是一座政府办公大楼，钢筋水泥建筑，估计机枪射不穿，炸弹炸不跨。每次跑警报，我都提起装着毛毯的提包一齐跑，有时就在那座楼里睡觉。记得那天晚上刚躺下不久，突然有人催促大家起来，说日军已到郊区，新公路已断，只能走老公路，马上出发。我连忙将这毛毯提包带上车，与一位机工战友轮番驾驶着一辆军用卡车快速撤退。那位机工驾车过一座小桥时，不慎翻了车。我幸亏紧紧抱着毛毯提包，翻车时头部撞在毛毯上，安然无恙，而那个战友却负了重伤不得不留下住医院。我提起救命的毛毯，又搭乘另一机工的车脱险回国，而那留在医院的战友后来却被日寇杀害了。据说日寇屠杀南侨机工时，不问青红皂白，只看你风吹日晒的黝黑脸庞，如果额头上有一条因戴军帽而留下的白色皮肤，便立即枪杀。因为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更加珍惜它——南侨总会赠送的毛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可算步入‘小康’了，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或有关家具，也都不断进行‘更新换代’了，可是，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把这件毛毯扔掉，我把它装进皮箱置于衣柜里，因为它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这次把它捐献出来，一来是响应捐赠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号召，二来我想，我迟早是要去见陈嘉庚老先生的，故先与毛毯老伙伴告别，把它送往该去的地方——历史博物馆，这样算来，我俩就各得其所了。”

战后留居在昆明的南侨机工汤耀荣，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就英年早逝，可是认识他的人们仍在怀念他！

**悄悄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南洋。为拯救民族危难，汤耀荣恨不得马上奔赴抗日前线，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境。可是，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庚好友回国参战，自己却没能报名。这到底为什么呢？原来他不忍心辞别无依无靠的年迈祖母。

汤耀荣原籍广东南海，三岁之时由母亲带往南洋，寻找在槟城谋生的父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病灾袭来，父母不幸相继病逝，小小年纪的他成为孤儿，幸得靠老祖母抚养成长。家庭的不幸变故，生活的艰辛磨炼，使小汤比同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汤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由于他刻苦耐劳，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一手熟练的机修技术，十几岁就以熟练的修车技术远近闻名，二十出头就当了师傅招收学徒。他一向尊敬祖母，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之时，孝顺之心与日俱增，在南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服务团时，他多么愿意把自己的开车与修车技术报效于祖国。但是，一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祖母需自己来伺候，他就不忍心断然离开这相依为命的老人家。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到了第九批时，听说这是最后一批了，再踌躇就报国无门了。怎么办呢？他悄悄地走了三步“暗棋”：（1）悄悄地筹赈会补办报名手续，并特别交代不能公开登报宣扬，以免让亲友们知道。（2）悄悄地向几位好友与徒弟谈了心里话，请他们今后多关照老祖母，预计两年之后就胜利归来。（3）悄悄地写下一封敬请祖母原谅的信，准备在启程前才留给老人家。启程那天，他天未亮就悄悄地出了家门。忽然心酸起来，转身跪在大门口，长叹地说：“奶奶，忠孝不能两全，原谅我吧！”说完，悲郁地踏上了征途。

**熟练地修车**

回到祖国大西南，汤耀荣被分配当机修技术员。由于他有高超的技术，颇受机工战友们的欢迎。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回来个王文松，槟城回来个汤耀荣。在遮放，汤耀荣与伙伴们投入紧张的抢修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上级的表扬。对于汤耀荣的修车技术和为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居在昆明的南侨老机工许年回忆说：“1939年秋，我与汤耀荣同在西南运输处第10大队，后来编为华侨先锋大队，我任第二中队的班长，负责督促全班车子的检修。有时候修理工解决不了，就去找汤技术员，经他检查、指点之后，原以为难以排除的故障，很快就能解决。当时，找他的人很多，从10大队到华侨先锋队，可说无人不识汤耀荣。因为找到他，再难的机修问题，都可以迎丸而解。”

**巧妙地撤退**

1942年，日军经泰国拦腰插入缅甸，局势紧张，汤耀荣与许年、朱松胜（见图100）奉命一起开车撤退。为了避免新车及汽油，弹药落入敌寇之手，他们还肩负了破坏汽油库等特殊战斗。他们先猛力挥动长柄大斧头砍破汽油桶，让汽油流出来之后，再开车撤退到一段距离，然后回头开枪射击，结果一打就燃烧起来。当他们巧妙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之后，随即沿着滇缅公路撤至惠通桥。此时，桥的两边已布满炸药包，守桥工兵已将炸药引线安装完毕，情况十分危急。汤耀荣果断地与战友火速地通过惠通桥。闯过不久，惠通桥就引爆炸断了。后来，机工队伍被解散了，汤耀荣才与战友们分了手。

**默默地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汤耀荣调到云南汽车运输公司当驾驶员。他善于总结保养引擎的经验，总结了十条，在公司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据他女儿汤晓梅珍藏的1953年云南省生产竞赛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手册》有一文：《公司一级劳模汤耀荣——创引擎行驶里程新纪录》，专门记述他创造木炭车行驶里程的新纪录，超过中央指标175.66%的先进事迹。

汤耀荣保持与发扬了南侨机工的光荣传统和干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他常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要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他说到做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他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被送入医院，终于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仅四十来岁。上手术台前，他说：“我回国抗日，青春无悔，遗憾的是未能最后再见祖母一面！”

南侨机工史料选

1937

* 7月7日 -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 8月13日 - “八·一三淞沪抗战”。事变当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元电，翌日发出寒电，呼吁全世界华侨紧急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
* 8月15日 - 新加坡华侨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
* 8月24日 - 云南省主席龙云赴南京参加国防高级军政人员紧急大会，从抗战时局发展的需要出发，首次提出即刻着手修筑滇缅公路的建议，为国民政府当局所采纳。
* 10月 -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属准军事机构，在国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新加坡、仰光、河内、香港等地设有分处，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该处主任，后由宋子良接替。（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大部分编入西南运输处从事抗战军事运输工作）。
* 11月20日 -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称为陪都）。
* 12月13日 - 南京沦陷。日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达一个多月，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消息传开，激起海外侨胞的极大民族义愤。

1938

* 元月 - 滇缅公路西段开始动工修筑。

**【按：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戌，全长1146公里（中国境内960公里，由畹町至腊戌186公里）。全线分东西两段，东段从昆明至下关，长412公里，原是中缅交通骡马古道（俗称“毛路”），1935年由云南省政府改为公路；西段由下关经保山、芒市至畹町，仅有缅甸华侨梁金山1933年出资修建的惠通桥（吊桥）及一些毛路，此时应抗战急需而动工赶修公路，该段长548公里，仅8个月即竣工。】**

* 8月 -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建成试通车，全长960公里。
* 9月 - 由于日寇进攻广州，西南运输处由广州迁至昆明。
* 10月10日 - 南洋各属45埠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八百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作后盾。
* 10月27日 -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来“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尽管会议的当然主席汪精卫“议长”饰词狡辩，但大会仍以大多数赞成而通过这一提案（惟将文字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名记者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评论说：“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

* 1月10日 - 滇缅公路正式宣布全线通车。
* 年初 - 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还特派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专程南往新加坡向陈主席面商事宜。
* 2月7日 - 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
* 2月10日 - 新加坡机器行响应南侨总会号召，特发出通告：“窃思我星岛机工不少忠贞爱国之士，具此两项技能者，实繁有徒。际兹国族凌夷之日，正好男儿报国之时，况吾侪平时每感向往有心，请缨无路者，对此国际需才孔亟，当可联袂而起为国服务，共肩民族复兴之责，以尽国民之天职也。本行为此特行通告，凡我机工同业，具有司机或修机之技能，而愿为国家服务者，请来本行报名，以便进行也。机工乎，良机勿失，盍早来乎！”
* 2月17日 - 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80人），并发表演讲：“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辛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
* 2月18日 - （农历除夕）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由新加坡搭乘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启程回国。这批机工是由新加坡（32人，白清泉为领队）和峇株巴辖（48人，廖国雄为领队）两地机工合计80名组成，即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遣送的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 2月22日 - 陈嘉庚致函各埠筹赈会征募机工并随函附送《组织法及其手续》及《登记表与介绍书》。

|  |
| --- |
| **《司机回国服务之组织法及其手续》**  **甲、组织**  **一、每队以五十名为限（如不足队数可来星洲凑足之）。**  **二、 队内举正副领队各一人，文书一人，财政一人，宣传一人，负责管理全队事务。**  **三、 正副领队须具有相当学识及判断能力、服务精神者，方可领导全队为国努力。**  **四、 队员训练须注重忠诚为国、肯牺牲、能耐苦、有恒心等精神教育。**    **乙、手续**  **一、每名队员须拍照像八张，两张贴于入队登记表（一表存于当地机关，一表交新加坡西南运输公司，转缴国内运输处），三张贴于护照，另三张用于华侨登记证（如已有华侨登记证者可免）。**  **二、各埠队员来星之前，（一）须先派人将名单登记表及护照应用之照片等，先于五日内来星办理；（二）并于事先十日内通知总会，以便向中国旅行社接洽船期。**  **三、回国航线概由安南河内登岸再转祖国，旅费以散舱票及火车输送，约费叻币五十五元，另队员每名给予需用五元，制服一套，雨衣一套，御寒卫生衣一领，牙刷、嗽口杯、毛毯、面巾各一件，约合叻币计八十元左右（由内地来星火车费概不计在内）。**    **丙、本队之简则**  **一、须具有熟练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者。**  **二、须体魄健全略识中国文字。**  **三、须热诚爱国具有牺牲精神者。**  **四、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  **五、无不良嗜好如烟酒等类。**  **六、须有相当店铺代为介绍。**  **七、每埠暂以□□名为限。**  **八、旅费悉由各埠机关负责供应。** |

* 3月13日 - 第二批南侨机工207人搭乘丰庆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钟运熙为总领队。
* 3月27日 - 第三批南侨机工594人搭乘丰平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刘贝锦为总领队。
* 4月5日 - 由于接到昆明西南运输处来电，第四批部分机工决定经仰光入滇，以便他们到缅北筹设机厂及在仰光装新车。由仰光登岸的机工（首批）一行于5日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黄锦坤为总领队。
* 4月10日 - 第四批经安南入滇的机工一行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连文瀛为总领队。
* 5月22日 - 第五批南侨机工5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钟椿祥（五峰）为总领队。
* 6月19日 - 第六批南侨机工124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经安南入滇，叶子英为总领队。
* 7月3日 - 第七批南侨机工11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平轮启程，经安南入滇，廖萍为总领队。
* 7月16日 - 第八批南侨机工3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黄景镇为总领队。
* 8月9日 - 陈嘉庚主席派出南侨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回国视察机工生活并考察滇缅公路与运输情况。随行的还有《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张楚琨与陈戈丁。
* 8月14日 - 第九批南侨机工50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
* 10-12月 - 一批南侨机工参加南宁战役、昆仑关战役的火线军运工作。
* 12月 - 南侨总会为改善南侨机工生活待遇，购置了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慰问品，平均每个机工可得九件，于12月底备齐送至昆明。据了解，部分南侨机工未能如数或领不到应得的慰问品。

1940

* 2月1日 - “华侨机工互助社”在昆明成立，直属西南运输处，社长由宋子良兼任。
* 3月 -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并两处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
* 3月 - 西南运输处组织“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该大队人员200多名，除了大队部的会计、政训员和各队的炊事员外，全部是南侨机工，刘贝锦（麻坡华侨）任大队长。
* 4月12日 - 下午9时许，遮放军火仓库发生强烈大爆炸。其时，经南侨机工从滇缅公路抢运的军火物资已积存日多，仓库暴满，4月初又遇交通部运来筑路用的烈性炸药数百吨堆放在露天，突于是日发生爆炸，守库员工和附近居民被炸死伤者为数众多，损失惨重。
* 4月26日 - 南侨机工代表张达等三十人前往慰劳八路军负伤将士，并在《新华日报》公布发表华侨机工《慰问八路军负伤将士》的慰问信。
* 7月16日 - “华侨运输先锋第二大队”正式成立，詹忠浩任大队长，连文瀛（莆田籍南侨机工）任副大队长。
* 7月18日 - 英国执行绥靖政策，在东京签订英、日协定，关闭了滇缅公路的缅甸段通道。
* 10月18日 - 滇缅公路关闭三个月（1940.7.18---10.18）之后，重新开放。
* 10月 - 日寇仅占安南之后，专门组成“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以河内机场为基地，重点轰炸滇缅公路。据不完全的统计，自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1940.10.18），至日军入侵缅甸前，日机共出动60批639架次，还有29批架数不详，对云南各交通要道进行狂轰滥炸。仅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惠通桥和功果桥，就各遭炸坏20次以上。
* 11月底至12月初 - 陈嘉庚在结束“南侨慰劳团”考察工作后，不顾劳累，亲自再沿着滇缅公路进行视察并慰劳南侨机工。同行的有李铁民、庄明理以及交通部的二位工程师。陈嘉庚对改善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
* 12月中旬 - 陈嘉庚视察滇缅公路后到达仰光，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的代表，交涉实施滇缅公路等事宜。

1941

* 1月 - “皖南事变”发生，在国内外引起强大反响，各地华侨掀起了反对分裂摩擦运动。
* 2月5日 - 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
* 3月 - 南侨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嘉庚再次被选为主席，庄西言、杨启泰为副主席。大会特发出包括改善管理滇缅公路在内等九项通电。
* 11月 - 西南运输处被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简称“中缅运输总局”），由军委会后勤总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局长。
* 12月8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电林森、蒋介石请迅即对日正式宣战，以示与英、美、澳及其他同盟国共同对敌。

1942

* 1月14日 - 中国国民政府令第5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从此时起，由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陆续进入缅甸对日军作战。南侨机工奉派运送远征军入缅。
* 2月 - 新加坡沦陷，陈嘉庚辗转避难于印尼玛琅等地，前后长达三年多（1942.2 - 1945.10）。在避难期间，陈嘉庚冒着日寇搜捕的危险，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以惊人的记忆力，写出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
* 3月8日 - 日军占领仰光。
* 4月30日 - 滇缅公路缅甸境内段终点站腊戌沦陷。
* 5月3日 - 日寇攻入云南国门畹町，并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
* 5月5日 - 中午 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怒江咽喉---惠通桥。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止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断绝了。
* 8月 - 滇缅公路主管部门三易其主，“中缅运输总局”又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滇缅公路运输局”。南侨机工竟被裁员，生活陷入困境。
* 8月 - 盟军在昆明招收第一批南侨机工50人，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工作，李卫民任领队。
* 12月15日 -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救济回国华侨机工》，陈述华侨机工失业流浪的悲惨处境，要求政府救济机关及赈济团体，应该认真地使归国侨胞各得其所，万万不能敷衍了事，推诿延迟。

1943

* 年初 - 又一批南侨机工（200人）奉盟军派遣，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
* 5月 -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组成敌后工作队，由林谋盛、庄惠泉负责，隶属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统辖的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日占区从事地下抗敌工作。部分南侨机工参加一三六部队。后林谋盛在马来亚被日寇逮捕，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44

* 1月20日 - “云南华侨互助会”假昆明福建会馆举行成立大会，推举侯西反为理事长，理事会下设总务、文书、救济、交际、教育、设计、调查、编辑等八个组。该华侨互助会着重于收容失业南侨机工及救济难民等。经侯西反呼吁，得到有关单位和人士同情，拨款50万元救济难侨。
* 2月 - 贵州交通公路总局运输人员训练所设立“华侨机工整训班”，收容华侨机工110余人。维持至年底，该训练班被撤销。
* 4月 - 盟军总部从南侨机工中选调部分精干人员，派遣潜往东南亚日敌占区从事地下抗日情报工作。南侨机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
* 11月10日 - 南侨总会常委、云南华侨互助会理事长侯西反，为救济南侨机工事，由渝飞滇，不幸在昆明市东郊九门里坠机罹难。

1945

* 1月4日 - 我军攻克畹町，收复滇西失地，打通滇缅公路。
* 1月27日 - 滇西中国军队攻克芒友，与缅北的中国远征军会师，中断两年多的中缅印公路恢复贯通。
* 8月15日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亲身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与国内各地民众一起欢庆胜利，狂欢达旦。
* 9月至10月 - 抗战刚一结束，为南侨机工复员事，庄明理曾向政府当局提出八项要求：

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

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

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

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

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

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

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可作为奖励，另一方面可作为南返生活费；

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该提议经侨务部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即席通过。但迟迟未能得到落实解决。

* 10月至11月 - 10月6日，陈嘉庚结束避难生涯（1942.2----1945.10），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各界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赠送条幅，赞扬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6

* 1月至2月 - 南侨机工进行复员名册总登记，计登记1203人，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服务证书的实为1114人。
* 3月 - 华侨互助会特派常务理事白清泉、总干事邱新民携带总登记后的华侨机工名册前往重庆交涉办理复员事宜。
* 5月 - 华侨互助会派了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龙历文等“四机工”代表前往新加坡交涉办理复员之事。
* 6月初 -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雪兰莪福建会馆举行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初步联席会议，商议机工复员之事。
* 6月16日 - 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陈嘉庚任会议主席。会议作出5条议决，协助解决机工南返。
* 6月19日 - 陈嘉庚、庄明理、陈可用、蔡伯祥与何炽祥等5位代表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机工南返的三点具体办法，伍总领事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 8月30日 - 陈嘉庚再次致函伍伯胜，指出“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
* 10月 - 经过多方交涉，特别是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和云南华侨互助会的努力，战后拖延了一年多的南侨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民发出通告，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200元，分别在重庆侨委会办事处、昆明侨务处及贵阳侨委会登记站分发。
* 10月至11月 - 南侨机工胜利复员南返。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以昆明为“大本营”，抗战胜利后机工复员也是轰动昆明的大事，云南各界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并向全体机工赠送了“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1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11月29日启程。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据不完全的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这一壮举，总算有始有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华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    ＊

* 1955年11月 - 陈嘉庚在庄明理、张楚琨等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南侨机工。看到留居西南的南侨机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已安居乐业，陈嘉庚甚感欣慰。
* 1986年9月3日 - “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在昆明成立，推选杨保华、王亚六为正、副理事长，邓文聪为秘书长。
* 同年11月4日至14日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嘉庚之侄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公路访问南侨机工。在此期间，陈共存、庄明理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等商议在昆明建立“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事宜。
* 1989年7月7日 - 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在海内外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建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赤子功勋”，这是对南侨机工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历史评价与高度赞誉。

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服务机工名册

**逐一核实，恢复了按原始档案的机工名单顺序排列，并对《侨务志》中机工名册的若干错漏（上百处）作了补正。各批机工档案名单之后所附的带队任职职务，是根据当时《南洋商报》公布的名单。本名册可说是迄今为止综合海内外最完整的南侨机工名册，但仍难免有缺漏，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便补充。】**

* 于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人数，据《星洲十年》一书所刊录，1939年共分九批回国，总数达3192名，这个数字是历来被普遍接受的，兹将统计数字列表如下：

南侨机工档案选编

案奉主座二十七年十二月渝艳代电第六项内开 ：华侨如有志愿回国驾驶汽车者，应尽量罗致。等因。遵与本埠华侨筹赈会几经洽商 兹由该会派送第一批回国司机六十八名，修车机工十二名，共八十名，由廖国雄、白清泉率领，于本月十八日由新加坡启程，经海防转昆明赴钧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查该司机、机工等均系身世清白，意志纯洁。所有回国旅费均由当地筹赈会供给，服务待遇，暂由筹赈会规定各月给国币叁拾元，自在新上船日起算，此后视服务成绩再行酌加。理合开列全体名单，备文交该司机等，赍呈钧处，谨祈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附名单一纸（略）

新嘉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陈嘉庚叩。蒸。印。

径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计有二百0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由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个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亦愿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他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佰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新加坡译转陈嘉庚先生勋鉴：蒸电敬悉。先生领导侨胞热心救国，薄海同钦。此次协助本处罗致修驶员回国服务，充实抗战力量，尤深感佩。续募人员起程日期仍乞电示。谨电申谢，请祈察照。宋子良叩。寒。滇。

香港宋主任：心密。兹接陈嘉庚先生致钧座蒸电开：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等语。除复电致谢外，谨电钧察。弟遂、琢叩。寒。滇路车。印。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寒电悉。第三批四百多名感日可起程。贵处应需驾驶车修机修电池各若干名，乞电示，庚当积极鼓励精熟工手志愿投效者急往。陈嘉庚。铣。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鉴：铣电奉悉。查司机除第一二三批外，请再添招驶车300名，修机工100名，修电工30名为荷。弟宋子良。马。印。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马电悉。第三批五百八十名决感（甘七）日往。第四批一百五十名，可再往否？此次募一千名，乃陈质平君所诺，如何？急电复。陈嘉庚。梗。印。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梗电敬悉。第四批仍请派来，马电请续招机工100名、电工30名，并请速募，径赴仰光与陈质平接洽。弟宋子良。有。印。

顷接筹赈总会陈主席嘉庚来函开：本会此次派遣第三批机工计五百九十四名，业经于本日上午乘轮赴越转昆，内中有印籍王亚能一名，系第二批机工，因手续关系，故延至此次始行参加，敢请贵公司迅即航邮呈报昆明运输处。等由。准此，查第三批机工回事事宜，已于昨日备文交机工带呈钧处在案。查该印籍司机投效，业经婉谢，此次该会又再派送，实难坚拒，拟请钧处准予录用，理合呈请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查奉命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业已先后遣派三批经越转昆赴钧处报到在案。兹因仰光分处急需机工，屡电函催请去仰。第四批机工决改经缅甸回国。第五批机工约一百六十余名，约于本月十日起程，仍经越赴昆。前奉主座梗日港秘第五七二0号代电节开：“据河内分处呈，以机工经河内因食宿不便，车辆缺乏，请饬每次以五十名为限等情。仰即知照，并婉请筹赈会照办”等因。当即函请筹赈总会知照。惟该会以第五批机工定期回国，已请星埠总领事馆并托中国旅行社将一切过境及轮车票等手续办妥，并已函托越领馆及旅行社照料，一切可无问题，决按期起行。待离星时再行详呈。查第四批机工，为便得起见，分由星、槟两地于四月六、七两日先后登丰庆轮起程，经缅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其中星埠八十二名，吉隆坡一百余名，槟城一百六十余名，合共三百五十余名。计机电及修补车胎技工共约百名以上，余均为司机。吉槟两地机工，因径在槟上轮，名单迄未送到，故确实人数尚未知悉。所有星缅船费仍由筹赈总会支给，每人并发给叻币十三元作为缅滇路费。至于薪金，仍照前三批所规定数额发给。理合将星埠机工名单乙份，寄呈鉴核备查。吉槟两地机工名单，待送到后再行呈奉。谨呈

总经理处

附星埠机工名单乙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昆明宋子良先生鉴：蒸日第一批赴仰修、驶各半，共三百四十四名。除星、仰船费外，另汇仰运输公司助滇缅旅费每名二十盾，计六千八百八十盾。特闻。陈嘉庚。元。

径启者：查本会所募机工共四批，统由安南入口外，另一批承仰光西南运输公司陈质平君嘱，专选修机者赴仰，经于本月十日由槟启航，计三百四十四名，因程途邻近关系，其中修驶各居其半，陈君请另补助由仰至滇一段旅费。经决定，每名助以缅币二十盾，共六千八百八十盾，即日由中国银行汇去。除电陈君外，经另电尊处告闻，想已达尊览矣。以上所有办理经过情形，相应函请查照并盼惠复。又，各地侨胞应募机工自愿投效者，仍风起云涌，如尚有所需，亦请电示，当代续募，俾资效用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总经理处钧鉴：查星洲华侨筹赈总会选送第四批司机、机工共三百四十四名，业于本月十二日乘丰祥轮抵仰，现暂寄此间华侨中学校。膳食由本处供给，计每名每日膳费缅币五安托，由商会代办。现腊戌、仰光两装车厂亟待开设，须工殷急，该项机工拟即留缅使用。业经电奉主座核准。其余司机等拟俟日内新车装竣一部分，即行驾驶入滇。复查该批司机等由星至仰船票、护照等费已由筹赈会代办。另由该会拨汇六千八百八十盾（每名二十盾），交由本处转发，以充自仰光赴滇旅费。届时如感不敷，拟由本处酌量资助，当否，理合检同该批司机、机工名册报请鉴核示遵。仰光分处。旱。

昆明总处：密。星侨司机等三百四十四名文（十二日）抵仰，内机工（150）名，奉准留缅庇余驾装竣新车回国。该员等抵滇后愿先受训。乞核夺。职平。巧。

据本处新加坡分处转来贵会三月十二日大函敬悉。贵处领导侨胞返国服务，增强抗战力量，热心爱国，良深感佩。此次承招修机人员王文松君等二百零七名，已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昆明，经送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编队，稍事训练，即行派任运输工作，相应奉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印

呈为呈报事。

查第四批机工共一百五十八名，由总领队连文瀛率领，于四月十日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所有一切详情，业经于四月十日坡发字第311号呈文呈报在案。兹有仰光第二批机工八人，宝于本月二十一日搭丰平轮经仰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总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邮呈寄钧处，敬祈鉴核备查。查职处委托筹赈会招募机工，先后已派送经昆四批，共计为一千零三十九人。又经仰转昆一批计为三百四十四人。此间现已停募，筹赈会以该工人等热心为国，又以人数不多，决予遣派，特将派送原因，一并呈明，敬备鉴查。谨呈

总经理处

海防宋主任钧鉴：密。寒港电敬悉。归国华侨司机待遇一律国币36元。除径复后勤部外，谨复。弟遂。哿。路车。

令新加坡分处。

呈悉。第三批技工已到昆入所训练 。印籍技工王亚能经予录取，仰转知录用。此令。

密。星洲司机过境，越政府以治安关系，每批不得多名。经迭电知照，闻本月将有五百名赴滇，西贡登陆转车及河内住宿均无办法，若有意外，职处不能负责。恳迅电星洲，务必分多批送来。（0011）。支。印。

新加坡分处陈处长：越政府限制大批司机过境，且在西贡登陆，转车河内住宿均无办法，嗣后务分多批送滇。（1111）。歌。滇总。印。

窃查第四批回国华侨（按：由安南入滇）一五八名，除五名点编时未到场，迄今亦不见来所，实到一五三名。经于四月二十日点编为第六大队第十七、十八队。第十七队七五名，第十八队七四名。内赖耀清等四名调教务科工作。原领队连文瀛、黄玉田、刘传授、符气簪等四名分别擢升为队附、分队长试用，以示激励而资熟手。又，刘金祥一名，有三十五岁及二十七岁者。已将后者改名为刘必成。以上各缘由，理合检呈各项名册，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第四批回国华侨花名册一份，第六大队新编第十七、十八两队学生花名册一份（略）

接奉大函，敬聆一是。查本处目前所有机工暂敷分配，容俟将来不足或须增补时自当电请再募。迭函贵会代募回国服务之华侨机工，技术俱臻优良，并能遵守纪律。现在各地侨胞复能踊跃自愿应募，足征热心祖国，国家大有可为。抑亦征诸先生之力不□此。本处令人感佩之余，并为国家前途庆幸。相应函复，籍布微悃，即烦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宋子良谨启

窃查第一、二批回国服务华侨编队情形业经呈报备案在案。至第三批回国服务华侨五百九十六名，除二名留星未来，二名半途潜逃外，实到五百九十二名。经于四月五日连同庇能返国机工三十一名合编为临时大队。第一队二百十一名、第二队二百零五名、第三队二百零六名，调编第六大队一名。旋以临时大队各队人数过众，管教困难，乃于四月十五日改编为第七、八大队。计第七大队二百二十一名，第八大队二百十一名。奉命遣赴腊戌工作者五十名，遣派各运输队工作者五十名，遣赴保山工作者三十四名，调属所教务科工作者二十七名，调路运组工作者一名。又于改编时先后潜逃□名。以上各生编调情形理合造具清册，备文呈报鉴核备案，指令祇遵。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十二册（略）

呈为呈报事。

前奉钧处本月歌电，饬将回国机工分批遣送，以免经越时发生困难，当即将该电抄送筹赈会查照办理，尚未得复。兹有筹赈会交来返国机工名单五百二十四人，定于今日下午二时乘丰庆轮经越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至于该批机工名单，本应交该批机工总领队钟五峰带呈钧处，以备鉴核，但因筹赈会送来名单乙份，势须暂留职处抄录后另行邮寄，理合呈明，敬祈鉴核。谨呈

主任、副主任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宋子良主任：第五批五百廿九名昨出发，经越，希准备。又，谢侠逊与征募机工无关。中央社电传昆明将开会欢迎，殊可异。陈嘉庚。漾。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一百十九名，除甘潭胜在下关失踪，郑昌因病留医腊戌，陈锦全（泉）病留保山外，实到一百十六名。经于五月十六日分编为第二十五、二十六二队实施训练。为此，附呈原来名册及编队名册各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又，萧学在一名，系随队前来，携有畹町分处乘车证，现着编入二十六队受训。理合一并陈明。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四本，乘车证一纸（略）

昆明宋子良先生：后方勤务部托招汽车司机二百名，修机可否兼收？电复。陈嘉庚。有。

桂林、贵阳探转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樵峰兄：准陈嘉庚电，以贵部托招司机200名，技工可否兼收？转请电示。弟，宋子良。宥。滇密。

宋子良先生：请复有电，修机兼收否？陈嘉庚。东。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有、东两电敬悉。俞部长复称：优良技工可兼收。弟宋子良。歌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本处经陈嘉庚先生介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先后到处者，计一、二、三、四、五批共1,397名。现第六批529名，不日又将到达。陈先生热心爱国，不辞劳苦，诚属难能可贵，拟恳钧座电令嘉奖，以励来兹。是否有当，敬候钧裁。职宋子良。有。

案查马来亚回国华侨一百零四名，除萧学在系于五月十六日随第五批侨生先到，并经派往路运组第十一大队工作。又，余亚三因病留医腊戌未来，林德和在腊戌奉调他处服务外，计实到学生一百零一名，经于本月二十三日编为第二十七队，理合抄呈编队名册一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乙份（略）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第一次到一百十六名，第二次到一百零一名，第三次到九十四名，均经分别呈报在案。查前因病未到学生陈锦泉已于五月十五日到所，编入廿六队受训。甘谭胜于五月廿六日到所，编入第廿五队受训；余亚三于五月廿七日到所。编入第廿七队受训；王家财、彭海于六月二日到所，编入第卅一队受训。理合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案查第六批【按：应为第五批】返国华侨计五百三十一名，经于五月三十日莅所。除李濂、李福霖、陈有儒、石毓才等四名，另女性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等三名因不谙技术，未予编队外，余分编为第廿九队，计百名，属第一大队。第三址队，计百名，属第二大队。第三十一队，计百名，属第五大队。第三十二队计九十八名，属第六大队。第三十三队六十二名；第三十四队六十二名，属第九大队。理合抄附名册六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附名册六份，共一帙（略）

西南运输处：虞滇路车电奉悉。承示华侨技工待遇与本部所定略同。除前托招收司机二百名外，请转恳陈嘉庚先生代为招收修理工四十名、电工十名。并赐复为祷。筑。俞飞鹏。已寒。管甲。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俞部长来电，除前请代招司机200名外，并托代招修理工40名，电工10名。请惠办电复。弟宋子良。筱。滇秘。

呈为呈报事。

兹由星洲筹赈会交来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机工116人，并声称该机工定于六月十九日下午乘丰平轮经越转昆，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赴钧处报到，再由钧座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另有学生七人同行赴昆。除另备呈介绍该生等晋谒钧座外，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该机工等带呈钧处，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主任、副主任

附后方勤务部所招机工名单一分（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昆明西南运输处：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皓搭丰平轮来越。陈嘉庚。

西南运输公司宋处长子良兄勋鉴：前奉委座三月感川侍参代电，抄交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并电示：如需用此类技士，可与宋子良商办可也。等因。当经转电各机关学校去后，兹据交通司案呈交通机械修造厂五月哿代电，附呈技士类别，数量、待遇简明表三份。等情。相应抄同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修造厂表二份，电请查代洽办理并见复为荷。渝。何应钦。巧。交汽。印。

抄附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

（衔略）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君托募驶汽车修机、修电计一千人，资送到昆明。经募足数，而热诚赴义之人尚多，未悉军用处有未需否？倘待遇可如昆明，各需若干人，由何处入口，抑仍宋君办理，乞电示。庚当鼓励应命。陈嘉庚叩。敬。

呈为呈报事。

查星洲筹赈会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一百十六人，已于六月十九日乘丰平轮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经越转昆前赴钧处报到。业经坡发字第585号呈文呈请钧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在案。兹由筹赈会送来代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一百一十七人，由总领队廖萍率领，定于今日下午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据筹委会声称：此次所招机工内，一部分为代后方勤务部所招，其余机工系代钧处所招。敬祈钧处于该批机工到昆后，即由钧处转咨后方勤务部将其所招机工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除电知海防分处给予照料外，理合备文并检同是批机工名单面呈钧处，敬乞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

附机工名单一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案查第七批【按：应为第六批】华桥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经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所，其中温贵华、陈文基、陈平波、王云锋、叶文来、苏邵耕、余学慈、古乾贤、李永炳等九名，原系归国投考大学者未予编队，其余一百十五名编为华侨第六队，隶属第六大队，理合抄附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 龚、吴、刘

附呈名册一份（略）

径启者：现本会征募之第八批机工三百四十名已于今日搭丰庆轮起程赴越返国。查此次机工具有特殊技能者计有两位。一为总领队黄景镇，一为槟城队田穗九。黄君在此间马来亚摩多车厂任技师职，月薪二百元，其人与前批王文松同一具有优良技能，今次亦弃职回去，请特予拔擢，以资鼓励。田君系热血男儿，富有机器电器常识，曾于广九铁路、粤汉铁路、香港汽车工厂、太古船厂、北婆罗洲火车工厂历任装置火车修整机器电机各职，经验丰富，皆有任职证明书以资验证。今激于爱国热诚，情愿弃职自备资斧返国服务。如此热诚，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此致

西南运输处处长宋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西南运输处：筱（17）由越第八批机工三百三十七名。陈嘉庚。巧。

窃查第七批华侨机工一百十七名，业于本（七）月十一日抵所，着由第六大队接编为华侨第七队，经由该批华侨领队廖萍交来新加坡分处嘱转呈钧处之坡字第六七四号一件，附名单一纸。籍悉该批华侨内一部分亦系后方勤务部请代招取者。除将名单抽存备为编队参对之用外，理合检同原呈一件暨编队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并恳转咨后方勤务部迅来接收，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新加坡分处原呈一件，编队名册一份（略）

径启者：本总会数月以来，募应祖国机工二千余名，原以责在征募，其他事项全未参与。乃其中有少数意志薄弱不堪部勒，竟复潜逃南返，以惧社会罪责，反而造谣惑众。浮言所及，难免影响续募。查此辈恶劣分子，有方在受训者，有甫出服务者，遽尔潜逃，深恐以后散遣各地工作，效尤更甚。又查滇缅公路，开辟未久，长途千里，设备容有未周。海外侨胞关怀祖国，对此抗战国际运输关注更切。为此种种，不能不作实际考查，俾得依据实情，公布侨众，以释疑虑，而利征召。用特遣派本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由仰回国，沿途考察滇缅公路一切运输设备状况，以至昆明访询运输管理待遇各情，回报本总会，籍资考镜。相应据情函请执事于刘君抵谒时，赐予面洽指导为荷！此致

陈质平先生

主席陈嘉庚

径启者：案查贵总处托募机工，除各批募往外，尚需一百七十名。兹经决定于本月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前来，其中尚加有百余名，原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要由仰光入口。此间认为长途跋涉不便，故概由安南入口。请贵总处兼收训练备用，就此批截止，以后贵总处无再委募，便不复遣派。其他军政部所委募候车各种机工尚欠数十名，待募足后再行遣派回国。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是荷。

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宋子良先生：寒赴越机工四百余名，希准备。陈嘉庚。蒸。

昆明宋主任子良兄：（2814）电敬悉。密。承代招华侨机工226名已于东日到筑，由本部汽车管理段点收编队，谨电奉复，并致谢忱。筑。弟俞飞鹏。未元。辁管甲。印。

径启者：此次军政部托募机工八十三名，截至今日止，仅募得□□名。兹列一单呈览。其他欠额待后续募。但能否足数，未敢预定。第九批返国机工（连同军政部所募在内）已情趣今日（十四日）乘丰庆轮首途由越北返，总计五百零九名。除贵处嘱募外，约加二百到三百名，此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因各处筹赈会事前多未来报，迨至近日始行参加，故其名额突涨。务希贵处尽量收纳，以应他处可也。至此批机工约有百余名，平昔系司机助手再加训练者，经验不甚丰富，论理不便派往。无知从外埠集合而来，且爱国热情可嘉，故特声明，请为注意训练。查蒸日曾电告此轮有四百余名，请预备一切，计邀台察。现此间对于征募机工事，若国内各机关无再来征募，从此已告一段落，实行结束矣。以上所有经过情形，相应备文函达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宋子良主任：寝日电悉。第九批508名请全收训。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300余名。陈嘉庚。俭。

径启者：昨由本坡西南运输公司转来台发寝电，询第九批机工五百名有无贸易委员会所募之额在内，曾立复一电云：寝电悉。第九批五百零八名请全收训。贸易委员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三百余名各情，计承察照。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六月间来函，托募五百名，由越南往广西明江受训。此间方着手征募，旋又来函嘱转由仰光前往，时适仰复兴商业公司亦来托募，系欲就地驶车入国。鄙人以入广西明江者，应由越南入境为宜。仰光路程遥远，长途跋涉需时耗费，诸多不便。终因其办法游移不定，故即取消。而将已募来者悉数遣赴贵处受训耳。仰复兴所募，计三百五十名左右，因到地立须工作，故所遣派皆为多年经验之工手，约九月尾可以全数派完。至本月止已往半数矣。敝处尚有半熟技手，再经训练毕业者二百名。其他有执照而富经验者，虽未来报，谅亦不少。如须征募，每月或一百名至二百名，大约必无难事，至少或可至三百名。未悉贵处尚有需要否，即希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由新加坡来昆第九批机工五百余名内，本为贸易委员会托代招募。惟该会现不愿接收，经本处询，准陈喜嘉庚先生电复：该第九批机工请全收容，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等由。准此，合亟令仰该所，即便将该批机工全部予以收容训练，仍将名册列报备查为要。此令。

案奉钧处滇路字第九零二六号训令，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函告第九批返国机工五零九名已首途返国，特饬知照。等因。复奉钧处转示海防分处马电开：“星机工五三八人马午由河内慢车到昆，请派接”。等由。奉此，职所当即从事准备，并逐日派员赴车站接候。兹该批机工已于八月二十三日到昆，经接运入所，计共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会托招之机工，曾经职所派员前往接洽，请其派员接收。该会以缺乏设备关系，未予接收。现由职所一并收容考核技术优劣，分别给以短期训练。奉令前因，理合将该第九批华侨机工回国入所情形备文呈请钧处鉴核备案，并请转函筹赈总会，人数已足，毋庸继续募送，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案准贵处滇路字第八七三四号公函，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来函，此次搭乘丰庆轮来华机工，内有百余名系本会托募，嘱于该项机工到达时派员前往贵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收等由。准此，查本会复兴公司前因驻缅运输工程处需要司机、机匠，经委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司机三百六十名、机匠四十名，共四百名，并应请随时分批送仰以便派赴工作，据报现已多批到达仰光各在案。此外，并无托募机工经安南来华之事，或恐系他机关所委托。除转函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陈主席外，相应函复 ，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

主任委员陈辉德、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卢作孚

案查前准贵会八月八日及十四日两函，以续募第九批华侨机工二百余名，及贸易委员会托募百余名，于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返国，嘱查照接收训练并转批各等由。当经令饬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遵照收容，并请贸易委员会派员届时赴所接收在案。兹据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呈报，该批机工于八月二十三日到昆，共计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员会托招之机工，该会以缺乏设备，未予接收，一并由所考核技术优劣，分别施以短期训练。请鉴核并转函筹赈会等情。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昆明宋处长：虞路车电敬悉。密。除饬交通机械修造厂克日派员前往接收外，特复并谢。渝。何应钦。马。交汽。印。

接准八月廿九日大函，详示代贸委会招募技工及取消情形，并以现在尚有半熟手及富有经验技工征募非难是否需要，嘱查照见复。等由。准此，查第九批技工到达后，业经本处遵嘱接收训练。现在各修车厂及运输车队机工均已满额，目前暂不需要补充，应请停止征募。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查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总队第十五大队已由运输人员训练所编组完成，并派杨碧湘为大队长，于十月一日正式组织成立，所辖两中队，已先于上月二十九日出发同登接运车辆。兹将该大队官佐士兵名册另行签报外，理合将该大队组织成立日期先行签报，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公路运输组兼组长吴琢之、副组长饶竞群

径启者：兹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自昆明函称：本队自星洲选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于八月廿三日抵昆明西南运输处人员训练所，瞬息两月余，尚未有派赴重庆消息，曾数次呈询本所长官，均复以须候重庆军政部派员接领。等语。本队以在所等候，遥遥无期，曾开会议决，由春呈函重庆军政部请示外，并请赐示进止办法，俾资遵循。等情前来。查该队既经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似应派赴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其回国服务之志。据函前情，未知为何延搁，相应据情转为函请查照，希即迅予遣派，前往重庆，以资国用。倘有其他缘由，应俟何日即得派出，亦希径告该 队，并即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径复者：十一月三日来函据称：到昆明已两月余，尚未奉派开赴重庆服务，请转函查询缘由等由。已悉。查此间已即日据情函请西南运输总处从速派往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矣。据函前由，相应函复查照为荷。此致

华侨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接准贵会十一月十九日领字第六一三号笺函，以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函告；该队留昆明运输人员训练所已两月余，尚无赴重庆消息。在所等候军政部派员接领，遥遥无期，请示进止办法等情。转嘱本处派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回国服务之志，并嘱将延搁情形见复等由。准此，当即令饬运输人员训练所查复并电军政部及军政部交通机械修理厂迅派员来昆接收各在案。兹据运输人员训练所呈称：查该队学生六十六名，云云。抄至——但该厂派员何日到达，尚难预卜，究应如何办理，迅赐核示。同时复准军政部机械修复厂函复略称：云云。照抄至——现已抵筑候车转昆等由。除指令训练所转知重庆队外，准函前由，相应函达，敬希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

窃职队第一批一行22名经定于今天下午动程赴星，第二批57名约迟数天亦可南返。至所余7名中，除黄华才一名因病留腊及陈荣、阮润松二名自动呈请留仰外，尚有许礼丰、福记、钟金水、李添福等四名因护照问题须较迟方得南返。又附队七名除贝友胜、詹行嶷、柯玉彬、郑大成四名径先回南。朱南粦今天亦随队南返。此外有苏振怀因病留医，吕金祥因护照未妥，故须稍待。惟该附队各员之船票护照等费概经职先行付与中国旅行社，是以特此具报，恳请钧长察核，准予第二批动程后，即着孙同志克镛回滇。至所余三批数名，因护照未能同行者，统祈代为办理遣送，俾节公费而利国家，是为公便。谨呈

仰光分处副处长陈

南洋队领队马牛呈

查第二批南返三十二人经奉批准南返，并派本社助干李卫民率领于四月一日首途，由仰光转口南返在案。诚恐沿途发生困难，敬希赐洽指导予以方便，或因特殊情形需要费用之援助者，得由该员陈明理由亦请准予酌借。相应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仰光分处

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互助社

窃职处于本月二十二日欢迎南侨慰问团参加车队检阅，业已马电简报在案。兹将是日欢迎情形及该团主席陈嘉庚、团长潘国渠、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演词另纸录呈。敬请钧察，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陈

附呈欢迎南侨慰问团记事乙纸、陈嘉庚等演词三纸、答词一纸

重庆分处处长汪英宾

本团此次回国慰劳抵渝，承蒙贵处两次热烈招待，前两天因时间关系未能与诸位谈话。至于说训话，实不敢当，不过有此机会需要与各位说两句。第一点要向各位提出报告的就是此次侨胞组织慰劳团之意义。本团五十余人系南洋各属一千二百万侨胞推选之代表，回国向各长官致敬，并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及后方努力抗建以及出钱出力诸同胞。二、去年二月间南侨方面得到宋主任函，知滇缅路完成通车在即，嘱代招侨胞返国服务，前后陆续自愿抛去原有的优美生活以及父母妻子，热烈返国参加抗战工作者已达三千余人，均系抱抗战热情而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无工作无办法借此返国而求生活者。而且前数批均系技术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及经验者。虽则后一二批略有少数经历差点的，而大多数的技术还是精良，惟对于军事训练较为缺少。因在海外生活安定，无所拘束，故在人数众多中难免无一二品行不端的分子夹杂在内。希望国内同胞决不可因少数不肖者影响到多数，对于侨胞便发生不良印象，那就决【绝】对错误了。要知道滇缅路在抗战时期各路国际线多被封锁之际，确为一最重要的国际路线，在该路中有数千尺以上之山岭，道路弯曲，徒坡特多，行车不易。服务此路者，若非有精良技术，特别胆量，决难负此重任。现在侨胞机工既有数年或十余年之丰富经验，胆量亦大，始有绝对的把握到滇缅路去服务，确属得当。故一年来成绩颇好。现在本人可以代表各华侨机工尚有数种要求。因为他们一向在国外，生活是很优美的，每月所得之金钱亦很多，回国是为抗战救国，决不是金钱的问题。所以要求国内管理者对于他们衣食住以及医药问题要特别注意。其次则为新闻报纸应多多的供给他们阅览。但是我提出者决不是过分的要求，是求其适当，就是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日工作，夜间可以安息，则他们工作自可发挥莫大的成绩。今天在贵处所看见的队伍，服装、排列、精神均极整肃，惟今日参加侨胞不多，我希望在滇缅路服务之多数侨胞都要与今天所看见的一样，我们要大家抱定爱国热心，努力完成抗建目的，以求达到最后胜利，则可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再有一点，希望各侨胞要知道我们中国是很贫穷的，此次回国我所知道的可向各侨胞报告。现在前方抗战士兵的生活是更苦，每月所得的只十元，除去六元伙食，只得四元。少尉官长亦只有二十八元。还有青年服务团团员多系国内外大学专门或高中毕业生到前方去服务，每月只有十五元。现在我们回国侨胞最少者都有三四十元，比较他们已经好多了。由此我们应认清国内对我们的待遇实在是提高不少。我们回国服务是为抗战，不是为金钱。所以我们收入只三五十元就应该节省，要抱刻苦耐劳的精神，不要浪费金钱。如果不知节省，就是三五百元亦属不够。总之，侨胞之回国服务，首先要看清，目标是抗战救国，民族复兴，不是来享福过优越生活的。再有一点报告，就是此次回国晤见冯玉祥先生问本人，此次对于战时首都的感想如何？后来晋谒蒋总裁时亦是同样的询问。当时我很诚恳的答复，本市市政建设种种均极满意，惟感觉有一缺点就是不问大卡车、小包车、黄包车等等多是不清洁，一方面既不卫生，一方面又不经济。我们知道，此项车辆多系用外汇购来，如果保养不得法，则机件易于损坏，寿命减短。希望负管理之责者，对于清洁保养应多加注意。外国城市里对于交通上如发现一部不清洁车辆就要立刻扣留，必要清洁者才准在路行驶。当蒙蒋总裁记下，近数日来重庆市内不清洁车辆已少发现。今天最后希望在此数十位侨胞将本人所说的转告贵处。其他三千侨胞都要抱定回国参战是为国家是为民族增加抗战力量而来，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来。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运输第十大队业经撤销，所有官佐士兵已饬向该所报到，薪饷至六月底止。仰即接收编为华侨运输先锋总队第二大队，自七月份发给薪饷。除分令外，仍仰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此令。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蒋委员长钧鉴：支庚两电均经奉悉。庚一行业于文日抵缅，关于滇缅路视察结果，谨陈如次：公路工程，近已多处改善，殊堪满意。惟一部分路面狭窄，转弯未顺，坡度过高之处，鄙见仍宜改进。近有载重五吨卡车比前加大，路面狭处，失事颇多，须加宽至一等标准九公尺为度。功果桥、惠通桥经各于上下流添造便桥摆渡，敌机来炸，亦不虞运输有阻。政府禁令，在紧急时期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不许车辆通行，原属安全策划，惟实际上在此六小时内，将来往车辆停塞于两桥前后，如遇轰炸，牺牲更巨。桥之两旁危崖数千尺，如非白日行车，其危险性殊大，得失比较，似以照常开放为宜。又此路交通重要，沿途未设电话，情报难通，非常时期，相需益急，故电话亦应赶设。至于运输管理方面，松懈如前，毫无改进。车辆失于保养，开运仅一年余，业已近半损坏，经常停修，现用只有半数，运量自难增加。鄙意拟委华侨侯西反、庄明理二君暂住该路，协同兴革，籍收臂助。侯、庄二君对此略有经验，可尽义务。西南运输处陈代主任体诚在缅晤谈，欣然同意。如蒙钧座核可，请另电饬各主管机关遵照办理，并予侯、庄二君以事权上之便利。所有上陈各节，运输编制局刘组长传书，交通部赵工程司履祺此次偕行，所见一致。回渝复命，必较周详。谨祈钧夺施行为荷。陈嘉庚叩。删。（仰光）

重庆陈代主任：密。据陈质平寒电以据腊处潘其武电称，据报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事。认为本处不要华侨，并派至腊煽动，拟就星洲南侨总会四月东日大会之前，派代表携案赴星报告，以致人心浮动。除由潘副处长向各队长负责解释外，转请妥为安置等情。兹事关系重大，似应切实声明，以正闻听。除电复并分饬腊、遮、保各处妥为解释外，敬祈迅赐径电陈嘉庚先生设法开导，以释疑虑为祷。弟吴琢之。巧。秘。

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勋鉴：据报，该处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曾倡西南不要华侨服务之口号。芒市华侨先锋第一大队长刘寒【贝】锦曾派分队长林清会赴腊戌，致电陈嘉庚并怂恿驻腊华侨司机响应，嗣以电费过昂未果。现驻腊之第二大队亦奉令再行缩编，人心不免更形浮动等情。持电知照，即希注意。中正。马。川侍六。

蜜。奉军委会办四二养代电开：据西南华侨司机谭荣耀等三月十一日由昆明新村华侨互助社报告略称：窃侨等无故奉总处命令退回训练所，该所复以未奉总处命令，不予收留，致流浪昆明，无家可归，食宿一切难以维持，恳请设法解决或送返南洋以免漂流异乡等情。兹据前情，特电希迅将该华侨司机等失业情由查明，并妥筹救济办法具复。等因。奉此，特电查照，仰即将上项实在情形查明具复，以凭转报为要。运输统制局。寅有车。印。

顷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三月十九日来函（上略）据称：贵处近有令饬所属华侨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按其表格似有令华侨机工离职或中途解职之举。该会为华侨机工服务前途计，函请本会核办等由。准此，查军委会嘱托，本会募集机工原为服务祖国，帮助抗战事业早日完成义举，倘有临时更调，或着其离职时，应先通知本会，以便通告各机工家属知照，兹准前由，相应函请贵处着各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之愿旨见覆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昆明总算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窃职此次奉命护送南侨慰劳团受伤代表蒋才品先生南返，并代钧座慰问，等因。谨将护送经过及与南侨会接洽情形缕陈如左：

（一）查蒋氏于二月一日乘中航机离昆，次日抵仰即送往当地中央医院，并电新加坡南侨筹赈会派员来仰会送。准电复，仍请职护送，并经钧座电准在案，即于二月二十七日趁轮，三月八日抵新，当即送入南侨会延医诊治，惟病势颇剧，恐难获痊愈。

（二）关于南侨会捐款事项，经与陈嘉庚先生多次洽商，据称：

1、捐本处卡车百辆、救济车拾辆，约值叻币二十余万，惟目前英政府统制外汇，无法将上项价款汇出。

2、关于滇缅路铺设柏油事，经与交通部张部长电洽，是项价款估约需叻币贰百万元，款经筹妥，亦以统制关系，无法汇出。

3、南侨会尚有捐款伍百万叻币，亦因外汇统制，无法汇出。

以上各项捐款，除陈嘉庚先生已电请中央与英政府洽准汇出外，并嘱职将所述情形报告钧座暨陈处长质平，再电呈政院设法将上款汇出。

（三）关于职此次出差旅费另案答呈核销。

谨呈

主任、副主任

职顾树立 谨呈

谨呈者。职此次护送蒋才品先生返新，谨将此行见闻分陈如左：

（一）南侨对于政府之印象：查陈喜庚先生此次返国观光，似不满闽政，曾在报端公开批评指谪。又此次解决新四军事件，侨胞认为系内部分裂，内战之开端，舆论界均表不满，责难政府。推其原因，似系共党活动及侨胞认识不清，我中央又未派员至该地作下属工作所致。据新总领事高凌百先生面告，以南洋商报本系陈嘉庚先生之机关报，目前似已左倾……

（二）对于本处之批评：南侨会招待席上公开责问三点：

1、车辆问题：捐赠本处汽车，行驶不及半载已毁大半，所存者虽可行驶，惟已破旧。

2、运量问题：本处系唯一西南公路最大之运输机构，而其运量适成反比例，牵至车辆保养问题及管理问题。

3、管理华侨问题、司机管理问题牵至不爱护华侨司机，据问以：

（1）身亡之司机直至一年后南侨会始得消息。

（2）机工互助社之调查工作成绩毫无。

（3）司机之待遇不足。司机每日奔走于公路，膳食皆无定处，每餐皆至饭馆，至少平均二元，则每日伙食费须五六元，又杂费等均须二、三元，每月每司机至少须二百元左右始能过活，而目前待遇过低，皆质当其行装以求生活，或行法外之事，而得收获。故出走之司机颇多（职出差滇缅路时，司机不满意者颇多）。推其原因，事实上本处应负之责亦有……

（三）查马来亚侨胞占该半岛人口总数之五分之三强，经济权亦操纵于我侨之手，惟我国过弱，国际地位不均等，我侨胞受殖民地政府之压迫，无法反抗，深望祖国日强。故革命之完成与此次抗战，侨胞尽力筹赈……抗战以来，回祖国服务之华侨多在本处，又捐赠本处车辆亦多。本处除负有军运之责外，尚应注意及侨胞问题，盖本处系与华侨发生直接关系之机关也，故似应注意及下列问题：1、司机的教育。2、司机的管理。3、司机的待遇。

又查华侨机工互助社似应普遍成立分社，注意及调查统计及福利诸问题。至福利社之组织亦属重要，似应请拨专款组织之。福利社包括下列数种福利事业：1、浴室，2、膳堂，3、宿舍，4、图书室，5、康乐室，6、储蓄，7、其他。

又查本处既系与侨胞发生直接关系之机构，供职本处之华侨多系由星洲而来者，故新加坡分处已撤销……与华侨接洽事项，并可协同领事馆作调查工作及宣传工作。

以上各点谨请核夺。谨呈

主任宋，代主任陈、副主任吴

职顾树立

案据本会昆明侨务局三十年六月五日呈略称：近据服务西南运输处之华侨司机多人来局声称，因奉令缩编，致无工作，加以生活压迫，不得不脱离原有职务，请予救济，或资助重返南洋。等语。当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函请西南运输处将编余司机名单，及编遣待遇办法查明见复，旋准函复，此次车队改编，并未遣散华侨司机一人，仅编队施以短期训练，一俟新车到达，即可分派工作，请代为开导着至指定大队报到。等由。复查华侨司机到该大队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一，余皆散处各地，迹近流浪。其所以不愿报到之原因，实由待遇太低，不足维持生活。今若不详加调查，指导及救济，则风声所播，诚足影响侨胞内向之心，而为敌伪所快。恳请准予转函西南运输处交涉，除机工原有薪饷外，应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予生活补助费。其无意重返工作者，宜给予南返川资，另谋职业。等情。查华侨司机，抛弃原有职务，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其拥护党国之热诚，至深且切。乃近常发现华侨机工，衣履破烂，困苦堪怜。此种不幸现象之所以造成，实因每月所得，不足维持生计。当此抗战已达最后关头，凡属国民，固应各尽所长，为国家努力服务。但服务机关亦宜顾全其生活，俾可安心工作。如人浮于事，不感需要，似当资遣南返，俾得归宿。本会前据陆军辎重兵汽车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全连华侨驾驶兵呈请救济，亦经转函军政部请酌予加给生活补助费在案。诚以华侨机工系属专门技术人才，似不宜以普通士兵看待也。除令行昆明侨务局详细调查流落各地之华侨机工，予以抚慰，晓以大义，婉劝前往预备大队报到受训外，据呈前情，相应函请查照核办，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此致

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侨务委员会长陈树人

昆明总处钧鉴：案准陈嘉庚先生八月十六日函开：接六月二十一日大函暨名单乙纸谂悉。乙是华侨司机回国服役，原属服务报效性质，与资雇不同，且回国期间已逾两载。当时系彼等爱国情殷，踊跃投效，原无约定在役年限。如贵处有相当待遇，料不至有他图。间有一二自由向他公司任职或系为生活问题，贵处应委婉劝其继续为国效劳，似不可加以逃走之罪，致远道传闻，滋生误会是荷。等因。查六月二十一日函并非本处所发，理合电请鉴核示复，俾便转复陈嘉庚先生，并恳妥慎处理，免伤侨望为祷。仰光分处陈质平叩。陷。总午。

慎余吾史大鉴：华侨机工人数统计训练所与前公路组所列颇有出入，互助社成立在后，无案可查，难得确数。弟向各批回国华侨查询，参考各方名册，得三千人之数，亦不敢言确实也。近日编余若干人，向预备大队报到者若干人亦无案可查，请就近向管理组一查可也。专此祇颂

分绥

华侨机工状况一稿遵命拟就，不知足供参考否。附呈。

弟郑琦叩

**西南运输处之华侨机工**

**本处华侨机工之起源及来源**

本处之有华侨机工，起于民国二十七年。当抗战开始，南洋侨胞激于爱国热情，多自动愿回国服务。当时槟城机器工会，曾遣送侨工两批回粤，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务于本处。同时本处既感于侨胞之热诚，且正在需用驾驶修车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特请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种侨胞回国服务。于是马来亚各地华侨，闻风而起，纷至新加坡请求参加，为国效力。遂于二十七年十月遣送第一批，以后继续办理，至二十八年冬，计共遣送十批，约二千九百名——第一批八十名，第二批二百零六名，第三批五百九十六名，第四批一百五十五名，第五批五百三十四名，第六批三百四十九名，第七批一百一十七名，第八批三百三十二名，第九批五百零九名。时该处殖民政府禁止南侨筹赈总会继续办理，第十批遣送事发生阻碍，而热心者仍暗自活动，潜回祖国，故是批只得十二名，十批合计为二千八百九十名。又有暹罗华侨多人，原于抗战以前自动回国服务，及抗战后，本处组织成立，彼辈又向本处投效，以及抗战后自费回国，由海外各地帮会专函介绍来处，请予考试收容者，约计百名。总计此三千华侨，均先后在本处司机训练所及运输人员训练所分组训练，毕业后皆分派在本处各运输队及各厂站等担任驾驶或技工等工作。

**本处华侨机工之现状**

三千华侨机工服务本处，三年以来，不独平时多能忠于职务，对于历次抢运，如广东、广西、同登、滇越、滇缅诸役，尤忠勇奋发，不畏艰危。在敌弹射击轰炸之下，冒险工作，间有深受重伤，仍不退缩，终能达成其任务者。其劳绩尤足纪录。惟近年以来，因内地物价飞涨，本处因限于经费，对于员工薪给，未能增加，待遇莫由改善，生活日感困难，少数不良分子及志气不定者，不免有犯法之事。适值各处商人经营运输事业者日多，即以腊戌一地而言，新组运输公司多家，需用司机至二三千名之多，尤喜用华侨机工，其待遇均较本处机工高至数倍，颇多招引本处华侨机工者。加以本处为军运机关，员工犯法，当按军律处置，不若商民之宽纵。以故此辈华侨机工，内受生活之压迫，外受种种之引诱，渐生外向之心。又值本处因车辆日少，司机太多，为求撙节计，乃将各运输队加以改编，责令各队对机工加以甄别，另设预备大队收容编余机工，着在队听候，俟有车时再行编队，另派工作。编余机工，心益外鹜，颇多至腊戌方面为商车司机者。查本处此次缩编，编余华侨机工计□名，现向预备大队及送赴训练所重施训练者计□名，离开本处者已有□名，虽经本处严令，以后不得擅自离队，否则以弃职潜逃论罪。但对于业已离处者，因限于经费，不能增加其薪给，既与商车及其他机关司机待遇悬殊，若此，欲一时将彼等招致来归，办理殊感困难也。

**特殊情形**

华侨机工皆闽粤人氏。南侨筹赈会遣送回国者，第一批至第五批，对于驾驶或修车等技术，十九有相当经验。以后各批，收容较滥，但亦多技术精良。言其性情，则爽直而热烈，言其举动，则活跃而放浪。且久居热带海岛之地，又因殖民政府但求供其劳作，此外不加苛求，平时故与放纵，不加管教，文化水准因之低落，久习于放浪自由之风，多有好勇斗狠之气。性情习惯言语生活，皆与国内不同，以视国内近日曾受本党及新生活等严格整齐之训练，更相枘凿。一旦归国，为国服劳，与内地军警人事自不免时生龃龉，互相摩擦。但彼辈回国初衷，确为激于卫国抗敌之情，牺牲其职业，离别其家庭，万里归来，为国效力，其热情至堪嘉尚。各队长官，倘能知其习性，略迹原情，赏罚严明，甘苦与共，言行以身作则，使其心悦诚服，则一旦有事，激发其忠勇之天性，信能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诚可用之材也。

《南侨回忆录》有关南侨机工史料（节选）

为通告事，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修机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修机者按数十人），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并注意下列各条方可。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以不嗜酒者），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机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三）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概由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四）凡应征者，须有该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方合。

（五）本总会经函达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如经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募者前往安南路程。如能由所在地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此布。

中华民国廿八年二月七日

我国抗战后，海口概被敌侵占，外货可入口者，只靠香港、安南两路而已。滇缅路甫在开创尚未通车。及广州失守后，香港存积货物军火二万余吨，我政府乃将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新加坡，名曰“西南运输公司”，总机关设在昆明，主事宋子良君。香港存积货物大半移往仰光，由滇缅路入口，其余则由安南入口。滇缅路将通车时，缺乏驶车机工，且新路多崎岖，驶车者非老经验必多蹉跌。宋君来电托代雇司机及修机工人等回国，往滇缅路并西南等省服务，除薪水外膳宿衣服医药概由政府供给。南侨总会乃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三百余人。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诸机工到昆明须经军训两个月乃出服务，其训练多属军式礼节。实行服务后有少数人逃回。寄来之通讯亦云，“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云。

余闻悉滇缅路办理及待遇司机不善事，难免寝食不安，乃举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往昆明，沿滇缅路视察事实。且度所传如不虚，或由路甫开竣未瑕设备，或限于经济因陋就简。若限于经济，南侨总会可以代筹。余按滇缅路由宛町至昆明九百余公里，可分作六段，每段一百五十余公里，当设七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亭，可容货车三百辆，面积五六万方尺，每方尺建筑费国币一元半共约八万元。工人寄宿舍伙食房阅报室医院二万方尺，每尺以二元半计共五万元，合计作一百万元，申坡币二十余万元。就使再加十万八万元，亦容易办到。乃详列此项计划交代表带去，并嘱沿途考察，逢站特别留神履勘，作事最患乏金钱，金钱如便何事不成。如此设施非但为华侨司机工人计，亦为抗战军运成绩计。该代表于民国廿八年秋起程，沿途来函报告果如前闻，“所经各站设备极形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迨至昆明急向龚主任提议，将余所计划条件呈交，请其赞同从速兴工，并交涉改善他事，该主任答伊无权主张，待备文往重庆请命。代表不能久待归来，余函电昆明均未得确实消息，并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告以滇缅路车站设备不周，办理不善，请速改妥，虽屡蒙覆电嘉奖，第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

七月卅一日，余往西南运输办事处，见主任袭学遂，请备一辆汽车，后天早为余坐往下关医院，看前慰劳团员蒋才品翻车受伤事，蒙应承准备。余问“敌侵安南海防，闻我国损失军火原料七万左右吨，是否事实？”答“实情，但有一部份赶往新加坡约一万吨，又一部分在机房，请美商挂牌作其货物，如能保亦有一万余吨。”又问“前日在滇缅路某路栈房爆炸，损失军火甚多，并死数十人有是事否？”答“亦事实。损失价值约香港币二百余万元。死伤五十余人。”又问“为何因炸发？”答“中央已派专员查勘，结果认为自行爆发，非被人有意来炸者。”又问“滇缅路我国界内等站，计积存有若干军火原料未曾运往内地？”答“未有。然自前月未禁时，日夜极力运出缅界有两万多吨。”又问“未禁以前逐月可运若干吨？”答“四千左右吨。”又问“汽货车现存可用者若干辆？”答“原置三千辆，现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修理，余者概已损坏矣。”

八月一日，为昨天龚主任约往参观运输车栈，余复到其办事处问“前敝代表曾提议滇缅路各站，应添建货车停宿栈，又司机工人宿舍膳所等，如政府欲节省此费，南侨总会可以负责，后来如何解决？”答“当时计划预算须三百多万元。财政部不准，故尚搁置。”又问“余当时预算六七站，至多不上一百万元，何须加许多倍？”答“报告财政部时，系连贵阳桂林各站合算故须许多。”余云“如此误事，实出我意料之外。”又问“华侨司机数月来服务工作如何，疾病减少否？”答“工作较前顺利，且在此设有华侨司机互助社，俾可联络感情，遇事容易通融，拟待日后复设分社于各站。至疾病事此前减去不少，各站均设有医院，如较重者则移往下关总院，因设备较为完全。”余云“互助社如有精神办得好，医院能多设，则运输受益不少也。”

龚君导余参观车栈，在该栈办事处楼上座谈。一华侨司机前在新加坡任某医生司机者，入门见余等即举手立正行礼，又向龚君亦然。辞出后，少顷因事复来，见坐中有续来某君，复向他举手立正行礼。此种礼节之繁，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又一华侨司机告余，伊是新加坡李某（与余久相识）之孙，“为爱国服务而来，在此再受训练数月，毕业后已经半年，终日赋闲无工作，虽政府供腾膳宿及半薪，然非我志愿。”托余向龚主任疏通，早给伊工作。余问毕业无工作者若干人？答百五十余人。余转询龚君，答“三四个月未有工作可给，又逢滇缅路封禁，现正查询别条路有无需要，料不久便有缺可工作也。

余问龚主任，“华侨回国诸司机，多系久有经验，来此须再训练何项？”答“军人化管理法及其他等。”又问“若久卒业？”答“两三个月。”问“全校学生几多？取何程度？”答“二千左右人，除华侨外，国内多系小学毕业，初高中生亦有。”问“教职员及经费若干？”答：“教职员及工役计五六百名，经常费每月廿二万余元。学生现分两校，一校一千二百左右人，又一校八百左右人。”又问“贵机关及分处，逐月经费若干？”答“二百余万，多从香港汇来。前日因国内汇出不便，某处又汇来不及，由宋子良君私人向香港汇丰银行担保，借七百万元来接济。”又问“宋君现在何处？有来此否？”答“现在香港。前月为调查爆炸，及英国封禁事，曾来监督赶运十数天，已回去香港矣。”（前日李宗仁君在老河口云，宋子良被蒋委员长扣留不确）

余不向筵中诸人辞别，即戴帽执手杖先行，侯李杨随后亦来。出门再行半里许，方到停车处，登车即行。余告杨君云“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昨晚余辞医士设宴，彼已闻知，早间又吩咐简便午饭，彼乃复设三酒席，骗余为大理绅商所备。已食两点钟久，尚再购来两判若两瓶酒，再迟一点钟或未毕席。余原按午饭后，往市店参观各贩卖店之石器，兹为赴筵所误竟不得往观。昨晚与交通部长订约午后参观其工厂，西南运输工厂亦须往观，现虽赶往，恐到时多已停工，晚后各机工又将开会，岂不迫促乎。西南运输委此腐败之人，有意如此开消，彼必呈报昆明机关，欢迎某某费去至少千元，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到昆明可向龚君言之。”杨君云“均是一丘之貉，如昆明机工互助社，专为华侨而设，理应任华侨司机妥人为主任，他则不然，委用其私人月薪至三百余元，社内职员卅余人，每月费款八千余元，无裨华侨司机实益，其腐败如是，所云欲继设分社，不外增委私人已耳”。

近晚到下关，参观交通部，及西南运输等停车场，及修机厂，尚有其他如中国红十字会、经济部、银行、及别机关，统计汽货车客车等，有六七部份，各自立门户，如添油站、办事所、停车场、修机厂，各独立创设，若货车少者，则未有修机厂。均为政府公用车辆，而机关林立，不特多占地方，多用许多人员，多加费用，且各部份人员互生意见，如某部份缺何物品或汽油，别厂虽存许多，亦不肯借用。甚至医院亦如是，除西南运输处车多人众设有医院，其他均未有。西南运输处货车有一千余辆，交通部货客车数百辆，其他百余辆或数十辆。机关愈多，设备愈简，损坏及停修者亦愈多。运输成绩当然减少。此概为不统一所误，若能统一主持机关，不但逐月可减许多用费，设备亦可完善，损失定可减少，运输必较有成绩也。

晚餐后，赴华侨司机及修机等人之会，到者百余人。多有问客年南侨总会惠送机工等衣被鞋每人若干件？余答由仰光入口者有洋毡被一千八百件、蚊帐二千件、棉背心二千件、卫生衣二千件。由香港寄安南转昆明者有卫生衣一千二百件、纱内衣三千二百件、胶鞋三千五百件、袜子七千双、二南衣裤三千二百套。洋毡被按分送第一批至第四批为止，若第五批起自新加坡已有购送。蚊帐与背心，系分送在滇缅路服务者。计每人多者九件，少者六件，即减蚊帐，背心、毡被、三件而已，诸司机云：“余等亦略知应得数额，然多领不足，领得九件者只有极少数人，如重要之洋毡被，甚多人领不到，蚊帐亦然，其他亦多领不足。”余在洋时曾闻被公务员取去不少，今日闻诸人言始信之。有人问缅甸经禁出口，现虽有我国界内可转运工作，若运完将如何？余答封禁只限三个月，到限英国定必开放，可免介怀。并勉励努力服务，敌人气力已衰退，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也。

昆明至下关四百余公里，此段路线未抗战前已开辟，但稍狭，未铺石子。按世界路政阔度分三等，即七公尺，九公尺，十二公尺。滇顷缅路为九公尺，抗战后开足尺数，路面加铺石子。沿路多高山。今日行时，见中间路边树立一碑名“天子庙坡”，高由拔海算起，八千二百余尺，为全滇缅路最高之处。时虽初秋，见不远之高山上白雪如云，满罩半山之上。沿路石山虽不少，然能生产之土山亦甚多，水田农园到处多有，远胜西北及贵州诸省。若日后政府能改良农业及水利，则云南此一部份之生产，定可增加数倍。如由滇缅路再开无数支路，则由可生产之山地及矿物，更可获无穷利益。且气候温和，不甚寒亦不甚暑，雨水颇足，在西南诸省中，实不我得之乐土也。

八月三日，余等四人离下关，乘汽车回到楚雄，约下午四点钟，仍寄宿中国旅行社，嘱车夫明早六点起程。车仍驶到西南运输站寄停，时货车尚未来。越早余待至六点半，车夫尚未到。侯君亲往探视，回报被后到各货车数十架阻塞不得出，而最后到之货车夫，不知寄宿何处，车之钥匙被带去，现方派人寻觅。待至八点余钟，各车夫来始将货车驶出，乃得起行。车站陋习如此，西南运输安有成绩可言。如非余急需汽车，则数十辆货车，俱须待最后到车夫来开车，方得驶出，一日之中已空费两三小时矣。自去年派刘代表来视察。便知货车停栈无秩序，不但阻碍运输，连修理及清洁咸都不便。车夫无宿所，任其散处外间，难免嫖赌怠工等弊。精神既差，危险易生，此为必然之势。当此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如此，可胜叹哉。

余等由楚雄回昆明，日尚未晚，顺途先往某温泉浴室沐浴，及到，见其设备甚简陋，且秽杂不洁，大失所望，即回旅行社。越日往见龚主任，告以沿途各站所见以及楚雄汽车遇阴事情。自前年刘代表报告，迄今经年绝无改善，汽货车安得不多坏，运输安得不寡少。龚君答伊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君委派，逢有不法当革辞者，虽屡告亦无效。余见龚君是诚实人，非狡诈圆滑之流，所言可信为事实。然余不得不再进忠告，冀可挽救多少。“（一）货车到站栈，段排列有秩序，留空路使各车可自由出入。（二）货车到站栈排列后，须雇定工人洗净泥污。余曾见放在车身底下之副车胎，染泥土如燕巢，足知许多或始终未洗除。若南洋司机之管理法，日日必要洗净。（三）货车到站后，若机器稍有不顺，司机人应即报告修机司，立即修妥，明早方可出发，如此可免途中停顿损失。以上简单三件事，普通管理人都晓得，只在当局命令监督实行而已。非挟泰山超北海做不到之大事。”余又言“余至渝无多天，蒋委员长问到此观感如何，余答政治原不晓，工厂尚未往参观，唯见市中人力车汽车甚不洁，满涂秽泥，令人憎厌，不但其车易坏，而观瞻上亦不好，影响所及，即有不卫生之弊。若南洋市政管理甚严，各车日日须要洗净，否则科罚。蒋君立登记随身手折，后十多天便见人力车大异前日，多已洗刷清洁。”龚君云“决接受君所言三事，一个月决实行改善各处车站。”又约余明天赴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联合欢迎会，余应承之。

八月八日，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开欢迎会，主席龚学遂致词毕，余答谢，并言“我国为世界最落后，及最贫穷之国家，故敌准备侵略之初，仅按数月便可吞灭我全国。然抗战于今三年余，敌人不但计划失败，而最后胜利且当属我。余此次往首都，及西北河南湖北各省，亲闻各战区司令长官、参长总司令等报告，我国民气日旺，军力日强，而乱则气力均退降，故咸都抱乐观景气。虽然如此，仍要靠万众一心，耐劳耐苦。如在前线与敌人赌生死之军兵，每人每月薪金伙食合计只十一元半，排长仅卅二元，上将原定八百元，现仅领三成二百四十元，中将原六百元，现领二百元，少将原四百元，现领一百五十元。又如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多系中学毕业，或修业者，大学生亦有，多自动参加，有步行两三个月而来者。训练期间不定，二个月至四个月，便往战区服务，向军民宣传联络感情，鼓励合作团结，并教士兵识字，或代写家信。每月薪金伙食仅一十五元，近因米贵津贴多少米价而已。自抗战迄今，毕业往战区服务者已有四万余人，成绩堪称满意。以上系白副总参谋长，及陈政治部长同时告余者。又余至青海省，该处厅长薪俸每月仅卅八元，闻贵校人员，及司机等，薪水百元以上至二百三百元者不少。比较上言诸人工作，安危及劳苦相差甚远，而薪俸则更优。应当如何努力，和衷共济云云。”其勉励与褒奖各项，与在重庆西南运输会所言略同。

廿八日早，余离贵阳将往昆明，是早在途中觉甚寒冷。越日午后车机忽坏，不能再行，幸距离西南运输车站不远，延至晚后乃坐运货车来昆明。来时已近午夜，仍寓前之旅舍。越日为十二月一日，往西南运输处，询政府气派有委员到未，龚主任答，重庆派来两位已到，一为造路工程师赵君，一为统运局委员刘君，而西南运输处要派一人未到，大约今明天可到。乃约定再三天同行，余即通知昆明同乡会，约定明晚开会，又往见建设厅长张君，问云南对田赋有无增加，答前月省参议会，接主席提案开会，讨论结果决议，待新年增加，要加若干待春季决定。又问数月来对省内运输，有无统制，答无有。又问有向民众派买军米，及兼营贸易货物乎，答亦无有。余乃告以闽省可苛政，张君言此间概无有也。

十二月三日，余与中央所派两委员及西南运输所派一委员，会议此次沿路进行视察等事，并订明早同车起程。而西南运输所派之人，即前下关主持人李某，余以此人前次欺蔽浪费，心甚不满，不可与共事。乃告龚君另委他人。答现无别人可委，拟电保山主持人，待余到保山时参加，余应承之。余即定明日早将起程，则再发一电文与蒋委员长云“余明早将同委员沿路视察，从此出国敬辞。前日在赣州、泰和、桂林呈上三电文，想均收览，迄今未蒙覆示。查黔、滇亦无如闽苛政，是则南方各省，独闽民最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虽需要，如有好公务员则有益，若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省，万祈勿轻施统制，只须严禁囤积，及平安物价，要视官吏肯否奉行。谨贡愚诚，希良裁。”余虽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心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之计也。  
滇缅路运输，自十月十八日英国开放后，敌机时常来轰炸，闻两个大桥多被炸坏，军火减运不少，每天仅可行半日而已，余甚为忧虑。适龚主任请往其家午饭，遇陈君体诚亦在座，他系代理宋子良君之缺。宋君为西南运输主持人，因告假往美国医病，故全权付陈君负责。余问陈龚二君，两桥被炸损坏如何，答一功果桥，一惠通桥，功果桥较无紧要，惠通桥则甚有关系，因用钢索吊造，若该钢索被炸断，则不能通行，然已被炸断两三条，眼前尚可维持。余问钢索有余存可续否，答恐无之，经电美国办买，但敌机尤注意惠通桥。蒋委员长已下令，每天自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均禁止通过。余闻后亦以为甚严重，因敌机时常来轰炸，非达目的安肯干休，陈君云渠近日将往缅甸。余问乘车或乘飞机，答乘机。

四日早余等与两委员，坐两汽车由昆明起程，余及赵工程师李秘书同一车，侯西反庄明理及刘委员同一车，余告庄君等注意沿路，如见某处欠阔或弯不妥，抑或有危险性，均要登记，待停车或到站互相查对，是否相同，并告知赵工程师。然沿路所记载，须改善者大都相同，赵君亦承受修改。是晚寓楚雄中国旅行社。越早复启行，午后到下关。余复往医院视蒋才品君，仍不能起床，乃与议定不日由医车运送至仰光，经医院长应承，并要派一医生同行。余等复起行，是晚到水平，寓旅舍。越早复启行，近午至功果桥，该桥长二百余尺，系用钢索吊造，其江水颇浅。自敌机来炸，已在上流距离半公里，江水更浅，江面更狭之处，再造一新桥，将竣工，以作预备。此桥免用钢索吊造，系用桥柱，工程极容易，故不惧轰炸也。

十二月八日，鸡鸣时离保山将来芒市，因惠通桥上午九点钟起，禁止通行，故须赶早起程。至桥时八点半，余等下车步行桥上，详细视察桥之两端，近处俱是高山，大约高可五六百尺，敌机来炸许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飞，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弹痕无数，桥中虽有炸坏，然非要害修理一两日便竣。唯钢吊绳在右桥头，炸断两条，计该桥两边各用二寸径钢绳九条，虽断两头，尚有七条，据赵君言，如有四五条尚足通行。桥长仅八十公尺，桥下江水缓流不急，自水面至桥板，高卅英尺。余问赵君江水涨落相差多少？答终年如是，相差少许。又问流水急慢如何？答亦不甚急激。自敌机来炸之后，交通部经鸠工从两桥头开斜路至水面，拟用渡船运货车，可免专倚靠该桥。以卅尺高之斜度，便至水面。路途不过半公里外。若有渡船可通，该惠通桥纵或被敌机炸坏，亦无关紧要。而敌人极力轰炸许多次，尚未甘休，亦是愚笨，所可怪者，西南运输处两要人，但知桥坏有运输不通之危险，竟不知虽炸坏，绝不至阻碍运输，有何危险可言。而身负抗战军运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缅往来只坐飞机从天上过，安能知晓实际状况乎。

惠通桥两边均立碑揭示蒋委员长严令，禁止各车辆非时过桥，每天由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并说明该时间防敌机来炸，故须停止通行。距离桥头两端数百步，并设有闸架，查其原因，为恐敌机常于该时间内来炸，货车适运到桥上有被炸之虞。然该桥长仅八十公尺，运货车瞬息即过。且车夫如闻机声，定驶往树下可闪避之处，何致在桥上被炸，此乃普通人所能晓，兹乃禁止该时间内通行，未免致使两端货车连接许多辆在路上等候。如敌机来炸，岂不更觉危险，无乃安危倒置乎。况该段路程甚崎岖，夜间不便通行，日间又减少半日，阻碍军运不少，真乃一举两失。我国人常识浅陋，而负责人亦如是，妄报上峰下此禁令，可胜叹哉。

昆明龚主任，前次对余应承，改良运输三件事，准在一个月内各站实行。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是晚在芒市，与中央两委员，及保山运输主持人等开会。余言沿途视察已告终，明天将离别，对于改善路政，若干处路面须增阔，又若干处弯曲，亦须修妥，及某某处有危险性诸项，赵工程师逐一接受，云当积极改善。至管理运输腐化事，此条龚主任既食言，希望刘委员回渝报告，设法改善。余待到仰光，电请蒋委员长，如获同意，则留侯西反庄明理二人，尽数月义务帮忙改妥。又各运输处各立门户，同为政府服务而不统一，不但人多费大，所需各物不相周转，甚至互生意见。车夫亦无一律牌号，由各机关自编号码，如西南运输之车，自行列号，交通部之车亦然。凡途中相撞触，发生争执无从裁判。车夫既乏相当惩戒，更任意不守路规，故翻车冲突损伤等事，无日或免，损失之巨何只数倍。西南运输两年间，置新货车三千辆，现仅存可用者不上一千辆，每辆平均仅用六个月而已。若南洋货车，每辆至少可用五六年。虽无乌油路面，亦不应如此速坏，此完全由管理无方所致。予并将管理腐化各亲告知刘委员，请其回渝报告当局。

有一华侨车夫，非其罪而被西南运输处拘禁暗房已三天。侯君闻知往交涉，始放出来见。乃潮州青年人，系新加坡华侨，为爱国而来。时天气寒冷约五十余度，余重裘尚觉冷。该车夫似非劳动界，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余问“你衣何如此单薄？”答“前在南宁服务，衣服一切均在南宁，失陷时适赶运军物在外，致所有衣物尽行失陷，当局云要赔补，迄未见赐，数月来衣服甚贵，无钱可买。”又问“禁在暗房，有被席给你否？”答“无有。”余伤感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三千余人回国服务，今亲见些景况，并忆其他类是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代为伤悲。乃送他五十元为买衣服费。又问“被禁因何罪？”答“有某司机是余朋友，余因暂停未有工作，帮助该友驾车，该友犯罪逃走，故当局捕余往禁耳。”侯君西反将回昆明，与余握别，余付他千余元，托其沿途到医院，慰问华侨车夫，每人赠一二十元。后余回新加坡，接侯君来函报告分赠完毕。

十二月九日上午，余离芒市来宛町，入市午膳。见西南运输车场，有数辆货车，均名华侨先锋队。视该车甚陈旧，似乎已用过数年，然该车系本年春初，始由西南运输处请求，并电行政院同意，由南侨总会捐买一百辆，费新加坡币二十余万元，对英政府声明系在缅界内需用，故免由逐月义捐汇款内抵扣。四月杪在仰光交车，添造车斗至六月间完竣，开始运货。迄今仅五六个月，何得如此陈旧。至先锋队之名，乃西南运输处所编号，前曾函渝告余，故知之。该车后来多有运至昆明者，不但行缅甸而已。庄明理君同余至仰光，即将回昆明，余嘱其沿途调查此华侨先锋队，一百辆车现存若干辆。一月后接庄君自昆明来函，云仅存可用者廿三辆，其他七十七辆有损坏者，有乏附属品可修理者。又其年秋间复买赠货车一百辆，计是年共赠二百辆，而后来之一百辆不知下落如何。南洋华侨募捐款项，多由零星凑集，如百数元，或十元八元一元两元，辛劳工作积少成多，非是同资本家一呼便集之容易措办。而彼辈公务员，则视若泥沙，上峰复委任不晓事，不负责之私人主持此抗战重要之军运，可胜叹哉。

十二月十二日早，余离缅京来仰光，近晚已到，仍寓曾君和衷行内。越日即发电蒋委员长云：某日两电均悉，余与委员视察滇缅路已毕，路中凡太狭及弯曲危险者，经与赵工程师酌妥速改。近来新到五吨货车，比前三吨者加大，故非速改不可。西南运输管理无方，车机易坏，运输减少。前龚主任许速改善，迄今数月仍旧腐化。经与刘委员商酌，留侯西反、庄明理在各站三数月，帮助改妥，以尽义务。如蒙赞同，请电示昆明龚主任，俾两人有权可督促各站负责人。至其他各运输，多设机关，各立门户，而不统一之害，经详告刘委员，希待改善。路中功果桥、惠通桥，任敌机如何轰炸均不能阻碍我运输，因免经该桥，尚有车船可渡。现每天禁半日不许通车，实极错误，不但减少军运，且反使货车均停于桥之两端，更觉危险，希取消勿禁较妥。余再五天往槟城。”

华侨机工在滇缅路——西南各省实地视察记

抗战的炮声，使海外数百万中华儿女，渴一般地惦记他们的祖国，那些没有看过祖国的侨生，尤其急于回到“祖家”，看一看锦绣的河山，并为保卫锦绣的河山而奋斗。

滇缅公路需要大批熟练机工，运输军火去，这是华侨青年投效报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从槟城、怡保、太平、马六甲、吉隆坡、芙蓉、新加坡、砂朥越、泗水以及马来亚许多角落，涌出了数千个热血的机工，在筹赈会的号召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些热血可嘉的机工，有的丢了职业，有的离开了新婚未久的妻子，有的和家庭大闹革命，有的变卖了个人的私产，因为他们可以到可爱的祖国了，他们将运输军火打鬼子去！

于是从今年（1939）春起在西南的山国里，在高黎贡山与澜沧江之间高原上，开始出现无数英勇的华侨机工，以熟练的技术，驾着载满了军火的汽车驰骋！

这些华侨机工，无论从海防登陆的也好，从仰光登陆的也好，一律要送到昆明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短期的训练。

这一个训练所，设在市郊，原是昆明师范的校址，有幽雅的花园，广大的操场和高耸的洋楼，我们的华侨机工便是在这里受训练的。

他们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五点钟就得起身，训话、吃饭、上讲堂、操练。下午也不得空。午饭完了，又是上操场，又是训练。

科目有政治、驾驶、军训、修理、驾驶实习、军事学、构造、供养。

出操自然是苦的，一向过惯了自由主义的生活的华侨，忽然要受军事训练，起初不免有些那个。然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所负的运输责任和普通运输并不相同，他们是“驾驶兵”，而不是普通的司机，他们必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负得起这个大责任，他们就积极地学习了。

训练所有一间涂满血迹的房间，最能激起华侨复仇的情绪。那是去年（1938）的事了，敌机狂炸昆明，一百多个广西学生，正在受司机训练，住在训练所的一个宿舍里，二三颗炸弹把这些热血的学生的生命毁灭了。他们的眼睛多半没有闭，他们的血溅在墙壁上，溅在木柱上，老洗不掉，华侨机工每一次看到这些殉身者的血，他们仇恨敌人的心便加强了一分。

这一间血房，现在是干部训练班学员的宿舍。

第一、第二批的华侨机工训练了两三个星期就出发了，因为许多军火待他们运，第五第六批也是很快的。

他们出发的时候，长官送他们旗子，上面写着“保卫祖国”。同济大学、西南联大来慰劳他们，因为他们将负起保卫祖国的重担。

他们多么高兴啊！一辆辆从美国买来的新车在遮放、腊戌等他们接收。他们唱着出发歌，高呼口号，坐在数十辆大卡车走了。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冲，冲没了一切恶势力，**

**干，干澈了领袖的主张。**

**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

**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

离开训练所的机工，便过着“道路为乡车为家”的生活。

云南的山是高的，水是深的。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海拔都在六千公尺以上。她们的山峰往往隐在云雾里。澜沧江、漾濞江，奔流于崇山峻岭之间，峡谷之深达数千尺，人跌下去是找不着尸体的。

然而滇缅公路就绵亘在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的山岭之下，就蜿蜒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的急流的旁边，而且横截了它们。

车整天在荒山里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嶂好象永远走不完似的，车路沿着数千尺的悬崖峭壁前进。这一条黄色的长蛇，穿过无数的密林，越过数百个桥梁与涵洞，有时且消没在白云里，淌若司机没有耐性和毅力，到了目的地说不定会发神经病。如果精神差，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滚到山下与水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不，用句机工同志的形容词，它的深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象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我们英勇的华侨司机，镇定地操纵这些甲虫的方向。他们的眼底永远是无尽止的山，是无边限的树林，是无尽头的路。这些山、树林、路，便是他们的家乡。

现在我们的机工同志，对于这条蜿蜒的公路，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知道跑了几百里路可以到某一城市，跑了几十里路可以到某一分站；转了那个弯，便有某一条水，越过那一道山，还有某一个高峰；那里有大石头，那里有崩溃的坍土；什么地方路狭，什么地方路宽，他们全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有没有宿舍？有的，腊戌、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楚雄，都设有宿舍。有的用竹盖的，有的就庙宇改造的，但是我们的机工同志们，大抵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机工同志对于车是很爱惜的。他们不能忘记那条标语：“汽车是我们的生命！”正如士兵珍惜枪一样，每一个司机有空便揩他的汽车，揩得雪亮，汽车如果损伤了，在他们是顶伤心的事！一个司机告诉我：“汽车是用民众的血汗换来的，国家相信我们，把民众血汗换来的汽车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不加爱惜，怎对得住国家和自己呢？”

每一个机工同志，都穿着运输处所颁给的制服，而最吸引人注意的是，胸前一律挂着“一等驾驶兵”的符号。

“一等驾驶兵——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二等和三等驾驶兵？”我问一个司机同志。

“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够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头’（华侨称外省人的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华侨机工技术的高明，确很使国内同胞惊叹。他们靠着丰富的经验，常常把自己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半年来他们驾车失事的只有二人，而国内同胞失事的却不下五十余人。滇缅公路确实很难走，全路有三分之一是沿着悬崖走，路宽不过二丈，狭的则仅容许一辆车通过。路又是环山筑成的，有许多地方，在一分钟内，要兜五六个大圈子，在转弯时候，处处只能看见深谷和峭壁，等到回转过去，这才发现并非绝路。在这样险的路上，华侨机工却十分从容地行驶着，他们极富有机动性，偶有不幸翻车，往往能够随机应变救活自己。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曾腾光，是第十三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遮放。他在离保山二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一个有名的悬崖）翻了车，但是他死抱住方向盘，任汽车翻筋斗，滚到了底下时，他抖一抖身上的泥土，碎石和草刺，开了车门爬出来，一点没有受伤。陈克已，十四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下关。他在功果桥附近来个倒栽葱，当时曾有两个“辣椒头”，人和车滚到澜沧江中，什么也找不到。可是，他滚到半路，即从车内跳出来，让自己跌倒在斜坡上，结果只闪坏了一条胳臂而已。我们到下关时，他的胳臂已经复原，第二天就驾着车走了。黄顶兴，那个十九岁的潮州少年，他同我们由遮放一起出发，在龙陵附近他不知怎的忽然“左倾”，幸得刹车刹得快，车撞在一棵树上，没有翻筋斗！

不但华侨机工的驾驶术高明，就是修理术也十分熟练。他们修理汽车，不必看书，在极短时间内，可以把极难的工程完成，训练所的讲师和教官，学历大抵很高，理论有余，经验都比不上华侨机工。腊戌装车厂，有二十个华侨机工，六人可以装置四辆车，宋子良主任称为“模范机工”。

滇缅路的汽车，分新旧二种，新的是□□牌，机器好，修理工具也完全，旧的是□□牌，机器差，工具全丢了，大家自然都喜欢驾新车罗！可是公司却把旧车交给华侨驾驶，为什么？因为华侨技术好，旧车在华侨手里不会出岔子。

有一次，芒市华侨机工和储藏库库员发生冲突，吴琢之副主任对库员大加训斥：“你们要知道，国家要培植一个机工是不容易的，请一个库员马上就有，你们如果再有对不住机工的事发生，我一定不宽恕！”张炎元教育长亲自对我们说：“滇缅公路如果没有华侨机工，过去半年几乎通不成车！”由此可见当局如何重视华侨机工了。

我在遮放碰到十三大队的一个班长，叫做陈恩仁，他是个执性的少年机工，要回国的时候，他的母亲老放心不下，不让他走。他去躲在同济医院一个月，坚决地走了。

他看到我们很高兴，他报告许多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心灵上印象最深的，是十三天“山大王”的生活。

“山大王”这名词使我想到绿林好汉，我很奇怪我们的司机同志怎样会做起“山大王”来。

“喂，好好的司机怎么会做起山大王来？”

恩仁知道我误会了，他对我解释“山大王并不是做绿林好汉的意思，在我们的行车中，有时路崩，有时车坏，不免在荒山里抛锚了，没有房子，没有同伴，偌大的山，只有我们一个人，所以叫做‘山大王’。”

“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他开始叙述那最可纪念的十三天，“走到距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住，大家都很着急，前进既不能，退后也不得，那样小的路是无法转弯的。我们希望救济车来，可是救济车来也没有用，它不能修桥。我们又希望交通部公路局赶快派飞班来修，可是那时又碰到雨季，桥一时不能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只好准备做‘山大王’。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盐。一百多人在荒山里要找饭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找到一顿饭吃，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不能一块儿离开车辆，车上放着军火，如有半点差错，谁也担不了责任，因为种种困难，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雨下得讨厌，白天愁坐在车头里，夜里也睡在车头里！我们过着很寂寞的生活！”这位执性的孩子，说到这里，眼眶里有点儿湿。

“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消遣呢？譬如在夜里，月亮上来了，你们可以围在一起，开座谈会，或举行一个小小的音乐会，会唱歌的唱歌，会吹口琴的吹口琴，那不是好得很！”

“不知怎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着，大家只想快点通车，早上醒来，希望今天桥会修好，可是失望了；我们希望明天，然而明天又失望了，明天复明天，这样我们一直等了十三天。”

“当我们听到桥修好时，我们的喜欢是不能形容的，我们象飞脱出了笼的鸟，象遇到大赦的囚犯。自然，我们为国家吃苦，并不怨叹谁，只有救济工作实在做得太差，路实在修得太慢。”

“做山大王的事常发生吗？”

“怎么不常发生？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有半数以上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独个儿那才要命！一个人，又要看车，又要找食，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味儿是怎样的？”

啊，英勇的机工们，你们是无名的英雄，你们为民族忍受最大的痛苦。

华侨有一个普遍的性格：就是刚强鲁直，如同李逵一样。机工同志当然不能例外，他们好打抱不平，到处闹事。三句不对劲，便用武力解决——打！

华侨机工的刚强，在昆明、下头、保山、芒市、龙陵是很出名的。市民和警察大都对他们存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最轰动一时的是今年六月金碧路的事件，一华侨机工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甚至把军士机关枪都缴了过来，幸得及时解决，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保山也因华侨机机工和饭店、理发店闹蹩扭，停市了好几天。至于和老百姓的事，在芒市、下关、遮放，更是层出不穷。探其原因，当地人把华侨当成“蕃客”，普通人买盒香烟四毛便够，华侨却非五六毛不卖，故意涨价，加上语言不通，于是全武行便常常演出了。

在演全武行的时候，机工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只要一个人喊道：“某某被人打了。”大伙儿便涌出去报仇，弄得警察、商人听到华侨二字便头痛。

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对，即使当地人如何可恶，如何不讲理，打绝不是“好方法”，这只有使他们怕和恨，而不能使他们觉悟和了解。开导民众，自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被一般人看做“革命之母”的华侨，却不能不负起这艰苦的责任。

对内，要“避免摩擦”，要“动口不动手“，怎么愚蠢，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我们沿路对机工同志这样说。

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有一张棕色的健康的脸。

摆夷女郎，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那些未出嫁的“菩抬”，有一条梳得发亮的辫子盘在头上的，最高兴和华侨机工眉来眼去，在那公开调情泼水节，有若干机工被泼了水——被泼了水，就说明你已被爱。

在黄昏时候，遮放、芒市的女郎，纷纷到小河边洗浴，上胸裸着，神情十分活泼。而我们最爱冲凉的机工，往往同在那里洗浴，于是虽非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泼水的热闹不减泼水节的盛况！

听说芒市的土司养着许多美丽的女郎，其中好几个爱上华侨机工，甚至和机工恋爱，可是我调查了好几个人，此说尚未证实。

那些好女郎虽然美丽，终究是异域的花草，也许我们的机工同志如此想吧。

我们到腊戌，便看到侨胞机工，踏进祖国的境界——畹町，便更多了。在路上，在荒山里，在茶馆里，在各分站的停车厂内，每一角落，都有他们的活动。他们以极快乐的神态欢迎我们，如同见到久别的兄弟一样，亲切极了。在荒山里，他们停车，跳下来和我们握手；在每一站，他们攀在车旁，坐在轮盖上，问长问短；在旅馆里，他们黑压压挤了一房间，争先恐后报告生活状况。

我喜欢他们，他们是热情的，豪爽的，鲁直的。

王亚能，太平的孟加里，现任十一大队的分队长，在遮放我碰到他。他的胡子乔刮得光光的，他会说福建话、广东话和国（华）语，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写王亚能，下面是“印度班邑”。

“王亚能，是你原有的名字吗？”

“不是，这不是我的名，这是我最好朋友的名。”

王亚能在队上很能获得上下层的好评。他肯干、苦干。有一次，坍路下来，大家都懒洋洋不大理会，独有他拼命撷土填路。他是中国最好的友人。

张天赐，工商校友会校友，在遮放修车厂当机工。他是一位耿直的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训练所的时候曾干一椿轰轰烈烈的事。四月十四日，同济大学慰劳团到训练所慰问华侨机工，演“放下你的靴子”，他提议从伙食钱节下三十元，丢上台上，作为献金，大家同意了。结果所献的金，除了三十元外，还有许多自动丢上去的，达四百余元。他和他们一块儿到昆明，他对我发表了若干对人对事的批评，我觉得很中肯。

“修理机器的生活，是否苦一点？”

“苦没有关系，回国就是准备吃苦。”他答。

在若干机工中，我觉得许成瑞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他是第三批的副领队，现在保山十一大队当副官。他最好抱不平，常常挺身而出，替人说话。在路上，他老问我应该看什么书，他说他正在看一本“思想与训练”。他很勇敢，常常把长官的腐化行为报告上峰，这使若干长官又怨他，又怕他。

他喜欢表现自己，他是英雄主义者。

甘锦寿（现名甘锦秀），表现得不错。他是新加坡一个富家子弟，英文念到九号，生活舒适极了。可是他不愿逸乐，他离了家庭，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我们在下关附近碰到他，我问他“想回家不想回家？”他耸一耸肩头笑道：“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对于陈亚来和郭成珠有着极温和的印象。他们见了人，老是笑笑的，成珠还只结婚了两个月就自动回国啦！他们已渐渐学会了国语，他们准备说国语说得象福建话一样流利。

我们碰到马来人马加森，是在保山的招待所。他到招待所来，对于长官的傲慢态度极表不满。我们安慰他一下，牡丹拿四十块钱给他。

他是个出色的武士，下关徐站长告诉我，他常遣派马加森抓那些偷东西的人，勇敢而且迅速。

洪传咸，是晋江会馆的会友，我们在星常常碰头。这个硬汉子，在昆明为打抱不平，被关了四十天，可是他，还是一样快乐安闲。

在龙陵合作社，我遇到南洋商报的排字工友陈秀碧，他亲切称呼我，他算“投铅从戎”了。

蔡仁德的脚踏车表演在昆明轰动一时。北平有一个冠军斗不过他。每逢各界举行游艺会，准有他的份。西南运输处当局为着便利他的表演，特地到河内买脚踏车。他现在和陈桢万（他表演大力士）等四人代训练所体育助教。

有许多学员升为长官。刘贝锦、林贵奇、林已茂、钟伟兰、陈剑如等十余人均升为分队长。

在这里薪水最高的是王文松（昔为新加坡□□公司工程师，每月约叻币二百五十元，他自动买棹回国服务），现任总厂的工程师，每月仅一百四十元。我们在下关的一个小酒店看见他，穿着一条虎皮短衫，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们。后来他又带队到昆明来，他没有李逵性格，他是有知识分子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

——《南洋商报·晚版》1939.9.28-10.2

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

笔者在大学时期专攻修历史，因此对有关历史史迹特感兴趣。

1937年“七·七”抗战后，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总会，领导全南洋华侨支援抗战，并号召以星马为主的海外华族组织总数三千二百人的卡车司机，在1939年分九批前往滇缅公路赶运军需品支援抗战。

由1939年至今已四十七年，此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尚未有正式的记载，成为抗战史上的一段空白。时过境迁，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竟被遗忘。吾人认为这段历史事实是一个最宝贵的历史教材，可以矫正年青一辈颓废的思想，教导海内外的华族，各为其个别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1939年春，笔者前往昆明继续升学，时值第一批华侨机工抵步，特往访问。当时看到这批机工既无寒衣，亦乏住宿的设备，以稻草席地为床，苦不堪言。当时曾写一信向陈嘉庚先生报导实际情况。笔者在那年一月到达昆明，四、五月间离开，以后的详情即不甚了解。但是当时的印象，虽事隔数十年犹历历在目，未能忘怀。抗战胜利后由各方面得到片断的报导，但不完善。《南侨回忆录》虽有述及，可是也甚为简略。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记载海外华族创业的历史及抵抗日本侵略的史迹。由此动机乃引起笔者对这一段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历史的重视。于是就与我国多位历史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经过共同研究后，认为初步的工作须组团前往昆明，到滇缅公路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因此乃致函当时曾代表南侨总会在滇缅公路工作的庄明理老先生，跟他取得联络，并且得到庄先生热烈的反应，代为安排在昆明会集。考察团的组织新加坡方面是以魏维贤博士为首，团员包括林孝胜和崔贵强二位先生及我四人。中国方面是庄明理老先生及他的秘书牛石林先生。会集的日期是1986年11月4日。庄老亦预先安排云南省政协、侨办、侨联、机工联谊会等有关单位协助。

1986年11月5日全团十多人，包括医生及保安人员等，浩浩荡荡由昆明出发，中午在楚雄午餐，当晚到达下关，行程四百公里。六日与三位机工会谈。七日续程往保山，行程约二百公里。八日由保山出发，凭吊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然后往松山参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傍晚六时许到达芒市，行程均二百公里。九日由芒市出发往畹町，随后继续往瑞丽，一直到达中缅边境。当日赶回芒市，来回约二百五十公里。十日由芒市出发，在保山午餐后，赶往下关。十一日由下关出发，当晚到昆明。前后六天，总计来回行程约一千八百五十公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在一年半之间，沿海各省均告沦陷，军援断绝，因此乃抢修滇缅公路，这是美国军援的唯一途径，山路险峻，军事运输非有熟练机工不能胜任，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山救不了近火。因此乃由西南运输处宋子良云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派遣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因此在1939年三数月期间内即派九批，约三千二百名机工往滇缅公路服务。

当时宋子良所提供的条件：衣、食、住、医药等一概由西南运输处负责，月薪三十五元。筹赈总会根据这些条件宣布招募机工，限定年龄为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除了要有卡车驾驶证或维修机器证明文件外，并须征得家庭同意，始适合资格。

考察团此次的访问，除了在大理和保山访问九位机工外，十一月十二日在昆明再与三、四十位机工开座谈会，综合要点分为八段，概述如下：

1、当时青年爱国热忱，极为高涨，报名参加者至为踊跃，有些青年实际年龄仅为十八岁，乃虚报为廿二岁而报名参加，有的瞒着父母秘密参加，有的已经结婚有妻儿者，亦抛妻弃子而投奔祖国，有的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参加队伍，形形色色，不能尽述。

2、1939 - 1942年在此段期间内，热爱祖国的机工夜以继日，在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滇缅公路来往奔驰。当时由于山高路窄，深谷万丈，而致翻车丧生，或因敌机轰炸扫射，饥寒交迫，瘴气患病而为国殉难者不计其数。但是这些机工却前赴后继，绝不畏缩。他们的生活虽然千辛万苦，险象环生，但是为了抗敌，精神上有所支持，心理上亦有所寄托，尚能度过。

3、1942 - 1945年太平洋战事发生，缅甸失守，日军攻入云南，直达惠通桥。滇缅公路交通断绝。西南运输处保留小部分机工外，其余全部遣散。这些机工突然间成无业游民，不但生活困苦，加上精神上的空虚，身心都受打击，有的机工甚至沦为乞丐。在些段期间，因生活无着、贫病饥寒两相交迫，而致死亡者为数不少，总计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期间中，为抵抗侵略战争而牺牲性命成为无名英雄的机工约占三分之一，人数在千名以上。

4、1945 - 1949年抗战胜利后，这批参加抗战工作的南洋机工，政府当局理应负起复员责任，但却无人理会。当时陈嘉庚先生曾向政府交涉，并宣称如果政府不愿负责的话，南侨总会将派船只前往中国口岸迎接。陈老因恐怕原本为参加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机工被迫参加内战，所以据理力争。但当时政府方面却为了避免这批机工回南洋以后宣扬他们所遭受的惨痛经历，有损政府的声誉，因此不甚合作。不过由于陈老的力争，有机会复员回返南洋者，据闻只有九百多人。其余因种种原因流落国内者达千人以上。在此段期间内，内战烽火再度爆发，遗留国内的机工流离失所，无所适从。其经历的苦难，唯有身受者始能了解，并非吾人所能想象者。

5、1949 - 1956年中国解放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重建家园。遗留在国内的南洋机工认为有机会参加重建祖国的工作是一件光荣和有意义的工作。物质生活虽然苦，但是精神上重新得到鼓舞，把前程寄托在建国事业上。

6、1956 - 1966年在这段期间中，中国把建国大计束诸高阁，而全力进行多项的政治运动。机工们在这种错综复杂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彷徨困惑，无所适从，所受到的冲击，不减当年。

7、1966 - 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工作被红卫兵认为是国民党的走狗、反革命分子，十年灾难，史无前例。他们一肚子的冤屈，无处倾诉，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

8、1976 - 1986年文革后厉行务实政策。近年来遗留在国内的机工逐渐得到照顾，但是仍有部分尚被忽略者，亦在所难免。我们希望全体都能雨露均沾，安度晚年。

上述八点是此次访问昆明和滇缅公路的简略报告。所接触者不及五十人，晤淡中有的人涕泪交流，泣不成声，有的怨气膺胸，慷慨陈辞，甚至有的埋怨陈嘉庚先生当时发动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以致连累他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这种怨言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

据闻除流落在云南的数十名机工外，在四川及贵州也有数十名。南侨机工的原籍绝大多数是闽粤人，据说有一小部分已回返他们的原籍地了。据估计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留在国内的千名机工，经过四十年漫长的岁月，尚侥幸生存者恐不及四分之一。他们的年龄最小的也近七十岁，而大多数已经七、八十岁了。这一群被历史所遗忘的抗日英雄，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突然间得到海内外关心人士组团探访，其心情的冲击和感受，悲喜交集的表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也。

考察团有责任把考察所得的资料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发行中外，更希望中国方面也能重视此段史实。如果能够将此段史实编写成书，而且更进一步摄制为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必能轰动国内外，同时也可以成为历史最好的教材，启发年青一辈的爱国思想，扬弃颓废、消极、腐化和自私的行为。也给这一群海外赤子、抗战遗孤，心灵上有所慰藉。

最后笔者要对北京和云南主管的领导及干部们的衷诚协助，表达万分的感谢。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次的考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了他们的合作，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才不致被埋没，永远成为历史的空白。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纪念碑的重建及其他

1989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52周年纪念日，也正好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的50周年。这一天上午，昆明西山公园的景色格外秀丽，骄阳妖艳，人流如织，纷纷汇集到公园的山坡上，为“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举行隆重的剪彩典礼。云南的老机工和来自海南、福建、湖北、贵州、四川、香港和缅甸的老机工代表，以及云南省、昆明市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庆典。

笔者受命陪同全国侨联庄明理副主席，专程从北京前来参加庆典。当年，庄明老在南洋是积极支持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的号召，并参与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的爱国华侨知名人士。

在典礼上，云南省委普朝柱书记在致词中，以宏亮的话音和庄严的语言赞颂了南侨机工的爱国历史功绩，并号召要用这一段光辉历史，教育和激励海内外炎黄子孙，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的振兴、繁荣、富强和统一而共同努力奋斗！

在典礼上，庄明老显得心情非常兴奋和激动，因为重建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是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一个夙愿。可惜，他这时已80高龄，且患有语言障碍症，致词已发生困难，力不从心，因而不得不由站在他身边的我代为宣读致辞。

这座雄伟庄严的纪念碑，高达12米，耸立在西山公园的山坡上，俯瞰着烟波浩渺的高原明珠——滇池。碑身是选用汉白玉石镶嵌而成的，迎面镌刻着镏金碑名：“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座选用黑色大理石砌成，迎面也镌刻着苍劲而雄浑的四个镏金大字：“赤子功勋”，金光夺目。碑座的另三面，镌刻着近八百字的碑文，颂赞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读来令人凝思万端，情感翻腾。

像这样专为纪念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日而立的如此之雄伟纪念碑，至今尚属全国所独有的。据了解，抗战胜利前夕，在昆明东郊郭家凹，曾立有用毛石垫基的“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较为简陋。“文革”期间已被毁，遗迹已荡然无存。

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何以在此时得以重建？笔者拟就曾参与有关此事的经过及其他，做此回忆记下来，作为这一历史篇章的结尾史料，供读者参阅。

事情得从“文革”后拨乱反正回忆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结束了这十年的灾难。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同年9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国庆的侨、台、港、澳同胞旅行团的讲话中，开始提出：“……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要“先把庙立起来”。同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利铬泽夫妇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指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他还提出，对“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1978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行使“文革”前原华侨事务委员会的职能，并任命廖承志为主任。同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廖承志的署名文章：《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和社论，批判了“四人帮”破坏侨务工作的罪行，并提出了要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彻底纠正过来。同年4月，全国侨联也恢复了活动。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和全国侨联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会上，推举廖承志为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庄希泉为主席。

1980年2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任总书记。国家在侨务工作中的澄清是非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的关怀和大力推动下，更呈现了一派盎然生机。

1981年11月，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有关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大会，推举廖承志为学会名誉会长，庄希泉为会长，陈翰笙、费孝通、梅益、洪丝丝等为副会长。当时，笔者受命参与创建该学会的筹备工作，在学会宣告正式成立时，被推举为学会首届副秘书长，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正因这一工作关系，学会办公室不断收到定居国内的一些原南侨机工或其家属写来的申诉信。这些信件，多是由各有关部门转来的。

他们在申诉书中，陈述了在过去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曾因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而被说成是“在外失业而回国谋职”，是“为蒋介石卖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蒙受冤屈。他们因有“海外关系”，被说成是“反动的社会关系”，受到了严厉的审查、批斗，以至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中，有的人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判刑，甚至有的人刑满还留队多年，后因年老被清退到社会上，生活无着落而又无人过问。有的人，因被错误地下放到农村，仍然未矛以回城镇落户。他们的历史旧案和冤假错案的档案材料，仍然未予以清理等等。他们要求落实政策，平反其冤假错案。他们要求予以恢复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光荣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承认他们个人的这段光荣历史。

他们在申诉书中，申辩说：他们在南洋原居地本是有家有业和有丰厚的经济收入的；他们当年是怀着满腔热血回国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根本不存在“在海外失业而回国谋职业”的问题，更不存在“为蒋介石卖命”、“国民党的残渣与余孽”的问题。他们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国内国共两党已形成了合作抗日的历史时期，国难当头，为了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些领导人也到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门去任职；中共领导的中国红军也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协同作战。这些历史事实，不正说明举国上下，一致团结抗日，根本不存在谁“为蒋介石卖命”的问题。

熟悉南侨机工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1939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总数为三千二百多名，其中在滇缅公路因车祸、敌机扫射和病疫等殉难者近千人；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洋者千余人；因各种原因而定居国内者亦约为千人。定居国内的这部分人，多散居于西南各省，特点是云南境内，也有少部分人是返回闽粤琼原籍家乡定居的。这部分人尚健在的已不多，且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在五十年代重新安置工作的，退休时因工龄短，加上在定其工资级别时偏低，因而家庭生活困难。如有的人住房有困难，有的人因子女没有工作还要负担其生活费，有的人年老多病无子女在身边照顾等等。他们要求予以关心和妥善解决其家庭生活上困难的问题。因此，每当阅读这些申诉书时，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我们虽然已多次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原南侨机工的上述申诉情况，并建议应予以重视和妥善处理，但苦于一时仍难于有结果。

1985年8月初的一天，庄明老见到我说：“陈共存先生来了北京相约会见，要谈南侨机工这段历史。”他邀我陪同去相见。第二天上午，我随同庄明老来到北京饭店会见陈共存先生。陈先生谈起四十多年前“七·七”事变后，陈嘉庚先生领导全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日运动的往事。他着重谈到了当年陈嘉庚先生是如何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服务工作的事。他说，当时南洋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者至为踊跃，有虚报年龄的，有女扮男装的，有瞒着父母和亲人报名的，有的已结婚有妻儿，却自愿放弃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和温暖幸福的家庭毅然应征的。他为到这些南侨机工回国后，是如何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为国殉职捐躯的英勇事迹。他还谈到了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攻入滇西进逼惠通桥，桥被炸，滇缅公路中断之后，南侨机工被裁员而失业，无以为生，沿街乞讨的悲惨情景等等。他对定居国内的这部分机工十分关心。接着，他表示说，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提倡撰写海外华人的创业史和抵御日本侵略的史迹。因此，他认为原南侨机工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包括他们后来蒙冤遭难的实况，应予撰写成史，载入史册，以教育后人。他提出，为了撰写这段历史以填补空白，打算组织新加坡若干华人学者赴滇缅公路考察，并访问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希望中国有关部门予以鼎力支持。

在交谈中，庄明老也谈了他当年在槟城是如何通过成立汽车司机公会来组织南侨机工报名，后来因被英当局以“危险分子”为由驱逐出境。在沿滇缅公路回国时，受陈嘉庚先生委托了解机工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此外，他还谈了1940年陪同陈嘉庚先生视察滇缅公路，解放后1955年陈嘉庚先生前往昆明和贵州等地探望原南侨机工的情景。当时，散居在西南地区的还约有二、三百人。陈嘉庚先生很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这次交谈临结束时，庄明老对陈共存先生提出拟组织考察访问团一事表示欢迎，他并示意要我谈一谈看法。我本来是不准备说话的，只好开口了。我心里想，如果能促进访问团的到来，也许有助于解决原南侨机工所申诉的问题，但又不便明讲。于是，我只概括表示：“撰写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希望访问团能成行。”“建议陈先生回新加坡后来信，正式地提出这一意向和行程的具体计划，以便向有关方面反映。”此外，我也介绍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的宗旨，并说明学会拟组织和推动撰写海外华侨华人诸方面的历史。同时，也谈到了不久前，在云南省成立华侨历史学会的大会上，我在致词中也已提出了应组织力量撰写南侨机工的历史。尔后，又安排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向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提供六千元的资助款项，作为搜集和编写南侨机工史料的经费。

离开北京饭店，在回程的车上，庄明老以不寻常的心情对我谈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完成三件事：一是收回在“文革”中被占云的北京“华侨大厦”，归还全国侨联；二是实现在北京建立“华侨博物馆”，以完成陈老（嘉庚）的遗愿；三是解决好定居国内的原南侨机工的问题，包括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

1985年9月的一天上午，庄明老将他刚收到陈共存先生的来信拿给我，并要我随后到他办公室商议此事。

陈共存先生在信中写道：“七七事变后，新加坡曾组织技（机）工回国服务，人数达三千人，其中有半数可能已成为无名英雄。此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可惜无人整理。陈嘉庚基金会愿意支持此事，拟组织一队人员前往中国考察，撰写有关此事的史料，届时希望中国也能大力支持此事，给予考察团以交通和住宿的方便。”

几天后，我在全国侨联办公会议的一次例会上，汇报了陈共存先生在约见时所谈的意向，以及他来信的内容，并提出建议应积极促成考察团来方的想法。这次办公会同意我的建议，并决定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联合名义接待来访，具体工作主要依靠云南省侨办和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给予协助。办公会议还责成我拟草《关于接待新加坡“华侨机工考察团”的请示报告》，报有关领导部门。1985年9月7日，请示报告呈上后，有关领导部门很快就批示，需与云南地方领导部门商定。

在与云南省有关部门联系的过程中，省侨联、省侨史学会和省侨办态度非常积极，并认真地做了许多工作。因此，接待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后来为了增强接待力量，也请了全国政协华侨组（华侨委员会的前身）和云南省政协共同来负责这项接待工作。

1985年12月初，经与有关部门联系和研究，决定由庄明老复函陈共存先生，正式表示欢迎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派考察团来访，并请他们通过我驻新商务代办提出申请，行期由他们决定后通知我们。

考察团最后通知，定于1986年11月4日飞抵昆明。我受命陪同庄明老于11月1日先行飞抵昆明。同行的还有著名电影演员项堃夫妇和全国政协工作人员牛石林。

11月4日上午，陈共存夫妇及随访的王素月女士（陈济民之夫人）、余惠贞女士等四人，自上海飞抵昆明；同是下午，考察团成员魏维贤、林孝胜和崔贵强先生等三人，则是自香港到广州转机直飞抵昆明。魏维贤博士时任新加坡工商银行董事会主席、南洋学会会长，林孝胜是新加坡国家口述档案馆的负责人，崔贵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当天，以庄明老为首的主要接待人员，到机场迎接贵宾的到来。

七位贵宾和庄明老等主要接待人员，被安排下榻在云南最高级的震庄宾馆。

11月5日清晨，陈共存、魏维贤、林孝胜、崔贵强四位客人和庄明老等主要接待人员、医生、保安人员一行十余人，分乘三辆车，自昆明出发。

新加坡三位随方女士因不宜远道劳累，留在昆明市游览参观。项堃因高原气候反应不适，留昆明住医院，未能随行。

出发的当天，车子跑了近四百公里路，迄晚上七时许才到达下关（白族自治州首府）。当晚下榻于大理州政府宾馆。

六日上午，与住在下关的三位原南侨机工座谈，请他们谈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情况，并对他们表示慰问。下午，安排了游洱海公园、苍山脚下的三塔和大理南诏国旧址等。晚上大理州领导人宴请洗尘。魏维贤先生因另有公务急需赴伦敦，故在宴席未散前，由我送他上车当夜返回昆明。我和魏先生是在这次首次见面认识的。在推动研究海外华侨问题上，我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故我们畅谈得颇知己。1985年5月，我们能携手共同推动在厦门鼓浪屿观海园举办战后海外华人国际研讨会，亦是以此为联系的开端。

七日清晨八时许，从下关出发，继续沿着崎岖陡峭的盘山公路前进，下午一时许抵达保山，行程约二百公里，途径澜沧江上的永保桥，下车摄影留念。永保桥是解放后建造的大铁桥，以代替当年的功果吊桥。当天下午，与当地六位原南侨机工座谈。其中一位名叫孙其文的机工噙着老泪哽咽地说，他在当年是隐瞒着父母和妻儿报名回来的。不久前经辗转托人与在马来西来的妻儿云了一封信，却遭到妻舅回信痛斥，说他无情无义，拒绝再作通信。陈共存先生十分关注此事，当即向他问清了通信地址，表示回去后要协助做其妻儿的工作，以求得谅解。

八日清晨，自保山继续出发，午后抵芒市。行程亦约二百公里，途径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松山戴安澜将军抗日阵亡纪念碑址时，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下车凭吊为国捐躯的烈士。

芒市是傣族自治州首府，当晚下榻芒市宾馆。宾馆是一座不久前盖成的傣族建筑形式的竹楼。下午安排与当地的几位老机工座谈，其中有一位是已定居在缅甸境内，特地赶来相见的。

九日清晨，从芒市出发，十时许抵达边界终端边陲市镇——畹町。在边防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以河流为界的畹町桥上。陈共存先生还走到桥中的中界线上，跨着双脚风趣地说：“我现在同时踩在中缅两国国土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啊！“在畹町市镇上，边贸市场十分活跃，街上摆满摊位，海鲜、瓜果和日用品应有尽有。随后，我们又沿着边界河的公路来到瑞丽渡口，登上边防海关楼上眺望河对岸一片朦胧的田野景色，好象在宁静地迎候着乘小木船过境的边民。边民早来晚归，多从事边贸。在瑞丽县政府的招待会上，遇见了一位印尼归侨，他是几年前自北京首都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此地的，现在已成为当地名医，深受少数民族兄弟的尊重。

午后，又自瑞丽返回芒市宾馆过夜。原计划于11日自保山乘小飞机回昆明，由于连日下雨，飞机停航，只好仍坐车按原路回昆明。

10日大清早，冒雨从芒市出发，马不停蹄地赶路，当晚七时才抵下关过夜。第二天大清晨，又从下关赶路，当晚六时许，终于顺利地回到昆明震庄宾馆。两天的回程，走完五天的去程，苦了驾车司机，乘车人也不轻松，幸好座车机器性能有保障。

滇缅公路中国段，以昆明为起点，要途径安宁、楚雄、南华、祥云、下关、流氓、漾濞、水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等十余城镇。这条公路，在解放后重修时，路段长度有所缩短，已全铺上柏油路面而成为高级的公路。但是，公路仍然要盘旋高山，翻越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飞渡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道路仍然险恶。由此而令人联想和怀念当年在这条险恶公路线上驾车驰骋的南侨机工，是有着何等的英勇献身精神和高尚品格！

回到昆明第二天，即12日上午，陈共存先生在圆通饭店与在昆明及从其他区县赶来的三十多位原南侨机工老人座谈、合影留念，并设千宴招待。当晚，又宴请云南省侨联、侨史学会、侨办和政协领导人及接待工作人员，以对东道主热情接待表示由衷的谢意。

13日上午，接到云南省委普朝柱书记于当晚宴客的请柬。此事使我油然想到几天来，庄明老多次谈到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事，正苦于无从着手。中午从餐厅陪同陈共存先生走出来，在漫步的小道上，我有意识地谈到晚上普书记要接见并宴请的事，紧接着就着重谈了纪念碑的事。陈共存先生会意地表示，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个好机会。

午休后，我陪同庄明老到庆云街省侨联会所。庄明老同关平，阮咏棠等侨联负责人，再次着重谈到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并急切地提出要以省侨联名义向省政府写申请报告，同我坐在一边的阮咏棠秘书长便当即向庄明老说：“已遵照您老的指示拟好了申请报告，准备这几天就呈上去。”但与此同时，阮秘书长又转过头来向我说：“报告如送上去，恐怕也难以办到……”这时，我就对他说：“报告暂不急于完稿送上去。”又说：“我已同陈共存先生谈了这件事，正好今晚普书记要接见，这件事会谈到，我会见机行事，将重要的谈话记录下来，抄给你们补进报告书上。”这时，庄明老露出了满意的神态，连声道：“好，好，好！”

果然，当天晚上在震庄宾馆一号楼会议室，普书记等领导人在宴会前亲切接见了贵宾和主要陪同人员。在交谈中，陈共存先生主动向普书记说：“海外华人对抗战时期回来的南洋华侨机工的这段历史很尊重，也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在昆明如果要为他们重建纪念碑，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表示一点心意，愿捐一万元人民币供建纪念碑，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表示一点心意，愿捐一万元人民币供建纪念碑用……”这时，我就赶紧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照片递给普书记，并略加说明：“这是马来亚华人分别在雪兰莪、槟城等地为殉难南侨机工所建立的纪念碑。”普朝柱在接过照片，仔细地翻看后说：“好，做个纪念！纪念碑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所以政府搞一个纪念碑很有必要。”在座的省政协主席梁家也支持说：“省民族博物馆正在筹建，该馆周围将建立一张纪念碑，如果南侨机工纪念碑能安排建在这个范围内更好。”

根据预先所考虑的，我在笔记本上，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交谈的上述原话。翌日，将记录下来的几段原话抄下，送给阮秘书长补进请示报告的文稿上。

请示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报告，于同年11月27日送上。不久，便顺利地批下来，同意着手重建。接着，由省侨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派员，正式组成纪念碑筹建办公室，推动此项工程的兴建。值得一提的是，筹建工作刚开展不久，却赶上国务院下文严禁各地正在兴起的建纪念碑和纪念馆热。于是，要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工作也受到冲击，有关领导机关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遵照国务院禁文下马，取消建碑工作；另一种则认为，筹建工作不能取消，应如期完成，理由是，筹建工作是在国务院下文以前已开始，而且，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不同于国内一般的建碑热。同时，它也关系到省领导人已向海外朋友许诺的事，不能说了不算数。幸亏如预先所考虑到的，在请示报告书上，录有普书记在接见考察团时所说的上述那段话。此后，经省主要领导人出来干预和表态，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才幸免夭折。

在重新确认建纪念碑立项后，筹建办公室就积极进行建碑地点的选择、设计、造预算和申请调拨建材等项工作。其间耽搁了一些时日，迄至1989年7月才竣工。

建碑工程共耗资十余万元。其中除五万元捐款外，其余大部分为云南省政府拨款。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也向建纪念碑工程捐了一万元。

如当初所意料的，促成新加坡考察团的到来，也促进了原南侨机工所申诉问题的解决。据1986年调查的情况，仅以机工定居较集中的云南省情况看，当时尚分健在的77人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6岁。来自马来西亚41人，新加坡24人，印尼和泰国等12人。原籍广东、海南的61人，福建16人。

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云南有关部门为上述77人解决了以下几件事：

一、清理机工档案91份，其中包括已故的14人。

二、纠正冤假错案10件，其中包括撤销原判而宣告无罪的、撤销因“海外关系”而被“内挂”的、并对因被批斗搞臭而予以恢复名誉的，等等。

三、补发因被错降级而扣发工资的五人。

四、解决住房困难的15户。

五、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供应商品粮等）。

六、发给生活困难补助款的31人。

七、协助调动子女工作的4户五人。

此外，就面向全国各省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而言，中央有关部门曾于1986年12月8日专门下达《关于给已退休的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生活补贴费的通知》。根据通知规定，对原南侨机工现居国内人员，由现支付退休金的单位每月发给定额生活补贴费；其补贴款数以补足其在退休前的标准工资总额为限。换句话说，他们每月所领取的退休金额，是其退休前标准工资的百分之百。

应该指出，当时由于国家实行低工资制，加之他们的工资定级偏低和近年来物价指数上涨，这补助仍显得微薄，但却也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

从全国各省来看，在解决原南侨机工所存的问题上，要数云南省地方落实得比较好，这与云南省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分不开。同时，新加坡考察团的到来，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昆明重建，对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意义。同时，它也象征着对南侨机工这段光荣历史的最充分、最崇高的赞扬。在参加纪念碑落成剪彩典礼上，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原南侨机工老人，感情非常激动，他以深沉的感慨话语对周围的人说道：“今天碑已建立了，我们别无所求，只希望祖国没有忘记我们，只希望我作古后的骨灰撒在这座纪念碑周围的，以了却我矢志报国的夙愿。”当年，南侨机工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即盼望在滇缅公路沿线上择一景色幽美的地点，为那些以身殉国的烈士造一公墓，以便将来侨胞回来凭吊时，好有一个慰藉之处。而今，“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落成，当是在更高的基点上实现了他们当年的夙愿！

后记

三千多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半世纪前华侨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大壮举。然而，世事沧桑，岁月流逝，南侨机工的事迹竟渐被遗忘了。为再现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面貌，经数年几易其稿，《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先生的鼓励与资助，是他大力支持我赴滇缅公路及西南各省实地调查研究，还亲自审阅书稿，给予指导，并在百忙中惠赐序言。还应感谢母校老师、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陈毅明女士的提携扶助，多年来她对本课题时时加以关切指导，为本书的编撰工作及联系出版事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且热情为本书作了序言，勖勉有加。还要感谢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郑民副秘书长，他在应聘任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期间，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为促成本书的如期完稿提供了保障，具体指导并审校了大部份书稿，花费了许多心血。

本书撰写、编辑与出版过程，得到责任编辑、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林树丹，北京新华社主任记者、《半月谈》杂志主编林双川，厦门大学林进川、华侨大学苏连成、著名作家陆昭环、著名电影作家洪永宏、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顾问刘宝全及泉州退休教师协会林开基、林飞龙诸先生的热情支持与鼎力相助。

非常荣幸的是，本书承蒙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博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先生等惠赐题词；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澳门侨联总会主席梁披云先生惠题书名，使本书增辉生色。本书的出版，还得到陈嘉庚国际学会、陈嘉庚基金会、厦门星集有限公司蔡光明董事长、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诸同仁的关心与支持，并得到华侨大学科研处的资助。

云、贵、川、湘、闽、粤、桂、琼等省各级侨务部门，云南档案馆及南侨机工联谊会，曾为本书的采访等工作提供多方的帮助。

上述海内外知名人士、良师益友及有关部门团体，惠我良多，在此一并谨致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谢忱！

由于本人阅历和水平所限，有关史料的掌握也还不够全面，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广大读者，特别是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予以批评指正。同时，恳切地期望海外南侨机工及其家属、亲朋好友继续提供有关资料，以便本书的姐妹篇——海外续编早日问世。

中国泉州 林少川谨志

1993年12月于华侨大学

  陈嘉庚，福建同安人，1874年生。9岁入乡间私塾，1890年出洋至新加坡助父营商。

       1904年自立门户，创设新利川与日新黄梨（凤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及谦益米店，1905年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着手橡胶种植业，又与友人合办恒美米厂，1908年改为独资经营。1910年加人同盟会。同年，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道南学堂第三届总理，是为致力教育事业之始。1911年，于曼谷设黄梨厂。同年十月，武昌革命军兴，住坡闽侨组织保安会，被举为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1912年，返国于故乡集美（今厦门市）创办制蠔罐头厂失败，改与友人合作，另组   大同罐头食品公司。同年，兴办集美小学校。1913年，再赴新加坡。

       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营橡胶、航运及白铁业，开始获利。战后专营橡胶业，先后于南洋各地增设橡胶厂。又陆续在新加坡创设南洋华侨中学，在集美开办幼稚园、中学、幼稚师范、普通师范、商科学校、女子师范、农林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在星洲倡建南侨女中及爱同、崇福等学校。1921年，更斥资创立厦门大学。1924年，于新加坡创刊《南洋商报》，并手订“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作为办报规则。翌年，橡胶价格大涨，获利近八百万元。于马来亚、荷印等地及香港、上海等大城市设分行、分店三十余处。总资产逾一千二百万元，是为其企业之极盛时期。1929年起，受世界经济大恐慌影响、企业损失巨大。1931年，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企业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1933年，《南洋商报》被迫出让。1934年，公司歇业。1936年，将厦门大学交由教育部接办。

       抗战爆发后，领导南洋侨界筹款，抵制日货，并动员南洋侨界参与抗日运动。1940年，率侨团返国，至各地慰劳考察。访问延安期间，备受中共影响，认为重庆“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延安则“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1941年，先后任南洋闽侨总会及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并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942年，于新加坡沦陷前，避居爪哇。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由爪哇返回新加坡。1946年，致电美国政府，吁停止封国民政府之一切援助。同年，发刊《南侨日报》。1947年，又创办《南侨晚报》。

       1949年10月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至1961年，先后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1961年病逝于北京。著有《华侨领袖陈嘉庚救国言论集》、《住屋与卫生》、《南侨回忆录》、《我国行的问题》、《陈嘉庚言论集》、《新中国观感集》、《五万里路祖国行》等。

   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夏塾师谢世，辍学出洋。时已有简单之日报，余仅一知半解。在洋就商之后，对学问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念无甚成绩可纪，故生平未当记载。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消声灭迹矣。抗战胜利后，我国史书即有记载，亦不过略提海外华侨曾捐助慈善救济费若干已耳。至于我南侨如何辛苦募捐，同仇敌忾，抵制敌货，严惩奸商，牺牲若干，数年如一日，以及祖国战时所需金钱与华侨有如何密切关系，当然无由得知；而后人或难免以为当国家存亡关头，千万华侨不思回国报效，尚在海外逍遥也。余忝任南侨总会主席，所居新加坡为南洋最重要商埠，且曾回国慰劳，对国内政府及战区官长多有接触，对南洋各属侨胞筹款会，更有往来，所以知之甚稔。自新加坡失陷，避匿爪哇，闲暇无事，乃思写此“回忆录”，不但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亦可免后人对今日侨胞之误解也。为记述南侨对抗战之工作，故并余以前些少服务社会之事及南侨概况约略记之。书末复附个人企业追记一篇。全书计三十万言，最大部分为记录南侨襄助祖国抗战之工作，次则为余服务社会之经过，再次为个人以前之营业状况。所以补记个人之事，则因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要之余书虽属记载性质，而材料亦甚繁多，然其中固有一贯之根本意见，非杂凑而成书。兹请撮其要点，申述于此，以作导论。

       祖国前受制于清廷，政治腐败，国弱民贫。迨光复后军阀专横，官僚贪污，农村破产，百业落后。日本乘危打劫侵占东四省，继将进而并吞华北各省。幸英国派员助改币制，统一财政。然所有国内白银，多被政府没收，输往外国，而代以纸币，复于数年间发出巨额公债票。唯因外强中干，债票在市面价值仅五六成而已。政府财政之困穷，社会民众之贫苦，毋庸多赘。

       我国各业既落后，洋货复自由入口，清朝时每年已入超数万万元，民国光复至七七事变廿余年中，入超近百万万元。我国既不能出产金银，其所以免致破产者，端赖海外华侨逐年外汇输入现款二三万万元，故能抵塞漏卮。外国人以货品出口换金钱，而我国则以华侨人身代之也。

       战争之国最需要者人力与金钱。外国逢有战争需要金钱，多是发行公债，向国民息借。我国政府亦不能例外，然政府素乏信用，民众又患贫穷。抗战后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虽如何极力推销，总不能达到半数。如闽省由中央政府分派八百万元，经省政府悉力强逼，甚至捕人封屋，竭泽而渔，经年以后，结果仅销四百万元。其他各省可以想见。然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每次五万万元，至民国廿九年，抗战已三年半，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万万元，除首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银行何以有此能力？此则利用华侨汇款做纸币基金耳。

       抗战第四年（民廿九年）春，据何应钦部长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客年全年战费共开出一十八万万元，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归国币十一万万元，义捐交政府约十分之一，余为私人寄家用者，从中南洋约占十分之七有奇，余为美洲等他处。按华侨外汇之款，概是现金，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公例，有基金一元便可发出纸币四元，其信用便可称稳固。政府如以十一万万元现金，存中外银行做纸币基金，便可发出纸币四十四万万元。除十万万元交还侨眷家费，尚可存三十四万万元，除抵补是年战费十八万万元以外，尚有十六万万元也。

       我国自抗战以后三四年中，俄国借助我军火值三万万美元；英国自初开战时，借我现款五百万金镑，以维持国币基金；美国以货物交换，借我值四千五百万元美元之物品！除此而外，未有其他现金资借也。

       我国战费及政费，所需金钱，既与华侨有密切关系；华侨应如何竭诚努力，以尽职责，大可以救祖国之危亡，次可以减将士之死伤。然若考究其实，则遗憾甚多。南洋侨胞虽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其中暹侨五百万人被当地政府压抑不得公开援助祖国，而各属侨生约一百万人则多乏祖国思想。此外，尚有五百万人之众，其中殷富侨领不少，如肯努力提倡，义捐及增寄家信，至少可加一倍。然或以领导不力，或袖手旁观，致成绩有限。故祖国虽遭此空前危险关头，而南洋华侨既众且富，义捐及私家汇寄，犹未及在洋资产十分之一也。

       自敌南侵（民卅年十二月）后两三个月，南洋各属地都归失陷，华侨汇款概行告绝，其他美洲等侨汇，亦因香港失守，机关欠灵，阻碍不少。自民卅年以后，我政府既无侨汇现款，可作国币基金，而银行纸币，仍旧增发，以抵政府续发之公债券。加以政治不良，污吏奸商舞弊囤积，由是货物昂贵，战费大增，而政府又不得不增发纸币，以资周转。纸币愈多，价值愈贱，物价亦愈膨胀，此皆由乏相当基金存于中外银行之故，由此更可证明侨汇与祖国之关系。

       自民廿九年夏，法英战败，敌乘机侵人安南，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东亚方面，中国为战线要冲，将来中美必须联络，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而金钱与军械，则赖美英供给。故美总统屡派代表，或借名中国顾问，与我政府磋商，其最重要条件，即是财政公开，政治民主化，避免国内分裂，方能一致对外。经历有年，结果无效。迨至日本南侵，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以为大敌日本，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而眼中钉之中共，使可乘机制裁，即转一部分军力封锁其边界，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此次世界空前未有大战后，各国政体必多改革，民治化势力蔓延，决不容野心独裁盘踞误国。我国惨遭战祸时期最久，而战后之幸福亦必最大，所获利益亦必最多。兹举其大者而言，对外如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百年来所丧失之国土与各租界，及没收敌人在国内所有业产，至于以前所负不平等外债，亦可脱卸；对内则改革政体，实行民主政治，兴办交通，振兴工业，改善农村，提高文化，注重卫生，以上诸事均为我事事落后之中国所独有也。

       我国经大战之后，民治政府百端维新，而卫生端在首要之列。卫生事项虽多，而最困难最重要之根本，则为住屋问题。我国自来人民生死未有登记，设有登记，其数必甚多。余住新加坡五十余年，自初到时当地政府对卫生已有相当设施，而市民每年死亡率，每千人平均廿四五人。迨至近今廿多年前，（民国十年间）市政更大改革，将全市总计划，凡新建屋宅，须照政府计划办理，旧者则逐渐改建，其要点为留街路，留空地，开门窗，留天井等事，目的在使日光空气可以畅达。十余年间改革完竣，而市民死亡率，遂减去十分之一有奇，每年每千人平均仅死十五人而已。余前者回国慰劳，经历十余省，所见城市之住屋街路，大都不合卫生，认为此事极关重要，于民族前途大有影响。各地城乡曾为战区者，其住屋之破坏固无论，即未沦陷之地亦多有遭炸毁者。乘此战后复建之际，各地方政府应就全区通盘计划，颁布合于卫生之建筑规则，使人民遵循。新者全照规定，旧者逐渐改变。从此一劳永逸，他日无须重拆，则卫生之基本已立矣。此事有时间性，逾时即不及，故余特印行《住屋与卫生》一小册，以宣传之，并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以提倡之也。该小册亦附于本书内。

       此次胜利国诸大领袖，均有伟大善愿，欲措世界各国于长期和平之前途。然欲违此目的，必须监察既往，揣度未来，以公平道义为根据，消除不平及无理之旧状态，方能熄灭战争之导火线，而达到弭兵之期望。就东亚言，安南为我国属土，已有两千一百余年历史，不幸为法国占夺，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苏美英诸领袖果真有长期弭兵之诚意，必须将安南之法国政权取消，方能拔除战争之祸根也。本书末附中国与安南一文亦即发挥此意。

       此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诸领袖，既欲以道义造福人类，当然对于不平等苛政，不仁义权利，必须铲除或改善。华侨亦在联军之列，战时共同遭受惨苦，战后各属居留地政府对于华侨，不宜仍照以前苛待，而应改善待遇。例如以前各属地之限制华侨人口，征收人身税，禁止土地权，限制教育，及其他不平等条件，以及鸦片公卖等陋政，必须消除或改善。本书中亦常提及此等事。

       要之，本书虽属事实之记载，然其性质颇有关于社会风化，立身人格；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本书节数五百余，头绪繁多，且系按时间先后记录，非按事件之性质，故粗观目次，不能明其内容，按其性质略分为以下诸项：

一、福建光复时本坡汇款接济及孙总理回国事。

二、集美、厦大两校经过，及南洋华侨教育事。

三、福建救乡会及“济南惨案”及其他社会事件。

四、七七抗战后南洋各属筹款会及南侨总会工作经过。

五、机工及慰劳团回国，及余亲历十余省见闻之状况。

六、陈仪祸闽及余抗议事。

七、余与蒋委员长、毛主席及各战区司令官长等人恳谈之语。

八、日寇南侵华侨抗敌动员及沦陷事。

九、战后补记附《住屋与卫生》《中国与安南》诸文。

十、个人企业追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于新加坡怡和轩

  余二十余岁时，在新加坡见友人珍藏一本药书，名曰《验方新编》，云某友赠送，无处可买。其时上海书局尚未印售。书内注云，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送。据友人所言及余自己经验，其方颇有应效，故余甚为注意。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乃备款托香港友人汇往日本定印，每本三角，前后数次，共印六七千本。书面标明“同安集美陈家奉送”。最后一次定印五千本。其时余适回梓，约半年之久，尚未寄到。余及港友屡函日本该会馆查问。据复久已寄出，迨后港友查悉，该书在日本托出口商店代寄，该店寄时适倒闭，致失手续。运到香港日久，无主向领，致被船栈拍卖，料该书必散在广东矣。其后多次与该会馆交涉无效，不但不肯认错，且完全不负责任，由是不能继续印送，不胜遗憾之至。

       自该帮药书被误后，与该会馆遂绝来往，由是有怀莫展。过后多年乃思向上海书局定印，并拟广集国内及南洋经验良方，以增补该书之不足。不但余义务印送，而公开与印刷家售卖，亦可推广。故不惜报费，在天津、北平、汉口、郑州、南昌、长沙、济南、安庆、南京、杭州、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广州、梧州、汕头，及南洋各大埠，登报日广求云，“凡存有经验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请惠示济众，将药方及住址写明寄交余商店或报馆代转”。并言“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凡有惠寄者待印就时当赠送一本”。月余之间，中外惠寄者千余方。编辑既就，拟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新方编竣未寄，适上海世界书局派代表来洋招股，乃向其定印二万本，国币五千元。将新征各方抄一份，及验方新编一本，备交该局代表带去。数月后如数印就。除分送诸赠方者及余国内诸分行取去赠送外，约存一万本。以半数在闽省分送，半数寄来南洋应各处需求，已存无几。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前日寄赠某方，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而所印书作二两，关系至重，请查谁错”。余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乃请人将全书查对，又觉印错不少，事关人命，抱憾无似。虽欲收回，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即向世界书局严重交涉，只有认错而已；若认真计较，或需兴讼公堂，亦非余所愿，由是该书遂复失意停顿也。

       余原拟定印二万本，后以闽省各乡村如分发普及，须再印若干本，计全省作二万五千乡，小乡一本，大乡二三本，五六万本便可普赠，费款仅一万余元。不图前为日本中华会馆运寄失误，而后复为世界书局印错所沮，使余志愿末达。然终不能去怀，乃思重编自印。遂雇一略知医学之人及一书记，专工将新旧方斟酌校对，历经数月全书修正。交本厂印刷部经理陈辉煌君付印。乃挨延日久，及至余有限公司收盘，印刷部被南益购去，而所编书稿陈君竟失于保存，增余无限遗憾。再后战事发生更无暇计及，战后力能办到者，决重行登报征求编印，以遂宿愿也。

 余年三十七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清廷脱离关系。是年新加坡道南学校举余任总理。其时校中理事三十余人，后来改理事为校董，总理曰董事长。向黄仲涵捐款一万余元，购置校址。余乃提倡向闽侨募捐四万余元，建筑新校舍。其时国内学制虽已改革十余年，而南洋学校寥寥可数，新加坡只有广帮之养正学校，闽帮之道南学校，潮帮之端蒙学校，客帮之启发学校，琼帮之育英学校而已。女学校仅有广帮一校，余均未有。时社会甚幼稚，侨民只迷信鬼神，爱国观念、公益观念均甚形薄弱。

我国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住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复。”越日黄君回电云：“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即汇去国币二万元，并电云：“厦泉漳素多匪，乞维持治安，款可续汇。”越日孙都督回电云：“款收，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至感。”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盖光复初，库空如洗，民心动摇，二万元收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云云。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经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故就新加坡筹备全副机器，并向日本聘一海产技师，民国元年秋回梓经营罐头厂，数月无效（见附录）。集美社始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移来，已历二十余世，男女两千余人，无别姓杂居，分六七房。各房办一私塾，男生一二十人，女子不得人学。各房分为两派，二十年前屡次械斗，死伤数十人，意见甚深。兹欲创办小学校，必须合乡一致合作，将各房私塾停罢。幸各房长听余劝告，于民国二年春所有子弟概人集美小学校，校舍暂假大祠堂及附近房祠堂开幕。学生一百五六十名，分五级，应聘校长教员七人，而同安全县师资连简易科毕业者仅有四人，一人改从商业，尚余三人，乃聘来两人。查同安全县人口二十余万人，只有县立小学一校，学生百余名，私立四校，学生三百余名，连集美共六校，学生不上七百名。师资既缺，学生亦少，成绩更不足言矣。

      余此次出洋十余年，对本省改革教育事，成绩如何多不知，及回梓办学，始悉教育不振之原因。如同安县立小学校，学生一百余名，十余年未有一班毕业生。其原因为权操县长，由彼委一绅士任校长，教员学生全由该绅招来，若更动新县长，则别委他派绅士为校长，全校更动，教员学生均散去。十年余间县长更动许多次，而该校逐次随之改组，故未有一班毕业。学制改革初期，以县立小学为模范领导全县，乃自身如斯腐化，不但无毕业生可升师范中学，且影响全县小学校成绩，其贻误可胜言耶！

 同安师资缺乏，闻他县亦多如是。而全省师范学校只福州一校，办十余年，在校学生三百余名，经费充裕，闽南学生甚难参加。漳州虽有一校，甫办末久，经费困乏，学生仅百多人，成绩鲜闻。余乃往福州查问师校成绩，及闽南学生如何难入。乃知自来腐败，迄今仍旧。该校自学制改革时，设立已十二年，学生常三百余名，学膳宿等费均免，奖励学生优厚，未毕业时声誉崇隆，似前清秀才风度，四年毕业后，约当举人资格。由是求学者争先恐后，每年招生二班八十名，多不公开招考，盖官僚教师及城内富人豪绅之子弟，早已登记占满，闽南人焉能参加。所收学生既无执教鞭之志愿，又非考选合格，程度难免参差、学业勤惰更所不计，只求毕业文凭到手，谁肯充任月薪二三十元之教师。故闽北虽有此校，而小学教师仍形缺乏。即使每年七八十人肯出任教师，亦是杯水车薪，况其中多属膏粱子弟，教职非其所愿。不知小学教师一职，唯有贫寒子弟考选后经过相当训练，方能收得效果。乃当局违背此旨，师资安得不缺乏。学制改革已十余年，以前之旧学先生日减，乡村私塾大半停歇，新学师校则腐败如此，吾闽教育前程奚堪设想！余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己。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余自省垣福州回梓里后，决意建筑集美小学校舍。然集美乡住宅稠密，乏地可建，且地形为半岛，三面环海，田园收获不足供二个月粮食，村外公私坟墓如鳞，加以风水迷信甚深，虽欲建于村外亦不可得。幸余住宅前村外之西有大鱼池一口，面积数十亩，系昔从海滩围堤而成。乃以二千元向各股主收买，做集美校业。从池之四围开深沟，将泥土移填池中，做校址及操场，高五六尺，俾池水涨时，免被侵及。即鸠工建筑校舍，可容学生七班，及其他应需各室。夏间完竣，全校移人。

民国四年天津水灾，新加坡华侨筹款救济，开游艺会及募捐，举余为主席，计募二十余万元。此为华侨开始不分南北畛域，及对祖国义赈破天荒之成绩，乃光复后民气进步之效果。回忆光复前数年，新加坡闽侨初拟办一小学校，在天福宫开会，资本家及富商多到，议捐开办费及基金，诸富侨咸都踌躇互相推诿，观望不前。有普通店东谢君有祥自动倡捐一千元，大众多仰其慷慨，盖自来捐助公益义风未振，许时之一千元不亚现在万元。于是资本家及富商不得不跟同认捐，最多者二千元，先后共筹三万余元，该校即道南学校也。民国光复之年，余任董事长，做第二次募捐建筑新校舍，筹四万余元，遂成立今之校舍。

民国二年秋余复南来。不久欧洲战事发生，余因租轮船及购置轮船，并因黄梨厂树胶厂颇有所获，故决意创办师范及中学等。民国六年春商遣舍弟敬贤回梓，负责建筑校舍，并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全校校长教职员等。定期新春开课，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至课室校址，则从鱼池地小学校舍后方及左右起盖，礼堂膳厅宿舍操场等，购鱼池后田地，填筑兴建。自此之后，所有以前风水迷信，及居奇阻挠各事概已消泯。凡学校所需地皮，比通常地价加倍给还，公私坟墓亦然，且酌贴迁移等费。故初时校舍多建在低田卑地，而后来则概在坡上。东与集美乡村毗连，西与岑头、郭厝二村相近，北多田地尚可扩充，南虽有坡地，然临海，不宜建筑，恐碍观瞻。

集美师中学校初办时，收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帐，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至新招师范生，因鉴于福州省立师校偏僻，故力思改革，以期普遍。又恐殷实子弟志愿有乖，毕业后不肯服务教职。乃函告闽南卅余县劝学所长，请于每一大县代招选贫寒学生五六人，小县三四人，共一百廿余人，并烦注意人选，详填履历，到校时加以复试，凡违背定章或不及格者决不收容。经如此严格取缔，故各县选来诸生大都相当不错。再后逐期招师范生仍依此例，数年后已无须防弊，始取消此规例。至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如有志回国升入中学者，则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绍函，概行收纳，到校时如考试未及格者，则另设补习班以教之。此为优待华侨派遣子弟回国而设，此例永存不废。

民七年夏初舍弟不得已亲往上海别聘校长，其他教职员亦由该校长负责聘委，准秋间来校接办。秋季开学后，冬初接舍弟函云，“新校长及教师比前好些，但教师尚有缺点。校长自承认仓促托人聘来，故有此失，待年假伊回上海亲自选聘”云云。余则认为不妥，复函舍弟云：“聘请教师非同市上购物，可以到时。选择校长若能用人必及早行函往聘相知，如脑中乏此相识者，则函托知友介绍，非充分时间不可。况年终时稍好教师设有更动，早被他人聘定，决无待价而沽之理，希告知之。”迨元月校长回来，云好教师难觅，并通知暑假辞职，嘱我及早别聘校长等情。

余既鉴于闽南师资缺乏，而中等教师想更困难，且素居南洋，与闽省教育界绝不相识。兹欲办师范中学，需用校长教师多位，不得不托人由外省聘来。素闻江苏学校发达，教育称最，南洋小学教师多向该省觅聘，如本坡道南学校教员，亦由上海聘来。乃往询道南某教师，彼由何处何校出身，答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余即修函托该校校长代聘校长及教职员，准民七春开幕，蒙复函接受，即派筹备员来集美筹备一切。开学后觉教师多不合格，办理上亦多失妥。缘与集美小校十数教师比较，优劣易知，幸立约仅试办半年耳。

余接舍弟函告后，适黄炎培先生南来，不日将回上海。黄君为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在教育界鼎鼎有名，曾办一职业学校，余认捐一万元，故颇相知。教育事业为彼最注意之任务，南来视察原非他事，余故将集美学校经过详情面告，且告以欲急进扩大规模，求其代聘校长教职员，承蒙许诺。余又告以再后两三月将回梓里。黄君约到厦门时可电知，彼或亲来集美参观。余又致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查询“本学期贵校闽省籍有何科毕业生若干人，肯来集美服务否？”蒙复知有五人。五月间余回梓立电知黄君，黄君招同学友陆君来见，云校长未聘，教师聘定二人。而集美已定六月一日放假，相距只数天，全校教职员大都辞退，秋季又拟再招新生三班，统算全校教职员须四十余人。余不免情急，乃转商黄君，校长仍托彼代聘，其他教职员可就地尽量聘请。黄君赞成之，于是将旧教师选留二十余人，并电北平聘请五人，又托人就本省内再聘数人，尚缺六七人，即电上海黄君访聘，八月杪开课，黄君仅聘到一校长及教师五人耳。

 新校长为浙江人，系北京高师毕业，曾留学日本，原籍泉州，故能说泉州话。到校后余告以“现尚缺教师数人，新春拟续招新生两三班，省内教师已乏，请于省外预早谋聘”。迨将近年终，余讶其无何表示，复提两次亦无确息。不得已乃托人代觅数人，由校长聘来者仅两人而已。余见彼才干庸常，办理校内事无何可取，对外聘请教师又短绌，此种人才若任一小规模学校或可维持，若集美学校日在进展，绝非彼所能办。余由是优虑焦灼，不可言喻，盖未及两年已三易校长，外间难免讥评，而不知当局负责苦衷。但虽焦虑萦怀，亦未便轻向人言，再觅校长既无相知人才，屡屡更动又恐不合舆论，惟含忍静待而已。乃至春未，彼竟来函云至本学期终愿辞职，其原因为顷间与国文主任发生刷烈争诟，意见既深，难以共事，余复函婉劝而不挽留也。

由上述经验，渐觉集美校长从外省聘来实属错误。盖校长既用外省人，教师亦当由外省聘来，本省虽有良教师，校长亦不能聘用，从外省觅聘许多教师，又甚觉困难。好教师多不肯离乡井，间有愿来者，多不待期终回去。原因多端，或思恋家乡，或被旧校或母校函电催返，此为两年来常有经验。故虽诚挚如黄炎培先生，亦爱莫能助。余既明白了解此弊，今后绝不复向外省求聘校长。拟待本省有相当人才，然后慎重聘请，否则虽暂时虚位，亦属无妨。故秋季仍添招新生积极筹备，并托人于省内外预聘教师，新校长虽未聘，余心颇宽舒无甚焦虑。迨暑假既近之日，适安溪叶采真先生来厦，因友人介绍初次识面，同余来校参观，余又送其回厦。在电船中往返言谈，已略识其才干，并认其有负责气魄，即聘为校长，校中一切信任办理，余绝不干预，集美学校从此安定矣

余以本省海岸线长，渔利航业关系非尠，故拟办水产及航海学校。乃致函上海吴淞水产学校，托代聘一二位教师，据复函云，水产教师国内无处可聘，伊校亦甚需用仍付阙如。现有两位高才生本届可毕业，如有意，可资以经费往日本留学，两年后便可回来任教师。余即回函应承。故民国九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得以开课。并向德国购全副机器，在厦门造渔船一艘，为全班学生出海实习之用。此种学校闽粤均未有开办，恐招生不易，故待遇同师范生，学膳宿均免。四年将毕业时，念该生等恐乏出路、特向法国购捞鱼轮船一艘，来厦捞鱼，成绩不劣，每次来回数天满载海产物三百余担，多系大鱼，素所罕见。第以厦岛销路短少，他处交通不便，不但售价廉宜，尚须约十日方能售完，冰块尤贵，每吨十五元，不唯乏利且须亏本、余原非为自家营业计，系出于提倡之意，原拟如有利，则招各鱼商组织股份公司，扩大渔业，不图竟无利可获，乃将该船驶往上海捞鱼。其后水产航海学生毕业后，均有出路，而尤以航海为易。然每年毕业仅一班二十余人，其原因为本地渔利未畅，故向学者少，或志愿不坚畏怕风浪，致未毕业便去也

  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科学落后，水利未兴，改良无法，故收获不丰，民生困苦。本省虽临海，农业实占一大部分，尚乏农林学校，以资研究改良。余对于农科尤为注意。民十二年函告叶校长，在天马山或美人山麓择地开办，土质虽欠佳，可以肥料补助。此事筹备建设等费去十余万元。开课后疾病频发，尤以疟疾为酷，历年如是。虽学生热诚向学，而阻碍非轻。且自开办以后数年间，闽南治安不良，盗匪纷乱，校内物畜屡遭抢劫，阻挠学业，亦一原因。否则农校毕业生更有出路，各县需用不少。兹拟待战事后，极力设法消除毒蚊，冀可挽救而谋进展。

美学校自民国九年，添办女师范及幼稚师范，其待遇与男师范同，又办商科，待遇则与中学同。唯小学校规定不收客生，盖小学校应鼓励各乡村自办为最要，集校如收纳，不但不能容多人，如外乡有钱子弟多遣来学，便失在乡提倡之义，反有损无益，且能占去中学生寄宿位。若南洋侨胞有意遣回子弟就学，以及教职员家属，则尽量接受之。余曾往厦门参观日本人一间小学校，学生百余人，大半我华人，校长教师三人为日本人，余教师则华人。校中玻璃橱内陈列山海各种标本不少，余询从问处购买，校长答概系件与两日人教师在本地采取制成，只玻璃橱为购得者。伊等三人各任一部从其所好，如海产诸物、陆上动物及矿产等。每星期日自动负责采取，校内裁花不少，亦系学生工作。余见此情形异于我国教师乏自动性，颇生感想。余在新加坡所识美教会那牙校长，连分校学生数千名，终日事务丛脞，而星期日倘招一班学生补习，彼则义务亲教之，其自动负责勤劳如此。我国教师任务既异外国人，而学生又风潮时起，全国汹汹效尤，尤以民国八九年至十四五年，此七八年间为甚。教师既如此，学生又如彼，社会报馆不辨是非，政府机关得过且过。私人负责办学既属少数，或认捐多少钱为己尽责。若余亦何独不然，虽明知其弊亦无法改善。转念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所谓聊胜于无。余既明白了解斯义，故一意热诚致力，毫无反顾，绝不因学生罢课，校事乖舛，财项有些差弊，便即缩手灰心。窃度民国初基，政局未定，质虽有差，量不可无，如水太清则无鱼，欲速反不达。华侨一富商住居鼓浪屿，在故乡南安办中等学校一所，甫办未久，因钱财有何差错，曾对余叹息曰：“吾侪前云赚钱难，今日方知用钱更难也。”后竟停办。盖立志不坚，且不了解过渡时期之应有困难，难免不因噎而废食也

 余为提倡及改善闽南教育计，派人调查县立小学办理不善者，助费改善之，或另设模范小校为领导。泉州有一私立中学，系诸学界人苦心创办，成绩颇好，后因经济困难，将停止，余念泉城为文化之区，不忍放弃，故捐资维持。同安本县华侨在南洋众多，富商及中等商人不少。余乃提倡全县十年普及教育，按每年创办小学二十校，每校平均至多助费一千元，十年二百校，从中富侨自己创办者按五十校，尚缺一百五十校，十年之后每年十余万元。以同侨财力一人可以负担，况富侨百数乎。乃将此计划函告新加坡同侨征求同意，捐资分特别捐及常月捐两种，待进行顺利后，推及马来亚及荷印安南缅甸菲岛等处。由民国十年至十一年两年创办四十余校。而新加坡同侨认特别捐三万余元，常月捐每月数百元。迨收款经年之久仅二万余元，余多互相观望或推诿，除极少数营业不佳外其他亦拒绝不交。为此当然不便推广续捐，而在乡增设学校亦即停止矣。

民国十年秋厦门市政会将开彩票，事前各日报未有登载，余亦绝未闻知。是早余往观厦大建筑校舍，忽见市街上贴一大张广告，标题曰“奖券”，详视乃知是月杪将开彩票，距离只二十余天。此系最初次开彩，售票四万元，再后每月定开一次，可增至若干万元，则视销路而定。其广告中极力宣传，如“大公无私”，“主持者概系厦中名人”，“费少利大，利权不致外溢”，极力鼓励推销。余乃往见各日报负责人云：“此种彩票乃大赌博，将来贻害闽南非少，况厦门台人横行，更有所借口。市政局系欲利益民众，兹乃首启祸端，请贵报著论驳斥。”越日，各日报绝无一言。余不得已乃致函市政会（办事处设总商会内），劝其取消，并请答复，越日亦无消息。余复致函其主任，告以日期已迫，请速复，亦不理。余不得已乃作文将其广告中逐条驳斥，并详述将来利害，月月增加，可售至数十万元，吸收全省膏血，贻祸至大，而尤以贫民为甚。劝民众勿被欺诈，以消弭惨祸，该局如不从劝告取消，余当别筹对待之法云云。此文缮就后送各日报发表，另印多张分送市民及市政局董事。余意此文发表后，再看几天，如无相当表示，拟召集厦门民众大会，讨论彩票利害。如未达目的，则再召集学界，或鼓励学生示威反对，或待其开彩时破坏之，缘彼要开票必须在公众场地，任人参观，以昭公允，而扬声价也。不意该文发表后，不但无人续购彩票，而前日已购诸人且纷纷退回，两三日内退回者大半。盖彼系托厦市各钱店销售，十余日间已售出七八成，再数天立可售完。方自鸣得意，谓厦门一埠如此易售，将来普及全省定可增许多倍，视余之反对置之度外，不图各钱店纷纷将彩票退回，于是急召集市政董事开会，全体三十余人齐到，为该会破天荒之盛举。董事中多有住厦门之南洋富侨者，结果无法支持，唯开办费四千余元，由某富侨负责收场。可见我国政府社会豪绅虽坏劣，若遇事肯见义勇为，出而公开纠正，则民众定不盲从，少却许多苛政祸害矣。事后余因建厦大校舍用料，往厦门海关查询税饷。该关主事英人，见余甚表敬意，云伊前日阅报见余逐条驳斥彩票之害，深为感佩。余云实出于不得已，非故欲开罪于许多绅豪。渠云西哲有言：“当为人模范，勿模范于人。”君实堪为贵国之模范人物云云。足见洋人之乐善，虽异国事亦能表同情也。

民国八年夏余回梓，念邻省如广东江苏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意倡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三百万元，做十二年支出，每年二十五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窃度闽侨在南洋资财千万元，及数百万元者有许多人，至于数十万元者更屈指难数，欲募数百万元基金，或年募三几十万元经费，料无难事。而校址问题乃创办首要；校址当以厦门为最宜，而厦门地方尤以演武场附近山麓最佳，背山面海，坐北向南，风景秀美，地场广大。唯除演武场外，公私坟墓密如鱼鳞。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备以后之扩充。然政府未必肯给全场地址，故拟向政府请求拨演武场四分之一为校址，乃在厦门开会发表此事。

政府既许拨演武场四分一为大学校址，乃托上海美国技师绘校舍图。其图式每三座做品字形，谓必须如此方不失美观，极力如是主张。然余则不赞成品字形校舍，以其多占演武场地位，妨碍将来运动会或纪念日大会之用，故将图中品字形改为一字形，中座背倚五老山，南向南太武高峰。民十年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奠基。左右近处及后方坞慕石块不少，大者高十余尺，围数十尺，余乃命石工开取做校舍基址及筑墙之需，不但坚固且亦美观。而墓主多人来交涉，谓该石风水天成，各有名称云云，迷信之深难以言喻。余则婉言解释，至不得已则暂停工以顺其意，迨彼去后立再动工，因石众多，两三天大半都已破坏，虽再来交涉亦莫可如何，惜然回去。数月后拟再建其他校舍，不得不迁移坞墓，为屋址，乃将演武场后诸公私冢墓，立碑标明，限日迁移，并在厦门登各日报，如不自动迁移，本大学则为代迁，并规定津贴迁移费。且在数里外之山腰买一段空地，备作移葬地位。从此顺序进行，依限自迁或代迁，绝不致再发生交涉，或其他事故矣。演武场地界面积约二百亩，下系沙质，雨季不湿，平坦坚实，细草如毡。北负高山，南向洋海，西近厦港许家村，东系山坡及平地。昔为阅兵场，自厦门与洋人通商，兼作跑马场，后来阅兵与跑马均废，被洋人辟为“哥耳夫”球场，厦大建筑时概已收回。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须费远虑。西既迫近乡村，南又临海，此两方面已无扩展可能。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计西自许家村东至湖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亩，大都为不毛之公共山地，概当归入厦大校界。唯南普陀佛寺或仍留存，或兼作校园，至寺前田地，厦大需用时，则估值收买之。厦门港阔水深，数万吨巨船出入便利，为我国沿海各省之冠。将来闽省铁路通达，矿产农工各业兴盛，厦门必发展为更繁之商埠，为闽赣两省唯一出口。又如造船厂修船厂及大小船坞，亦当林立不亚于沿海他省。凡川走南洋欧美及本国东北洋轮船，出人厦门者概当由厦大门前经过，至于山海风景之秀美，更毋庸多赘。日后如或私人向任何方面购买上节所言校界范围山地，建私人住宅，则当禁止或没收之，以免互相效尤，因私误公也。

 汪精卫在新加坡原与余相识，民国九年来漳州访陈炯明，余邀到集美参观。回去后来函告予愿任厦门大学校长，余复函应承，其夫人亦来住鼓浪屿。然不久因粤军回粤成功，彼便来函辞职，谓将回粤办政治无暇兼顾。由是厦大乃组筹备委员会，举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胡敦复、汪精卫、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黄孟圭等为筹备员，在上海开会，举邓翠英为厦大校长。邓君即派郑贞文、何公敢两人来集美筹备一切。时厦门厦大校舍未建，拟假集美校舍开幕。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厦大在集美正式开幕。适美国杜威博士游历上海，故请来校参加，邓校长亦于近甫日到。学生一百二十名，闽生约占半数。闻邓校长开幕后即将北返，彼原为北京教育部参事，当筹备委员会公聘时，关约声明须辞去教育部职务，然彼未有辞印，故欲急回，而厦大校长居然由他挂名，校务交郑何二君。此种挂名校长虽他处常有，若厦大当然不可。郑何二君知余意志，力劝彼暂留勿回，迨至月杪邓君接学生无名函，骂他无才学且欲作挂名校长，若不自动辞退，不日诸生联名攻击，列首名者即是我，邓君于是来函辞职，余亦不留也。

邓君既去，余即电新加坡请林君文庆担任校长，林君于秋间开课前来到。开课后召诸生口试英语，问你从何方来，不能答，复问何姓名亦不能答，而尤以闽省诸生为多。当时中学为四年制，故大学新生须先读两年预科，厦大新生当然在预科两年，然后升入正科。依部章中学生四年毕业，英文已有基础，兹乃粗浅英语尚且不晓，其程度可知，虽读二年预科何能及格升入正科。细考缘由，闽省诸公私中学，对英文教授，多不认真，虽厦门省立十三中学亦然。其原因多为经济关系，盖英文教师每月薪俸八十元，月终便要支清，不似中文教师薪少且可拖欠也。厦大为即此函告闽省各公私中学，从速改善免致贻误青年，此为厦大甫办，影响闽省教育之初步也。

厦大开办时，南洋富侨回居厦门鼓浪屿者颇多，资产千万元以上者三人，百万以上者更多。有某教育家素与富侨交游，屡告余伊拟向某富侨募二三十万元，厦大当然不能专赖君一人负担。余答向富侨募捐，余于开会倡办时，已有明言，惟现下时间尚早，机会未到，君意虽佳，勿作无益要求。后复余言伊经向某君提议，或有相当希望，然结果终成泡影。民十一年春厦门厦大校舍一部分完竣，厦大由集美移来。不久余复南行。约近年终有一位荷印富侨，原籍同安县灌口区，自前年移居新加坡，富冠全侨，资产称万万元以上，是年获糖利二三千万元，余与相识后认为此机不可失，乃写一长函送他，其中详述本省教育大概，及厦大之重要，并云西哲有言，“言凡人有诚意办公益事，当由近处作始”，君祖同安，厦岛前原属同安，请捐五百万元为厦大基金，否则多少随意，抑捐办医学一科，以为君纪念。彼接函后只嘱其商行经理用电话告余该函已收到而已。渠虽侨生，但曾略受过我国文化。其后余托友查询，回报绝无意思，不久竟谢世矣。时厦大开办已近两年，余始敢向该富侨劝募，不意此乃为第一次之无效也。

民十三年春，余因树胶制造厂扩设分行，往游荷属爪哇各埠，先到吧城次至万隆。在万隆商会内遇一富侨，原籍漳州，自少来洋，年近六旬，余早耳其名，闻其资产二三百万盾，惟系初与相识。越日邀余到其住家午饭，亦颇诚恳，并言平生经历及家运不好，无亲生男儿，在梓里伊兄弟送一侄为嗣，养至去年十九岁而夭，现存一女寡居，拟续觅一佳婿，伊年纪已老，将遗业付托了事云云。余回旅馆后复萌为厦大捐款之想，即托人向该富侨请捐建厦大图书馆一座，多者十万盾（其时国币与荷币略同），少者六七万盾，一年中陆续汇交。伊兄弟在厦门开钱庄，林文庆校长亦其知友，该款绝不至落空。图书馆可标伊姓名捐建，既可永作纪念，亦可作厦大募捐提倡之例。自开办已四年，余捐输开办等费百余万元，未有标余姓名一字。伊如有意认捐，余当面陈较详。越两日回报无效。又十余日余复到万隆，别托一人重向该侨提议，或降减额数亦可，盖为此机若失，余不复来，结果徒劳往返。此为余代厦大向富侨募款之第二次无效也

余离万隆埠往东爪哇泗水，侨领多来相访，有一位富侨原籍同安城，年四十余岁，甫自梓里复来两三月，对于集美、厦大两校规模他当亲身历见，因其为出入必经之地也。彼原为泗水富侨，是季复大获咖啡净利数十万元，闻资产可三百多万元，亦无亲生儿子，惟螟蛉两人尚幼。余不因万隆募捐失望而灰心，而尽为厦大奔走之责任，冀可达目的。乃托一闻人向该侨劝募，所提之事，如在万隆，不意亦竟拒绝，不数年已身故。南洋富侨以爪哇为最多，而爪哇巨埠以吧城、三宝珑、泗水、万隆、四商埠为最富庶。吧城余已经过，富侨除侨生外，乏相当可劝募者，三宝珑富侨已在厦门及新加坡试验矣，兹复经万隆、泗水亦不济。不但希望向富侨募捐数十百万元为基金归于失败，而仅此十万八万元或四五万元建图书馆尚困难如此。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此为第三次向富侨募捐之无效也。

余为厦大向荷印富侨募捐既如上述，至于马来亚闽人富侨远逊荷印，资产上千万元者未有，百数十万者却不少，若向其募捐巨款绝无效果。余不但筹之熟且知之稔，故不作无益请求。如粤籍富侨上千万元者有数人，然不免有省界畛域之见，况闽籍富侨袖手，彼必更可借口，故我更毋庸问津。余回忆前年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曾同粤侨数人向一富侨募捐，希望可惠数万元，结果空手而回。该富侨近年谢世，遗产新加坡币六千余万元，被当地政府新增遗产税，抽去四千万元。至他属如暹罗、安南、缅甸、菲律宾等闽人富侨亦属不少，以尤富者数人而言，余早略知其志趣，比较荷印富侨如五十步与百步。余自倡办时即宣布待两年后规模既具，余牺牲二百万元，即向富侨募捐。迨时机已至，实践前议，则到处碰壁，自恨以前之理想失败，夫复何言。余上所言系民国十五年以前之事。自十六年之后，世界景气日非，悲惨之象日深，富侨破家荡产难以数计，其他虽可维持，损失亦多，对于厦大募捐巨款事，更觉灰心无望矣。

  余之营业自民十五年起，至二十二年终，此八年间如江河日下，不但无毫利可长，且逐年亏蚀及支出百余万元。计有四项损失，货物屋地降价，厦大及集美校费，银行利息，每项每年三四十万元，合计八年一千余万元。马来亚事业之荣枯，关系胶锡两物产，而尤以树胶为重要。民十四年树胶每担价二百元，逐年递降至民国十九年，每担价十余元，后再降至七八元。当市景繁盛时，马来亚政府发出流通纸币一万万七千万元，迨民二十年后降至五千余万元。居民比前加多而枯竭凄惨不可言喻。外国银行因余侵欠巨款告予停止校费，余不可，故民国二十年秋改作有限公司，银行亦参加，并举多人为董事，规定校费逐月坡币五千元。（申国币七千余元）然厦大逐月尚需二万五千元，集美一万余元，共三万余元。除国府补助五千元，其他收入二千元，有限公司七千元，共一万四千元，尚不敷二万二千元。至民国二十二年终，有限公司收盘，计二年余用去六十余万元，此系由马六甲曾江水亲家捐十五万元。叶玉堆先生捐五万元。（两条申国币三十万元）厦门厦大校业变卖十余万元，集通号（在厦专理两校财政）向人息借二十余万元，此乃余极力维持两校之实在情形也。

 自有限公司收盘后，余即函请厦大校长林文庆来洋募捐，数月后结果，新加坡募国币十万元，马来亚十五万元，然催收经年，马来亚仅十余万元，余作罢论，共实收国币二十余万元。而厦大经费已缩至每月二万元，集美六千元，除国府补助及其他收入，逐月尚不敷二万元。集通债款又须陆续清还，幸灰余红利（前生胶厂租人订抽红利）上半年颇好，故聊可支持得过。民国廿五年买树胶园四百英亩，成本十六万余元，拟作厦大基金，每月入息约二千元，该款系向李光前、陈六使各捐五万元，陈廷谦一万元，李俊承五千元，不敷由余凑足之。民国廿六年春，余念厦集二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缺如，未免误及青年。若政府肯接受厦大，余得专力维持集美，岂不两俱有益，此乃出于万不得已之下策，乃修书闽省主席及南京教育部长告以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过后未有消息，适孔祥熙院长将往欧洲贺英皇加冕，轮泊新加坡，余下船送行，彼对余云厦大事，行政院已通过。再后接教育部长来函，并委派萨本栋君为校长订暑假时接收，余即函知林校长预备交卸，交卸后而七七战事已发生矣。厦大自民十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有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

英属马来亚以新加坡为首府，初时对教育甚形敷衍，如历史、地理、化学，与及诸开化智识极少教授，学校教科书只教服务公役书记。迨后美国教会学校开办较为提高，故政府学校亦不得不改善多少，但对于地理及化学等，虽中学生亦无由问津，比较菲律宾美国人之设施相差远甚。民国七年美教会校长那牙君来访余云，马来亚乏一大学至为可惜。该教会久欲倡办，碍于本坡捐款困难，故目的未达。如有坡币一百万元绝可成立。在美国教会机关愿捐半数五十万元，当地亦须捐得五十万元方能成事。渠筹谋已久，坡侨富人多推诿不肯先捐，恳余首捐十万元，渠自有办法，余即应承，但声明以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所捐十万元做该科基金为条件，渠亦接受，乃由律师立定合约做十年交清，每年交一万元，约字中声明如办不成，须将原款及利息交回，由其主教与余签押作据，即交去首期坡币一万元。美主教与余签约字后，该校长转向他侨募捐，个人认五万元者已有数人，甚他两三万元者亦有多人，不久之间五十万元业已募足。考其成绩如此优异之故约有数端：一、大学设于本坡侨生必多获益；二、主持者为西洋人信用素著；三、美教会办中小学已久，成绩规模为全马冠，富侨子弟多其学生。有此三项故目的易达。于是积极进行，一面向当地政府请注册开办大学，一面在市区外购置地址数十英亩费十余万元，即绘图拟建校舍，据言一年后即可开幕。不图英政府对注册事拖延年余，始驳回不准，云大学事英政府欲负责创办。盖认为最高学府容外国人设立，于国体有关，不似我国政府社会茫不知耻也。美教会遭此意外，逐打消计划，所收捐款应当交回。余已交三万元，乃来询可否将母利捐送其中学做理化基金，余应诸遂不收回。

新加坡英政府既不许美教会办大学，欲自行开办，当然有相当之筹备，庶不使民众失望，乃延至民国十四年始克成立。迄兹几二十年，所办仅文科理科学生不上百人，且理科多为医学之预备生。该大学无论其质如何完美，然对于量之设施，及扩大收容，必非其立心本意，第不过敷衍塞责了事，维持其殖民地教育本来面目焉耳。当时若许美教会开办，必能推诚积极多设学科，宽容收纳如菲律宾诸大学之进展。至于经费问题，美国方面既负担半数，而南洋诸富侨及该校学生，既感其培养成绩，亦必有相当协助，可惜失此良机，否则；迄今二十余年我华侨人才不知将养成多少矣。

民国光复前清学制变动后，南洋华侨学校寥寥无几。光复后略有进展，概属小学校，马来亚未有正式中学。民国七年余乃招多位侨领，在新加坡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募款五六十万元，向上海聘请校长教师，越年春开幕。自是之后，南洋各处不但中等学校继起设立，而小学校亦更形发展，几如雨后春笋。前年统计约三千校，学生男女数十万人，较我国内地任何地方为普及。其经费概由侨胞募捐，绝非政府帮助。迨至近年马来亚政府始有择校津贴，每生全年不上十元。至能如此发展原因，约有数端，有因各地方或各会馆互相竞争比较者，亦有因校内校长教师发生意见另行创设者。至于经费问题，则受厦大、集美之影响，亦较前容易募捐。加以教师易聘，与民国十年以前大不相同。本省华侨所办学校，多用本省人，不复如前须向上海远聘。校内教授则用国语，现下南洋国语到处可以流通，较之祖国某省学校，尚有用方言教授者大不同矣。

 南洋华侨最多为暹罗，次则为英属殖民地，再次为荷印。暹罗华侨设立学校原本落后，后受各处影响，及民国光复，民心内向，颇见进步，故对中文教育亦知注意，于是热心创办校者日多。数年后暹政府嫉忌心生，多方取缔，校长教师须用识暹文者。再后亲日派操权，愈增苛例。及中日战事发生，更因媚日而虐待华侨，所有学校尽行封闭矣。荷印自来以不平等条例虐待华侨，荷政府所办学校，不许华侨子弟参加，唯许侨生入学。民国光复后，我侨创办学校日多，始取消禁例，然对我国教师入口颇多刁难，故学校之进展，不免受其阻碍。英殖民地对教育方面则较形宽放，虽校长教师须经注册承认，若无不法行动，却亦无何干涉，且时常派视学员到校视察，对卫生上甚加注意，唯三民主义书籍不许教授。至于经费近年来颇有择校津贴，有相当董事及办理良好者方得享受。故马来亚华侨学校比他属更多。法属安南华侨教育虽稍逊英属，然当地政府无取缔之苛例。美属菲律宾政府重视教育，一律待遇，有教无类，其诚意优待为南洋冠也。

南洋华侨教育既如上述，量数虽略有可观，质的方面不免尚差，其原因不外各自为政，泛而无统，或董事校长任用私人，或因陋就简，种种弊端，颇为不少。盖无教育会之机关为监督领导，亦无我国政府视学员为之纠正，且各校经济概系自筹，既无资助财力，虽有教育会亦等于无。至我国政府虽鞭长莫及，若责委所在领事馆何尝不可。无如我政府既无此远图，而素来领事官大都不满人意，不但不能称职，尚多露出丑状，贻华侨羞。间有一二称职者，则不能久于其位，唯能敷衍应酬，虚伪浮沉者乃得久任。外交官僚既如上言，不但不能改善华侨教育，且有反生陷害者。新加坡有一中正中学已办两年，学生五六百名。“中正”二字校名系倡办人托林君文庆，呈请重庆蒋委员长同意。而校内一位教师为总领事高凌百内亲，被校长辞退，总领事不满，则电请蒋公取消校名，云该校专为造成共产机关。取消电文既到，立即送交各日报发表，以为该校便即瓦解。不图以此事妨碍当地提学司名誉，致提学司甚为不满，董事长亦以被诬拒绝取消，教师学生更形坚持，仍旧开课，其贻羞国体为何如耶。

民国十七年夏，蒋委员长将兵北伐，日本恐其成功，借保护日侨为名，派兵入济南，阻挠北伐军，并惨杀外交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占据济南城。新加坡发起筹赈会召集全侨大会，名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举余为主席。两三月间筹捐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概汇交南京财政部施赈。自筹赈会成立后，新加坡树胶公会议决，每担抽一角交筹赈会助赈，每星期汇交一次。初时依期来交，迨后则迟延日期。及日寇退出济南，筹赈会将结束，树胶公会存款六万余元，任催不交，盖因掌财务者两三人不能一致之故。其后蔡公时夫人来新加坡募捐，拟为公时办一中学做纪念。余乃召集大会通过。将树胶公会未交款数，捐作公时中学基金。再后多月树胶公会尚未交出，适华北豫陕甘旱灾，新加坡总商会组救济会，因负责者不善办理，成绩甚少，乃异想天开，谋取树胶公会存款移作救济。竟不明向余等磋商，私写约章运动数位胶商盖印承认。由是盲从签同意者七八十家，踌躇未签及反对者五十余家。首谋诸人扬扬得意，谓大半赞成便算有效。余乃登报声明该款乃山东惨祸筹赈会存款，业经某月日大会议决，捐作公时学校基金，已登报表明在案，树胶商无权擅移别用。倡谋诸人尚不甘休，屡向树胶公会迫取，该公会乃传集诸胶商开会解决，结果通过仍交还山东筹赈会。越日树胶公会开和丰银行支票一纸六万余元来交，余即转交和丰银行登入山东筹赈会来账（筹赈会始终系与和丰银行来往，树胶公会亦然）。迨至越日和丰银行始将该支票驳返，余则将原票送回树胶公会。该会主席向和丰银行交涉无效，乃以法律控告和丰银行于案，涉讼多月，和丰银行败诉，然尚不休再行上诉，后又失败。至此已拖延两年之久，树胶公会再开和丰银行支票仍旧将六万余元来交了事。此场讼案和丰银行经理在公堂被原告律师鄙辱至于无地，以为经理银行资格，复以感情作用，捣乱商业程序。盖银行可越日驳回支票，系甲银行与乙银行之例，若同是该银行出入，因故要驳回支票只以本日为限，若越日则不可也，此乃银行普通条规，稍有常识者皆能知之。然和丰银行董事长及正副经理等，非不知此粗浅常规为逐日出入支票常例，第因受人嘱托，感情用事，竟置法律于度下。闻系其夜董事及经理受对方友人要求，乃不顾损失颜面。华侨如此程度，莫怪被洋人轻视也。

和丰银行既败诉，将款交还山东筹赈会，对方等复挣扎不休，唆使某树胶商延律师阻止该款，不得汇祖国，须留存本坡，其理由谓济案已息，不需救济，且不得捐作别用。余由是不得不以法律解决，讼案由粤侨总务员负责办理，兴讼经年，对方败诉，再行上控复失败，纠延三年余，最后该款仍由筹赈会汇交南京政府财政部了结。至公时夫人所办中学已停罢，故请财政部仍赈济山东难民。树胶公会管财人为拖延不交，致与和丰银行涉讼，继复弄出胶商与筹赈会涉讼，前后拖延五六年。和丰银行及胶商等开讼费四万余元，筹赈会亦费二万余元，诉讼目的物之该存款额数只供洋律师支尽。当和丰银行驳回支票之初，树胶公会将诉诸法律。一日“华民政务司”某君，与数位名律师在西商会楼上午饭。政务司某君言，树胶公会与和丰银行交涉案，渠将为斡旋了结。某名律师答“干汝何事，我侪方将开一金矿，尔勿破坏”云云。所可痛者，吾侨程度参差，好生意见，往往与无谓讼案，耗无数金钱与洋人，并遭受耻辱而不悔耳。

 “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先生被日本惨杀，全国同胞异常悲愤，新加坡华侨组济案筹赈会已如上述。从中两次汇款六万元，给公时家属一万五千元，余分给同伴被难家属。又筹三万余元将在南京择地为公时立铜像。嗣后因公时夫人举动不端，学校既做罢议，像址及建造亦无可付托，故年复一年，至民廿五年存款除向德国购铜像四千余元（铜像现寄存新加坡三条巷南益胶厂），尚存三万元。适厦大购柔佛树胶园十六万余元，不敷三万元，保款人广客闽四人，同意借该园生息。后该园转归集美学校，民卅年将款收回，计母利三万七千余元，寄存中国银行后移交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收存。该会于新加坡失守时，尚存华侨及中国两银行十余万元。

 鸦片流毒我国，民众受害最惨，清末经与英及关系各国公约限期禁绝，我国雷厉风行笃著成效，适民国光复，军阀割据，故有多处种植鸦片，死灰复燃，此系国体改革暂时不幸之变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实行严限几年内概行肃清矣，南洋英殖民地马来亚，对禁绝鸭片事无意实行，仍旧公卖，每年获利千余万元，概系我华侨之脂膏，民十七年欧洲国际联盟会，特派与鸦片利益无关三国，每国一位计三位代表，来马来亚调查究竟，是英政府贪此利权，抑是华侨必需品，新加坡政府事前组一委员会，多方召诸烟民来问：“吸鸦片是有益或有害？”如答以有害，则反诘怒责，不数语便斥去，如答以有益，则欢颜问答不休，愈长愈妙，句句登记以做证据，此种立心不问可知。国际调查鸦片三代表到新加坡时，余则代表华侨开欢迎会，到者中西数百人，在筵中余详述南洋华侨受鸦片惨害，而尤以马来亚为甚，阐明指证，并要求国际联盟会诸代表以人道主义劝英政府早日实行禁绝，则无异美国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之功德云云。事后政府公卖鸦片，逐年缩减，然迄今仍存流毒未绝也，当筵宴未开时，政府某官员托闽粤两侨领，再三告余筵席中切勿提起鸦片事。然余自有主张，若无目的何必费此筵席。英人多有资格，凡谄媚畏怯之流，彼愈加鄙视，若热诚正义，虽非所愿，然彼衷心尚存敬意，国际联盟三代表往各处调查后，复到新加坡，余则以私人设宴送行，彼等对余甚形满意也。

马来亚各处地面，虽多山冈不似安南暹罗多平地水田可以种稻，然卑湿田地亦属不少。民二十几年不景气流行，男女失业日众，尤以华侨劳动界为最。当地政府为土人设想，改良水利，资助种稻，提倡粮食自足，竭力劝勉鼓励。然土人性怠志短，无甚效果。新加坡政府另设一官署曰“华民政务司”，中设议事会，名日“华人参事局”，局员三十余人，多系祖国来者，概由华民政务司选委，任期无限，多有终身者。开会时以华民政务司为主席。虽组织此议事会，亦不过形式上笼络而已。余亦曾任参事局员数年。当不景气之秋，土人既获水田权利，而华人则不能。然华人在马来亚占一半人口，欲图马来亚粮食自足，非华侨共同努力绝难达目的，余故提议请一视同仁。蒙赞成通过，由华民政务司向上官要求，结果无效，余即辞退该局职务。而华侨失业日多，除自有旅费自动回梓者外，其他月以万数，由政府资遣回国，足见其排斥华侨之深意矣。

民十八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傅秉常等来新加坡游历多日，晚间余在怡和轩设宴招待，计五席，同席林文庆（厦大校长告假南来）、薛武院（总商会长）、林义顺（中山先生住新加坡系他招待）并余共八人。时适南京政府初换国旗未久，有人通知胡君等总商会仍树五色旗。筵间孙科告胡等“总商会未换旗，明日我等勿往”。盖越日欢迎会有三处，中午和丰银行，下午二点总商会，四时南洋华侨中学校，薛武院坐余之右，林义顺坐余之左，薛君闻孙科言，告余云：“总商会未换旗为总领馆尚未换之故。”余则转告林君，其座位与胡君毗邻，乃转告胡君。胡听未详尽，误会总商会不换旗系总领事阻止，为其性素躁，即大声怒问总领事。时总领李事君在右席，闻声急来问故，于是就筵间与薛君议妥，明日总商会须换旗，胡君等应承均愿赴会。不意越日总商会门前旗杆空竖不升何旗，而挂新旗于门上。有人走告胡孙等总商会不升新旗，在和丰银行宴会时孙科即约诸人均勿赴会，而伍君谓恐失侨情不可，乃推伍君独往。总商会散会时，林义顺导伍君出会门将上一汽车，林君始觉伊车在该车后，乃转向后行。刺客立对伍君发枪数响，伍君逃脱，林文庆面被误伤。盖刺客原拟待伍君上车时，然后开枪准可得手，及见其不上车而返行，疑伍君已察觉将避，故急开枪，然伍君自出会门略有注意，故能走脱。刺客被拿，系琼州人，自香港与同志多人来，是日早党人会议，举三人负责各刺杀一人，即孙科、胡汉民，及伍朝枢，幸为总商会不升新旗，故均获无恙。

  世界各国之国旗必有取义，如英系三岛合国，故用三色，美为联邦合国故用若干星点。我国光复后孙总理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为国旗，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何等正大光明，宏伟美观。后来袁世凯野心称帝另有一样旗式，与五色旗无关。至军阀割据地方，仍用五色国旗，亦莫非遵守国徽，其胜败与国旗完全无关，此理至明无须多赘。乃自孙总理弃世后，国民党北伐胜利，南京政府成立，便即野心变更国旗，以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造成，应将青天白日党旗为国旗，俾国民党功勋永存，政权亦可永操。余深知青天白日党旗，系光复前孙总理在新加坡“晚晴园”议定，此系一部分人党徽，与国际无何关系。若国旗则代表全国国徽，对外对内关系至大，不但要取义适当，尚须参以美观及气概宏伟，三者缺一不可。试看该青天白日旗无一可取，言主义则泛而无据，言美观则非日非星，至若宏伟则炎光不展，气象短缩。自光复后，余对政府最不满者，首两件事，一为长衣马褂仍旧保存，一为青天白日旗换作国旗。前年余将回重庆时，曾将青天白日旗，托美术家将炎光修改，较有美术及宏伟气象，然经过数位研究，虽稍胜现状，终难满意。印百多张带至重庆。盖念国旗大事，改革至难，若但修改炎光，或可试探如何。迨至渝见诸要人情况，认为出我意外，遂作罢论。

      民国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国内纷纷尚未统一，而外国则咸已承认为正式政府，南洋华侨亦未能一致。余则手订规则，交南洋商报经理，命悬挂办公处，其语为“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其时余与蒋委员长尚未相识，亦未有信息相通，特念外国已经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汪精卫在德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煽动反对南京政府，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此为余主张应服从中央政府，而不顾个人交情之事实也。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当民八年开办时捐款六十余万元。余经手购市内洋楼两座为校舍，费五万余元，又购市外五英里武吉智马律大路边，前马来王别墅八十英亩为新校址，景地均佳，价八万元。余回梓后新加坡屋地业大涨价，董事会议决买市内四万方尺地，拟建店屋为校业，每方尺四十三元，计十七万余元，捐款未收者二十多万元，因商业欠佳均不肯交。所存现金十余万元，两年余经常费提用净尽，至余南来计已三年，校费已无着矣。余乃设法维持，并向认捐未交者，磋商酌衷折交。最巨者为富侨黄君十万元，渠言“实非怠交，当时系有条件，所捐系为建新校舍礼堂之资，不能移作经常费，如有实行建筑立即交出。”余念乘此机会若新校舍落成，可将旧校舍变卖以助校费，则一举两得。于是兴工起盖，除黄君交出十万元，复收旧捐六万元，前置市内四万方尺地仅售两万余元，复向华商银行借出六万余元，合计支出建筑费二十四万余元。礼堂可坐千人，课室膳厅宿舍等仅容三百余人，余如图书馆科学室等尚付缺如，而学生额已满，若有金钱尤须扩充诸校舍。希望热心教育者慷慨输将，俾可继续进展，此为民十五年以前之事也。余辞卸后更换数届校董，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提议临马路边建筑两校门，费由渠负担，董事会赞成之。校门造成后有人来告予，门柱标题某某姓名，如此则全校包容在内，将置以前捐款人于何地。余乃往视新建左右两门，相距约一千尺，为该校出入路口，颇堂皇美观，门楣上横书中英文“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右门柱为白石刻中文，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左门柱亦用白石刻英文，字义与右柱中文同。不筑围墙，只此两门所费不过千余两千元，然以门上有字，观者必误认全校为渠捐建，而以前捐数十万元之数百侨胞全归埋没矣。然此事尚小，该地校址广大，将来可容学生数千名，现所占面积不及十分之一二，空地虽多，日后谁肯复捐资扩充，此则为大问题。余不得已乃告知该校诸董事，请将石柱之字取消，无效。后乃假总商会召开捐款人大会，到者百余人，举林君义顺为主席，全体通过石柱须拆卸，决议后负责无人，余乃派人办理。窃念教育关系后生极为重要，董其事者必以公忠热诚为主方能收效，否则，不免贻误青年，安得利用学校以为广告，无论中外此风诚不可长也。

  福建同美汽车公司，川走由同安城至集美，资本二十余万元，由新加坡同侨投资，于民国十年开办，通车后略有利益。同溪汽车公司，由安溪至同安城，资本三十余万元，由南洋安侨投资，因董事多意见，无利可获。倡办时集美校长叶渊亦参加。民十八年许卓然到同城见陈延香（同美董事）言拟代某民军筹饷三四万元，要向同美、同溪两车路公司息借，招陈君来集美与叶君商借款事。叶君答同溪车路公司重要董事住厦门。三人约定越早八点在集美下船往厦。许陈两人复回同城。越早两人均未到，叶君乃先行留一名片托车站人交许陈二君云，伊在厦门太史巷街丰益钱庄等候。约近午间许陈始到，渡海至高崎村转坐汽车，来厦至美人宫换坐人力车，到太史巷街口下车步行，陈君在前已入丰益内，许君随后。甫将入门，枪声连向，许君倒于门内，乃移往鼓浪屿医院，有顷而亡。陈叶二君均往探视，而凶手逃走无踪。丧家乃指陈叶二君为主谋，即控于法庭，所以致此者系同溪车路意见人，含恨叶君主动也。陈德麟，集美人，在师范科未毕业即来新加坡，在余分店管财，侵逃七百余元回梓赋闲。屡向叶君求职业，叶君知其在洋无状拒绝，由是对叶君无好感，乡校人多知之。许君被刺移往医院时陈德麟适在厦，亦到医院探视然后回乡。在电船中多人议论许事，陈德麟眩巧好言，谓该事伊知情，究实所谓知情，乃受伤后人医院等项而已。即有人往告许家，于是同安县派役拘捕，审问无据。其时许家主持人硬欲加罪叶君，然乏实证可据，不得不利用陈德麟为凶手，造作一篇供词，谓与叶渊同谋，伊任凶手等云云。严刑酷打极其惨苦，使不得不依词认罪。陈德麟既诬服后、移往漳州张贞处囚禁。张君时以师长镇守漳州，在闽南已炙手可热，与许卓然、秦望山为党友，故许案主持人张秦二人为主脑也。

 叶渊、陈延香均被禁厦门监狱，厦门司法官权属中央，张秦鞭长莫及，乃谋将叶君移漳州，借词审问，屡向厦官交涉引渡，实欲置之死地。余乃电南京国府胡汉民、古应芬二君，请急电厦法官阻止移漳，故张秦目的莫达。后胡君复令将案移至杭州裁判，于是叶君乃往杭州，余杭州分店为担保二万元得免狱禁，而陈延香、陈德麟亦均移杭。讼案判决复翻，纠缠两年余，结果三人均无罪释放。然对方复极力运动，利用军人势力，将再上控。迨闽人民政府发动后，又指叶君曾参加，于是叶君乃辞卸集美校务，而往广西任省府秘书。当叶君被诬时，余即电张君勿冤枉陷害，并“昔邓禹将兵百万，未尝妄杀一人，子孙兴盛”，至与秦君电，则以集美学校关系闽南及南洋教育，请勿诬害。彼等均置不理，更悉力钻营，且靠人势焰武必欲诬杀为快，余在洋适遭世界不景气，不能回梓设法妥人办理校务，致数年间集美学校如无舵之舟，乏人主持，成绩退化。所可痛者，同为闽南人，既明知叶与许风马牛不相及，必欲硬干到底，既不计冤诬必归无效，又不顾社会教育之损失，欲逞其昧良之心，致死友真凶竟逍遥法外也。

 广西省自北伐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先生极力整理军政，对交通教育实业尤形注意。缘地方素贫，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乃派代表来南洋鼓励侨胞投资开发。广西侨民不多，富商又少，故代表不得不向闽粤人劝勉。数年间计派来多次，每次均曾访余。然余不能以敷衍报其诚恳，乃直言此事之无效。其理由有二；其一富侨决不肯单独运资亲往经营；其二如设有限公司，招股提倡者恐乏信用。就此公私两事而言，虽在闽省创办，闽侨亦未必响应，况非故乡更觉困难。有潮商某君等曾往广西应承，欲大规模招股投资，在新加坡成立机关，登报鼓励，结果经年，招不上国币二十万元，该公司由是搁浅不前。又有客籍侨胞在霹雳埠颇有资望，亦应承要招集百万巨款，在马来亚各报发表，经过吉隆坡、新加坡到处热烈欢迎，且在新加坡总领事馆宣誓就职。于是遂带秘书等同赴广西，不久回洋，亦是空雷无雨。叶采真先生任省府秘书，最后当局以彼为闽南人，且与余深交，备费数千元，派其南来招闽侨投资，先到安南十余日然后来新加坡。嘱余负责提倡，余仍如前言直告不讳，叶君不信，云经过安南已略有头绪，诸侨商咸言若余肯出倡办，就安南一地要招数十万元易如反掌，言之凿凿可据。余问某某富侨曾言此乎，云无之。余云其他不负责人安可轻信。叶君仍是不信，将往马来亚各埠及荷印宣布使命，计奔波数月将回国，复经新加坡云，某处表同情要筹得若干，某处亦应承拟组公司投资。余答君归去便知是泡影。叶君仍不以余言为然。最后余告叶君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余与君交接十余年，君是否认余好妄言乎？”叶君答：“极相信所言必实。”余云：“既如是，何能信诸侨能投资乎？”叶君回广西后，如何复命，余虽不知，但广西政府从此灰心不复盼望南侨投资矣。余详载此段事，未免菲薄华侨轻诺寡信，抑或虚妄欺骗，虽非尽然，然亦颇多如此。我国内外同胞，若不觉悟过去虚伪错误，猛省改善，讳病忌医，华侨决不能投资救国。至详细理由可阅余在重庆，马寅初经济学社年会，演讲“华侨投资问题”便知。

 民国光复以前，马来亚华侨每年或每两年有一次迎神赛会，装作戏剧马队合棚弄狮弄龙弄蜈蚣大锣鼓旗帜等，而尤以新加坡为最。光复后此事稍杀，大不如前之愚迷。乃不知谁人作俑，将上言游戏娱乐之诸项参加于运柩葬仪之中，由是互相效尤，闽粤虽装饰不同，皆不免违背主哀之义。余每于途中遇见，为之羞愧痛心，无地自容。盖此地各国人民皆有，观瞻所系，为人鄙笑指斥，甚为国人之耻。又如死后不葬留柩多日，宴客赌博，热闹终夜，种种陋习为全球所未有。民十七年余主席福建会馆，乃传集开会，议决改革丧事铺张，及宴饮赌博；并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此乃侨民私约规章，非当地政府之法律。福建会馆无权干涉私人，唯有责成各区负责人，每逢丧事亲往劝诚，并登报劝告侨众，颁发规则贴于丧宅。从此以后颇生效力，全马来亚皆随而改良矣

民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四省，余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发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及美国总统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将造成将来世界纷乱。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至联络抵制事项，出于不得已下策，任何激烈牺牲，亦往往不能持久，盖由居人篱下，当地当局不但不表同情，尚屡以法律裁制，或袒护对方也。日本有一家炭公司，在新加坡托华侨某君代理，销路颇好，“九·一八”发生后，我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该代理不得不取消定办之炭。日本炭公司代表南来，详述发动侵占东四省，完全为少壮军人主动，若诸老成政治家绝不赞成，恐将来引起世界大战。又谓山东归还中国，少壮派已生不满，后来复加以华盛顿会议，议定海军五五三限制，则更愤怒不堪，故主张缓和之政治家屡被暗杀。彼等急欲侵略中国，以破坏国际条约，第因前年日本东京大火灾，损失惨重，故暂中止，现已恢复原状，所以此辈，不顾将来危险遂发动此祸矣

民二十四年，福建漳、泉等处多水灾，而尤以泉州及近处为甚，于是泉绅等来电，求新加坡闽侨汇资救济。余乃以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国币八万余元，然将付托何机关或何人主持施赈颇觉为难。盖吾闽远不及广东，如粤属逢有灾难，因素有组织慈善机关，可立即备资救济，然后向中外募捐，信用成绩素著，负责劝募者可安心进行。若吾闽省则不然，福州厦门均无此种机关，前有一两次因灾捐款，而施赈方面多生弊端，为捐资者所不满，故闽省逢有灾难，南侨不能救济。此次付托之人不得不慎重，后不得已乃托驻泉李师长主持，并副以数位绅商共同办理。蒙李师长按灾情轻重酌衷支配，泉州居多。而泉州绅商意见不一，有主张将款计口施尽者，有主张灾情已过，将款办工业做工赈者，纷议莫决，结果不知用途如何。依理该款既为水灾劝募，应立即施尽于灾民，以副南侨捐资之义，不宜迟滞或转作他用也。

   闽南私立男女师范学校多所，自陈仪主闽政后，命令禁止不许开课，只留集美一校。其理由为程度参差，拟归省立办理。师校为教育基本，程度参差或不妥，省府收归统办俾可一律改善，实教育之幸。然省府不但要充分容纳生额，尚须各区分设，俾有志贫生不致向隅，方可裁止诸私立学校。否则，程度虽参差，岂不较善于无耶？然禁止后经过多年，而省立师范仍只福州一校，学生数百名，已属杯水车薪。而闽南师范学校仅有私立集美一校，民二十五年冬亦下令禁止。余函电请求保留无效，乃电南京教育部长详言理由，后来电准每年招生一班。此乃敷衍了事，余实无限愤慨。若言成绩集美绝不让于省立，若言普遍收纳闽南有才志贫寒子弟，则远胜于省校，况集美校又有关于南洋华侨学校之师资，重要如是，而乃加以摧残，是诚何心也。

七七抗战将发生之前，闽建设厅长陈君极欲尽其职务，欲兴办多项事业，农矿海利尤加注意，可惜素乏经验，难免反遭损失。余到永安时有人报告，前陈厅长任内曾在某处开矿，损失百余万元，现已罢歇，余颇信为事实。缘前该厅长曾向集美学校建议，由省府备资派遣是届水产学校全班毕业生，往日本留学。又欲租集美第二渔船，订期六个月，每月租金六千元，在闽南捞鱼。两事余均不许，并详告其原因。一为日本无意容纳水产留学生，即肯亦有名无实，徒费无益。前有日本高级视学官来台湾视学，并到厦大、集美参观，受集美校长招待，即要求容纳水产留学生与日生同课，后回复许可五名，仅此而已，再后要求续派，概行拒绝。至集美第二渔船每月租金六千元，比现在往上海捞鱼，可长两千多元，六个月共可长利一万余元，而省府逐月或须亏蚀七八千元。该船前在闽海经验两月，知之已稔。余不贪得一万余元，而使省府亏损四五万元也。闽政府自来委任建厅长政绩无闻，敷衍了事者有之，营私舞弊以政治做营业者亦有之，除是之外，则有上言计划错误者，岂非建设才难乎？

民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外国已承认。汪精卫在法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互相利用，煽动反对。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李石曾君将往法国，途过新加坡，余告以汪事，渠云，彼亦常劝其勿参加政治活动，谓：“依你性质，最好做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后来余每追念李君，真善知人矣。至汪之左右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陈春圃等，余知其皆属碌碌庸常，笨拙无价值可言。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有年，未见其做何有利民生事业。来新加坡时在会场演说，及对记者言，渠等如何辛劳服务，每夜工作至午夜后方得就寝。南洋商报记者来访，详述其所言成绩，余答：“此亦如前日山东省之梁国有，捐赠政府三千万元，各报多为宣传，究实乃不兑现。”记者发表后，坡中某报赴京报告，则寄一长函来此登载晓晓自辩。褚民谊来洋多次，余识之已久。在南京任行政院秘书长，地位何等重要，乃亲为女运动员执鞭，且拍照登载日报，谄媚妇女不顾国体，人格更觉可知。陈春圃抗战前与同伴七八人来新加坡，寄宿英旅馆，膳宿日费坡币百余元，无非浪费我国民膏血。某党员在怡和轩俱乐部设宴招待，陈春圃演说各项，不但极无条绪，且亦无何价值，彼乃认为关系严重，再三吩咐“切勿向外人言”，更足显其幼稚无知。汪精卫自身既奸庸愚昧，而主要徒党亦昏愦鄙陋如一丘之貉，结果自归惨败，无地自容，敌人虽利用彼等做傀儡有何益哉！

 王君正廷任我国外交高级官员多年，余久耳其名，尚未识面。抗战前南来始会见，云此次系私人来南洋游历，先到马来亚再往荷印，其目的要知华侨状况，如政府待遇、经济、商业、教育、社会状况等。及游荷印后将回国，复经新加坡，对报界记者谈话言荷印各埠华侨商会，近来将组“商会联合会”，以资团结，极赞其美举，谓：“我华人每被洋人视同散沙。荷印华侨既能联合团结，不但有益商业，其他各事当然亦可获益，希望马来亚华侨当如荷印华侨团结。”余乃往见王君，先述：“阅报劝告侨胞诚意，至深感谢。然王君此次虽私人南来考察，与政府社会方面定有关系。闻平素做事多务实，不似其他官僚常存敷衍。唯对南洋情形尚未深知，或有误会，无益此行，故特贡献所知，希望王君明白华侨底细，冀有补救办法，庶不虚此一行。兹就团结二字言，华侨所有组织大都形式上而已，若言内容实际乏价值可称。如各商会联合会，马来亚十余区自十年前已组织联络，按年轮流在某埠开会，至今已久，绝无实际利益可言，徒有形式上之应酬而已。荷印今始倡议，将来料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空言团结，仍属散沙，此则甚可痛耳。”王君云：“我不知侨胞如是泛散，要当如何方能达到团结？”余答：“余意甚难，所可望者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做模范，则华侨当然响应。若祖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团结，欲望华侨先行，则无异缘木求鱼，希望先生回国后请政府改善，则华侨受赐无限矣。”

清灭亡我中国，为我祖先深仇大敌，将我祖制全发剃作辫发，服装亦变为长衣马褂，此二者均为清胡人制度，绝非我中华民族自来所固有。民国光复后辫发裁去，不恢复全发之古制，而与世界各国同属短发，诚属妥善。惟满制长衣马褂，则仍保留不改，甚至认为通常礼服，当局之气馁妄从，违背革命真理，保存亡国风气，其弊何可胜言。至改革服制式样，如不恢复古制，亦不尚法西洋，自可研究妥善体式，取其经济与便利，则耳目一新，可除腐旧。否则虏服仍存，丑态依旧，不但世界无此服装，为人指点讪笑，且依附阶级陋习，更非平等制度。如学校教师可穿长衣马褂，学生则不可；高级军官可穿长衣马褂，下级士兵则不可；店东职员可穿长衣马褂，而劳动工伙则不可。世界无论何国有是理否？民九年集美学校修理电机，该发动机不上百马力，乃该技师只令工人开视工作，自己全不出手，不一点钟完竣，留校午饭，余与校长伴食。回厦后则大不满意，谓受我辱待，与其工人同席。如此骄傲自高，莫非因其身穿长衣马褂乎？技师亦劳工之列，有何高贵可言也。后来新加坡余树胶制造厂中电力发动机二千余马力，凡有损坏请政府电气局总技师来看，每次单身自来，脱去外衣，亲手查验，盖亦尽其义务而已。若论新加坡电力厂与厦门电气局比较，则不啻小巫与大巫，余由是更感长衣马褂之遗害。民廿三年曾著论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并函请南京政府立法院限期禁除无效。民廿七年复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又不蒙采纳。越后余到重庆，曾参加开会摄影，林主席蒋委员长均到，合诸参政员及各院部要人二百余人，服装有长衣马褂者，有单穿长衣者，有中山装，有西洋装，亦有西式礼服，有军服，及蒙古西藏等服，及其他便服等，真所谓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现政府及参政会对清长衣马褂，虽不与余表同情，然余深信必有一日可达目的也。

  我国妇女衣服，各处互异，政府既无规定，普通服制多由人民自由变更，故到处多殊，数十年来更常演变，大都由上海倡起，不久便风行中外，时髦屡易，损失之巨难以数计。自改服旗袍以来，身长无限，有至脚踵者，而袖由长变短，现竟变至无袖，长裤改作短裤，现亦有短至露腿者，不特美观未见，而且不耐寒冷，对卫生上实属有碍。若延安中共妇女服装，则短衣长裤，与男服略有分别，为其便于工作，及节约朴素。以我国人之贫寒，质朴勤俭最为首要。如苏俄革命后，耐苦十余年，穿破衣服，食黑面包，乃能成其富强。我全国妇女，如欲勤俭节约，则可短衣长裤，以苏俄为模范，此在乡村中可无问题。若城市殷裕之家，无须劳动工作，不肯短衣长裤，则可仿效西装，长衣束腰，袖长至肘，衣长过膝已足，裤长亦须过膝，若服裙者则衣短，而裙束在衣之外。妇女此种服装，既较经济亦更美观。若云何必模仿西装，是则所见未广。我国古代女裙亦束于衣外，况男子衣服已多仿西装，何必独限妇女，既不能恢复古制，则当取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恒五项为主要。民国光复后，希望政府对诸不良事项，实行改革，然诸多失望。即就男女衣服而论，政府当局亦应代民众设想，务求经济便利，朴素雅观，命令倡行，表示维新气概。余久欲向政府建议，无如前所提革除长衣马褂，不蒙采纳，故仍有怀莫达也。

马来亚前有青楼妓女，虽住市区内，然另有街巷，不与良家眷宅混杂，不特良家远避，而妓寮亦不敢杂溷良家住所。后来政府禁止青楼，至今二十余年，虽有暗娟，亦匿居偏僻处所，至于日间更不敢显露头面。自民廿几年顷新加坡开设一跳舞厅作俑，既往上海雇来舞女，又向本坡招诱华侨女子参加，俄而小坡跳舞厅相继效尤设立，由是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到处创立，而尤以“跳舞学院”最发达。政府放任而不取缔，坐视华侨腐败，以益市面繁荣。市中到处唯见唇红口丹之冶容，异服奇装之妖态，车水马龙，炫耀于道，堂堂皇皇，毫无羞耻。美其名曰“舞女”，夸其技为时髦。且住处多与良家混杂，泾渭不分，致令贫寒女子垂涎羡慕，合污同流，廉耻羞恶，扫地无余，良莠传染之害日甚一日。不但血气青年受其迷乱，便是中年老辈亦多乐此不疲，至以舞场为营业者之计划，则网罗周备，诱惑多端，夜舞、日舞、酒舞、茶舞，时时可舞，事事可舞。问津之人以其名称异于青楼，畏长惧内较免罪责，然而既入迷途，积重难返，轻则精神耗削，事业荒废，重则离异破家，囹圄亡命，种种恶果，日有所闻，不一两年全马来亚到处都有。余睹此情景，痛心疾首，挽救无术。闻菲律宾新加坡跳舞亦甚盛，然市内禁绝，凡跳舞厅须设于离市区五英里外。乃呈函坡督详述跳舞营业之祸害，请其设法限制，如不能禁绝，亦当效菲律宾办法，并禁止日舞、茶舞等奇祸。函呈后即接回札，云已收到，再后久无消息，约经六个月之久，复接一函云：“君某月日之函，政府现正考虑。”不久欧战发生，无复消息矣。或云：“跳舞在欧美已普遍化，若谓我国不可仿效，未免过于顽固。”然凡事当先论利害，若利害参半，或利多害少，取而仿效，尚有可言。若此跳舞营业，有百害而绝无一利，直是卖淫变相，为祸害青年陷阱。若必以欧美风化为比拟，无论是否变本加厉，且我之国计民生，未能望其项背，安可专学其娱乐，如胎毛未干，便欲学毛羽丰满之高飞，其遗害岂胜言哉！又如法国巴黎人，常在大庭广众中，男女互抱，狂吻特吻，几同无知鸡犬，是亦欧俗之尤，我国亦当取而效之乎？至于苏联社会主义，男女自由，为全世界最平等及最新国体，如互抱狂吻之风，鸨业跳舞之害，绝不通行，我国民何不取而之效乎？

 吾闽自李厚基任督军时代，孙总理在广州委任闽人党员八司令官，组织民军，以闽南人居多。由是各组机关，树旗招兵，所需军械粮食都系就地征派。始则善意劝募，为保护治安经费，后则强迫硬派，无复情理，所招军士又多属无业恶徒。迨至意见发生，则各立门户，抢劫勒赎，割据地方，强抽捐税。且强迫种烟，按亩重征，若不举行，则每亩硬收烟税若干。由是民穷财尽，地方纷乱，盗贼如毛，尤以闽南为甚。民十二年冬菲律宾闽侨发起组织救乡会，派王泉笙等三人为代表，来新加坡见余云，本人代表学界，彼两人一代表报界，一代表商界。其使命系向英荷等属各埠闽侨请组织救乡机关，然后择期举派代表，到香港或菲律宾开会。现全菲闽侨均同意进行，彼特到新加坡征求组织，然后往马来及荷印同样举行。余问其是否拟定救乡办法条件，及带来何项手续。据云都未有，要如何办法，须待各代表开会时议决。余云，贵处既热诚提倡，且距故乡较近，必先有调查状况，及计划拯救办法，譬如需财若干，需人办理抑或他项，从何方面起手，略具条件，再待各代表开会修正。兹若虚泛无绪，茫无把握，但欲各处先组机关，授权代表赴会，恐多未明白，难收实效。因代表远途赴会，侨领恐不能亲行，愿往之人则未必有决定之全权。王君等不以余言为然，辩论不休，余则告以此系余个人见解勿怪。此间有福建会馆，主席及司理某某希往请他办理。迨后召集开会竟乏效果。王君等往马来各埠，据日报登载多有组织救乡机关。后几月余往荷印，适与王君等相遇于泗水。及王君回菲，订期约各处派代表到菲律宾开会。闻马来亚及荷印均无举派，到者概系菲属而已，至于救乡事则空雷无雨耳。

 民十七年马来亚槟城埠，某惠侨倡议救乡，在槟城先开会，举派若干人为代表来新加坡。动身时电知新加坡闽侨诸会馆，故多派人往码头迎接。并预告马来亚诸埠闽侨，均派代表约期同来。假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开谈话会，强邀余参加。诸代表有主张训练乡团若干人者，有主张与民军合作者，亦有主张造铁路利交通，兴实业，开矿产，则民生有赖，盗匪自消，方是根本解决者。所言各有理由，而不计事实能否办到。余则云：“凡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顷所言练乡团及与民军合作，以闽南之广，不但不能普及，不能满各乡侨之意，反恐画虎成狗，增添许多匪徒。试问华侨有何忠诚人才可负职责。至于兴办各事业，谈何容易，不但无许财力，亦缓不能济急。以余鄙见吾侨果有救乡真诚，则负担相当金钱，按马来亚闽侨力能办到者而行，办法极简单而有效。依光复时经验，现南京政府已成立，可发电或派代表磋商，请派若干军队驻闽南清乡治匪，订若干月可以肃清，每月吾侨补助若干军费，如此较靠得住。若要实行此事，必须筹有相当金钱，方可向政府商议。余按如需一师兵，每月补励至多国币十万元，至迟一年治平，计一百二十万元。政府如实行及治理有效，我则逐月汇交，否则，停止汇寄并与交涉。此款数目可由马来亚闽侨担认。”然诸代表不置可否便散会，余从此不再与闻，余早知倡起者骛名，非实事求是。盖槟城代表来新加坡，何必分电各会馆，往码头迎接，其虚荣心可以想见。续后数月各埠代表回去，复来开会数次，纷纷不一，结果咸归泡影。而巧妙收场之议决案，则转归新加坡福建会馆办理，其理由新加坡为马来亚首府，福建会馆为闽侨各会馆领袖。余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然救乡事大，公义所在不得不承受，即乘诸代表未归召集开会。余言：“贵代表数月来开会多次，救乡无妥善办法，故移责本会馆，究竟诸君是欲卸责任，抑欲与本会馆合作？”诸代表云：“系请贵会馆领导合作。”余言：“既如是本会馆无他权能可以领导，唯有如前谈话会余所主张，侨胞负责出钱，要求南京政府派军兵负责治安而已，如同意赞成方有办法。”于是全体赞成，乃议决募捐坡币一百万元，新加坡卅万元，槟城十五万元，余分摊各埠至足数。余云：“此次救乡系由槟侨爱乡热诚提倡，目的若达，功德无量，然不可如前菲律宾空雷不雨，不但贻笑中外，反致有误家乡。各埠认捐数目应限期募足，请由槟城先行劝募，至迟两星期内起手，一个月募足，成绩如何来函报告。本会馆立即传达各埠及新加坡同时举行，均于一月内募捐足额，再传集开会选派代表赴南京。”全体代表均举手赞成。越日各代表回去，过后十余日槟城绝无消息。余乃致函查问，亦无确实回答，并不见报纸登载募捐工作，余复行函责问，竟复无价值了事，此为第二次救乡之结果也。

 民国廿三年，南洋闽侨救乡运动死灰复燃，其时闽南匪氛已大减少，唯安溪及内地尚有骚扰。提倡者为新加坡闽侨，素志阴险，人格不讲，每利用时机欺人扬已，不察者则受愚罔。盲从之流，不但坠其术中，并不计将来利害，附和奔走，举动若狂。余曾向两三位热心人忠告无效，或且以余为破坏救乡，盖反对者独余一人耳。至倡议条件，不但救乡，且向中央政府要求闽南十县做自治区，创建设银行兴办各种实业并模范村，计划确是伟大可观。新加坡各日报均用大号字标题，并详细登载，由是南洋及闽南诸日报多有转载，谓此回闽侨确能造福桑梓，闽南民众多有额手称庆，眉飞色舞者。在新加坡传集马来亚各区代表，开会两次议决，派三位代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各一位，并筹旅费一万余元。中外报纸既先宣传，三代表及秘书随后前往，先到南京请愿，然后回闽视察，如安溪铁矿、龙岩煤矿，均有查勘，闽南有名城市均往游历。到处空巷欢迎，爆竹震耳，荣耀得意莫可言喻，历时数月方始回洋报告，此一回之救乡责任便已告一段落矣。过后多月复召集马来亚闽侨开会，为建设银行募股，按实备资本国币五百万元（时坡币七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新加坡举多位代表向全马劝募，经过月余未达数额。再后气衰志馁，日形无味，前后纷纭两年余，结果归于解散。此为南洋闽侨第三次救乡之效果也。

 南洋闽侨三次提倡救乡，无益而反有损，盖每次都为虚荣心所误。语云：前车覆，后车鉴，深愿华侨无论为国为乡，若虚荣乏诚，决定失败。兹余按次述其失败原因如下。第一次救乡失败之原因，盖由于提倡者拟自居盟主地位，且未考察真因，计划办法，任其无根之理想，轻率欲招集远处英荷等属派代表参加，此其失也。第二次救乡亦成泡影，则为倡议人好名乏实，初时轻于传集开会，后来既无办法则捐资请政府负责，实至善可靠办法，彼首倡者既有财力，若肯以身作则，先认捐两三万元何事不成，无如诚意不足，素非慷慨，故归失败耳。至第三次倡议救乡已乏价值，唯办法与前异，而以要求自治及模范县模范村，建设银行，振兴实业，夸张虚构欺蒙同侨，存心原本狡诈，立意为己名利，绝无实事救乡之念，只欲炫已才干，愚弄他人，其失败固无待言。此第三次闽侨救乡，较前两次同为无利而加有害也。所痛者多位有财力侨商，对银行均有承认购股。曾告某友可认三万元，该友答我安有财力，彼云免兑现名誉可得，社会之坏即在明知其非而不谏止，甚至助桀为虐之乡愿耳。海外闽侨逐次对救乡热烈举动，若不贻误桑梓，损失尚属无妨，无如虚荣影响易招外侮，如陈仪之轻视闽人亦即由是也。余阅报载陈仪在某处演说云“闽人希望南洋闽侨运资发展，利益民众，迄今年久，究有何效，多属空雷无雨，他省免倚靠侨资，其民生更形安定云云”。审此足见陈仪藐视闽侨，而鱼肉闽民之有因矣。

集美学校创办时，余原意不求外助，迨至民廿二年不得已乃向相知者请其补助，李光前逐月坡币六百元，陈文确国币五百元，七七抗战后集美距离厦门隔海数里，飞机大炮时常来炸，损失之巨无须多赘。民廿八年余乃主动在洋拟向集美诸学生，募捐国币二百万元，按八十万元做修理费，余做基金，定每生最少捐国币一百元，坡币十发五元，不向外人募捐，而巨港校友，竟向商友捐几千元，结果共捐国币二十三万余元。陈六使（集美人，亦集美学生）捐公债券一百万元，系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利息每年六万元，做集校基金。余至重庆知战事。未易解决，集校修理尚迟，乃将捐款参加“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国币二十五万元，全年本息六厘，做集美学校基金，该公司资本一百万元。李光前所认月捐至民廿九年春停止，换捐坡币五万元，系麻坡及实吊远胶厂押款，逐月可收利息坡币三百七十五元为集美校费。

 集美师中等学校，自民国七年开办以来，南洋华侨学生前往肄业者不少。集美系乡村学校，不但与城市远隔，不染繁华，而自来校规严格提倡朴素，禁止学生浪费，虽距厦门市不遥，然学生无故不许请假离校。为此缘故，间有富侨子弟，生性好动，或被人招诱，或不耐拘束，转学上海及其他繁华城市者亦属不少。其转学原因，必有相当理由函禀其父兄，该父兄身居海外，虽被欺骗多无由知悉。至上海华侨学生之浪费，有月开数百元者，若百数十元可算为俭省。有某君之子留学上海，不到一年费款两千元，及知其浪费亲往召回，须再清还校费旅费衣服费等数百元。其浪费最烈者即是跳舞。跳舞之祸害甚于毒蛇猛兽，我国抗战胜利后，内政方针第一件须禁绝跳舞，否则，执政之腐化庸污，无建国精神可知矣。我南洋侨胞如要遣子弟回国就学，尤希格外注意为幸。

  民廿五年西南将异动之前，陈济棠派某财厅长林某，来南洋探访侨情意向。新加坡总商会特开欢迎会，会长谄媚演说，称广州政府为父母官长，该代表满意回报。秋间发动叛变，余乃联络各界假总商会开侨民大会，表决趋向，结果大多数反对异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于是余乃以大会主席名义，发电劝广州陈济棠，广西李白黄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等语。陈复电辩论，余复去电责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广西复电甚长，约三百字，亦多解释理由，余回电仍善意婉劝忠告，请勿与贪吏叛逆陈济棠合污。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等云云。

   同年秋蒋公五十寿辰，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我国驻英大使电新加坡总领事，劝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十万元。总领事向余提议，余云：“居留政府对募捐例须请准方可进行，况飞机属军械品能否许可未可知。窃思如蒙许可，须联络全马来亚，庶小埠市不致向隅。”乃向当地政府请求，即获准许，出余意料之外，由是感觉英政府对我国方针已变，心中无任欣慰。总商会传集各界会议，举余为主席，宣传驻英大使电，按全马捐十万元购机一架。余按马来亚诸大埠俱能独捐一架，其他小埠不免向隅，余经请准当地政府，联络马来亚各埠合作。即决议成立“购机寿蒋会”，登报并通函全马十二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计捐国币一百卅余万元（其时坡币约六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概汇交南京购机。

   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事变，马来亚华侨多埠发起募捐救济祖国难民。新加坡爱国侨胞，自余询问以落后为言，余答：“战事尚未显明，若可息事则无须筹款。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开会筹款当有相当计划，不宜急切轻举贻误成绩。可将此意告总商会，预向当地政府接洽，许可于必要时开侨民大会。”越至八月十三日战事已发动。即由总商会登报传单，订十五日开侨民大会，捐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十四日英政府华民政务司佐顿君邀余谈话。问“明天赴会否？”余答“赴会。”“将举汝为主席否？”答“不知。”佐君又云：“经与总督议定，此会当由你负责，因本坡华日侨民众多，政府甚为关怀，并附带四条件为明天会场要旨。（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此乃中立国应守规例。（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又云：“总督经发电询驻华英大使，待复告知。”余归后即电南京外交部长，速与英大使接洽，款切须交政府机关，华侨方能信任多筹，全马侨胞亦可统一汇交不致分散生弊也。

 八月十五日侨民大会开会，举余为大会临时主席，余即将昨日华民政务司佐顿君所示四条宣布，言我侨如要筹款有成绩，当注意遵守。即通过本会名称曰“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规定委员三十二名，闽十四，潮州九，广州四，琼州客帮各二，三江一，由各帮自选。大会授权委员会行事，再由委员会选主席及各职员，议决后余即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昨经叶玉堆先生自动认义捐国币十万元（时坡币五一五申国币一百元），余则承认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两千元。”

越日召开委员会，举主席及职员，举余为主席，议决办事处设怡和轩俱乐部。所有捐款概作义务捐送，不收政府公债券，不得另设其他筹款机关，凡募捐款项，概汇交中央政府行政院收赈（此系总督接英大使复告）。至募款分特别捐及常月捐两种，各帮自动极力进行，并于市区外劝设分会三十余处，以期普及侨胞。规定坡中三大游艺场，每两三个月为筹赈事轮开一次，其他复有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报效、游海等等募捐手续。特别捐每年复向华侨捐一次或两次，每次降减甚多，亦有不肯续捐者。至常月捐除较成宗外，若月薪甚麻烦，店东多不负责，越久越稀故成绩无多。抗战经年之后，常月捐大半靠货物捐，树胶每担一角逐月三万余元，他如米、糖、鱼、枋木、什货等约五六万元。特别捐、常月捐、演剧、游艺及各分会八九万元，共每月义捐坡币十七八万元。论输款，闽侨较有成绩，诸募捐员及出资之人，往往以他帮为言，及闽侨开会，余常告以闽侨应多捐理由。抗战重要在出钱出力，我闽省出兵力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劝捐员务希以此勉励。至于抵制日货事，成绩颇佳，剧烈且持久，此系另一部分热诚侨胞负责工作，虽身入囹圄不辞。然英政府大不似前严格对待抵制工作者，又如各货捐实犯其法律，我侨虽私相授受，而彼知之甚稔，且全马仿行多年如是，不但未有禁止，亦绝未来干涉，其特别优容，使余铭感无任也.

马来亚原分十二区，抗战后各区均组织筹赈会，然无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亦无可比较及激励成绩。各区侨领能原谅同情者虽多，而偏忌自高者不无其人。故对于召集开会事，余不得不慎重考虑，但求能一致进行，绝不计是否领导名称。故思变通办法，函请各区会准国庆日，派代表到吉隆坡（该埠为全马中区）作谈话研究会。议题为：（一）“所筹款项是否概作义捐？”因南京政府宣布汇款概给回公债券，菲律宾已接受，马来亚诸区亦有接受者。（二）至本年终，全马按捐筹若干，各区如何分配承认。（三）所筹款项是否一律汇交行政院？（四）不组织总机关及举临时主席。计四条议案。及开会时代表百多人各区均到，多数主张须举一临时主席，正式开会，乃举余为临时主席。余言义捐不应换取公债理由，“如可取公债，则资本家及稍成数者将免损失，大多数劳动界捐出一元数角，则白牺牲，其他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等杂捐零毫碎如何办理，故新加坡筹赈会经通过，概作义捐不取公债。至公债事项待后另行劝募。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于是全体决议不取公债。第二项认捐数目案，决议至年终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负担三百万元，余各区分摊。第三项决议概汇交行政院。第四项诸代表谓虽不设总机关，亦当设一通讯处，俾可与中央政府及马来亚各区会通消息，乃举余为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余将离新加坡来吉隆坡时，已知孔祥熙院长由欧回国，国庆日可抵新加坡，即留函报告：“马来亚义捐，至年底可募国币二千万元，救国公债须待新年方能进行，至多亦二千万元。”彼接函后即发电来吉隆坡祝开会成功，并谢侨胞热诚义举。

南京政府对敌抗战后，首次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按新加坡四千万元（包括全马），付交余及其他两人函件并证书。余按此办法不妥，必乏成绩，盖三人均闽侨，而粤侨未有，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余即复函开释缘由，提议“新加坡须添增粤侨某某三人，马来亚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他十一区各有筹款机关，领袖某某请各直接寄交诸手续”云云。总领事闻知余接公债证书消息，即与新加坡、吉隆、霹雳侨领暗中联络，一面向本坡政府要求立案，成立马来亚募公债机关，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云余不肯负责募公债，他等以为募数千万元公债易如反掌，其意要居此虚荣功。政府即派广东交涉员刁作谦南来帮助，向坡督及华民政务司运动，结果拒绝要求，仍委筹赈会由余负责办理。盖彼等如何努力向当地政府运动，余绝不与闻，念均属义务，甚愿相让，无如坡政府不肯。可叹者我外交官及数侨领，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

  民二十七年春，政府复派募债员南来，其时余亦以首期义捐已办妥。应进行劝募公债，然仍必由新加坡发动较为有效。但须先觅有人认购巨额，方能影响本坡及全马。乃向数位富侨提议未遂，余不得不自己负责。于是召集侨民大会，宣布募债缘由。“政府发出五万万元救国公债，分配马来亚四千万元，余按不能如数办到，然至少亦须接受半数二千万元，庶免过负政府期望。以二千万元核计，新加坡区应负担六百万元，此项巨款非全侨努力不能足数。余经济有限为诸君所知，然为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愿购十万元（汇水坡币五十一元半申一百元）。”于是在场认购二三十万元。再后积极进行，至秋间结束仅五百余万元。而马来亚诸区虽有进行，或观望不前，或成绩不佳，后经政府及余再三催促，延至年终截止约一千余万元。统计全马一千五百余万元。盖我国政府公债，前时未曾推行海外，而上海市公债时价，每百元常行五六十元，南洋华侨银行素不肯典押我国公债，有此种种阻碍，故推销困难。况义捐劝募逐月进行亦一原因。回忆暹罗华侨对公债事，因南京政府托某银行办理，该行在暹京无何势力，又不自量力，不让总商会接办，致诸侨商袖手观望，故无成绩可言。缘许时暹政府尚未排斥华侨，若付托得人数百万元或可办到也。

 七七抗战后冬月，闽省府派数代表来，系闽南人，萨镇冰亦同来，云：“要筹款二百万元救济闽省，否则，夏末青黄不接，惨状难言。”余告以“现下绝难办到，理由有三，抗战后侨民大会及本坡政府约定统一机关，凡所收款概须汇交行政院，一也。国庆日全侨在吉隆坡开会，决定义捐坡币一千万元，限本年底筹足，新加坡数额须三百万元，现尚推筹未足，二也。中央政府责成马来亚华侨，须认购公债四千万元，余按至多承受二千万元。在吉隆坡开会时，余主张待新春开始劝募，而各区代表多欲同时与义捐并进。然俗语云针无两头利，新加坡公债须负责五六百万元，必待新春开募，且不知若干日月方能筹足，三也。以上三件事均系全马议决在先，万万不可违背失信，私为闽省筹募，此乃最易知明白事项，望诸代表原谅”。而诸代表有不明白之人，纠缠月余不休，且听人怂恿，谓闽侨另筹确有效果，余告余既负总筹赈汇交中央政府之责，无论如何在新年夏季内绝无办法，他闽侨言可另筹，汝可请他另立机关劝募，何必纠缠不满。后诸代表往吉隆、怡保、槟城，到处如新加坡应酬招待，各埠均许筹国币五十万元，系股份式做兴办农业之款（时坡币五十五申国币一百元），并有侨领同诸代表来新加坡，要余赞同亦认五十万元，共二百万元，使诸代表不致空手回去。余云：“做事须务实，若轻诺寡信，他日空雷无雨，反贻害本省，此等事余决不效尤。试问贵区会议定救国公债额数过期数月已募若干？”该侨领答：“尚未起手。”余则驳以“何故迟延，可见未有把握故尚迟廷。新加坡应摊五六百万元，开募月余仅二百余万元，尚欠之额不知须延迟至何时，且大半靠闽侨负责。贵区迄未动作，兹又欲增加省款，非至两败俱伤不已。在平时对故乡事犹当脚踏实地，何况抗战严重期间，已许中央筹募公债战费，安可迟误失信。无论如何必待数月后公债募有把握，方可筹及省项”云云。该侨领无言可答，而诸代表中难免有含不满之意者，及余回国尚有余言也。

    七七抗战后，菲律宾李君清泉来函，言：“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余复函谓：“新加坡乏相当之人请转商香港较妥。”越后又接荷印吧城庄君西言来函，嘱余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君同样，余辞以乏相当才望，不敢接受。越年（民廿七年）夏末，忽由新加坡总领馆转来重庆孔行政院长电，云：“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余以国府命令当然接受。于是登报并通函英属香港、马来亚、细甸、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处各筹账会、慈善会、商会，订十月十日国庆目，派代表来新加坡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并限定大埠十二名，次八名，又次六名，旅费各自备，附列重要议案，（一）总会名称；（二）地址；（三）举主席及职员；（四）各埠会承认常月捐义款每月若干；（五）各代表提案。须于开会前七天交到本筹备处。

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到者一百八十余人，唯香港及暹罗代表最少。其原因香港粤侨十居八九，自抗战以来年余，尚未组筹赈机关，故无举派代表参加，只有闽侨一部分派两代表而已。至暹罗商业最盛者为暹京曼谷。华侨亦最多，其时暹亲日派执政，禁止华侨捐款汇寄祖国，故代表无法选派。唯暹京外诸埠秘密派人参加。新加坡华侨无相当大会堂，乃假距市五英里“南洋华侨中学校”礼堂为会所。布置颇堂皇，并拍有声电影。祖国重庆及各省主席，或战区司令长官，多来电祝贺。开会时举余临时主席。各处代表演说后，越日正式开议。对第一条名称决议曰“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次办事处地址在新加坡。三举余为正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四各埠会承认常月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规定坡币三十元申国币一百元）。又议决一条谓政府如派任何官吏南来，须先征本总会主席同意，由主席函知各属会方得招待。其他议案及规则颇多。

      本年五月中旬，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援闽，并筹汇赈裁，当时庚曾复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菲律宾李清泉君函电，倡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援救华南事宜，吧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以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复：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复后，即未有再通消息。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文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复，电谕，孔祥熙世。”庚即电复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除来函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高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订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日期仅余三十多日，唯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相继奔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各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唯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以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不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克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大会既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廿七年十一月。

    吧城庄西言君前向孔院长建议：南洋各属侨胞应推派代表集新加坡开会，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使筹赈购债汇款及其他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而加速进展。菲律宾李清泉君亦持此主张，二君曾先后以函电询庚，帷间涉军政问题，故庚未尽赞同。日者，庄君重提此议于孔院长，孔院长乃电征庚意，并承高总领事过访面商，庚即以集会目的如在研究筹赈购债汇寄信款及国货问题，当甚赞成为答，现此事经拟进行，至领导机关云者，乃各侨领集思广益，组总会以相联络，而非操事权于少数人或个人，各埠侨胞自应明白此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服从政府指导，而体庄李二君之意，俾斯会得告成功也。南洋各属包括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以地理位置言，新加坡实居中心，以华侨人口言，马来亚亦居多数，庄李二君所以主张召集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于新加坡者，盖即以此。自卢沟桥战事发生，我南洋八百万侨胞，奔走筹款，不遗余力，而时至今日，义捐公债成绩，合计不过国币六千余万元，平均每人负担七八元而已，视敌国国民“七七”一日献金四千余万元，相去霄壤，能不惭愧！以吾侨财力与敌侨较，盖远过之无不及，而国家遭遇之痛苦，又十百倍之，乃物质上为助于祖国抗战者若是其微，则中间显有许多亟待改善之缺点，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一。敌自一九零五年战胜俄后，跃为一等国，欧洲大战又假以造成富强之机会，于是黩武穷兵，蓄志侵略，积极谋我，垂数十年，“七七”变起，敌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夺我华北，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鉴于最后开头已至，毅然发动全国长期抗战，一年余来，愈战而我之人力愈强，愈战而我之物力愈充，最后胜利属我，已为理势所必至，列邦所共许矣，然最后胜利云云，究非时间所能倖致。而宜以长期抗战争取之，此欧美军事专家所以有“时间为日本之敌，中国之友”之论也，是则今后敌我兵连祸结，历三年五载而不休，或亦意料中事，而欲支持我之长期抗战，并保证最后胜利之属我，则军事上之机械部队，尤当加紧整顿。国防建设，尤当充分完成，凡此种种，皆有待于后方国民之协助，华侨安居海外，独免流离转徙之苦，天职所在，更宜感愤惕厉，黾勉有加，使输款益臻普及，而无复见不出钱之人，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二。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间接增厚国家经济力至大，数月前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该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吾侨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姐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者，泰半恃此，然中国银行仅设分行于新加坡，其他南洋各属尚付阙如，则除新加坡及其附近各埠外，他处侨胞寄汇信款之困难，仍未解决，是项困难不及早解决，直接固足以影响吾侨故乡之经济，而内汇锐减，间接亦足以影响祖国抗战之前途，倘新加坡成立一相当机关以通南洋各属侨胞声气，而金融亦设法由此流转，使僻远侨胞同感交通之便利，则于国于家，皆有大益，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三。抗战军兴，我政府迅集巨大人力开辟西北西南等省交通线，铁路公路，双管齐下，期使内部脉络相连而远达邻境，以解除敌人锁海之威胁，及今战区难民内移者达数千万人，而丰富资源亦得赖以开发，奠建国之基于风雨飘摇之日，启复兴之运于河山破碎之时，操心弥苦而抱志弥坚，努力愈大而收功愈著，将来寇氛一扫，转贫弱为富强，特俯仰问事耳，吾侨爱国，素不后人，则于建国复兴之大业，何可袖手旁观，而不速图自效耶？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四。综上四端，实有召集南洋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之必要，孔院长所以深致关怀者，盖亦同感，现各大埠由孔院长或领事直接通令准备，其他政令难及之区则由庚代为传知，并订本年国庆日为开会日期，凡已正式成立筹赈机关之大埠，应请从速举定代表以便来会。而该埠辖内之各小埠分会或支会皆属之，不必另派代表，例如马来亚分十二区，每区有一筹赈会，大会仅承认各该区筹赈会推派出席之代表，其余各该区内诸小埠之筹赈分会或支会如另有代表，则大会不能接受，若各埠会不能推派代表参加者，则其所属之分支会便可直接派代表出席，其职权概与各埠会代表同。此外若干不相统属之小埠或偏远孤僻之地，应请迅自组织机关与大会直接联络，除修函奉达外，特另文刊登各埠报纸，如函有未达，仍希自动示悉，并举代表依期参加，至大会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经交托各驻地领事馆代发，请就近询取，或函索即寄。

**一 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 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

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复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复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谱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 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利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借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 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分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处机关之贺电，计若干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记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 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惟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 华侨捐款及公债**

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可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几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当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 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见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位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建议于荷属华侨庄西言，经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孔院长同意而召集。大会目的在谋组织领导机关，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并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军政问题，概不讨论。各属参加者有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婆罗洲、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代表，凡四十五团体，一百六十四人。此华侨史上之空前盛会，蒙新加坡居留政府赞许，得于本年十月十日开幕，大会同人谨先鞠致恳挚之谢忱。

       中国立国五千年，夙以和平正义昭天下，不幸邻邦日本，军阀专横，妄图吞并中国以为征服世界之准备。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件之提出，十七年济南惨案之发生，特荦荦大端，世所共闻者，其他无理压迫，非法要求，擢发罄竹，难以具举。二十年“九一八”日本更挟其坚甲利兵，攫夺中国东三省，继以占据热河。翌年，“一·二八”，又惜不启衅于淞沪。中国自念加入国际联盟，且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签字国，懔于盟国之尊严，惕于和平之神圣，不得不负重忍辱制愤抑悲，勉循外交途径，以求合理解决，而冀日本之觉悟。乃侵略者野心未戢，变本加厉，转鹰瞬为虎瞰，舍蚕食而鲸吞。去岁卢沟桥炮声，盖世界和平与国际盟约之丧钟，中华民族与人类公理生死存亡之警号也。中国政府鉴于最后关头已至，毅然发动全面全民长期抗战，将以争取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将以争取国家民族之平等自由，故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共同信赖唯一政府，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蒋委员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大会同人，集议伊始，用首次决议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同人于此，愿更揭举数义，为我南洋八百万侨胞告：

       其一，抗战十五阅月，敌财消耗百万万元，敌兵伤亡七十万众，我之物质损失虽巨，敌之物质损失亦巨；我之国土，虽涂满黄帝子孙之血，亦涂满三岛丑夷之血；惟我有无限之资源足以支持，我有无穷之人力足为后盾。忍万屈以求一伸，拼千输以搏一赢，艰苦奋斗，义无反顾，否极之后，终有泰来。敌则资源有限，人力易穷，踵决肘见，百众不安，时间愈延长，危机愈逼近，墓由自掘，祸由自取，行见鼠窜而败，鱼烂而亡耳。故当前领土之沦敌，无关大局，最后胜利之属我，绝对可期。此种理势，吾人必须认识；此种信念，吾人必须坚抱！

       其二，华侨素有“革命之母”之令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南洋方面，占十之八。此在道德的义务上，可谓已尽；而在国民天职上，究有未完。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借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而吾人之生存与幸福，亦庶几有恃而无恐。大会开幕之日，我国府林主席之训词曰“急难轻财，护兹祖国”，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训词曰“财力增厚，即战力增强”。林蒋二公，语重心长，凡我侨胞，宜皆铭诸肺腑，奉为金玉。而各代表所报告，今后常月捐义款，总计每月约近四百万元，尤当分别依其自定标准，努力求其实践。

       其三，南洋各属华侨，山海修阻，云天遥隔，声气欠沟通，感情失联络，常时犹病其不可，非常时更何能集中力量，效劳国家？大会同人，有鉴及此，爰议决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英属新加坡，期使筹赈购债之效率，得以增强，抗战建国之功业，有所补助。是项组织实现，不特各属筹款机关，可密切联系，而冶于一炉；即全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神团结，而化为一体。吾人既共成之，既共有之，则吾人必须养之育之，予之以生命，赋之以灵魂，俾能发挥活力，为国家用。敢假借此组织以遂个人之私图者，固为吾人所不许；敢破坏此组织以快个人之私意者，亦为吾人所不容。

       其四，吾国丰于矿产，啬于产品，故建设难以进步，贸易难以发达。今欲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借自力之更生，谋自强之不息，则开发矿藏，推销产品，实不容缓。唯政府专力御侮，未遑兼顾，海外侨胞，应速分负其责。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之设立，于此亦将加以注意，务使国产品深为侨胞所认识，永为侨胞所乐用，以振我工商业，而厚我经济力。更拟组织公司，开发祖国富源，维持难民生计。凡此加强战时经济机构，奠定战后复兴基础，皆属至急之要图，为我国内外同胞所当尽心尽力以求之者。

       其五，南洋各属当地政府，平昔爱护华侨，不存歧视。此次吾国发动抗战，各属侨胞，本慈悲之怀，为救济之举，当地政府皆能深表同情，予以协助。凡我侨胞自应致其敬佩与感谢，然各属环境不同，法律不同，我侨胞宜各顺适环境，遵守法律，屏叫嚣而尚沉着，崇理智而制感情，步伐必求其齐，路径必取其正，使各方获好印象，而利我进行。吾人须知，吾人之敌，只有一个。敌以外皆吾人之友，吾人应以左手拳挥以击敌，应以右手伸掌以握友，然后足以孤敌困敌，然后足以加速博取最后之胜利。

       以上五端，为吾人之态度，亦为吾人之方针。本此态度，循此方针，以求达目的，则在乎大会全体代表与南洋全体侨胞之共同努力，大会同人谨乘休会之时，更郑重致意曰：惟精诚始足以言团结，惟团结始足以言力量。精诚充，则团结未有不固；团结固，则力量未有不宏。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鞠躬陈词，幸相与勉之。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十六日

       谨依据代表大会决议：“总会应行订定各种筹捐赈款办法之细则，及其方式，通告各属会尽量采用。”一案特草拟本文筹赈办法举要，都为十二种类，以供各属会参考，而采用之，在此十二种类之外，各属会如有更切实有效之办法，亦得举报本总会分达各处。

**一 特别捐**

甲、每若干月相机出捐一次，视地方景况而决定之。

乙、逢大纪念日，可倡行献金运动。

丙、采用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名义，即同时进行特捐——例如黄河水灾等类。

丁、国内有何种倡捐，在时间上急需者——例如劝募寒衣等类。

**二 常月捐**

甲、各行店公司应捐认者。

乙、各店员伙伴应捐认者。

丙、自由职业应捐认者。

丁、劳动界应捐认者。

按此项常月捐在都市而外，并应推行各山内、乡村，以求普遍，办法应雇员催收，如各地方有热心家负责催收更妙。

**三 货物助赈捐**

甲、出产品或入口货。

乙、如与环境有关者，应设法避免干涉。

丙、此项货物助赈捐，如办理得妥时，实惠而不费，最可持久。

**四 纪念日劝捐**

甲、一月一日开国纪念，及旧历正月初一、二等日（约阳历二月间），可借此年节劝侨胞节省各费助赈。

乙、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及三月卄九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择一举行。

丙、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

丁、七月七日卢沟桥惨案纪念日。

戊、八月十三日抗战纪念日。

己、九月十八日暴敌入寇东三省纪念日。

庚、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

辛、十月卅日蒋委员长寿辰纪念日。

壬、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

癸、十二月廾五日云南起义纪念日。

按每逢纪念日劝捐办法，或口头劝募、或演剧、或卖纪念品、或卖花，均可随时地而决定，其中唯卖花较为简便，若距离月余或二个月举行一次，虽颇麻烦，然以国难严重关头，出力出钱，固应勉为其难，爱国侨胞，当能原谅，而乐表同情，若逢一月之间，有两纪念日者，可以就地变通，观局打算，总求加强筹赈成绩是也。

**五 卖花卖物捐**

甲、每逢纪念日组织卖花队出发，向各行店及个人劝售。

乙、要以广大队伍普及劝售，求成绩之伟大。

丙、卖花而外或兼售别种纪念品物，如蒋委员长像章等类。

蒋委员长像章铜质每个大宗六占余，镀银约近一角，镀金约近二角，如需要可代介绍购办。

**六 游艺演剧球赛捐等**

甲、此数种之中，各有不同且多属娱乐性质，虽每月多举几次亦属无妨。

乙、场内卖票，多出游客自由购买，若场外买票，则须用工作鼓励，方有成效。

丙、场内货物，多用征求义务捐助者。

丁、场内卖物，亦有当场鼓励顾客加价之效率。

**七 舟车小贩之助赈捐**

甲、舟车小贩等应经若干时日，请报效一次，须察情形而定，但应派员鼓励，方能有效。

乙、每次给以救济箱，收来若干，应为之表扬，俾互相观感。

丙、报効之日应大书特书，挂布表扬，俾买者更不计值，而多捐助。

**八 迎神拜香演戏捐**

甲、迎神等虽近于迷信，然习惯难除，便宜利用，有此机会宜劝诸当事人节约开费，移款助赈，此举甚有效果。

乙、旧历七月盂兰盆会（俗称普度），此项习俗，耗费更巨，若能设法利用，鼓励其节资移赈，收入定必不少。

丙、各社神诞香火热闹，人山人海，彼等虽为迷信诚心而来，倘乘机组队，卖花卖物，亦可收巨效。

**九 设救济箱于公共场所**

甲、制木柜高二尺余，尺余方，柜后面墙枋高出约十寸，绘一伤兵或写标语，以引致观感。

乙、该木柜安置于公共出入场所，或任何大机关门户口，托其所内人员兼管。

丙、该木柜应加封锁，按若干时日，由筹赈会派员会同所内人员公开核算，得若干赈款即给收据，并表扬之。

**十 宣传有效方法**

甲、多设阅报室，及壁报，任人观阅。

乙、另拟白话文告，隔若干时日，印发一次。

丙、利用世俗各种纪念日，做演讲会，会场或借戏台一半小时便足。

丁、通俗演讲，意在感化文盲，切勿多用文言，宜用乡土浅白之语句，能令男男女女家喻户晓者为要。

戊、通俗演讲，每人不过半点钟，讲时应简短，及能感动者为合，并多招演讲人员，每次集会，至多一点余钟，至二点为限。

己、注意在市区外各山芭村落演讲，俾能普及出钱。

**十一 各处应多设筹赈会分支会**

甲、各埠市区之外，所占地域更广大，应派员向各内地乡村鼓励，组织分支会。（语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何处，吾侨定必有热心家，可负其地方之职责）

乙、分支会若有成立则其常月捐或何项特捐，定有多少可以增加收入，在组织初期，应宜派员指导。

丙、乡村内地如多设分支会，则必互相观感互相竞进，盖不甘后人，不甘受不爱国之恶名，此乃我民族之特性，但期各埠会领袖，尽力设法领导为要。

**十二 各埠会常月捐应求有进无退**

甲、各埠会对此次大会报告之常月捐额数，此后当求增加，不可减少。

乙、要达到所期之目的，势必用心用力，勤事工作，然救国筹赈，责无旁贷，所望负责筹赈会领袖，与同事人员之努力。

丙、本节所谓各埠会常月捐乃包含各埠会逐月收入一切捐款而言，非仅指各类捐款中之一类常月捐而已。

暴敌扰粤，广州告陷。在时间上，可谓意外；在情势上，实在意中。吾侨切于爱国爱乡，难免骤受刺激，然不宜因而丧失意志，更不可因而动摇胜利可期失地可复之信念。盖抗战初发，我最高领袖即已立定三大策略曰“焦土抗战”，曰“全面抗战”，曰“长期抗战”，以对付暴敌。此三大策略果能坚持到底，则暴敌虽有世界一等军备，亦终必失败。兹谨为我全南洋侨胞陈之。

       （一）焦土抗战，所谓焦土抗战者，将不惜糜烂若干领土，使敌于偿付重大代价之后，纵有寸进，终无所得。敌虽有飞机大炮之轰炸，使我田园庐舍，悉化灰烬，然不足以惧我、屈我；敌虽肆其劫掠屠杀之手段，施其恫吓离间之伎俩，然不足以阻我、挠我。反之，我之团结日以坚，我之力量日以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成仁而死、不忍辱而生；宁以焦土葬敌、不以净土资敌；我虽失败于一时，敌必失败于最后。此种策略，实出敌意料之外，而足以碎敌之迷梦也。

       （二）全面抗战，所谓全面抗战者，将精诚团结，举国动员，使处处抗战，人人抗战，不致示敌以弱点，予敌以个别击破。目前敌虽占我江海边地，繁华城市，铁路交通线，然每省被占之地，至多无逾十分之一，其余全在我国手中。我政府更派员组织游击队，而民间壮丁队又从而附益之。无论城市乡村郊原山野、皆有其踪迹，神出鬼没，夜袭昼狙，毙敌日以千百计。如华北之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虽被占最久，被祸最甚，然境土十分之九，仍在我统治下。平津近郊，屡受我游击队威胁。仅此数省，敌须经常留兵二十万左右，犹且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故此后无论敌能再占我若干省，我之游击队壮丁队亦必随之增加，以陷敌于四面楚歌之境。试问敌有若干兵力可分驻许多日，而逐月伤亡盈万，更将如何补充？由是以观，可知敌多占我一省之地，则多损彼一臂之力，似此人力财力有限之小国，而欲妄图吞并地广人众，决心全面抗战之大国，其最后胜败之数，盖不待卜而知矣。

       （三）长期抗战。所谓长期抗战者，将养我之兵，耗敌之力，坚持到底，义无反顾，使敌速战速决之野心，悉成画饼，而逐渐暴露其先天不足之病征，自召政治经济之总崩溃。民二十年敌占东四省，易如反掌，遂得陇望蜀，拟于客年再吞华北，敌初按六星期至三个月即可得手，迨我蒋委员长发动长期抗战后，其狂谬计划遂完全失败。抗战以来，十六阅月，敌于华北尚不能占一全省，况华中华南华西之区域较华北广大十数倍，而能尽为吞没乎？稍有常识之人，当能明白此理，而了然于泥脚之敌终不能久立矣。然敌固自知久战必败，故狡图速战速决。当南京被陷时，敌即请求友邦与我商谈和平条件，为我最高领袖所拒绝；占徐州后，复施此策而无效，最后乃谋急夺广州汉口，以胁我采择和平之一途。观此即知所谓和平计划，即敌之逃死计划，绝非蒋委员长三大策略所能容。故无论何城何镇失守，皆我抗战中难尽避免之过程，于我抗战前途，实不发生恶劣影响，吾侨唯有信仰领袖，拥护政府，尽后方出钱出力之责职，以与战事相终始，则最后胜利属我，期在不远耳。

       抑更有言者，敌占我东四省，已阅七年，费款卅万万元，死亡士兵十余万众，至今仍时时受我义勇军攻击，不得安居乐业。我东四省人口不过我全国国民十分之一，自沦丧以后，无我政府机关为之领导，军械又甚缺乏，财物又甚枯竭，而民心依然未死，民气依然甚盛，相率振臂揭竿，且冒万险，以与强仇抵抗，使其损失与时俱增，而无法解免。今我战区各省人民众多，组织周密，供给领导，日臻完善，抵抗力量视东四省加十余倍，岂容入寇之敌一日得安寝食耶？

       我国地势，河北山东诸省多平原，乏高山深谷可以藏守，尚能遍组游击队，到处活跃。其他诸省，高山深谷，所在皆有，尽为游击队绝佳战地。进可以杀敌，退可以保身。敌之机械部队，更何所施其技。长是与敌周旋，终以使敌消耗巨大，而趋枯竭也。

       我国地大物博人众，居世界第一位，特科学未昌明，实业未发达，故宝藏于地，不能富强。今抗战建国兼筹并顾，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则最后胜利之日，即民族复兴富强之时矣。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失败，名城尽失，要地多丧，余众不过万人，卒以华盛顿之坚苦沉毅，百折不挠，长期抗战至七年之久，而博最后成功。今日我国抗战情势，持较当时美国实远胜之无不及，最后成功之希望必更容易实现，断无疑义。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岂足转移我同胞之心乎！愿相与共勉淬励，以加速民族解放之日之来临，幸甚，此布。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七日

 战后补辑

       余写《回忆录》动笔于民国卅二年三月，脱稿于民国卅三年四月，迨日寇投降后，余由爪回星，抵星以后数月来，因事务丛脞，未遑补记。兹因付印在即，特补数则，并将报章所载及余近所撰诸文件附辑于此。  
   民卅四年四月初，日本内阁首相小矶倒台，改以海军上将年已七十九岁之铃木继任，识者已知其将败降。盖自来大权属于陆军，今乃归海军，且以老大之人负此重任，其将屈伏，不待智者而后知。五月初其盟邦德国已完全崩溃，而日本之延迟日子者，无非要求联军减轻投降条件而已。至八月十二日果闻日寇已屈伏投降矣。

       日寇自去年知将战败，乃鼓励印尼土人许以独立之筹备，反对荷人战前对殖民地之虐待。于是土人宣传日广，城市乡村普遍集会，日甚一日。日寇投降后，尚须负责地方治安，以待联军来接收。然传闻纷纷，或云此月内，或云来月初，究实相差甚远。九月半间，风闻土人将抢劫华侨，余乃移住玛琅市。至廿八日接吧城前新报经理，洪渊源君来电，告予如要急回新加坡，有飞机可乘。余复电不日起程。十月一日，余与校友黄丹季等，坐汽车来泗水，午间赴各界欢送会。下午五时搭火车将来吧城，送行者颇众。一等位火车每辆八位，蔡钟长君自费包租惠赠，诸校友伴行者，为黄丹季、郭应麟、陈新盘、林昌平、黄奇策。车行半小时后，有一洋装印尼人来坐在椅边。校友告以包租事，彼答伊“奉其最高领袖令，来此保护华侨领袖，到某站，即换他人”。沿途果转换数次，足见其鼓动独立，只敌对荷人，而对我华侨尚有好感也。

十月二日至吧城，寓于庄西言君住宅，三日厦大、集美诸校友开欢送会，各界参加者数百人。主席致词后，余答谢，并略言厦大、集美两校经过大概，及战后本省及南洋师资必大缺乏。其原因为本省教师素乏，复加以台湾收复，所需更多，而南洋教师为战事改业，及久客思归者亦不少，侨生愿读中文者必多，准是推之，教师必大缺乏。鄙意祖国如有良好政府，则集美学校现移在安溪、大田、南安三处，仍旧勿迁回，而将集美校舍借给政府，专办师范学校，可收学生二千余名，格外优待，在南洋可招初高中毕业及未毕业诸贫生数百人，省内亦然，如此则一年后陆续毕业，可以补救师资之缺乏。余言终，有某校友发言：抗战告终，建国方始，希望校主领导华侨襄助祖国建国云云。余答言，“乏此才力，实不敢当，至祖国现延安毛泽东主席来渝，国共表面上似有妥协之可能，然根本上则背道而驰。不知者只认国内两派不和，究实中央政府方面，将官亦甚复杂。各派均言要行三民主义，究竟谁是谁非？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诸君如要知详细，明天尚有福建会馆一会也。”

       十月四日，早间庄君告余，今日如开会勿道起国共事。有顷郭应麟君告余，伊受郭美丞嘱托，劝余在会场勿言国共事，因侨领等多党人。两郭均为校友，余答：“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人限制。且起因出自主人，既不能信仰，何必开此欢迎会，不如取消为愈。”郭君等见余如此坚决，与诸侨领聚商，至午饭时尚未表示如何。迨至开会时将届，不见庄郭等君，有他校友招余同车赴会。抵时各界男女侨胞到者甚众，座位皆满，郭君等亦在场，闻甫欲宣布解散，而余适至，遂即开会。主席致词庆祝余安全脱险及勉励领导华侨襄助建国云云。余答谢云，“余乃侨民逃难一份子，奚敢当此盛大欢迎？适贵主席顾爱奖誉，并勉余领导华侨，对祖国战后帮助建国等项，余实愧不敢当。然既蒙在盛会中表示，余亦不得不发言，鄙意会场中发言有三种：一、漂亮话；二、敷衍语：三、老实话。漂亮话余平素不会说 敷衍话，难免使诸君失望；若言老实话，恐为一部分人不喜听。如此则深无言可说，但既不能不说，又不得不言多少。

       “今请言‘爱国’两字。然爱国范围甚广，姑从抗战建国与我华侨之关系言之。抗战需要金钱，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余于民廿九年春，率同慰劳团回国时，在重庆曾问孙院长及财政部，去年（指廿八年）华侨外汇若干？答十一万万元，其中侨胞家信寄款十万万元，义捐一万万元，此数南洋各属占三分之二，美洲等地占三分之一。据世界公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每一元基金可发纸币四元，如此其纸币基金便算稳固。华侨汇回国内，尽是现金。政府如依十一万万元之数目尽量发出纸币，可得四十四万万元。除发交侨胞家信十万万元外，尚存三十四万万元。又据何应钦部长在参政会报告，去年（民廿八年）战费支出为一十八万万元，如将上述三十四万万元之数，再除此一十八万万元，尚存十六万万元，可以供作政费及党费。其时抗战已经三年。余询白崇禧、陈诚两将军：兵士每月每名发给粮饷若干？彼答十一元五角，近因米贵每名另贴米价三元，共四十元半云。查当日每担米价为四十余元。及至南洋失陷后，侨汇断绝，纸币增发，百物昂贵，民不聊生，米价亦由百元升至一万余元，殆由于国币缺乏基金之故。”

       “至于南洋各属义捐，自南侨总会成立，以迄沦陷，计三年余，所有捐款及药品以新加坡币一十五元申为国币一百元计之，更用各属华侨人数平均，成绩最佳者为菲律宾，彼地侨胞十三万人，每月每人捐出五元。次为马来亚华侨二百三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七角半。又次缅甸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二角。又次荷印华侨一百五十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成绩最弱者为安南一地，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五角。若论自祖国来，而个人又拥资最富者莫如安南，该地富侨黄某为同安人，资产有千余万元，惜以领导失力，群情散漫，捐款成绩，致落人后。抗战已属过去之事，此后全国要集结总力，从事建国，余以为首须认清是非。以国民立场言，若不明辨是非，对国事必模糊不清。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金钱非人人所有，力量不大，是非之心则人人皆有。我侨在海外有千余万人，既富有金钱势力，若能加以认清是非，对此后建国贡献，比之以前抗战贡献，必更伟大。”

       “我国不幸在抗战时，内部尚未统一，重庆、延安，俨然对峙。双方领袖均系南人，两党名称虽不同，而其所云推行之三民主义则一。（延安言他们是行三民主义，其说详后。）然主义既同，何故不能合作？盖重庆指延安为‘赤’，延安指重庆为‘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余观察，战后则必多一中立派。中央、中共、中立适成三中。大都势均力敌。中立派虽未结成团体，其人物则约略可知，如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张发奎、薛岳、余汉谋以及宿将冯玉祥、白崇禧等是，彼等虽隶属中央，实则貌合神离。三派人物，俱言奉行三民主义，在抗战时，亦尚可勉强合作，此后三民主义必各有其形态，谁是谁非，殊难认清，要在各人肯运用良心与否耳。”

       “余前年回国慰劳，深深注意，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抑或分裂内战，以及两党政治措施究竟如何？故决定既到重庆，亦必亲到延安，以求得知事实。兹先言重庆，重庆政治，可不具论，我华侨都属闽粤人，如已知闽粤两省之政治如何，则亦不难推知重庆之政治状态也。至所谓中立派者，如阎锡山将军，中央许其有十八师军队，但他扩充至三十师，军费不足，自发省币。余告他国共摩擦事，经白崇禧将军拟具调处方案，划定双方界线，各守范围，合力抗战。阎云此非根本办法，须国民党自已把政治弄好，政治好共产党自然没用，否则虽无共产党，亦有别党，可起而反对云。傅作义原属阎将军之部下，自然与表同情，他两人握有军队四十余万。李宗仁虽反共，而与中央亦非十分契洽，蒋委员长之个性，彼知之甚深，对余曾表示过批评。是时李君亦有军队四十余万人。张发奎虽任战区司令长官，然与中央无一贯因缘，未为中央所倚信。薛岳前系张之部下，余汉谋亦与彼等有默契。以上诸人，在抗战时，固然拥护中央，一致对外，而战后拥有百余万兵力，数量实不减于中央。至于中央之正规军虽上百万人，而民主势力已遍布各省内地，统辖游击队二百余万人。故余以为此三者，已成鼎足之势。国共果能真诚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则中立者可无问题，设不幸仍旧背道而驰，则三民主义必能露出真伪，谁是谁非，我侨不可不分别认清也。

       蒋委员长待余极厚，虽宴全体参政员，而首席客位则以让余。最后在黄山别墅设宴饯行，筵终适来警报，主客均下山数百步，入避防空壕，警报解除，复再步行上山。蒋公见余未执手杖，乃将自己手杖强让与余，他与蒋夫人携手同登，深情厚意，余终身不忘，然此属私人情谊，至于国家大事，公私应有分界。余甚望蒋委员长更使政治良善，庶以成其不世伟业，保持其无上荣誉也。余自入延安界廊县甘泉县，便注意道旁所经各田野，见其陇头阡陌，一一仍旧。窃思彼等若已实行共产政策，必废阡陌，而成为集团农作，今则田园旧界仍存，心中颇觉疑惑。又见农夫及路人衣服亦颇完好，不似甘肃人之破烂残污，恍似另有天地。

       抵延安之越日，参观女子大学，乃首次与朱德将军相会，将回时，李秘书头部突受车伤，入医院七天，此时期一切参观，李秘书概未参与。延安教育大中小学校均免费，男女大学生衣食住皆政府负担，每月复给零用费一元。公务员每日工作外，须读党义二点钟，每星期上一大课，坐在露天地面。公务员、学生、民众常数千人，听名人演讲。

       “农民产业权仍旧自由，各新垦荒山田园，业权亦属私人。抽税每人每季不论收成何种物品，上四百斤者抽一斤，加收一百斤者，加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为止。新垦田园首年收成免税，民众负担纳税，只有此条义务而已，并无其他捐税。工业如机器厂只有政府创设数家，甚形幼稚，人民仅有多少手工业而已。

       “商业在延安城外，只一道街。延安全城内前住二万多人，被敌炸作平地已无人居。大小商店百余家，均为私人经营，营业自由，政府绝不干预。全年亦无抽税。

       “南洋男女学生及闽南人在延安者颇多，财政长、医院长、司法院长均龙岩人，宣传部秘书陈伯达，惠安人，为集美学生，司法院长亦为厦大学生。

       “余既查明后，问何请共产政治？彼答‘是行三民主义，而非行共产政策。前在江西亦系如是。又自西安事变时，与蒋委员长所立合作条约，更坚守不变’。余问条约内容可得闻否？答‘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时所议定者（一）日本如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廿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国币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发。（六）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而共产党须实行三民主义。故自该约成立后，彼已实行三民主义云’。

       “据朱德将军言，彼等‘照约实行三民主义。而中央政府对所约各条件，未尽举行，行政院虽已通过，却未宣布全国，致国民绝不知情云云’。

       “余上言三中鼎足，或者有人以为此乃余之杞忧，余亦乐受不辞。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建国不难成功，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则三民主义又将如何？料不致均为徒托虚名，最低希望，亦必有一方面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战时虽黑白难分，若在战后，无难水清鱼现矣。

       “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惟有极望国内政府实践三民主义，庶能达到建国目的。欲求建国目的之达到，尤必须先认清是非也。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何以言之？国家政治不良，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而在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新加坡闽侨，余所知者，五十年来百万以上之富翁十余家，其身后不坏于无知之妇妾，则毁于不肖之子弟，家破产亡，门庭冷落，声名狼藉，言之可伤。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保，其乐何如？然此固首赖祖国政治之优良，方可有望也。”

十月六日，上午由吧城乘飞机，午后到新加坡。直到怡和轩俱乐部，屋内修理未竣，用具及各物损失无余，盖被敌占住三年余，方始交回，重整未备。少顷诸旧友接踵来访，相庆脱险平安，及闻侨胞遭难惨况，则悲喜交集，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星洲沦陷后笔者经华侨检证之浩劫，幸得脱险。当时甚欲知日寇对于华侨之意见，一日于一小摊购得日文旧书一册，书名《华侨研究》系日本企画院——按此想系日本政府所设，专为计划侵略他国之机关——所编，一九三九末出版，洋洋巨帙，详述南洋华侨之种种情形，以及其抗日工作，事事皆甚明晰，较之华文书报所自述者尤详。日寇大约即用此种报告为根据，以对付我华侨者，阅之不禁毛竖。中有一段专论陈嘉庚先生，可见日寇对于嘉庚先生之注意，先生能安然渡过此长期逃亡之难关，可谓天幸。于兹日寇屈膝，先生归来，侨胞举行欢迎大会之际，笔者欣然释锄，译而刊之，以与侨胞共申庆祝之意。该书第五章抗日诸团体之活动第一节陈嘉庚，所述如下：“若将此人除外，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其他华侨社会活动，均不得考究矣。彼为福建出身，在世界恐慌前，其经济力唱霸全马来亚，发挥绝大势力。（中述嘉庚先生之营业，从略。）其后受世界恐慌波浪所袭，经济上遂致失败，然其昔日之势力仍不减少，其社会地位及声望依然‘独步’，对全华侨有强大之影响力。彼现为星华筹赈会之主席，又为抗日及排斥日货之主动机关，难民救济会之主席，‘奔命’于抗日之运动。一时传闻彼欲辞职，然此系误传，实则彼仍旧在抗日阵营中指挥工作。彼早于一九一三年（应为民十三年）特为排日之目的，而创办《南洋商报》，置言论界于其势力之下，现今其销行额约一万份。去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双十节，全南洋华侨代表开大会于星洲，任此会之主席者即为陈嘉庚。彼抑制一部分华侨之盲动，而指导之以从事冷静而有秩序之大运动，实一不可侮之人物也。去年七七纪念日，彼在星洲大会中演说，告诫华侨应遵守当地之法律，勿破坏中英之友好关系，而为敌国所笑云云。华军虽屡败，然彼仍不停其怒号。汪精卫脱出重庆以前，曾发表和平愿望之谈话，彼立即电汪云：‘和平谈话将使华侨误解为无继续抗战之意，应排斥和平，坚持强硬态度，彻底抗战救国，以振奋人心’。（译者按此照日文直译，下仿此。）汪复电云：‘我国固反对侵略，然对于国家之生存无害之和平交涉，亦不必拒绝。’陈再打一电表示不满云，‘际此国难，民气愈盛，生而屈辱，毋宁玉碎’云云。其后汪由重庆遁出，发表对日和平宣言，新加坡之华侨遂视彼为叛逆，致强硬通电于蒋介石，请其发逮捕令，此电亦正为陈嘉庚所发起也。其后维新政府电陈嘉庚，劝其赞成和平亲日，陈不过以一笑置之。如上所述，彼陈嘉庚者实为南洋之排日货及抗日之巨头，其风貌态度手腕及‘抱拥力’，正可谓为蒋介石之南洋版也。”

 日寇投降后，余在爪哇即发出通告如下：

      “南洋各属不幸沦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他如缅甸菲律宾华侨较少，然地当战区，损失必更酷烈。至于爪哇侨胞，遭难虽次，但既受土人抢杀，复被敌寇劫掠物资，几至竭泽而渔，工厂没收或拆毁，略有声望侨胞，多遭拘禁集中营，酷虐待遇，苦不忍闻。其他侨众，虽获些少自由，然拘捕任意，朝不保夕，一入囹圄，释放无期，酷刑虐待，非死则伤。加以公务人员，狐假虎威，助桀为虐。人民疾病伤亡，难以数计。兹幸联军胜利，领土恢复。侨胞损失虽重，然经此困苦难关，追念前昔泛散，此后应有团结组织，亲爱互助，协力同心，俾于两三年内，克复前业，效力建国，实践侨民天职。至于沦陷间，敌寇权威之下，或迫于压力，或困于生计，不得已在营业上与敌交易，不足为怪。若以此为罪，则许多人员为敌服务，政府将如何处置。惟有为虎作伥，任敌走狗，谄媚无耻，利己害人者，此辈虽可恶，然谅极少数，政府必有相当之处置。除此以外，不可居心嫉忌，吹毛求疵，造作构陷，互相排挤。当知侨胞来此，多为谋利计，虽或有积货居奇，料属少数，而大多数人损失，当加百十倍。黄台之瓜，岂堪再摘？倘有获利侨胞，对于救济援助，捐输教育，尤希格外慷慨，因富成仁。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此布。”

  “万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苏加尔诺先生鉴；鄙人前由爪哇返星，在爪哇时深悉足下所领导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与人民，对中华人民采取友好态度。鄙人兹特向足下表示感谢。惟目前苏门答腊有若干地方，中华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感情尚未臻融洽。鄙人以华侨领袖名义，已通知该地华人，务须与当地印度尼西亚人保持最密切之友好关系。兹请足下对各地印度尼西亚人亦作同样通知，以期中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之睦谊愈益增进，无任盼祷。陈嘉庚自新加坡。”

（转录各报记载）

       星华筹赈会，自星洲沦陷后，会务便尔停顿，至今已达四年矣，主席陈嘉庚归来后，觉该会有许多事务，急待继续办理，爰定于本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假座中华总商会举行委员会议，议程如下。

一、报告本会在沦陷期间账单及器物各种损失。

二、报告民国卅一年一月廿九日存在中国及华侨两银行之款项数目。

三、报告沦陷前，曾代英政府雇工垫出三万余元之款项数目。

四、本筹赈会之名义，是否暂再保存，如须保存，各帮委员缺额是否须加补充或更动。

五、敌寇入境惨杀华侨，及检证时被其捕去，与及后来累次掳杀，生死存亡不可胜计。是否须另组华侨机关负责调查，抑由本会办理，以便汇集报告，呈请中英两国政府严惩凶犯，及处置敌国。

六、敌未入境时，侨胞各商店存积物资，多或数十万，少亦千百元（叻币）。迫被占领，非遭武力掠夺一空，即为伪币剥夺以去。现今英政府对于伪币价值若不予相当承认，则吾侨几等于全部破产，损失惨重如斯，前途奚堪设想？又如各工厂原有规模悉被破坏，是否应限期征求各侨商造报工商业物资损失，及所存伪币数目，以便呈请中英两国政府筹划补救补法，并责敌国赔偿。

七、临时动议。（《南洋商报》十月十三日）

       “星华筹赈会为调查敌寇占领马来亚时，吾侨生命财产之损失，特组织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昨假总商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到会者卅余人，主席陈嘉庚，纪录李铁民。（一）制定调查表格案，议决，分作财产损失及所存军票，（再分商店与个人两种）及人命牺牲，依照所拟格式表通过。（二）调查办法案，议决，分区进行，大坡四区，小坡四区，由全体委员会及襄助员参加工作。大坡推杨缵文为召集人，小坡推李亮琪为召集人，如人数不足，另行增加。至于市区外，仍由筹赈分会负责。（日内召集会议）”（《星洲日报》十月二十日）

       “星华筹赈会调查委员会，已发动大规模调查吾侨在敌寇占领时代，人命财产之总损失。其中如敌寇之宪兵部，特高科以及各种军警机关，逮捕无辜民众，加以种种酷刑迫讯，惨无人理，如所周知，灌水、灼电、灸香、灸香烟头、碾腿、跪玻璃屑等，任意施刑，不胜枚举。该调查委员会为欲制成表式，以便详细调查，兹特征求各界侨胞，凡所身受，或耳闻可靠者，请将其酷刑种类，一一列出，函报“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调查委员会”收，俾便汇集填入调查表格之内，望我侨胞，深切注意，就此数日内，径函报告云。”（《星洲日报》十月十八日）

**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号**

       “自敌寇南侵至于投降，南洋各属华侨生命财物，损失惨重。各处若不妥备手续，分户调查，则不能知确实数目，既无确实数目，何以造报中外政府，严惩敌寇，责偿损失。至于办理调查之机关，如由七七抗战后各地组成之筹赈会慈善会等，亦甚相宜。其中如因战争解散，回复为难，则由当地侨胞之新成机构，或原有公团如商会者，负责主持，当无不可。查英属马来亚原分十二区，各区原设有筹赈会。现新加坡区经组成调查委员会，推进工作，按一个月内可以竣事，其他十一区因交通不便，未悉情形如何，是否应行变通办理，最好就地解决。兹付去新加坡区调查表格四种，凡未举行诸区，可以参考，并希从速举办，最迟尽本年内调查完毕。统报本总会，以便汇集转行呈报英政府及我祖国政府，依照公意，请求办理，为死者谋伸冤，为生者谋救济，或不至全无希望也。此布。

    新加坡各社团欢迎会于十月廿一日开会，主席总商会长连瀛洲致词毕，余答词言：

       “余乃侨民逃难者一份子，未曾随同诸君在本坡沦陷区内痛受敌寇凌虐之惨苦，内心无限惭愧，奚敢当此盛大之欢迎！无如报纸已将欢迎事情发表，屡辞不获，再却又恐不恭，只得敬谨接受。

       “适才大会主席要余说话，余首先欲言者，为抗战与建国。抗战之起因，乃由于九一八之事变，九一八罪魁为‘土肥原’，继而七七战争，七七之罪魁为‘近卫’。近卫宣言，欲将中国打至屈膝而长为日本之附庸。其最初计划，按出兵十五师团，三个月占领华北各省，此事世界咸知。又继而敌寇南进，其罪魁为‘东条’。自敌寇败降后，联盟国对敌寇严加处置，首重惩治战争祸首，故土肥原、东条，均已捕禁待审，而近卫则逍遥法外，且仍为高官，居尊处优，威势煊赫，不逊平时。虽美英苏等认七七事变，非其战争主要，而我政府对此深仇大敌，竟亦默无一言，殊觉可异。南侨总会拟于近日致电我政府，主张严惩此寇，以谢我国。”（以下如在吧城福建会馆欢送会所言，见上文，不赘。）

 “陈嘉庚先生赐鉴，暴敌投降，公莅星岛，消息传来，万众腾欢。顷由十团体发起庆祝大会，本月十八日举行，贺辞满壁，到者盈门。会上公决，奉电致敬，祝公康强，为国宣力，和平永奠，端赖老成，盼赋归欤，群情所企。海天万里，无任神驰，谨电奉闻，诸维垂察。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公叩，印。”（十一月八日）

附转载十一月十九日《重庆新闻报》：

       “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这是冯玉祥先生为庆祝陈嘉庚先生脱险所作的一首‘丘八诗’，挂在十一月十八日重庆所举行的庆祝会的会堂中，特别为人所欣赏。

       “会场中还挂得有很多人的祝词，包括各方面的人物，譬如说陈立夫和青年团送了些对联，毛泽东也送了一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单条，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说：‘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大会主席是邵力子，到会的人有五百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和海外部副部长赖琏都来了，正如黄炎培所说的，来参加的人都是自己来的，不是被拉来的。

       “邵力子先生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郭沫若被请起来说话，他是代表文协来庆贺陈先生的安全的。‘陈先生是建设的人物，另一方面还有些破坏性的人物存在着，陈先生是坚决地反对有破坏性的人物。’郭先生开始了他的一篇有血有泪的呼吁。‘陈先生是诚实公证的人，能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诚实公正的话。我们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水够深，火够热，我们决不容许再使水加深，再使火加热。陈先生现在是在庆祝个人的安全，同时正在忧虑全国人民的安全呢！我以良心来庆祝他的健康，庆祝全中国人民自己免掉内战的健康！’多少鼓掌，打断了他的话，台上在呼吁，台下也发出吼声。

       “最后柳亚子提议于大会后致陈先生贺电中，加上请他和他的朋友快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以制止内战的意思。台下又发出爆炸似的吼声‘好，好！’但是没有成功。邵力子说贺电中有：‘和平奠定，端赖老成’的字样，不必再加。后来主持筹备的人也不肯，郭沫若、柳亚子、邵力子都离席了，接着一些参加的人都纷纷离席。

       “这次庆祝会中，潘国渠先生提出了两句话：‘南洋一千一百万华侨的心预备供献给祖国，祖国如何来接受他们的心呢？’

       覆庆祝大会电：

       “重庆大学转庆祝大会诸君公鉴。印电敬悉，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新加坡为甚。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竞蒙过爱，集会电祝，愧感无任，谢谢。陈嘉庚沁。”（十一月廿七日）

  余徇总工会所请，敦请本坡各厂家推派代表，于十一月十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座谈会，协商复工办法，同时并请各帮侨领为调解人，莅会协商。发出小启如下：

       “昨日本坡各业工人，联合总工会主席卢君，及代表四人来告，总工会已经成立，且已经过各途工友多次集合，授权各代表与总工会接洽复工问题。故彼等托庚向资方劝促举派代表，共商复工条件，俾得早日复业，双方均蒙利益。庚窃以新加坡虽为出入口转运商埠，然工厂林立，劳工实居多数，尤以我华侨为最。对于阁埠工商营业，民众生活，与及治安繁荣，实有莫大关系。然自战前劳资纠纷，早已无法消弭，扰攘已达极点。基本原因，为劳工非但无总工会可以领导，而各途工友亦乏相当代表负责人。兹者各途工会既产生实权代表，复由各实权代表组成总工会，是则劳工方面，既有具体团结，遇事自有全权代表可与资方接洽。所以彼等特于今日来告是项缘由，并托代向资方促派代表协商复工办法也。此举纯为双方均等利益着想，资方谅必共表同情。庚以社会公利所在，不避僭越，谨订本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假中华总商会，开各途资方代表，及调解员联合座谈会。每途请即推派代表二人至四人，前来赴会。如该途尚未有团体组织，请会集同业商议，酌派出席之人。”

     余著有《住屋与卫生》一册，赠寄国内各省当局，贡献住屋与卫生之意见，并拟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征求团员及书记三十二人观光祖国，到各省府县城，实地考察报告，并由总会发行月刊贡献祖国，促当局注意各点改革事宜，此为中华民族将来健康之大计，民族生存扩展之要务，兹录通启原文于下：

       “径启者，南洋千万华侨素以家乡为重，自民国光复后，热心爱国，进步甚快，逢有灾难，悉力救济，不分省界，以国族为前提。七七事变，同仇敌忾，热烈救亡，捐资助饷，数年如一日。惟寄人篱下，限于自由，故不得不借慈善机关救济会等名词，成立机关，以避阻挠。此不但新加坡为然，全南洋诸筹赈会，亦莫不皆然。兹者抗战告终，各处未汇捐款，必有多少。若仍汇交国府行政院，以助政费，犹如沧海一粟，无丝毫价值可言。如请为某项救济，虽政府能实行，亦不过抵减国库极微之支出，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余为此事再三考虑，若变通办理，存款汇归祖国，用途则择其确可有益民众者。言外汇则绝无差异，言救济则更可实施。不宁唯是，如办有成绩，将来可以继续捐输，再行推广，以期普及全国县市。至所拟办法，为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其简章及任务，另印付阅。盖祖国城市乡村之不合卫生久矣。影响所及，至为重大。战后建设伊始，亟应乘兹计划改革。予已印有《住屋与卫生》小册，邮寄祖国各省市当局，供其参改，并请迅速实行。兹复拟组织此观察团回国调查视察。查新加坡筹赈会存在银行十六万余元，若将此款移作观察团经费，足可支持两年。他处如表同情，日后更可推广。借考察于观光，借调查而促进，我侨任务，唯此为宜。或云祖国方事内战，观察恐生阻碍，应暂迟一步，然此所谓因噎而废食。盖国内虽不幸而发生政争，然军民多明是非，谅不致延长糜烂，阻碍建设之进行，况我侨完全为促进卫生建设起见，绝无党派政治意味，可免过虑。兹付上《住屋与卫生》一本，及观察团规则一通，希予惠览。不日拟传集开会解决此案，特此通告。”

南侨总会通告第五号

“本总会成立于祖国抗战发生之后，组织法与普通会社不同，因常务及诸委员多住外埠，故授主席以特权，如第十四条‘主席主持一切任务及策划应兴应革事宜’，除领导各属会增加外汇金钱外，凡有裨抗战有益国家民族之事项，本主席当尽其职责，庶无负侨胞之委托。兹者，抗战告终，各处筹赈会或慈善会应当结束。然尚有未了之事，则以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调查造报，义不容辞。他如爪哇、安南，兵戈未息，迁延何时，尚不敢知。为此之故，本总会虽欲召集开会，办理结束，亦不可能。且以抗战虽终，建国方始，华侨任务，更形重大。本总会在未结束之前，略尽绵薄，责无旁贷。审时度力，实事求是，认卫生为建国首要，考察有促进效力。华侨贡献任务虽多，易收效果无逾乎是。故倡组‘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以期襄助建设于万一。舍此以外，无其他更有把握者可以提倡。职责虽重，贡献无术。爰拟将筹赈会存款，拨作此项经费。至前汇交政府之用途，确实用于救济者不过十分之一二。盖华侨每年义捐虽达国币一万万余元，救济会长许世英言，中央每年仅限拨救济费，二千万元而已。然华侨义捐之目的，多在襄助战费，故不问政府用途如何。兹者战事告终，剩余微款，似以完全充为慈善建国之费为宜。或云国共政争剧烈，内战难免，恐致交通阻梗。然兄弟阋墙战区有限，与外寇侵略，绝对不同。我侨不宜因噎而废食。设不幸延长扩大，双方必能尊重局外民意；况华侨，为襄助建设而回国，定必更加优待，决无意外之虞也。为卫生观察团事再予说明如上。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侨民大会赞同（转载《南洋商报》十二月十七日）

星华筹赈会于前星期六日下午三时，假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计讨论筹赈会存款十万余元移交南侨总会作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经费事，到会侨团代表及筹赈会委员计二百多人，由陈嘉庚主席。开会时，首由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大意略先追述南侨总会组织宗旨，及和平胜利后，因环境关系，故一时尚难办理结束，而星华筹赈大会亦以抗战后责任未尽，继续为国家社会服务，进行各种工作等由。次即宣布此次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藉他山之名，裨益祖国战后建设上之进步。对卫生之注重与否，与民族之健康，及死亡率之比例，有重大关联，阐明甚详。继称抗战胜利后华侨欲贡献国家，舍此无较适切之道。渠于避难荷属之时即曾慨念及此，且曾周详计划，乃著作《住屋与卫生》，将观察经验，及智力所及，撰述成帙，印刷三千册寄交国内各省当道，请其转致属下市县，以备新兴建设之参考。最后言明回国卫生观察团之组织，业经星华筹赈会委员会赞成通过，兹为移款手续慎重起见，本日特召开侨民大会，请诸君对移筹赈会存款充作南侨总会办理卫生观察团经费，是否赞同予以慎重表决云。主席致词讫，继起发言者有周献瑞、连瀛洲、庄奎章、李竹友、郭珊瑚等君，对主席倡议卫生观察团，原则上均表赞同。惟连瀛洲先生对团员遴选建议重物色技术人才，而庄奎章君则请扩大观察范围，卫生之外，进而考察国内政治、教育、经济、建设诸问题。最后再由主席解释，该会之召集，只在讨论移款问题，请到会代表就此种意义而表决之。结果由李竹友君正式提议，将星华筹赈会存款移给南侨总会作为组织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费用，多数举手赞成通过，遂告散会。

南侨筹赈总会，拟编辑及印行《大战与南侨》一书，由余发出总会通告第三号征求稿件，文云，“自七七抗战以来，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捐资助饷，不遗余力，其经过情形，余已记于《南侨回忆录》数月后可以出版，俾今后人知我南侨拥护祖国抗战之实况。其后敌人南进，造成世界大战，既据越暹，复陷英美荷各属，使我华侨无量数之生命财产，均在其淫威掌握之中，俘捕刑杀，奸淫劫夺，牛马奴隶，任所欲为，损失之大，难以数计。兹者大战告终，胜利已达。此后中外各国战史，必多记述。然各国各有立场，编述各有所重，欲求其详载我华侨之惨遇与牺牲，永为后人观感之资者，料不可得。纵吾侨另有私人记载，恐亦囿于见闻，一地之情况尚恐未周，况全南洋地域广大，网罗更为不易。本总会有鉴于是，爰拟集合此项记载，编辑成书，名曰《大战与南侨》。特在南洋各埠登报，广求爱国侨贤，将前后见闻，确属事实，堪留传记以为信史者，撰成文章，寄交本总会。征文内容：计分（甲）军事（乙）贪污（丙）刑杀（丁）奸淫（戊）奸贼（己）损失（庚）政治诸项。”

**南侨总会通告第四号**

       自日寇七七启衅至南进为止，我侨对祖国筹赈救亡工作，余已详述于《南侨回忆录》。迨日寇南进后，南洋各属沦陷，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大战告终，我侨遭难经过，不应无所记载。本总会爰拟集合此项文字，编成一册，名曰《大战与南侨》特登报广求爱国侨贤，将前后见闻事实，堪留信史者，撰文惠交本总会。征文内容，分军事、刑杀、贪污、奸淫、奸贼、损失、政治七项。详述地方一切或一二项情形均可。详细说明，另印散张寄存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分会、苏门答腊中华商会。要者请向贵处机关索取，或来函索寄。至截止期，马来亚限至本年终，苏门答腊限至明年一月终，此布。

  余鉴于英军接收后，华校复办者寥寥，众多儿童，失学流荡，民族文化，前途可忧。爰倡议筹募教育经费，择地开创学校。经派人与大世界娱乐场商定于明年阴历元月十六十七两夜举行游艺会，以资筹款。十二月十五晚召集福建会馆本届执监委员会商讨办法。余报告此次筹募目的在开创新学校，非为供应原有三校。本会馆办学，一向注意普及，所收学童，不分省籍。例如道南学校，本季所收学生，闽籍以外者，即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故此次在大世界游艺筹款，亦望全侨各界，能予尽量赞助。至于此项筹款，亦非经常所有，不似以前筹赈时代，各世界娱乐场每间数月即举行一次。所以尤望侨界有资财而热心兴学者，视此为荣誉之捐款，踊跃解囊云。旋即进行讨论办法，决定组织委员会负责办理，名称定为“福建会馆筹募教育经费大世界游艺委员会”。越数日举行职员联席会议，余之致词录印如下：

——金钱如肥料撒播才有用——

       “本会馆自多年前，已鉴于本坡侨胞日众，儿童失学日多，而各帮创办诸小学校，大都囿于市中，校舍狭小，每校仅能容学生数百名，后虽复设分校，亦限于局部少数生额而已。至于失学儿童，每年有增无减，约略计之，非仅数千，或且近万。为此之故，拟作一具体计划，于市区近旁择相当地点，至少有若干英亩，建筑学村，收容学生可万名。而本会馆所辖塚地，最适宜者，莫如恒山亭及新恒山亭等处。屡向政府要求，自行备费迁塚以作校址（当时地契只限作塚地），交涉许久，不蒙许可。乃转求政府安祥山空地，蒙提学司等努力襄助，以为目的可达，聘绘图师设计，复延多年，终被拒绝。不得已拟将羔丕山坟塚余地建筑，呈请政府批准（该地原系先侨献作塚地），亦不可得。前后十余年，所有计划，均成泡影。兹者本会馆既无其他余地，若复要求政府供给，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为此之故，唯有出资购买，方能有效。然欲达此目的，必须筹有相当巨款。按如买地作十万元，每年建平屋式之校舍，容纳五十班，每班平均建筑费三千元，预筹两年建筑费三十万元，设备费十万元，合计须五十万元，可收容学生一百班四千名。两年之后，再作打算。或云本坡民主政治将实现，咨询会屡向政府建议实施平民教育，如有实行，毋须我之代庖。然此种见解，恐未明了殖民地之根本立场。设政府能采纳此项建议，亦必首重英校。若我华校至多每年每一学生加贴些少校费而已。至于为我侨胞计划经营校舍，普及教育，谈何容易？本会馆此次借大世界开游艺会筹款，目的在实现上言计划。自敌寇南侵后，迄今四年，义捐久停，仅此复见。窃度此后两年间，必无再事义捐巨款之机会。本会馆鉴于侨教扩大之必需，不得不负责作大规模之提倡。且以同属侨胞，有教无类，更无地域意见，省籍区别。如道南学校本届学生，福帮五百卅人，广帮二百廿四人，潮帮二百零四人，琼帮一百八十二人，客帮九十六人，三江帮七人，共一千二百四十三人，其中福帮学生只占四成而已。此次筹款扩充教育仍抱此旨。西哲亦有言‘金钱如肥料，撒播方有用’况祖国抗战告终，建国方始，教育重大，尽人都知，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愿我殷实侨胞明白此义，格外解囊，其他各界多买入场券，慷慨玉成，并望各募捐员及干事售票员，与各界负责诸君，踊跃努力共成义举。前者敌寇入境，余公司厂内所存橡胶二万余担，被抢一空，仅存厂小部分而已，然天职所在不敢推诿，愿买名誉券一张，银一万元，以资提倡。中华民国卅五年一月七日。”

余由爪哇回星之日，顾爱诸君出示印就简章，言为促进华侨团结起见，拟组织马来亚华侨总公会，经小组筹备会议，尚未完满，适闻余平安至吧城，乃暂搁置，待余取决云云。余以兹事体大，自度才力不能办到，谨辞不敢参加。其后本坡外坡屡次函促，咸认团结为战后华侨最重要任务。然余再三考虑，仍无把握，故不敢造次。近日各报屡有专论，又蒙顾爱诸君惠临见教，无非促余领导团结，关心之切，错爱之深，可敬可感，余非木石，敢置度外？惟念把握毫无，故尔再四踌躇。然而长此缄默，亦恐不知者误以余为消极独善，置侨胞公益于不顾，故亦略抒鄙见。夫团结二字岂易言哉！姑无论南洋及全马之广，只就本坡而言，能否团结，未敢肯定。盖所谓团结，空言无补，必当有事实之表现。先语其最明显，最易行者，如各帮学校应统一办理，各帮大小会馆及无数同宗会，亦须减少合并。此两事如能解决，方可进及其他。兹略举此两事之具体办法如下：

**一 教育统一**

       设星洲华侨教育会，总办全坡华侨教育，统筹全坡华侨教育费（各帮公举若干董事参加管理），设立师范学校，高中初中若干校，高小学校若干所，国民学校若干所，均分配于适当地点。各帮所有校舍概归教育会管理，其他产业基金不在此内。各帮学校基金，丰啬悬殊，以后应一律公平办理。按每学期每一学生须补助校费若干，由该帮会馆负责，按该帮学生额筹补。每学期招考男女学生，以程度高下依序收纳，多设贫生免费名额，依一定规则公平办理。

**二 裁并会馆及同宗会**

       每帮各留存会馆一所，如福建会馆、广州会馆、潮州会馆、琼州会馆、客属会馆、三江会馆。至于一府一县之会馆，可合并于以上之大会馆。同宗会取消，所取消各会馆及同宗会等之屋业，概归教育会管理。除作校舍外，余可收租，以补校费。其他产业不在其内，亦可自动捐于教育会。按本坡各会馆及同宗会，至少有七八十所，如以三分之一作校舍，每校按收学生百余人，计可容四千余人，余者每所收月租按七八十元，每月可收租金三四千元。我华侨各会馆及同宗会之多，系由于昔时封建时代之陋习。以前提倡者每美其名曰联络感情，促进团结，究实每多相反。若言办事，则终日无事可办，徒花无谓用费，空置堂皇会所。我侨果能觉悟团结，必先合小群为大群，化无用为有用，否则未免徒托空言耳。

       以上两事，不过我侨团结之第一步而已。然只就福帮而言，无论谁人开口，必遭碰壁。唯此系余个人之蠡测，或者广潮琼客三江等帮，其学校会馆及同宗会，不似福帮之杂，且较有团结之热诚，亦未可知。希望提倡团结诸君，请向各帮诸机关试探如何。若能一致，则福帮或不至于自外。果能如是，余敢不附骥于诸君之后也。

 敌寇占领马来亚三年半，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地政府未有挨户切实调查，虽市民咨询局曾招人民往报，余恐不识英文者及市外较远人家，定难往报，家无余人者更无从报。况所报只人命而不及财产，亦有不足。故余在筹赈会结束之前，组织市内及市外调查委员会，印备调查表，沿户分送，限日收回，汇集统计。至新加坡以外十一区，则由南侨总会通告各区筹赈会仿新加坡办法或酌衷办理。迄兹数月只有新加坡及柔佛南界一部分已获结果，兹附列于左。

新加坡市区内被害人数二千四百九十三名。

又市外被害人数一千七百九十五名，然尚有一部分未报，因多在偏僻地方，大约至多不上一千名，共计约二千数百名。

市区内外二条合计约五千名。

又受非人道酷刑者三百九十三名。

财产损失个人方面，叻币一千一百七十八万一千四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四千六百九十四万八千元。

又商店方面，叻币共五千五百八十三万六千八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二千三百八十七万四千元。

合计叻币六千七百六十一万八千二百元，日军用票二亿七千零八十二万二千元。

       但关于人命损失，绝不止此数。据政府咨询局报告，失踪及死亡者三千余人。合计之亦不过七八千人，与前所传数万人相差甚巨。虽前者系属风闻，然调查未周，或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被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故遗漏自所不免。至财产损失，亦有以为赔偿无望，而军票已成废纸，不肯费手续填报者亦属不少也。

       又据咨询局报告，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大检证”之役，全坡失踪者二千七百廿二名，该局负责人称必不止此数，而望市民复往投报，盖定有不欲报，及乏人可往报，以及不知往报者，当然不少也。

       至当时被检去之人，据确实可靠消息，概被敌寇残杀，有林崇鹤君之子失踪，要求台人黄堆金（为敌走狗最有势力者）代为寻觅，据言“无希望，昨天亚历山大地方，枪毙六七百人，巴实班让亦枪毙三四百人云”。亚洲保险公司经理李亮琪君，被敌拿去，其汽车为敌军官取用，其车夫爪哇人仍为服务，言亲见被检去之人，每日上午运四货车，下午亦四货车，每车约五六十人，在丹戎百葛海边枪毙落海，如有浮水而未死泅近岸边者，再用铁枪刺杀，计三天约杀死千余人。伊所驶汽车，即敌寇监刑者所用。然惨杀之次日，伊恐惧过甚，几不能司机，敌人乃命将汽车停歇于廿二号货仓，其他如运往加东及淡申律枪毙者，亦有人见之。至柔佛，仅柔南一部分华侨仅数万人，而调查所得，被杀者即有三千二百九十九人。

 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创自民廿六年八月十五日，迄今八年余。兹者敌寇投降，战事告终，调查本坡侨胞损失亦已告竣，尚存余款拨交南侨总会，作回国卫生观察团经费。余乃于本月三日召集委员开会，报告调查损失数目，并讨论建碑事项。盖此次祖国抗战，及世界大战，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亦从来所仅见，本坡为南洋最重要及繁盛区域遭遇损失亦最大，故须择地建一堂皇之永久纪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后代之侨胞，故余有此提议。结果全体赞成授权于余向政府请地，并订至本年三月终将筹赈会结束，另组织建碑委员会。

  此次世界空前未有之大战，皆由于侵略主义国家贪欲无厌之结果。近世以来战争频临，无数十年得和平宁息，忧时之士，力图弭兵良策，在海牙设立国际和平会，然不免于前次世界之大战。战后设立国际联盟会于日内瓦，冀可久息干戈，长享太平之幸福，乃不廿年，东西侵略国又相继异动，遂造成此次世界空前大惨剧。今者大战告终，联军胜利国领袖，定必亟反前非，以道义为根本，认侵略为罪恶，究祸水之来源，消火线于净尽，移其独忠于国之心，扩而兼忠于世界，如此则长期之弭兵可达，人类之幸福无穷，而俄美英三领袖，丰功伟烈，堪称空前绝后，流芳千古矣。诸领袖果欲达此目的，则就东亚而言，法属安南殖民地，应归还中国，或为中国之自治领，最低限度亦当使之独立，其他香港澳门等小部分之地，更无问题。至安南关系东亚和平之重大，谨将其理由胪列于左：

（一）安南一地，自秦始皇时代，已属我国领土，置吏治理，再后历朝二千余年，大半为中国地，较其他附属诸国，如朝鲜、暹罗、缅甸等，一时入贡者不同，不能引以为例也。

（二）安南人民，与中国古时闽浙两粤（粤即越）之人民同属越族，而闽浙两粤之越人即为构成汉族之一要素，故安南人与中国人为同种。且安南之文化亦属于中国系统，即在今日经法国统治数十年之后，犹不能改变其素质，语言极相类，中国文字犹存在，其衣冠犹保存明代以前之大汉古制，较之国内三百年来之改从满制为尤胜，其他风俗习惯亦多相同。故从民族及文化言之，安南与中国亦最为密切也。

（三）安南与法国无论在历史上、民族上、文化上、地理上，均为风马牛不相及，绝无丝毫理由可以为继续占领之借口。

（四）法国人口仅四千万，在欧洲已占有优美国土五十五万方公里，平均每方公里仅七十三人，德国人口六千六百万，国土四十六万方公里，平均每方公里一百四十余人。德国无殖民地，法国不但本国住民宽松，尚有国外殖民地比本国加至二十三倍，计一千二百余万方公里。若安南仅七十一万方公里，不过十余分之一，法国减此小部分，实无关乎国计民生。

（五）此次发生世界大战之惨祸，法国亦难辞其咎。当“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时，“日内瓦”国际联盟会执牛耳者，系法英二国。若履行誓约，加以制裁，亦可警诫德意之效尤。法国政府不但袖手失职，其各机关日报更大吹特吹，都用特大号字登于第一版，不啻同意日本之侵略。迨后欧战发生，德国攻法不上五十日，全国瓦解投降，俄与美本非其盟邦，若非此二国及英国之力，则法国至今尚在亡国之际。欧洲本土尚不能保，更何有于远隔之殖民地？今国土恢复，应当深感联军之再造，尚敢重占昔年侵夺我国之领土，欲为世界和平之阻碍乎？

（六）俄美英三国领袖既以爱国之道义，推广兼爱世界，必须深谋远虑，铲除将来战争之祸根，乃能达到长期和平之目的，其千绪万端非吾人可能道其万一，惟据我人所知者，则安南必须归还中国，此为拔除祸根之一法，如或不然，试问安南人是否情愿复受以前不平等之统治，而中国民族岂肯长期放弃其弱小兄弟乎？

总而言之，安南与中国万万不得割离，其密切关系既如上述。欧洲列强前昔之侵略主义，今须觉悟改善，世界和平乃能持久，俄美英领袖大功亦克告达，此实天经地义必然之至理。余为此语，不专为安南与中国而设，亦为保持世界长期和平而言也。

**附列 中国与安南在历史上之关系**

       安南人既与中国人为同族，自然从古即有关系，周初越裳氏即来朝贡，见于载籍，自秦以来，关系更为密切，摘录历史记载如下：

       汉高祖乙巳十一年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赵佗（河北真定人）为“南越王”。初秦南海尉赵佗，乘秦乱聚兵诛秦吏，击并桂林（广西）、象郡（今安南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至是诏立以为南越王，使陆贾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贾至说佗令称臣，奉汉约归报，帝大悦拜贾为大中大夫。

       高后吕氏戊午五年南越王赵佗反，庚申七年遣将军周灶将兵讨南越，会暑湿大疫回军。

       孝文帝壬戊元年遣大中大夫陆贾使南越，南越王佗称臣奉贡，孝武帝已巳五年（纪元前一一九年）。南越相吕嘉杀使者发兵反，秋遣将军路博德将兵讨南越。庚午六年路博德平南越以“交趾、九真、日南” （今安南国）置为三郡。

       东汉光武帝十六年交趾（今安南国）女子征侧征贰反。

       十七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交趾，十八年春，马援与征侧征贰战，大破平之。

       梁武帝壬戌大同八年交州（今安南国）李贲反，梁主遣交州刺史武林侯谘，与高州刺史孙同 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讨之。

       梁戊辰太清二年交州司马陈霸先，讨李贲，平之。

       唐太宗戊子二年遣卢祖尚镇抚交趾（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癸卯十七年贬杜正伦为交州都督（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高宗丁巳二年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今安南国清化府爱州）。

       又高宗辛未二年王勃父为交趾令（今安南国国交趾）。

       周武氏壬辰九年流御史严善思于欢州（今安南国人安府欢州）。

       唐玄宗壬戌十年秋安南乱遣内史杨思勖讨平之。

       宋太宗辛巳六年田锡请罢交州屯兵（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仁宗皇祐元年广源州蛮侬智高反（今安南国谅山府广源州）。

       又仁宗皇祐五年正月，狄青大败依智高，讨平之。

       又神宗乙卯八年交趾反，丙辰九年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败交趾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又理宗壬戌三年封陈光昺为安南王。

       明永乐戌四年秋七月击新城侯张辅率师讨安南（安南王陈日焜为其下所弑）。

       又丁亥五年五月，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十、户三百二十万，设布政司于交趾。

       又丙申十四年命丰城侯李彬镇交耻（今安南国）。

       清康熙五年封黎维喜为安南王。

       乾隆五十一年安南乱，遣粤督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讨平之。

       诏封黎维祁为安南王。

       又五十五年因黎维祁失位，阮光平入朝赐冠带，封为安南王。

       嘉庆七年封阮文惠为安南王。

       光绪九年法国兵侵入安南，清政府遣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树声、提督冯子材，统大军入安南，击败法国兵，而法国乃派东洋舰队来攻台湾入闽江，击败清海军，并陷宁波，于是英使巴夏里出为调停，割安南与法国，此为光绪十一年，即一八八五年之事也。

附录 百年来我国领土及主权之丧失

一八四二年林则徐在广东烧英商鸦片，英军来攻各海口。

一八四三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及赔款与英国。

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陷大沽，复在天津立条约，赔款并准许领事裁判权。

一八五九年英法又陷北京，订立北京条约，赔款及割地，是年俄国因调处之功，迫清朝立瑷珲条约，割黑龙江以北边区境地。

一八六〇年俄又因调停英法事，复迫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一八八五年法国侵占安南。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割台湾及赔款。

一八九七年德国籍山东曹州教士案，占胶州湾及山东铁路权，并许可开采各矿产。

一八九八年法国占广州湾，并订两广、云南三省优先权及铁路权，英占威海卫及九龙半岛。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北京，除惨杀、奸淫、抢劫外，复赔款母利十四万万元，订三十九年逐年交还母利。

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东三省，自日本未占领以前，在帝俄时代，列强各划定范围，俄定长城以北，英定长江流域，法两广及云南，德山东，日福建。

一九四五年我国与美、英、苏四国联军打败日本，称为“大战胜利”收复台湾及东三省，然因国内政争，竞失去外蒙古全部，及旅顺、大连主权。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八号**

       径启者：本总会曾为南洋华侨于祖国抗战期中所组织，虽出侨民建议，亦我国民政府所命令，其任务为出钱出力以救国。成立以后，黾勉从事，出力虽远逊祖国，出钱则有过无不及。至于救国之目标，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不平等条约取消，人民得自由幸福，达到总理临终之遗嘱也。

       抗战时最重要之牺牲，为人命与金钱。我华侨资助祖国，不但义捐而已，其他私人汇款，亦为战时军政费所利赖之资源。然所寄血汗巨资，今日已同乌有。至于日寇南侵后，华侨人命牺牲之惨重，亦由抗战爱国而致。如各处侨领全家遭害者难以数计，较之祖国贪污官吏金钱逃存外国，家属安居内地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然华侨为救国而牺牲金钱与生命，若能达到救国之目的，固无所悔恨。今者敌寇已失败，胜利已属我，然而华侨牺牲救国之目的，是否果已达到耶？本总会为爱国天责起见，不能缄默无言，谨举所见如下：

       鸦片战争，失去香港；中法之役，失去安南；甲午之败，失去台湾；三败之辱，失地八十万方公里。今日战胜收复台湾，仅数万方公里，而反失去外蒙百万方公里及旅顺大连主权。互相比较，战胜与战败如何分别？

       菲律宾之预备独立，出于宗主国特别美意，然军权、外交仍不轻放弃。印度之要求独立，为统治国不平等待遇，与我国各民族平等共和政治，大相悬殊。且凡属土要求独立，系自动对母国而发，绝未有邻邦为之代庖，有之，惟野心国日本，要求朝鲜独立而已。

       外蒙古土地，大过两江闽粤四省，为我国西北藩篱，与内蒙、满洲有唇齿关系，旅顺大连则为满洲门户。兹者藩篱已撤，唇亡齿寒，门户为强邻占据，东省内部，何能长保安全？虽以国弱乏力抵御，然如不承认，尚有国际机构，可以投诉。目的纵未能达，久后终有收回之日。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是则为国贼也。

       近日出版《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云：“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撤除。”今乃自相矛盾，竞因内部政争，将外蒙旅大全部甘心割弃，冒历史上所未有之大不韪。

       甲午战败仅失台湾数万方公里，今日战胜竞失去外蒙旅大加至十余倍之多。呜呼！战胜乎？战败乎？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之一身，拔一毛而知痛，何况去其股肱哉！

       今日挽救之法，只有全国民众一致声明否认，指斥其非法授受，违背三民主义，破坏五族立国，对内则实践政归民主，奋志图强，庶可取消伪约，保全国土，方有胜利可言。本总会追念华侨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坚持达到抗战救国之目的，特此通告声明，永不承认中苏非法之条约及外蒙之割弃，此布。

中华民国卅五年二月廿一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余居南洋新加坡五十余年。初到时市政局已规定生死登记，对市民卫生甚为注意，如自来水、防疫、除蚊、清洁、屠宰管理，均已有设备；每月派人视察市民屋内是否清洁；公共沟渠街道垃圾逐日清扫，运往市外销毁。此在现今我国诸城市，多尚未有也。而每年市民死亡率，平均每千人死廿四五人；疫病虽常发生，然迅速消灭，不至蔓延。以上所言，尚系一九二一年，即我民国十年以前之事。从彼时起，市政更大改革，将全市通盘计划，凡不合卫生之住屋，逐渐改建。至近年新加坡未失陷时，市民死亡率，每千人仅十五人，比较二十年前减少十分之四，而疫病亦已罕有，此盖为改善住屋适合卫生之效果也。闻之卫生之根本有三项：空气、日光，与清洁；其他次要者虽多，较易解决。余前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经十余省，所历城市乡村以千数，见其街衢及乡村屋宅之卫生状况，比较新加坡二十年前尚远为不及。市区街屋，虽略有改造，街路仍狭，店屋只整饬门面而已；至于乡村屋宅，建筑更多不善，又乏窗牖，有之亦甚小，且常关闭，有等于无。其他厕所、沟渠、垃圾，更形污秽。我国人民生死无登记。若其有之，每年死亡率，当更多于新加坡市政未改善时也。

       余自离延安及抵金华，沿途见诸繁盛城市，被敌机烧炸惨重，有化为平地者。每逢开会，余必报告新加坡廿年来改善住屋，有益卫生诸事实，且言日后重建，应当取法，不可仍前由业主任意自建。并呈函蒋委员长，请下令被炸城市，“今后重建须合卫生，俾可转祸为福”。虽蒙覆电嘉纳，恐亦徒有具文耳。兹者大战告终，交战各国，破坏之后，重新建筑，势必益求最近代化，以适合卫生。我国政府自来放任，人民亦不注意公共卫生，损害健康，促短寿命，莫此为甚。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无谓外债免还，所有战时借款及其他债务，自有敌人赔款抵偿而有余；加以人力物力之丰富，海外华侨汇款之巨额：若有民主的良好政府，则交通发达，工业勃兴，城市繁荣，乡村发展，皆指顾间事；而改善住屋促进卫生之举，当然不致忽略。凡全国各城市，不论被炸与否，均应预为全盘计划。至于乡村亦当从易于办到者着手改善。谨将所见所闻，贡献于政府社会以资参考。

       我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城市大小数千处，然除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外，其他开发尚未达十分之二三。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必多兴革，力求进步，而尤以卫生为最注重。我老大不振之中国，关于维新兴革诸事业，应比他国更多且更紧要。维新之道，莫重于卫生，人民身体之强弱，寿命之长短，与国家之兴衰，极有密切之关系也。

       新加坡市区，在民十年以前，住民不及五十万人，华侨约占三分之二，余为印度人及土人，欧美人甚少。每年死亡者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千人死廿四五人。及至近年间即民卅年顷，住民增至七十五万人。每年死亡者仅一万一千余人，平均每千人中死者不及十五人，比较廿年前减死四成之多。其原因大半为改善住屋适合卫生之效果也。

       新加坡在民国十年以前，诸旧式屋宅，多尽地建筑，无论屋身长若干尺，均不留空地。屋后多相接，不但无巷路，甚至乏窗户。屋内虽有天井，然或太狭小，或用光瓦遮盖。房间既多，窗牖寡小，空气日光不能通达。沟渠既长，清扫困难。据卫生家言，水、空气、日光，为生命上最重要之三元素。空气少到，氧气自减。屋内无日光，则细菌及害虫发生益盛。水不但有关饮食，于洗澡及清洁亦甚重要。

       新加坡自民国十年起，将全市计划改革，规定某街若干呎阔，后巷亦若干呎阔（至少八九呎）。某处作政府及公共机关，某处作公园、运动场、游憩所，某区建工厂及货仓，其他商店住宅亦各有规定区域。至市内店屋、住宅地址，限长八十英尺，至多一百英尺。若前已建旧式屋宅，凡过限者概须拆卸。剩余空地，不得复建小屋，均由市政局管辖，改作儿童游戏运动场，或草地花园等。

       规定新式建筑法，不论商店住宅，如地址八十呎，屋身只可建三分之二（地址不足亦然），即五十三呎，前后两房均须开窗；尚剩屋身后二十七呎，以一半建厨房、浴室，厕所等小屋，余一半作露天空地，不许用任何物遮盖。如地址长一百呎，屋身准建七十五呎，然中间须留天井十方尺，不得遮盖；如作三间房，各房均须开窗；尚余空地二十五呎，照上言以半数建诸小屋，半数作露天空地。违者拆卸并加科罚。无论建大小屋，或更动修理，均须先绘图呈市政局批准，开工时由市局派员勘定基址，方得兴工。至公寓别墅工人宿舍其他建筑物等，则另行计划，总以适合卫生为标准，沟渠概造明式，易于清洗。污水从后巷路流出，水沟既短，自免积滞。

       楼上下各房间，每房至少须开窗一个，每窗至小高四呎阔三呎。窗上墙壁或他处，须再开通风洞数个，方圆或扁形均可，每个约若干寸，不能容人出入；此系备夜间窗户均闭时空气不致隔绝；若雨季怕冷不耐，则可用物塞之。至窗门日夜须洞开，不可常闭。总而言之，全屋不论厅房，必须有相当窗户，可多不可少；使日光易于照临，空气易于流通。

       屋内逐日所有垃圾，扫置桶中（桶由市政局列号供给），每早置于门口，市政局派役运往销毁。厕所如非阴厕（近发明阴厕，积粪自能融化入土，可十余年不须清除），市政局供给粪桶，每早派役换取并代洗扫，用户逐月缴还市政局役费。市内不许饲养家畜，须在市外设棚畜养，并须领有市政局许可执照。街路边卖食物亦严禁，须移往屋内。

       市政未改革以前，所建不卫生诸旧屋，有长至百余呎以至二百呎者，此种屋不论屋后彼此有无相接，均须依新定图式改造。凡屋身过长逾限者概须拆卸，除留后巷（约八九呎至十余呎）外，余地概作公共游息场，或花园草地，然以全市之大，非短时间可能办到，第分别较有关系者，先后办理，以及每逢修理或火灾时，均须依照新图式改造，十余年间咸已毕改。且初时旧屋虽未遽改，而屋内天井遮盖，亦即严令拆卸。

       自市政总计划颁布后，各处前街后巷均照规定改阔；横直有序，整齐美观，逢有火灾，容易消灭。然美中阔近百呎，即旧屋诸街无论如何扩大，阔度尚感不足，直街不过六七十呎；横街三四十呎而已。不若新市区直街阔近百呎，两边兼有人行道，并栽种佳树，横街阔五六十呎，各屋宅门前酌留空地，或围短墙栽种花草，令人见之悦目开怀，似有园林之胜，精神为之爽快。居民既安，健康少病，医药、迷信、保险等费终年省却不少。市区日益繁盛，业主亦因之而收桑榆之利。

       欧美十年前，城市住屋已经改善者，其死亡率，英国伦敦每年每千人死十四人，法国巴黎每千人死十三人，德国柏林每千人死十一人，美国纽约每千人死十六人，芝加哥每千人死十五人，西雅图（系新开埠仅数十年）每千人死九人。尚有未改善之纽奥伦，每千人死廿一人。伦敦市亦有贫民区，人口十余万，住屋未改善；据医官统计报告，死亡率每年每千人中死廿余人至卅人左右；婴孩死亡率更大，即能成人，身体亦少康强。我国各城市住民，生死无登记，设有之，其死亡率之多，必可惊叹也。

       我国人住屋不卫生，以乡村为尤甚。盖自来建屋，原不注意空气与日光之需要；习惯又多畏风，故屋宅大都户小窗乏；不但空气不足，日光更难到达；厕池到处多有，沟渠不清，垃圾积滞；水井无栏，或距离厕所仅数十步；各种弊端为甚烈。然屋宅改善，大非易事，若从简便着手，可多开窗户，使空气日光能通达，厕池尽量缩减，并改良筑造，令蚊虫不生，沟渠垃圾委工人负责按日清毁；水井筑栏，且须距离厕池有百步之远；他如湿地池塘蚊虫易生，或填塞，或开沟以通流水。如此则卫生基本已立，收效定属不少，而费钱无多，任何穷乡贫户都能办到。然清扫屋舍之事我国人常专责妇女，男子多不闻问；欧美人则不然，屋内外男子亦共同负责指导或帮助之。我人对改善卫生事，果欲提倡实行，男子更不可不努力也。

       十余年前，欧洲卫生家研究世界人类寿命长短，以人数最多之三区域民族比较，即欧洲、中国、印度各区人寿平均，欧洲人每人五十四五岁，中国人每人卅九四十岁，印度人每人廿八九岁。然此为十余年前之事，据后来欧美医学研究会，断定将来不久，欧美人平均可达七十岁，足见其卫生科学日臻进步。印度人寿命之短促，虽因早婚之害，我国亦有早婚，第不如印人之甚，其实重要原因在乎住屋不卫生居多。或云食物滋养料亦有差别，中印人主要食物，远逊欧美人。此语似是实非，如新加坡市民自来食米，何以前后廿年间，死亡率相差许多。若以欧美人多食肉类，我国青海省人三餐以羊肉作饭，何以不能如欧美人之长寿。或云自来水亦有关系，然新加坡自七十年前已有之，绝非改良市政而始设，水固重要，然非仅由水一项也。

       人自出生，艰难培养以至成人，须廿多年。若论其能振作事业，普通人当在卅岁以上，再加以阅历经验，亦须有相当年纪。虽或天资出类，才干超群，如此次大战俄美英三领袖年俱六七十岁，亦须四十余岁甫始知名，复过多年经验阅历，方能轰轰烈烈，造福民族，闻名世界。推而至于模范乡党领导社会，服务政府之人，亦何尝不然？可见国民身体强弱，寿命长短与国家最有密切关系。若我国人之弱质，年未五十，老气横秋，安得不事事落后也。

       前年德国柏林，举行国际运动会，为全世界所注意，我国为此事，曾费去廿万元巨款，集诸有名运动家，第一次演身手于国际体育比赛之舞台，在我国历史上亦一件可纪念之事。然其结果乃饱吃鸭蛋而归，考其原因，各种比赛非由技艺不精，实因体力不足，故致全归失败。国民体格之健全，要在平时有素养得来，非短少时间之训练所能速成。故对卫生根本问题，必须彻底改革，不但体力可以增强，而长寿当然亦可期矣。闻苏联鼓励青年培养强健身体，检查合格者给以奖章，亦有见于人民健康之重要也。

       据外国科学家研究我国土地与人民，谓自北方沙漠至南方热带，土地肥沃美丽，不论上下级社会男女都有强壮骨骼，天赋独厚，体格优美，活泼聪明，勤奋耐劳，所差者无良善政府与社会之负责领导，致事业不振疾病丛生，而蒙病夫之讥诮云云。前年江西熊主席告余，本省自七八十年前，已有人民二千五百万人，自太平天国乱后，降至现在仅存一千六百余万人。其锐减原因，在于疫疾时发，死亡相继，而数十年来，疟疾为尤烈，遍处多有。言间不胜唏嘘。余答以此种惨况，他省亦多有，或以江南等省为甚，所见人民多面无血色，尪弱可悯，此莫非起居不合卫生之害也。

       健身之术，运动洗澡亦有关系。余少时未受新教育，对体育绝不注意，迫年逾六十，身体常觉困顿。由是每早（约黎明五点钟后）在床上运动（展转数十次稍稍用力），起后续行普通运动，计床上下运动约十余分钟。洗澡廿余分钟，用毛巾擦全身数次，温冷水随意。是后无日间断，自觉补救不少，于今十余年裨益实多，若少年能知行此，其健康定胜于今。寒季人多怕冷，怠于起床，若在床上运动，则寒气减而热气生，洗身后精神益清爽，不怕寒冷矣。如能出门行数千步，并行深呼吸一二分钟，既可吸新鲜空气，亦可运动内部，更为有益也。

       药物与卫生亦甚有关系，余非医生不敢妄谈，惟推荐身所经验之一种于此，此药即“五香丸”。余自四十余岁染胃疾，延及盲肠，中西名医诊治无效，乃阅《验方新编》得之于内外备用诸方，据载“此方善能消食、消积、消痞、消痰、消气、消滞、消肿、消血、消痢、消虫、消隔、消胀、消闷、消痛。药料平常，功效甚大，每服一钱，姜汤送下，早晚一服，其效如神。其方为五灵脂八两，香附子八两去净毛，水浸一日，黑丑一两，白丑一两，共研细末，半以微火炒熟，半生用，和匀醋为丸，如萝葡子大”。余照方采服，立见功效，据所言可消治十四种，若以余及朋友经验数十年，尚不止此。凡胃腹疾痛，服之多效，盖疾病多因胃肠积滞而起，无论何病，若感觉胃腹不快，服之屡效。又晕船晕车，胃苦欲呕，服之立可消化，晕吐俱免。遇病服药，最患在无效而反有害，若此方则绝对无害，余因论及乡村住屋卫生，故并载以告同胞；亦因医少病多，乡村为甚，若备此药，费款无几，自救兼可救人也。

       全世界各事业，最落后者莫如我国，此事尽人都知；然此后建设最多者亦为我国，此亦时势必然。就交通言，各省县都市乡村间铁路网之敷设，虽未能于数年内普及；然若有民主良善政府，积极进行，各重要干路不难完成，其他支路虽迟亦属不远。若无铁路，亦必有电车路，以利便城市与乡村。此非神经过敏之理想，欧美诸国及印度南洋已行之久矣。至于汽车路我国现下各省虽可交通，而各县市及乡村间尚付阙如，然此项较易办到，不久以后不但可望普及，即乡村内小车路，亦可望到处多有，唯西北西南边境，如外蒙新疆西藏各种道路之建设，或须稍迟一步。至与南洋方面之交通，则云南汽车路已通缅甸，铁路亦将完成；广西铁路及汽车路已达安南，经暹罗而至马来亚矣。他如国际公路及铁路，至少有三条干路可通欧洲：东北西伯利亚铁路虽通，汽车路尚未；西南由云南至印度，汽车路已通，而铁路尚未，将来更可由印度而达土耳其。至西方中路，则由新疆经中亚细亚而达莫斯科。此三条国际之大干路，无论铁路、汽车路，不久必能实现。我国战后交通空前大发展，必能促进将来各城市之繁荣；城市愈繁荣，则其住屋问题更不可不讲也。

       英美人民不及我国半数，而英京伦敦，美国纽约，市民各八百余万人，又芝加哥市百年前仅有一千人，现今增至三百余万人，我国百数十年后，交通中心各城市，其繁盛如伦敦纽约者，必有多处，如芝加哥者定亦不少。至于县城小镇，偏僻市区，将来交通发达，工业兴盛，繁荣随臻，数万人或数十万人聚居之象，可以到处都有。试思前此蒸汽电力发明未备，欧美城市即能如此发展，现下已大不同，繁荣之可以速臻，毋须多赘。故宜乘兹放大眼光，将全国各城市筹备测划，预定市图，街路须横直整齐，前街后巷，阔度相当。目前先建筑二层三层楼屋，后来可以改建十层八层高楼。至公共应用地方，如政府机关、菜市、民众教育机关、运动场、游艺场、公园等等，须精密预计。若较广大城市，并加人行道及种树。工厂住宅须分区。欧美凡已改善市区，屋宅占市地面积至多半数，余者即是街路、人行路、树木、公园、运动场、草地、花园等。我国市屋既密，街路狭隘，近来虽略有改革，然除街路稍扩外，他项尚未着手。所有屋舍，稍壮观者唯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少数城市有之，其他建筑费无多。若乘兹规定改合近代化，则市内损失既少，市外尚未开辟。毅力进行一二十年之后，全国城市皆有园林之胜，居民获寿康之福矣。

       市内稍大之区，街名多复杂，探寻不易。如新加坡市住民仅七十余万人，街名多至九百余；有一条街长不上二英里，街名至有三四名目，若较偏僻之街，虽本地人尚难悉知，外来之客更难问津。如我国上海市区广大，街名必加多数倍，探寻尤觉困难，更无论将来无穷发展以后。美国纽约，缅甸仰光，整饬市区街路之办法，系以数目为名称，直路曰“路”，横路曰“街”，如第一路第二路等类，设须分别者，则曰天字第几路，至横街则曰第几路第几街，故无论商店住家，寻访极易。仰光市直路虽用数目排列，而横街则否，未免美中不足。我国将来城市发展，街路之多，屈指难计，若乘兹将全市通盘计划，街路以数目代名称，其利便岂浅鲜哉！

       以上所言各地死亡率相差之远，世界人寿长短不同，运动会失败之原因，江西人口锐减与疫疾之关系，我民族天赋骨骼之优美，乡村城市不适合卫生之诸点，住屋改建之办法，市区改建之方法，如市内空地应留半数，街路以数目字为名，诸重要事件，希望政府社会注意，决心毅力改革。如美国新兴市区“西雅图”，真可谓后来居上。我国各城市平屋居多，有楼亦一二层，建筑费不多。能从兹割爱积极改善，损失无多，而收效甚巨。欲获得无穷之幸福，不得不牺牲眼前少许之代价也。

       （附言）有人认为此种建议，尽可呈送政府，何必公开发表，然此所谓“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贡献政府固属当然，第公众卫生之重要宜使人人明白了解，俾可服从政府，协助地方，不致反生阻挠。若得全国同胞，咸知住屋卫生能致病弱与高度死亡率，而猛省戒惧，则无论城市乡村，改善住屋之目的不难达到也。属稿既毕，更为通俗短歌以晓民众。

寿命长短在卫生，科学进步理益明。

无知顽迷委天数，欧美中印信可征。

星洲市政改住屋，日光空气助洁清；

二十年前死亡率，于今减少达四成。

乡宅无窗似衣箱，日光空气闭不容，

微菌丛生到处有，厕池露设在村中。

沟渠垃圾多积滞，蝇蚊成群各逞凶。

不知卫生最首要，健康寿考乐无穷。

富家儿子尚早婚，为扬家声急饴孙；

不图见小反失大，所生多弱或愚蠢。

血气未定焉能戒，健康失去草无根。

维新政府宜规定，适当年龄方准婚。

世界比较人年寿，美欧平均五五右，

我华仅登三十九，印度三十尚难就。

中印年龄何短促？卫生不讲仍守旧。

政府同胞当猛省，寿夭有道应根究。

  余本无意记录个人企业上之事项，故《回忆录》只选记与大众有关之事。然以个人营业与所从事公众之事件，有密切关系，且此《回忆录》颇似个人自传，缺其前一部分亦不完备，故补记于此。

  余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集美社，与厦门岛仅隔十余里海港。九岁入私塾，至十七岁夏师亡辍学。性钝惟颇知勤学。旧例塾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俗语所谓“念书歌”是也。至十三四岁读四书注，始有解说，十六岁略有一知半解，既限于天资，又时读时辍，故虽就学许多年，识字甚少。十七岁秋始出洋来新加坡，在家君所营顺安号米店学商业。该米店系向暹罗、安南、仰光诸米行采买，然后售于本坡零售米店，及外水商行。其时家君久不直接管此业务，住眷在顺安三楼，午间始下二楼，吸烟、看书、接友，及办理硕莪厂并地皮屋业等事。顺安米业系交族叔经理，兼管财政。硕莪厂财项亦由顺安出入，然银关甚困，每月买入米款二万余元，账期市例卅天，普通多加十天清还，而顺安常延至五六十天。所以能维持采米者，为有德安复安两号合买分来，该两号原亦家君倡办，与友合股，并归伯父儿子名下。余十九岁族叔回梓，米业及财项交余料理。是年家君又加作黄梨罐头厂，名日新号。在此两三年间，地皮屋业略有获利，硕莪厂亦有利，米店每年之利约五六千元，合计实有进步。资产除欠账外，大约存十余万元。然顺安之财项亦不宽，还米账须在五十天左右。家君在洋娶一侧室颇好，不幸早逝。后复娶一妾苏氏，性极好赌，虽畏家君，然每乘机往外，或招外间妇女来楼上，其癖性生成，终年如斯。螟一子尚在幼稚。余廿岁秋承家慈命，回梓完婚。自来洋及回梓三年，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执权两年，家君未尝查问。在膝下三年，终日仆仆于事业，亦未曾撄其怒也。

  余廿岁冬完婚，廿一岁在家复从塾师补习多少。廿二岁夏复南来，仍在家君顺安内服务，公忠守职。廿四岁冬家慈不幸谢世，停柩在堂。家君以营业无人替理，不许奔丧。其时顺安诸营业多有进步，而尤以地皮及屋宅价值日高，逐月可收屋租二千余元。然除还借款利息及政府牌税外，所余无多。硕莪厂已承顶与人，黄梨厂则在柔佛加开一所，并经营黄梨园数区，共数百英亩。各业虽有进步，而银关仍困，还米账常近五十天。然其时米业比前规模加扩。家君逐月规定准苏氏支家用一百五十元。彼因赌性难改，常要加支，如属少许余或与之，若多则拒之，因其赌友妇女常由商店出入，余甚觉其不便也。

廿五岁秋余回梓，择地葬先慈灵柩，地师言正穴方向不合，须待至两年，乃权厝于穴之侧，并从俗为之延僧作佛事。廿六岁春带眷复南来，此为余第三次之出洋，仍在家君顺安内服务。至廿七岁冬因慈柩合正葬之年，故决计回梓。而此几年来，各业均有进步，亦以屋地业为最，其时屋租逐月可收三千余元，大约堪值六十余万元，而典押借款约卅万元，利息牌租逐月近二千元，按该业可存实款卅余万元。顺安米业兼营外埠逐月比前又更增不少，银关还米账在四十余天，为十余年最宽松之景。且加营两号，一为九八店名金胜美，一为庆成白灰店，均为友人情面承作，资本支去三万余元，后来失败多由此两号为祸根。盖苏氏螟子已十六七岁，金胜美财款系他支掌，向洋行收黄梨羔项，亦常由他往领。余默思此人得志，则其母赌资可任意支取，为害非少，然不便向家君谏阻。其时将建住宅，原按至多一万余元，计该时家君诸营业，顺安米店资本四万余元，黄梨厂及园六万余元，金胜美二万余元，振安铁店一万余元，庆成灰店一万余元，共十五万余元，屋地业除押款外存卅余万元，合计四十余万元。而借款除典押固定卅万元外，其他向印人流动借款，只系信用而无抵押，约九万至多十万元，此系多年如是，利息每月近一千元。再除此条外，实存资产卅五六万元。余如德安、复安、竹安、新开茂四号股份额，约五六万元，系余先伯父儿子之业。又源安米店股份数千元，则为该螟子名下。余将回梓时所知之大概如是。至余原抱公忠尽职之心，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内亦不许有金饰。顺安财款仍交族叔管理，余即带眷回梓。

余廿七岁冬初回梓，改葬先慈后，适厦门市遭火大烧一日余，焚去店屋千余间，倒塌砖土堆积满街，高可十尺，乃积极挑移，往填海口之提督打铁两码头海滩，未及一月已填平三数万尺实地。有人介绍向厦官厅购买一万元之地，可建店屋数十间。余以有利可图，乃函禀家君如肯承买，其契据可作该螟子之名，盖余原非为自己起见也。函去后不久回示可行。由是兴工建筑，按先建半数卅余间，费款二三万元，一年至年余完竣，然后出洋。不意有台湾籍民，野心倚势，图占一部分，乃与打官司，经年方结案。计前后时间两年余，建筑费三万余元，连买地及填筑合共四万五千元。在洋顺安执事族叔，未尝来函报告银根困迫，借债增多，及诸号侵款事，只有一两次遇相识之人归家，吩咐嘱余速往，言为家费浩大而已。余转念设每月被苏氏加支赌款千余元，三年不过四五万元，入息抵补有余，无关营业大局，故亦不甚关怀也。

  余卅岁夏末，厦门建筑事完竣。七月初作第四次南行，甫入顺安店门，即感觉状况大形衰退，各事凌乱不堪，似无人管顾。则往住宅拜见家君，又睹其神色久别相见，亦无欣容快意。少顷辞出，回顺安米店，见族叔身染麻木之疾，神气丧失。余问以流动借款，比较余归时增减如何？答加增。又问加增若干？答不知。余即查核账簿，其数目至三十二万元之巨，比较余前年将归之际，增廿二三万，余甚惊惶。又阅屋地业押款，仍前卅左右万元无加减。乃复问此三年间，有加置何业产否？答未闻。又问有多营何生意否？答无有。又问还米款须若干久？答须六七十天。又问流动借款既加借许多，银关又奇困，则此巨款为何业何人侵去？答不知。余是夜几不成寐。越日在楼上检查各来往数目，半日之间已明白大概，计黄梨厂侵欠七万余元（时黄梨季甫完），厂内货底统存不上一万元，庆成灰店侵欠六万余元，金胜美侵欠五万余元，家费三年支四万左右元，建住宅支三万余元，还支流动借款利息约三年九万余元，汇厦门四万余元，合共约四十余万元，扣去金胜美、庆成灰店余未归时原欠三万元，实支出三十七万余元。而顺安被黄梨厂所欠之款，一部份是原料，如白铁糖枋，尚欠人未还五万余元，又顺安米业资本前四万余元尽罄，尚不敷一万余元，流动借款加廿三万元，三条合计三十三四万元，尚差四万余元，系三年顺安米利及向振安复德安等支来者。现下银关已大困乏，欠市面白铁等款五万余元，米款一万余元，共约七万元。

余既查明三年间支出数目，则抄列一纸，午饭后复往住宅见家君。问此三年间有无增购屋地，及加营何事业？答无有。又问何加借至廿余万元之巨款。答汇厦门数万元，余为利息加重，及不时垫去之故，今已惨矣。又问黄梨厂三年结算得失如何？答未曾结算，大约可得利万余二万元。余乃将所抄数目呈阅。家君方知被各号侵去之多，及尚欠白铁糖枋，并米项许多未还。乃复叹曰，“我以为屋地业大降价，当损失廿余万元，料不能维持，不图复增欠市面许多项。”盖该时不但借款已穷，而诸流动借款，每单限期多系五六个月，到期有欲收回，或要加重利息者。前余未归时，信用借款利息平均一分，迨至后来加借之款，多非信用，系将屋地业作次等抵押，利息升至一分三四。诸借款主互相效尤，由是信用遂失，既被家人舞弊十余万元，复加借重利之损失，又遭屋地业大降价，亏损更巨，三者并至真所谓祸不单行矣。

    顺安号三年间被诸号侵支如许巨款已如上述。其中如黄梨厂设使乏利，当不至克本，不意损失许多，因所有向洋行收款，概由螟子之手，故易舞弊。金胜美亦然。庆成白灰店系小营业，何至亦侵巨项，据其经理言，大半为苏氏母子取去。住宅照估值不过一万余元，而加支二万余元。家用三年亦加支大半。此数条被二人侵支十余万元。该螟子常于醉后侮辱店员，故好人亦变坏矣。家君平生俭素，除染洋烟外，别无花费，数十年来住家即在顺安米店楼上，故家用亦省。余在顺安服务十余年，所有流动信用借款，初时由数万元增至十万元，乃由屋地及营业扩充而添借，借单每张五千元或一万元，订期四个月至六个月，利息九厘至一分。每当银关稍困时，余则禀知家君，须再借若干来济用，家君常惜耗利息迟延多天，始择较廉者借贷。有时盘问何必再借之故，余则列单呈阅，某时或某单若干，或某号因何故暂侵若干。绝非任意侵借也。常叹言，屋地业如有相当价值，拟售出一部分，可长十万八万，清还此流动借款，庶免如此纷繁云云。乃不幸在此两年余间，逐月添借近万元，而绝未查考用途，余至为不解。至顺安经理兼管财项之族叔，身既染病，终年未曾见家君一面，借款等概由螟子与家君直接，彼似抱不干涉主义。余多次往住宅与家君谈话，在厅中相距约十余尺，见家君目中似有白点，如翳疾状，然明知无此目疾，复注意细观，白点仍然，乃起行近前则无之，余心甚异之。回念其神气衰变，故致如是，毋乃气数使然乎？

 余自到店之后，家族叔日日要将事权及财政卸交，余不肯受。彼时余大有进退维谷之慨。盖全盘核算，所有屋地业原典押卅万元，流动借款抵押卅二万元，合计六十二万元，现因降价按可值四十余万元，除后不敷约廿余万元，顺安欠米账五万余元，又欠洋行白铁等五万元，按至年终六个月，利息须还三万余元，流动借款到期要收，按还一万余元，共十五万余元。而可收入之额，顺安被人欠米项四万余元，黄梨厂承顶于人，按二万元，金胜美、庆成、振安等收盘，按四万元，共十万元，除外尚不敷五万余元，合计押业及生理共不敷廿五万元弱。厦门屋地业不但难于变卖，且非余名字，故踌躇不欲接受。然转念不能脱离家君而他去，况在此艰危之际，逐月再被苏氏母子支取数千或万元，则无须三四个月决不能维持。不但屋业押款无着，而欠市中米白铁等项亦无法清还矣。乃接受之，并禀准家君，逐月只许苏氏支家费二百元。立即预备将金胜美、庆成、振安等，尽此数月内结束。黄梨厂因出产期已过，无款可收，则由家君觅人承受。柔佛厂承顶与人，收一万余元，本坡厂招潮商黄梨贩合伙，资本一万二千元，彼出七千元，余出五千元，商号称日新公司。生意由彼经理。至顺安米业不便停顿，故仍旧经营。唯较次之客不放账，俾款容易收取。两月之后还米款仅须四十余天。又幸有客承买一段空地，除还押欠外可剩五万余元，故白铁糖枋之欠款亦概还清。虽黄梨厂承顶与人，金胜美等收罢，市面中西商人绝不知内容，多谓因乏利不欲滥作。于是无欠货账，只有米款数万元而已。顺安名誉转隆，交冬之后，米业减作，劣账迫收，延至年终米款尽行还清。被人欠尚有一万多元，按有半数过年可逐渐收回，从此即一概停止。所未清者，只有产业抵押两种之款。第一款则固定卅万元，此条产业价值虽降，尚可值约四十余万元，无丝毫损失，唯次押之流动借款，计欠卅一万余元，如除产业剩余之十万元外，尚不敷约廿余万元。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余卅一岁春，顺安既停罢，念不可赋闲度日，乃在距坡十英里汫水港山地，建筑黄梨厂。按从简起手，用木料茅草造成，并买旧机器，一切按两个月完竣，应夏初黄梨产季开始工作。共费款七千余元，名曰“新利川”。至活动资本可免需，因各原料如白铁糖枋均可向市面华洋商赊取。数日间黄梨罐头造成，即交洋商便有款可支也。而春末日新公司伙友潮人逝世，照英律当截止其股份，全盘归余一手，然余不忍举行，往商其家人营业股份照旧，但经理权须归余执掌。他不许可，余于是依律通知，并核结一切账目，计自客年冬初合伙，至来春末半年间，实得利一万八千余元，他之母利一万七千余元，须留待向政府请求领出遗产，至速数月后方得交还。日新公司既归余自办，时适夏季之初，黄梨甫在出产。盖生黄梨每年出产两季，冬季约产四成，夏季约产六成。是季由四月起至六月终止，此三个月日新厂核结得净利近三万元。新利川净利得九千余元。在此短促时间，两厂获利近四万元，为初出茅庐极好机会。合前日新公司母利一万余元，又收顺安账尾及货底亦一万余元，合计已有资本近七万元。故自夏初加开一米店，号曰谦益，资本二万元，除米业外兼为两梨厂收支机关。而新利川厂则扩大工厂及机具，以备冬季应用。

  余前在顺安服务，但经理米业及财项而已。至于黄梨厂如何经营，则不闻问。其时售黄梨罐头，只与两三家交易，多系洋商，由家君直接经办。每次数千箱或万箱，每季或作数次，先期售完，制出概属普通庄头，甚形简单。余既未曾参加，绝不知该业利害。及亲营此业，并由前日新公司半年获利之巨，乃知此业极需有才干思想。若能精于核算，用心选择制造出售，每箱可多获五六角之多。其时同业有十余家，其能干者，即与余合伙之潮人已死，其他多乏精明之流，故余得独占大利。欧美加拿大诸洋行，有经营此业者，约十余家，除星期日外，三两天必有来电，采买黄梨罐头。计所采各庄，不下五六十样，如条、块、四方形、整个圆形、成片刻花，或加糖、或仅水、或各半，等等式样。最大宗为条庄、方庄、枚庄，约占八九成。全年新加坡诸厂出产一百七八十万箱，各色杂庄数十样，仅一二十万箱而已。每箱比较普通庄，多获自两三角至七八角之利。每次成盘只数十箱至数百箱，非如普通庄，每次可售千箱至万箱者。余与一副手叶君，每日上午九点余钟，分途到洋行探询，有无电信？采何庄？故凡诸杂色庄头，大半被余售去。他家或嫌少数零星，或不晓核算，或恐制不合式，致日后须赔偿，故少竞争，此向外人售货与同业不同之也。至于厂内最重要在采买生梨，及工人剖梨损失。余每天清早及下午到厂视察费数点钟工作。各厂采梨例系算枚还价，诸梨贩来售大小不定，有每百枚两三元者，亦有一元余者，不特大小有关，亦须看成熟与否，并须察看有无坏烂等事。既非按重量还价，但凭眼力而已。他厂多系每季停工时，然后核计得失。余则不然，系逐日核结得失。凡该日所采生梨，概令制完不使混杂，明天罐头装妥，便知得失。既可以为采估梨价之标准，又可研究剖工损失。比较前日新公司潮人之办法更进一步矣。若言资本则少许便可作。盖全箱原料最多为白铁片，向洋人采办系二个月还款，其次如白糖枋箱向华商交易，四十天期还款，工资半月还清一次，只有生梨须用现款而已。普通市价每箱生梨占四分之一，至多三分之一。生梨入厂三四天制就，即运交洋行，便有款可收。为无须大资本故，新加坡并柔佛共有廿余厂，竞争剧烈多乏利，全年获利一万余元者仅数厂耳。

 新利川近处，黄梨园颇多，全年可制卅多万箱之额，大都运到坡中由梨贩经售，余恐数年后生产退化，采买困难，乃思购地栽种，则于距离数英里远车路边，购空芭地五百英亩，每亩价五元，共二千五百元。积极砍芭种梨，按一年内完工，加两年全园可生产二万余箱，名曰福山园。然自各家开种黄梨园以来，至多二三百亩，或作二三年栽种，未有如福山园于一年间完成之多。是年冬季日新、新利川两厂，得净利二万余元。因黄梨膏价稍降，故利益稍不及前。谦益米店得利八千余元，计余卅一岁之年，除伙伴红利外获实利六万余元。

 卅二岁夏季，余两黄梨厂得利三万余元，秋间又在新加坡梧槽港口租屋，创办一黄梨厂，兼制煮冰糖，号曰日春。该处收采外地运到生梨，为最好地点。相距至近，早晚免待海潮均能运到。至冰糖厂，系从坡中向爪哇糖商，买白糖来煮成冰糖，还款账期三四十天，而过煮成冰糖仅八九天，并装配下船至多十五天。若有信用汇票往支，免廿天便可收款。不但免出资本，尚可先期收存款项。计坡中有冰糖厂七余家，概系潮侨。然他等均用大锌锅，燃料用柴薪。所煮冰糖多寄香港托售，上海则甚少。余之煮法则不同，系与黄梨厂同用蒸汽炉，而燃料则用锯木屑，煮锅系内铜外铁，比较燃柴每担成本可廉二三角。每日煮二百余担，计可便宜数十元。制成大半寄香港托售。是年冬季黄梨厂虽加日春号，而得利仅一万余元。全年三梨厂得利四万余元。谦益米店得利八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获实利四万五千元。

  余卅三岁春，则每念家君前顺安号为屋业，所典押一等二等诸借款，除一等外，二等卅余万元，尚不敷约廿余万元，而屋业此两年来无何升降，若愿与债主折减还清，以消遗憾，亦须半数约十余万元，至少亦当八九万元。本夏季黄梨厂如能获利四五万元，便可议还，此为余最念念不忘者。不意黄梨膏价自去冬已稍降价，至本年更形冷淡，甚至经月乏人问津。迨近夏各厂争售，每箱降至一元左右，诸杂庄亦大减消。又他人加设两厂亦能核算竞争，由是乏利可图。福山园初出产，适逢败市亦不见利。是夏梨季三厂仅获利一万余元，除各伙伴侵支，实得约一万元。统计余营业此两年半，获实利十一万元。又前日新公司及顺安二万余元，共十三万余元。家费及义捐等约二万元，实存十一余万元。而各营业垫去资本，谦益米店二万五千元，三间梨厂资本四万余元，冰糖厂免资本，福山园垫去一万五千元，合计八万余元，尚剩仅三万余元。

是年马六甲埠，陈君齐贤卖一丘树胶园二千英亩，价二百万元。该园初时为林君文庆得英人报告，乃向陈君倡办，资本多由陈君支出，先后垫出廿余万元。其时南洋人种树胶尚未发达，所有者不外百余亩，仅几处而已，亦未曾刈胶见利。故英京无人注意。及陈君种此大规模之胶园，英人即组股份公司来承买。西报虽有登载，而华文报则绝无言及。余虽闻人言亦绝无注意，且与陈林二君素无交接。约在夏间在某洋行一英人告余，陈君售胶园获巨款事，劝栽树胶可获厚利。余始查探陈君有树胶子出售，乃向买十八万粒，价银一千八百元，运往福山园栽种。在黄梨边，每十五方尺开一窟栽之，对黄梨无伤害。全园两个月栽完，此为余经营树胶园之始也。

 是年冬初，谦益米店左邻，有一间米店恒美号，兼租在芽笼桥头印人一白米厂，每日可绞出白米一千余担。然所作是熟白米，而非生白米。其制法系将粟落水池浸两天，然后加热气蒸熟，在砖庭晒干运入厂用研磨机磨净壳糠。此类米概销印度。时每担比较生米加价一元之外，算来甚有好利。适其股伙多人发生意见，愿由该经理另招别股，余乃招一友人承受，与原经理合作，仍用恒美字号，专营熟米而已，资本六万五千元，余出四万元，经理及友人各一万二千五百元。然因晒粟砖庭不敷用，尚欠半数，故每天不能出充分白熟米。余与合伙后，熟米价又升，乃急购一段地距米厂不远，在大港边，兼有淡水可用，价四万元，交还一万元，余三万元典欠利息七厘。积极铺砖庭三四个月后大半完竣。逐日可以充分出米矣。冬季黄梨厂获利仅一万余元。冰糖厂因竞争剧烈，香港代售行甚靠不住，各冰糖厂多乏利有亏损者。余度此业难取利，营业经年即停止收罢。是年三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九千余元，福山园长利五千元，共四万元。除伙伴红利及支侵，余实利约三万余元。

卅四岁夏季，黄梨膏市复降，普通庄每箱仅三元半，比前年减价二元余。自新加坡制造黄梨罐头以来，绝未有如此落价者，半由欧美多出生果，半由新加坡黄梨罐头增产，如前年仅百六七十万箱，本年增至二百余万箱。本季三厂获利仅一万余元，同业多有亏本或至倒闭者。恒美熟米厂自客冬入股以来，米价常好，每担实利六七角，每天增出至七百余担，每月实利一万多元。余以恒美有利，自秋后则与前顺安号，产业抵押债主，开议清还之事。所有产业由他承受，不敷若干然后折还。计开议数月，或因主人回印，故延至冬间始议妥，计不敷约廿万元，折还九万元完结。从中交现款六万元，余三万元限期四个月还清，并坐还一分利息。彼此在律师处立约，并登报存案明白。是年终各项生意核结，恒美公司计十四个月，实利十六万余元，余得十万元，黄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元，福山园五千元，共十三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实利一十三万元

卅五岁春，恒美公司所租印人之米厂，租期已到不肯续租，硬要出售价十六万元，典回十二万元，利息七厘率，须还现款四万元，不得已承买之，买后不两月熟米大降价，每相实利一角余，而合股之经理料难获利，便欲抽出，无法挽回，即就年终核结数目，抽去母利红利四万余元。由是银根难免稍感拮据，幸他抽去后熟米价复转升，每担三四角，故递月可得数千元入息，年终核结得利六万余元，三黄梨广全年得利一万余元，谦益米利八千余元，福山园六千余元，合计九万余元，除恒美股快及诸红利外，余实利约七万余元。

卅六岁春，福山园左右有旧黄梨园数处，亦兼栽树胶，仅年余，而园主以老园乏利可收，故不耘草，廉价出售，共五百余亩，每亩五十元，买后将黄梨及草清除，专培树胶，由是福山园之树胶已有一千英亩矣，是季胞弟敬贤回梓完婚，不数月适遭家君不幸谢世，余因营业所缠及银根关系，不能奔丧，但遣妻妾儿子回去，丧事由胞弟料理归土，又数月而祸不单行，恒美厂竟遭回禄之灾，货物无保险，仅机器保四万元而已，然货物损失不过数千元，急复兴工积极办机器兼建筑，并扩大规模，至年终告竣。是年恒美公司因火灾乏利，黄梨厂得利一万余元，谦益米利七千余元，福山园六千余元共三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实利二万五千元。

  卅七岁，自客年秋，恒美厂遭火，保险赔四万元，交还典主（原典十二万，现存八万元），而恒美厂重新建筑，及置办机器计费款六万余元，逐日出白熟米较多，流动资本亦须增加，银根甚形困迫。时适树胶市日奖，每担由二百余元升至三百余元，树胶园及股份，亦随佳市而活动，故于去冬将福山园，抵押广益银行七万元，然为谦益恒美侵支。至本年春将福山园，与陈齐贤君等立约，许他至年终为止，按价三十二万元实收，任他经手转售，所加之价归他所得，届期如售不出，则合约取消。然由立约起他须借余八万元，利息七厘半，限期两年，又不拘何时，广益银行如要讨回七万元，陈君须代清还，期限与八万元同。计两条十五万元，均为垫于恒美厂之事。自与陈君签约后，胶价复升，未及两月，陈君便将福山园售与英人，价三十五万元，订三个月内找清。至秋间如数交清，除还广益七万元，陈君八万元外，尚剩十七万元。然自夏间胶园卖成后，余立即向柔佛觅地两处，复开芭种植黄梨与树胶。是年恒美公司得利四万元，黄梨厂得利一万元，谦益米利八千元，共五万余。除恒美股伙及红利外，余实利约四万元。

余自卅一岁春自立营业起，至本年卅七岁止，计此七年间，恒美公司及黄梨厂米店，共得实利约四十五万元。福山园收黄梨三万余元，树胶园除买地种梨雇工等七万余元外，得利廿五万元。合共三条得实利七十三万元。除还顺安债款九万元，恒美公司因熟米降低且暹罗有多家新设利源日退，而厂身及砖庭资本已乏相当价值，应须折减。前逐年只添置及修理开销，而成本却未曾折扣。计厂身原本十八万五千元，折减八万五千元，砖庭原本十万元，折减五万元，两条十三万五千元，余之款应为十万零数千元。又七年家费及义捐等八万余元，合计廿八万余元。除此之外存款约四十五万元。至往柔佛开垦之树胶园，一在笨珍港，名曰祥山园，拟栽树胶兼树茨，一在老谢港，距新加坡较近，拟栽树胶兼黄梨，名曰福山园，每月按开一百五十英亩，垫本五千余元。

   卅八岁春，余往暹罗曼谷，系专为恒美厂采粟而往。拟就曼谷溪边租栈房，买粟配来新加坡。以前系向暹行采办，颇不利便，故拟直接在暹自买。不意除米厂外，栈房难租。有友人告北柳港黄梨甚多，供全国生食之需，余即坐火车经数点钟前往视察。在北柳港有一所米厂，乃假其小火船游内港，果见黄梨园甚多。略探大概，按采三分之一，则每年可制梨罐四五万箱。其时黄梨市价已升，因新加坡数年败市，出产减少，而暹地未有人制造。又北柳地方产中下等粟亦多，正合作熟米之用。若在此设厂制梨罐，并采粟，诚一举两利。而加两个月生梨便盛出，余即买地赶建，机器由新加坡及在暹购置。按夏初完竣。并建采粟码头栈房，兴工月余将竣，号曰谦泰，余乃回新加坡。

  余往曼谷寓友人泰源行内，他介绍往见一侨生闽人，行号鸣成，富有数百万元，在曼谷及北柳均创有米厂。余到北柳参观其米厂，于近年始兼作熟米。其砖庭御雨蔽粟，系用活动可进退之屋盖。庭股边安轻便铁路，出入湿干粟及屋盖，均从铁路运载甚为便利。余一见之后，深敬服其机智，而抱恨自己愚拙。彼近间始经营此业，真所谓后来居上也。若恒美之砖庭遮粟系用竹叶制成之帆席，湿干粟出入均用人力挑运。如湿粟散在砖庭上未干，逢阴雨及夜晚则用竹扫聚积庭股上，遮以帆席，待日出再开散曝晒。常于一日间散合两三次，不但工人须多，如逢降雨多天，乏日可晒干，则臭烂损失不少。鸣成厂活动屋盖之妙处，在于湿粟既散开庭上，逢降雨及夜时，只将屋盖运来遮御，未干之粟可免聚积一处，不但可受空气助于，又俭省许多工人，终年不致有臭烂损失。然此法须有加倍空地，以容纳活动屋盖之退藏方可，然恒美新创粟庭可以办到。余回新加坡，立即照此办理并办轻便铁路，改作数月完成，约费去近二万元。至新加坡诸黄梨厂廿余家，为数年来多乏利，亏本倒罢及收盘者近半。余即招两三家来合伙，余约占三分之二。是年恒美公司除新造庭盖等费以外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厂得利二万元，谦益米利八千元，共五万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三万元。

  余卅九岁，为去冬我民国光复，极欲回梓，一为略尽国民一份子职责，拟在集美社创办制蚝厂，及集美小学校，一为出洋已近十年，思乡甚切，故拟于秋间言归。即在新加坡筹备制罐机器，及火炉等，计费七千余元，并函在日本友人，代雇一熟悉制海蚝罐头技师，月薪国币二百元，订冬间到厦。至蚝之罐头，余在新加坡曾买外国货运来试过，原质气味，虽不及生蚝之佳，然每枚比较集美出产尤大，余意其过于老大，若集美之蚝势必较佳。及至秋间回梓，冬末开制，则完全失败。其原因有二，集美之蚝在海中仅八九个月，不耐高热度，煮久缩小约存十分之六七，形体大变，此其一。而该技师亦乏经验，试制仅十余天，多已变臭，此其二。以此完全失败。后乃闻外国罐头蚝，其蚝身在海中年余或两年，达相当老大，乃能耐高火度，而不变其形体，盖火度不高，则易变臭也。计亏损四千余元。乃将各机器估八千元，与厦门友人合伙招股份公司，名曰大同罐头食品公司，余入股约五分之一。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公司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七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余之额三万余元。  
  四十岁秋，余复南来，暹罗所创之谦泰黄梨厂，计经营已三年，约得利五万余元。迨至末季因北柳港水变咸，经理人不知预防，致损失三万余元。由是承顶与人，机器屋栈均廉价卸去，采粟则移来曼谷，租一小米厂经营白米，并为恒美公司采粟。而新加坡有两黄梨厂不利，招余承盘，由是全新加坡黄梨厂制出之罐头，余公司约居半数之额，年可七八十万箱。然因市价不佳，竞争亦烈，故虽占许多数，而不甚有利。在柔佛笨珍港所开树胶园，因地方多病，及其他不顺，上年间费去五万余元，不得不放弃。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厂公司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八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三万五千元。

    余四十一岁秋，欧洲战事已发生，黄梨膏近奢侈品，政府对船运认为次要，限制颇严，洋行不但停采，而前所定诸期货亦不肯领。时适黄梨季甫过，厂内积存数万箱，不能支配，致银根日形困迫。再后运熟米亦无客可受，因乏船运所致。复加以德国一艘战舰，自东亚逃去，在印度洋攻击许多商船，故船运更形恐慌。存栈万余包，洋行及印商前时采定之货，既不肯领，要求先交款十分之一亦分文不还，咸云银行汇票及抵押不通，故无款可交。黄梨厂虽停工，然欠市账未还及工资厂费，恒美厂亦然，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还，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延至冬间，黄梨膏及熟米，因船运稍松，稍稍来领，及至年终存货略已售清。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三万余元，黄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余元，福山园黄梨虽可收成，尚不垫全年之费，净得利六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四万五千元。

  余自卅八岁至四十一岁，四年得利共十四万余元，而开支及损失数目，计祥山园五万五千元，家费三万余元，义捐及制蚝损失二万余元，建集美小学a校舍及两年校费二万余元，共十四万余元，出入相当，无可见长。当前年胶园卖出时，存现款十余万元，而新开柔佛福山园垫去十五万余元，大同罐头公司股份一万元，暹罗白米厂资本三万元，共廿余万元，故银根无时宽舒，常侵欠银行多少款项。

 余四十二岁，自客年欧战发生，至冬季火船载位虽稍宽些，然较前时实有相当困难，如要在安南暹罗配粟，甚不利便，各船局多不愿运粟，为其量比白米占位较大，而运熟米往印度亦常乏船。故自新春来熟米虽能合销，而原料缺乏，巧妇难作无米炊，不得已乃租赁两轮船。一艘立约两年，可载一千三百吨，名万通；一艘立约一年，二千五百吨，名万达。租后敷月颇顺利。再向香港租两艘三国船，每艘二千吨，订约一年，计租四船。所以敢如此放胆者，因曾为英政府承运枋木片，往波斯湾，每次来往须一个月，虽无多利可获，然日期可由我自定先后两个月。如运往他处较有利，我可尽先往他处；如乏利或限期已届，然后运枋木往交。以此算来全无危险。是年租船得利廿余万元，黄梨厂甚少作，而定采全年白铁，转售得利廿余万元，恒美公司得利四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余元，共五十余万元，余之额约四十五万元。

 四十三岁，余为客岁租船有利，乃自置轮船一艘，可载三千吨，原名东丰，价卅万元，所租之船三艘，已到期被讨回，仅存万通一艘，时租金已提高，故不复他租。而熟米一途，因暹罗仰光诸产粟原地，增设许多厂竞争剧烈，新加坡既不产粟，更难与争，已现乏利气象，前程亦甚悲观无望矣。黄梨厂自客年集合在加笼区为一所，每日能制出两三千箱。然自欧战后，销路甚短，减去不下十分之六。所定采白铁片，价值日升，转售于人更胜于裁制罐头。前有一梨厂在土桥头，各机器概已移去，只留火炉而已，乃改作树胶厂，添置各机并建吊栈，并加热风气，费款五万余元。先代他家作绞工，每月可绞五六千担，得实利一万余元。是年轮船得利卅余万元，黄梨厂得利廿余万元，树胶厂得利五万元，谦益米利一万二千元，共得利六十余万元，余之额五十余万元。

 四十四岁春，不幸发妻谢世。恒美公司熟米业已完全不可经营，乃将米厂改为树胶厂，而对面砖庭建平屋安机器，原有栈房，则改建四五层以吊胶，并添置热气，费款廿余万元，号曰谦益。自买湿胶片来过绞为胶布，在本坡售诸洋商。适有一美国广告公司经纪人，来新加坡招登广告，乃托其介绍美国胶商来交易。渠回美时，即介绍于胶业协会经理人。由是绞出胶布大半直接售于美商。秋间复购轮船一艘，三千七百五十吨，原为澳洲客船，可行十四海里，价四十二万元，名曰谦泰。余以两年来有利，乃思前年获悉闽省师校之腐化，师资之缺乏，若力能办到决在集美办师范学校，兹正其时矣。秋间即商遣舍弟回梓，建筑校舍，可容寄宿生三百人，并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代聘校长教师，准新年元月开幕。冬间将所置两轮船，谦泰东丰租与法国政府，租金每月新加坡币十二万元，除用费及修理外，按可长五六万元，立约至战事终再加六个月满期。是年轮船得利五十余万元，黄梨厂仍得白铁利廿余万元，谦益胶厂得利十五万元，恒美公司无利，米店得利一万余元，共一百万元，余之额九十余万元。

四十五岁春，东丰船在地中海被德国击沉，保险赔款实收五十万元。秋间谦泰船亦在地中海被击沉，赔款七十万元，而船业已不能再谋利矣。为收得保险等款，乃买在柔佛高踏丁宜路，胶园一千英亩，又空山二千英亩，价四十万元。又买本坡马珍律港边空地，卅万方尺，价卅二万元。黄梨厂自欧战到今四年，销路甚小，获利无多。唯白铁片每订采一年之用，初战时买每箱六元，第二年买九元，第三年买十二元，第四年买十六元，大半转售出去，首年兑十二元，次年兑十五元，第三年兑廿元，第四年兑廿五元，故四年间得利近一百万元。然因经理人怠于管理，致腐漏甚多，损失及赔还洋行廿余万元。是年战事告终，谦益胶厂得利八十余万元，两轮船扣原本外得利六十万元，黄梨厂得利十万余元，米店得利一万余元，共一百五十余万元，余之额一百四十余万元。

余自冬间欧战息后，便思回国久住，以办教育为职志，聊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而对南洋社会关怀之事，则为新加坡未有华侨正式中学，乃首倡捐资，招全侨合办。营业如黄梨厂，因数位伙友兼经理多不认真，恐有危险，乃卸去一切，归他等承受，而保留谦益树胶厂及米店，并与他人联财在新加坡参加裕源公司、振成丰公司、槟城树胶公司等。彼时计谦益胶厂资本二百余万元，直接与美欧商交易，按逐年中平均可获五六十万元。裕源、振成丰、槟城三公司，亦均营树胶，余股份约三分之一有奇，资本五十余万，每年亦按可分利十余万元。福山园计栽树胶二千余英亩，已七八年，黄梨已除去，专顾树胶，再两三年便有利可收。新买一千英亩胶园，亦将近收利。空山二千英亩，则开始栽树胶，按年余可完竣，每月垫本一万余元。计自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四年间获利轮船一百六十余万元，黄梨公司实额六十余万元，树胶厂一百万元，米及恒美七八万元，又三公司得利卅余万元，福山园估得利四十万元，前原存五十余万元，合计四百五十余万元。而支出数目，集美学校建校舍及开办，并全年经费，三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家费五万余元，共五十余万元，除后实存资产约四百万元，从中谦益胶厂活动资本二百余万元，三公司五十余万元，承恒美厂及添置约四十余万元，树胶园一百余万元，买地卅余万元，米店资本七八万元，共四百卅余万元。所加之款系买地押欠及侵银行者。

 四十六岁春余既决意回梓，乃请舍弟南来接理，时为民国八年。余于五月回乡。秋间接舍弟函告，马珍律所买空地左邻，尚有廿余万方尺要售，因地较次可便宜些，按廿余万元，余复函承买之。计马珍律两次所买空地，近六十万方尺，买价五十余万元，过后陆续填平空地，再费去四五万元，共六十余万元。该地在新加坡河港边，数百担驳船可出入，为适合建货栈之地。自余归后屋地业月月升奖，因新加坡币日小，而南洋各处获战后巨利者，多来置业，有升至两三倍者。冬间舍弟与友人，合买马珍律对面空地数万方尺，每方尺价至四元。若相比较，则马珍律之地，至少可值每方尺二元半，最低亦二元，则值百万元有奇。是年谦益树胶厂获利九十余万元，米店得利五六万元，除红利外，余实约九十万元，而汇水须二百余元方可汇国币一百元

   四十七岁余在梓里。新加坡币复缩小，盖亦为上海香港等处多存款之故。最高时坡币三百元，方得汇国币一百元。余因急于尽教育义务，故仍依计划奋进，不以汇水而退缩。其时新加坡屋业价尚好，舍弟与友人所买空地，亦积极赶建，意在建后售出可获多利，然原料亦多升价矣。而土桥头之树胶厂，余则函告舍弟改为树胶熟品制造厂。又在三条巷粟庭隔邻有远利火锯厂将拍卖，余寄函以廿五万元收买之，兼营黄梨厂。而裕源公司经理兼股东，自余未回梓之时，屡向余言合伙营业已久，有如人老须更换少年，盖早有独立之意。及本年来则下决心，存树胶五千余担暂停不售，成本每担九十余元。不久适胶价大降特降，及至售出每担亏本五六十元，计亏去卅余万元。又一胶园成本廿余万元，估计五万元归他自己承受。洋货店及账目及招牌亦归他。因诸股东念多年伙友，故不与计较。余母利原廿余万元，仅抽得饼干厂股份及屋业，可值四万余元而已。至槟城树胶公司，因股东兼经理变更售法，将一部分胶布，托洋行往美国代售，款先支八成，前后托售五六千担，亦值胶市屡降，亏损廿余万元，在地亦亏本十余万元，共卅余万元，将公司资本一切弄空，营业停罢。振成丰公司股伙中，有五人共理事，因一客籍伙侵款及私营他业，他四人便与发生意见，余函劝须念多年伙友勿复计较，他等不肯，遂致折散，振成丰公司归他承受，余原本收回。计此数月间，裕源、槟城、振成丰三公司俱失去，亏损卅余万元。是年胶市虽大降，而谦益胶厂得利九十余万元，米店得利二万余元。除各伙红利外，余实利九十万元。

    四十八岁新加坡屋地业，自客年上半年已升至登峰造极，至下半年则大降特降。舍弟与友人合建之栈房，垫去廿余万元，虽要亏本售去，亦无人接手。而所营之树胶熟品制造厂，及火锯厂黄梨厂，亦垫出许多资本。树胶园则因胶价降跌，亦停止采刈，新旧园逐月须垫去三万余元。集美、厦大建设及校费逐月亦数万元。虽有胶厂之利，出入仅略相抵，而利息及诸垫本，须多侵银行数十万元。其年谦益树胶厂得利约一百万元，米店火锯梨厂得利四万余元，余实利一百万元。

四十九岁春初舍弟因病回梓，余不得不复南行。本拟数月后再回国，及到坡之后见树胶营业，已有数家出为竞争，彼亦直接与美国胶商交易，致利益已不如前。而厦集二校，均在扩充，所需经费多赖此途之利源，故不得不转变方针。其时因两年来胶市告败，马来亚各埠小规模胶厂，大都亏损，或停罢或半作，多欲卸去。余乃往各处视察，向其收买全厂栈机一切，计峇株巴辖、麻坡、巴双、答株牙惹、怡保、江沙、实吊远、太平、霹雳九厂，卅余万元，逐厂扩充吊栈热房，及改善机器，费去十余万元。槟城厂停闭两年，复修整扩大，费数万元。俱于年内完竣，逐月可绞出胶布三万余担。制造厂亦加垫十余万元，是年各胶厂得利一百零万元，其他制造厂、米店、梨厂、火锯厂等，得利十余万元，合计一百十余万元，余实利一百一十万元。

 余回梓里及再来洋，计此四年间所得利三百九十余万元，而支出及业产降价事，计集美、厦大两校，设备及经费二百二十余万元，利息六十余万元，火锯地皮栈房按跌价五十余万元，三公司损失卅余万元，树胶园垫出卅余万元，因胶市降估减，又义捐十余万元，家费六万余元，共四百一十余万元。出入抵后不敷廿余万元。比较四十五岁时资产减去此数，而树胶园许时可刈者，已有三千英亩，新园二千英亩。尚有一坵亦在柔佛二千英亩，与梨厂伙友合种，名曰三合园，余得一半，后一友抽去，故余得四分之三，一千五百亩，已栽六七年之久。此园原本甚轻，初时只还讨山费一万余元，招客籍人百余人栽种黄梨，每亩津贴十余元，黄梨收成，分得梨利来抵津贴费已可相当，又兼栽种树胶，彼等当兼顾。此时黄梨已收五年，再迟一年余已将尽矣。合计余之树胶园六千五百英亩，每亩只估值一百零数元耳。

五十岁，陈君延谦招余一任职人合伙，经营树胶厂号曰信诚。其时竞争剧烈之家，以振成丰、通美、信诚等为最，陈君出而提倡合作，通美不甚利害置之，只谦益、振成丰、信诚三家，每采湿胶一担抽利一元，谁不实报每担须赔十元，逐月抽利若干作十分均分，在律师处立约三年计谦益得六分，振成丰二分半，信诚一分半，并公租坡中他人之胶厂五间，关闭不得开工，办事所附设信诚楼上，书记由他兼理。其初四个月谦益采胶较多，逐月支出一万余以还两家得利，再后经三个月未闻核算。时谦益办理人系李光前，余催其速结，则该三个月，振成丰、信诚二家须支出二万余元还谦益。而振成丰疑信诚减报，要查其账部，信诚不许，但承认减报五千担，振成丰则以就此当罚出五万元，渠欠谦益之账可以抵还而有余，由是两家应出之款均置度外。再延三个月，两家应再出四万余元，合七万余元当还谦益，更难交出矣。而信诚竟唆弄振成丰，将公租一胶厂作私家复业，余则以约章阻止之。彼即控余于法庭，欲破三年之约。振成丰伙伴四人，前均任余职务，其中一叶君者良心上自过不去，奔走要求总商会长薛君，力为斡旋。余云彼欠七八万元既不还且又见控，上堂打官司事，余素不愿，欠款不还置之就是。而薛君等强为要求，取信诚五千元来作了结。余素抱宁人负我宗旨故即了事。是年谦益胶厂得利九十余万元，其他得利卅余万元，除红利外，余实利一百廿万元。

    五十一岁，是时树胶厂营业扩充已足，树胶园新旧相抵，免复垫本，市价稍转，逐月有利可长，则注意扩充树胶熟品制造厂，此后简称“制造厂”，对各种车轮胎，及各日用品、医生用具、胶靴鞋等，均筹备试制，由是扩大厂屋机器。然货物出产既多，销路未通，寄人代售则难靠，盖资本家以我为新品，销行未畅，不愿代理推销，非资本家则乏信用，不得已须自设分店，俾可推销。故先在马来亚及荷印诸大埠，开设十余处。是年谦益各胶厂得利一百五十万元，其他得利卅余万元。除红利外，余实利一百七十余万元。

 五十二岁，为英政府限制树胶出产，其时荷印出产无多，未有参加。限制后胶价每担由卅余元逐月升奖，至冬间竟达二百元。自秋初三合园售于英人每亩七百元，余得四分三，实收一百万元。由是大为买入，计买五六处，在柔佛七千余亩，新加坡一千余亩，每亩平均二百余元，共二百廿余万元。制造厂又分设商店于香港、上海等国内大都市十余处。自树胶限制出产后，每担卅余至五十余元。将本厂全年所需胶款，采入足数，故有多利。至在马来各树胶厂，因价高厂寡，乏人竞争，亦有厚利。是年谦益各胶厂得利四百余万元。胶园共有一万五千亩，每亩估值按最少价三百元，可值四百五十万元，固本三百廿万元，可得利一百卅万元。又三合园得利一百万元，制造厂得利一百五十万元，其他得利廿余万元，合共得利八百零万元，余实得七百八九十万元。

余此回再南来，则由五十岁至五十二岁三年，为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依上言三年计得利一千零七八十万元。而支出之数，厦大、集美两校建设及经费二百七十余万元，因胶价高及多买树胶园，故多侵银行。计还去利息七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家费五万余元，共三百六十余万元。对除后三年中可长来七百十余万元。若论其时树胶园价，每亩至少堪加估一百元，可加值一百五十万元。又前年估存资产三百七十万元，共一千二百多万元。从中各项财产所占数目，树胶园为最多，计一万五千亩，每亩四百元，共六百万元，谦益各胶厂机器及厂栈估一百万元，活动资本四百万元，制造厂机器并厂一百五十万元，活动资本一百五十万元，空地及栈房估五十万元，火锯梨厂米店等五十万元，合共一千五百余万元。故尚侵支银行近三百万元。

五十三岁，树胶制造厂复在南洋及祖国设分店十余处，再垫出数十万元。余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以廿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多所，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各机器，可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至谦益胶厂为去年有厚利故，多位职员欲自出经营，外间亦有羡慕诱出合伙者。然自新春之后，胶市日降，各胶厂无利可图。前拟办一造纸厂，办机器交定廿万元，见市势已不好，即取消不敢进行。自春至冬，树胶价降如流水就下，由每担一百七八十元而跌至九十余元。各厂不但乏利，尚当亏损。由是厦大校舍已下手建设者，使至完竣便止，而集美建设则于冬间完全停止。虽建筑近半之工场亦不敢继续，此乃出于不得已之苦衷，而经常校费，则如旧进行。是年谦益胶厂亏损卅余万元，利息支去四十余万元，厦大、集美支去九十余万元，办纸机取消廿万元，其他均无利，共支出一百八十余万元。

   五十四岁，前承接裕源公司之环球饼干厂系股份公司，余之股额，系一部份，他人尚占大半。因经理人与股伙生意见，余诸股东多欲售出。乃承买一切，加以改善，并扩充新式机器，垫款十余万元。夏间树胶园卖与英人五干英亩，每亩五百元，计二百五十万元。而谦益树胶厂两年间、请职员出去合他人经营同业者，计有志成、益和、南益，连前振成丰、信诚五家。洋银行及华银行被侵支至七百余万元，多将厂栈货物抵押，并有银行买办暗与联财，此乃举其大者。至于马来亚诸厂职员，出去作同业者亦有多人。由是竞争益形剧烈，各厂绝无毫利可图。自欧战后十余年来，入息多靠此途营业，兹乃如是变迁，前程甚为悲观。而胶园及别途亦无好景，逐月应支出厦、集二校经费及利息十多万元，衷心苦况难可言喻。然尚希望制造厂后来有利，故复增设分店十余处，推广销场。是年谦益胶厂，及制造厂、胶园等均无利，饼干厂及火锯梨厂米店等得利数万元，只足供义捐及家费，所余无几。厦大、集美支去经费七十余万元，利息四十余万元。共一百二十万元。

 五十五岁春，复售出树胶园六千英亩，每亩四百元，共二百四十万元。夏间我国为北伐故，日本派兵入济南，发生惨案。新加坡开侨民大会，筹款救济，举余任主席。其时华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余所办之《南洋商报》揭载某商家，由某轮船运到某货品若干件。由是衔恨，雇人下毒手放火焚余树胶制造厂，计毁去屋机货品近百万元，除保险外损失五十余万元。是年谦益各胶厂仍无利，制造厂为各物品降价亦乏利，又受火灾之损失。其他火锯梨厂饼干米店等得利几万元，只足供义捐及家费。而厦大、集美虽缩减经费，亦须汇去六十余万元，利息四十余万元，加火灾损失五十余万元，共一百六十余万元。

  余自五十三岁起至五十五岁，此三年均在退步境遇中，虽幸两次卖出树胶园四百余万元来抵额，尚不敷支出之数目。计支出最多者，厦集二校经费二百二十万元，利息一百卅万元，火灾五十余万元，胶厂亏损卅余万元，卖胶园佣资二十五万元，纸厂机廿万元，义捐六万五千元，家费四万五千元，共四百九十万元。饼干火锯梨米等得利十余万元。对除后尚支出四百八十万元。按诸业及厂机降价损失，树胶各厂按五十万元，地皮栈房廿五万元，火锯等廿万，胶园十万元，共一百零五万元，合计两条五百九十五万元。至估存资产制造厂机厂二百万余元，活动资本二百万元，谦益胶厂活动资本二百万元，厂机五十万元，胶园存四千亩估一百万元，火锯饼干厂等六十余万元，共八百一十万元，合两条共一千四百零万元。故尚侵支银行三百余万元，仅存资产实额五六百万元耳。

 余五十六岁至五十八岁，此三年为全世界发生大不景气之年，各物产均大降特降，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园主多停止采割，然不忍完全放弃不加管顾，只留一部份工人，采割之额只抵工人生活费，每日每人仅二角余，工人亦甚困苦，须加勤方有此数。至于其他失业到处多有，政府津贴川资遣送华侨男女回国甚多。胶布鞋前每双一元外，降至二角余。凡各原料及成品诸物莫不降落大半。余制造厂分店八十余处，及厂内所存生熟品，跌价不下百余万元。谦益胶厂亦无毫利。饼厂火锯等获利无多，只供义捐及家费。利息及厦集校费支出仍巨。制造厂又垫去七八十万元，致加侵银行一百余万元。至秋间银行乃商余改作股份有限公司，利息愿酌减，厦集校费亦裁减大半，每月仅限叻币五千元，余不得不迁就之。于是核结一切，计此三年支出最多者为利息一百廿万，次为厦集二校经费九十余万元，制造厂垫去七十余万元，共三条二百八十余万元。除侵银行外，余数十万元系抽谦益胶厂之活动资本。而树胶园估值六十万元，须亏四十万元，制造厂亏本七十万元，利息及校费二百一十万元，此四条共三百廿余万元。前年结存资产六百万元，除后可存二百余万元，估作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亦有加入少许。凡余名下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概行并入。此后余个人不负债责，银行举三四人为董事，一人任副经理，余任正经理，月薪各一千元。此为民国廿年八月间改组之事也。

 五十九岁之年，世界不景气仍深重，美国富人甚至有不能维持生活，降至为乞丐者。譬如存有业产及股份一百万元，而将此业抵押四十万元，尚存价值六十万元，是一富翁也。然遭世变降至值卅余万元，债主代为售脱尚不敷数万元，无力清还，安得不破产报穷乎。马来亚出产只有树胶及锡为大宗，直接间接多视此为荣枯。工人除失业及回籍外，留存有工作者每日工资至多两三角为极优，苦况难以形容。至于园主如有久债，及无力可还利息地租者，多被政府或银主拍卖，每英亩四五十元，亦有十余元者，南洋资本家破产者难以数计。是年虽校费仅支六万元，利息可减十余万元，然因物品价值复降，各业无利可长，致利息亦不能清还。

 六十岁春，新加坡及槟城两胶厂，因乏活动资本经营，乃租于南益公司。迨至夏间似有否极泰来之象，在马来亚尚有小胶厂八九所，已略呈转机。然六月间本有限公司董事会见客年下半年，各厂核结数目或无利或亏损，则议决将各胶厂停止出租，又议将外地如祖国荷印英属等分店，概行收罢。余虽力劝以分店要收必大损失，至多收回两三成而已，又胶厂已转机有利，不可造次出租，彼均不肯。计尚存答株、麻坡、巴双、怡保、江沙、太平、实吊远、峇株牙惹等处胶厂。余不得已乃将巴双厂租南益，订资本由他出，利息扣后，有利分半数为厦集校费。麻坡厂租于益和，利息扣后，有利全数充集美校费。怡保、太平等厂，则招诸经理人合租，余亦参加，订明有利，抽三成助校费。峇株厂租于宗兴公司，条约亦如是。以上系各胶厂转租之事实也。

本年五月间，英国为数年来不景气损失，对前时入口货少征税事，不得不改变税则，乃通告英辖各属地，派代表到加拿大开经济会议，增加入口税。如树胶靴以前每双征税二角半，兹加至二元，胶布鞋每双七占，加至七角半，由七月一日实行。新加坡为英殖民地，然入口不加税。前英京有八家向本厂采办靴鞋，逐月无多，现因日本及他国税重难往，故自此议案通过后，来办者大增特增。余按本厂逐月可出胶靴五万双，每双可得利一元半，逐月有利七万余元。此物香港未能制造，全数可以销清。杂色胶鞋逐月可销十万双，每双得利三角，逐月有利三万元。此为各采办家之式样，至于普通庄有多处竞争，每双得利一角余，每月亦可销十余万双，得利一万余元。合计每月可得利十二万余元，一年之后，本公司各业可以复兴，深以自慰。不意八月间英京忽来一魔商，执有汇丰银行介绍函，向新加坡汇丰银行运动，要求将本厂所出品靴鞋为他一手专卖，并运动诸董事同意。该魔商原系八家之一。余极力反对，彼等则硬要接受。余警告云，若如此必至两败俱伤。最后汇丰银行经理，则不客气言，我英国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所交易其他七家，系犹太人及别国人云云，此语无异暗示我华侨在内。余仍拒绝不肯签合约，而诸董事竟代签许。所欠七家之货交至十月完了，以后由该魔商一手承揽，不但定采之数大减，余亦灰心办理，与诸董事大生恶感。自秋初因定货多，立向欧美采办许多原料，兹销出既少，存栈如山积矣。

  自秋间英京魔商来后，银行诸董事与余意见日深，除制造厂有意保存，以供该魔商之需外，其他饼干厂、黄梨、火锯、米店，概欲收罢。余亦料制造厂寿命不久，故交冬后或收罢，或承顶于人。饼干厂营业额不劣，年年有利，乃招李光前承受，订明资本由他供出，利息公开，得利三分一补助二校经费。在新加坡树胶厂，原租商益一年将届，次年仍续租，亦与订明资本由他供出，利息公开，得利十分抽二，及月租加一千元，补助二校经费。而魔商逐月来定制靴鞋，不但无多，价钱亦廉，每双靴得利不上一元。余以后望已绝，更灰心办理，且料不能持久，故于阴历将终之前，核查尚欠市面七万余元，若公司一旦收盘，决无清还之理。于是通知各货主或原物领回或取制品抵额，一切交还清楚，此后如有再需些少用料，则以现款交易。银行诸董事见余灰心消极，乃延至阴历十二月终，全厂停闭，由银行公举收盘员，全权核结收罢矣。

  余自卅一岁春，经营商业及工厂，种植黄梨树胶，计前后创设商店百零处，各项工厂卅余所，垦树植胶及黄梨园万余英亩，雇用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对于居留地政府及侨胞，略有相当裨益。至十余年间牺牲教育费，坡币八百余万元，实亦按部就班，非自已无相当根底，而只出于孟浪之举。所经营诸业，以树胶园、树胶厂、制造厂三项为大宗，其他则无关轻重，尤非专营投机者比。当四十六岁倡办厦大时，己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而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岂意再后树胶价大败特败，复加以职伴多人出作同业竞争，三年间无毫利可入，而校费及利息货价支出至五百余万元，然尚存有资产六百余万元。校中设备费早已停止，经常费每学期缩减，至常年费三四十万元。不幸一波未平，一波复起，适逢世界大不景气来临，仿似避贼遇虎惨况。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遽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若命运衰颓，无挽回可能，原属定数，不在年开三几十万元校费也。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绝无关系也。当公司收盘之时，分店八十余处，货物家私存二百余万元，制造厂机器厂栈房除逐年折减外，尚估值二百卅万元，原料存在栈内者六十余万元，生熟品数万元，共五百余万元，树胶园可值一百万元，胶厂四十万元，饼干厂及火锯等廿万元，地皮栈房廿万元，合计六百八十万元。而收盘最大损失为分店及制造厂机器，收回不上三成。自有限公司成立至收盘计卅个月。厦集校费每月不敷一万余元，共四十余万元，系将厦门校业变卖十余万元，及由集通息借卅万元，来维持耳。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卅日陈嘉庚于爪哇晦时园避难中

余自民国成立后，对于中国前途，抱热烈希望。虽军阀内哄，战争不息，总念国家改革，乃能达到幸福目的。迨民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更希望能如苏联之彻底改革。乃历过多年，绝无实现，只是独裁欺诈，媚外害民，消除异己。至七七事变后，抗战多年，民生惨苦，而独裁者仍不悔悟。其时，蒋介石等尚属中年，且历行教育党化，预作永久独占政权地步；余意设使天佑中国，降生忠诚建国人才，不知须再延迟若干年之久方能代蒋氏掌握政权，以救国救民，况今世尚未闻有此人才，故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至重庆，见国共磨擦严重，似有剑拔弩张之势，如不幸破裂，抗战何能胜利，余知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仇恨之深，非轻易可以解释，但未识中共方面之意见如何，乃决亲往视察，俾略知其究竟，庶回洋时可报告侨胞。及到延安后，关于国共磨擦事，据该方表示，愿极力退让忍耐，避免分裂，以枪口一致对外为目的。时彼强此弱，余相信其所言系事实。除此项之外，余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已将军队扩充至二十余师，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回到重庆时，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为“西北之观感”。余对军事一字不提，对政治方面，颇详述见闻各事实。国民党报对余演讲词，俱不登载，独新华报登载甚详。国民党人由是对余大不满意，蒋介石之不满更形露骨，以何应钦名义电令江南诸省当局注意余之行动。及余入闽，查出陈仪徐学禹祸闽惨重，电请蒋介石撤废闽省苛政，但结果被拒。余经西南各省，召集福建同乡会，图团结救乡，出国后至南洋各埠亦然。从此之后，蒋介石及其军政机关等即与余断绝来往。

       民国卅一年，日寇侵陷新加坡，余避匿爪哇，乃著《南侨回忆录》、《我国行的问题》及《住屋与卫生》。民国卅四年十月，余回新加坡。在其时国人对国共会谈妥协合作事，多抱乐观，余独不以为然，盖君子与小人，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及全面内战发生，美国政府极力帮助蒋介石，增长其内战之野心，甚至驻海陆空军我国土，余乃发电致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参众两院长，反对美国助纣为虐及驻军，并警告多行不义必败，请彼等以日本德国为鉴戒。因此，马来亚各处国民党人机关及报纸，对余百方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谩骂，遍贴标语，惟全马诸民主派，及劳动界，妇女界，青年人等，愤恨不平，在各处亦召集大会，拥护余之通电，其他侨民表同情者亦众。荡动月余，国民党人及党报乃消声。详情载在《南侨正论集》。当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尚未开办，所有各报多偏于国民党人方面。吠影吠声，势所难免。及南侨报开办，全面内战正剧，余故屡发表意见，以告侨众。现蒋政府即将倒台，全国即将解放，革命大功瞬将告成，余乃续著一书，名《民俗非论集》，以贡献我新民主政府，兹当回国观光前夕，爱将三年来发表意见汇印，名曰言论集。

大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一日

陈嘉庚

    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要我作一篇自传。自维一介侨商，非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贡献宗邦事业，愧不敢当。乃荷续函催寄，语重意诚，过却恐涉不恭，谨书稍关实业教育及侨情数者，聊以塞责。

我为福建同安县人，世居集美社，距离厦门水途数海里。九岁入私塾，十七岁第一次南来新加坡，随同先君从商，二十岁首次回梓完婚，二十二岁第二次南来。二十五岁第二次回梓。二十六岁第三次南来。二十八岁第三次回梓。三十岁第四次南来。三十一岁始自经营米谷，号曰谦益；同时并创设波萝罐头厂。三十二岁买山地五百英亩，种植波萝，逐年入息不过二万元。其时南洋橡皮业甫在萌芽，乃觅购种子二千元，插种于波萝之边。三十三岁向印度人租一制造熟米厂，日出米数百担，专售印度，年余获利十余万元，乃承购该米厂二十万元。制熟米之法，系将谷用水先浸至透湿，然后炊热，落厂栈磨去壳后，印度人食米多用此法。南洋华侨前多脚气病，若食此米，则脚气可愈。三十五岁熟米厂遭回禄之灾，重新建造，损失数万元。

       三十六岁剪去辫发，示与满清断绝关系。时适橡皮价昂，将所种之橡皮园卖给英人三十五万元，复购置山地数千英亩，仍垦植橡皮，每年垫资本十余万元。三十七岁任新加坡闽侨首创之道南学校总理，加入同盟会。是年秋满清政府推倒。在福建会馆开闽侨大会，倡办保安捐，筹款资助闽省光复，被举为会长。三十八岁第四次回梓，在集美大祠堂传集乡长，告以创办集美两等小学校。及建筑校舍之要义。议定即托友物色校长教员十余人，始知同安全县，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四人，除一人转营商业外，尚有三人，即聘其二。查同安县人口四十万人，仅有县立小学一校，私立四校，学生总计不满六百名，其文化如何，可以想见矣！

       我在南洋将归之前，曾购办制造罐头机器。运回集美设厂制造海蛎，并聘到日本人任技师，结果成绩不佳，将该厂移设厦门，改作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罐头厂。

       三十九岁春二月集美小学校开幕，夏集美小学新校舍告竣移居焉。我于夏秋之间，出游同安各处乡村，目击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询之乡长有无设教，咸云旧学久废，新学师资缺乏，经费奇重，无力创办云。我听其言，深感闽南数十县，同安如是，他处可知，若不亟图改善，恐将退处于太古洪荒之世，岂不可悲？顾以能力有限，时萦脑中而已。是年秋第五次南来，扩充波萝厂，四十一岁适欧战发生，船运不便，货物积滞，大感困难。几乎有停业之虞。四十二岁租期限轮船四只，川走南洋及印度等处。四十三岁购置轮船两只七千吨，出价一百万元。航行欧亚，曾往浦口载运华工往法国。秋将一部份波萝厂。改作生橡皮厂。并命舍弟敬贤回梓建筑集美师中校舍及创办女小学。四十四岁复将熟米厂改为生橡皮厂，规模扩大，并直接推售美国，较之就地售于洋商，获益不少。

       四十五岁春集美师中学校开幕，夏秋所置两只轮船，因欧战关系，沉没于地中海。收回战险赔偿费一百五十万元，冬购置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四十万元。并购拓山地数千英亩，垦植橡皮，复在霹雳邦之太平埠及槟榔屿埠，设生橡皮分厂。同时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四十六岁集美商科及幼稚园开办。是年本拟长住桑梓，致力办学，不复南来操心商业，故南洋商务稍事收束，计其时如除还债务外，剩资产四百万元。按逐年入息，尽数提归办学之需。秋五月第五次回梓，七月假厦门陈氏大宗祠，传集各界倡办厦门大学。其目的系要求最优美适宜之演武场官民山地为大学校址。

       四十七岁集美女师及水产学校开办。夏聘定汪君精卫任厦门大学校长。迨秋间因陈总司令炯明，由漳州领粤军回粤。汪君乃来函告辞。十月我往上海邀同余日章，郭秉文，李登辉，黄炎培，胡敦复，邓萃英，黄孟奎诸君，开厦大筹备委员会议。

       四十八岁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假集美校舍开幕成立。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奠基。秋驰函新加坡将第一生橡皮厂改作橡皮熟品制造厂。

       四十九岁二月厦门大学移入新校舍。建造集美第一渔船，为水产学生实习，费款三万元。三月第六次南来，原拟稍住数月，重行回梓；迨抵埠后，鉴于生橡皮厂同业竞争之剧烈，不得已取消来意，即往马来亚橡皮出产地，创设分厂九处。大半系承购旧厂改革，同时并扩充橡皮熟品制造厂。

       五十岁集美女中并幼稚师范开办。是年新加坡寓有同邑人爪哇大富某侨，拥巨资数千万元者，因代厦门大学向他捐募，不纳。五十一岁往游爪哇。创设分行数处，在万隆泗水二埠，遇两位乡侨，各积有资产数百万元。年纪已大，皆无子嗣可继承其业，然我恐曲高和寡，不敢奢望，但请捐建厦大图书馆舍一座十万元，亦竟无效。

       五十二岁集美农林学校开办。向法国购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三百余吨，价七万元。是年英政府限制橡皮出产，价值大涨。乃卖去第二次橡皮园二千英亩，银一百四十万元。转购入数段七千余英亩，银一百五十万元。其年生橡皮厂获利四百万元。冬间函告厦大集美二校长，新年可增加经费，扩充设备，并拟捐建厦门福州上海三处图书馆。计其时除债务外，剩有资产可一千二百万元，拥有橡皮园一万五千英亩，每亩现年可入息一百元，姑如减至五十元，全年亦有七十五万元。其他营业人息亦属不少，自以每年担负教育义务一百多万元，不为过举也。

       五十三岁春复购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六十五万元，其地距离新加坡市区仅六英里，又创设牛皮厂肥皂厂，造纸厂。（纸厂不成耗去定购机器银二十万元）夏秋之间，橡皮市价大跌。上半年各途营业又多失利，审度时势，绝无乐观之希望，不得已停止集美校舍工程，驰函取消图书馆之筹备，此为我一生最抱歉，最失意之事件。

五十四岁卖去第三次橡皮园五千英亩。价银三百五十万元。虽获此巨款，然不敷两年来之支出，故难免处于困难之景地。

       五十五岁济案发生。倡办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其时全侨抵制日货至为剧烈，我所办之南洋商报，因登载某家某日到有大帮仇货，对方竟以此含恨，致橡皮制造厂重要部份，突遭其回禄，损失六七十万元，更以抵制日货之故，日人大肆报复，有组织之同类物品，贱价竞售，受创尤大。

       五十六岁卖去第四次橡皮园六千英亩，价银二百六十万元，除还债外，所剩无几。从此之后，橡皮价值日败，橡皮园乏人承手矣。

       五十七岁至今四年间，各途营业更形惨败。土产败市，产业贬值，不景气之严重，自有新加坡以来所未有，亦世界所未有。损失之巨，毋待赘言。

       自五十三岁迄兹八年，江河日下，入息毫无。盖诸营业中，唯生橡皮厂最为有利，而前服务诸伙友十多人，相继离去作同业之经营。各银行更供给款项，至七百多万元。故资本宏厚，竞争剧烈。致数年来优美之利权，完全丧失，至银行何以容易相信彼等而投资，因凡许售欧美橡皮，买客当由银行认来信用票，银行以票利厚，故争相放款耳，竞争诸旧伙，大半已于前年失败，银行损失亦甚巨，现存数家，亦曾经过困难，但因价值低廉，资本短小，难期发展，然在马来亚市场上最活动者，莫非旧时伙友也。

       我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更鉴于吾闽文化之衰颓，师资之缺乏，海外侨生之异化。愈认为当前急务，而具决心焉。集美师中初办两年，四易校长，外人不知中间苦况，每多误解，且或讥为商人见异思迁，然敷衍潮流，较之实事求是，相去悬殊，故不得不彻底改革。我在厦门鼓浪屿，遇一富侨在其乡里办一小学，附设师范科两班，甫仅数月，纠纷枝节，告我曰：“唉，吾侪当时以为赚钱难，今日方知费钱更难也”。

       集美中等学校，开办时系注重师范，次及中学实业等科；因鉴于全闽师资之缺乏，及严求师范生毕业后人人须能实践教职，故首期招生，不便造次，乃函商闽南各县劝学所长，请各保荐合格贫生，及志愿将来任教席者五名，其待遇则较政府所办者为优。如此设施，经数期后，师范生在学者数百名。

       闽南地瘠民贫，海多田少，对于水产农林，故特加以注意。其初拟先办水产学校；民国六年，资送吴淞水校考取第一名学生，往日本留学，毕业后服务集美水产校。开办后又恐毕业生无出路，乃向欧洲购买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使其出海捞渔，三四天后满载而归，成绩甚佳，所得之鱼多为帆渔所未见，迨开市发售，每次须七八天方能卖完，缘闽南交通不便，不能急运内地消售，而厦门一隅销路短少，供过于求，且冰块昂贵，利不及费；不得已，乃令该渔船驶往上海渔捞。厦门大学创办之起源，为鉴于闽省中等师资之缺乏，盖小学师资既有集美学校可负责，而中学师资，则尚付缺如，然大学要办理稍完备，需款浩大，非千万元以上不为功。窃以南侨之富，若有宏愿者出，则三数人之力已绰有余裕，且百尺高楼从地起，要彼先筹现款，而后创办，度今之势，无日可成，故我不计成败利钝，勇往进行，最初准备三年内，捐输开办费一百余万元，待规模稍具，引起侨界信仰，然后奔走南洋各埠，筹募巨款，以闽侨之富，目的不患不达也。

       向人募捐办学，势有不同，如办中小学，可以沿门劝募。半由情面，半出本意，多者千百元，少者数十元，结果筹有数万元，或多至一二十万元，便是最佳成绩。可以作基金，可以抵多年校费，至于大学募款，则似不然。凡殷富之家，须了解人群责任，及社会义务，才能自动慷慨，虽出于厦门之劝募，亦当由本身热诚乐输，如此则少者数万元，多者可至数十万以至百万者，则规模方能远大，倘其人不解国家社会为何物，人群天职为何事，拔一毛亦难，况巨大捐款乎？

       厦大集美两校，十余年间，我各捐去四百余万元。集美从未向人募捐。厦大前年曾由林校长文庆，向黄君弈住捐办图书册三万元，又曾君江水捐建图书馆一十万元，又叶君玉堆捐款五万元，又北平文化基金委员会，年补助理化科三万元，国府于民十八年秋，按月助款五千元。自东北事变以来，所交不及半数。去年厦门之厦大协进会，并林校长来南洋捐募。合计约募得二万元。

       南洋华侨素称爱国，然对祖宗庐墓所寄之桑梓，理宜更加注意。西哲有言：“凡有诚意为公益者，必须先近后远”，查闽南富侨，在南洋未遭不景气之前，约可千家以上，若每人能在其故乡办一小学校，或数人合办一校，按年每校津贴费至多不过一千元，则闽南何患教育不普及；而事实上乃等于凤毛麟角！民九我在集美倡设同安教育会，其目的在图同安小学之普及，而向南洋同侨筹募年捐，按每年增办三十校，十余年间全县可以普遍，甫办两年，成立四十余校，每校年约补助费六百元，在新加坡募有年捐二三万元，他埠尚未进行，迨收款时，成绩则不及半数，或完全推诿，或交不及半，于是巧妇难作无米之炊，原定计划，终成泡影。

       橡皮熟品制造厂之创办，我亦为一种理想之提倡。二十世纪称为橡皮之时代。欧美之盛，固不待言，岛国日本亦已设厂至数百家，独我国则尚未萌芽。新加坡为橡皮出产地，且距离我国不远，男女侨胞数十万人，若能设备大规模制造厂，不特可以利益侨众，尤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如化学，工程，技术，机师，人才等等。须经长时期之训练，为教育之造就师范生，应有发展林立之可能，故锐意进行，当时聘到东西洋技师多人，教练工作，凡各种车胎，靴鞋，雨衣，及其他用品，无不研究制造，前后垫去资本银八百万元，雇用男女工人六千名，分设发售处八十所，乃遭不景气之损失，及日货贱价倾销之竞争，致一切皆遭受打击，陷入困难之境地。

       我在此三十年间之经营，统计所入赢利，米业约五十万元，波萝厂一百万元，轮船一百五十万元，橡皮园四百万元，生橡皮厂一千二百万元，共一千九百万元。至支出之数，厦大集美两校八百万元，利息五百万元，橡皮制造厂亏损四百万元，牛皮，肥皂，造纸，枋木厂损失七八十万元，地皮产业亏折一百万元，共一千八九百万元。我之个人家费，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值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今日资本实力丧失迨尽，而校费极力缩减，现状尚可勉强维持，善后问题，则茫无把握矣。或谓我当时校费若早缩减，可免今日困难。语虽近情，然我则否认是说，盖自不景气来临，平素较我殷裕者尚多，既无如我之负担，乃现下之困难，固亦不减于我，且更有甚者，又何说焉。自古英雄豪杰，何尝不遭艰危落拓，况我乃一庸愚侨商，安敢妄事怨咎，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辱耻”其言足资警惕。愿国人勿引我之困阨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

 闽南华侨不下数百万人，不亚其他繁盛区域，何以闽南社会仍属衰落，民生仍属艰难，乡邦事业，实际似无裨补，推究其实，殆有三种原因，一则此间乐不思蜀，绝无祖国观念，及身如是，后辈可知。一则入只供出，或所人有限，无资可以寄归。一则固富有资财，不忘乡梓，虽挟资回里，不过建华屋，蓄婢仆，锦衣玉食，交结权贵，阔费大豪侈，导变风俗，或则放钱债，高利息，购良田，独善其身，无民生之观念，无社会之利益，且田地有限，原为农村生命线，一归大地主，则农民不能自存，至贫民借债人手，多作不正当之开销，结果财产俱亡，其流弊酷烈，转出富侨之所赐也。

       过去华侨在祖国称可获得荣誉者，缘华侨较之国内居民，资财比较丰裕，故对于义务捐输，亦比较容易，逐博得爱国荣名，几乎华侨不归，如吾闽何。自民国成立后，各界同望华侨运资回国，振兴实业，大利民生，而尤以吾闽人为甚。若究其实，虽不景气未来之前，亦如画饼充饥，徒拥虚名而已！盖少数义捐，集腋成裘，乃普通人容易做到之事。对于精神上，营业上，绝无关系。较之倾家产，运巨资，归祖国，舍熟就疎，艰难辛苦、与新事业奋斗者，殊有天渊之别。至华侨拥有资产之人，现下可分两种：一种侨生承先人遗积，富者尚在不少，此辈久已忘祖，安有祖国观念？一为年在四五十岁之老客，经久年辛苦奋斗，始成艰难缔造之事业，多属不动产，或商场货账，虽有现资不过十之一二，使其热心祖国，亦仅衣锦回梓，省视庐墓，或稍息尘劳，或游历观光，目的不过如是而已。谁肯舍半生在南洋已成之事业而另图未必有利之新事业耶？

       我久客南洋。对于侨情颇知底蕴，既不欲祖国空费无益之期望，亦不愿侨众辜负国人之推荣。故凭我良心上坦白无隐，据实倾诉，功罪均不之计。虽然，华侨之于祖国，亦非绝无乐观之可能，以我鄙见，约有三事，若能达到，则华侨决不负国人之希冀！

（一）政治纳人正轨，地方秩序良好，无军阀劣绅土豪之欺凌。

（二）交通略已发展，利便新事业之建设。

（三）独资创办或组织股份公司，成绩稳健，利益优厚，则利之所在，人必争趋，而华侨之投巨资归祖国，势如水之就下，即平昔乐不思蜀之流，亦必倾资而乐于归化也。

**新加坡华校历史沿革**

**星洲道南学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11.1936**

       潘校长、各位教师、各位董事、各位来宾，本人对于新教育，为一门外汉。惟本校为福帮所办，本校历史，则所深悉。“有教无类”，办学而分帮派，本可勿须。而事实上本坡华校，则殊分帮办理。此中底细，少年人或未详悉，老年人多能道之。查本坡各帮学校，率皆创办于三十年之前。故本人今日，愿与诸君一言三十年前本坡各帮创办学校之事。

**华校历史**

       前者，国人所读，不出四书五经。读书场所，率为书房，亦称私塾。每处所读，不过十人左右。至如今日学校集数十人或数百人于一堂者，曾未之见。而于授课时间，则自上午六时半至下午五时左右。当日训蒙，着重道德。至于科学，如历史地理之类，则付缺如，盖复偏守一隅，故有所言，尽于“天下”，殊不知有世界各国。是以当时读旧学而知爱国少，受欧西文化陶冶，不在此例者，亦有可见。

**满清变政**

       再言满清，满清时节，禁锢民智。教育虽极要紧，自亦不与我人提倡。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后，痛定之余，乃思变政。于是废科举、兴学校，稍稍振作，然皆取法日本及西洋也。

再言旧学，学校振兴之时，唐山各处，固有书房。唯于南洋，则殊罕见。即有设立，亦仅设于僻巷偏远之处，迨至学校兴设，数年以后，南洋乃有纠集同志，兴办学校者。当时办学，固有出于先知先觉，然亦有出于顾全一帮体面，或出于他帮所设学校，不收异帮子弟，此则分帮办学最初现象也。

**最初学校**

       当时本坡各帮，所办学校，广府有养正，客有应新、启发，潮州有端蒙，福建有道南，琼州有育英。育英之创，时间较后。至于道南之名，则陈宝深南来招集铁路资款时所取。

       当时华校，由各帮自由筹划，分帮筹划入手较易，此固分帮办学之原因。惟当时各帮，难于联合，亦事实也。世言学校得失者，率别质量。惟今日言学校之办理得宜或成绩优异者，则多以量为凭准，至于质则未加注意。

       华侨教育，至今尚未负我前人之望，岂不宜哉！华校组织则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彼此之间，不相联络，更无所谓统一行政。夫无组织则无钱，无钱则难指挥如意，此乃必然之结果。而使之然者，国民程度太低有以致之也。若言合作，华侨中学事实上固各帮所合办，惟举董事，各帮中则有举而不认，认而开会不到，有事不管，经济拮据不瞅睬者。故知国民程度太低，欲事团结不可能也。卅年前，侨教即加统制，其结果料亦不能与华中有异也。

**侨团近况**

       总而言之，华侨社会，卅年来，实无进步。至于官僚政客，过星受人欢迎，必以“团结”之义，最我侨众。团结一事，又岂开一欢迎会即可实现耶！

       若言团结，外人霜业纸业、胶锡业之联合，始终如一，成绩卓著。反观我人，则又如何？有人谓此次马华联合寿蒋，可谓团结。实则此次所以有一百三十万元之成绩，一则出于华侨之爱国；二则出于彼此之比较；三则出于西南倒台，全国之统一。若此可谓团结，则结婚生日与夫送死、迎棺之聚集，亦可谓团结矣！今日国政上轨，建设进步。同侨于此，切宜洗心，则于自省自治之下，侨教自有通盘筹划之可能，团结一致，方有实现之一日。

**集美学校风潮与高小毕业生升学之将来**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8.7.1923-20.7.1923**

       鄙人承校长邀请对诸学生训词，鄙人非教育家，安能承领。惟集美此回风潮真相，谅为诸君所愿闻，爰报告大概，愿诸君有以教之。以鄙人之意，高小毕业生有志升学者，第一，安当有毅力求学。第二，凡事当审慎是非。第三，自己有主持能力，否则难免时势之潮流而趋于嚣张妄从之弊。吾侨子弟肄业集美者不少，凡学父兄为以邻人之言为是，请于家庭之责任勿度外置之。

       集美学校；此回风潮，其缘由为少数学生不喜校中规则严谨，阻碍其志气与男女社交之自由，乃倡设学生会以对抗学校，发周刊骂中学部女师范部主任与管理员。不数日复以“五一”、“五四”自由停课，全体到厦游行自鸣爱国。五月九日唆使童子军违抗教师命令，于是校长既忍无可忍，乃开全体教职员会议，革除为首两名，于是罢课风潮遂起，而集矢于校长，以为校长若罢，则不满意之教职员亦可一网打尽矣。

       集美学校教职员一百七十余名，学生一千九百余名。在校寄宿者约一千四百名。建筑部工人五六百名，校役百余名，合计近三千名，概归校长管辖；而校中最困难之事当推寄宿生为多务，与通学生大相悬殊，盖通学生除数点钟上课外，他非教师所干预，且上课时教授讲演面会谈譬，师生感情，较为浓厚。若寄宿生者另有专员管理，虽兼教授时间无多，故不驯之生易生恶感，其管理之规则如下：

早五点半鸣钟当离床

六点赴操场列队早操

下午课后运动别订规则

九点息灯安睡不闲谈

帐被要整齐室内要清洁

每日三餐管理员陪食

晚钟七点须自修功课

往厦须向管理员请命

       他如关于社会风化卫生嗜好，管理员认为不妥与越出范围，或干涉阻止，或示戒记过。鄙人但知其略，未谙其详。究此规则有无严酷，如认为适当并符部章，则难免无诚意求学之生之恶感，盖父子兄弟间或尚有其人，况师生乎？

       不宁唯是，而寄宿生亦以中等学生为最参差。若小学生年纪幼小，任教师如何指挥训导，莫不遵命服从。否则当为大学生年纪，程度阶级较高，设有少数乏诚学之生，或狂谬过激之辈，同学中自有辩其是非能力主持，决无相率妄从。唯此中等学生，既失家庭之教育，复乏良好之小学，立基不善，办理惟艰。加以血气未定，自由误解，以罢课为爱国，以不敬为勇敢，既无尊师重道之念，安能爱家爱国之行。不晓权限，不计是非，乏主持能力，复以不同为耻，故一唱百和，重以劣社会不明真相，推波助澜，是以一发而不可抑止也。

       自风潮发生后，鄙人屡接多处教育社、勤学所并素不相识之人来函讥刺，谓甘牺牲千余学生而不肯去一校长相诘责。嗟乎！此语或出自他界，尚可有原，不意乃出自教育界中人，且为一方之领袖，可不叹哉？现集美校长办理三年，鄙人在家与共事者两载，深知其道德毅力学何，足以长集美而达我将来之目的。其成绩为何，为学多焚。然教职员百七十多人，系经过三年中罗致多措之精锐，而非一郡之所有。此回风潮，不讲是非曲直，而以多少数比拟，即罢校长，诸教职员，其谁不解体乎？势必重新组织，无论鄙人不能复居家求贤，含弟病躯未愈，设托人介绍得贤如现校长，亦必再压三年乃无此现状。则该三年中务退阻进，其牺牲为何如耶。况贤能校长将何处觅，鄙人曾受多次教训矣，不幸不得其人，则集校前途，奚堪设想，恐其牺牲或当十倍于此回也。

       至于牺牲千余学生之说，更觉谬妄。盖彼辈若甘自废学，作乏程度之国民，虽留之集美奚益，或即足以捣乱耳。若果有诚意求学，试讲闽南中何校可容其不来者几希，就使有者，均属教育，何牺牲之足云。若果如来函与某报馆社会之言论，当依多数学生之意旨更动校长，以迁就之，则校中规则亦当任学生可否；而教师当奉迎听命于学生，管理员可以免役，此后学生便可趾高气扬实行自由之目的，而校中可以省许多经济，鄙人何愚而不从。弟恐失教育之真相而负学生父兄之信仰，否则更动校长，为鄙人之惯技。集美开办未及三年，四易校长。厦大成立，仅一月便辞校长，兹何劳学生之要求社会之推波助澜哉？总而言之，教育非仅读书识字，而尤以养成德性裨益社会，且不忍血汗微资，贻害青年，并问我之天良与实事求是耳。

       附录前电如下：

       校长鉴：请主意便是或商敬贤。

       校长鉴：仍如前年罢学生，决无许先生辞职。切盼毅力支持。如果出于不得已时，仍提前放假。

       校长鉴：过度时代，蜩螗嚣张潮流难免。吾侪职责创造兴革安可轻弃？请宽怀视为常事。余意逐生诘去留，愿去听来秋招生，取缔保金三十元，勿以生多为意。

       校长敬贤均鉴：曩数易校长，前车可鉴。若轻易更动，集美恐无宁日。我兄弟又未暇兼顾，况权操学生，教育何在，余绝端反对。

       校长鉴：任学生如何嚣张，各界如何推波，本校但以冷静处之。秋季来生愈寡愈妙，余虽不能迁就，深愿彼辈转学他校以达目的。请将前后中文登报以明决心。

**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18.6.1918-20.6.1918**

       南洋华侨中学，亟应筹办之要义，前既迭发通告，谅早在诸君洞鉴矣。回忆数年前鄙人曾具意见书，倡办中学无有之者。嗣复有人，提倡此举，鄙人又首先签名赞成，乃竟徒托空言，不久仍无声无息，心灰意冷，亦只徒唤奈何耳。迩者同德书报社请君特举代表，重以此只徒活那人，而鄙人欲偿夙愿，遂不顾棉薄，毅然为之那不辞。然恐经济无着，未敢冒昧，爱先谋之同志，得万余元，合诸国风幻境演剧捐助万余元，共得五万元之款，乃遍询各校总理，佥得同意，故敢登发通告，召集大会。今日蒙各界诸君踊跃惠临，不吝雅教，鄙人无任欢迎。所谓谋得同志之款者，鄙人亦参与其列。兹将认款诸君，按名报告。计马六甲埠曾君江水壹万元，小坡新协兴钟水泮二千元，恒利号暨林义顺、叶大炮、叶玉桑、邱国瓦、陈先进、张顺善、薛武院诸君各捐壹千元，鄙人凑捐壹万三千元，合国风幻境壹万七千元，共计五万元。至中学应合办之理由，试略言之。若小学兼办中学，无论能力之办到与否，弟以鄙人梓里所历办学校之经验观之，断然不合，盖中小学两部分，教员之资格既有等差，而学生之年龄，又相悬殊，种种困难，不胜枚举。两校不宜混合，必须距离，方为两便。不宁惟是，中学生如仅有一二班，每生年须垫款百元，其经费之浩繁，岂得支持长久，此南洋中学尤不容不合办也。诸文明国教育，除幼稚园外，七岁入小学，十三岁升中学，四年毕业，至是十七岁。即不人专门，其智识技能，亦足自营生活于世界。乃吾人不注重中学，是无异培养子弟至十三岁止，而欲责令自立，勿论无此能力，倘非最贫苦之家，其父兄决亦不如是之忍也。

       至南洋小学之不甚著效者，以无总机关为之比较耳。苟中学成立，使其有所进步，浸假而改良之，则小学之获益实非浅鲜。或云小学毕业入中学者殊罕，是亦莫怪其然。诚以前此华侨子弟多半幼年失学，十余岁始入小学，迨毕业已十七八岁，故鲜有中学以上之志。今则勿虑及此，盖迩来小学生在十龄之内者几居过半，就本坡而言，可在千人以上。此后按年毕业是有百人之外，吾侨如不早为之所，其贻误后生，奚堪设想。美教会近已实行筹办英华大学校于本坡矣，校中兼设华文一科，他日我华侨中学毕业生，有志升入该校，纵英文不及格，亦可先入预科，或我中学增设英文科，抑要求该大学特聘华文专门师为教授。以该校之设，我华侨捐资为最多，且有多人参董其事，来日方长，尚多前途希望也。谚言：“有财不乐则愚”，其语似有价值。然以鄙意度之，要当以国势为判断，在吾侪丁此存亡之秋，忧国之不遑，奚遑娱乐，故有财宜输教育为急务。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乎。日本某杂志云：“英美德法诸国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国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的人中则占九十六人，识字者仅百人中四人而已。”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其数尤巨，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非全倚靠政府也。我国政府既不注意教育国民，复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致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于今日，此诚堪痛哭流涕者。我侨胞久慕文明，号称爱国，而富商巨贸又不乏人，万勿放弃天职，坐待沦亡也。

       昔日本之兴也，提倡教育，亦不过数人耳。幸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任耳。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况属救亡图存，而可不猛然省悟乎？设输出百余之五，或百余之三，试问何损于富。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孙贤，何须吾富。同侨君子乎，须知贤而多财则损志，愚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古人之言，岂欺我哉。以鄙人久客本坡之观察而言之，华侨中以三数人之力，输出百余万元办一大学，或以个人之力，输出数十万元，办一中学，尚且绰有余裕，况合众人之力而仅办一中学乎？惟在我华侨肯为不肯为耳。现虽筹有五万元，然以之供开办费，并两年维持费斯可也。若更谋伟大之建筑，则必购数英亩之地营宿舍讲堂数十座，容生额数百人或近千人，核其经费者在二十万以上。似此区区，以内外各埠侨胞之踊跃捐输，实不难咄嗟立办。倘误视中学已经成立，便可卸却仔肩，则误矣。至于常年费问题，按每学生除收学金外，每年补垫六七元，若五六百生徒年须垫出校费四万余元，设要筹捐基本金收息抵额，非更捐六七十万元不可。许多巨款，实难办到。然以鄙意计之，果能变通办理，则有恃而无恐。何以言之，敝帮道南学校，此次有月捐，年可二万元。福建会馆之天福宫余利半数，年可得三四千元，除道南年费八千之外，尚可存款万余元待请诸认捐者。按年酌量拨助一半或三份之二，抑或全数，想其乐捐教育费必不限定中小学，而乐于赞襄也。其次则本坡一公众社会产业数十万元，逐年入息万余元，亦可要求按年输助数千元。以公共积贮之财提出公共重要之费，想该会同人热忱公益定当赞成。又次尚有贵粤帮并外埠侨胞，若不作一次捐助巨款，则仿道南学校之办法，按年认捐若干，俾得永远维持，似此众志成城，尚可忧常年费之不足耶。同侨诸君，若不以鄙人之言为过当，请各抒毅力以图之。他日者莘莘学子，进步有期，上足以谋国家之福利，下足以造社会之体祯，是则鄙人所昕夕馨香而祷祝之者也。

**陈嘉庚筹办同安教育**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1.1.1920;2.2.1920-3.2.1920**

       延谦、金练、淑恭、大炮、仪卿、俊秩暨同邑列位先生大鉴：近阅叻诸报悉，诸公热诚公益认捐巨款拟重设南洋公学于我同城之内，弟无任感佩之至，兹就吾同教育状况及将来计划条列如下：

       吾同教育之现象，现小学校全邑只县立一所，集美一所，阳翟、曾营各一所，崇文一所，共五校。崇文、曾营生徒无几，县立腐败均无成绩可言，阳翟已建新校舍并经费大半由弟帮助，及集美两校略有些成绩可言，杯水车薪，正为是言也。前灌口凤山学校，马巷原有之校，炳州、曹蟳、藩涂、板桥、高浦及他约有十余二十多校，迄今停闭迨尽，其中多云经费不充。以弟所知不尽乎，此大半关于校董之初意不善，无注重实际，故聘来教员与同款宗旨，设有好教员亦不肯任此无实际之校，况好教员难觅者乎。推其致败有三，首为董事，次教员，三经济，全邑数十万人而学风如是可悲之甚。

       教育会：弟意诸公如果以桑梓为怀，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立一教育会，然后逐渐扩充推广。凡我教育会补助者，必服从我指挥，听我调度，而我必时常派视学员考察，如此统一调理，庶几有一线之教济希望。倘蒙同意则前日在功诸公倡筹南洋公立学之指款并入教育会，再行推广募捐。缘题目较大，属全邑命脉，劝同邑诸侨胞鼎力加捐，而弟愿首为之倡。则以弟并含弟名义，认捐开办费一万元，常费逐年五千元。教育会暂附于敝校或他处，由诸公指定。

       新加坡董事部：捐款概用同安教育会名目，凡同安辖下之商店人家，必要向捐开办费并年费，收入之项，积存于叻埠生息，待教育会告汇应用若干，然后寄归。教育会逐期当列表报告，其章程乞从叻诸公订示。

       补助费：不分畛域按谱补助，若城镇许从会中开办学校，除收外不敷，概从会理足。若村落社里则用补助法按每班补助或每生补助，由教育会视其成绩酌衷，或贫富为标准，此为不得已之补助。若其社有热心家或殷实家自担得起，不愿会中补助更幸。按应开校费国民级每班年三百元至三百五十元，高等级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每校八十名，约开一千至一千二百元。按补助五百元至六百元，学生每名收四元，即三百二十元，不敷二三百元，令自筹。

       校舍：教育会决不能代建新校舍，且亦乏许多项，唯各就其庙祠修理暂用，此乃必然之势也。若其社能自筹建果属不敷，会中拟补若干，由叻董事部议其可否。

       捐款用途每校修葺开办费约成千元至千余元，设三年内能筹三四万元，不外创办二十余校至三十校，照现下汇水须八万元。至年捐补助费，每校五百元叻银一千元，若三十校年捐须有三万元。

       小学教员：堪膺校长教员论理须有师范毕业生，吾同现下算甚缺乏，故本年难于实行，若来年便可着手。因敝校本年秒可毕业四十名，除学生自敝社需用外，按作三十名，可以分配十外二十校。每校如用教师三人，尚欠之数，可从他县觅聘或中学毕业并旧学者是也。再后逐年敝校师范生毕业尤多，俾得逐渐推广。一年如得增十校，十年可增百校矣。若无教育会为督理机关，则如叻校之涣散，要望成绩优良甚是难事。如办理得法，则吾侨赞助必无限量，此举关系前途匪轻，盖小学如发达，其毕业生则入敝集美师范中学必能特别提携，异日更可选入大学，其关系非细。倘蒙不弃，弟当力负责任以尽天职。

       交项之日期：募捐可从近间实行，并分推各埠鼎力认股。如开办费大都本年秋后方有需用。凡认捐之人，作一次交或作两三次交均可，总订至迟秋末收清。至逐年年捐，或由本年七月交起，则先收半年以作基本。如何之处，乞为良裁并侯。

       公安

弟陈嘉庚谨启

九年一月十号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1.1920;1.12.1920**

       鄙人之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者，其原因有二。（一）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二）南洋实业，日益发达，其进步之速，实有一日千里之概，而土地又大，未开垦之地颇多，各国人侨居于斯数，首推中国。则中国欲发达实业，南洋实为重要之地。乃反视在南洋之华侨，广帮余不知，不敢言。请言闽帮，余乃抱悲观。每见许多华侨，多不愿回国者，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专从事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至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故余谓长此以往，华侨财愈富，具有害于中国尤深，因之乃每欲设法援救之。援救之方法无他，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至于现在尚在初办，究竟对于前途，为“功”为“罪”不得而知，盖事或成功，则无论矣。假使失败，则定绝其他华侨后来之路，则非但无功之可言，且将有害于祖国。是以对于前途，觉得非常可怕。故惟有谨慎从事，努力前进，以冀成功，以免有害于中国，此则甚望各省教育家之指教也。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今就中国而论，据鄙人所知而言，鄙人家住福建同安，同安教育自废科举以来，办学二十年，而今毕业者仅二班，观此岂非愈趋于退化之境。同安如此，即就福建全省论，每年师范毕业生，不过千人，平均计之，每县每年仅得教员三人。查福建人口有三千余万，平均每县有三十四万，则得学龄儿童，至少有十万，每年当有毕业生六千人。今欲以三教员教人，如何能办？故平均计之，福建人之受教育，每百人中不过一二人耳。福建如此，他省当亦如此，则中国尚有强盛之日乎？虽然，鄙人前二月在福建，遇教育厅长，将此番意见为之呈说，乃得答话云：“省之师范学校之毕业生，尚无处安插位置，”岂非奇之又奇？鄙人于未见福建教育厅长之前，以为身为教育厅长，其见解之高，对于教育计划之周，必有高于人者。乃既见之下，实毫无见解之人耳。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三千万人民，岂不可哀？其所以致此者，不外“私”与“不认真”二事耳。福建如此矣，除江苏外，其他各省，不知如何？江苏教育，可谓发达矣。然平均而论百人中至多亦不过十数人受教育，即多至百之二三十。若与欧美较，则仍远甚。然如何而救济之，则惟望于各大教育家耳。一国之强，必先受一种之痛苦，此为过渡时代，必须经过。但鄙人对中国前途甚抱乐观，何也？因中华共和国纪念日为十月十日，此四字合成则含有“朝”字。则中国之前途，犹如“朝气”蓬蓬勃勃之现象。我人既生于此时，可不努力前进，以达此落蓬勃勃地位乎？

**华侨中学开学仪式（改组后）之演词**

**原文出南洋商报2.3.1931**

       华中此次改组，因苏维埃共产党想在华中活动，教职员及学生一二人受到共党机关金钱。俗语说：钱能使鬼通神。苏俄有钱便可利用一二不良的教职员及学生为非作歹，捣乱鼓动风潮，多数学生不知，卒被所利用。

       制造学潮及不良学风的罪魁是学生会。学生会的罪状有四：（一）不承认中华民国。国庆时，学生会竟不参加庆祝典礼；（二）谩骂董事，侮辱教员，这可从过去学生会所创办的墙报看见；（三）种种无理的要求。新董事就职尚未数月，学生会的要求竟达七八项之多。所要求的大半事实上无办到之可能；（四）煽动本坡男女各小学校，组织与其性质相同之学生会，以与各校当局为难，有危乎本坡华人之教育。本来华中校风之坏，并非始自新董事接任之日。此次学潮，固有错误，但却不能负完全之责任。

       学生之跋扈无理，及其行为均有违当地之法律。董事本身事前曾加警告，但所谓学生会之领袖，竟视若耳边风，嗣后卒发生不幸之事，良可痛心。

       今后学生应专心念书，抱定宗旨做有益社会的人，切不可再有过去不端之行为。学生会为制造罪恶之机关，学校不能再允许其存在。如学生有谁敢再倡办学生会，既立刻开除。

       学校之经济目下十分困难，来华中做董事并无权利可言。董事多半负着筹集款项，维持校务之责任。学生所交之学费，是不够学校之开支。学校要再为每个学生负担一半。学校负担如此重大，学生如再不努力求学，似乎太对不起一般出资维持学校之侨胞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居留政府已声明，不能再容许华中发现第二次共党活动的事。如再发现，那时学校生存将受绝大打击。此话我姑妄言之，诸君亦姑妄听之，信不信由诸位。

**本报开幕之宣言（注一）**

**（实业与教育之关系）**

**原文载南洋商报6.9.1923与7.9.1923**

       鄙人倡办本报时曾有宣言，谓实业与教育，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虽略陈梗概，尚有未尽鄙怀者。爰于本报开幕之日，谨将所蓄之意，冒昧陈言，罄而就正于阅报诸君子。尚祈勿吝教，锡以针砭，是岂特本报之幸，抑亦实业与教育前途之大幸也。

       鄙人未研究商学，何敢言商，又非教育家，更何敢言学。惟内观国家过渡时代之艰危，外鉴列强文明事业之焕发，未尝不咨嗟太息，独怀生感，而弗能已于言者也。

       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兴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其物品优良，大促供社会之需要，博国际之欢迎始是以居商战之地位，执其牛耳矣。其经济上势力与精神，尤能辅助国家，以培育无量数之人材，而使其互相利用获益者，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中其焉。

       反观我国人之所谓商者，不特对商业上各种原理，茫然不知，即对于商业上各种常识，亦付缺如，而徒拥虚名，听天由命，因人成事，甚至一身命脉，均操纵于外人，而不克自振，此固无可讳言者也。似此资格，何足与言商，何足与言商战，更何足与言商战中之寓夫学战哉。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

       吾人深知此弊，以为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然我国兴学至今已二十余年，用心不可谓不专，为时不可谓不久矣，而乃环顾国中各校，成绩有何可观。且有感触现状，咎新学之误国，而反加厌恶之者。吁！良可慨矣。

       兴学缺乏成绩之原因，大都因于经济之缺乏。盖经济缺乏，则教材不足，教材不足，则成绩自无可观。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如能从根本上统筹预算，全国教育成绩，定必蔚然可观，又何至今日之幼稚哉。

       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以教育言，有良好之大学，自有良好之中师。有良好之中师，自有良好之小学。譬植树焉，不培根本，枝干何处发达，理势然也。

       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财政尚不困难，即一省设一大学，每省年费数十万，亦属不难。即就国中分区，设立数大学，统计年费不外数百万元，乃当局不此之务，徒斤斤然以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为事。殊不知每生留学，年费当在二千元以上。国中自立大学，每人年费不出三百五十元。舍近图远，去少就多，漏巵至今，不知凡几，可胜歎哉。

       时至今日，我国中之所谓大学，除外国教会所办者外，只有北京国立大学，至今垂二十年矣。年费至数十万，生额二千余（注二）。所有科目，几称完备。而各项科学之重要试验物，成立较久尚付缺如，不特学生不能实受科学上之精神，即教师自身，亦多历久而失其固有之学问。盖学问与时俱进，研究无穷，进步亦无限，教师尚且如是，况学生乎？民国以来，时局蜩螗，日滋扰乱，军阀伟人，地盘权利迷其心，更何暇注意兴国之根本。夫当局诸公，既不足与之言兴国，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一任教育前途之涂炭。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爰将厦门大学之预算，胪陈如下：

       厦门大学，现时生额五百人，此生分作三期。设备，每期以五年为度，首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三百，至第五年，在校学生可二千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一百万，共五百万元，为苟合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二百零二万元

（乙）建筑费一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一百四十八万元

       次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五百，至第十年，在校生可四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二百万，共一千万元，为苟完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五百一十七万元

（乙）建筑费二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二百二十三万元

       三期五年，每年添报新生八百，至第十五年，在校生可八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四百万，去二千万，为苟善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一千零二十五万元

（乙）建筑费四百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五百七十五万元

       统计十五年，经常校费一千七百四十四万元，建筑费八百万元，科学实验设备费九百五十六万元。倘或未能达到充分之预算，而欧美各名厂，每有其发明之机器，必尽先捐助以资试验，亦未可料，由此一笔也，为数亦属不赀。再后五年，距今二十年，前后毕业生，可达二万余人，俱属各省优秀份子，合而陶铸诸一炉，其资格程度，较之留学外洋，何多让哉？以二万余人专门大学之毕业生，分配于各省重要机关，如农工商学政议各界，各要职，纵未能充份布满，较之今日人才乏缺何啻天渊之别。且其时民智更开，实业与教育，愈益进步，人民有自治之能力，何军阀伟人之足道哉。以上之统筹预算，为期延至一二十载，为资不过数千万元，以少数人之力，自觉靡易，合多数人之力，亦觉不难。况按期分年，增高继长，进行由于积极，并非一蹴而成也。虽然，树人之难，古有明训，若无多年之筹备，虽一时拥有现金千万，亦难免无欲速不达之虞。今我国人，不求根本之解决，而徒希望实业之发达，教育之进步，与夫政治之改良，其又何时可得耶。纵此而观，教育之必需经济，经济之必赖实业。实业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也明矣。我力至微，而望乃至奢，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与其苦心孤诣，一意独行，何如大声疾呼，广招群应。我南洋侨胞乎，我南洋资本家乎，其有关怀我祖国，欲求兴国之根本乎，对于厦门大学之前途，其将作如何之感想乎。

**闽省教育**

**欢迎厦门男女篮球队茶会上致欢迎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4.8.1933**

       前日工厂中职员陈当来君告余，谓贵队诸君泰半为厦大集美两校学生，欲与余会面，余以厂内办事处地方狭小，故约定假座怡和轩俱乐部相会。今日彼此相见，余至引为欣幸。

       余此回南来已十有二年，未克回梓，此为余一生南来最久之期。虽寝食思乡，无时获已。无如时势不顺，心与愿违，致与厦集两校师生，久已无缘一面，未能一表衷曲，然余固念念不忘于厦集两校之师生也。今日幸诸君为球赛南来，辱临相会，谨略表衷怀所积，籍资谈助：（一）关于创办厦集二校之缘由及经过之景况，以备诸君回国后同学中有询及时，资以转白；（二）凡为闽人应注意吾闽教育；（三）诸君均属青年，前程万里，且与厦集颇有关系；对于南洋社会之接触，必有许多感想。余亦不忍缄默无言，顺进所见。上列三者为所欲言之大旨，以大概括言之，不逐条列举焉。

       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平生尤最服膺美国汽车大王之言曰：“正当之失败，并非耻辱，畏惧之失败，才是耻辱”。

       民国光复后回梓，创办集美小学，始觉吾闽教育之颓废，教师之缺乏。全省师范学校，仅闽漳两所，学生不上三四百名，且毕业后多非服务教育。就同安一县而言，亦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三四人，小学校仅有数间，学生不上几百名，而师资已甚形缺乏。同安如是，则闽南各县可想而知。

       余曾于暑天时，往游各乡村，见儿童裸体成群、或游戏、或贴博，询之村人，咸谓私塾久废，学校又无力游办。余思此惜形，如不改善，十数年后，岂不变成蛮野村落者乎？此为余办学之动机也。民国七年，余因欧战机会，入息稍丰，乃创办集美师范学校，附以中学及水产学校等。然兴办后，乃觉更苦，盖中等师资尤为缺乏，故于民国十年再创办厦门大学，此为余办学之经过也。大学欲稍事完备，非千万元巨款不为功。余意待兴办两年后，略有规模，则向南洋富侨劝捐巨款，不料同志乏人，未能如愿；而数年来复遭不景之损失，致经济困苦，至于极点。对于厦集二校，虽能勉强维持，然进步毫无，大负初衷，惭歉之怀，真有不胜为诸君道者。乃于不得已之中，恳求南京政府月补助五千元。自九一八后，发给不及半数。最近虽有省政府补助月款五千元，未知能否照交。至厦门热心家，提倡厦大协进会，其组织宣传，虽甚热烈，迄兹闻仅筹得四千元。杯水车薪，窃叹无裨于事。夫广东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年费各百余万或至二百万元，而厦大年费仅卅万元，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维持尚苦，安能更言进展。至吾闽本省原属地瘠民贫，既无出产，更无伟大工业，较之广东，不啻天壤。百十年来可以维持者，端赖侨客南洋寄资回国之一条出路。数年来不景影响，现已波及省内。余接省内各店报告及集美校董来函，谓两校新生大减，深恐此后日甚一日，其苦况更不堪言喻。吾国国运危如累卵，存亡未可预卜。然吾民族赖以维系于不堕者，统一之丈化耳。今日一人之文化，则他日可传千人万人之文化。昔波兰为强邻所灭而今日得以复国者，为能保存其民族之文化故也。

       吾闽事事落后，惨不胜言。民国初年在未有闽人治闽之前，则希望闽人治闽之得享大福。迨闽人治闽而后，希望尽违，痛苦尤甚，更思反求外省优秀者之来治。呜呼！是何因由而致于此，莫非教育不振，人才缺乏所以造成者耶。诸君身在宗邦，必能详知底细，而思有以挽救者乎？

       至于体育运动为教育中一重要之科学，虽主旨在训练健康，然对于道德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此皆重体育而忘道德之现象，深可慨叹者也。

       南洋华侨之教育与社会之风气，较之祖国，或优或劣，余未便妄加臆断。若以教育言，则当向祖国优劣如何？盖各教师多由祖国聘来，种子好则根芽亦好。故祖国教育良窳，影响于南洋教者至巨。祖国教育界所负之责任，其重要可知，此尤愿诸君深长思之。以言南洋社会风气，既较十数年前，已大不相同。不但生活程度高奢，而生活程度以外无谓之消耗，尤形加多。如娱乐场所，近年以来，社会上之地位列于何等，诸君想已明白，无待费词。若以学界体育之尊贵及体育人员之高尚言之，无论何国，亦当公认。设或误被利用，或自身用之不得其当，变为营业性质，流与江湖卖艺者为伍，其损失为如何？一入其中，同流合污，黑白难分，影响于队员身心纯洁之修养，关系尤大。例如报纸之鼓吹，观众之热烈，跳舞场之欢迎，娱乐园之招待，或更有意外特别之报酬，以意志未定之青年，受此积渐薰染，结果未有不被虚荣所惑，而走入歧途者。习俗误人，至为可長；须知人心放纵易，收拾难。脱疆之马，难期就范。诸君多在学业青年，甫来南邦，凡所接触已极耳目声色之愉快，回梓后能否影响学业，鄙人尤难免鳃鳃过虑，而愿为诸君一陈，更期诸君之能善于自处也。逆耳之言，是否有当诸君之视听，固未敢必，惟诸君谅之。

**依赖外人出资兴学最为可耻**

**陈嘉庚先生在欢送厦门大学校长**

**林文庆博士回国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7.3.1935**

       本晚为本会馆欢送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回国，谨设薄酌并请列位先生光陪，荷诸君宠临，本会馆至为荣幸。本会馆自改组以来六七年，开欢宴会者，连今晚只有两次，首次为前年丁超五先生奉国府命南来，本会馆曾设宴会欢迎，至其他个人或团体非奉公而来者，本会馆则未曾为此以示欢迎或欢送，即如林博士本人前年亦曾南来多次，本会馆对之未尝有何项之表示。独此回林博士专责为厦大募捐而来，事出于公，不但关系全省，而且关系全国，所以本会馆曾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于本晚设宴会欢送，一以表致敬爱之诚，一以显示公私有别也。

**一、捐款之目的未达**

       林博士此回劝捐之目的，报纸经有宣布，毋庸多赘，计所捐的款核国币约三十万元，折新加坡银仅十八万元而已。若依近日之汇水仅存国币二十余万元矣，（款寄本坡银行未曾随收随汇），较之兼办医农相差近半，然林博士本不辞劳苦，拟往爪哇吕宋募足四十余万元，故自前月先函吧城及吕宋闻人征求同意，然后敢往。不料两地均来书谓市景恶劣，缺乏成绩，未便应承，为此之故，林君已定近日回国。

**二、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

       此回募捐仅国币二十余万元，添办医科尚恐不敷，何暇计及兼办农科。念两科若不能实现开办，关系吾闽至为重大，而尤以我闽南为甚，盖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虽闽北有一间教会办者，然其性质恐与本国人所办者不同。且教育事业，若依赖外国人出资来办，无异自家子弟求外人代还教育费，其可耻可羞为何如耶。一九一八年时，本坡尚未有大学校，有美国教会学校校长那呀氏，提倡在本坡创办大学，拟定一百万元可以开办。据言在美国教会中，经应承助款半数，无论本坡能捐若干款，彼可出全力募足之，然最好本坡能捐得五十万元，于是鄙人首先认捐十万元，分作十年交清，已在律师馆与美教主立约，所捐之款系作汉文科基金。嗣后那呀氏更向本坡他方面捐三十多万元，且已一面呈请本坡政府注册，一面买实叻门屋并地数十英亩，价十余万元，以为校舍，后因本坡政府拒绝，事遂不行。而本坡政府乃创办现时武吉智马之大学，由此事观之，可见英人认外人来其属地办大学为可耻，古人云：“知耻近乎勇”，由此勇气之激发，故自开办大学古训昭然，吾人讵可不引以自励。况我闽南半省三十多县，人民千余万人，全靠此厦门大学之造就人才。盖有完备之大学，然后方有好的中学及小学之希望，譬如坡中最需要之自来水，必先建筑一清洁卫生而储蓄充分水量之大水池，然后可以便利大众之需要，了无疑义也。

**三、科学卫生进步与人生寿考**

       医农两科关系吾闽之重要，鄙人前日在吾庐俱乐部经有说过，斯时希望捐款能达到预定之目的。今日结果如斯，殊未能悉惬初望，故鄙人今晚尚不能已于言，希望日后资本家自动乐输巨款，以发抒储材救乡之诚意。前日鄙人所言卫生科学之进步，人类死亡率日减，则寿命当然长享，昔人有言：“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乃千年前之情形。然此语已为今日欧美科学所打破，此后诸文明国上寿或可至百岁之上，中寿或八九十岁，下寿亦可享六七十岁，而少有五十岁内之夭寿者矣。据外国卫生家调查世界人类之享寿，欧美人平均有五十四五岁，中国人平均卅八九岁，印度人平均二十七八岁。诸君试思凡人出世，经父母艰难辛苦抚养成人，且并受有相当教育，其牺牲如何巨大。至能服务社会，其人当已在廿多岁，加以十年八年之经验，与机会之寻获，至少将近三十余岁至四十岁。如以卫生家统计观之，印度人早已成塚中枯骨，至我华人亦已行将就木，即其不然，所余年限能有几多。夕阳虽好，已近黄昏。而欲效忠国家建功立业，与文明国家竞存于世界，何异缘木求鱼哉，至印度人短寿原因，鄙意不出数项，一早婚（印人多十余岁结婚），二乏卫生，三失相当之教育，四x国之害。今日我国人对上言四项危险；若从兹猛醒，尚未为晚。若但先图利己不为整个民族设想，结果唯有遗害儿孙促其短寿，何福之有耶？

**四、医农招生各学之分配**

       农科急办之需要，鄙人前日吾庐俱乐部已略言开办三年之经费，今晚所言系普及闽南办法之计划，盖若筹有充分之款项，其招生之法，可仿集美初办师范时，减费优待贫家优秀子弟，按县分配人额。譬如首期招生三班百二十名，半耕半读，每县托教育局考取保荐二名至六名。（以大小县规定）如此处置，则他日毕业生可以回乡服务，遍布闽南各县，实践学以致用之旨，或创办该县农林试验场，或指导农物农作之改良，十年之后定有可观，民生问题无难解决。至于医科如筹有充分款项，其招生亦当仿此办法，毕业后方能回去乡梓改革卫生，服务社会。盖招生若不按县支配，则所招必多城镇儿童，或膏梁子弟，拜金主义，充斥脑筋，毕业后，多居繁华市场，谁肯往乡村吃苦耶？

**五、医农两科均可独立**

       医农两科，均可独立创设，免用厦大名义，亦免附设于厦大。譬如医学校可附设于厦门中山医院，或另行独设亦可。在理化科未设之前，首两年学生可在厦大肄业，至第三年然后入医专学校。如现时本坡至完备之医学校，其学生亦有首两年从武吉智马律大学而来者。至于农林学校，鄙人前日经已说过，须择地漳州为适宜，既距离厦门稍远，更免用厦大名义，可以独立一帜，无论个人负担，或众人捐资创办，均可，免附属厦大无妨。至于人才问题在十余年前鄙人创办集美及厦大时，诚较困难，不但校长难聘，就是教师亦感不易，故须多方请托外省物色，以致屡屡易人，若现下已大不同，本省人才已有多少把握，可免如前之困难。至于招生亦比前容易多多，若肯少收学费，选择贫寒优秀子弟，目的亦易达到也。

**六、厦大之成绩**

       报载某君，昨天在吾庐俱乐部演说，谓上海某大学较厦大迟办，而现下学生已千余人之多，厦大仅六七百名，反为落后云云。经林博士解释地方之大小不同，若以鄙人所见，尚有许多异点如下。

       甲、某校名为大学，学生千余名，然中间附设初中与高中，若大学生则不过数百名而已。

       乙、大学中间又当视所办何科，如文法等简单科，免用种种仪器，仅有教科书及讲义已足，不但生数易招，且经费亦省。

       丙、又当分别寄宿生与通学生，如寄宿生，须代备宿舍，膳厅伙食房，沐浴室，以及特派舍监等等，事既麻烦，费尤奇重，一人寄宿生之校舍，须加于通学生数倍，厦大概属寄宿生，教师则住校内，不似上海师生多住校外之简便也。

       丁、厦大学生本省居多，潮梅大埔温州次之，为地方附近之关系。其他十余省之学生，当然以上海广州之大学为便利，盖厦门属偏僻地方，况其繁华远不及上海广州，除非特别缘故外，他省学生定无舍近而就远以来至厦大者。

       戊、厦大初开办时，按招新生三班百二十名，本省按半数，余招外省。迨考试完局，（彼时教部定入大学须开预备班二年故所取程度系现高中一而已）本省学生及格者不足二十名况后来教部取消预备科，须有高中毕业方得人大学，故招生更为困难，若非厦大成立此十余年，各中学提高程度，则每年要招取十余名也非容易。

       当林博士到校时，曾以粗浅英语，试问许多学生，问汝何姓名，不但不能回答，且听不懂，再问汝由何处来，亦不懂。夫大学教授多用英文，乃以科学书籍多由发明国著作，不得不学其名词。（如我国出产之茶，世界亦日茶之类）譬电灯一件，其中各物均有名称，就该玻璃球而言，我国人或云电珠，或云灯球，或云灯胆，若非沿用原来英文，何能一律了解，依部章规定高等小学，便兼读英文，若至旧制中学四年终，则英文可有六号之程度，乃以粗浅文语，竟完全不懂，可见前本省中学之简陋，可悲亦属可怜。自厦大成立后，吾闽各中等学校，既显露其缺点，故无论公立私立中校，大都感觉不能如前之敷衍。有厦大光明之照镜，则其无形中之进步成绩，可云半由厦大成立以后互相激励而来。

       厦大兼设高中之原因，乃以吾闽虽有中学数十校，大都小中居多，虽南洋各中学亦然。要求其办好高中，至为难事，因生少费多，势必因陋就简，故厦大不得不负责创办，乃能集中多量学生，庶可为大学造就基础，否则何能升入大学也。至厦大收生严格，亦与上海不同。就鄙人所知而言，本坡华中前年有两学生，一为某君之子，在华中二年级，虽经某君介绍到厦大，经教师考试，只可在高中作旁听生，待程度及格，然后升入，可见厦大不为情面而破格超升，两俱不便。其他一生文凭，原系一年级，到上海人某大学，私将一字改为三字，变为三年级，亦经该大学试验收纳。该生乃来函告知华中某君，请求遇该大学函询时，须照三年级答覆云，可见其他等处招生之随便，或规定程度之浅低，而厦大则不然也。去年春间，南京政府鉴于国中技术人才之缺乏，欲鼓励各私立大学校，扩充设备等，于是教育部专派调查员，向全国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考察成绩，分别补助款项，迨调查结果，计有卅二校，教育部规定每年助款七十二万元，除留五万元外，余六十七万元分别补助。厦大得最多数为每年九万元，可见厦大对技术科之成绩也。

**七、厦大财政之独立**

       厦大自民国廿年，财政已自独立，并组织财政处自与银行直接来往。鄙人规定补助款，则逐月依数备交而已。当前年建筑设备时，有年开至四五十万元者，迨后逐年减少。凡每学期预算费，须经校务会议，及鄙人赞成，方能决算开支逐月列表报告关系人，鄙人亦得一份。然末向社会捐款之前，不但无机缘可宣布，且亦被人笑我器小而自炫也。

**八、厦大前未多举董事之原因**

       普通学校，无论规模大小，多先组织董事部，董事有多至二三十人者。以厦大之规模，而董事仅有三人，此问题社会上多有不解者，今日鄙人谨表明原因有二。

       （甲）不拘各界，若有忠诚维护或赞助厦大之人，厦大甚愿推举为董事；

      （乙）如经费是向社会捐募，当然要推举多数董事组织董事部，如此回之募捐是也，为以上原因，故前时未便多举，而与普通学校一样，且厦门政局屡有变动，得彼失此，尤当审慎。至资本家方面，畏厦大如蛇蝎，谁敢参加，其他挂空名无裨事实，更非厦大所宜。最当注意者，恐董事中受人嘱托，屡介绍教员或学生，职员及其他等等。若不接受，则恐发生恶感，如接受，则最高学府机关，权限不明，贻误非轻。自厦大开办迄今十余年，鄙人未曾介绍一位教职员，或保荐一位学生。此回自林君到叻时，鄙人即与林君商定，现将正式募措，则董事部须扩充多人，先就本坡拟定陈延谦李俊承二君，（并即举他签押银行支款）其他待捐务结束时，并行推举。此种大意，且已十天以前由鄙人函知吉隆坡关系人洪进聪君矣。

       现名誉董事已举定六名。新董事已举定九名，连旧董事林文庆君及鄙人一共十一名（名誉董事及新董事名单待后日发表）。

       待林君回校后，当备正式明文，请各先生费神参加。将来厦门如开董事会，在洋各位可指派代表。至进支款项，逐月厦大当然分送各董事。倘有个人要独出巨资，指办何科，譬如医科，或他科，抑建筑何校舍，可直接与厦大磋商条件，要经董事会可，免经董事会亦可，厦大当然欢迎，必须达到捐款人之目的使其满意也。

**九、国民对教育应负之义务不可专责之政府**

       前日鄙人所预算，办医农两科二十四万元，现捐款竟不能达到，况所预算之规模，亦属小数。窃吾人每开口便推责政府，不肯全担负担之不是，其大意似乎教育事业，不关国民义务。吾人正因为此错误观念，所以未能慷慨多输，有之亦勉作情面而已，不知政府自身何能生利，所倚靠者全属国民之财源。今日吾闽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若格外抽捐，更非所宜，故爱莫能助，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世界除苏俄共产化外，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事实甚显然也。

**十、希望此后自动义捐**

       林君既不日回国，则对于募捐之事，已作一段落矣。林君亦非一年半载就再南来，不但无成绩，恐反为人讨厌。无如是，则医农乏财力可办，对于救乡根本之办法，未能进行，至为可痛，然鄙人尚有三项希望。

       （甲）本省不久成一新福建，百政维新，政治略就轨道，匪祸消灭，则吾侨内向信仰，而赞助厦大必较形慷慨；           （乙）资本家凡有数十万，或百余万元者，敏悟救国之义举，其收功在于大学教育，捐出十分之一二。则目的不患不达；

       （丙）吾侨在南洋营业进步，入利较丰，则捐出之款，亦必较易也。以上三项俱为赞助厦大之乐观，而冀医农等科，可以实现，勿作消极之悲观。吾侨多与种植树胶有关系，鄙人请举一譬喻，照旧式普通胶园，每英亩至多每年产胶五百磅。自科学驳枝胶树发明后，每英亩每年产胶可至一千五百磅。今日鄙人已失力，希望侨胞继续兴起，亦如天然树胶须用科学驳枝更可大加发展也。

**为筹备建立南洋师范学校（注一）**

**致各帮侨领函**

**原文载南洋商报31.3.1941**

       迳启者，庚此次回国，考察抗战情况，教育事业亦在注视之中，闽粤二省华侨最多，尤所萦系。据中央教育部颁布命令，由民二十九年起，五年内全国普及教育，每保一百户，须设一国民学校，每三保须设一中心小学（即高小学校），依此推算，对于师资问题，定须先期积极准备。庚所历各省，虽无精确调查，但都在推进之中，则尚可信，唯闽省对师范学校，不但不扩充，且将前时私立学校，概行禁止，致弄出现下教员荒之气象，更遑论前途之普及。广东省当局，虽在积极进行，然因沦陷区多，无法充分兼顾，实势使然。总之，闽粤二省，在省内所办师范学校，不足供给本省之需要，既如上述，而南洋方面，我侨胞人口，不亚于国内一省，侨务委员会既未筹备及此，将来需用教师之多，势必复向闽粤内觅聘，物稀则贵，非仅教育经费须额外激增，且尚恐有顾此失彼之虞。

       庚自考察后，曾派代表请教部，速在闽粤创设华侨师范学校，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请政府施行，虽蒙接纳通过，惟官场办事，向来迁缓，且往往不尽如人意。如云南保山之华侨中学，为教部直辖，学生四百余人，庚由滇缅路经该处南归，有许多侨生前来报告，开课三个月，上课只有一个月，且有非用国语教授者，该生等失望之极，欲归不得，哀悔难言。庚所提议，虽参政会通过在案，但能否成为事实，尚不敢知，纵教部果决采行，然校址之适当与否，以及规模之大小，精神与设备，人事及管理等问题，是否不至如保山之使人失望，亦尚不敢知；因此，庚乃倡议在南洋另办一师范学校，假使国内能积极进行，办理妥善，规模相当可观，学生各省以千数，将来足以敷足海外侨胞之需要者。而南洋所办之师范学校，成立以后，他日毕业生亦足供应本地时，则国内毕业生，当可免尽数出洋，留供省内之需，是则更为幸事矣。况国立师校，以过去情形言之，亦难望如许发展，近年中央为提高党权，凡学校校长、教务、训育各员，概须以党员充任，无如全国有党籍者，百未有一，人才不敷分配，势必降格任用，苟如用非其人，则成效更难期矣，南洋师范学校，不得不积极实行赶办，此诚最大缘由也。

       师范学校乃专门教育，教员要聘有相当学识与经验，学科要分门训练，图书仪器化学要充分设备，学生要招收贫寒而有才之子弟，应加以优待，由此种种，故其规模必大，经费必巨，而筹款必多，方足以措置裕如。

       国内对教育方面，既多使人失望，海外侨胞关怀教育，当然不忍坐视，凡可设法补救者，应当披发缨冠以赴之，故在新加坡创立大规模完备之专门师范学校一事，似不容缓举矣。

       南洋侨胞一千一百万人，每年须用教师当数千人，国内教师既如是枯竭，海外学校，尤正在蓬勃滋长，若不及早设法，一旦急用，必无所措。抗战以来，文化界出洋众多，故一时有供过于求之象，近年教师被政府注消名籍者二百余人，各机关需用知识分子，又多从教界觅聘而去，由是已感教师难觅，反成供不应求矣。

       南洋师范学校创办后，毕业生虽未能回国服务，然可免如前之向国内争聘，况侨生受祖国文化，比较国内尤为关要，在国内之国民，虽终身不学，到老还是中国人，若侨生失学，则难免外化，且并其父兄遗弃，亦同遭损失；现在本坡侨胞，最殷富者当有数十人，在南洋教师之恐慌，若不负责领导，见义勇为，将来南侨文化，必缺乏领导之人物。若能慷慨牺牲，作大规模之计划，则侨胞青年，多受薰陶，家乡政治，亦必并知关切。以我侨胞众多，资财宏厚，平时对抗战后方，已多助力，然对抗战输财外，其第二重要莫过于培养后生，灌输祖国文化。南洋吾侨教师，在学科上素称最缺乏者，即为“数理化文史地及英文”各种，马来亚英文八九号位失业待职之侨生虽多，然国语不晓，教法不知，故不合格。现下拟办之师范学校，当将上言各类，更加注意，以应各校之需。而办学首要者为校舍，在此战争期间，物料昂贵，建筑非易，当地政府，对卫生甚形关切，故欲觅一适当大规模校舍，可容学生千名，更非易事。恰有李君光前，在金炎律置一巨屋，初时置本五万余元，今愿捐为校舍，再增捐大银五万元，作修理及开办等费，合计认捐一十万元有奇，经召匠赶修，按本夏季可以竣工，秋初便可开课矣。

       师范学校，在国内优待学生向例，学、膳、宿、书籍、制服均由校中供给，盖所收概属贫生，俾毕业可达其担任教师之目的。在南洋对于优待事，庚按学、宿、书籍由校供给，伙食、制服学生自备。每班校费全年按叻币三千元，首期按招十五班，全年须费四万五千元，此十五班学额，共六百名；马来亚拟招三百五十名，荷属按一百五十名，缅甸婆罗洲合按一百名，不分省界，但规定贫寒子弟有才乏升学能力者为合格，且须该埠社团负责证明，至分地考试各手续，可赶于本年六月内办竣，俾便预聘教师，筹备一切也。

       上言拟办此“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本拟待南侨总会开会时提作议案，乃有昧良之流，本人既不出席，且向当地政府企图破坏，其意谓南侨大会只限筹赈而已，本坡当局，已接受其要求，虽未正式表示，顾庚则以为此校之成否，本坡数十位资力宏厚之侨胞，自可解决，然后推进全坡及全南洋各属，不分省界，共襄盛举，当一样可以成功。

近者，庚经向福帮多位热心家接洽，多承同意，且认捐巨款，兹特致函各帮殷实领袖，请求鼎力赞助，以抵于成。

       先生热心教育，夙所钦慕，倘蒙慨诺，然后再逐渐推行各属。务祈集中全侨力量，共成盛举，谨此奉闻，佇盼明教，顺颂德祺。陈嘉庚谨启，三月二十八日。

**注一：**南洋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四一年，而在一九四七年改为南侨女子中学。

**文化与国家关系**

**星福建会馆举行改组四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7.3.1933**

       此日为本会馆改组后第四周年纪念，并为选举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之日。（按下月三届执盟委员即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余（陈君自称）忝任连续两届主席之职，在任职期间，对于会务之进行，诸多与希望未克实现，故成绩毫无，内疚殊深。甚希望下届被选新职员，同心共济，以图将来之发展；更希望能实事求是，凡事不可拘诸形色，应注重于实际工作，以实现本会同人之夙愿，对祖国则应如何补助国家，维护教育。对当地之工作，应谋闽侨之福利，赞助华侨教育之普及，联络侨团之团结力量，努力倡除华人不良之习俗等。

       吾侪心理，谁不具有上述种种之希望，但本会改组后，瞬经四载，许多事件，多落于空言无补之憾，仅有维持三校之一事，稍可留为纪念者，从前本会之计划，对于本坡闽侨各校，均设法津贴。以期普及，无奈因不景气之巨潮，影响及本会经济，致津贴闽侨九校半途停止，而一切经已按序促进之计划，亦告中辍，至今尚未能恢复，以偿夙愿。

       至于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年需费二万元，如果非适为本会改组之重新整理，恐三校遭际此时不景气，或者早告停办，否则必出诸敷衍了事，焉得有努力日谋扩展之机；对此点更觉三校之维持，更非容易之事也，而南岛之不景气，日趋严重，故希望将来新职员诸君，更应齐心协力，最低限度，对于三校之前途，应继续进展，不可因经济困难问题，驯至中途搁浅，或因陋就简焉。

       因本日言念及三校问题，顿觉我国教育现状，发生无限感慨。忆自逊清废除科举制度，迄今三十余年，我国教育，居城市者，当然比较进步，然于乡村之内，反成退化。此种原因，在事实之所指示吾们者，盖从前不论乡僻小村，亦遍设书塾，儿童就学，每年仅须数元，便可了向学之愿。而现在则不然，因学校之经营浩繁，于乡村之地，甚少设立学校；而城市之学校，欲求学每年非数十元不够，致平民界因限于经济问题，失学儿童，遍地皆是，顽劣万状，令人不胜感慨系之。且城市之间，许多学校，其经济之来源，或由地方之税项，或为教会所设立，或由华侨汇款之补助，方克维持者，甚少有基金之学校，得以独立无虑者。城市之教育，尚且如此，乡村教育之现状，可得以推见矣。是故吾人，对于我国文化前途，应加注意，吾在事实上曾告诉吾人，如俄灭波兰，并亡其文字。当时波兰之人民，虽于强俄压迫之下，民间对于波国固有之文化，不忍放弃，多冒险私授波文，午夜深更，尚且父母教其子女，兄长教其弟妹，孜孜不倦。今波兰之复国，多有归功于其文化保存之力者，可见国虽亡，而固有文化尚未灭亡，终以文化之力量，而得恢复其祖国也。就以我中华民族而论，考诸历史，我汉族亡于元清之手，两度之恢复，亦全赖于文化之重力，故我人如果试一默思，教育于国家之关系，岂浅鲜哉？

       我国际此危如累卵，虽连日来报章之宣传，长城战事，迭告胜利，但胜利云何者？我国土地，失而未复。且当今之世，战争侧重科学化，敌寇以犀利之枪械飞机大炮，坦克车等军用品，其炸力之雄无力复加，如果徒以血肉之躯、与敌拼命，恐终归于失败耳。故欲抵抗强寇，必万众一心，于物质之外更求救国保种之道，各尽其能，方有济也。然侵略者得以灭人国家，占人土地，终不能灭人之固有文化。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故吾侨之责任，对国家之义务，应如何补助，对教育之维护，应如何尽其力量，我国前途，方有一线希望也。

       且中日问题，前途险状殊多。如日前李顿爵士在巴黎和平社之演说，称“将来中国是在‘如何’‘何时’及‘由何人’等问题，以求领导使此优良民族，可以团结其国民之力量，其惟一之问题，则为莫斯科，或‘日内瓦’。目前中国选择日内瓦，但如日本仍坚持其目前之政策，而日内瓦调解失败，其选择无疑的，将反覆”。

       如照李顿氏之见解，日本如果仍抱侵略野心，国联无法调解，则中国无疑的向“莫斯科”云。

       最近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氏，抵香港时，向香港大学学生之演说词，曾谓“将来经过二十年之后，世界变共产化”，又谓“在二十年后之人类，如果由二十岁起，至五十岁之中，不能作革命事业，可谓无用之人，但若其为四十许之人，尚能实行革命，仍不能以无用视之”。盖萧之言论，乃有感于国际现状，及将来之见解耳。然总而言之，将来世界如何动，祖国当局，无论走那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盖今日一人能保存文化，即他日千万人之文化，赖以保存，而传播于无穷也。故际此千钧一发之时机，我辈对固有文化，岂可不思保存，对教育前途，岂可不思维护乎。

**复兴民族与服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4.1.1937**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民族复兴问题”征文，计有“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今日之民族问题”，“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民族复兴与法律”，“复兴民族与服制”等五篇。著作者，顺序排列为冯玉祥、孙科，李宗仁，居正，与新加坡大实业家，中国大慈善家，厦门大学创办人，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兹将陈先生著作介绍于读者。

       衣服盖以蔽体彰身也，而式制所存，则一国之文野系焉，见其人，审其衣服，而其国政俗教化之高下，固已昭然若揭，无待足践目击而后知。红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黑种人之衣服，黑种人之衣服，不同于棕种人之衣服；棕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黄种人衣服；黄种人之衣服不同于白种人之衣服。代与代异，国与国别，此其间若梯之有阶，声之有度，上下高低，了不可混；而文化之水准，亦于是乎取征，故谓衣服为文化最显着之代表物，无不可也。

       吾国开化最早，黄帝时已备衣裳之制，舜观古人之象，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于衣，绣宗彜藻火粉米黼黻于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其设思之妙，取式之巧，有非后人所能及者。后有所谓“深衣”之服。其式则“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其用则“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其法则“……应规矩，绳权衡，短毋元肤，长毋被土，续袵钩边，要缝半下，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誳之及肘，……制十有二品，以应十有二日，袂圜以应规，袖裕如矩以应方，负蝇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蝇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义也……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槟相，可以治军旅……”一见马氏文献通考一一此种“深衣”，裁作简便，动合礼法，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服之，可谓服制上一大进步。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儒缓见晒，良可慨也。降及秦汉，品秩之界愈严，阶级之分愈著，衣服之制遂亦因之而愈杂，崇名黜实，去朴趋奢，五光十色，不可究诘，其于先圣俭约之旨，盖渐失而渐远矣，然最繁缛无谓者，莫如清。

       清之时，皇帝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端罩，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褂、常服袍、朝珠、朝带；又有雨冠、雨衣、雨裳、皇子之服，约如其父，而稍异其式，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亦各有其朝冠，有其吉服冠，有其端罩，有其补服，有其蟒袍，有其朝珠，朝带，下至公、侯、伯、子、男，一品官至九品官，亦各有其所谓冠、所谓服、所谓褂、袍、所谓珠带。他如祭祀舞生，祭祀执事人，乐部乐生，卤簿舆士，以至军、民、吏、员、奴仆、优伶、皂隶等，亦莫不视其尊卑而各有其服。女性自后妃以下，其冠若袍、若裙、若帨若祺、若约、若珠饰之属，亦各各有别。此其为制，举名指已不胜屈，状貌则曰罄且不能尽。而在衣袖，取形马蹄，曰马蹄袖。褂也，亦竟马之，缎以长辫，摇曳若尾巴，遂真如犬如马，与禽兽无择。呜呼！斯诚匪夷所思之怪制，而极古今天下之奇观也。

       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不肯苟且；故一生罕着长衣马褂，自馀革命同志，光复后亦多主废清服，重新规定。然国人每易安于现状，忸于旧习，长衣马褂，犹是人时之装，驯至今日，建国二十许年，复以此物为民国礼服。虽曰割尾去蹄，稍减丑态；而与傀儡伪满，空无锱黍之差。嘻嘻！清服可存，清旗何独不可用？观瞻之所在，则心理之所系，精神之所趋，庸可忽也？

       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宣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剪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长衣马褂，定为礼服，虽若小节细事，而影响则甚巨。窃期期以为不可也。

       或曰：长衣马褂，美观便利，不可废。此狂言也！以云穿着，则重钮叠扣，形同作茧；掣肘裹足，状类拥被；身失自由，主为宾夺，束缚已甚，安见便利？以云体式，则如枇襄。如布袋，褂开前而惟恐其不短，衣开侧而惟恐其不长；支离错综，缠夹臃肿，拙陋已甚，安见美观？抑美观云者，固因时因地而异，原无一定之标准。野蛮人之所谓美，文明人不必以为美；古代人之所谓美，今代人亦不必以为美。特风会所趋，相仿相效，得其宜者迎于众，于是群从而美之，失其宜者弃于众，于是群从而恶之。民国初年，觉悟之士知尾巴不可有，马蹄不可留，争为割尾去蹄之事，一班遗老遗少，犹以是物甚美，爱护备至，如宝家珍，今则何如者，昔日士子，好养长指甲藏垢纳污，不以为丑，而以为美，今则如何者。是故习随时移，欲随境变，移爱无已，进步亦无已，吾能因时制宜，重定新服，尚何美丑之足虑。

       或曰，废长衣马褂，于国货有损，此说太糊涂滑稽。兹所谓国货，当指丝绸布类而言，然长衣马褂，服之式也，丝绸布类，服之料也。废长衣马褂，是所废在服之式，初与服之料无涉。置料于此，吾欲方则方之，吾欲圆则圆之，吾欲西装则西装之，吾欲汉装则汉装，料以成式，式固不能移料，理至浅显，无待费词。果政府能安定相当制服，宜于富，亦宜于贫，宜于丝绸，亦宜于棉织品，要以不失俭约之旨为依归，以不失国布之用为原则，则说者之忧疑，当可焕然冰释矣。

       或曰，衣服乃仪礼之所托，不可轻改，所谓礼不忘其本也，此其说足以欺庸众，不足以欺通人。夫一切仪礼制度，悉人为之，便于古不必便于今，利于一时，不必利于百世，当其利见而弊隐，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存，当其利失而弊著，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废，人为之而人废之，凡所以求利于人，有何不可？君主时代，三跪九叩头，礼之大者，居今而行之，非狂则妄，是亦忘其本也乎。君主时代，国为君有，制之大者，今则国为民有，无所谓君，是亦忘其本也乎。且如长衣马褂，乃清服遗制，非吾先代所固有，今说者遽尊之为本，是真忘本之尤者矣。

       此岁以来，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学生，皆同受严格军事训练；平民壮丁队亦严行组织，不遗余力。良以复兴民族，必植基于全国武装之精神，惟有全国武装，全民军化，然后人人能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然后人人能爱国族，能知责任。今公务员若教师，学生，既须并受军训，军训服装，自非长衣马褂。如曰：长衣马褂乃用于军训时间以外，则军官于非操练时间可服，士兵又何独不可仿效？学校教师于非军训时间可服，学生又何独不可仿效？必曰军官可，士兵不可；教师可，学生不可；则是蔑视平等，妄生阶级，揆之情理，岂能安者？

       夫吾国以文弱之风，而贻“病夫”之诮，服制失宜，抑亦要因，今发奋我雄武，兴我民族，洗从前“病夫”之辱，启后来强盛之机；则于服制问题，可不再三致意？愚失学，不能文，东方杂志社来函征稿“民族复兴”，忘其无似，草此塞责，引玉抛砖，斯区区之微意耳。

**陈嘉庚抗议闽种烟苗之演词（注一）**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0.1922-31.10.1922**

       前之禁种，全持民气，而现在人心，以为权利在军阀之手，无可奈何，种禁由之。民八五月，弟回国时，几乎将绝，后何以发生，亦国民八之间，地方方乱，民思种之，强者行之在先，各乡随之而起，于是乎烟苗遍地皆是矣，而地方官不但不禁，反从旁而赞助之，得以中掬饷，每斗种八元十元十二元不等。同安一县，光明收入的，每年九十万元，浙军分得一份，北军一份，绅士亦一份；尚有暗的六十万元，为乡绅等等与送与李贼厚基者，此一县已至一百五十万元，不可谓不巨矣。而军阀更预算民九，应掬光的一百五十万，暗的一百万元。此区区同安一县，负担至二百五十万元。广东为富裕之省，尚知禁赌，此县何能担二百五十万之烟饷乎？弟觀此情形，为国家民种计，起而假座青年会开会，到者百余人，宣布烟苗宜禁之种种理由，众赞成者通过，举弟为正会长，林文庆君为副会长，及四干事员，越日往见道尹陈培崑，他云今年如不能禁，后来必达目的而后已。再见臧致平（注二）臧云我乃外省人来此，不能益地方，应当竭力赞成禁种烟苗。时已八月，正下种时，急则治其标，赶印十余万张禁烟宜言，颁发各乡，乡人多怀观望，不敢即种。急再开会，举弟与黄廷元君为代表，往福州。在北京有拒土总会故福州有拒土分会，正会长英领事，副会长美领事，弟等到该会，甚荷欢迎。派代表同往见李厚基，李甚为招呼，满口应承，云一切手续如备，即当令各县实行禁种。代表云，现下种时，宜速致电各县，李亦允诺，开筵请代表，不赴且强之。余等回厦，全无消息，再待十余日亦然。往问陈培崑云寄有些少告示，再七日始见城门头有禁种告示标出而已。再过两星期，亦是如此。后询武官，云如无上司命令，吾人何敢禁种。虽然民九此年，为受十余万传单之力，始不敢种，后虽再种，已减少一大部分。弟意谓地方官及臧致平李厚基的许禁种，不顾如何，驰电北京、福州、南洋各处要人社团，布告形色上之禁种，实际上仍进行，于是乎内外攻击起，故军阀预算民九同安一县，烟税二百五十万元，经此反对，而失效力，大概收入不及一半。

       在太平洋会议中，口口政府代表，提出议案，云当派员到中国监督禁烟，顾维钧耻之，声言担保今年禁绝，故北京派王大贞到闽查察，王南下之时，便谣言四起，云带随员八人，各皆费几千元买来的，于是闽人打电与他，云不可如尔兄之行为，若然，当打尔死。故王声名之坏，皆从其兄从前之劣跡而来。而王大贞到闽之后，就不敢作乱。斯时烟苗已长，实行铲除，乡民不遵命令的，且被拿禁不少。今日之事，弟虽与洪晓春为友，亦不能为之盖其愆。洪为厦门总商会会长，先前却为好人，后更与贼为伙。同安绅士，向北军包马巷烟饷一十二万元。在马巷绅士，谓如一斗种八元，可掬三十万元，尔等许纳北军一十二万元，我可自掬。于是同安绅士，计谋不成，含怨在心，唆使浙军干涉。云北军得一二十万，浙军亦当得六万元。马巷绅士，处于淫威之下，不得不许。他又向北军云马巷又掬至三十万元，北军又来干涉，后不论团长、旅长、营长皆要，所掬约二十七八万元，难应军人之需要。故不得已，洪晓春被迫走香港，复回厦，将自己之款私填二万余元，方能了事。

       但此款却可向马巷收回，然一时实难收入。后军款掬马巷烟税，马绅不敢接洽，北军不得不找旧路，寻洪晓春，许洪前填二万余元，以扣还。洪允再行担任，该年马巷掬至七十余万元，但洪却是好人为财变恶。今又为李侵蚀福建银行七十余万元事，期将死的烟苗复活抽税作抵。现商会会长如此行为，吾人岂无军阀与绅士何。况乡民不敢自种，商会更为之提倡。至种烟之害，何乡能了。我乡应担五千外元，找寻二三家长，而各私其私，至今账目不能结，乡乡如是，乱如纷丝。而兵头则与兵约，我令出则行。待烟税收后，每日辛饷当发二十元，后自食其言，只发四元而已。民九年贼厚基一人之私入便百万元。至若间接受其烟害，米粮每担八元，猪肉每斤五角，种种之害，君等皆知，毋庸多说。或云烟利极大，可裕生计，但此指无吸之家，若半吸半售，自害亦多。且余烟并非卖之外国，所卖者自家人耳。弟记了，今不愿放弃天职，况现在事事重民气，不重武力。满洲之倒，李厚基之走，皆民气之力也。内地受武力压制不敢言，在海外岂不能享此权乎？故请闽侨到此，大胆用弟之名传单，皆事急迫不及待。因加种一亩，则受一亩之害，诸君如何打算，请讨论。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办闽南水灾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9.1935**

       闽南此次大水，灾情至为惨重，我人因此进行筹赈，筹赈之法，率有三途：一为自由捐题，二为出发劝募，三为举行游艺会。三项以第一项最为方便，盖可不费手脚也。第二项则须十人八人，出发劝捐。第三项较第二项尤为不同，第三项每须数百人至千余人参加工作，且须筹备。惟举行游艺会筹备，实亦罕有。论成绩，我们当视市情之如何以为断，我人固不可以劳动大众而获蝇头为可怪也。

       前次天津水灾，本坡举行游艺会从事筹赈，其时游艺收人多至七万，捐题十余万，其得款二十万。此次捐题至今，仅得二万余。市情不同，成绩亦异。事实如是，夫复何言。此次闽灾，最惨痛者首推安溪。此次闽南，被难者十万人，住屋夷为平地者千家，流离失所者六七千人，死亡实数，尤不可知。我人试思，大水以后，灾区难民，生活无着，设不加以救济，弱者当成饿殍，强者必为盗贼。大凡救灾，一推政府，二为富庶之区，今闽南则多一华侨。现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自顾不暇，何况华中灾情亦重，安有舍彼救此之理。至省政府，此次福建省府，对闽南水灾仅出万元，其经济之如何，于此可见。至于富庶之区，首推厦门，厦门亦当视华侨积蓄之如何以为断。厦门华侨纵有积蓄，如其不与赈助，亦属无法。风闻厦门至今仅捐一万数千元，将来至多亦不过一二万元。各区灾民生活费每人每月至少亦须三四元，则此二三万元，安得有济，故所望者华侨而已。南洋商情虽则冷淡，惟数十万赈款，似尚不难罗致。且南洋多金之士，为数甚多，如私人乐出为善，则一人之财力，以足甦无数之涸鲋。惟私人不肯出钱，我人亦不必引以为怪。我人应自动赈救，力量较大者多出，较小者少出，则救灾之目的亦可以达。

       现时安南、吕宋、爪哇各地，读报告捐题十万八万已有可能，其他为本坡。本坡至今亦只捐得一二万元，希望此二日游艺会之举行，将来可弄得二三万元亦不可料。至于怡保、吉隆坡、槟城，将来或者亦可捐得四五万元，统计南洋至多不及二十万元。惟亦只得如此做法，一元可活一命，数之亦可救得数命，希望各位一致努力。

**陈嘉庚倡建闽南十年计划（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30.4.1937**

       启者我今日修此函与诸君，有效时，关系闽南何等幸福，则此函自有许多价值。失效时，则为废纸，不但无价值，且或笑我为多事，而慷他人之慨也。先哲云一言为智，一言为不智。我今日不计乎是，盖吾侪生逢国体改革之时代，国家至危急之秋，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吾闽之贫穷，远过邻省，所有富人属之南侨，以马来亚言，而尤以在诸君身上为最。我知而不言，则责在我，言而能否有效，操在诸君，谨列陈于下：

       一、厦大集美为我创办，无论为公为私，虽尽人都知，然名义上不免有多少连带。兹此函所言则与厦集二校无关，虽然亦须先白二校，此后状况。厦大现有月费二万元，足资维持，免至停顿关门，而此次所谋置胶园七百英亩为基金，如能成为事实，尚欠十左万元，无难募捐应付。是此后厦大每年可增经费国币十左万元，自有相当之进展。至于集美学校，现月费一万零五百元，若每月再加数十元，便可恢复旧观，利益贫生不少，此条我度以后，能力可以负担，准此计划。故谓今日，此函绝对不关厦集二校之事也。

       二、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盖深信国体改革，纷乱政争，乃必经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来临。若不乘时即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未免临渴掘井。近者全国统一，政治已就轨道，前途乐观，为世界所公认，国家兴隆计日可待。现我闽中人才文化，服务各界，多有厦集二校出身者，其他影响可以免论。由此而言，是我之目的已达，所有个人牺牲与失败，或亦气势之使然。古语云：善作者不能善成，善始者不能善终。明乎此，安有丝毫悔念耶。惟当年有议我者，非笑我孟浪，则讥我轻财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三、南侨可以巨资报效祖国，以我鄙见，当具有五项资格：

       （一）身为国产来自桑梓者；

       （二）晓识中文略知民族历史者；

       （三）国家兴亡时存注意者；

       （四）在社会上不愿失声誉者；

       （五）富有财产数十万至百万以上者。

       若无完备有此五项，而欲与言牺牲，则无异与虎谋皮，或对牛之弹琴。所以南侨富人虽多，而乏可告之人，良由是也，先生等资格完备，故我今日不得不进言忠告。圣人云：四十五十而无闻，则乏可为之日矣。盖及身不为，留待后辈，或儿女众多，不但乏此资格，而此间乐不思蜀，先侨许多富翁，其后嗣对祖国如何，可以车鉴。至为损为益可以免计。总言之，身由梓里而来，一生千辛万苦，手中得来金钱，不能分一部分以救家乡，困穷族类，留作子孙乡梓之纪念，而必多多益善，稽交后嗣，我敢武断曰，已与祖宗脱离关系矣。

       四、吾闽贫困尽人都知，少壮者侨客南来，老弱者则留居乡梓，人才缺乏，民生困苦，故人丁日减，生计日蹙。虽此后政治维新，建设可期，势必由闽北起手，近水楼台，何时波及闽南，就现下教育费言，每月全省规定十一万元，而省垣已占去六万元，其余五万元则分摊六十余县，每县不上一千元，杯水车薪，其他可以想见，故文武人材，与及出洋学生，几如凤毛麟角，人才既乏，地土贫瘠，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加以政府鞭长未及，而吾侨拥巨资，若坐视不救，以开化如先生等，问心何以能安，至集资援救之法，当取牺牲与事实，不外教育事业之初基，约述如下：

       （甲）矿产，吾闽矿产虽多，然未闻有何项开采，亦未有实在彻底查探造册报告。

       （乙）农林，农夫株守古法，改良无术，若非有大规模之农务，实验场与农业学校之教导，终无发展之日。

       （丙）工业，吾闽土产原料缺乏，交通不便，工业一项，更无可言。

       （丁）海利，吾闽海岸线虽长，若以集美水产校经验，则尚乏相当把握，可以报告诸君。

       （戊）人才，人才须赖教育，吾闽除莆田一县外，其他寥若晨星，故如军政要人，必须外省来治，其他可以知道矣。

       五、欲开发吾闽之矿产，与及吾侨将来之投资，必有相当之牺牲。聘到经验矿师，分队查探。至少二三年，积极遍查，详细造报，按费国币一百万元，勿要求政府苛利条件，所开销之项，如收回固妙，否则作义务牺牲，以吾闽名矿如安溪之铁，龙岩之煤，要开采，须浩大资本，实难办到，若探得其他别种矿物，资本较轻，为吾侨个人或合公司财力能干到者，则利源一开，影响必大，许时利之所在，势必争先恐后也。

       农林，吾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乏农校之研究，故改良无由，水利不修，畜牧放弃，兹急宜在漳州创设农业学校，与实验场。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之开销，工业吾闽虽乏原料出产，然不能因噎废食，且其他如测量绘图，建筑电学机械及别类等等，为吾闽最需要者，不知凡几，应在厦门创立工业专门学校，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或七八年之开销。

       教育，闽南数十县儿童，失学者十居七八，如每名学生，补助国币五元，以一万名计，每年开销五万元，按十年之费计五十万元。

       留洋学生，为造成专门人才，重要如选择有经验优秀青年，资助其出洋留学，每名至毕业，按助费国币一万二千元，每年约选派成十名，五七年间约五十万元。

       六、上言各项共国币三百万元，按作十年或七八年开销，以我国今日之财力薄弱，万万不能仿效富裕欧美，须先筹足充分基金，方敢下手，若果事事如此，虽本坡侨胞之富，要开办一间小学校，亦不可能，故凡事虽因时权宜，治本治标，酌计而行，十年之内，按有相当经费，已足十年之后或免待至十年，自有无限机会来临，如诸君志愿有加，慷慨乐输，或者数年后财产比现下增多数倍，则目前所计划，仅区区小数耳。

       先生等现下财产已在千万元之上若肯捐出十分之一，或捐出一年或半年之入息，则比二百万元国币，相差无几，尚可再向他侨及外埠闽侨筹捐一百多万元，料无难事。如何之处，希良裁为荷，并请

大安廿六，四，十五日

**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3.1929**

       今天为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之盛日，主席且略述本会馆之源泉。初并无福建会馆之名称，人只知有天福宫（注二）。顾天福宫之性质，不外每岁举行伟大之迎神赛会而已。距今十余年前，天福宫之外表修理得巍峨华丽，且每次迎神皆耗金巨万，备极奢侈。有心人士觀此情形，乃出手参预，始悉天福宫并无设立章程与注册，于是才有章程。及福建会馆之产生，积十余年来，会务未见若何发达，颇呈颓唐之象，斯非特福建会馆耳，即其他华人团体，又何莫不然。同人等不能任全闽侨所属之总机关长此萎靡不振，爱有改组之提倡。现在委员会已告正式成立，可谓焕然一新，堪引为幸。惟是吾侪已受全闽侨之委托，务须立些功绩，以副吾侨之期望。所以，本席愿诸君对于会务须有责任心，切莫推诿。假使每个部员推诿主任，主任推诿主席，而主席则推诿其他，大家互相推诿，一切事业，皆无成功之可能。吾故谓当认真负担而忌放弃。其次，目前亟待整理者，厥为教育问题，而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如经济处理得法，即易而解决也。再者，教育一层，非仅反映海外方面，祖国方面尤须注重，不可使有所重轻。总之，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如有力者出资，无力者则从事宣传，量力行之。较有资产之家切莫待有余款时始作公益，盖金钱是流动的。譬如掘井得泉，今日抽出，明日则依然流满，用之不竭。设置之不用，则为腐泉，善于利用金钱与否，亦犹是也。再其次，希望本会各委员，此后举凡分科或分股诸会议，宜一律依时到会，毋拖延时间而失却精神。此职位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者，但吾人当视比其他一切有代价之职位更为重要、更加努力。

**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报告会务**

**原文载南洋商报5.8.1930**

       今日之会员大会，是福建会馆改组后，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之大会。委员会如照三月十六日宣誓就职之日算起，到了现在，已有年余，若按照新旧移交手续计算起来，最多只有十个月而已。今日开会目的，最重要者，为各科主任工作之报告，及本会馆章程之通过。各科工作之报告，为了使会员诸君明瞭本馆会务进行怎样，章程是规定本馆会务进行的方法。一经规定，我们就将受约束；里面如果有不妥处，希望诸君尽量提出，加以修改，俾本会得有一尽美尽善之章程。

**会务**

       今日开会，本人实有无限感慨，本会馆全体会员，新旧统计，共四百二十余名。内中旧的为三百九十名，新的仅卅名而已。所谓旧的，系本馆职员未选举以前就加入，新的是委员会成立以后，经会友之介绍始加入。新加坡的闽侨，最少亦有数万，而会员加入，仅三十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东道不好，侨胞对此种会社，无心参加，另一方面，亦是我们委员会办得不好的缘故。关于此点，兄弟觉得很惭愧。

       新旧会员，总共有四百余名，虽然不多，但为数亦不少。今日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在我们的理想中，以为到会者，将不知有多少。最少这间会所，总要挤满才是。然而今日到会人数，竟出我们意料之外，仅仅几十人而已。到会人数这样少的原因，不出二项：（一）东道不好，无心参加；（二）国内扰乱，一般会员，专心国事，以为国家不安，社会事业，参加亦无用。以上二原因，我们希望在最短期间，可以消灭。那么，会务就可以蒸蒸日上了。

**馆址**

       本会馆办公处，我们所以暂借怡和轩，经济占最大的原因。因为如将办公处，设在本馆所主办的崇福学校，课室不足，将另租房屋为课室，结果每月总要百来元。他如职员杂役、茶水、灯火等等费用，总共计算，每月最少要二百余元。这二百余元，会馆不能不出，然而我们如暂在恰和轩各种费用如房屋、灯火等，都是现成的，这笔款便可节省，在经济困难的馆务，不无少补。

**募捐**

       本会馆基金并不多，改组后，各种开销又较多。常委员会成立后，预算另筹特别捐与月捐加以维持。可是将近一年，尚未进行。不进行的原因，无非因近年来，各途生意，极端惨淡。经商者，都有入不敷出之慨。种种困难情形，皆足使委员会无法进行。这是一种苦衷，并非委员会放弃责任。但是到了最近，因为津贴七八间学校，经常费特别重，使各委员不能不本着以前募捐的议案进行。现在我们已细察街市中生意较无影响，而对于社会事业较为热心者，向之进行募捐，成绩虽然有些少，但是还看不出什么，总之，欲解决本会馆之经济问题，全视乎我们做职员的及会员的态度。倘是我们本身不肯多多捐款，怎好再劝其他社会人士出钱呢？这似乎说不过去。

**计划**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新加坡的华侨教育能够统一。但是欲统一全侨教育，第一步，要先从统一闽侨教育着手。统一闽侨教育，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我们如果没有经费，去补助所有闽侨学校的话，我们办学的人，绝对不会听我们的指导，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

       自本馆改组后，我们统一闽侨教育的步骤，第一步是接办道南、爱国及崇福。其余的，是津贴八间学校。种种所进行者，离我们的理想还远，将来经费充足，希望能本着预定的计划进行。

**迎神**

       禁止迎神演戏事，现在已算解决，没有问题。本来阴历十月的迎大伯公，是种迷信事情，我们一定要破除，不能再举行。自改组以来，我们曾与各股头商量，已得他们之同意。但是对于关帝爷生辰、妈祖婆生辰、天公生辰的演戏，我们并未加禁止。这一年来，天福宫连众佛生日，都没有演戏。其原因，总不出下列二途：（一）生意冷淡，不易捐缘。倘是不足，做股头的欲自负担，亦感不足；（二）或许他们当事者，亦觉得演戏费钱是不好的。所以自行废止。

**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雏议**

**原文载南洋商报4.2.1929**

       鄙人以吾侨为一大团体，足领导全侨，进行一切兴革事业。回溯民国十数年来，侨界地位，绝无进展。由此之故，今当祖国革命成功，建设伊始，百事维新。海外华侨，亦宜乘时奋起，作有组织有秩序之大团结。一方面严守当地法律，表现华族之文明，一方面创设公共事业，增进侨界之福利。而初步着手，应从“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始。爰述管见，分为八则如下：

       （一）总商会本届选举，闽帮之新董事，照原订十三名选出，其中选者，几乎完全签辞，虽有承认，亦极少数，乃缴征诸候补员，而候补员亦多有不承认者。现方罗掘票数寡少诸人，冀以勉强成数。然截至今日，尚未达到半数。即潮帮签认，亦尚未备。此种现象，诚自有总商会以来所未尝见。似此，设可勉强签足抵额，而将来会务，能否发达，至为可虑。各人于此，觉责任所在，殊不容放弃矣。

       （二）总商会常年规定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开新董事会复选正副总理及各职员。兹者过期多日，不惟职员不能选出，而初选名额，尚缺乏几半，是此次选举之效力如何，当为众所共喻。其应存在与否，更无俟赘言矣。

       （三）总商会创办迄今二十余年，尚无正式章程。现所有者，仅为初办时之试办章程，久为大众不满。况现下制度，对于旧式之董事制，亦与采用委员制之国民政府，精神上显有抵触。其应速开大会，改革研究，更不容缓。

       （四）均属中华民国国民，而总商会分别省界府界，议董名额，亦以地域分等差，甚至总理有闽粤两省之轮流，不惟选不择才，且地方主义，封建色彩，浓厚至极，更觉不妥。

       （五）本坡我华侨各业各界社会会馆林立，而无一总会机关，以司枢纽，遂致数十万华侨，难免有一盘散沙之弊，失大团结之力，滋为可惜。兹宜联络各界全体华侨，创设一中华会馆于最适宜之市区，其关系我侨地位之进展，实非浅少。

       （六）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足以开化智识，健全身体，又足以供给公共娱乐，杜绝不正当之游玩，其有益于青年，至为重大，此数者急于兴办，而以附于中华会馆为最宜。

       （七）总商会会址，为本坡最适中之地，其面积至数万方尺之多，大半久置空闲无用，若拆卸重建新式楼屋，则大礼堂、结婚室、图书馆、总商会、中华会馆、体育场、游泳池，莫不可以次而创立其间，诚一举而数善备焉。

       （八）查总商会试办章程，并无规定会友请开大会之人数，是则不拘会友多少，便可请开大会，征集众意，重订章程，再行选举，以备改革建设上列各条所呈事项，爰集会友若干人，签名函请总商会，择日传单登报召集大会。

**新加坡全侨大会讨论创办中华会馆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3.3.1929**

**与14.3.1929**

       列位先生，今日假座总商会开全侨大会，乃为筹备中华会馆，及拨前山东惨祸筹赈会余款，救济豫陕甘三省旱灾事。查创办中华会馆之议，系发源于本年一月廿八日山东惨祸筹赈会董干联会讨论结束时所倡议。原筹赈会目的，非如此短期便要结束，其希望本在长期之努力，奈因未向政府注册，有碍本地法规，故不能长期生存。虽为全体公认之团体，究因未曾注册之故，不能不于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结束。当结束时，全会会员，因不忍吾侨终无一个总机关，以承办全侨事务，故一致表示愿合力组织中华会馆。但觉在中华会馆未成立之先，凡发传单等事，必须负责有人。筹赈会结束，名义已不适用，乃授权与弟个人，可以随时集众开会。二月五日，曾以弟个人名义函请原任筹赈会董事干事讨论一次，结果对于倡设中华会馆事全体赞成，并当场推举筹赈会全体董事为筹备员，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切进行事宜。其所负责任，乃限至总商会开会时为止。当时所以函请总商会开大会者，以商会地址甚大，中华会馆建筑，大可与商会合作，及一部分商会会员关于商会之选举事，既而商会签辞之董事，重再追认。选举既无问题，大会乃亦未开。合作与否，商会虽未明言，但其不同意之处，亦可略见一斑。时至今日，中华会馆之组织，盖已当另起炉灶矣。原与商会合作之本意，在于商会有广大之地址，可资大规模建筑之用。中华会馆所占面积应估价还值（约十万余元）非不名一钱，可擅侵占。今商会既未同意，关于地点问题，自当设法觅购。惟尚有一希望，中华会馆为全侨一大团体，或可请求当地政府给地，亦未一定。至中华会馆应要组织之理由，在座侨众，早已明瞭，毋待赘述。

       鄙人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则全侨之团结，关于爱国心理之演进者甚大。溯在民国未成立之先，吾华族受满清专制之桎梏，爱国观念，甚为薄弱。自光复以来，国内外同胞，爱国程度，进步极速。据弟鄙见，爱国与人民团结，实有至大关系。要爱国必须团结，既团结尤要爱国。何以言之，爱国而无团结，则如一盘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团结而不爱国，则团结亦属空泛。国内外之团体，到处都有矣。然而能集中力量以赴爱国事业者，恐不能到处而皆有也。此何以故，盖凡有团体未必悉以爱国心为基础耳。吾人诚能从兹努力，则爱国心理之普遍养成，以及爱国力量之总集合，虽或不能及今而见其效，然二十年以后，其庶几乎。其次，人民爱国心理，每亦有随政治局势而转移者。近日国内政界消息，颇觉险恶，必难免因而大抱悲观者。然吾人须知凡一国家之建设，本非可一蹴而成，此项困难诚为必经之阶段。如法美之革命，曾经长期间之痛苦。德废专制，亦经一度欧洲大战而始成，其苦痛犹今未泯。况以中国之大，较法美德等十有八倍，历十余年之痛苦未可谓久。即不幸而须再加几年，吾人亦认为革命过程中不能幸免之事，实无可奈何者。吾人万不能因事局之恶化，而遽冷退爱国心。况在几月前关税未达自主时，侨胞爱国，何等热烈。今自主已成，是宜益加努力。诸君须知华侨与祖国，关系甚为密切。祖国政府及国内民众，亦甚重视华侨，尤以吾星洲因地理上自然形势，更为优异。华侨人额几千万，足跡遍全世界，就南洋而言，亦有马来半岛、暹罗、缅甸、爪哇、越南、菲律宾等之分。惟历次国府代表暨学者名流等至南洋，必过星洲，即可见我星洲地位之重要。顾星洲无一华侨总机关，甚为缺憾。按槟城则有平章会馆，荷属各地到处皆有中华会馆，我星洲岂可久任其无。此一月廿八日各团体代表在前筹赈会开会时，所以一致倡设中华会馆。今日大会开成，鄙人无任欣慰，从此可正式选出筹备委员进行组织。中华会馆组织成后，则其他如华侨教育会、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游泳池等，皆可以次设立。教育会可特设视学员，请国府委派才望优越者充之，以收华侨教育行政统一之效，而策其前进之功。图书馆可增进侨民智识，并以改良侨界青年公余不正当之消遣。其余大礼堂、运动场等，于侨化教育皆有最大关系，不能不兼行并进。或谓一事未成何能做得许多，鄙见以为凡事如认为应做，则百万金俄顷可集。如不愿做，则一钱亦不易取。诸君尚全体努力，即纵十倍重大于此者，当易易耳。愚见所述，浅陋之极，望诸君不吝指教。

**陈嘉庚建议在星洲建筑中华大会堂（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939**

       本人深以星岛一地，为欧亚航道交通枢纽，处东方商业重要地位，侨胞寄跡于此，数达五十万人有奇，而竟无建筑完备之中心侨团，实属憾事。甚至侨民大会，尚须假借游艺场或学校举行，故本人认为适应今后华侨之需求，实有从速建筑星洲中华大会堂之必要。近闻槟城方面，亦有继雪霹之后兴建一大会堂之议，足见扩大华侨团结之组织，已为各地同胞所重视。关于重建星洲华人大会堂办法，本人意见，主张由现存之中华总商会会所或以华人网球会场地，为重行改建之地点，盖取其位处市区中心地，大会堂之建筑，因建有“中华”名义，兼为增进有关方面之联系起见，应将我驻星总领事馆并合在内，此外并须设立一规模完善之中华图书馆，藉为辅助社会教育之推进。盖教育为强国之本，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实属提高民智之要素。内欲求华侨教育之普遍，尤赖于有充实之公共图书以为推进之工具。又者，尚能以华人网球公会为建筑场地（按华人网球公会，在初级法庭之后，同济医院对面），则更可以此大会堂，兼容侨生公会于内。因该网球公会场地，乃数十年前巨商章芳林氏捐赠与当地侨生作为公共团体者，由是而南渡之侨胞亦可与侨生获一更密切之联络矣。一举数得，法善意良，莫此为最。至于会堂之内，至少应有一足容千人集会之礼堂。照此计划建造，需款当在二十万元之间。吾侨富商，为数不少，如能各献些许资力，众擎易举，事之必成，当无问题。

       本人相信，我之抗战，其必获得最后胜利，为期当在不远。观乎欧战之时，德国军备，世无与匹，但卒未及五十个月而告败。今此外强中干之日本，经我十有九月之抗战，已趋崩溃途中。其必不能支持四十阅月，乃意中事也。故此中华大会堂告成之后，尚有两大意义，一则以为抗战胜利之纪念，一则以为华侨团结之集体表征。且抗战胜利之后，吾侨将进而从事襄助国家建设之大计，其时负此领导之任务者，已非星华筹赈会，而乃应归诸最高之侨团也。故今日之中华总商会，必需早作完备建设之谋，乃克以当斯巨任。

**陈嘉庚谈总商会应取消分帮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4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各帮商人集合团体之最高机关，宗旨在求增进同业利益及襄助社会福利事业，成立迄今，凡三十六载。创设之始，原由闽粤两帮，分选正副总理一人及议员协理二十四名为共同负责职员。及至民国三年，乃依农商部颁布规定商会之第十条文，改为会长制，增设会董三十二名，任期二年，会董限额，为福帮十三名，广帮五名，潮帮九名，琼帮二名，梅埔及三江一名。每届正副会长，例由闽广二籍人士分任之，但不能同籍连任原职。历届正副会长，闽粤互调，原因在此，此例相沿，及今未废，社会帮别，因以存在。迨及抗战军兴，海外华侨，团结救亡，呼声洋溢，曾有提议取消商会之分帮制度，以为同侨团结之示范，嗣以狃于习例，一仍旧贯。记者昨以商会分帮制度问题，征询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陈氏对此，发表意见，据谓商会会董人数分帮限额，与及正副会长不能同籍连任，此种制例，始于数十年前，当时因风气未开，各省侨胞之畛域观念甚深，故不得不以此方式，适应该时华侨社会之特殊情形。今则华侨文化程度，日高一日，各籍侨胞，合组商店或联合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者，不胜枚举，省界观念，已渐消除，实为同侨团结之良好现象。商会为全星商人集合机关，似可不必于会董中划出帮别，亦不宜于会长不能同籍连任，凡具有担任会长能力及资望，并为当地政府所信赖者，无论何帮均得选任。犹忆去年欧战发生，当地政府为预防金融外溢，爰有统制外汇之颁布，该会为吾侨商人及政府便利起见，乃商诸当轴，准由商会设立统制外汇办事处。又如最近政府实施人息税，倘政府能准在若干资额以下由商会代办者，则于政府及侨商，亦将便利良多。商会欲取得此种联络及许可，必须负责主持人，为当地政府所重视，余之谓会长不但宜具社会资望，而且应为政府信赖，即此故也，至于废除商会之上述帮制，其法甚易，只须召开会员大会，经多数会员之同意，将原定章程，加以修改便可矣云。

**福建会馆改良丧仪宣传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4.1936**

       列位同胞，今日为福建会馆丧仪改委会第一次宣传演讲。福建会馆改良丧仪之事，报纸上迭有记载，本委员会亦曾发表宣言。所以再在总商会演讲者，一、以报纸销数有限。二、以本委员会分六宣传区派员演讲。出发时，先应在适宜地点开一演讲会。三、以做人既以决志改良丧仪，则亦应有工作。四、则在此演讲，听者甚众，亦必可得多数人之帮忙。数日前闻洪宝植先生言，彼预一妇人丧事，丧家照例设席，彼以于理不合，不肯就食，并请丧家勿尔，时在座潮籍侨胞多位，曾与同情，不肯就食。是以，我人希望各位同志，能如上述潮籍侨胞，实行帮忙。

**丧仪今昔观**

       关于丧仪，四十年前，较铺张者，惟富人耳。时本坡有甲必丹，为陈金钟及章芳林，大富商则有万兴号等。惟其时热闹亦不过以轴随棺，锣鼓和尚继之而已，殊不若今日之怪形怪状。昔者，最有钱仅如此，余者不及，今则家资近三四千元者，即大吹大擂、彩阁、弄狮、弄龙、装戏，光怪陆离，无所不有。有时即以友谊，思往相送，亦无不因此而折返，然此风起于迎神。昔者，本坡分五股头，依例迎神。三年一迎，五年二迎。至三十余年前，众以有关国体，因在天福宫集议废除，谓以后若欲迎者，仅能迎一香亭云云。夫迎神人尚认为公事喜事，而复以其有关国体，集议废除。今复用于私事喜事，不知其可。

**丧仪与爱国**

光复以前，知爱国者少。今日知爱国者多，此学校报馆兴起之故耳。惟爱国应遵守国家颁布规条，蒋委员长以民尚奢侈，因倡新生活，以礼义廉耻为纲。礼义廉耻四字，因先贤之遗教，蒋委员长特倡之耳。然则今日之丧仪，合乎此耶？以言礼，人子之于父母，生事之以礼。今日之丧仪，合乎礼乎？以言义，义者宜也。今日之丧仪，合乎义乎？以言廉，廉为贪之反，即妄与妄取，安得为廉。只顾一已私利，不虑社会祸害，又何足为廉？至于耻，前已言之，此殊要紧，无耻则不足为人。因个人之体面，使国家蒙耻辱，人知不可，我知爱国者，必不忽略礼义廉耻四字耳。

**丧仪与自立**

       爱国自立，必先使民自立。国难严重，于今为极。昔者我国先亡于元，再亡于清。元灭中国之时，与辽金并进，中国疲于应付。乘危而起，事出有因。清灭中国之时，叛者吴三桂引狼入室，自侮人侮，理固当然。今敌图我，毫不假借，明目张胆，一何可恶。今日之日，岂元清灭我之日可比哉？抑尤进者，元清文化远不及我，灭我之后，存我文化，开放政权。我人前后二次亡国，同得光复，信非偶然。今敌一旦灭我，政权将无由开放，教育将立与消灭。现东三省之烟厕林立，毒物流行，甚至于雇用年少貌美女招待，以资引诱，则知人种亦与以消灭。今日国难之严重，又岂昔之可比耶。自助而后人助。……我人于此，全仗人固不可，全仗已亦未能，故须仗人，亦须仗己。仗己则全仗政府亦不可，仗政府亦须仗人民。年来政府已大振作，如有犯法，枪毙者既不乏人。鸦片禁绝，去年闽省已不复种。他若公路之开辟，长十余万里。教育之强迫，亦已见诸实行。调查户口，行征兵制，亦均一一实施。至于广西，人已目为模范者，此皆列位之所知，毋待赘述。惟仅靠政府，亦殊不可，故须全民振作，而后乃可共禦外侮。且敌人图我，良以（一）视我如散沙；（二）世界将大战。今世界和平渐有实现之象，大战已见不复爆发。苟能全民振作，敌将奈何？他若我侨在外，试问将自承为中华国民否乎？然则我人对于国家之服务，又觉如何？我人行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何异登大广告反对祖国政府？窃思即以电影宣传，亦不若此之甚也。我人爱国家，而不废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可乎？

**原文载南洋商报13.6.1936**

       婢女考团经于前日由港抵星，侨社人士，对该团此来任务，颇甚注意，良以婢女生活，每甚离奇，人权关系，尤为重大也，记者为此，曾于昨日，往晤陈嘉庚先生，询彼个人对新加坡婢女问题意见，兹就陈先生所称各点，分述如下。

**婢女制度存废问题**

       记者问，婢女制度应存应废，言人人殊，大抵主张废除婢女制度者，无非以婢女生活，有乖人道，故尔云云，至于主张保存婢女制度者，则谓刻下农村破产，农家子女，无法生活，以此卖出为婢，亦委屈求全之计也云云，先生于此，意见如何？陈先生称，此一问题，关系甚大，亦至复杂，本人于此，未有成见，是以亦无任何意见，可供发表，大概婢女调查团此来，目的当在调查当地政府婢女保护律例实施情形，调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究竟已至何地步，婢女本身，究竟有无得其实惠等等，若然，则余将有言。

**星洲婢女保护律例**

       新加坡现行婢女保护律例之本身，本人尚觉满意，本人以该律例若能切实施行，婢女生活，必得改善，一切惨无人道之虐待情事，亦可减免，惟政府对此律例于实施上殊未得一完满结果，盖实施方法，尚有待乎改善也。

**忆参议局讨论情形**

       记得当日参议局讨论此项律例之时，本人适为参议局议员，当时本人曾提议政府每年至少须在华字报上刊登此项律例实施办法广告数次，以广宣传，当时本人以蓄养婢女者，多为华妇，若政府仅将此项律例在宪报上公布一次，殊难使人周知，律例公布既未使人周知彼不知有此律例者，势必不知虐待婢女为于犯法律之行为，则欲其幡然悔改，已不可能，何况此项律例施行之后，对于虐待婢女之取缔，又不严厉，是以此项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婢女生活即有稍加改善者，要亦限于局部，大多数婢女，当仍在悲惨世界，渡其岁月也，当时本人在参议局所作上述的华文报刊登广告提议，曾获通过，惟事实上又未见诸实践，不知如何，总之，律例虽好，若不切实施行，亦复无补于事。

**主妇文盲提醒匪易**

       陈先生叙述至此，谈及文盲问题，陈先生称，事实上政府施行此项律例，在华文报刊登广告之外，尚须再觅适宜途径，帮助推行，若仅登报，效力亦复有限。目下新加坡读报者少，而读报者又往往未必蓄有婢女者，其读报而能以婢女保护律例告诸蓄有婢女者尤千不得一，至普通蓄婢女者，每多目不识丁之妇人，彼等既不知有婢女保护律例，又未阅报，是欲彼等之不依旧虐待婢女，不亦难乎，故谓除登广告之外，尚须寻求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也。

**未行登记婢女生活**

       在今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情形之下，蓄婢而行登记者当然甚多，蓄婢而未登记者，相信亦当不少，蓄婢而行登记，所蓄婢女已得相当保护也可知。蓄婢而未登记，所蓄婢女生活情形，又可想见，相信此等婢女之被虐待者，当必照旧备受虐待。俟至一朝逃出，投报警局，彼身受之痛苦已不知几许，斯时政府即将虐待者判罪入狱，在此文盲遍地之今日，相信如此亦徒使监狱之内，增一犯人而已，于社会将无影响，惩一儆百，更难言矣，故除登报以外，再觅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亦为当务之急也。

**蓄养婢女不行登记**

       至于蓄养婢女而未进行登记者，相信其中必有一部份出于从未知有婢女保护律例，故亦未能觉知其当履行登记手续者，同时亦必有一部分出于藏匿不报，明知故犯者。前者，若能广事宣传，即可减免，后者则当详细侦查，无使疎漏，若能于若干住宅或若干街巷设侦查一人，以资督察，尤为有效。总之，须政府有意严格推行，事方有济。

**养女生活应与注意**

       婢女保护律例实施之后，蓄养婢女者，势非履行登记手续不可，惟其中藉言养女，规避法律责任者亦复不少，究竟养女与婢女性质有殊，藉言养女，阴行虐待，事实上与虐待婢女同出一辙，欲免此弊，政府自宜注意养女生活，最好于养女一项，亦有一种管理方法，或于某一特定期间内，派人前往巡察一次，使彼狡猾之辈，无从施其毒手，诚能如此，于事实上想亦有所补助也云。

**体育与运动会**

**为天津水灾筹办运动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4.12.1917**

       弟非学界，对于教育，茫然无知。惟运动一科，闻关系卫生为至大，故又称曰体育。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为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学界诸君，知之最稔。惟学生父母，多未明白，指为游戏而反对之。至于运动会，洋人视之尤切，年必开一次，以比较之。优者益勉，负者振奋，故能咸臻完美，而有益于身于家于国。若闭门自矜，安知鸟之雌雄，势必日退而后已。况属同侨比较，可互相勉励，优负不足为荣辱。数年前菲律宾发起远东运动会，集中，日，菲三国健儿，运动比赛。第二次会场，设于上海，两次日本均失败，其选手致书全国谢过。国人引以为耻，于是留心奋励，悉力研究。本年会场轮设，日本竟占极优，而我国最居末后，贻笑全球。闻日本有不上分数之人，终日哭泣不食，自怨贻国家羞。其民气如此，实在可敬。我国学生父母，爱子如金，至一闻运动会，则生反对，其阻碍体育为何如哉。兹适学界诸君发起救济天津水灾游艺会，愿集阖埠学校开运动会筹赈之场，弟知到时各侨胞必争先恐后而来，所谓一举两得。深愿学生父母猛然省悟，作有益之爱为幸。尤有进者，则希望部长及各校干事员，和衷共济，格外筹备，庶秩序整齐，竞争有法，岂徒学界之光哉！

**国术、道德与救国**

**陈嘉庚在怡和轩欢迎张馆长及国术**

**南游团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0.1.1936**

       张馆长，国术南游团诸先生，诸位来宾，本俱乐部今晚开会欢迎张馆长暨国术南游团诸团员，蒙诸位光临，实在荣幸，小弟于此，用特代表本俱乐部对诸位道谢。张馆长这回来叻，和以前宣慰专员，特派专员，以及过往政客不同，张先生感觉国家需要体育，尤其需要国术，因此乃于前年在京招集各方能人，举行国术考试，以资提倡，张先生不惟考试提倡，还率队到各省去表演宣传。当时曾到广东，有来南洋消息，我们正在欢喜，讵未果行，张先生这遭来此宣传国术，使人人知道祖宗传下的国术，现在已经复活，并且，不久就要完全恢复，何等称心。

       张先生所做的事，小弟仅知一小部份，而已洞悉张先生所为，均为实事求是，所以今晚，小弟用不着客气，随便在这里说几句话。南洋华侨有个习惯，就是对国内派来专员，每每开会，欢迎，颂扬备至，以前如此，最近也是一样，华侨一边恭维，专员们一边夸耀，彷佛功劳太大了，了不得了。国内专员到南洋来如此，南洋华侨到国内去，也往往没有两样，无非是彼此铺张，相互颂扬，这应该说是国人公有的习惯，其实，大家就尽点义务，也都是职务份内应尽的事，何况事实上大家都没有实在的工作。

       张馆长此次来叻，小弟也曾会过几回，张馆长不喜欢恭维，小弟素来也不善恭维，至于今晚所说的彼此铺张，相互颂扬的话，原非捕风捉影，大抵都有根据，我们先说对于华侨这方的根据：

       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当时国内难以立足，所以到南洋来，南洋华侨因此多所接触，这本来是事实，可是，华侨一回国内，便往往可以听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以华侨对国家有极大功劳，说这话的人，大概以为革命，只推倒满清便足，不须其他了。可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宗旨，革命一事，殊未如此简单，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的革命和人格的革命。如果人人人格不加改革，心理不加改革，就是满清推倒，袁世凯打倒，军阀弄倒，也是无用，不惟无用，地方更要纷乱。我说，革命可分公私二种，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公的革命个人做不来，不能做，可以让别人去做，至于私的革命，如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孙中山先生遗嘱里头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革命应该人人能够共同奋斗，事方有济，遗嘱中又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段说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朝野上下，就须人人奋斗，继续努力，如果处处敷衍，不务实际，不惟不配称同志，也还是革命的罪人。事也如是，又何足称为革命之母。

       对于华侨不务实际的事实已如上述，对于政界中人，如部长，厅长，师长，每言每日办公时刻多少，成绩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中国农村破产，经济破产，一些应做的重要工作，都未做到。轮船，飞机，汽车，不惟不能造，而且不能用，大逾千吨的轮船，已经无法开到南洋，飞机无论空军空邮，自己也都不能驾驶，动辄聘用外人。至如汽车，欧美竞赛，每小时开行二百余英里的，我们那个开得，这些这些，朝野上下，应该引为奇耻大辱，而后乃足以言改革。

       又如广东来说，粤汉路是中国交通上的脊骨，全线不过一千多里，满清时代，筑成甚多，所余也属无几，却是迁延至今，尚未造好。试看苏联，苏联从黑海到西伯利亚铁路，长七千余里，三年之间，居然完成，等到通车，才向世界宣布，能做事的，每每不尚多言，吾人何堪比拟。至于福建，闽南有一师长，在职五六年间，不惟未为一善为闽人福，甚且迫闽南百姓，栽种鸦片，自己也自经营鸦片，共产党一来，他又不能抵抗，不能抵抗就要走。走时，别的顾不得，倒管到自己一大堆鸦片，用几十辆汽车运走一大批鸦片。

       这师长也还借着航空救国的名义，从百姓身上剥了几十万块钱，说是要买飞机，结果几十万块钱，仅仅买到一架。共产党来了，顾不得，连这一架也给共产党拿去了。

       当时小弟有间分行，估值三四万元，在官兵退走，共党侵人，纷乱之际，被人抢去，抢的虽不是共党，但连我的也都被抢，足见其时全城商民损失之惨了。

       记得当时前数月间，共产党曾一度侵入湖南长沙，当时兄弟也有分行在长沙，可是，长沙的分行却没有损失。论共祸之烈，湖南政府衙门及教会礼拜堂均被烧毁，其情形殊不次于闽南。可是湖南因官军为有秩序的退走，所以商民也就未有任何损失。

       闽南这位师长对闽南百姓的蹂躏无以复加已如上述，可是，当这师长到英荷两属游历时，师长依然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到处夸耀，而英荷两属的闽人，也到处开会，到处欢迎，而且照例颂扬备至，恭维极点，师长所为固无足论，试问华侨所为有价值么？华侨又有是非么？今晚为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小弟说了这些，原甚不对，不过，张先生实事求是，小弟有感于中，也就按捺不住。总之，小弟希望英荷各属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千万不要和过去欢迎政客专员一样的欢迎，张馆长此来为提倡国术，小弟已知一二。记得我国数十年前，也有一度国术化，其时小弟年少，闻长者言，乡里之强弱，夜晚往观，即可了然，入强乡，可以听到三种声音，弱乡则否。三种声音是什么？一为读书声，一为打拳声，一为弦管声。小弟生于集美，少时集美尚有余绪，未行全绝，近数十年，此风已不可复有，有的是吸烟（鸦片）声，赌牌声。小弟谓提倡国术，应先打倒鸦片，张馆长过去，曾为全国禁烟委员会主席，小弟知道张馆长深知提倡国术，必先打倒鸦片。中国年来，禁烟认真，说不定三年五载，即可禁绝，所以张馆长此来提倡国术，殊称及时。

       张馆长此来，弟闻有人谓国术现在不适，不能抵敌飞机大炮，现在张馆长于此已有解释，且报纸上也经有人代为辩白，社会已经明了。记得前此，有个朋友自南昌来，据称南昌空校招生，须中学毕业乃有投考资格，当时六百人投考，结果，及格录取的仅八九十人，其实既经应考，其自觉资格相当，自意中事，而竟未能如愿以偿，想因身体孱弱，五官发育不完全以致落第，也未可知。及至其后，此被选之八九十学生，又退去几十人，仅存三四十人，直到毕业，我想当不出十人，由此看来，足见体格不完全，飞机就不能驾驶，大炮无从驾御，小弟适才所谓根据，就是这些说。兄弟对于国术，有三见解。

       第一，国术和国文一样重要，国有文武，文是国文，武即国术。国文不可废，故今日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文字为辅。国术也不可废。国术亦当取本国武术为主，外国体育为辅。

       第二，国术不惟关系体育，而且关系卫身，日本除柔术之外，并取我国武术，所以对武士道极重视，现在人家正拿了我们的国术，我们却来丢了国术，这怎可以？

       第三，国术可以用于消遣，消遣原极重要，青年人空闲之日，不以国术为消遣又将何为。并且，人的好歹，决于十余岁至二十岁之间。在此期间，工作之余，既不能将之关在屋内，不以国术为消遣将何与？说到消遣，对于业已发达的外国，花样自然很多，譬如体育场，图书馆，电影戏以及新发明的播音机，说也不尽，可是，上述数者，不惟我们乡间未有，即城市也都未能全备。我国乡居人民较住城人民为多，如此，不与一正当消遣又那里行，张馆长提倡国术的意义，今晚道及的，想不及二三，未道及的又不知多少。总之，小弟对张馆长提倡国术，有三感想，第一是张馆长既已彻底认清这是应该提倡，值得提倡，急需提倡的事，就该和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一样，一心一德，锲焉弗舍。今后若有什么院长，军长，省长或更佳位置，也都勿就，专心致志，提倡国术。第二是联络各省，并赴各省表演。第三是多培养人材，为各省用。

       弟阅报知张馆长此来，与本坡中华总商会接洽，此举诚是。新加坡华人最高机关是中华总商会，荷属则为中华会馆，张馆长前此曾来函本坡中华总商会，这遭又与中华总商会接洽，承认中华总商会为华人最高机关甚是。弟阅报知张馆长除在本坡宣传国术外，兼欲筹募国体学校经费，表演办法，已详报载，筹款办法却未见到，总之，际兹不景时光，大款虽难筹措，尽心而为，当不至使张馆长失望。小弟希望商会会长及董事，能为此事尽力。相信商会会长及董事能尽力去做，必能得到各帮商家团体的拥护及帮助，如果大家真能为此事诚心努力，将来新加坡即可为各处模范。小弟以华侨对祖国能帮助的不外二三项，第一出钱，第二出力，有钱出钱，无钱就须出力，第三，出钱出力之外，还须诚意。

       弟以世界各种族，对于各人的国未必都爱，对于各人的家，大抵都晓得爱。总之，爱家的，无不爱其子孙，爱子孙的又无不爱其子孙强健长寿，有好道德。既然如此，也就应该叫子孙学习国术，自己也就应该出钱。如果荷包不打开，子孙又那里能够得到幸福，如果有人怕出了钱，不能益到自己子孙，倒益了别人的子孙，其实如果这样，也复甚佳，因为别人的子孙好了，我们的子孙环境一好，也就可以变好，岂不一样。

       最后，弟引一言为证。古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怎么说法？这就是说，积善之家必能辅助子孙，使子孙得到幸福，所以我们要子孙得到幸福，应该辅助子孙，辅助子孙，又莫善于出钱提倡国术，今晚的话，就到这里，现在请张馆长指教。

**筹赈山东惨祸全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5.1928**

       诸君，今日侨胞各团体假总商会开山东惨祸筹赈大会，举弟为主席，弟实不才，未敢承受，无如诸君过爱，屡辞不获，故勉任其难。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大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如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济。古人之所谓救灾恤邻，原属慈善性质，不分畛域，一视同仁。换言之，即全世界人类所应尽之义务。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且属同文同种，而从来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所谓救灾恤邻之义何在。乃今且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无异乘危抢劫，落井下石。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

**总不外两项办法**

       对待办法不外二项，第一就是抵制，第二就是筹款。抵制之事，当守居留地法律，切不可轶出范围。若或轶出范围，是破坏抵制也，故应行文明办法，实行经济绝交。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不难驯服其野性也。惟是抵制之事，十日来坡中已屡发现传单，报纸亦屡有登载，吾侨已经实行。故今日本会可无须讨论，请到会诸君注意，至荷至感！

**我们是和平的**

       今请言筹款问题，筹款用途，弟意亦有二种，即助战费与赈难民是也。然以我国之弱，万无开战之可言，譬如有一巨室，人口虽多，大都妇孺童稚，而突来群盗，各执利器，任意抢杀，试问诸君应趋避乎？抑与死斗乎？吾知诸君必以趋避为宜，故今日我国民政府只有退避，而无开战之准备。夫宣战既不成问题，则助战费之事，本会今日亦可免加讨论矣。

**应当讨论筹款救济**

       今日所应讨论者，就是如何筹款救济。如死者未葬，伤者未医，逃亡离散者无家可归，若能捐筹巨款以救济之，则伤者可医，散者可聚。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一日，故弟意救济难民，即是惩治强暴之初步，未悉诸君以为如何。今日本会之组织，弟意有数条应加讨论：（一）举正副会长、财政、董事及募捐员；（二）本会之名称；（三）赈款应汇交何等机关，但此问题尽可由董事部从长计议，目下毋须提及。唯恐诸君急欲知其大概，弟敢以所知奉告。现南京政府谭、李、蔡诸委员，已命令组织直鲁赈灾委员会，设仁济善堂于上海，委员长为许世英。本会之款，大致不外汇交南京政府所设立之此等机关也。

**主席之希望**

       （四）此回筹款，与平常不同。既望诸君踊跃，尽力捐输；又望诸君急速将认捐之款交出，以便汇赈，万万不可如前，每次捐款，催收至数月，尚未清楚也。诸君爱国热忱，毋须鄙人多赘；（五）捐除意见，缘已往多次之慈善组织，虽筹款原无权之可言，而亦屡屡发生枝节，或设多处机关，或立另一名目，互相倾轧，甚至街头巷尾，张贴标语，毁骂当局。此种行为，实足阻碍进行。夫慈善原属义务天职，已如前言。故吾人应深明大义，遇功勿居，见义向前，庶散沙可合，意见可消矣；（六）本会完全为筹赈山东难民而设，诸君凡有指示发挥，请认定此旨，勿过事激昂，涉出范围，当恪守居留地法律，勿干例禁，实为万幸！况此会场系假自总商会，万一发生事故，未免阻碍后人之提倡慈善事业也，故弟于此再三致意云云。

**山东筹赈会各社团代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3.5.1928**

       列位代表诸君，今晚之召集此大会，即属各团体代表之第一次大会。查本会之成立，原承各团体来函发起，于十七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开全侨大会时所成立。计当日由公众举出正副会长两名，及董事三十二名外，其余一切任务及进行办法，悉委托董事部妥议进行。当晚（十七号）经即召集各董事，在本办事处开会，继续讨论是日大会未毕之议案，并承大会之委托，举定财政查数文牍庶务等职，协同办理。嗣又曾开董事会议两次，讨论各项办事细则。但此次各务以赶急进行之故，而召集全埠各社团代表大会，又须筹备种种手续之故，所以延至今晚，始能召集此第一次之代表大会。至本会各职员之组织法，本席今仅简单将组织之财政委员团六名，为诸君言之。查所举定之六名财政，其中以一人为主任，余为委员。此五名之委员，每晚轮值一人驻会监收各处交来之捐款，各有专职，斯各有专责，如此组织，是已缜密之极。

**事虽慈善关系国民极巨**

       今进而言本会之性质，及今晚之开会。在本会虽属慈善事业，但关系于国民极为重大。微本席言，在座诸君当亦共悉，今旷观数十年来，凡办理各种慈善事业，有劳力工人，不须鼓吹，不须提倡，而自动捐资加人，有如此次之踊跃者乎，毋亦由店东或资本家出而办理已耳。且今番不独各劳工自动奋起，即妇人孺子，亦多自动捐输，如昨日大埔黄暖娘女士之到会拔钗助赈，及其稚孙之捐款五元，均足以征此次国民爱国之热忱。想各因得闻此次东邻恃强压逼之甚，故有如是血诚之表现。由此观之，近十年来，我国人不独男界智识已有进步，即女界智识亦已大有进步耳。又查本会本非怡和轩同人所发起，亦非恰和轩所召集，盖由各人各以良心上所感触，联同发起而成立本会。

**办事切要统一**

       今各团体代表诸君既如是热忱，投函加入，愿为本会之发起人，在本会今既得庆成立，则自应视本会为办理此次赈务之统一机关，何能又人各将款自向祖国政府汇付。该使人各将其捐集之款汇去，不特国民政府莫明此处筹赈之情形，抑亦令国民政府中人忙于应接，手续綦繁。就以对外而言，外人久已讥我国人为一盘散沙，倘于今次之赈款，仍然各自为政，岂不益贻散沙之诮，而蒙同侨莫大之羞耻乎？查当日召集之传单，原就已知其已有团体者而发，其外之未有正式社团，及查访未周者，因未及派以传单。弟今日所要求于诸君者，诸君须明白怡和轩，亦不过本会会员中一份子，其主体仍在百余个之社团。在本席个人之意见，本会之成立，实系一大公无私，无偏无倚之机关。况当日大会选出之正副会长，系由大会公举，卅二名董事，亦由大会按照商会组织法分帮举出，由众通过。其余各事，亦悉由大会委托办理，已力求完满上进行。今本席得闻有人将款自汇回国，且汇款者又属本会之发起人，设人人如此，又将自置于何地。虽曰彼自将赈款自行汇付，与本会无关轻重，其如贻人讥诮，谓我小小之事，亦不能统一进行何。况今之经济绝交，原是一最文明出于良心上之举动，设众志亦如是不能统一，是即破坏经济绝交文明举动，可不慎歟。唯一之鹄的，毋出于范围之外。就今晚所会议者，唯一目的，则在筹款汇赈，此外均不理其他。至承大会举出之正副会长，及各董事，诸君须知此中人均非无业之闻人，然以既受公众付托后，如正副会长，财政查数文牍庶务十余人，每晚均到会办事，自甘牺牲其本业本职而尽力于此。但除此专职十余人每日到会办事外，尚有董事十余人，初拟举任外出募捐，嗣恐难于普及，故今晚特召集各社团代表出任本会之各位干事员，开此大会，讨论各自负责，自向其社团募捐，以求普及。设尚有在于到会各社团之外，而为各社团代表募捐力所未逮者，本会自应再举未受专职之各董事出面募捐，祈尽全侨而普及之，至到会诸君，对于募捐进行，有何伟划，请示教之。

**山东筹赈会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9.1.1929**

       山东惨祸筹赈会，自成立以来，已历九个月之久。论其成绩，昭昭在人耳目。昨晚该会开董干第四次联席会议，亦为该会最后之会议。当晚到会者，董事部二十四人，干事六十四人，妇女部四人，总共九十二人。八时开会，先由李铁民君用闽语宣读上期议案，继由李亮琪君再用粤语翻译，然后主席陈嘉庚君宣布，谓今晚之董干事会议，早已在报上及传单上说明，为本会之最末一次会议，欲将前九个月半之工作，作一结束。现可分为三层说明：（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二）报告总收人及总支出之账目；（三）讨论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应如何办理处置。

**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

       按照第二次董干会议中所报告，本会结束之日期，最少须在中日济案完满解决后，然后结束。照目下情形观之，本会似不应就此停止工作，因我等之初衷，还未达到。但处于居留政府之下，我们不得不尔。盖华民政务司，曾数次传问，要求一确定结束之日期，故乃以本月底对。设诸君质问政府有无正式公文通告或有无命令于本月底结束，弟可直言一字“无”。盖政府当局对于本会，极表好感，彼不过以个人之感情，用口头上之通告。在去年八月间，华民政务司即以个人之私情，询问山东惨祸筹赈会，究竟于何时为止。当时但答以特别捐至九月底，当不再进行。月捐尚未收清者，当再收清。及至十月底，华民政务司再托人及本身问弟，质问结束之确定日期，仍以本月底对。但自十月至现在，虽中间已有三个月之久，然终未在诸君面前详细发表。此种苦衷，诸君当能亮察。适才谓政府对于本会颇有好感，而华民政务司之所以急于知本会之结束日期者，总括言之，最少亦受有三方面质问。（一）某西报对于本会之不满，每将本会每次所开会之记事，翻译成文，送交华民政务司；（二）某领事之再三向华民政务司交涉；（三）政府探员之报告，故当时弟曾对警察厅及华民政务司坦白说明，谓本会对于地方治安，最低限量，当予以帮助不少，政府答覆亦属至理，盖本会未曾经过合法手续，在政府注册。政府不过暂时作情，焉能作为长久，且加有三方面之攻击，故不能不询问，彼三方面人之攻击。其最重要者有二点：一、本会未经过注册手续；二、即是经济绝交。在第一点我等当得承认本会与居留政府法律有抵触，因目下本坡各种社团，无论其为大社团小社团，若不经政府合法之手续注册，政府即视为私会，可以将该社员尽数拘捕。再者已注册之社团，其人数亦有规定，如树胶公会只限于树胶商，硕莪公局，只限于硕莪商。现本会乃集合商学工而成。所以在第一条，我们当得承认。至第二项因为各人之行动，乃各人之自由，何况属于爱国之事。比如邮政局，为英人所建造，其所用之铁器洋灰以及其他，必定采用英国货。英国人如此，他国人何独不然。设有中国人，不购某国货，而购中国货，此种举动，是否为违法，稍有知识者，当不假思索，而必答曰：不属违法也，于居留地法律上实完全不相抵触。故今晚本会之所以宣告结束者，乃因素来缺乏一种相当之公共会所，有以致之也。

**二、报告总收入及支出**

       收入

       一、对捐来赈款总共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五百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一、峇株改造蔡公时铜像三千元。

       一、马六甲，同上，二千九百元。

       计三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百一十一元五角。

       支出

       一、对十二次汇交国府申银一百二十五万元折叻银一百零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元。

       一、对汇蔡公时申银六万元，折叻银四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和本银行存叻银四万五千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半。

       一、对庶务员去叻银八百三十七元一角八占。

       一、对日清尾存叻银二百三十元一角三占。

       一、对电费去叻银四百五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车税去叻银二百一十七元四角六占。

       一、对购置去叻银三百九十一元二角半。

       一、对什费去叻银一千二百七十一元五角六占。

       一、对辛金去叻银二千七百二十八元六角二占。

       计十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以上所报告乃至昨为止。月捐册总发出七千六百余本，现尚有三千七百十二册未收。特别捐册共发出七千六百余本，尚有三百外本未收。至于特别捐、月捐、货捐、演剧筹款，收足时，可在一十万元以上，所有开支账目大概如此。

**三、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之处置办法**

       从上面之收入及支出观之，我等可知尚有一十万元以上未收之款，银行有四万余元，日清尾有二百余元，此种未完之手续，我等此后势不能开会讨论，因我等须自守信用，亦不欲使政府当局有不满或干涉之事发生，故深望诸君加以讨论，俾本会有较为美满之结果则幸甚矣！

**陈嘉庚为日本突然毁弃济南惨案**

**解决条款致中国外长电文**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29**

       王外长先生鉴：日兵未退，先许言和，让步已极。乃日本无厌反覆，损失不赔，事关国体，万万不可迁就。况民气初盛，抵制正剧，乘兹国货振兴，愈迟愈效，利害关头，欲速不达，务希毅力坚持，铭感不尽。

陈嘉庚叩尤

**陈嘉庚对日问题之检讨**

**原文载南洋商报4.1.1932**

       欧战而后，各国鉴于战争之惨剧，乃深思远虑，为防微杜渐计，期有以消灭第二次大战之发生，故有华盛顿九国条约之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凯洛克非战条约之订立，其联络不为不周，设计不为不全，历年适逢有一国争执，多赖国际联盟会裁处，莫不化干戈为玉帛。此次日本平地风波，乘中国天灾人祸之惨，无故攻占东三省，既占我领土，复杀我人民，又藉词以欺国联，希图蒙骗全世界，然国联安能受欺，故屡次决议，促其退兵，还我领土，乃日本不但不退，且口是心非，视国联如无物，跡其贪狼野心，实不在德皇威廉之下。

       彼所以轻视国联，演成此种暴行者，毋亦以为今日之列强，如英则财政困难，美亦失业者众，法可引为挚友，捨此数者，其他更不足道，然此多出乎武人之眼光，以为良机可乘，实践田中之遗策，以餍国人之大欲，国联其奈我何，不知英国所谓财政困难，乃一时对付失业工人之经济，与军政消费之奢靡，欲藉是裁减其供给，至其商民之富裕，胜过日本十倍，何关大局，若美国之财富，甲于全球，又何关乎工人之失业，日人竟视为良机可乘，真井底之蛙耳。至于法国虽可引为好友，然当论其举动是非，若如此凶恶强盗，荒谬残忍，自欺欺人，人格已濒破产，而欲希望文明友邦，不顾公理正义，同其作贼，岂可得耶？

       凡最无人格之行为，莫甚于荒谬与无耻，盗者窃肉于市，只知有肉，而不见有市人，荒谬至极，无耻至极也。今日日本之举动凶贪狠毒，世界皆知，尚欲反指鹿为马，设词遮饰，何异于窃肉之盗，岂尚有国家人格耶，然其全国人士，对于占夺东三省之见解，亦未必一致，以余之观察，至少有下列数派：

       1.饭碗派：为此次发难之主动者，武人也。武人恐裁减海陆军备，危及自身饭碗，故主张对外侵略，以巩固其地位权利。

       2.霸王派：主张积极侵略，实行田中政策，先占满蒙，继占中国，然后鲸吞全太平洋群岛与印度。

       3.贪狼派：以东三省偌大富源，若得归入其版图，则人口不患过剩，子子孙孙，可享万世无疆的幸福。

       4.侥幸派：颇知灭环绝伦之举动，大亏世道，虽中国一时不能抵抗，任其为所欲为，而列强或不甘坐视，前途荆棘，无如一见肥肉，垂涎三尺，冀可行险侥幸。

       5.悲观派：此派稍有智识与良心者，莫不知乘危抢劫，落井下石，为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况背约弃信，以一国之力，欲敌全世界，何异以卵击石，其覆败决不旋踵，然犹因循犹豫，噤不敢言，恐蒙不爱国之罪责。

       6.革命派：共产党，社会党，平素明争暗斗，出没起仆，无时不思推倒帝制与军阀，惟机会甚少，未克如愿，此时正利其国家有事。全神外注，彼乃得行其革命之目的。

       以上数者，各有其见解之背景，故利令智昏，荒谬狠毒，如惨杀我旅韩华侨数百命，冀可激我之报复，以遂其野心，又如藉词人口过剩，积极对华侵略，皆此种复杂荒谬之见解所促成，不知防止人口过剩，惟有节制生育，方为正当办法，譬如贫人欲多蓄儿子，而行凶劫夺他人之财产，谓以供其教养之资，可乎？

       孤行必败，古训不诬，日人若能悔过遵国联之劝诫，知难而退，其损失或不过名誉上而已，若不然，必待国联第二步封锁经济，自处绝境，然后摇尾求和，其损失已不可胜计。再不然，果一意横行到底，不计成败，侵吞满蒙，又占我沿海各省，或攻击国联商船，撕开世界第二次大战争之战幕，则其结果之失败，当成为德国第二，可断言也。

       我国处今日列强均势之时代，国力虽弱，亡国亦须有理由，东三省若亡，全国必与偕亡，此理势之推测也。但中国有不亡之理在，何也，若外侨不能保护，国交失于妥洽，如甲午庚子之妄启衅端，至于丧败覆亡，此何足怪，若仅仅政争不息，内乱纠纷，教育废坠，国民程度参差，此乃一国政治在改革过渡时代所必经之程序，决无亡国之理由，今日之幸灾乐祸，欲乘此而亡我，岂非缘木求鱼耶，况二十年来助长我内乱，暗施其纵横捭阖之术，谁之罪乎，日本不当负此全责耶。

       九月十八夜不抵抗之失策，我国人大都归咎于政府当局，然我国财力军备之优劣，外国人莫不详知之，独我国人反昧昧然，呜呼，此国之所以弱也。其次，如我国在国际地位，素为列强所轻视，固然为讳，每逢交涉，无论理由如何充分，而结果莫不归罪于我，如五三济案，是非之判，明如观火，外人尚有不直我之言，此回事变之初，设极力与之抵抗，不唯中日人之奸计，而外国人是非莫判，必反疑我之不是，况与抵抗，亦决失败，所差仅迟早间耳，凡忧时之士，能为国家全局利害计，当然表同情我政府之主张，况显示曲直，大白日人暴行于世界，引起国联公意之重视，利害所关，又岂微细。否则，所谓一失足则千古恨矣。今者，国联等咸已明瞭日本之野心，情势与前大殊，是非原已大白，而我政府负有守土之责，明知虽战必败，亦必抵抗，重大牺牲，在所不惜，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国联非有爱护于我，此固人所共知，惟国际联盟会之组织，订有严重规律以制裁会员国之纠纷，故无论国之强弱，咸当守此公法，我国为会员国之一，故必诉于国联之公判，况国联而外，更有华府九国公约，凯洛克非战条约，凡会员国又当恪守而遵行。国联既负有维持条约尊严之义务，凡有负约，必有相当对待，苟国联条约及华府凯洛克等约皆告无效，则全世界之道德法律，全人类之公理良心，皆已破产，祸变所极，又岂仅我中国而已，夫复何言，且英美与我国，在商业上更有密切关系，彼二国者，皆以我国为大市场，将来发展，未可限量，如我国可亡，则香港马来亚缅甸印度澳洲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岂独能安枕耶？

       世界兴衰之循环，必无一成不变之理。数百年前，中国之富强，冠于全球，迨后则转而至西欧大陆，继而至于南北美。近数十年来，东至日本，以此类推，循序循环，将复至我中国，此乃已往事实之确证。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系根据三代而言，孟子而后，有秦始汉高之盛，汉之后有隋文帝唐太宗。唐之后，有周世宗宋太祖，宋之后，有元世祖明太祖，史迹循环，更番而盛，历历不爽。明之后，于今五六百年，孙总理之革命已开其端，不过如秦皇隋文，资以过渡，必待有汉高唐太者出，始成全盛之局，在此国体改革过渡时代，其多难多险，乃时势所必经也，日本自维新以来，历六十年之顺境，每逢甲年必兴，如甲午中日之战，甲辰日俄之战，甲寅欧洲大战，均助彼之大发展，迨至甲子（民十三年）其运已竭，不但不能再获机会，且近甲之癸，已遭大地震之败，兹者癸又将到矣，或者前运之兴，逢甲必胜，今运之退，逢癸必败，若云天数，虽知，近于迷信，而书不云乎，恶有恶报，种恶因必不能结善果，又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请拭目以俟之可也。

**陈嘉庚谈抗敌必须联俄问题**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37**

陈嘉庚先生答南洋商报记者问称：

       关于国共联合问题，个人以为国共殊无任何联合之足道。惟共产军若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在中央指挥之下，共成救国伟业，于中央，亦殊应与以接纳。所谓无条件，并非指联俄，抗敌，及不应保存共产军队而言。夫敌之当抗，此乃必然之事。共产军若有抗敌真诚，斯固义之正者，安得指为条件，至于联俄，欲抗敌必须联俄，是亦势所应尔。相信中央之所以不轻言联俄者，殆仅戒于口耳。共产军果有抗敌真诚，联俄何能谓为条件。以言保存共产军队，共产军队，果能归我中央政府改编，真诚谋图，则彼有可用之材，可战之兵，中央政府诚宜利导善用。相信中央政府接纳归附，亦必无悉数解散共产军队之理。然则，保存共产军队，亦未足谓为条件。总而言之，时机危迫，非可敷衍，况箕豆相煎乎，共产军之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固其时矣。

       至于中央经济提携，日本侵我东北察热及冀东，中国与日本万无成立经济提携之可能。中国与日，即有任何经济提携之标榜，相信亦必出于敷衍不有实际也。

**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6.8.1937**

       今日之会，本人被推为主席，事关国家民族，不敢推辞。大会召集宗旨，首在救济难民及前线死亡者家属。彼等为国牺牲者，可爱可敬，请到会者起立，静默二分钟致敬。

**中日战争有关国家存亡**

       今日大会，到会诸君应当注意者有二。前者关系整个国家及民族，后者关系当地政府。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过去我国虽亡于元，亡于清，但我政权教育权尚在，文化保存，不致亡族。若观日本目前毒害中国，足知其旨在灭我种族，故意义特别重大。至于当地政府，在目前本认时局严重，因居留人民，华人最多，日人次之，政府极望各民族和洽，不致发生事端。且中英向来亲善，故于中立之间，尤为留意我侨行动，不愿发生事端，致人有藉口。今日之会，曾经政府允许，共有五项条件。所以有五项条件，实因吉隆坡发生一种不幸事件，被当地疑为劝募军费，致本坡被其牵连。当局曾拟禁止全马来亚华侨募捐，前此总商会及百余团体开会之期改变，一方面因时局和缓，同时亦因此事关系。本人所以不能不提出报告，实使列位知在居留地之行动，应格外审慎也。大会开会一度延期，嗣经设法疏通，极力说明本坡集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并非劝募军费。当地政府，应亦了解，认为救灾可无问题，但恐轶出范围之外，乃请总商会会长，前往谈话，谓欲开会，当征得华署同意。滬战发生后，商会会长乃往见华民政务司，承示应守条件，同时亦嘱本人到署，面告一切。在开会前，总商会曾约同各帮代表在会晤商二次，讨论以下政府提示应加注意各点：（一）捐款应以救济为目的；（二）不得强迫捐款；（三）所捐款项只许由一机关收汇；（四）开侨民大会时会众发言，不得涉及抗日、抵制日货及捐款购买军火等项；（五）开会时应守秩序，勿有越出范围以外之言论及行动，因一方面而政府固不愿意，一方面华侨立有失体面也。关于此条，会中如有发言，应加注意，不可有任何可引起纠纷之言论，如抗日，捐助军需，或抵制日货等。华署提出此条件后，曾谓如何许允，须于昨日上午十一时答覆，方可开会。总商会及各帮代表乃于昨日上午九时开会，对政府提示各项，全部同意，即行答覆，此事本由总商会代表接洽，华署所以特召本人前往者，察其意向，似以如此，较为妥贴也。本人曾保证称侨胞程度已见进步，一切当守秩序，今后进行，亦可遵照原则办理。华署许以今日之会，若由本人出任主席，维持一切，则当地政府，较为放心。此系当日情形，敬此报告。

**星洲组织募捐迟缓原因**

       查此次星洲组织募捐，较为迟缓。当华北事变发生，各地纷纷发动筹款，星洲独为落后，谅甚引起侨胞之疑问。此会本由总商会提倡，但本人虽非董事，亦曾从中参加讨论。主张不急即开会者，本人亦其一人。因中日此次问题，极为严重，与从前内部问题不同，亦非短时间可了，说不定须数月或数年，华侨对于此事，不能随意题捐。譬如购机寿蒋，星洲区捐卅余万，此次希望对此数有十倍或数十倍之增加，各地随便集会捐款，每有欲速不达之弊，本人所以极不赞成也。查星洲为马来亚首府，应为各埠模范。去年购机寿蒋，星洲与当地政府磋商，得其同意，故进行顺利。此次各地不候星洲发动，遂发生此次吉隆坡事件。且本人所以不主张急开会者，有三原因：（一）欲先对政府疏通；（二）俟战局显明；（三）拟先向有力者疏通，首捐巨款，以为模范。以此事系长时间之事，战局末了，本会即应继续工作，使义捐源源而来，将来应分为特别捐、月捐、分期交纳捐等。目前时局严重，捐款性质，非仅慈善，亦非义务，乃系本乎个人良心，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存亡，除非良心已死，否则必当努力捐输。

**泗水日侨**

       最近泗水来客，谓该地日侨节衣节食，以收入之半，捐助其国家。星侨尚良心未死，即不能如日本人之爱国输财救难，亦应有相当限量，且不应偶遇军事失败，或地方丧失，即行灰心。假定如是，即谓之无坚忍、无毅力。即令南京失、汉口失，退至川陕，亦应继续努力。目前战事，仅系发端，将来范围或且扩大，最后胜利，乃在我国。但欲国际情势变化，我国应先牺牲，绝无事变初起，便有外国助力之理。试观当此国势孱弱之秋，英美法荷各国，即知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打倒敌人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同胞应注意坚持二字。譬如星洲侨胞四十万，假如有半数可以捐款，每人每月一元，即有二十万。每人每月二元，即有四十万。平时人人言爱国，目前并无亲临前敌之必要，只是输款：是以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如不出钱，将来报纸或征信录披露，即可明白。

**叶玉堆君捐十万元**

       此会已经政府同意，眼前战局严重，战区灾情又甚紧迫，本人顷以征求叶玉堆君首捐十万元，以作侨胞模范；其次由叶君介绍一人，亦已答应十万，但有人拟再请其增加，故名字暂不发表。又其次周献瑞、蔡汉亮、林文田三君各捐二万。本人现无力量，无论战局延长至何时，每月出月捐二千元。又总商会定每人发言至多五分钟，此刻有欲发言者，请注意发言范围。

**陈嘉庚在南侨筹赈会成立会上之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1.10.1938**

       总领事，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今日适在我国国庆日举行此会，蒙推兄弟为临时主席，兄弟忝居东道，亦不客气接受。两月前得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拟邀各属侨领集星开会，组织领导机关，其最大目的在增加筹款效率。今日诸位踊跃光临，足见大家奉行政令甚诚，要求团结甚切，将来群策群力，加强后方工作，必有良好收获，可以断言，现在谨将经过各情，约略报告一下。

       （一）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甲）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覆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覆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诸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得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藉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份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省机关之贺电，计多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纪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唯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得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只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常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限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

**南侨总会组织经过**

**原文载南洋商报30.3.1941**

       本年五月中间，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亦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救闽，并筹汇赈款。当时庚曾覆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非律宾李清泉君函电，俱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巴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覆：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覆后，即未有再通消息。

       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覆，电渝。孔祥熙世。庚即电覆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

       来往两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高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定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为时仅余卅多日，惟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

       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亦相继贲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多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惟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机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必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先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

       大会即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

**陈嘉庚主张持久战以抗日**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0.1930**

       针对路透社昨传日军进犯广州，陈嘉庚氏告诉记者称：我国对日抗战，贵乎持久。所谓焦土抗战，盖即表示持久之决心也，是以一地之失，无须牵虑及之。吾侨目前最大之救亡任务，乃在各尽天职，加强输财。抗战之最后胜利，决定于国家经济之巩固。即使广州一旦被劫，吾人更须引以激奋，加深同仇敌忾，我持久战必可败日，绝无疑议。本人对于目下之时局，不日将本此信念，作一详述。

**购机寿蒋与国防**

**陈嘉庚在新加坡购机寿蒋会**

**游艺筹款会上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5.9.1936**

       列位同胞，今日我人假大世界跳舞厅举行此礼，盖为购机庆祝蒋院长寿辰游艺筹款会开幕礼，至于本游艺会之举行，一因市情不景，藉此添加购机款额，一则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至于购机寿蒋一事，为三数月前，国内军政界之所提倡，外洋从无动静，视极平常，未见有倡导者。至七月半，本坡侨民大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之时，刁作谦总领事乃以提倡一事，与弟言之，盖得伦敦郭大使之来函也。时弟以侨民大会之举行，目的仅在制止内战，提付讨论，殊有未合，因谓之曰：此事是否既得当地政府之许可，若然，则函总商会，请其发起可也。及后，闻商会因领馆来函，召开会议，以人数不足流会，终改开侨团代表大会，侨团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日，刁总领事谓事有攸关，君必出席，当晚福建会馆举行执监会议，又举弟代表福建会馆出席，弟本不就，嗣以过却不恭，故尔迁就，中间，弟并拜托华民政务帮办孙崇瑜先生，探求华民政务司意见，看其是否同意马来亚华侨联合举行。总商会团体代表大会举行之日，孙先生即于午前答覆消息，称，华民政务司经予应允，惟捐款不可出于强迫云云。以是，总商会侨团代表会议举行之顷，弟即以此报告会众，并谓，当地政府既经应允，吾人可以放心进行，且应联合全马来亚侨胞，一致为之云云。及至本坡购机寿蒋会成立之后，亦遂函请各埠，举行联合，至于联合进行之好处，弟谨顺为诸君报告一二。刁公使言，购买飞机，每架需款十万元，我人试思十万元购机，此于大埠，自可如数捐足，小埠则否。如此，小埠捐款之不及一架者，势须谋与其他小埠联合，则所购飞机，应书何种名目，实有问题，而况与人合购，亦非甚易为乎？若牺牲小埠，不使捐款，则其所失，亦殊大，设与联合，即无问题，此购机寿蒋之不可以不联合一也。购机一架需款十万，不行联合，大埠捐款亦将受阻，何则，飞机购买，既不可购买半架，尤不可购一架许或一架半。如是，能力可捐至十余万之大埠，势必捐至十万即止，若行联合，则无论其为十五万、为十六万，均可尽量劝捐，免受阻碍，此购机寿蒋之所以不可以不联合又一也。总而言之，购机寿蒋，举行联合，不特物质上有利，精神上亦复有利，盖使各界人士，于此知建设空航，人人均有此一义务也。弟此次与周献瑞，李亮琪二君，出席小组会议，对于小组会议经过，顺便报告一二。此次小组会议之举行，到有六七州府代表，该会议举行二三小时，现象极佳，并无一人反对联合。弟此次出席小组会议，得与各州府代表晤谈，对各方捐款情形，较为明瞭，大概本坡可至国币卅万至卅一万，柔佛区各方合计，可至十万以至十一二万，马六甲目前已及万余，将来可至三万，森美兰，芙蓉，可至五万左右，雪兰莪可至廿五万以上，吡叻可廿五万，槟城可至十五六万，其余各处，一共可至四五万，统计将来可至国币一百廿万左右。我侨将来即捐至一百二十万国币，购买飞机，亦称甚微。至于国内，又将不及。我国民穷财尽，一省之数，想亦不及此间也。总之，我人即捐一百二十万购买飞机，所买亦不过一十二架，为数殊少，然此可谓为教员机而非学生机，何则，航空人才难得，须加训练，则此十余飞机可教学生数百人，与全国购赠飞机合可达一百余架，则此一百余机，可训练学生数千人。又此种飞机为飞机母，我人希望其能多生儿子，相信我国有航空人才千人以至万人，则我虽无力，友邦必将助我，彼野心勃勃者，孤立无援，我则至少亦有强国三四为友。二次世界大战，果告爆发，可无疑义，则一国助百架，三四国助三四百架，一国助五百架，三四国助千余架，俗语云：“自助者天助”，我人固须自己有人才而后人乃得而助我，若无人才，望人助人助机，全盘负责，则又谈何容易。抑尤有进者，数十年前，作战仅靠海陆二军，今则空军为重。论海军，我国海军幼稚，发展又为能力所限，今可用以自卫者厥惟陆军。而陆军又须有空军掩护，陆军无空军掩护，等于无用。今我空军初创，谓无空军也可，无空军是无陆军，无陆军是无国防，国而无防，其不等于亡国也乎。是则购机使为机母，急不容缓，均有力者至宜出力，得添一机二机，均属可喜。

       列位同侨，弟今尚欲有片言，此言实为不幸之言，不幸之言，原可不必言，惟弟终不得不言者，盖以关系之大，非仅及弟一身，而实关系全新加坡，全马来亚也。侨民大会举行之后，寿蒋委会成立之前，即有人以匿名信寄弟，内中所书，多有对弟个人不利之辞，甚有书于墙壁之上者。寿蒋委会成立之后，再有同样事情发生，此大约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也。投匿名信，弟以无关大体，即在墙上书写标语，亦无关系。怕数日前本坡一有力言论机关，登载反对文字，措辞与前述匿名信所言，觉甚相似，此无非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弟本不欲有言，然终不能无所解释，彼等指责开会何故不在商会而在怡和轩，究竟开会在怡和轩有何不可，即有不可，此亦为第一次委员会议之所决定，并非偶然。至言怡和轩，三四十年前，孙总理南来，计划革命，当日孙先生亦与怡和轩会员接洽，即福建光复时之保安会，及后来之国民捐，亦均由怡和轩所发起，他若济案及其他事故捐款，亦为怡和轩所发起，所捐亦每至数十万，然均圆满进行，并无弊端。记得十年前，潮州八邑风灾，商会发起筹赈，当时由林义顺君任主席，捐款者最多二千元，弟不分畛域，亦捐二千元，惟二周后，即有纠纷发生。有人在外，另设机关筹赈，林君被人大骂，事固受阻。五六年前，水灾募捐，亦由商会办理，捐得多少，弟殊不知，惟终发生弊端，有人假单，不知捐去多少，然终破获，拘入警署，中间有人拟使入狱，有人以如此一来实属不雅，其后如何，不复记忆。于此可见此次委员会在怡和轩召开二次会议，至三十余人，不及全数委员之三分一，论者谓为地点不合，改在商会举行，盖望出席人数增加。然弟所知，商会会员五六百人，年开会员大会一次，出席者不过四五十人。又，商会董事三十二人，开会时，出席者亦不及全数之三分一，有时亦至流会，若谓怡和轩为俱乐部，须知我人献机与南京励志社，励志社亦蒋院长所组织之俱乐部。实则，以此种种，皆因国民程度低下，有以致之，与地点曾无关系。

       又有一事，言之不恭，惟望诸位原谅，盖即彼等对弟捐五百元一节冷讥热讽是也。弟以无力，捐五百元殊少，对会不住，对诸位也不住，惟谦益饼干厂所捐二千元为何人所出，弟连此二千元一总计算，亦然不见得太对不起。惟弟困难，弟对集美，厦大，每月尚须负担五千元，此为不可少者，其中三千元为直接替集美负担，二千元则间接替厦大负担。所谓间接，即前因此间公司为有限公司，每月仅能津贴五千元，厦大不足开支因由专理厦集校务之集通号代借一十余万，以资应付，此款今日须还，母利已还大半，目下每月拨还二千。厦大前在本属捐款，共得二十七八万，即收得者约二十万，其余看已无法鸠收。然此二十万元，维持厦大经费，不足二年，又安有余资清偿债项。至弟维持二校，自知甚是笨拙，其目的一为使华侨知重教育，一为发展闽南教育，事虽笨拙，惟笨拙愿望，亦每有一二分可以达到。民元至今，纷乱不已，惟弟有一信念，即信中国纷乱，为过度时之必然现象，二三十年后，国家必可发达……。

**西安事变电陕请保蒋氏安全**

**原电载南洋商报15.12.1936**

       西安张汉卿先生伟鉴：贵部哗变，蒋院长身失自由，消息传来，侨情惶惑。以为张先生与蒋公交谊至深，且共患难，今遽出此，当非本意，尚望尽力设法，迅释蒋公，推诚合作，以复国仇，毋为摇及国本之事，而启纷乱割裂之机，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临电不胜迫切之至，盼覆。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叩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关于和谈与抗战到底问题陈嘉庚**

**再忠告汪精卫副总裁**

**原电载南洋商报27.10.1938**

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磨擦，淆乱视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果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倘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益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今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十月廿六日

**陈嘉庚在第二届参政会议之通电提案**

**原文载南洋商报18.11.1938**

参政员陈嘉庚提案为：在日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注一）

**请通缉汪归案**

**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致电蒋委员长**

**原电载南洋商报1.1.1939**

       按南侨筹赈总会陈主席，昨晚为报载汪精卫所发狂谬汉奸宣言，特急电重庆蒋委座，请宣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其原电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跡，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世（卅一日）

**闽省光复与新加坡福建保安捐**

**原文载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页二**

       我国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本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覆。”越日黄君回电云“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即汇去国币二万元，并电云：“厦泉漳素多匪，乞维持治安，款可续汇。”越日孙都督回电云：“款收，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至感。”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盖光复初，库空如洗，民心动摇，二万元收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云云。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过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陈嘉庚在槟城与吴铁城专使谈闽省政治**

**原文载南洋商报26.12.1940**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于廿日由仰抵槟，而奉命宣慰华侨之吴专使铁城，则于二十一日抵步。陈吴两氏，均受槟城侨胞热烈欢迎，情形已志前报。陈主席已于廿二日晨离槟，前往吉打属。当吴专使抵槟之首晚，陈主席曾先以电话告知吴专使，旋晤吴专使于桂林庐（林连登洋楼），十时晤面，坐谈约一小时。其间所谈述者系关于闽省问题，陈氏关心闽民之疾苦，是以异常注意闽政之能改善。其与吴专使之谈话，当为一般侨胞所欲知者。兹为纪述如下，以告关心闽省情形之读者。

       陈吴会面时，互相寒暄，陈氏谓与吴氏相别，迄兹三个月，称赞吴氏之精神更佳，彼此均甚客气。继而开始谈话，陈氏称，本拟由港返星，嗣因滇缅公路有需要改善，及再经一番之视察，曾得蒋委座之同意，饬派工程师，交通处等部人员，到滇缅路共相磋商一切，故改由仰光乘轮返星。

       吴专使问 陈主席此次返国考察，观感若何？何省最佳？何省最坏？

       陈氏答 本人所经十四五省，费时约九阅月，考察所得，各省均有相当进步，情形甚佳，惟福建一省印象最劣。

       吴氏问 所谓最坏者，究为人事上做不到歟？抑系时间上所不允许歟？

       陈氏答 全非时间上问题，亦非人事上做不到。例如加重田赋，统制运输，设立贸易公司与民争利，及抽调壮丁之不得其法，凡此既非积习，欲加改善，殊非困难。田赋本为每年六百万元，于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加至七八倍，达四千余万元之巨，使民叫苦连天，不知死所。

       吴氏问 此种增加，如何收法？

       陈氏答 本人亦莫明其妙。

       关于统制运输事，吴氏谓或恐资敌，不得不尔。

       陈氏答 既非边境之区，自无资敌之可言。且统制运输若是严酷，虽利用牛马挑运，人力挑运均不准许，如一人挑运五十斤重之货物，欲过一乡，亦被目为犯法。吴氏对此，亦为默然无语。陈氏继称统制一事，在战时非为不可，然政府之设有运输队，亦在辅助人民之不及。他省运输等等，政府不加干涉。独闽省人民，并人工之挑运，亦在被禁之列，此为本人所亲眼看见，亲历其境者。

       吴氏问 陈先生此次入闽，曾否与省主席陈仪晤及？

       陈氏答 已会过矣，然所提及要求改善之事，如统制运输等，陈仪认为非若是统制不可，是其无诚意接纳，可想见矣。关于徐学禹之为人，据吴氏所称，情形亦略知之，陈氏谓以徐某一人，一身而兼十二职，怎怪闽民之痛苦哉。

       吴氏谓 由本省人而任本省职务，较为妥善，盖有乡党制裁，俾可范其行为耳。

       陈氏答 闽省政要，都为外省人。

       吴氏称 陈氏与蒋委员长来往电文，概有阅及。则在数处开会之演词，亦有寓目。吴氏并谓蒋委员长既云地方之政情，如有所见，自可直接向中央报告，最好此类之言，不必对外发表，期免对于筹赈方面，有所影响。

       陈氏答 倘政府能予接受，有所效力，则本人今日，亦何须再多提及之乎？至于筹赈工作，绝不因而受影响。本人每次发表谈话，特别声称，请各界应更加努力捐输，切勿因此而灰心馁志，盖救国捐输，乃为公事，而福建只为局部问题，暂时使人满意，终有改革之一日。故对于整个抗战前途甚抱乐观，在最后胜利尚未达到之日，我人必须加倍努力，必不因是而停止应尽之天职也。

       陈氏复谓 福建种种，确难使人满意，岂能强不好而妄说其好乎？

       吴氏称 或者因侨胞对于国内政治之希望过奢，故对闽省情形，而感失望。若大体上不错，其他失妥之处，自可渐求改善，盖为政者非一朝一夕可能做到也。

       陈氏坦然答曰 我人对政府不敢过事苛求，惟望政府当局，体恤海外闽侨之关切家乡，在可能范围，对于不善之处，加以改善，俾海外闽侨，稍得安心，已感满足矣。

       吴氏称 彼本人亦曾电达陈仪，提及此事，并谓对于陈氏在泉州、桂林、及槟城三处所发表之谈话，均阅及，但觉甚为难过耳。

       最后谈及关于滇缅公路事，陈氏谓该处设有五个公司办理交通事务，未免多费人员及费用，若由一个公司办理，岂不较佳。最后吴氏询陈氏抵星日期，因吴氏来星时，仅晤代督，故决再到星洲，拜会总督汤姆爵士，当再与陈主席在星从长讨论关于闽省之种种改善问题云。

**回国考察观感**

**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1.1941**

**一 考察经过**

       本人此次归国，乃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全南洋华侨对最高领袖致敬，对军政长官及全国军民致慰劳，除在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与创设制药厂而外，此行最关心者，尚有三项，一、军事，二、政治，三、团结问题。军事方面，向蒋委员长，何参谋长，白副参谋长，及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参谋长总司令访问。政治方面，向中央各院部及各省行政长官社团领袖，报界记者等访问。团结问题，则在重庆访问国民党领袖而外，又往陕北延安会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并其他重要人物。以上三事，本人在未回国之前，原已留意及之，如以未曾宣布者，恐战时交通不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兹者，愿望已达，谨将一切经历，概括报告如次，其中所述，虽曾在南回途中，如缅京、仰光、马来亚各地发表，惟时间匆促，略而不详，且本人非专家，所见难免肤浅，而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又多疏漏，但较一般报纸记载，或出于道听涂说者，自度当较真确。顾考察原非易事，立言尤贵忠实，一、须自尊人格，二、须无党派关系，三、须无权利企求，庶能作公平之评断，而不负侨胞之期望。军事方面，全国兵员，比较抗战前，已增加两倍，军械配备亦比前充实，机械化部队，更甚完备，其中详细状况，各处演讲，报纸多有登载，今日毋须多谈。各省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七百余万人，逐日训练，所到各城市触目皆是，桓桓赳赳，生气蓬勃，各战区将领，精神饱满，绝无已往军阀气习，类此现象，实令人无限感奋。政治方面，各省分别言之。

       四川 新兴工厂林立，矿业勃兴，如煤炭产量，比较战前已增十倍，矿盐产量，前每年仅五百万担，现可增至一千万担。农产品更形发达，其他如交通，治安，禁烟，均成绩卓著。教育方面，民廿八年全省教育费支出五百万，廿九年预算增至一千万元，本年度按再增至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元，教育部规定由廿九年度起，五年内普及全国教育，而四川则拟缩减于三年内完成之，其进步可以想见。前军阀时代，所有地方军人势力，现经收归中央，拥护抗战到底。

       甘肃 抗战前全省岁收七百万元，鸦片税占五百万元，其他仅二百万元。近年以来，鸦片税取消，而提倡生产，整理赋税，根绝中饱，民廿八年收入一千二百余万元。甘省宗教信仰，虽各不同，然民情融洽一致，信赖省府，拥护中央，故地方安堵。他如教育交通，工业农产，亦有相当进步，抗战后征调壮丁，办理得法，服务前线，极其踊跃，其政象之佳，可以概见。

       青海 自马主席步芳接任以来，对财政颇多整理，吏治亦尚修明，各县公路电话均可通达，民风淳朴，官吏廉洁，拥护中央抗战，备见忠诚。全省民众仅百余万人，回教徒居多，抗战以来，调赴前线骑兵，已达三师之众，该省素称产马区，现正大规模训练战马，以备补充。本人行抵青海，已在午间，当局召集各界于翌晨六时，在省府大操场开欢迎会，时间甫届，军民鹄立者五六千人，秩序整齐，精神活泼，边区有此佳象真是可敬。

       陕西 该省烟患极深，民众怠惰，生产衰退，百业凋残，近年以厉行禁烟，生产渐进，百业渐兴。汉中各地，向多土匪，历久未能肃清，抗战后亦已销声匿跡。乡村民众生活，素多穷苦，十来岁男女，无裤可穿，近则稍足自给。交通事业，亦称进步。上述禁烟剿匪及交通各端，皆为中央势在必行政策，而战事推行尤力，所可惜者，省府行政长官德望未孚，难资表率，西安市虽密迩前线，而奢侈娱乐之风仍炽，醉生梦死，似乎不知国难之当头。

       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域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众。抗战后，敌机屡来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服亦尚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边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归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雨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跡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者枪毙，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千人集合露天“上大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

       山西 该省在军事上所处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初意吞併全省渡过黄河，直迫陕豫，威胁川鄂，卒以第x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极力死守，在高山峻岭中开洞驻军，出没无常，使敌人不敢正视。省内市镇，虽多沦陷，然敌人势力，不能越出城郊及铁路线之外，各处民众，于协助杀敌之余，均能努力生产。

       河南 该省征调壮丁，约在百万人以上，为全国冠，本人沿路所见壮丁，日以千计。第x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保卫中条山声威尤振，有福将之誉。卫则甚自谦逊，谓临事谨慎而已，每一阵地，必亲临察勘，大而一山一水，小如一池一石，均不疎忽，谋定而动，故所向有功。河南田野广大，农民勤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尚觉安定，该省近出纺纱机，一人工作可抵三十人，各县皆相仿制，纺织业故亦甚盛。洛阳为古代九朝都会，古蹟名胜，触目皆是，前吴佩孚练兵于此，植树四万万株，郁郁苍苍，令人可爱。

       湖北 本人由洛阳坐大卡车往湖北老河口时，途经博望坡及南阳，在卧龙岗午饭，参观三顾堂诸胜蹟，沿途桥梁车路，多已破坏，乃别从间道驶过。其时襄燮宜沙，战事剧猛，虽风声鹤唳，然民心安定如恒，其他教育生产，事业亦多进步。第x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渡河来会，欢谈竟日。老河口系汉萧何封邑，居武汉上游，为豫陕鄂货物集散地，商业颇称繁盛。

       云南 前盛产鸦片，每年烟税可收三千万元，禁烟后，烟税取消，别征消费税，年入一千七百万元，近来中央亦令停止，改予补助。该省土地广大，农产丰富，新辟滇缅公路，两旁山地，亦皆种植，其农业之进步，可以相见。矿产如锡，盐铜煤等，力事开採，产量日增。教育大中小学校林立，沿海著名大学，亦多移此，商业繁荣，蒸蒸日上。抗战后出兵杀敌者十余万人，而后方在训练中者，亦数万人，滇缅公路开工时，征发民工十五万人，七个月完成，中外赞叹，近因敌人进据安南，我国乃以边境陈兵三十万，待机出击，由龙主席兼任指挥。

       贵州 该省政治措施，颇重实际，省参议会开会，议员质问时，态度轩昂，有拍案者，省当局和颜接受，不以为忤。省参会所组织县政访问团，出巡各县，省府亦甚予以便利。贵州原属贫省，前惟盛产鸦片，年收税款千余万元，禁烟后，农产增多，人民安定，交通教育及工业，亦多进步，提倡节约，禁止宴会，其努力求治，有足多者。

       广西 广西，前有范模省之称，七七事变，出兵二十余万，李白黄，和衷共济，埋头苦干。黄主席旭初，清勤正直，虚怀若谷，极为僚属民众所拥戴，在任之久，为全国各省主席冠，布衣淡饭，家无仆役，黄夫人每清早亲到市场买菜，十年如一日，其治家朴俭，甚为人所乐道。广西自抗战以来，征发壮丁，全数达六十余万众，而省内农产品，仍有剩余，可供广东一部份之需要。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兴办水利农林，及其他各种实业，著有成绩，交通事业进展亦速。自广州南宁失守，空袭警报，几于无日无之，而军民合作，精神极佳，此次南宁收复，驱敌人于境外，实收功于空室清野，尤为难能可贵者也。

       湖南 湖南，土地肥沃，农产丰富，水陆交通，战后虽多破坏，各种事业，仍然迈进，长沙焚毁，衡阳惨炸，南昌失守，敌人野心勃勃，视该省为俎中肉，然第x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攻守得宜，敌卒不逞，人民依然安居乐业。其他教育文化，亦有可观。秋潮涨时，敌人扬言将再以战舰大举来犯，而薛长官严阵以待，结果敌人阴谋，竟无法实现。

       广东 民物富庶，然自广州失守，邻邑亦多沦陷，粮食缺乏，敌机威胁，一日数惊，损失之大，为西南各省最，民众颠连困踬，触目伤心。自第口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省主席李汉魂，通力合作，军事政治，相辅而行，遂于前年造成粤北大捷，人心稳定，各种事业，逐渐恢复旧观，革故鼎新，且见蓬勃气象，杂粮食品供应，全年尚欠两个月，经省府鼓励生产，由去年九月一日起，公务人员，自省主席以下，每星期亲下农田耕作一小时，以资倡导，并订九月半起，禁食白米，而食糙米，据建设总长预算，如此做去，本年春后，广东粮食，便可自供自给，不虞缺乏。

       江西 前为共军所据，连年烽火，糜烂不堪，人民死亡，财产损失，不可胜计，熊式辉主席就任以来，悉力整顿，兴利除弊稍稍恢复，建设厅长杨绰菴，在职年余，创办工厂三十余所，本人最注意者，如麻袋厂，所出麻袋，品质优良，不亚于印度米袋，又如染料厂，已化制成功，每天可出数担，此两种出品，为全国所未有，将来利益之大，莫可限量。教育文化，相当发达，中小学而外，普通师范学校，亦有八所，中正大学，经已成立，农产以米为大宗，可以兼供闽粤，熊主席虽为军人出身，然温文儒雅有学者风度，殊难得也。

       浙江 东南富省，浙亦其一，沦陷九县，县城虽失，而城外仍在我掌中，各县县长依然在职。农工商业，比前更进，文化亦不失战前状况，交通事业，除原有舟车外，省府更特备人力车五六千辆，每辆可载重四百斤，以辅助汽车之不及。沿途所见妇女肩挑农作，一如男人，为数不少。抗战前省库每年收入不上三千万元，财政所有时仅存款十余元，战后一经整顿，如民廿八年增收至五千余万元，财政厅经常存款四五百万元，其进步可知。敌人虽封锁我出入口货物，间亦有人投以私利，而得自由转运汽车煤油，敌舰且可私售。

       福建 现驻国防军口师，自金厦沦陷，海道而外，内地则甚安全，剿匪亦颇著功效，惟沿海渔船，惨遭焚炸，损失不少，而民气旺盛，拥护抗战，实不后人。无如年来苛政百出，民不堪命，为各省所无，征发壮丁，则用捆绑押解，如上刑场，前后征发一十五万人，逃走死亡，无数目可考。省营贸易公司，与民争利，一物之征，如旧式账部，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图向南洋推销。更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私营外汇，运输公司统制全省运输，自挑数十斤之货物，亦属违法，三日路程，而寄运两月尚不能到。百物昂贵，米粮尤甚，藉名军粮，贱买贵卖，月获巨利百万元以上。田赋改征实物，折合米价，平均价加七八倍，以前每年收入六百余万元，自去年十月一日起加征，突增至五千万元，公务员营私舞弊，相习成风，了不愧畏，苛捐什税，指不胜屈，教育文化，如普通师范学校，全省仅设一所，学生八百名，不足一县之分配，其政策乖谬如此。

**二 总观感**

       中央官吏清廉苦干者固多，而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者，间亦难免。以我国数十年政治积弊，欲期一日澄清，自非易易。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全国经济学社举行年会于重庆大学，主席马寅初先生邀本人演讲南洋华侨投资问题，本人略言国内盼望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所以空雷无雨者，实因未明侨情。以本人见解，华侨资本家当分两种，由拥资数十万元以上者言之，一为侨生，一为国内来此久居者，侨生多未受中国教育，国情未谙，何肯回国投资，至国内来者，能成为资本家，年多四五十岁以上，欲望其投资回国，重新奋斗，亦为人情所难。但抗战决能胜利，建国决能成功，则华侨回国投资问题，实不必悲观，盖华侨能回国投资者，非惟资本家而已，一般中产阶级，尤为可能，如家产在十万元以下或略积数千元数百元者，全侨每百人中实占九十九人，每人如投资国币二千元（新加坡币三百元），一万人可二千万元，十万人可二万万元，全华侨至少数十万人，有此资力，其成效岂不宏伟。然欲依此吸收华侨资力，须有健全股份公司之组织，犹忆晚清时代，福建有漳厦铁路，广东有粤汉铁路两股份公司，经营失败，华侨损失数千万元，由是华侨对祖国投资，遂视为畏途。今后抗战胜利，华侨爱国热情，必更增进，投资建国，必更踊跃，但须政治良好，社会安定，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阻碍进行，始能达到目的。马氏闻言，似有所感，再上讲台，痛陈国家在此国难严重之时，而管理外汇当局，尚且私营外汇，逃避资金，不惜危害国家猎取私人利益，纵加获数千万元，无非留贻子孙买棺木耳。言时悲愤填胸，几于声泪俱下，近日报载，马氏曾揭发中央政要某人在银行存款若干万万元之事，想系张大其词，按之当日马氏并未作是言。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建国已三年余，内外拥护，转危为安，最后胜利，确可属我，绝无问题，唯建国前途系于政治，未有政治不良，而建国大业得以完成者。国民党创造之中华民国，伟大功绩，永不磨灭，若孜孜不已，修明政治，兴利除弊，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党誉更隆，党权更固，发令施政，无往不利，民心悦服，如水就下矣。中共自西安事变后，已放弃其共产政策，奉行三民主义，顺民意之所向，推诚合作，审国情之所宜，改弦易辙，抗战以来，军队由三师增至二十余师，所辖区域，由陕北二十一县扩大至河北全省及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各一部，虽属沦陷区，然敌人势力不出城外，其区域之广，自有中共历史以来所未有。唯无军械厂，军火缺乏，内不能制造，外不能输入，据朱德将军言，所有军火除中央供给外，一部份夺自敌人，一部份得诸民间，然军械虽乏，组织民众，运用宣传，力量亦不减于枪炮也。据陈诚部长所办青年团训练青年服务战地，约十万人，受训者，多出自动，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皆有之，训练期间，两三个月不等，受训完毕，即派往战地鼓励士兵，组织民众，团结抗敌，并进行识字运动，每月俸给十五元，膳食在内，刻苦耐劳之精神，殊堪钦敬。胡宗南将军所主持之军分校，学生二万余名，亦皆自动入学，资格最低为高小毕业，或同等程度，生活简朴，训练严格，成绩优异。举此二者而言，足见今日祖国青年，咸具牺牲之决心，在此抗战期间，一致枪口对外，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如欲枪口对内，谁肯服从乎？全国各级将官精神无不奋发，公忠诚恳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共间失感者，不过少数人，但枪口对内，自相残杀，则绝对无人。各长官员，除陈仪一人外，其他大都奉公爱国，领导民众，奋发图强，至可敬佩，阎锡山将军言，国民党政治如办得好，共党自不足虑，否则，寻瑕抵隙者，当不止一共党也，金石良言，令人铭记不忘。本人代表全南洋侨胞回国考察，凭良心说公道话，愿与国人共勉之。

**福建内幕**

**陈嘉庚在新加坡闽侨大会上报告**

**原文载南洋商报20.1.1941**

       今日用本福建会馆名义，假座商会召开闽侨大会，以便本人报告考察福建详情，凡我闽侨，均可参加，假座总商会者，因本会馆礼堂太小，此外更无相当场所，恐人多难容耳，此会只限于本人报告，而非欲有所讨论，如要求改善福建政治，当再看多少时间，国内情形如何，有无改变，然后打算，因本人前日已接重庆蒋委员长之覆电，林主席之覆函，且已将案交行政院及监察院办理，故须稍待也。

       在未报告之前，我要声明两件事，一为我前之同情陈仪，乃以其出于中央，蒋委员长所任命，其时亦未深闻其对闽省政治有何苛刻害民之情事，且反对陈仪者，按其言论，不外责其访问台湾，（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秋乘舰往台湾，庆祝日本併吞台湾四十周年纪念）雇用日人探矿，（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冬雇用日本参谋本部测量队廿七名测量福建全省公路矿山港湾水利及军事要隘）残杀张超（编者按军事委员会福建特务负责人张超因反对陈仪压迫青年妨碍抗战被陈仪枪杀虽经军委会来电制止不顾也）三事而已，海外未明真相，自不便随声附和，一为考察报告，当以实事求是正大光明为怀，如不顾事实敷衍塞责，不负责任，趋附权势，想诸君必不同情。本人负代表责任，归国考察，今既南返，不能缄口无言，言则当不违良心，不贬人格，期不负同侨之希望。本人此次回国考察，不仅注意闽省而已，他省如有此苛政，亦要报告中央，请求改善，惟其他各省，则尚未闻有如闽省之民不堪命也。

       本人三月廿六日到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后，于五月五日离重庆往西北各省，七月尾回来，又往西南东南各省，九月廿四日，始由江浙入福建，闽省府及绥署已于事先派大小汽车两架，招待员两人宪兵二十人入浙江龙泉迎候，是晚宿浦城，越日至南平，会见陈仪主席，只问本身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多少，他答二十五万人，问逃走及死亡若干，答无登记数目可考，旋乃请转达各县，凡本人所到各处，但求节省耗费，切勿铺张欢迎，他亦许照办，在南平数天，已得各方报告，闽政苛惨，民不聊生，举其尤重要者，如虐待壮丁，视若囚犯，贸易公司则与民争利，企业公司则损害农工，运输公司则虐及挑夫，又如假军米为名，贱买贵卖，改征田赋，由三四倍加至十七八倍，摧残教育，施行愚民政策，贪官污吏，遍布要津，什税苛捐，多如毛发，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营私资敌，削弱外汇等，更不胜枚举，然本人犹未递信，乃转往闽北各县考察，经建阳时，见路旁死尸两具，一则全身裸露，同行者言，此即壮丁，因病死而弃，或病不能行而被击毙者，又往崇安，（武夷）邵武，折回建瓯，古田，而至福州，沿途所见，及在福州所知，更为详尽。十月十一日由福州南下，经长乐而后，一路乘轿自福清，涵江，莆田（县城），枫亭（仙游县境），惠安，而至泉州，稍住数天，沿途查访及闻见，又深知各种民间惨况，至此入闽已近一月，所经已十四县，人物接触，多系报界记者，厦大集美师生，社会名流，商界领袖，至舆卒挑夫等等，认为种种事实，可与南平所闻，互相印证。闽省苛政虽多，而本人用函电恳请陈仪取消者，只提统制运输一项，以此事害民最惨苦，而革除却比较容易，若有实效，然后再及其他。廿日离泉州往南安永春，沿途复多有观感，即亲笔函告陈仪，复列七条事实，皆为运输公司害民惨况。本人至南安某处，始悉同行陈延进（省科长）到泉州时，立打电话告知南安县长，令其转戒欢迎人员，勿对本人谈地方疾苦，事缘南安县长拟派四人来泉欢迎，而延进又将他去，故有此嘱。本人在永春致函陈仪，谓贵科长陈延进电告南安县长，冀以蒙敝本人耳目，然本人到处，自有各界来告，何须查问地方官所派之人。函去后，陈仪亦不敢否认陈延进之行为，非出彼意。廿五日过安溪，（集美初高中学校在焉）留三天下同安，至集美，去国十九年，回乡仅此一宵。越日，又经灌口至漳州，一度绕往海澄石码，复回漳州，复将所见所闻，续发三电一函，痛陈运输公司销售，如烧火之柴，每百斤原市一元，统制运输后，升至四元。十一月六日往南靖县，入龙岩，以抵长汀（厦门大学在焉），陈仪派代表三人前来招待，并邀往永安，谓各事可从长计议，乃于十一月经连城到永安，第二度会见陈仪，谈一时许。翌日，参加全省工商品展览会开幕，并应欢迎会欢宴会，本人在各处演讲中，将沿途观感，及民众惨苦，扼要略述，惟已觉陈仪缺乏诚意接受，因在本人将到永安之前一二日，他已在纪念周及报纸上表示统制运输绝对不能撤消之意见。十三日在大田县（集美水产农林商科各校在焉），十四日又回永安，十六日乃由长汀出省境，故乡甫返，又告别离，民生维艰，补救无术，欲依阿取容，则良心实难泯灭，欲批击逆鳞，则家乡不能再入，却顾徘徊，忧郁不堪言状，计回闽已五十余天，历三十县，兹将眼见者八项，耳闻者四条，报告如下。

       （一）虐待壮丁 征调壮丁，因待遇不善，视同囚犯，恐其逃走，乃用绳联缚每队数人或十数人不等，此乃本人在仙游枫亭所亲见者。

       （二）贸易公司与民争利 如南洋商家所用之旧式账簿，竟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值国币百余万元，本人在福州时，贸易公司主者来见，询如何物色新加坡代售人，要赶旧历年底应市，此物之微犹如此，其他大宗商业更可知。

       （三）企业公司 安溪茶叶。每担採制工资五十余元，而政府定价收买不上五十元，农民屡次亏损不堪，多将久植之茶园，忍痛掘除，改种粮食，而武夷山之茶园，亦因价贱焦荒者不少，乃企业公司反设示范茶叶工厂于武夷山下，人员数十，设处办公，开辟新茶园，触目皆是，闻将栽二万亩，其摧残民生，虚靡公帑如此，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没收工厂，藉名改善之事，不胜缕述。

       （四）统制运输 贸易公司为与民争利，深恐不胜，乃由省令设运输公司，将全省运输统制，虽挑数十斤自用之物，亦须交运。以一机关而要包揽全省货物运输，法制人事，诸多未备，当然不灵，故阻滞运程，不啻十倍之久，三天货运，两月尚不能到，以故百物昂贵，米粮尤甚。本人于同安路中（英埭头市口海边），见米船五只，每只载米约一百担，系由鼎美社运来，水途仅半天可至，而停留在船已十余天不能起卸，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利用青红帮情况，另有详文附列于后。

       （五）加征田赋 闽省特创田赋改征实物办法，而各县米价不同，最低须加三倍，最高须加十七八倍，平均全省须加七八倍，全年可增收四千余万元，已自旧年十月实行，大田县人口十一万，素非股实，当时本人与县秘书及商会长等谈田赋事，据谓以前每年五万元，战后加附捐七万元，共十二万元，若照此次增加，全年须增至六十万元之巨云。查征收田赋，手续繁复，经收人最易乘机舞弊，如折银元及大串小串等，颇不易算，故人民每以粮胥之算盘为“圆算盘”，且负担不平，闽省产米区多在后方，米价低，负担自轻，缺米县份皆在沿海，米价高负担重。抗战以来，建筑砲垒，破坏公路，拆毁城堡，就地征料征工，所有义务工作，多属沿海诸县。

       （六）各县加捐 自米粮腾贵，各县公务员原俸不足赡家，乃由省府津贴米资，名曰米津，由县长向民众推派，名目加多，贪污更甚（省内六十余县，县长大半外省人），此外尚有其他各种捐款，本人查诸沿途轿夫及民间所言，每人每月当纳还各种捐税一元三角五分至一元五角，若全省统计，其数之巨，几及二千余万元。

       （七）网罗周密 查省银行在各大城市多设中南旅运社，布置美洁，官民称便，岂知是项组织，特务情报各员，满布四周，所造政治成绩图表，及宣传刊物，到处多有，凡中央及其他机关委派视察人员来闽，大都受其蒙敝。本人入闽数天，便发觉本人言论行动，已有人暗中报告陈仪，本人以责问招待员陈延进，（省府委派），他云是中南旅运社经理所为。

       （八）愚民政策 闽省自民二十五年将私立师范学校，概行禁闭，统归省办，迄至今日仅有普通师范学校一所，学生八百名，每年毕业一百余人，杯水车薪，何能应全省之需求，至于高级中学，省立亦仅三校，初中卒业之有志青年，无路更求深造，其设此愚民政策，以降低吾闽教育文化之程度，用心之毒可以想见。

       以上八条，皆为本人亲身接触之事实，凡拥护陈仪代陈仪声辩者，可将不实之处指出，以明是非。

       （九）贱买贵卖 贸易公司最大营业与最大利益就是军米，凡产米县份，莫不藉採办军米，每担定价十六元，廉宜大半，由省府限额责成县长收买，而县长乘机加派委责区长，区长又委责乡镇长，乡镇长又委责保甲长，层层增加，相率渔利，由是舞弊成风，无米之家，须以钱代。

       （十）政治变作营业 省银行各客户存款三千余万元，发出纸币三千余万元，合计七千万元，贸易公司利用此项资力，积存货物一二千万元，上海香江，更设和济商行，大作投机营业，侵蚀外汇，舞弊资敌。

       （十一）计口授盐 查全国行此法者，仅两三省，虽属中央财政部管理，然地方官长亦应酙酌民情，免民受害，闽之计口授盐，乃出省府与中央盐务局之设计，自计口授盐以来，盐子店未能遍设，产盐之区，反无盐可买，农夫制咸菜时，亦无可能多买，公务员及盐子店则舞弊居奇，民食不足，莫不叫苦。

       （十二）徐学禹之为人 徐前在上海电话局任内，私设新电公司，利用职权，包揽交通部购料贸易，每年获利十余万元，事被上官发觉，受停职处分二年，限期未满，陈仪反加重用，现一身兼十二职，省委而外，如省银行，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企业公司均任董事长，建设厅财政厅亦由他一手支配，厅长反若其私人记室，大权在握，灸手可热，有太上主席之称。

       以上四条，则为庚所耳闻者，有无多少出入之处，须待详查，然大致无讹，则可置信。

       抗战后全国出兵数百万人，虽青海边区，人口不多，亦出骑兵两三师，独我闽省以前无军事基础，乏军官领导故未有一师一团之名义可以出发。虽已征壮丁二十余万众，乃练成之后，多多少少，则尽送往前线各师团作零散补充，而无整个吾闽兵团。他日抗战胜利后，历史记载，吾闽不免逊色，然出钱如有相当量数，亦不减于出力。南洋闽侨，对于抗战出钱素称踊跃，在此胜利日近之际，尤望更加努力，他日战史记载，可以补我闽省出力之不足，此为吾海外闽侨，应当深切注意者也。

       本人对国家事，向少过问，惟曩年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攻击陈济棠，近年又以和平妥协，卖国求荣，攻击汪精卫，兹则以苛政如虎，率兽食人，攻击陈仪徐学禹，此岂本人之好事哉，良心上出于不得已耳。

**斥吴铁城高凌百祸侨阴谋**

**陈嘉庚在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4.1941**

       刚才西言先生发表意见，略谓这会是救乡救家的会，是很重要的，兄弟要来补充几句，兄弟觉得这会的确是很重要的，小弟到梧州桂林等地时，晤见福建同乡，他们都感觉到国未亡而省已先亡，小弟觉得这话很对。福建不是亡于外国人的手里的，而是亡于陈仪派手里的。小弟觉得他们要亡福建，是开始于三四年前的，当时陈仪下令取消私立师范学校，集美学校亦被取消在内，a理由是办理不善，小弟就去电教育部向王世杰部长交涉，无效，后来就在廿五年起被取消了，现在全省只有一间师范学校，学生不过八百多人，每年毕业不过百多人，造成福建教师缺乏的恐慌现象。其次全省重要机关，均由陈仪派把持，可以说福建是陈仪派的天下，南洋各埠，相隔遥远，自然不知其详，兄弟以前亦不知其详，所以回去了以后，我才发觉出来，陈仪派是准备亡我省的，他们亡我省的手段是比外国人要来亡我国为更毒辣的。

       今日我们这个会，是很严重的，重庆方面，乏人会帮忙的，虽说有一位林主席，但他不便说话，就算有人说话，亦无甚效力，至于省内更无人敢说，致令福建父老长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国未亡而家先亡的情形，谁不痛心？我们侨胞虽远隔重洋，但这里终究是客居，谁不想于将来回到故乡去，更有谁不对故乡这种惨痛情形而亟思所以拯救他们呢？小弟于离开福建时，曾先后发电呼吁，只觉言微力轻，无济于事，诸位今日应看到南洋商报专电，中央派员入闽审查，是由陈仪电请的，小弟以前累次请令，但至今事隔多月，毫无下文，而陈仪一请便发生效力，足见小弟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诸位要注意，“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意义，中国决不是属于一省的人，福建不是陈仪派的，福建是福建人的（热烈拍掌），福建土地肥饶，森林畅茂，地又靠近海滨，小弟曾走过十余省，多是牛山濯濯，地多不毛，可以说比福建差得多，而且福建华侨大量寄款回去，他们早认为最理想的殖民地，要是我们不把陈仪派打倒，我们是无法救家乡的，诸位代表，诸位记者，我们须知道今日要救福建，只有我们挺起胸膛，彻底严厉对付他们，不然的话，福建是不会有希望的。我前日在南侨大会中的演说词，内中有说关于高凌百拥汪亲德的话都删削了去，这是不该的，这里小弟要报告的，就是弟于去年春代表南侨总会，到国内慰劳与考察，我曾到西北去，到过山西，到过陕西又到过延安，后来又转回重庆，记得在七月间，国民外交协会派人请我于七月廿五日前去演讲，题目是“西北之观感”，我就本我的良心和我所知道的来说实话，外间传说都说共产党是怎样实行共产并公妻制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那里私人做生意的照常，人民土地在耕作私有的地方，秩序亦好，一般生活非常朴素，既没有小偷，也没有叫化子。弟曾对该地当局询有无实行共产政策，据答谓自西安事变，即废止而奉行三民主义，在重庆计有十一家报馆，而完全不登我的演词的，计有五家，还有五家仅登一小部份，另有一家则完全登载。因此，就有人向委员长报告，说我是被共产党包围了，我对这件事并不认为介意，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但以后弟到东西南八省考察，就有人打电报给各省长官，说我是同情共产党，但我所经过地方，有人向我提起这事，经我解释，均明白对我同情。其他想运用外交势力，来压迫我，但没有效果，前日我有辞去一切职务的启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次南侨大会开会，承诸代表好意劝勉，只好打消辞念。吴铁城在星洲时，对记者谈话，大骂特骂“汉奸”，“口是心非”，他骂的不是别人，正是骂我，只要懂得看报纸的，我想都会明了的，小弟明明知道，但只好容忍，为的他是代表蒋委员的，因恐失国体，不然，我一定给他丢了脸子回去，他当上海市长，薪俸几多，而他居全国财富第九位，陈济棠还在其次，这话是否事实，我不得知。而我所知道的，吴在重庆嘉陵新村新建一所大厦，估计至少在数十万元以上，这钱究竟从那里来的呢？非贪官安有此巨资焉？在战时县长失城逃走，照国法应处死刑，若身居一省主席，于不数日间失去广州省会，反得逍遥法外，大作其官，这又何说？前日高凌百在南侨大会开幕演词，大骂“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这些话在说谁呢，无疑的是针对我和大会代表说的，最卑劣的骂人的话。诸位代表，当然也难堪，我今日要讲的话是有凭有据的话，这里是殖民地，是有法律的制裁的，我所说的话，如果不对，我愿负赔偿名誉的责任，今天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我说高凌百是“拥汪亲德”的，我这话是有证据的，当汪精卫发出和平妥协，我去电反对，他覆电回护，我又去电劝戒，他又来电不纳，我预备第三电指他为张昭秦桧奸谋，电尚未发，高凌百就来阻止谓，切切不可再电责汪，务必从此停止云云。其拥汪可知，若云该时见事不明，何乃复经一年之后，英德宣战，我认为华侨应表示真实态度，曾发表通告拥护英国正义抵抗，反对德国侵略，高凌百又来表示反对，说我国对德国友谊未断，不应该发此通告。以上两事，居心何在，不问可知。他骂我挂羊头卖狗肉，究竟谁是挂羊头卖狗肉呢？还有一项就是关于中正中学撤消校名的事，据说是高凌百介绍其私友在中正任教，后因不守师道，被学校停职，高凌百含恨，乃冒报中央，捏称该校“办理不善”，予以撤消校名，该校卒不受命，就此一事而言，又岂非大失国体者乎。

**斥高凌百阻碍筹赈募债**

**四月三日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说**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41**

       闽侨大会在四月三日会场中，因菲律宾代表王泉笙自开会数天，未来出席，主席即派代表二人，前往邀请，据王君言，因当地高总领事不参加会议，与菲岛开会体例不同，他故不能出席云云。主席团陈嘉庚氏闻言，则当场表示怀疑王君之说，并宣布未请高总领事参加原因，翌日报纸记载不详，兹将当日陈嘉庚氏所言补录约分为下列各段：

       一、如照王君所述，菲律宾吾侨，凡有开会，必有领事官参加指导，方克成会，则全菲律宾群岛，为吾侨居留较多者，不下数十岛，每岛凡有开会，如无领事官到，则不生效力矣，事实真相，是否如是，此庚不敢置信。

       二、过去马来亚侨胞开会则不同，有如新加坡筹赈会，年开许多次会议，概未尝请领事参加。大凡作事如认为有益者，当然欢迎之，否则，何必画蛇添足。前日南侨筹赈总会开会，固曾请高总领事来参加，乃其致词狂悖荒谬，对大会无益而有损。且自抗战起后，高君对于筹赈及募公债各事，屡有阻挠破坏，故更无须再请其参加，兹庚请以事实言之。

       甲、廿六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新加坡总会及各社团，请准当地政府，订是月十五日在总商会开侨民大会，先一日，当地政府约庚谈话，告以此次华侨筹赈，庚当负全责，且应统筹统汇，不得另设其他机关，并告此为侨民之事，勿须贵国官员参加，盖中立国政府，自宜遵守中立国规例，以免发生意外之交涉。迨开会时，众举庚为主席，致词后，高君便要发言，庚婉谢之，彼竟悻悻而去，留下其秘书某君，登台发言，广引国内种种开会情形，纠缠一二小时，几致开不成会，尚幸日近昏晚，故得收束了事。

       乙、是年九月间，报传我政府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分配华侨一部份，高凌百便来告余，谓伊明日要往马来亚各处招售救国公债。庚即阻其不可，以马来亚义捐，至十二月止，可募一千万元，现仅半数，须暂待来月募足，方可提起公债。他似不以为然。庚便不客气云，今日国家时局严重，凡事勿作儿戏，君前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庚劝君谓居留地政权不在我，难收效果，君不听，今何如耶？又某君倡捐集二十万元建领事馆，君极力挽庚参加，庚以为徒劳，君亦不信，今又如何？夫劝募公债，实非容易，今日所急在筹赈，公债稍慢何妨，且公债之详细手续未到，当地政府未准，若贸然举行，不但成绩无，且恐阻碍义捐。高君于是同意而退，乃不三天，霹雳方面，便有人用长途电话来询，谓高总领事鼓励组织公债委员会，劝侨胞买公债，现义捐进行未完，究要从何项先办。

       丙、在该时期，适上海宋子文先生，托李玉书送来聘庚为公债委员之执照，同被聘者，尚有李俊承胡文虎二君，并庚共为三人。阅其计划，当负责全马来亚一切劝募责任，庚寻思依此办法进行，决无成绩，即修函告宋君云，所委三人，均为闽籍，尚未足以代表新加坡，何况全马来亚，最少在新加坡须加添广帮林文田，潮帮陈振贤，聘书请直寄总商会交之。又告新加坡既不能代表全马来亚，现全马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其他十一区侨领某某等君，亦请直接聘委云云。岂知高君一闻庚等被聘，立即在吉隆坡另行召集怡保吉隆坡新加坡数人开会议决在新加坡成立公债委员会，向当地政府请求注册不达，适刁作谦君亦因公债事南来，复代向当地官长疏通，结果当地官长表示，谓兹事体大，何不仍委陈嘉庚办理，而乃要新立门户，刁君于是来见庚，详述原委，后数日当地官长便来函嘱庚接办，庚于是仍分十二区，平均负责，实行劝募。

       丁、新加坡筹赈会，即遵行统筹统汇原则，便不容在同地复设第二机关，妇女部原亦参加在内，已有月矣，乃高凌百夫人，中途竟自组一机关，且任主席，所有妇女部份捐筹，概由她主持，然该会对新加坡妇女募捐工作，未能进行普遍，前后所筹，不外数万元而已。庚恐破坏统筹统汇，违背当地政府约言，或者由此作俑，再生出别个机关，故修函向高君交涉，后始作罢。

       以上数事，可以证明高凌百对新加坡及马来亚，关于筹赈劝募公债事，是有益或有损，是否开会须请其参加，盖侨民爱国，捐资救济祖国难民，乃属侨民之事，毋须领事官参加，此为新加坡社会之惯例，而菲代表王泉笙，竟以此坚执不出席本大会，本大会当然亦不能迁就之，诚以一人之出席与否事小，而全局所关，得失所在事大，不能不斟酌损益于去取之间也。

**陈嘉庚斥贪官污吏罪恶**

**星洲大世界五届筹赈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5.1941**

       今日为本筹赈会主办大世界第五次游艺会开幕之日，欲以所筹之款，寄汇祖国，救济伤兵难民。查自前年欧战发生，英政府限制马来亚及婆罗洲义捐汇额，每月限坡币五十万元，而逐月义捐收入，约七十余万元，故积存在银行未汇，有三百余万元。迨自本年四月起，逐月准加汇二十五万元，即每月可汇坡币七十五万元，然自本年元月以来，各处义捐，收入比前较减，本席希望侨胞，此后出钱出力，更加踊跃，否则，不但银行存款不久汇完，就是逐月七十五万元，亦恐不能汇足，此则望本坡及马来亚婆罗洲诸侨胞注意为要。

       自廿六年祖国抗战，本会成立以来，迄今将近四年，开会亦已百数十次，其间除攻击汪精卫，及招待机工回国而外，则以鼓励侨胞出钱出力之事件为多。至于祖国政府如何，固未曾闻问。海外侨胞，亦属国民一份子，奉行三民主义，较之国内，当无逊色，而于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则不特抗战后如是，在抗战前亦莫不如是。致而对民权问题，亦当研究运用，不便放弃，唯凡事必取合乎正义，且有实据者而言，不能轻举妄动，以作无益及非理之干涉，本人受全侨之推托，负南侨总会主席之责任，对祖国抗战后，方应尽之义务，当然要负责鼓励，而对政治方面，在民权范围之内者，亦不能缄口无言。抗战以前，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我召集侨民大会，攻击陈济棠，抗战后卖国贼主张和平妥协，我攻击汪精卫，回国后，在国内，我复攻击西南运输处之腐败，攻击保管外汇之人侵逃外汇，以及西安恶吏，福建陈仪徐学禹之苛政等。回洋后又攻击吴铁城及高凌百，我所攻击者，前后计九人。呜呼，此岂我之好事哉，出乎良心上之不得已耳，兹复略述其大概如下：

       （一）陈济棠不但背叛中央政府，且极贪污，误省误国，尽人皆知，今则竟在中央，任农林部长，我国以农立国，对农业何等重大，而乃以此等任之，天理人事，是否适合。我国科学未发达，水利未振兴，农业之丰歉，半由人力，半由天功，若果有天意，见此贪污误国之人，定必不满。

       （二）汪贼卖国求荣，罪恶之大，莫可比拟，我首发其奸，军人莫不称快，今乃反有利用汪贼来诬我者，其居心可知。

       （三）西南运输处管理腐败，因之阻碍抗战军运，亦非常重大。中枢保管外汇之大员，贪黩营私，其有害于抗战经济，关系之大，更无待言。西安省会，与中共边区邻接，主政不良，使共党愈加侧目，此亦均与抗战前途所关至大者。

       （四）陈仪徐学禹祸闽至惨，不特闽民水深火热，而摧残民众，斵丧国力，全面抗战，受其牵累，整个大局，难免动摇，故其残民暴政，未可视为局部问题。

       （五）吴铁城及高凌百煽动党派分裂，破坏华侨团结，不特阻碍筹赈会常捐义款，且使侨胞发生极大恶感。近日有所谓海外部代言人者，更替吴铁城命领事馆在某报发表其谈话，而吴铁城本人亦公开其私人书信，谓省主席理民政，失地不负责，巨富无根据，重庆巨厦非已有，兹我答覆如下：

       （甲）广州失陷之速，出于全国人意料之外，且觉无限痛心，苟非平日文恬武嬉，绝无戒备，何致如是，当时粤侨领袖多人，疾首悲呼，而就商于本人请发电询问蒋委员长，要求严惩弃城逃走之大员。本人为恐有碍蒋委员长之尊严，颇觉难于下笔，乃婉商由该侨领等写稿前来拍发。至云省主席任民政，不负责失地，若然，则县长岂非任民政，何以律当枪毙者乎。

       （乙）国内贪官巨富，吴君列在十名以内，此乃香港富有身家之某粤商向我言之。以陈济棠之富，仅列在第十一者，吴君竟驾而上之，其言是否详实，固未敢知，唯我最不解者，公务员不拘文武，如吞款至五百元，律当枪毙，而厚拥千百万者，不但逍遥法外，尚可高官厚禄，依然自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其斯之谓歟！

       （丙）重庆嘉陵新村吴君新建之巨厦，距离我寓所不过二百尺，据中央组织部招待人员告我，该屋即吴部长所建，我寓居是处三十余天，旦夕恒见吴君前来巡视该屋工程，其时一部份仅在筑墙，一部分甫设基石，如为预租之寓舍，而非已业，何不惮烦至是。

       （丁）往事可免多论，单就吴君此次在星经过事实言之，中正中学被高凌百向蒋委员长诬告，致来电取消“中正校名”，该校董事以全非事实，拒绝命令，不愿取消。过后数月，吴君啣命来星，该校校董林文庆，李振殿，谢荣西，林师万，郑古悦等联袂往见，陈述冤诬，并请吴君到校视察。吴君诺之，至时竟拒绝不往，谓渠此来，只代表蒋公，宣慰侨胞，不便干涉学校事云云。但数日后，吴君则又召集中正学校诸董事，告以校名如不取消，尔等应即辞去董事职务，以免担负干系。中有几人，卒为威势摄服而辞，按诸董事多为坡中闻人，社会前辈，且多亦为忠实老党员，而以屈于权威之故，非特冤诬未雪，且反被迫辞职。尤可怪者，吴君明知中正学校无故被诬，竟不为昭雪，复从而助桀为虐，以党部大员威临其忠实老成之党员如此，则其对待党外人可知。以在海外竟犹不分黑白，同流合污如此，在国内之党同伐异，则更可知。以待侨胞纯为国家牺牲而无利禄企慕之人犹如此，则在国内之武断曲直，鱼肉民众，制造磨擦，当更可知。

       （六）我在国内九阅月，历十五省，参加演讲会者几百次，所到国人，大都希望华侨回国投资，且要知南洋特产之树胶情形如何，我恒以实情告之。如投资者，前已言之屡屡，今日不复再赘。至树胶问题，我谓南洋土地之面积，不及我国新疆一省，而树胶一物，逐年出口价值，比较我国前年总出口尤多。在限制期间，每年出口至少一百万吨（系指去秋），值新加坡币八万万元，申算国币可为六十万万元，以征税为例，每百元按收五元，六十万万元，可抽三万万元。查我国抗战前，全国出口抽税，尚不及此数，树胶利权既如是宏大，我国人定要注意，至栽树胶之法，当分两时期，第一时期为砍伐芭树，待数月后，放火焚烧，烧未尽者再燃一次，此为第一时期之工作，第二时期为种植树胶苗，此时期比前尤须大用工夫，要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无令为害，则树苗方可长成，再过七八年，便可收利矣。

       鄙意我国现下抗战建国亦如种树胶者，当分为两时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属我，可无问题，此如栽种树胶者之砍伐芭树及烧芭。至第二时期，则为建国，属于政治问题尤大。如树胶苗之落地后，必大用工夫，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所有害物，概须铲除，有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宜驱而去之，则建国方能成功云云。本人在国内所言如此，今日凡我华侨之有树胶园者，谁不欲其树胶之茂盛，收成之丰富，而对恶草白蚁，绝不留情，庶可达其愿望，祖国之抗战建国，何莫不然。本人亦希望祖国树胶（政治）之繁荣滋盛，故不能为恶草白蚁而留情，诸君爱国，必不后人，愿共勉之。

**陈嘉庚电林主席斥吴高祸侨阴谋**

**原电载南洋商报7.4.1941**

       重庆国民参政会请分送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钧鉴，何总长白副总长暨各院部长官勋鉴：南侨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到英荷泰非越团体百余单位，代表四百余人，会议一星期。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国策，声讨汪逆，加强筹赈工作，又设立南洋闽侨总会，呼吁改善闽政，团结闽人，庚加以公意谬膺赈总闽总两会正主席，两大会呈电中央八通均托总领馆代发，不悉有无达览。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屏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自吴铁城来南洋，利用宣慰名义，暗植党羽鼓煽分裂，驻星总领事高凌百更仰承鼻息，变本加厉，阴谋操纵报馆学校社团各机关，以遂其破坏团结毒计。长此以往，恐将造成上海第二之纷乱情况，当地英政府已深表不满。吴君在星时对记者诬毁鄙人无法不至，以念其为委派专使，恐伤尊严，隐忍不较。高君以为懦弱可欺，益肆狂悖，竟在此次赈总大会中大放厥词，斥骂无党无派者为倒行逆施，为破坏抗战。庚认吴高等辈荒谬绝伦，无可再恕，始揭吴贪黩误国，高拥汪亲德各实据。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各端，经大会电请撤惩，务祈採纳，临电不尽欲言。参政员陈嘉庚叩虞。（四月七日）

**陈嘉庚主张团结息争通电**

**原电载南洋商报5.2.1941**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去岁春间，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两端：一则藉觇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一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徂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濒海，足跡所经凡十五者，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踊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神，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据要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讳。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未退，胜利确有可期。此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亦无爱憎，片言绝不扬仰。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翼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十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咸能明识大体，发挥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初，获闻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踊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诼繁兴，遇至热望冰消，义捐停缴，咸且疾首蹙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视，乃于回国期中，分谒渝延两党领袖，垂涕而道，苦劝息争，用以顾全大局，蒋委员长表示优容，毛泽东先生托述拥戴，庚闻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国人，期勿相惊伯有。乃南归未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无派立场，无利害私见，觀兹异象，弥切杞忧。庚久处炎荒，罕闻政治，人间名利，视若漠然，党派异同，更非所问。兹逢第二届参政会开幕，猥以愚擒，谬厕一员，爱举所怀，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 明教。

陈嘉庚叩歌

（三十年二月五日新嘉坡发）

**重庆与延安三则**

**此三则皆转录自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

**则一出自该书页一百六十二，**

**则二页一百六十二，则三页三**

**一、重庆与延安**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厅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部、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箝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弟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跡不见。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二、所闻与所见**

       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种种不堪入耳之言，似非为宣传而来，又是略可靠之人告余者。然彼或闻诸他人，或阅印刷册，信以为真亦莫怪其然，凡未到延安区之人，谁能辨其真伪，余亦是疑信兼半，所以必要亲往。亦有劝止者谓往恐不利，余则置之度外。及到延安界特注意前所闻数事，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常有一二南洋学生，在招待所留晚餐后，将回校须十左右里，余问夜时有无关碍，答绝对无关碍，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此为余所见者。至于所闻，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都能守分。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处，签押注册，简便了事，盖无论男女，谁敢行动非为，即免惩戒，亦受大众鄙视。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销，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共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三、向往延安**

       自民廿九年夏，法英战败，敌乘机侵入安南，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东亚方面，中国为战线要衝，将来中美必须联络，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而金钱与军械，则赖美英供给。故美总统屡派代表，或藉名中国顾问，与我政府磋商，其最重要条件，即是财政公开，政治民主化，避免国内分裂，方能一致对外。经历有年，结果无效。迨至日本南侵，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以为大敌日本，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而眼中钉之中共，便可乘机制裁，即转一部份军力封锁其边界，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陈嘉庚对所得税问题发表言论（注一）**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29.11.1916**

       庚为十三名会友请召开此特别大会之一，然庚之愚见，不在建议以何项抵入息税，惟有一防护耳，防护者何？以十八位之立法议院议员，华人中仅得数人，实占少数；际此商战之秋，应当筹有大公之策，万不可改人息税之抽，而加诸劳动家。况劳动家多属华人，直接则在劳动家，而间接则甚有碍于工厂。如前孟买人大会，讨论结果，以树胶及人身税鸦片加饷等件，试思其用意，明眼人不难明白，故庚深愿本会立法议院议员，格外注意。

       至于乐捐一事，万万做不到，亦实无价值之讨论。而庚忝在会友，与商会董事无干；但闻本会讨论纷纷，意有未合，于是在敝怡和轩公馆建议云，除最公平良好之入息税外，第二策任求不得，无已加抽门牌税，足以抵额。譬如如敝附近诸商家，一年扣还三千六百元这屋栈，而获利可一万元，除花红有账外，实存作七千元，若抽五巴仙入息税，即三百五十元，将此款加入门牌税，仅十分之一，似较请别项为便利，政府抽款即足抵入息税之额，而其费且可省却无数。庚此论系指生理屋而言，余如住家及戈里间（Coolie Keng),不在此内。至于抽诸业主，抑或加之商家，政府自有公平之办法，产业家无劳藉是纷纭。庚此意系前在敝公所愚见，若今日大会决不认提作建议，望诸君见谅。

**树胶之运命**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1.1.1921-12.1.1921**

       树胶一物，初为野生，继以种植，十年以来，发达最速。欧美资本家投资数百万元，于南洋热带一地，委任少数西人，指挥数十万亚人为之服役，开辟百余万英亩。其锐意进行者，不特因获利之厚，且兼其寿命之长，下种数年，可成大树，市佳即採液，失败则停止，不至重招损失也。而我华侨暨土人，亦开辟数十万英亩，大抵寄身异地，拮据经营，以求成功；其势力虽不及欧美资本家，而宗旨则同也。

       十年之前，每年产出不上万吨，迨至客岁，增至二十万吨之多（南美及锡兰岛年出数万吨不在此内）。其骤增之由，虽为树胶长成，取液及时，然亦因欧战后，神经敏捷之实业家，视其为奇货可居，故收买日盛，价值日高（上胶每磅新加坡银一元二角，下胶九角），有未及时之树，亦贪目前之利，而从速割取。虽然，迟早不过一二年，此后旧树益大，新树日长，逐年可增之数，不减数万吨，若非近来市价大败，再后三年，或可产达五十万吨以上，可云巨也。

       然出产仅限于热带区域，而需用遍于全球。制成之品，日新月异，最大宗之用途，则车轮居其大半，或且谓树胶之需要，与铁无异。将来供不应求，价值之高，可增数倍。斯言非无理由，何也？无论海洋大陆，无不用树胶，尤以文明国尤甚。即东亚而言，交通路政，方在萌芽，他日需用之巨，实意中事。乐观之说，几为世界所公认矣。

       採办之国，美居三分之二，机厂林立，商贩十百，资本多寡均可经营，竞争剧烈，莫可言喻。按年买卖，较之实数加至二十倍之多，至于出产地之南洋，机厂虽寡，若商若贩，则有如南亩农夫，几乎居斯土者，以不营斯业为愧，故其竞争更甚，而事实上能否得利，在所不计也。

       然而盈极则亏，泰极则否，殆或时势使然。本年以来，胶市日降，其原因虽我世界财政恐慌牵累所致，而实际上则出产过盛，供过于求之弊。商家不察，视如常市之升降，蓄积居奇，甚至买空卖空，希冀侥幸，不计其来源，如水非竭涸，不能止流。迨近年来，乏力抵御，袖手旁观，致一败涂地（上胶每磅三角半，下胶一角八占），于是，破产者多，势如火燎原，不可防遏。市况到处萧条，不堪回首。而最可伤者，尤以劳动家为甚。从南洋第一大宗土产，直接间接，痛痒相关，受其影响，奚啻数百万众。市佳则百物流通，市败则到处凋弊，其关系岂浅鲜乎！

       易曰：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今种植家，并诸商贩，咸盼望胶市之起色，冀收桑榆之效，于是种植会，联合研究各种补救之法，其结果议减工价，节少出产四分之一。据欧美及各处报告，并出产地调查，积滞之胶，三十余万吨，足供现状一年之用而有余。其已制成之品，美国一巨厂，论积存车轮，至一百万个之多。于是工人退职者，不下半数，其他可以想见。准此计核，虽出产减半，仍恐供过于求，欲望起色，无异河清之难俟也。

       今日种植家，如拘执成见，不能毅然解决，而欲望胶市之恢复，何异负薪以救火，扬波以清流者乎？何以言之，积底之厚，销路之短，即完全停採，绝其出产，尚不知再历几季，方有转机。乃诸种植会不此之图，尚守故策，与销货家相持，冀卜不久之胜利；或鸡肋难舍，虽售价仅供工费，而心存希冀之念，仍不敛手待时，是犹欲止其流，而不肯塞其源，目的乌可达哉。

       虽然，欲实行善后之策，有一困难之问题在焉，即採液之三十万工人，应如何安置是也。果行前策，则马来半岛许多数工人，能无失业之恐慌乎？吾人不得不为之代筹方法；或与政府磋商维持之策。或尚半数，给以便宜工资，使之除草修树，辟路开沟。他日胶市再腾，不患召集之难。其他半数，或津贴川资，听其回乡，或令其自谋别业，此虽出于下策，然不如是则出产仍供过于求。种植家以艰难多年，经营宝贵之树，供无益之採割，而工人亦仆仆辛苦，费血汗之劳，竟不能维持自身口腹（前工人每日工资一元之外，除伙食五角，尚可以仰事俯畜，现每日仅得二三角），两败俱伤，悲观无穷期也。若能毅然绝止出产，以避此恐慌时代，则不出一年，无难恢复原状，不特种植家与劳动界均受大益，而政府亦蒙其利；否则，挽回无术，吾更不知乐观之日矣。

**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

**当前应採之策略**

**原文载南洋商报26.4.1933**

       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之前，欧美日本等国，各种工业虽觉制造发达，转运灵敏，竞争剧烈。然生产尚在有限，世界供求颇略相当，加以欧洲列强经济昌裕，各方竞致力于霸权之争持，军备之扩充，故绝未露何项物品之过剩，以及工人之失业者。盖战前之世界，尚在繁荣之时代也。

       大战开始之后，交战诸国，凡正当生活用品，不唯不能制运出口，即其国内所需，恒且反求诸外。缘各项工业厂，多临时改造军器，而一部分工人更以驱赴前敌，死伤残废，日以万计，筹防设备，更事纷繁耳。

当时美国日本及数小国，多乘他国忙于战争之际，扩充自国工业，大收渔人之利，举凡农务矿产、实业工厂、商舶渔船，军用器械一切等，经营制造，昼夜兼程，出品之多，不可偻计。以三数国之力，供全世界之需，至于五六年之久。

       大战告终，各交战国，室如悬罄，野无青草，颓垣败屋，废垒荒壕，触目皆是。建设改造，工程浩大。而农业矿务，重张不易；工厂实业，典作尤难。斯时各参战国家，多感极端之痛苦，卒以经多年积极之筹备，大战经验之所得，科学进步，器械新奇。建设愈臻完善，出品日见精良，而且成本便宜，不唯免赖舶来之品，且可源源输出，其刻苦迈进惨淡经营之精神，亦良是使吾人惊佩不置者也。

       欧美日本各国，既咸积极扩充其生产制造物品，对于需要原料，似有求过于供之势。故原料价值日高，获利日厚，因厚利而增加出产，或从事科学与机械之制造，或力图交通与开垦之发展，各种事业，莫不随工业而俱进。

原料既充分应求，出品复日形膨胀，日积月累，各货充斥于世界市场，于是形势一变，供过于求，销途日塞，问津有限，物主乃不得不贬价求售，一以活动银关，一以维持工作。一地然，各地皆然。一国困，各国皆困，安得不大败特败，至于不可收拾。物品价值既败，各原料当然与之俱败。凡直接间接，莫不受其牵连影响。如工资之降削，工人之失业，商贩之损失，市肆之冷淡，运需之消减，银行之紧缩，生活程度之低落，江河日下，竟无止境，此世界所以趋人于不景气之重围也。

       数年以来，不景之风，普及世界。举世人类，嗟叹悲痛，咒诅惨沮，何可胜言。若一考究事实，亦颇令人费解。试问今日世界缺乏何项乎？以食物言，米麦糖果，各种食物，莫不洋溢丰盛，绰有余裕。以衣料言，棉丝毛羽，纺织新奇，充满市肆。至于住所，则空屋毗连，到处皆有，高楼广厦，更其堂皇，宜乎欣鼓腹，咸庆盛世，而反悲惨苦痛，咸叹不景，岂不怪哉！

       或曰不景者，非属于日常生活之物质，乃属于流通市面之金钱也。然金钱何往乎？既非如食物之能消化，亦非如衣服之能腐坏。出产有增无减，流通非彼则此，毫无损失。何以前裕而今竭，此期间盖有故焉，盖因主持金融之机关，非受财阀之把持，则遭银行之垄断，以至金融困闭，社会无以流通耳。然主持者之限制流通，亦实迫不得已，盖与其放出而危险，毋宁贮积而乏利。

       金融困塞，百物滞销，工人失业，商贾疲敝，不景气之严重形势，由是而生；世界之恶运，由是而烈。关心世运者，以为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或在一两年间，或断定两三年后，迄兹期限将届，不特毫无影响，尚且日败一日愈来愈险，重峦叠嶂，奇险重重，前路光明，不知何在？

       工业国如日本，乘不景之际，复积极扩充其出品。银价工资、运输保险等等，莫不大降特降，以最低贱价，倾销于各国，更增加他国工人之失业。故凡关税能自主之国，当然不能坐困待毙，由是而高树关税壁垒，以保护己国之工业。凡自国内所短缺诸物，有利可图者，无论国民或外侨，莫不自行制造，以抵外来。如英国新建设之工厂，不下数百家，将来增多无数之出品，可以想见。

       农业矿务，出产最富之国，首推美国。棉麦油钢，且有自动限制生产。而苏俄则方积极筹备，机器新式，科学进展，设备完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将来生产之丰富，岂在美国之下。五年计划成功后，其国内之重工业极力设备，方兴未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输出国外，亦已稍露头角，惹起列强严重之注目。

       不景气未露之前，及已露之际，其原因皆由生产过剩，已如上述。工人失业之多，欧美诸国，将达三千万人，几占同业三分之一。而英俄等国，复积极扩充生产，虽该二国工人失业，可以补救，而他国之失业工人补救无术者又将如何？况于生产过剩之中，而复增以无限之来源，则其将来过剩之过剩，更将如何以处置？此为研究失业问题及不景气之因果者所当注意也。

       挽回不景之法，其希望目的，莫非以工人不失业、生产不滞销，则金融可以流通，商业可复繁荣。然生产过剩，既如上言，工人失业，又如是多。姑勿论英伦两国之扩充生产，单就现下尚未充分出产之际，胃力已不能消纳言之，已觉痛苦，而况益增失业三千万人工作之出产，而欲求达消除不景之气，无乃矛盾太甚者乎？

       近者欧美列强，提倡军缩。虽在若即若离，然以美之牢握战债财权，英之举足轻重，其成功确有可期。唯能实行与否，须视太平洋和战为标准。假如全世界加入军缩，则一切国防之裁减，凡直接服务，及间接工作之人，则必因此裁减而增多失业，当不只千万人而已。

       综上推测，不景之气，全由生产过剩。生产之过剩，则概由科学进步，成本廉宜，机器发达，出品大增，替减人力之工作，故增多工人之失业。此种坚确不移之现象，不啻天然造成必经之潮流，任何智能财神、伟人博士，而欲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无不感觉缘木求鱼，势必无望。

       鄙见所及，欲救不景之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口口（注一）。战争属于治标，口口可以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平均工作，则工人既免失业。工作至多四小时，衣食无缺，老幼疾病，公共负责。既无私业之竞争，复免患得与患失。尧天舜日，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

       南洋属原料出产地，工业既无价值可言，而同遭不景之气，其苦况不亚于诸国。无论将来治标治本，欲恢复前状，实属难期。以治标言，界在太平洋之间，与前欧战远距离不大相同。以治本言，则殖民地性质，亦必远落人后，安有乐观之日？今日吾侨欲求立足地，唯有极力省俭，裁除耗费，恢复三十年前之生活程度。能如是，庶乎可避淘汰之列矣。若不未雨绸缪，必至噬脐莫及。一得之见，聊责侨胞，如有大雅卓论，深愿互相切磋也。

**由劳资纠纷谈到本坡华侨工业**

**原文载南洋商报30.7.1938**

       近数年来，本坡劳资纠纷，屡见不一，甚至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亦发生磨擦，双方损失，以及关系吾侨劳工方面前途至为重大。鄙人久居此地，鉴往思来，为吾侨工业计，为劳动界幸福计，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尤以祖国际兹倭寇侵略，全民族展开长期抗战之时，海外侨胞负后方重责，出力出钱，挽救危亡，为至高无上之神圣任务，万不能再生他故而自阻进行也。鄙人生平以服务社会为职志，不敢居资本家地位，自信发言不偏袒任何方面，惟根据事实，审察情势，本其愚诚，提出管见，略为我劳动界同侨陈之。

**星工业概况**

       一、本坡工厂经营较久，规模较大者，当推黄梨罐头厂，胶品制造厂。次则铁工厂、饼干厂、印刷厂，其他规模虽大，而人工不多者，如生胶厂、木锯厂、油厂、冰厂、肥皂厂、砖厂等。又如手工业之五金，裁缝、剪发、皮鞋、洗衣、建筑等，则工人虽多，而场所不大，此为本坡吾侨之工业大概情形也。

       二、黄梨制罐运销欧美，迄今五十余年。初时概用手工制造，每年出品仅数千箱，其后制罐改用机器，产量逐渐增加，客年出品遂多至二百余万箱，以鄙人所知，三四十年来前后改名易主之厂家，不下四五十，倒闭者，收盘者，负债者，时有所闻，情有重轻，失败则一，现存数家皆由近年新股东支持，不但毫无赢利，且亏许多血本，至胶品制造厂，历史不过二十年，虽厂家无多，而工人则近万众，资本尤为雄厚，时至今日，亦陷于进退维谷之地步矣。

       三、铁工厂，吾侨经营者多至百数十家，然规模不大，多属修理补造工作，厂东十九由劳工界出身，虽乏大利，尚可维持，盖无外来竞争之患也，饼干厂前仅一家，颇可获利，十余年来多家竞争，加以添置新机，建设新厂，垫款甚巨，现只供过于求，营业日见退化，收回血本未可预卜，前途至为悲观，印刷厂方面，则得失均有，善经营者亦仅足维持而已。

       四、生胶厂规模较大，工作简单，工人新旧无甚关系，自胶厂限制以来，原料大减，此条营业有属过去时代，枋木火锯，自来成败均有，目前尚可存在，近时外埠新厂林立，颇受威胁，而所用工人，小部份虽技巧娴熟，其他亦属简单工作。此外如油厂、肥皂厂、冰厂，更为简单，工人不拘新旧，皆可胜任愉快。

       五、手工业如裁缝，剪发，金银铜锡器等，均日常所必需，不患外来竞争，资本既非雄厚，工人生活亦较稳定，唯劳资间相互要求须有限度，始可存在，建筑业方面，人数亦够，一部份重要工人须熟练有素，其他助手则随时随地可以招雇，此项工作印度人亦能胜任，虽动作迟慢，而工资低廉，吾侨应知注意，万勿视为可以居奇地。

       六、关于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本坡人种复杂，工资不一，大都视工作之烦简及技术之高低而定，除欧籍人外，若我侨工资当不在他籍人之下，前清道夫概用印人，去年因罢工而改用华工，吾侨宜时时以此为鉴。

**本坡工业失败原因**

       综上各途工业而言，除少数资本家外，其他多不能长久存在，原因约如下述：

       （甲）本坡工业品无关税之保障；

       （乙）当地政府无限制开设工厂；

       （丙）本坡银价，比中国、香港、日本、安南、印度等处为高；

       （丁）同业缺乏团结互助之精神。

       有此四因，故投资工业艰于获利，由于设厂不加限制，稍一有利，即增设新厂以相竞争，而同业团结互助之精神，遂益消失。由于本坡银价高于他处，工人每日工资五六角可抵他处一元以上，致成本较贵，难与他处竞争，而外来工业品，又免纳税，得以自由推销，再使本坡工业感受重大威胁，故本地资本家因经营工业而破产者指不胜屈，发财者则鲜有所闻，一班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者，大多由购地皮及经营土产而来，与工厂无何关系也，吾侨明识之士，一方面应知工业谋利之不易，一方面应为当地政府着想，遇市景不佳，工人失业，须劳当地政府多方设法帮助，若市景稍佳，则各项工潮又接踵而来，甚至发生轨外行动，触犯法律，而遭当地政府干涉，当地政府鉴于吾侨劳动界过去情形，乃颁布命令，限制吾侨入口，吾侨若不觉悟，遵守规律，以后所处地位必更困难。至市景佳时，物价腾贵，欲求改良待遇，当以和平手腕出之，适可而止，毋持之太过，俾双方同感满意，免留不了遗憾，而智识界诸君尤宜放大眼光，善加启导，使我抗战建国之后方工作，不致间接受恶影响，则幸甚矣。

**半斤八两**

       台湾人民六百万，闽人占三分之二，多为闽南人。因距离厦门水途不远，帆船一日夜可达，火轮尤为快速。甲午以前，闽南妇女纺织业，无家不有，大半运销台湾。所需米粮，则由台输入。其他物产，交换亦夥。人民往来，如现下南洋一样。自割让日本后，不但人民来往困难，而布米等物品交易，完全为日本夺去。闽南民众生机，几遭断绝。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尽力改革，兴利除弊，而尤以发展交通，改良农业，建设水利，禁绝鸦片诸端为尤著。数年之后，生产增进，民生安适。唯民族思想，遭受压迫，主奴阶级，判若天渊，人民自由，剥夺无余，故台民自我辛亥革命以后，企盼祖国之收复，不啻农夫之望岁。抗战胜利，目的已达，台人欢忭欣幸，莫可言喻，以为从此可出水火而登袵席，由黑暗而睹光明矣。

       陈仪治台之日，带去公务人员数百人，其选择组织，大部分当然为前治闽诸僚属，故闽人亦有参加者。下车不上两月，台民大为失望，或贴标语，或绘图画，指为“狗去猪来”。盖以日本为狗，尚能护主，而陈仪为猪，仅能饱食而已。不满陈仪，于此一事可以想见。

       闽省原非富裕，加以抗战数年，民生困苦，而陈仪苛政，层出不穷，任用乡亲及私人，营私贪污，勒索敲榨，无恶不作，而闽民以抗战期间，遭受压迫，虽如何悲惨，亦惟有忍受饥饿，或则投江自杀，不敢挺而走险。加以特务横行，言论统制，故外间鲜能知之。今台湾则经日本数十年之经营，物产丰富，工业繁盛，不亚南洋膏腴之地，陈仪等如饿虎见肥肉，安肯放松。闽省苛政，故态复萌，甚且变本加厉，为势所必然也。

       昨日报载，美合众社电，台民反对陈仪苛政，死伤近万人。又美联社电，政府委吴铁城，继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如系属实，则可见台湾变乱影响甚大，如陈仪不去，将无法收拾，故以吴代之。然吴铁城之人格，与陈仪不过半斤与八两。言营私积产，陈不及吴。言任省长不负责逃走，吴则尤甚于陈。言年龄品性，残忍狡诈，则无分轩轻。陈去吴来，无异以虎易狼。台民何不幸乃尔！若台人果能一致行动，坚持到底，将贪污官吏，尽数驱逐，则民众虽受重大牺牲，亦可获得代价。如其不然，乱事不过暂时平静而已，欲望其拨乱反治，是缘木而求鱼也。

       人性善恶，出于天成，行年四十以上，向无改移之可能。吴氏年届六十，平时所亲信所接近者，皆佥壬之流。贤达之士，决不愿同流合污。物以类聚，薰犹不同器，此之谓也。今陈仪之羽党虽去，而吴铁城之爪牙又来，相差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余前著之《南侨回忆录》，台人由厦门购阅，知闽人早已饱受陈仪之虐政。至吴铁城之行动，在余书中亦有所纪述，惟未若陈仪治闽事迹之详细。呜呼，此岂特台人之不幸，抑亦我闽人之不幸也。以陈仪祸闽之罪，万死不足以谢闽人，乃当局与之朋比为奸，同恶相济，忠佞不分，是非倒置，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今居高位者，竟无是非之心，我民族安得不遭受惨痛，于陈仪乎何尤？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美借款与我国纸币**

       国共不能妥协，内战不能避免，凡与两方要人有接触经验者，不待智者而后知，故余早断其谋皮于虎也。内战既不可避免，胜负亦非易解决。大战后我国物资枯竭，生产有限，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横行，军费浩大，政府财用专靠印币机为资源，基金毫无，每日要印行数十万万元纸币，向民众流通，换取物产，致通货膨胀，降跌，此又不待智者而后知。

       执政诸人，以为人民可欺，以为数月内可以解决内战，农业国不怕纸币滥发，美国海陆空军火及军人用品，可以源源供给，故当风狂走，凶暴残忍，发动内战，不顾民众之饥饿死亡，国权之削弱丧失，保存其专制独裁之野心，惯行其自欺欺人之狡诈。

       就现下国币言，日趋降跌，全国民众咸知将来必成废纸。数星期前，政府规定美金一元，值国币一万二千元，每万元申叻银一元八角，近日降跌半数，每万国币值叻银仅九角，若再跌五六角，则每万值叻银三四角，五百元以下旧纸币，均作废纸矣。

       新印万元之币纸，价值既贱，每个士兵每月平均至少需五十万元，前后方按五百万人，每月须二千五百万亿元，而广众流通所需，当加千百倍。印钞机虽如何灵敏，恐亦供难应求。纸面价值愈巨，滥发又愈多，则总崩溃亦当愈速。

       士兵作战之需要金钱，如汽车行走之需要汽油。不但粮食衣服，而公私费用，运输补给，悬赏奖励，冲锋陷阵，间谍冒险，贿赂对方，及其他种种巨费，均非钱不行。民众对纸币既失信仰，士兵交易必生阻碍，影响作战之利害，必须多赘。尚有一说，则强征强取强劫，勉作维持，如此则国军变成国匪，可哀也已。

       报载政府将向美国借款现金五万万元至十万万元，余意此种无稽之空想，非画饼充饥之骗局，即缘木求鱼之妄想。自敌寇败后，向美国借款若干，未有公开宣布，然所借数目，系军火及军事用品，此乃大战后美国剩余无用之物，藉此废物利用，既可握债主权，又可助长我国之内战，一举两得，其处心险恶，世界咸知，若贷借现金，则同水花泡影，徒供马歇尔特使之玩弄耳。

       大战时及战后，美国剩余军火，如飞机大炮，战车枪弹，积存在太平洋诸岛屿，不可胜计，及倾收日寇所有，更形山积，若全数供我国内战，非数年可能用尽。其他军用品，积存亦夥，第恐未能尽合我国军人适用。就新加坡弹丸之地，战后运来者，仓栈皆满，迄今年余，虽消去一部分，尚存数千万元之多，虽廉价尚乏人承受。而大部份为糖精，泻盐，剃刀，肥皂，饼干，罐头，及其他物品。美国在太平洋同样之存积，不知要加许多倍，数目当在几万万元以上，姑彼慷慨任我国赊欠，一如军火之供给也。

       除上言军火及军人用品两种外，若借贷现金，乃人民脂膏，原非政府所有，以我国现下内战之状况，政治之腐败，贪吏之如毛，美国人黄金虽多，欲领填此无底壑，又谈何容易。

       或云义借之款，非尽现金，而大半为助我国建设，交通及工业器械。果尔，则对于挽救纸币之崩溃无关，况许多重要铁路桥梁交通，且遭破坏，何暇计及建设新事业。即使借来半数之现金，以美钞专供军政之维持，亦不过几个月时间而已。总而言之，欲望美国借出若干万万元之现金，救此病入膏育，濒于崩溃之纸币，而解决内战者，真无冀缘木而求鱼也。

（卅六年四月卅日）

**论潮州大学**

       阅报知刘侯武先生，此次为创办潮州大学南来，经与潮帮侨领妥议，成立筹款委员会，进行募款。

       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千万，尚未有一大学，诚属憾事。世界文明诸国，大学林立，姑置不论。而教育最落后不振之我国，尚有大学及专门学校百余所，以人口平均计，四百万人可有一校也。

       潮州僻处南疆，然与东南亚交通至为便利。潮洲创办大学，非但为潮州之大学，乃中国之大学，不但为中国之大学，将来亦可为东南亚之大学，盖有教无类，乃教育之目的，惟近水楼台，经营缔造，自不得不先由当地人士负其责也。

       创办潮州大学，其目的为造就专门人才，培植民生幸福之基础。百年树人，成绩虽难立见，惟影响所及，收效必然不少。当民国十年厦大初办时，闽省中等学校四十余间，每年毕业生一千余名。当时中学学制为四年毕业，故大学设有二年预科。厦大初办预科三班，生额一百二十名，招闽生半数六十名，余为他省生，及考试，闽生及格不上三十名，可见中学办理不善，致程度如此低劣，其原因为向无大学人学试验，课程漫无标准也。

       自有厦大之后，闽省中等学校，多自奋进，以后招考新生，略见成绩。不幸自民二十年之后，为经济所困，勉强维持，呼吁无门，抱憾无已。至二十六年，余以厦大集美势不能兼顾，乃请求政府，无条件接收厦大。交卸甫毕，七七战事发生，全校内移，虽困难甚多，在质与量方面，成绩亦略有可观。新加坡未沦陷前，报载全国大学生会考，厦大生占第一位。其原因厦大内移时，仪器图书等大部分，尚可迁去，而华北上海等大学，多在沦陷中损失，故厦大特占优势也。

       至就量而言，去年秋季，厦大招生，考试及格者，四百余名，闽生占大半数。本年招新生五百余名，大约相差无多。就此比较，厦大开办二十余年，大半在遭遇困难期间，而促进中等学校之进步，成效已属不少。中等学校成绩优劣，既受大学之影响，大多数之小学校，当然亦必随中学而进展。夫如是，则今日潮州大学之创立，岂仅为造就专门人才而已耶。

       西哲云，金钱如肥料，散播乃有用。以马来亚潮侨之富庶，倘慷慨解囊，要捐百余万二百万元，绝无难事。又如存积公款之多，潮属亦为各帮冠。潮州小学校多积有基金，故学校经济不受市况影响。反之，福建会馆所办各校，学生五千名，基金无有。潮侨在本坡尚有重要地产百余英亩，现下堪值坡币数百万元。化无用为有用，谁曰不宜。论公论私，要捐助潮大创办费，并数年之经常费，实易如反掌也。

（卅六年八月十三日）

**论美国救蒋必败**

       本年夏季以来，蒋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败象日益显著，颓势无可挽回。其爪牙孙科等，竟乃异想天开，欺人自欺，初则捏造苏联接济中共，继复就蒙疆边界冲突事件，作夸大宣传，以为如是则可促成美苏大战，而使美国不得不以全力援蒋。其计谋之笨拙，见解之卑鄙，诚无以复加矣。

       我国政府要人，发表言论，往往缺乏常识，中外传为笑柄，例如抗战中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等十八人提案，竟主张召回驻英大使，不通知理由，以促英觉悟。其愚妄无识，余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加以揭发。最近侨务委员长刘维炽发言非难马来亚宪法，竟不知马来亚民主同盟为何物，而主张停止马盟活动，致闹出一场大笑话。更可谓荒唐已极。

       余尝以为我国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十居七八，以故政府官吏，多为庸材，缺乏常识，殊不足怪。余所不解者，美国民智发达，教育普及，专家学者，多如过江之鲫，然其政府要人，国会议员，如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竟亦蠢如鹿豕，与孙科辈，可谓难兄难弟，则诚非意料所及也。

       当日寇败降之初，美国积极援蒋，冀于数月内消灭中共，消灭不成，乃托词助华复员，并派特使来华，假意调停国共争执，其设计不可谓不周，用心不可谓不苦，然终至完全失败，马歇尔扫兴而返。何以故？则以美国始终不明国共内情故也。

       在抗战初，中共局处陕北，地瘠民贫，内受威胁，外无奥援，赤手空拳，抗战八载，蒋政府不给一支步枪，不发一粒大炮弹，独能在华北华中内蒙各省，建立解放区，解放农村，十居八九，动员民众，亿千万人，使敌寇仅能扼守据点及交通线，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非有卓越之军事政治才能，断不克致此。至于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就蒋部下嫡系将领而论，大多为懦怯之庸才，每战必败。其他非嫡系将领，对蒋政府，或则貌合神离，或则敷衍恋栈，故国共双方，未及交绥，成败胜负之数，固已属前定矣。

       布立特，魏德迈，祖德之徒，昧于中国实情，竟复呼号叫器，主张美国正式声明，对蒋政府，作大量军事援助，并派麦卡瑟帅驻南京，如夕岁在太平洋指挥对日作战然。质言之，彼辈不以金钱军械援蒋为满足，而要求倾美海陆空军之全力，以来华助战，如仍无济于事，则虽以原子弹炸平全中国，亦所不惜。此其狼子野心，较诸夕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然弄枪者毙于枪，玩火者毙于火。原子弹秘密，已非美国所独有，姑直不论。若大量军事救蒋，果能挽救蒋政府崩溃乎？果能贯彻美国侵略之目的乎？试择要论之。

       （一）过去两年，美国以大量军火及贷款援蒋，举凡飞机，大炮，坦克车，战舰，喷火器，各种新型武器，应有尽有，益之以美国顾问，参预戎机，美国军官，编练军队，结果完全失败，反令中共获得若干师之美式装配与美国器械。军火及物资援助，无济于事，业已甚明。

       （二）布立特等主张派海陆空军由麦卡瑟元帅统率，以实行救蒋侵华，此等于美国对华不宣而战。然中国为大陆国，惟陆军作战，方能决定最后胜负。日寇陆军以强悍耐苦著称，然中共以数万之众，尚能坚持抗战，至八年之久。美国陆军虽设备较佳，而其质数则远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实力已超过抗战时十百倍，则美国欲求制胜，其可得乎？

       （三）美国所恃以征服全世界者，惟原子弹而已。原子弹炸力虽大，亦不能炸半县之面积。我国土地有二千余县之广，纵令美国日夜赶造原子弹，每枚原子弹落入中国土地，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灭廿余县，欲炸平全中国，则需时百年而后可也。

       （四）以原子弹作战，虽然损失巨大，但未免玉石俱焚。中共解放区与蒋管区犬牙相接，无法划分，且内战为民主与独裁之战，为贫苦大众与豪富贪污之战，如以原子弹助蒋作战，则势必使蒋区军民亦遭牺牲，试问蒋所统辖之军队民众，能甘心忍受乎？

       （五）今日内战，胜负决于乡村，而不在乎都市，与夕昔军阀内战及对日战争，迴不相同，夕昔战争，重要都市失陷，或如广岛原子弹一下，执政者为保存自身生存，可立即投降屈服，然民众为自身自由幸福计，决不惧任何牺牲及威胁。忆抗战初期，我国缺乏空军，致全国城市，任敌自由轰炸，我国损失虽巨，然因民众始终不屈，最后日寇国土遭受盟军狂炸，卒致败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国，其最后结果亦如是也。

       （六）美如派兵参战，将使中国内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诚有可能，然纵令美国甘为戎首，英法意等欧洲强国未必甘心追随美国之后，共同作战。观诸最近法意两国迭次大罢工，加拿大工人反对军火运华，如美国一旦发动大战，各国民众势必群起反抗，即美国大部份劳工，亦未必甘心为资本家充炮灰，而况此次战争，师出无名，与上次之为反法西斯战争，意义尤大不同也。

       （七）军事救蒋既无效果，徒然自取败亡，则以贷款救蒋，自更属无济于事。即令蒋政府获得数亿美元借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吗啡针，最多不过使蒋政府苟延数小时之残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势，贯彻美国之野心，则断不可得也。

       故余以为美国以任何方法救蒋，终必惨败，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人呼号叫器，其愚诚不可及矣。

（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岁献辞**

       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

       我中华民族立国垂数千年。今日我国幅员之广亘，人口之众庶，国际地位之重要，国际关系之复杂，实为旷古以来所稀有。然而独夫专政，卖国丧权，一党独裁，营私舞弊，贪污横行，上下争利，凭藉外力，残杀同胞，狼虎当道，饿殍盈野，内战惨祸普遍深入，实亦开史所未有之先例。

       予于九年前，代表南侨，返国慰劳抗战军民，亲见独裁政府，贪污专横，残民以逞，而中共局处西北，生聚教训，发愤图强，固知分裂无可避免，变革已成定局。兹值岁序更新，时局动荡，独裁命运将终，民主胜利在望，故复不避重复，就过去之回忆，当前之瞻望，一抒所见，以就正于海内外先进之士。

       民国建立以来，军阀角逐，互争雄长，此仆彼起，内讧不息。掌握政权最久者，厥为袁世凯与蒋介石二氏。倘以袁蒋两相比较，袁为帝制野心，不惜勾结帝国主义，承认二十一条约，滥借外债，广植羽党，穷兵黩武，祸国殃民。蒋为巩固独裁，不惜割弃外蒙领土，旅大主权，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复与美国订结丧权辱国之商约及航空条约，将全国国防秘密，交通主权，工商优惠，经济命脉，拱手奉送外人，使中国成为菲律宾第二。此其存心与袁氏如出一辙。然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氏。不宁惟是，蒋氏认贼作父，卖国固权，罪恶昭彰，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日寇败降两年以来，余揭发蒋氏窃国罪状，向中外人士声讨，已历多次。盖自作孽，不可逭，自古已有明训，断未有卖国贼而能长治久安者。余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为公理正义计，故不能苟安缄默也。

       蒋氏以下，螃据党政要津，朋比为奸者，如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王世杰，陈仪，孙科，于佑任，戴季陶，张群辈，非贪污即无能，贪污必致乱政，无能惟有尸位。陈仪为祸闽罪魁，而复令继续祸台，张群治川多年，毫无建树，而令其掌握中枢。至其他诸人，声名狼藉，更无论矣。

       再就蒋军将领论之，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胡宗南，张治中，汤恩伯，朱绍良，杜聿明均属蒋氏嫡系。何胡在八年抗战中，未曾亲临前线。顾祝同胆小如鼠。刘峙则一饭桶而已。蒋鼎文汤恩伯以数十万大军守洛阳，竟令未及十万之敌军，长驱直入，如鹰逐雀。及未两月，湘桂俱告陷落，国土数万方里，沦陷敌手。至于陈诚，自诩为国民党内之战略家，若据军事专家杨杰将军之批评，则仅能胜任一营长。杜聿明初到东北，民众欢迎，盛况不减于台湾人民当初之欢迎国军。曾几何时，腐败贪污，劣迹著闻，将骄卒怠，终至失败而去。蒋军十城如此，余子碌碌，更不足道。

       蒋嫡系以外之将领，如阎锡山，傅作义，张发奎，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罗卓英等。或则迷恋禄位，或则迫于淫威。大率与蒋貌合神离，互相猜忌，尽人皆知。近顷蒋介石军事挫败，嫡系部队多被消灭，故不得不将华北军权，付诸傅作义，将华中军权，付诸白崇禧，以期集中兵力，挽回颓势。傅作义本为晋阎旧部。阎曾语余：蒋介石如政治办得好，共产党自然无用处；政治办得不好，虽无共产党，亦必有别党起而反对。此为由衷之言。今日蒋政府好坏，阎非不知，徒为地盘及金钱军火接济，故不得不与蒋同流合污耳。广西李白，对蒋历史关系，颇与阎傅相同。李宗仁曾坦白告余谓：蒋委员长做事甚偏。夫偏则不正，不正则无是非。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白崇禧则称，彼与共产党无恶感，如共区政治修明，彼甚表同情。至于中共用兵，有神出鬼没之奇，彼尤极口称扬。今日解放区政治较诸蒋区优劣如何，白氏知之甚审。乃竟贪恋付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虚位，至不惜助桀为虐。其或韬晦待时，投机取巧乎？则欲冀其临危受命，以挽救蒋军在华中之颓势，必不可得也。此外如张发奎薛岳，早已消除兵柄，徒然备位素餐。罗卓英主粤无能，贿赂公行，今欲责令挽回东北危局，于事何补，由是观之，蒋介石剿共戡乱，转成为被剿被戡之势。军事崩溃，可计日而待矣。

       次就经济而论。国币汇率仅最近一年中，跌落一二十倍。国家岁出，八十巴仙以上，作内战军费，以至工商凋敝，农村破产，竭泽而渔，民不堪命，尽人皆知，无待词费。民国以来，海外华侨汇款，年达叻币二三亿元，先后合计近百亿元。核算美金为四十亿元。自政府发行法币，换取民间白银，不下美金十亿元，今此五十亿元之现金已无复余存，而泛滥全国者，则为万元十万元之大钞。据魏德迈调查，我国人存款美国，总数达十五亿美元，存在南美及欧洲者尚不计在内。此多四大家族及蒋府官僚剥削所积累之私产，其他人民所有者，则为数甚微。至今国家经济濒于破产，华侨损失与年俱增，孰令致之，固已洞若观火矣。

       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在于将财富资产，收归政府统辖，然后公允分配，使民众咸享康强乐利之生活，而免社会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畸形现象。然兹事体大，非咄嗟可期。苏联立国三十载，亦尚未达到共产主义之最终目标。至若我国，自属言之过早。就余所知，中共虽提倡共产主义，然在解放区所力行者，则为改良政治，铲除贪污，平均地权，复兴农村，振兴工业，整顿交通，安定民生，普及教育，凡此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三民主义，并无二致。至于真正之共产主义，则据中共人士称，或当期之于数十年之后耳。反之，蒋介石名为奉行三民主义，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独裁专制，残民以逞，有甚于暴君，则非孙中山先生之叛徒而何？

       抑民主与独裁原如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曩岁国内举行政治协商，以期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余即断定其为与虎谋皮，断难获得成功。盖秉政者或倾向于民主，或倾向于独裁，均系出自本性，断难率尔变更。如独裁与民主可以合作，则将成为“独民政府”；贪污和廉洁可以共事，则必产生“贪廉政府”而后可。试问天下安有所谓“独民”或“贪廉”之政府乎？至于美国过去名为调停国共，实则别有用心，不过欲假调人名义，暗中助长独裁内战，以遂其趁火打劫之愿望已耳。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声明，美国宁愿有一贪污无能之中国亲美政府，而不愿有一廉洁清明之中国反美政府，此语将美国之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当马歇尔所谓调停尚未失败之际，中共诸君亦明知调解无益，第在表而上不得不虚与委蛇。余则在当时早已断言独裁民主无法合作，一切惟有决定于战场也。

       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至灭亡，民主终必胜利，已不待蓍蔡而后知。近闻得尚有人主张调停国共战争，实行两党合作，则不啻痴人之说梦也。

       抑自民国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吾国所受创伤不可谓不巨，吾民所遭惨祸不可谓不重。值兹时局剧变，胜利在望，自应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一切惟有根本解决，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苟安，养痈贻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一旦革命军事胜利，民主政府成立，尤应首先宣布取消各项非法条约及借款，没收四大家族及贪官污吏财产，以救济饥饿流离之民众。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兴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贫为富，指瞬间事。民国三十七年其或为由黑暗进入光明之转变年，亦为我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国，余企望之。

（卅七年一月一日）

**如何追悼侯西反**

       近日听说若干人发起替已经逝世三年多的侯西反君举行追悼会，我颇有几点感想：

       一个人死了，亲戚朋友哀悼他是私情，社会哀悼他是公谊，公谊的哀悼，说明死者对这一社会曾经有过道德上，或者学术上，或者事业上的贡献。如果死者有贡献与世界，整个世界都该哀悼他。西反君正象其他的人一样，总有他的短处，但他却有很可钦佩的长处：好义，嫉恶，刚直，勇敢，任劳任怨。他卖尽力气于排难解纷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款工作，这两点无论从精神讲，从成绩讲，至今华侨社会中绝少人比得及。他遭诬陷，遭新加坡政府驱逐，是为公；他在祖国东奔西走，救济华侨机工，由成都飞昆明失事而死，也是为公。他对华侨社会确有贡献，他的死确是华侨社会的损失，大家要开追悼会，非常应该，毫无疑问。我本人和他有数十年友谊关系，公益慈善事业，关系尤切，对于他的死，私情公谊，更没有谁甚于我的悲痛！

       奇怪的是：这些人要举行追悼会，何以等到西反君死了三年多的现在？又何以发动于这一届中华总商会福建董事竞选剧烈的时候？如果说西反君死的时候，南洋群岛还在日寇蹂躏下，无法获得他死的消息，获得他死的消息也无法举行追悼；那么，盟军收复南洋群岛已经两年多了，何以不早点举行了呢？死者之骨已朽，才忽然涕泣滂沱地说要追悼，是诚意吗？西反君未遭逐以前，恶势力集团日肆侮辱谩骂，花大量金钱，收卖教育界败类，虚构事实，控告他；使他不得不为自卫为正义负担一笔可观的诉讼费，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给他精神上或物质上一点援助？西反君被限令三天出境，数千劳工界男女老少，亲戚朋友，云集飞机场，火车站送别，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参加？西反君出境以后，南侨总会，新加坡筹赈会，几次开会，责政府不公，为西反君的冤抑抗辩；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敢发一言？从西反君出境到新加坡沦陷这中间两年，近则他的家属远则国内他自己，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肯去慰问或者寄一封信？

       我以为大家如果真有诚意哀悼西反君，第一，要认识西反君的长处，记住他而且学习他；第二，要了解西反君家属的处境而予以直接间接的支持。

       西反君的全部产业是：

       住宅一所。

       彭亨和人家合伙经营的树胶园数百亩。

       大世界娱乐场十余年的租利权，每月一百元。

       南洋商报股份四千元。

       除上以外，亚洲保险公司顾念西反君对于该公司功绩，曾有一个时期，每月致送西反君家属优待费一百元。惟优待时期，恐已届满。至娱乐场租利权，自日寇南侵也已经一钱不还；后来经过屡次交涉，去年才以九千元一次清偿，取消原约，损失不下半数。南洋商报一本数倍之利，仅以原本抽出。彭亨树胶园，合伙者把持，无一利可分。

       上述情形看来，西反君的家属，正一步一步踏近饥饿线，大家忍心吗？视若无睹吗？说到这里，我仅作以下呼吁：

       一、希望亚洲保险公司破格继续拨优待费。

       二、请大世界娱乐场尊重原约，足数付出租利权。

       三、请南洋商报尊重股东权益，照得利分配。

       四、请彭亨树胶园当事勿欺死者，公平归割，或托人承买。

       如果大家不从学习西反君的长处，支持西反君的家属，去追悼西反君，则所谓追悼，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有所争，而不惜拿死人做工具，则“诸葛亮哭周瑜”，连瞎子都骗不了。

（卅七年二月廿一日）

**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

**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

       近日李宗仁对美记者谈话，陈纳德向美国会要求，均主美国应立即以军事援蒋，不然，则中国共产党势必胜利，以至统治全亚洲，而美国对华，将处完全失败之地位矣。

       曩者孙科布立特之徒，亦尝大言不惭，以为美国如予蒋介石以军事援助，则必可扑灭共产党，进而击灭苏联。此其所言，即属愚鲁，抑且谬妄。然兹李宗仁，陈纳德所言，则与孙科布立特，又有不同，中共终必胜利，美国终必失败，此确为亚洲未来之事实。惟所谓“共产党统治全亚洲”，究亦近于谬妄。盖中国决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诈伪奸险，损人利己，助桀为虐。中国一旦民主胜利，断不欲统治亚洲其他民族，惟当领导其他国家，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使人类咸享自由平等和互助之福利，此则大势所趋，沛然莫之能御也。

       南京政府诸卖国贼，美国诸野心家，狼狈为奸，扩大中国内战，残害中国人民，亦既两载余。虽军事经济政治，走头无路，独裁者日暮途穷，覆亡在即，犹复哀求美国，出兵援助，敢为石敬塘，吴三桂而无所顾忌，彼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原已垂涎欲滴，而对军事援蒋，犹复聚讼纷纭，迟疑不决何也？盖军事援蒋，将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一旦来临，美国绝无胜利把握，甚且等于自掘坟墓，故有所惮而不敢遽作决定也。

       假定美国出兵中国，实行军事援蒋，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则其前途若何乎试申论之。

       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反民主与民主之战。反民主阵营与民主阵营，双方人力悬殊，至若武器配备，资源生产，除原子弹外，双方约略相当，然原子弹秘密，现在非美国所独有，而仅恃原子弹亦不能征服全世界，其理甚明，姑置勿论。就战略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决于海上与陆上各半，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为苏美之战，胜败必决定于大陆战场，至于海军仅用于保护海岸与军事运输，将无重要之作用。

       大陆战场，以欧洲为主，而亚洲次之，盖美军欲直捣莫斯科，必取欧陆，断不能迂迴西伯利亚，作万里之远征，亦甚明也。

       欧洲战场，法意两国，内部分裂，与中希无殊，所不同者，法意今尚未发生内战，一旦世界大战爆发，两国尚不能保持中立，内部必起剧变，恐不必俟苏军进入国门，国内已起革命。此外英、比、荷、土等国，人口不过八千万，除海空军及内地警卫部队外，可供调遣作战之陆军，最多当不过三百万人，美国人口一亿四千万，上次大战动员兵力亦不过五百余万，除用以防卫国内变乱及留驻日本者外，陆军可调往海外作战者最多四百万人，倘以半数开往远东，则在欧洲大陆作战者不过二百万人，合计不过五百万人。

       至于民主阵营方面，苏联人口二万万，男女多受军训，除海空军外，最少可出陆军一千万人，加以东欧及巴尔干方面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国，人口一万万有奇，可出陆军五六百万，合计即有千五六百万。

       民主阵营与反民主阵营相较，不但兵力超过三倍，且苏联与东欧各国，国土毗连，农产丰富，政制统一，民心一致，且为正义而战，为保卫民族生存而战。若美国等僻处海外，运输困难，西欧国家，陆地偏小，粮食缺乏，加以阶级分裂，民心涣散，师出无名，劳苦大众，供数十家富豪牺牲作炮灰，非所甘心。以此不仅前方兵力，众寡悬殊，而后方随在有变起萧墙之虞，设令土耳其一隅失利，非洲亦难保存，地中海虽有天险，亦难固守矣。

       次论亚洲战场，美如出兵援蒋，对中国不宣而战，必须以半数军队，准备侵欧，其能调往中国作战者，最多亦不过陆军二百万人已耳。假定美国陆军战斗力，可与日本陆军相匹，则最多不过如抗战时期，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及若干点线而已。美军断无占领中国广大乡村及内地城市之可能，反之，苏联陆军可顷刻占领朝鲜南部，势如潮涌，虽日本本土亦难防御苏军之进击。若以二百万美军，入据中原，与数千万有组织有训练之中国民众为敌，势将不战而自溃，加以美国国内贫苦劳动群众，群起反战，爆发革命，则世界局势，将起空前巨变。华盛顿诸战争贩子，华尔街诸富豪财阀，恐将无藏身之地。虽欲为沙皇倒后之白俄而亦不可得矣。

       总而言之，世界非复昔日之世界，而中国亦绝非前世纪之中国，南京卖国贼至死不悟，其哀求美国军事援蒋也固宜，然华盛顿战争贩子，华尔街富豪财阀，则非不知世界大战之不利于己，其色厉内荏，举棋不定者即以此。反之，华盛顿倘竟无所顾忌，以军事援蒋，作孤注之一掷，则行见美国命运将迅即随蒋介石而同归于尽。“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之谓也。

（卅七年三月十五日）

**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

       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突然表示不做大总统，愿将灸手可热之元首地位，让给别人。其原因何在？中外人士纷纷推测，莫衷一是。有谓蒋氏系半推半就，故意作态。有谓蒋氏乃以退为进。亦有谓总统并无实权，故蒋氏宁愿退就行政院长一席。

       以余所见，则殊然，盖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独裁专断，已成习性，伪宪条文，视等弁髦。不论蒋氏就何官位，政由季氏，祭则寡人，固无人能加以争竞，亦无能加以干预，此理甚明，无待多赘。其所以表示不做总统者无他，军事崩溃，人心离贰，败局已成，无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参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属遥遥无期。故蒋氏为自身打算，总统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请再申论之：

       国共战局，在东北方面，大势已定，国军仅余长春沈阳二城市，楚歌四面，摇摇欲堕。残存部队，虽欲撤走，亦无路可退，迟早必全军复灭，损失官兵，当有四五十万之众，此其一也。

       东北战事，一旦结束，则共军最精锐最英勇之部队，至少六七十万人，长驱入关，有如狂风扫落叶。内蒙及晋冀一带，国军所占地区，或仅存走廊，或成为孤岛，本已不堪一击，如人关大军加以猛扑，则华北五六十万国军，亦成瓮中之鳖，此其二也。

       大江以北，鲁豫皖鄂苏诸省，国军现有实力，亦约六七十万人，遭陈毅刘伯承部牵制袭击，早已失去主动。倘华北丧失，则势成孤军，虽欲撤至江南，亦恐已晚。长江虽曰天堑，亦无法阻止共军之大举南渡矣。此其三也。

       西北地广人稀，防务空虚。河西国军虽有十余万人，然延安洛川，早被包围，西安亦受威胁。观诸胡宗南氏之匆遽赴京，可见西北已成垒卵之势，胡部纵能退入川境，当亦不过少数。此其四也。

       长江以南，川康湘赣云贵闽浙粤桂及鄂皖苏之一部分约计人口二万万。地广民稠，遭受虐政，最为惨烈。目前国军不过二三十万人，分散各地。虽有地方保卫团，则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职是之故，现在各省民众，大多不堪苛政，纷纷揭竿而起，有已激成巨变者，亦有在酝酿中者。不待共军之渡江，反独裁斗争，固已成燎原之势，此其五也。

       去年七月共军发动大反攻以来，各处战场，主动权均操诸共军之手。东北、西北、内蒙、华北、华中，国军望风披靡。不及一年，国军二百余万人，折损四分之一。即今所存不及百五十万。就上述情势，今后国军即作最后之挣扎，亦无异螳臂之挡车。此为历来未有之军事悲剧，国军土崩瓦解，固可计日而待也。

       民国初年，袁世凯妄思称帝，后知为民众所不容，故自行取消帝制，悔恨而死，遗臭万年，为天下笑。今蒋介石倘不做总统，断非有其他用意。盖独裁到底，则无佛朗哥之幸运；自刎乌江，则乏楚霸王之勇气；若赴华盛顿，作流亡总统，则徒为世人所讥笑。故计惟有牺牲总统之地位，以作日后之退步也。

（卅七年四月八日）

**蒋介石的“最大错误”**

       据报载廿八日美联社南京电，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结束的会议上演说，认为他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时期容纳中共。他说：“我在那几年中有很多错误，但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容忍共产党。我容许他们参加国民参政会，并且给予他们以特权，以致造成我们今天的处境。”

       前年九月七日，余致电美国杜鲁门总统，其中云：蒋介石等“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今美联社所传蒋氏之演说，则益证余言之不谬矣。蒋氏行年六十余，其一生奸诈独断，专横腐化，祸国之惨，害民之众，史无其匹。今则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行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乃复不知悔悟，竟诿为容共抗战之失计。其自欺欺人，恬不知耻，竟至于斯极。余故再举事实数端，闢而正之。

       （一）二十五年西安事变之发生，实由蒋氏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不愿抗日，故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谋实行兵谏。当时中共在陕北，已有民众基础，非武力可消灭，惟为委曲求全，息争御侮起见，故与蒋氏立约，如敌侵华北，即全面抗战。此在中共，志在挽救国家之危亡，可谓仁至义尽，苟其不然，蒋氏安有生存之理耶？

       （二）抗战开始，中共所部属万众，在晋北浴血抗战，蒋氏从未有一枝步枪，一粒炮弹之接济。当抗战初年：每月亦仅拨给些许枪弹，嗣后则完全停止。抗战八年中，八路军将士，出生入死，为国献身，从无一人之擢升。而蒋氏嫡系部队，无功受奖者，盈千累万，此为中外咸知之事实。今蒋氏竟谓误在容忍中共，其谁信之？

       （三）二十九年，余自西北返渝，蒋介石探询，在晋时阎锡山将军曾向余作何语。余质直告之：余曾告阎，国共磨擦，经白崇禧将军调解，双方划定驻防界线，从此可免发生严重冲突。但阎将军则云，此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须国民党政治行得好，共产党自无能为力，否则纵令无共产党，亦必有其他党派，起而反对政府也。余以阎将军此语，极为中肯，故率直转陈，冀再采纳。孰知蒋氏闻言色变，竟向余破口大骂共产党，谓：“抗战若要胜利，必先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消灭，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在外国已多经验，必消灭国内反对党，对外方可获得胜利，我国亦不能例外。”语时面红气促，声色俱厉，蒋氏继又称：“此等语我从未向人说，今特对汝说。”蒋氏对中共，仇恨之深，于此可以概见，今竟谓于抗战时，容忍中共，则非自欺欺人而何？

       （四）自蒋氏向余大骂共产党之后，不及数月，即发生江南新四军被屠杀惨剧。蒋氏嗣又自抗战前线调精锐部队十万至西北，包围边区，杜绝其对外交通，惟仍无法加以消灭。若谓抗战时期，未及消灭，系属错误，则在抗战前，蒋氏曾亲赴西安督战，以期灭共，然共未能灭，而本人则被囚蒙难，蒋氏何以健忘若此乎？

       （五）抗战八年中，中共不获政府接济，大敌当前，而能自力更生，愈战愈强，在晋省作游击战，牵制敌军数十万。当时如无八路军，则晋阎军队，必被迫撤至河西，不但山西全境沦陷，川陕亦难苟全。在抗战时期，以日寇之强悍凶猛，尚不能消灭中共，时且不能阻止中共之发展。今蒋氏竟乃大言不惭，谓当时容忍中共，系最大错误，岂不谬哉！

       （六）蒋氏谓容许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亦属大错误，更属谬妄之至。盖国民参政会包含参政员二百人，国民党员占其大半，中共参政员尚不及十人，不过备位而已。况参政会为一虚设之机关，军政大权，操诸独裁者一身，人民无权过问。故邹韬奋先生在其所著《抗战以来》一书中，称国民党参政员为被请之客。纵使中共参政员名额增加十倍，亦并无裨益。蒋氏竟谓容许中共参加参政会，系大错误，诚欺人太甚矣。

       总而言之，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在抗战之前，抗战初期，中期，末期，以至抗战之后，蒋氏固无时无刻，不作消灭共党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见消灭，转且日益强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势，此非蒋氏不欲消灭中共，实则其力断不能消灭中共也。蒋氏谓容共系彼最大之错误。究其实，蒋氏从不甘心容共，其所谓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属虚伪诈欺，则所谓错误更自何而来？故余以为蒋介石错误不在此，而在于不接受阎锡山将军之言，反诿过于中共，时至今日，末日临头，而犹中风狂走，至死不悟，则皆咎由自取也。故曩昔余屡言与蒋介石谈民主，等于谋皮于虎。而余致美总统电文亦称，蒋介石其人，断不足与言改革。观诸今日，则余所言，益信而有征矣。

（卅七年三月卅一日）

**中国内战何日告终**

       日前报载：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实力，谓太平洋战事告终时，国军有三百七十余万人，步枪一百六十余万枝，大炮六千余门，共军则有三十余万人，步枪十六万枝，大炮六百余门，迨至现下（按当指五月底，因何应钦报告系在六月中旬。）国军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一千余门，共军则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二千余门。

       又报载纽约通讯，谓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一篇论中国战局评论，中云：“反蒋的中共军队必须重视，他们显然已在打胜内战了。无论在数量上和组织上，他们都胜过南京军队。蒋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到今年已经过去了，数量的优势不再是蒋军的了。据审慎的估计，共军现在有正规军一百五十万人，单位较小的游击队，也有一百五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还有解放区大后方训练的大量后备军，而蒋军实际参加作战的部队，不会多于一百五十万人。”

       余意何应钦秘密报告，当接近事实。而美国人威尔纳之评论，亦当有其根据。威尔纳所言蒋军数量，比何应钦所言，减少至七十万之多，或有两项原因：

       （一）国军每师每旅素常不足其兵额，如减一成或二成，则少去三几十万人。

       （二）威尔纳所言，当指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之军队，若华西华南，如新疆、四川、西康、云贵、湘赣、闽浙，两广及苏南等十一余省区，至少亦有国军三几十万人，以防地方之民变，而非可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者。

       除去上述两项六七十万人外，威尔纳所言蒋军一百五十万，与何应钦报告，无何相差矣。

       国共两方实行大规模内战，系自前年七月起，至本年五月止，计二十三个月。在此期间，国军由三百七十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达一百六十万人，平均每月损失七万人，而共军由三十余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计增加二百三十万人，即每月增加十万人。如今后国共两方军队之增减，亦依照此种速度，则再过一年，国军当减少八十余万人，仅存六十余万人，可在前线与共军作战，而共军可能再增一百二十万人，共达三百八十余万人。其时，力量将更悬殊矣。

       前者，共军寡，军械少，故遇大队蒋军，则退避三舍，不愿轻作阵地战，而常相机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共军在此种情况之中，尚能逐月消灭蒋军许多。及至近月以来，战事已大有不同。共军对于蒋军大兵团，已可与之分庭抗礼，不但可作普通阵地战，且可对若干大城市实行攻坚之战。尤可注意者，为共军在若干战场上均操有主动权。如此则今后逐月所消灭之蒋军，可能较以前更多。据新华社之报告，五月份消灭蒋军十三万余人，六月份十五万余人，七月份或可至二十万人以上。假定今后蒋军除补充外，平均每月尚须损失十万人，则由六月起至年终止，七个月将消灭八十余万人，而在前线将仅存七十万人。以七十万人之蒋军，而欲抵抗三百余万之共军，则无异螳臂之当车。除美国助以原子弹或举世未发明之特殊军火，免用人力作战，或可以制胜共军外，否则，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

（卅七年七月十七日）

**国共决无和平可言**

       近日报载：北平谣言甚盛，谓国共再谈和平，周恩来到北平与张群及李宗仁秘密会议云云。南京方面虽指其为无稽之谈，不足置信，但据云有少数军界人士，则认为某种事物在酝酿中。事虽属于谣言，然古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李宗仁凯觎政权，正盼政局变动，无庸讳言，绝非无风生浪也。

       然国共合作事，果能实现乎？自日寇败后，经年之内，全国人士热烈期望和平，俨似目的可以达到，惟余个人之见解，则绝对不敢苟同。在吧城及本坡两次对余之欢迎会中，余均断定国共之间无和平可言，并认为当时所谓“还政于民”之呼声，实谋皮于虎，余敢如此断言者，系根据本身之所闻，所见，与仅凭阅报与风闻而揣测者不同也。

       余前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后，因国共磨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余对中共最注意者三项：

       一、政治如何说施。

       二、抗战是否积极。

       三、其地区之民生与治安何如。

       在考察中，知中共所实行者尚非共产制度，而为三民主义，其抗战之积极以及陕北一般情形，均令人满意。及回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西北之观感”，余乃将所闻之事实报告，而党人则大不满，谓余代中共宣传，即派吴铁城南来，破坏华侨团结。加以陈仪祸闽惨重，经余加以攻击，由是中央政府当局对余更形痛恨。迨至放弃外蒙，丧失旅大主权，与苏联订立不利于国家之条约，以巩固其独裁政权。余复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通告，指为卖国，主张不承认其条约，后又反对其与美国订立丧权商约，及许其驻军国内，并电请美总统勿助纣为虐，助长中国内战之惨祸，由是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党报，及准党报，对余大谩骂，而若干会馆或商会，亦多起而效尤。盖新加坡及马来亚诸大会堂，总商会，商会，会馆以及其他有势力之社团，多在党人之手。余明知孤立乏援，然为良心所驱，义不能辞。对于误国行为，余当然不能缄口也。

       国家与社会虽不同，然关于同作一事，则有类似之情形。辟如有人视蒋介石为天皇神圣，是非不讲，而余则认其为误国误民，是非要明，彼此意见无殊水火，决无合作之可能。国共之必然分裂，各走极端，亦若是也。余自民二十九年到重庆及延安，与国共各领袖接触后，早已判断两方终无合作之可言，时至今日，更毋须多赘矣。

（卅七年七月廿八日）

**再论中国内战前途**

       前日报载新华社社论，谓“中国人民至少要准备三四年时间作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又云：“保证内战的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就此两段而言，末段所言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含义之深，至堪玩味。至首段所云，至少还要准备三四年作艰苦斗争，或未免使若干急性乐观者，感到失望。然实事求是之士，言信行果，固常谦虚慎重，不发不能兑现之诺言，不似孟浪之流，动辄得意忘形，谓三个月就可打败敌人，六个月就可消灭异己也。

       我海外华侨，对于祖国军事政治，虽多门外汉，而报章之传载，又多宣传作用，然欲知国共将来谁胜谁败，亦有历史义理可稽。在政治方面，须视民众之向背；在军事方面，当视有生力量之消长。审此二项，当不难预断谁家胜败。国共两方在政治上之设施，已历十有余年，谁好谁坏，凡身历其境，与及经常注意书报记载者，当不能指鹿为马，毋待详论。至军队实力之消长，余于七月十七日在本报所发表之专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已略有谈及。该文所言数字，系根据国防部长何应钦及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所言。回忆前年七月蒋介石氏未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报载国军原有二百七八十万人，收编伪军九十余万人，在后方训练六七十万人，合计四百三四十万人。加上美国海陆军之声援，及美国在水陆空运输之助力，殆以为投鞭可以断流，大有灭此朝食之概。而当时共军正规军传仅有四五十万人，游击队七八十万人，只有国军四分之一耳。据前月何应钦在立法院报告，共军现有正规军二百六十万人，游击队多少未有提起。然游击队在共区亦甚重要，当然不能加以忽视。据威尔纳言，共军游击队有一百五十万人，兹如以半数七八十万人计，合正规军可有三百三四十万人。是则内战两年，国军由四百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超过半数，每月平均减十万人；共军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每月增加十万人。今后两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长，则内战胜败决定之时期，可以想见矣。

       据新华社报告，内战二年，消灭蒋军二百七十余万人。想蒋军两年间征抽壮丁，约有一百万人左右，其中死亡及逃走亦属不少，所以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耳。

       现下蒋管区人民，除回教徒藏族及苗夷等族，不能征兵外，至多约存二亿五千万人。以粤省征派壮丁数目言，上半年要五万人，限期虽届，实征不上三万人。按粤省人民三千万，全年要征十万人，即每千人征三人有奇。以二亿五千万人计，应征八十余万人。前日报载上海市欲征壮丁六千余人，届期征到者不上二千人，而逃亡者又不少。敝乡集美人口千余，上半年被征二人，征去后不久即逃走一人。由是观之，全年欲征八十万，除去不能征足及逃亡数目，可征实额每月恐不上四万人耳。新华社报告去年七月至本年六月，一年间消灭蒋军一百五十余万人，平均每月约十三万人，除去新兵补充四万人，旧兵每月尚须消灭九万人，此后战区愈广，战斗愈烈，其损失恐有增无减矣。

       鄙意国共两军再经相当期间显著之消长，实力当更悬殊。最后蒋氏或可退守上海与天津等大埠。如沪津等失守，则蒋府虽移到任何区域，以图苟延残喘若干时间，大局便是已经失败，对国际上无可再代表国家之资格矣。

       新华社社论谓内战结束，至少须再经三四年，系指全国完全解放统一而言。以我国幅员之大，边区之广，情形复杂，交通不便，如绥远宁夏甘青新疆西藏川康云贵及台湾等，难保无野心军阀割据，至于倔强将领，畏罪逃亡，盘据挣扎，加以美帝国主义野心未死，利用我蝥贼，摇动我边疆，尚有可能。故须以一二年或二三年间剿抚肃清，乃能完成统一。想非腹地大局胜利，亦须如边疆拖延多年之谓也。

（卅七年八月九日）

**徐州大会战与全局决定性**

       日前报载：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纸说，蒋政府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并责华盛顿白宫，不能于一年前坚决援助之错误。又希望杜威当选执政时，局势未坏到不能挽救之程度。我国古语所谓“利令智昏”，正为此种美国人之写照。美国援蒋之必无效，余前年九月致电美总统及参众两院长，曾对彼等提出警告：“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对中国之压迫，决无效果，勿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再后复著论“美国救蒋必败”，及“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军事援蒋”。此为去年及在今半年以前之事。以彼等美国之军政大员，及有权威之名记者，时至今日，尚未了沏当前局势，而立言竟荒谬至此，岂非利令智昏耶？

       至谓蒋介石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之说，能否实现，固未便臆断，惟回忆数月前，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数目，当时余曾依据两年间双方军队之消长情形，著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计至本年终，蒋军与共军实力之比较，即无异螳臂之当车。兹再就何部长报告后，各战场演变之经过述之。本年六七八三个月，据新华社报告：蒋军损失五十万人；九十两个月，济南锦州两大战役，及长春投降，按其损失，应在四十余五十万人之间，合之六七八三个月损失，共为一百万人左右，何部长报告时，蒋军计二百十八万人，数月来之补充兵，除军中逃走病死外，约有二十余万人，共二百四十余万人。此数之中，除留在华西华南防止民变者廿余万人以及数月来上述之损失外，剩余不过一百廿万人。而此一百二十万人中，分配在西北廿万人，在东北华北五十余万人，其可在华中分布于鲁豫鄂皖及苏北者，仅四十余万人矣。如此广大地区，尚须留防青岛，豫西，鄂省，至少应十余万人，则其能集于徐州四郊以作会战之孤注者，只三十万人耳。共军陈毅、粟裕两将军指挥下者，约有四五十万人；刘伯承将军所部亦不下四十万人，纵抽半数以防制豫西鄂省，参加徐州大会战者，亦可有二十万众以上。计此次鲁南豫东苏北皖北四省区域，范围广大，战线数百里，两方军队几及百万人。飞机、大炮、战车，美国式机械化部队，应有尽有，诚为我国有史以来，对外对内战争规模之最大者。此为一决定性之战役，在此两个月内，胜负可能解决。尔时若犹未能决定，蒋方可再由江南倾调其新练之十万至二十万人来助战，而共方则由东北华北，可再调廿万至卅万人来参加。如此则日子延长，战争更烈，战士伤亡及人民损失之大，当亦为前此所未有。或云蒋军兵员不只上述之数，但据前月报载，其军事家切实调查，蒋军在各战场共计一百四十五万人，如除去九十两月损失四五十万人，所剩不过一百万人左右，则更少矣。徐州大会战之后，全局胜负如何，不难由此决定矣。

（卅七年十一月一日）

**辨匪论**

       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此乃人类中最卑鄙凶恶，无人格如同禽兽者。在我国内战中，蒋政府及国民党人等，每指中共为匪，共军为匪军，共党为匪党，内战为剿匪。彼等应查中共有为匪之确实根据，始可加以此最不名誉之恶名，否则系诬蔑耳。

       强暴抢劫及偷窃假冒之流，均为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见，每贪污无厌，除浪费外复积蓄财产。余前年到中共所统治之延安多日，所见所闻，已载在《南侨回忆录》。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若酒楼舞馆，唇红口丹，则绝迹不见。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高级官吏以身作则，安可容下属越轨行为？夫如是指斥为匪，余所以不得不辩也。

       民国光复后，军阀割据，迭起内争，贪污官吏虽多，浪费而外，积蓄或属有限。政府印发纸币及公债券，多有相当限度；经济上无巨大之出入，故鲜有官吏寄存外国巨款也。南京政府自民国十七年后，年年发出大量公债券，及实行“币制改革”，严令没收全国银圆为国有，更源源印发纸币，由是四大家族之财富，日渐增进，而孙科吴铁城及其他要吏，亦得共同染指，抗战事起，巨宦军阀，财源更广进。闻上海产业税，何应钦列居有数地位。民国廿七年冬，香港议政局员冯香泉先生来晤，余询人言陈济棠巨富，在港置业甚多，是否事实。并言国内官吏巨富，陈济棠仅列在第十一名耳。

       四大家族及孙科吴铁城何应钦等，在民国十七年以前，或恐无立锥之地，虽有资产，想亦有限。而十余年间，除浪费及国内资产外，复寄存美国美金若干万万元。此种暴富，若非剥削民脂民膏，则系盗窃国库，否则从何而来？民国廿九年夏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演说，云国家处境何等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再逃走外汇，获利五七千万元，是要留为子孙买棺木。言间几于声泪俱下。其时重庆官吏，应酬浩繁。酒楼菜馆，车水马龙，摩登妇女，唇红口丹，与所谓战时节约，大相迳庭。福州万寿桥上，饥民投江而死者千人，而酒楼菜馆，终夜辉煌热闹，与重庆无殊。所有阔客，大部份为公务人员，及与官僚资本有关系之豪绅。此外，特务遍布全国，国民党机关人员，贪污勒索，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罄竹难书。至为金钱而被利用为鹰犬之徒，且不限于国内而已也。

       当南洋各属将陷沦于日寇之手，华侨汇寄款项回国，不下数万万元，多被扣留不交，任侨眷贫寒凄惨，置之度外。迨日寇败后，国币降跌九十余巴仙，银行及权威机关，始迫侨眷收领。如陈六使先生托余由中国银行电汇七百万元，交闽南集美学校收，而重庆总行及政府，藉词推诿延宕，不肯照交，虽百方交涉，犹拖延经年，至国币价值已降跌大半，始在渝交还。由渝汇闽，须亏汇水六十余万元，合计损失五百余万元。余在此向中国银行交涉年余，一文不肯赔补。以学校公益之款，尚且巧取豪夺，其他可以想见矣。

       去年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每人开支运动费数十万万元。此种巨款，若非抢劫人民，则从何处而来？八月十九日实行所谓“改革币制”，蒋经国对四大家族及权威文武官吏，不敢过问；对诸商家及人民，则威胁百端，几于竭泽而渔，寇盗之行为，或用心，或用力。以阴谋巧取之豪夺，其罪恶每甚明显之抢劫也。以上各情，均为中共所无，独为蒋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为匪，国民党人若稍具天良，抚心自问，必能明白谁方是匪也。

       蒋政府近因军事失败，在京沪大封船只，将所有南京上海公共重要物资，运往台湾，作为己有。他日再败，则运逃往外国。南京上海，不日解放，新民主政府即将成立。其时反动派若据台湾为地盘，则更无异叛逆之匪类，所有战舰飞机商船，当为匪舰匪机匪船，余去年曾论，蒋介石将作流亡总统，若如此，“流亡总统”之外，尚当增加一头衔。所谓四大家族，当称为四大匪族，乃能名称其实也。

（卅八年元月卅一日）

**领袖与诚信**

**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欢迎尼赫鲁大会演讲**

       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中国总领事暨诸位来宾先生！本晚余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名义，代表南洋千万华侨，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先生此来为视察战后印度侨民生活状况，我华侨得以相见，实为难得良好机会，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翁，而本会之欢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伟大人格。盖先生平生受尽艰难困苦，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民谋幸福，早为全世界人类所同情，亦为我中华民族所敬仰也。

       余以为历史上凡能成伟大领袖者总不能离去“诚信”二字。就普通平民言，若无诚信，已失其作人之资格。我国古云，“不诚无物”又云人无信不立。自数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时即有此意，如诚字拆开为言与成，意谓所言必成行方谓之诚。又信字拆开，即人与言，谓人言必信是也。然世界中有堂堂大国及一国中有权威之领袖，对诚信二字，完全放弃。如许人独立，往往食言；又如开口屡言民主，实则行独裁专制，历过已十余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但潮流所超，时至今日，如复执迷不悟，后悔恐将无及也。

       贵印度数万万民族，脱离苦海，而登袵席，有赖于先生之领导。我中华民族，亦希望确有诚信伟大之领袖，出而拯救四万万人于水火之中。我中印的民族之外，希望他国亦有真正人道主义之领袖出而合作，领导全世界人类均获大同平等之幸福，尼赫鲁先生除领导而外，亦领导世界之数人中之一也。

       近因当地节约限制，本晚宴会菜物淡薄，未尽欢迎之意，尚希原谅。

（民国卅五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致词**

       ［民国卅六年十月六日南侨日报新闻］关于庆祝三十六年度双十节，新加坡华侨均正热烈筹备庆祝。甚多侨团因为不愿向独裁者致敬，既不愿参加中华总商会之庆祝会，更不愿参加国民党所包办之庆祝会，故多决定分别庆祝，以表示华侨真正爱国之精神。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备庆祝国庆，及报告本年八个月收支账目，特于昨晚七时半假恰和轩俱乐部召开第八届执行委员第六次会议，结果议决按照去年办法，联络会员及福建会馆属下南侨，道南，崇福，爱同四校员生及学生家长，于十月十日在爱同学校举行庆祝会，并决于是晚参加爱华音乐戏剧社主办之提灯游行，属下各校校车三辆，亦载学生参加游行。一切事宜，决由教育科主持办理。此外决不参加其他任何“庆祝大会”。

       昨晚会议期间，主席陈嘉庚即席发表演讲，痛论华侨分裂问题。

       兹将陈氏演词录下：

       新加坡马来亚华侨，自民国光复后，所有国庆纪念会，多由中华总商会或商会召集，领导庆祝，至由总商会召集领导之原因，为各处华侨社团之总机关，若省县会馆，则偏于一方，唯有商会为侨众所组织，且各帮多有参加，故凡华侨对祖国及居留地，有重要事项，非由商会召集，亦多假商会为会场，可见总商会被公认为最高机关，负责对内对外，领导团结，联络情感。当其事者，必公忘无私，直道而行，庶可问心无愧，有益侨胞，了无疑义也。

       自民国卅年，吴铁城南来，掀风作浪，分裂华侨，破坏团结，致南洋各处侨胞，有党派与无党派之分，意见日深。迨日寇败后，祖国国共内战，影响华侨派别更甚，尽人都知，致客岁庆祝国庆，不能合作，殊为遗憾。

       本年国庆纪念日，各华侨均希望总会对往事引为前车之鉴，预行计划，以期联合举行，不意不但不能联合，有人反且预造鸿沟，蓄意分裂。前月在吉隆坡，开马来亚各地商会联合会，竟通过一议案，致电南京政府，赞成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查总动员之目的虽多，其重要者有两事：第一，要大征壮丁送往战场作炮灰，而国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均列为壮丁；第二，要征粮征财，甚至竭泽而渔，使家破人亡。政府此种行为，关系华侨家乡子弟生命财产，惨无人道，痛心莫可言喻。而领导华侨机关之商会联合会，竟火上添油，助纣为虐。彼岂不知如此举动，必使华侨益趋分裂？明知而故犯，非有意破坏团结而何？总动员令出于独裁政府，刀落头断，施行已有日月，商联会今表示所谓赞成，实为画蛇添足，与实际风马牛不相及，无丝毫价值可言。何必多此一举，以增加华侨之分裂，此次各处总商会开会，对庆祝国庆发生纠纷，商联会诸代表不能辞其责也。

       但是商联会既负责领导职责，果热诚拥护所谓总动员令，不宜只发一纸电文就可了事，应实地总动员，庶出力出钱，方能名副其实。尤当以身作则，派遣其子弟回国赴敌，庶不徒托空言，问心无愧。否则未免违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古训矣。

       关于此次新加坡总商会，对开会庆祝所引起之纠纷，党人原在岗州会馆开会，谋领导若干社团庆祝国庆，而广东会馆主席，拒而不肯参加，诿谓应尊重总商会领导方为得体。在表面上观，似属至公无私，有拥护总商会真情实意，而不惜牺牲其党人之合作，究其实，其然岂其然乎？彼之不肯与党人合作，为不甘受“小子无知（此四字出其人之口）之领导，故藉尊重总商会为辞。设岗州会馆开会时举他为主席，则感激不暇，安有反对退出耶。

       盖彼之地位，在国为参政员，在洋曾为商会长，在社团为省会馆主席，在党为红员，口是心非，声名四溢，小子无知，竟敢冠履倒置，真不自量也。

**祖国光明在望**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职员就职典礼中致词**

       ［南侨日报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讯］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举行常年会员大会及旧职员交卸，新职员就职典礼。席间，陈嘉庚氏致词，用坚决态度，指出在此届新职员任期之二年中间，中国良好政府必能建立起来。此良好政府必能对华侨教育事业，以及对华侨回国从事种种事业，予以保障。

略称：“此次承同侨过爱，举为常务主席，而弟在每次被举时，均予接受。其原因，一方面不欲客气，另一方面则感并无事做。

       “关于无事做一点，不但福建会馆如此，南洋各省县会馆亦多如此。其原因乃华侨社团之知为国家社会服务，乃仅民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之事。在三十余年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甚薄，更不必说要为社会做事。甲午之役，满清战败于日本，割让台湾，无异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时大家仍不知苦，虽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设想。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爱国教育，盖当时在满清压迫之下，读书人无法获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学些做奴才用的知识。在民国成立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数华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及至民国成立，才渐渐进步。因国内政府腐败，政治不良，同侨回国居住，尚且住不得，投资建设，则谈不到。结果，除在南洋办学校外，其余之工作则呈松懈。

       “福建会馆所办学校，学生数由一千而达二三千，四五千，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展。但一切力量，均为经费所限。一般资本家未能了解教育问题之重要，仅认子弟长大，以寻求职业谋生为重，殊不知教育关系国家之强弱。现在属下四校，每年所收学费，仅足供补贴费用，并无余款可供扩充。目前福建帮子弟受教育，学校虽不十分欠缺，但须知教育之事，决不应限于某一帮派之间。封建自守，故步自封，乃系错误者。福建会馆不但自己不应有此种观念，而且应该做了以后影响其他。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希望祖国早日获得良好的政府。一旦祖国建立了好政府，福建会馆不但不会无事做，甚且必定多得做不完。因为，如果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这好领事就再也不象现在这种敷衍从事的领事了。到那时候，好领事就会自动的设立指导促进华侨教育的机关，既不必我们侨胞计较，又不怕帮派对他不服从。

       “现在一般社会富家，遇有婚丧寿庆，即大事宴客。本坡每日费于此种无意义之开销者，达数万元，平均每月数十万。苟能将此无意义之开销，抽出十分之二，充作教育经费，则何愁乏款？过去本会馆曾经提倡节省此类无谓开销，并曾自己实行改革。如果中国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规定合理之婚丧礼仪，节省无谓浪费，以办有益事业，相信各帮各派，均必服从。

       “到了祖国成立好政府以后，在福建广东等处地方，当多设立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收容华侨学生，训练一般华侨教育适用之人才。同时，必能对华侨回国，予以适当保障，届时华侨回国投资，当不致有亏损之虑，如有亏损，希望政府予以补偿。

       “比如苏联，内乱一平，在英明的领导者领导之下，经过十余年之经营，终于成为最强盛之国家。虽美欧数国当初对之采取包围政策，但结果此种包围之企图，终于宣告失败。

       “中国在此战争以后，亦决不怕外国之侵略。美国援助腐败政府，图害中国，实际上并不能达其目的百分之一。在不久之将来，光明的日子就要到来。相信在本会馆第九届职员任期二年之内，光明必定能够出现。”

       陈主席继对宣誓之意义，加以分析。渠称：“宣誓者宣誓之后，如果不照执行，必受到相当的责罚，像国内那般腐败官员，一天到晚举行宣誓，但却不切实执行，到最后，请看那有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举行宣誓就职，就应该切实负起责任。”

**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演讲**

       今日为我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国庆纪念日。当前年庆祝之时，蒋政府军队及其所收编伪军计有四百余万人之众，加以美国军火等物资及海陆空运输之助力，军容之盛，气焰之高，殆属空前，故尝谓三数月就可消灭中共。中共在抗战时所占之四百余县城，曾被蒋军夺去约三分之一。两方疆土军力，相差悬殊。而本席前年在纪念国庆之致词中，即断言蒋军内战必败。盖根据历史经验，凡背信义不道德之人，虽一时炎威赫弈，终必失败。想当时参加庆祝诸君，当不健忘。今日蒋府之势力比较前年如何，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多赘。现本席欲复引证数十年来欧亚多国背信义道德而失败之史实。

       一、距今约五十年，我国发生团匪之乱，外国联军入北京，清太后及光绪逃避陕西，议和后外国军队概须退出我国土，独俄国军久据我东三省不退，且积极增辟交通，作长久计，视条约为废纸，被日本战败，酿成大革命，俄皇全家惨死。此事在五十岁以上之人，咸都亲见。就是青年人，凡关心国家社会者，亦能知之。

       二、德皇威廉第二，陆军威势，原冠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惜破坏比利时中立约章。初以为比利时国小且不设防，经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即可迅速占领巴黎，法国立当屈服，安知比利时坚决抵抗，阻其前进，力战多天方失陷。德皇由是目的莫达，终至战败，且倾覆皇朝，逃死异邦。

       三、世界第一次大战后，各国设立国际联盟于日内瓦，立约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倘有发生国际纠纷，应由国联处理，或由国际法庭裁判，谁敢违背条约，应受各国制裁，乃约仅十二年，日本因世界遭不景气之影响，以为有机可图，背约占领我东北四省，再进而欲吞灭我全国，故有七七事变，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果日本一败涂地，日皇虽未倒台，而日本殆已等于美国殖民地。虽美国欲扶助其旧势力，然国际地位，已降为下等国。

       四、日内瓦国际联盟成立之后，执牛耳之欧洲列强，若能秉公依盟约制裁日本，则日本虽狂悖跋扈，决不敢与世界为敌，况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主张制止日本侵略，而握国联大权之欧洲列强，竟不维持国联尊严，致有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惨祸，全欧亦难幸免，此亦失信背约之结果也。

       五、意大利首相莫沙里尼，步日本之后尘，撕毁国际联盟约章，出兵征夺阿比西尼亚，及阿尔巴尼亚，并力助西班牙内战，复参加希特勒所发动之战争，结果莫沙里尼战败惨死，意王亦倒台。

       六、德国希特勒于夺取捷克后，与苏联立互不侵犯十年有效条约，则进攻波法，其目的为恢复前次战败所失领土，连战皆捷，波法屈服，英受威胁，目的可以达到，若能知足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则德国可获胜利幸福，自身英名亦垂不朽，彼乃利令智昏，得陇望蜀，背信毁约，出兵进攻苏联，结果身死国破，贻国民无限之悲惨。

       七、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开外长会议，声明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所有美英苏在华驻兵，皆当撤归，此为全世界所知者。然美国竟野心背约，马歇尔久驻中国，假仁假义，名为调解国共纠纷，实际则帮助蒋政府对付中共，凡海陆空运输，军火以及其他物资，无不极力援蒋，驻军亦不撤归，并派遣许多军事干员，在蒋军中服务。经年之后马歇尔失败而归，然野心未死，复屡派政治经济人员，助长我国内战，迄今未已，其计划之失败绝对无可挽回。美国此次背约援蒋，不但无功耻辱而已，除其帝国主义政府倒台外，否则，我国人世世子孙，必不忘美国之野心。百余年前美国离英独立，与英国开战多年，得法国帮助，美国人迄今不忘旧恩，故对法国有特殊好感。恩怨分明，乃理之常。惟今美国竟在中国埋种仇恨种子，殊可哀也。

       八、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独裁，断丧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诺反信，屈指难数，如在前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答应消除内战，组织联合政府，未及三月，食言毁约。再后更公开发动全面内战，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其罪恶比较上言诸人，有过而无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于败亡？楚歌四起，不过时间问题耳。

       昔贤论人事与天道，有一文曰“深虑论”，乃明朝大文学家方孝孺所作，论秦汉唐宋建国诸帝王，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深思熟虑，原冀帝位可以世守，然虑出于此，而祸兴于彼，盖知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即不可以强违天理。鄙意社会及个人，亦不能例外也。

（卅七年十月十日）

**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

**——在南侨报二周年纪念会致词**

       诸位来宾及本报同人诸先生！今日为本报二周年纪念日，假此大世界舞厅，薄具茶点招待诸君，荷爱华音乐队惠临奏乐，及中艺剧社参加表演助兴，蒙诸位玉临参加，本人谨代表本报向诸君道谢！

       本报创办在祖国内战剧烈之秋，于今两年。创办之目的，系为社会服务，与一种党报及营业谋利者不同。出版以来，屡遭党人特务百方阻挠，幸能渡过难关。关于报馆任务，无论抱何目的，多谓为领导社会，开通民智，果欲奉行此旨，则消息必须确实，否则若捏造是非，欺人自欺，未免反误社会，罪恶非小，本报对此，常存戒懼，每自勉也。

       常有人言，本报为共产党报，窃此项名称，有好意与恶意两种。从好意方面言，国父孙中山先生谓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英国人大文豪萧伯纳言，共产主义意义，非平常人可能了解；如此则共产道义之高，可以想见；本报对于此名，愧乏资格可受。就事实言：（一）本报同人，无论股东职员，未闻有被中共承认为党员者；（二）本报资本四十余万元，无一文钱由共产党人参加者；（三）本报自创办以来，未直接与中共通一字消息。如此，安有资格可受此名义？从恶意方面言，蒋政府之特务，每以红帽子作诬良工具，毒辣阴险，陷害无辜，擢发难数。凡言本报为共产党报者，其为好意或恶意，明眼人自能了解，无须多赘。

       现下华侨受内战影响，与辛亥年武昌起义，满清将倒时相仿佛。前次革命，为推倒帝制；此次革命，系欲消灭独裁。前次顽固派，初时亦占多数，迨满清倒台后，尚有一部份人仍忠诚拥护，辫发不愿剪去。窃意蒋政府倒台后，亦必有其人，虽无辫发作标记，然每逢大日子如国庆或五月廿日纪念，当电南美或北美致敬，以表忠诚。至于报馆居领导地位，责任较重，更当坚持到底。党报可免言，若准党报编辑部，当不以美金消长而改变论调，股东应不以贪利而屈膝投降。

       俗语谓“百闻不如一见”，此句话本人认为不错。前年本人将往重庆时，有人告以四川峨眉山风景甚佳，不可不看，及到重庆复闻多人赞美，迨到目的地，则知除数十座陈旧枋木庙寺外，别无其他名胜可观，失望而返。又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乡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淳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什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自出延安后，有人访问，则实告之，回到南洋亦然，近年间报纸或社会，宣传中共凶恶事，已罕闻见，惟复造出惊人新闻，谓中共如胜利，我国将沦为苏联附庸，失国家主权。蒋政府人员无中生有，努力宣传，中外不免有被其迷惑而谈虎色变者。然自内战以来，尚未有确证，足以证明苏联有一人参加，一枪或一文钱帮助中共。时至今日，稍有常识者，当不再受其欺骗，作无谓之杞忧。百余年前，法国政体改革，废帝制为共和。后来欧美许多国家仿效，亦成立共和国，岂为法国之附庸耶？其政体虽同，主权则仍各独立。我国地土广大，民性强烈，人数多苏联大半，而谓能甘自放弃主权，附庸于人，有是理乎？

       有人言中共如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发生，此亦为反动派之捏造。实则我国此次革命成功，可以促进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现下美国为征服全世界，在欧洲已占德国一部份作根据地，复以物资引诱欧洲诸国，欲以欧洲人力物力为其牺牲。在亚洲除占日本及南朝，且以青岛等处为基地，并以金钱军火利用蒋政府，欲以中国有生力量为其效死。以为胜利可以统霸全世界，失败则美国免多牺牲，缘其海军无人可与对敌，其空军可以轰炸他人，陆军则有欧亚诸国代劳。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死亡不及盟军百分之一二，且国土处在西半球，敌国难于威胁，损失甚少。难怪其现欲遣派司令官高坐将台上，指挥欧亚人民相惨杀，以收渔人之利。此种如意算盘，欧洲诸国何尝不知，第处在经济穷困时，表面上勉与敷衍而已。若我国革命成功，美国在亚洲方面计划，当完全失败；欧洲局势，亦可能有转机。故世界和平，与我国革命成功大有关系也。

       现下徐州大会战，与全局有决定之关系，此问题本人日前在本报已发表意见，此次名谓徐州会战，其实范围甚广，非但关系徐州一城，与济南锦州之战大不相同。在胜负未决之前，双方均可由远省运到军队。解放军可从华北调来，蒋军不但可倾江北五省兵力会战，尚可由江南等省，倾输新旧兵作孤注一掷。本人尝言二个月内如未能解决，可再延长多少日子。若不幸在过短时间内解决，蒋方不但倾出江南新旧兵力作孤注，而从江北尚可撤退十余廿万军队以保守江南诸省，如此不但战争延长，而苏浙赣闽粤诸省，必惨遭糜烂，人命财产损失，当比较在徐州会战，拖长日子解决胜负为更甚也。

       我海外华侨千余万人，为祖国政府腐败，财产损失，客死异域，难以数计，尤以南洋华侨为甚。以本人所知，单就新加坡闽侨方面言，五十余年以下，廿余年以上，卅年间资产称百万元诸富翁，约有廿左右人，迄今只有一家能保存，余者都已破产，甚至有家风败坏，贻羞社会，虽有少数人遗些产业，而大体上远不如前。至中下级资产侨众，与职业界劳动界，损失更大。其致此之由，大半为祖国政治不良，不但投资无门，且视桑梓为畏途，裹足而不敢归，再世后已忘祖矣，若祖国政治良好，华侨两地为家，子女可回国受教育，辛苦血汗资财，不难建基立业，免如前时无家可归，孤注掷于海外也。

       民国光复前，华侨学校及报馆甚少，爱国心薄弱，迨光复后，学校增加百十倍，如云慢，则比较前进步许多；如云快，则比较先进国尚有不及。进步之快慢，须视祖国政治之良否。本报在此数月内，逐日或每隔数日必有内战重要确实消息，报告爱护本报诸侨众。内战解决后，新中国政务之设施，福国利民，兴利除弊，当为蒋政府统治廿年所未有，近则闽粤江浙侨胞之桑梓，远则全国区域，势必日新月异。其时本报所传可惊可奇之确实佳音，可为我侨注意者，料不亚于现下之战讯。本报当更努力奋勉，以副侨胞之雅望。

（卅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

**——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讯］华中、中正、南洋、南华、中华、育英、公教、南侨等八间华侨中等学校董事，昨日下午五时，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星马华侨教育史上空前未有之联席会议，一致议决拒绝接受本坡教育当局所提津贴华侨中等学校之新方案。八校董事将于日内派出代表，联合向教育当局表达此种意见。

       出席昨日会议者，有八校董事陈嘉庚、李光前、黄奕欢、陈清吉、梁元浩、杨惶华、李伟南、林师万、叶玉堆、李振殿、张建金、孙炳炎、符致逢、郭珊瑚、柯进来、洪永安、李铁民、颜耀鹏、叶怡煎、傅无闷、杨赞文、刘立卿、黄信满、崔信延、陈作民、许桂荣、林庆年、李亮琪、杨溢舜、黄镜波、李源章、王吉士、罗喜生、黄胜白、洪丝丝、黄叶生、谢荔圃、庄不唐、林邦彦、许逸君、黄复康、黄德文、胡文钊、符国峇、黄正本等四十余位。华中校长郑安仑，中正校长庄竹林，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南华女中校长杨瑞初，中华女中校长汪玉聪，育英学校校长王昌稚，南侨女中校长杨振礼，公教中学校长姚国华，及华中事务主任天贝，亦列席参加。主席光前。

       陈嘉庚、柯进来、谢荔圃、李振殿等，即席发表意见，认定应负起促进华侨教育任务，为不愿始作俑，而影响华侨教育前途起见，决不可接受此可能对华侨教育有所限制之方案。尽管教育当局解释此方案之用意纯为减低学生家长之负担，及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但大部份到会之董事，仍对教育当局提出此方案之动机与用意，深表怀疑。彼等多主张此种情况之下，政府如不加任何限制而予华校以补助，吾人当表感激，至如以此新补助作为引饵，企图作种种限制，则吾侨应该自力更生，集同侨资力，教育同侨子弟。

       陈嘉庚氏出席发表长篇演说，力陈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兹录其演词于下：

       “新加坡华侨自有中学校，系由民国八年起，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校，于今卅年之久。初办时学生不上二百名，后来增至七八百，现在全坡中学生多至三千余人。若非日寇来侵，沦陷四年，则中学生决不只此也。”

       “中学校最好设备科学馆及丰富图书室，供学生实验参考。然本坡各校多付缺如。本坡未失陷时，南洋华侨中学校，对科学馆，图书室，设备略有可观，不幸被日寇毁灭无余。现下各校但求其量，不计其质，此种程度学生，无论毕业与否，如要回国升学，在政治不良时代则可，若在良善政府时代，则恐不能适合也。”

       “此后中学生日多，而校中设备如此贫乏，真所谓因陋就简。其致此之由，莫非经济困难，资本家多不捐输，董事并乏注意。此种中学生程度之低落，毋庸讳言。兹如欲并此亦不顾，素称侨领诸董事，欲安逸独善，观望卸责，致使之节省经费，裁去科学课程，降低教师待遇，增加其辛苦工作，势必更影响学生程度，了无疑义。如此下去，与我国将来新教育难免相距更远。”

       “本坡各中学校，无论全体或一二校，若欲避劳安逸，放弃职责，将为始作俑者，不但本坡他校效尤，恐全马来亚或全南洋各属亦能仿效，事关华侨教育至为重大，其罪责当为，外所不满，而无可避免也。”

       “南洋华侨中学生，回国升学之多少，及造就之成绩，大都视祖国政治之良否。若政治良好，第一学校设备完善，第二严选教师，第三优待学生，如此则父兄必定争先恐后，遣其子弟回国升学。我国以前政治如何，毋须多赘，难怪中学生回国寡少。此后新民主政府成立，与前必大不相同。学校之设备，及教师优良，虽未可一蹴而达，至待遇学生定可大大改善。若干中等以上学校，不但学费免，就是衣食住书籍，亦应由政府供给。盖非如是不能普及贫寒子弟也。”

       华侨初高中学生，毕业或未毕业，如无相当程度，何能回国升学？又小学毕业之男女学生，或年仅十二三岁，未忍远离回国，势非暂入此地中学不可。因以上种种缘故，吾侨对培养中学生，应当极力设法提高其程度，万万不可反使之退步也。”

       “本坡各帮对于私立学校，筹募经费，甚形踊跃，数十年如一日，而对公立中学难免或有观望，致经费发生问题。余意如变通办法；各帮学生，由各帮会馆介绍入会，辟如福建帮学生，由福建会馆介绍，校费除收支外，每月不敷若干，照学生分摊，由该帮会馆支理，如此则中学校董无筹款之困难矣。”

       “华侨所办之中学校，其教学系照国内学制，应设有科学馆，图书馆，教员每周授课十八点至廿点，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并行，所以逐月设备及杂费，亦须多开。兹若照当地政府规定，学校设备及杂费每生仅三角钱，则课外活动，势常停止，仅读死书，如机械一样耳。”

       “华校比较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课单纯，教学较易。中国文字艰深难学，为世界所公认。英校全年休假日子亦多。若比较马来校，印度校，则更形不同。故他等教员每周可教课至二十六点钟，薪俸亦廉宜，而华侨中学校教员则不可耳。”

**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即席通过取消该会馆原来之豁免注册社团注册，而保留非营业有限公司注册。

大会临时主席陈嘉庚即席致词，坚信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兴利除弊，新中国前途呈现无限光明。兹录陈氏演词于下：

       “今日本会馆开常年大会，除各科主任报告去年工作外，另有一件要案。本会馆在社团注册官注册时，原为豁免注册之团体，而于产业保管及其他，另注册为非营业有限公司。兹据律师意见，谓两种注册，可留其一。然须大会解决，方合手续。此案待少顷表决之。”

       “本会馆除办理四间学校外，甚少其他事务工作。祖国桑梓方面，自民国光复后，军阀内哄，继以抗战及内战，民生惨苦，地方多故，归侨视为畏途。本会馆虽如何关怀，然无法补救其万一。兹幸内战将终，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改革，兴利除弊，前途无限光明，而救急与兴建，或速或迟，当能次第实现。关于除弊与兴利，鄙意有十二项可述。”

       “除弊方面：（一）三征惨酷，多年来严征实物，壮丁，金钱。（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能枚举。（三）各处县市，既设有官吏，又增设党部与特务，争权夺利，无恶不作。（四）贪官污吏，互相袒护，吸收人民脂膏，等于竭泽而渔。（五）花天酒地，奢侈淫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六）箝制舆论，封闭报馆杂志，残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种苛酷凶恶，祸害至为剧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种改革，既免费用金钱，亦毋须技术人才，时间可极短促，三数月就可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咸使安居乐业。”

       “兴利方面：（一）教育普及。（二）注重卫生。我国人对卫生事，素不重视，世未有不卫生而能健身长寿，亦未有人民孱弱，而能富国强兵。明乎此，当知卫生之重要矣。（三）土地改革及振兴农林水利。（四）整设水陆交通。（五）振兴轻重诸工业。（六）开发矿产与海利。以上六项重要事业，需要巨大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当时间。若能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并驾齐驱。我国地大人众，土地改革后，合众人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第一位也。”

“新中国实现后，本省人负责办本省事，此为必然之理。现在本省内恐怕缺乏才干之人，未悉中共区早有训练闽人之准备乎？至于政治略就轨道后，华侨投资，鄙意按有两种：一为资本家私人个别投资；一为创立各种事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招侨众投资。然私人资本家，能备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亲往经营者，在近年间恐不可多得，设有亦极少数；至创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过去所谓华侨投资，甚多为空雷无雨，欺人之欺，此后则不可复尔。鄙意新政府兴办某种事业，如需要华资投资，可由政府负责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得若干股，余则向华侨招募，并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及该公司不至蚀本，如不幸蚀本，不干华侨股之事，订若干年原本交回。此种鼓励华侨投资，比较公债券更为有利。盖新政府初步，非如是恐不能收效也。”

       “本人自十余年前，决意回国作长期游玩，每年或于严寒时南来一行，不意为抗战及内战所阻，致有怀莫达。兹幸内战将终，待上海解放后决即回国。对本会馆职务，余经已辞卸。自本坡光复后，余所倡办本会馆游艺会及募捐，并其他三社团进支数目，自当公布。今乘大会之便，先撮要报告如下：

       一、本会馆民国卅五年春为买校地及拟建校舍，向闽侨募捐，及开游艺会，计得三十七八万元。虽极力催收，拖延年余，收到不上三十万元，余七八万元无希望可收，应从兹结束，已印征信录五百本，分送诸交款人。如有未收到及已交款而无登录者，请到本会馆办事处查询为荷。

       二、闽侨总会在日寇未南侵前捐得四万左右元，除办刊物《民潮》及各项费用，至本坡光复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本拟续办刊物，因未得负责人，存在银行无利息。至去年末，转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一万五千元，利息周年四厘。

       三、前南侨师范学校战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为不能续办，故与南洋华侨中学校前任校长薛永黍先生议定招一两班师范生，学宿费每月每生十余元，由此存款补助。于今年余，虽应补助原不上十万元，因该中学校需款，最近已全数支去矣。

       四、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本坡光复后，存款二万余元。又星华筹赈会存款十五万余元，经侨民大会议决，移交南侨总会，作提倡祖国卫生费用。又总会存阿士百灵药片三千磅，除大半寄赠祖国多省，在马来亚托卖一部份，计售款约三万元。又星华体育促进会，捐助机工复员费七千元。又其他捐来一万余元。合计廿三万余元。

       支出方面，复员机工支去六万余元，印刷费约四万元，广告费约一万元，薪金及其他费用一万余元，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七万元，存银行及现款与被欠约三万元。合计二十三万余元，待不日在余未离星之前，当将各条进支数目付印，分送各社团。至印册费，《大战与南侨》一书，除收入外，尚不敷一万余元。《住屋与卫生》一书，前托上海陈维龙君印各县市五万本，费去八千元，迎在本坡订印三十万本，约须费一万二千元。至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之款，利息周年四厘。

       此次再印《住屋与卫生》三十万本，待不日祖国邮政通达，就可陆续寄去赠阅，以广对于卫生之宣传。每县平均不上五十本，拟托县长送交区乡镇，参议会送交社团，教育局送交学校及图书馆。若论宣传普及，当无异杯水车薪。此书除贡献政府外，希亦使民众了解住屋不卫生之祸害。各省县若能将此书翻印宣传固幸，否则如须本会再印者，则将来或可在天津上海，或托各省机关印赠百万本至二百万本，费款十万八万元，或将书中摘要，在全国有名城市百余处之日报，刊登宣传，每处按广告费二三百元，其计开消四五万元，浅见者或将指为浪费，其实卫生一事，关系及于国计民生，若每年能减少若干万人命损失，则多费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何妨？关于此事，待余到国内观察后再打算。欧美诸国，医科学校林立，医生众多，平均数千人中有一医生。医学上之重要任务有二，首为卫生预防疾病，次为医治疾病，我国医学校寡少，医生数微不足道，数万人中尚乏一人，尤以乡村为甚，虽有些少中医，殊不应付社会之需要。且民间对于曲突徙薪之卫生方法，绝少注意。此后新政府对医科学校，虽能积极兴设，然非短促年岁可能普及收效。惟先进邦域之卫生设施，多有充分效验。如殖民地中华侨最众之新加坡市，其卫生设施，即值得吾人取法仿效。余所以主张大量印赠《住屋与卫生》一书，意即在此。至《民俗非论集》一书，虽关系较小，如在国内亦须再印赠与及登报宣传，应费数万元，亦当进行。以上数事，按费十余二十万元，除南侨总会存款外，不敷多少，余当垫补之。如或不足，则请二三富侨捐助。此为余之理想，至收效如何，不敢逆料。贤者每劝人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区区十余二十万元宣传费，或难奢望伟大收效。所最希望者，政府能表同情，则事半而功倍矣。至南侨总会之机关，应留存与结束，须经过召集南洋各属埠侨团代表开会解决。然自日寇败后，荷印安南缅甸地方多故，加之祖国内战未终，所以迟迟未能举行。此事当待至明年春召集会议解决之。”

**明是非辨真伪**

**在福建会馆与怡和轩欢送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本报董事长陈嘉庚先生，将于最近回国观光，本报董事暨全体同人，中华总商会会长杨溢粦等，已先后举行欢送会，各情已志前报。福建会馆及怡和轩，亦于昨日下午六时，在怡和轩开会欢送。主席陈六使氏。兹将陈嘉庚先生演词录下：

       “本人联任福建会馆主席二十余年，对本坡闽侨及祖国桑梓，无有益贡献，至深抱愧。顷主席褒奖实不敢当。新加坡为南洋最繁盛商埠，侨民亦最众，而福建会馆尚未有一间正式会所，本人难辞其责。若早募捐若干万元，建一堂皇会所，甚易办到，第念空挂一招牌，实际上乏事可作，故自来未曾雇聘办事员及专责书记。盖如要聘两三位相当干员，每月至少须开费数百元。若每日有数点钟事务可供工作，亦属无妨，而事实就是一两点钟，亦未必有。为此缘故，所以自来办事处，附设怡和轩。

       本福建会馆在本坡方面，只有办理数间男女学校。对贫苦学生不敢多收学费，对教师有相当待遇，俾生活费无缺，能专心服务，逐年须不敷五七万元。本会馆诸委员，应负责捐筹，此乃当然义务，万万不可放弃此职责，而将不敷数额，加诸贫苦学生身上，或薄待教师，此为本人自来抱定之主旨。

       对祖国本省方面，本人未尝不关怀念虑，作些有益桑梓事业，或如何筹划，以加强侨民之乡土观念，勿久客遗忘。虽有理想，而实际丝毫不能办到。其最大原因为二十余年来，祖国多事，政治腐败，加以抗战内战，民生惨苦，侨胞视为畏途，故有怀莫达。至于务虚失实，空雷无雨，炫已愚人，欺人自欺，对海外侨民，阻其将来内向企图，对桑梓同胞，无异画饼诱惑，贻害实非浅鲜。如提倡救乡，要求自治，组织大公司，建设大事业，投资数千百万元，本会馆过去不但不敢提倡，亦绝对不敢赞同，以为时机未到耳。本省山多田少，海岸线绵长，陆上交通未便，海利未兴，土产稀少，故工业未能发展。唯出入口方面，如厦门水深港阔，数万吨巨船，可以直泊堤岸。将来铁路网完成，可居全国重要地位。因内省如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及本省，或全省，或一部份，货物亦必多少从本省出口，又如造船业之地位，在全国各沿海，亦难与厦门比拟。将来发展，当无限量。至于其他各种矿产，海洋生物，及农业，与及轻重工业，定必随之勃兴，了无疑义。

       华侨为革命之母，孙国父说此话，对华侨似有伟大之荣誉，而华侨中亦有人引以自豪，误认当时华侨有许多财力，帮助国父之成功，实则未必尽然。我国前被满清窃据，有志之士，倡起革命，恢复国土，如郑成功及太平天国，前仆后继，虽败亦荣。再后我闽南人起义不成，逃避南洋，在华侨中保存多少反清之余绪，故当时满清政府，曾有不承认华侨为国民之说。

       民国光复前，我闽俗例，男子将完婚之日，坐在稼萝上（竹器圆形，直径约五六尺，系农民晒物用具），家长为之理发，训诫今日已成人，勿忘祖宗仇敌（俗语称上头）。新娘出轿时，新郎手提米答（筛具）及笠，遮于头上。以上两事意义，就是足不履其地，头不戴其天。又人死入棺时，须用一白布盖面，其意为国土未复，无颜见先人于地下。可见先世被满清征服时，仇恨之深也。

       孙国父提倡革命，多次到新加坡及马来亚。当时生活费廉宜，如搭船往欧洲，二号位仅一百余元。孙国父虽辛亥武昌起义后应中外电邀回国，所搭之船，亦坐二等位。为生活费廉，华侨每次捐助，常为两三千元而已。唯最后经新加坡，到上海来电，嘱捐助私人用费，即由闽侨保安会，汇去国币五万元。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今五十年，曾负责招待孙国父。系已故林君义顺及其他多人所倡办，及武昌起义，闽侨组织保安会，亦由怡和轩会友之提倡。民国光复后，本坡华侨对祖国屡次负起工作义务，亦多由怡和轩发起。可见怡和轩俱乐部与祖国关系不少。此后祖国革命成功，与外华侨关系更形密切，本俱乐部更当积极负责，继续负起应尽之义务。

       我华侨在民国光复前，爱国心甚为薄弱，比较现下相差甚远。迨民国光复后，爱国热情逐渐提高，大半由于学校林立，教育及报纸与社会之鼓励，而尤以抗日战起，同仇敌忾之激动。至对于祖国方面之感想，本人未往延安之前，每忧虑我国难如苏联之发展。苏联革命后，内部纠纷仅四五年，政治便已逐渐进步。而我国则不然，军阀割据，战争十余年。自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至七七抗战事起，已有十年之久，国计民生，毫无进步。甚至教育党化，上下贪污，特务横行，政治腐败，比前尤甚。以前余意在蒋政府执政下，既无改善希望，而彼等尚在中年，政权尚可久操，设使天佑中国，产生建国人物，其人现未知名，不知将延至许多年中国始可得救。迨民廿九年，为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亦抱如此思想。至于中共，据其时各处宣传，有如毒蛇猛兽，凡闻其名，几似谈虎色变，故余亦未加以重视。

       因为国共磨擦，关系抗战严重，故本人曾亲往延安观其究竟，不图乃出意料之外，所见所闻，感觉其政治良好，上下勤奋，几如别有天地，衷心无限欣慰，深自了解前时忧虑建国人物未有其人，实属杞忧。今日已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故认定中共将来必定胜利，而兴建我中国。或谓余有眼光，能早知必分裂内战，结果国民党必败。然究其实，余无所谓眼光，只有辨明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而已。至要辨明此数字，自己必忠诚公正，庶无错误耳。

       主席奖余兴学。若言起此事，余无限惭愧，及对陈六使先生无穷铭感。为何惭愧？如创办厦大，难免虎头蛇尾，终累政府接办，每抱有始无终之遗憾。为支持集美学校，六使先生曾助余霹雳胶厂营业。日寇南侵时，经理人不明大势，积货满栈，致欠陈君五十余万元，结果货物被日寇完全抢去，损失百万余元。六使先生又因欲助集美学校，由中国银行汇国币七百万余元，申叻币八十万元，被该行延迟经年，至国币已跌价三分之一，而始交还。新加坡光复后，六使先生又资助余霹雳胶厂复业，计四十余万元。为马来亚动乱，几损失无余。余自创办厦大后，社会顾爱诸君，有奖余为毁家兴学者，其时余颇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许多资产，不图今日竟成事实。余住宅被日寇焚炸，仅存颓垣残壁而已。集美学校校舍被炮击轰炸，损失惨重。复员于今三年余，费款于集美学校共三十余万，修理与学费各半。至倒塌数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

**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

**代表会议通告**

**为讨论筹款资助机工南回办法事**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以回国机工及眷属，约一千七百余人，渴欲南返，但祖国政府迄未有具体办法，爰订于六月十六日（民国三十五年）在吉隆坡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代表，商议资遣机工南回问题。该会主席陈嘉庚氏发出通告，订十六日上午十时为开会时间，但地点则未决定，届时每区应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出席大会。议程拟定十余项，其重要者为（甲）各区应否负责设法机工南返经费，（乙）机工在国内眷属南来经费问题，（丙）每人需旅费若干，（丁）应筹款项，各区如何分配，何时筹毕，（戊）各区所筹款项，是否集交一机关保管，（己）各区举代表若干人往昆明与互助社协商，分批到港及沿途照料一切，（庚）为救急计，应否由某日起，每月先汇若干款项交昆明互助社，维持失业者生活费，兹录该会通告如下：

**南侨总会通告**

       自七七事变后，我国各海口，受敌人封锁，国际运输，几于断绝，除安南一部份外，全赖滇缅一路为生机，该路长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且工程甫毕，路基未固，国内司机素乏，新训练者亦不便服务。我政府运输机关，函电本总会，代招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乃出通告，鼓励爱国机工回国服务，从事救亡工作，前后踊跃参加者，三千余人。其后缅甸失守，一部份二百余人，随联军入印度。敌寇败后，除有职者外，余已陆续回来。其他大部份在国内诸路服务。惟据昆明华侨机工互助社报告，自胜利后华侨机工失业日多，登记欲南返者日众。最近所报，急欲南返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完全失业者约四百人，已娶妻室三百五十七人，生有子女者二百八十人，合计一千七百余人。据本年初回国慰劳团长潘国渠自渝来函报告，屡与政府交涉，最后应承由政府免费运至缅甸。本总会以为若能如是，由缅甸回星费用，我侨当完全负责。然至今数月，政府不曾实行此事。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由渝回星，详述数月来屡向政府呼吁，恳请救济及遣回事，或敷衍延缓，或藉词推诿，最后仅发救济费国币一百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以未闻本总会发电向最高机关如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或行政院，要求机工复员为言，然自廿九年冬本会陈嘉庚先生报告陈仪祸闽之后，中央政府即与本总会断绝消息，虽曾汇款数千万元，发去其它函电，不下数十次，一字绝不回复。迨日寇失败后，陈主席回星再试亦然，故知虽本总会要求亦无效也。至诸机工原为爱国而前往服务，亦由各处筹赈会鼓励而成行。今日战事已终，目的已达，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于兹，政府已不资助南返，我侨安能卸责坐视？计每人由昆明至香港，须费叻币一百六十元，再由香港至星费一百二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如以一千一百核计，须三十万元有奇。至于家属尚未计及。兹将各区，机工登记欲南返者人数列后，另将各区各人籍贯姓名，待六月十日付交各处筹赈会及商会若干张，以备其家属亲戚取阅，并订六月十六日请各区筹赈会派代表至吉隆坡开会，讨论机工南返办法。此布

主席陈嘉庚

**各区机工人数**

       新加坡三百三十人（内粤二百二十六人；闽一百零七人）妻子一百七十六人

       柔佛九十七人（内粤六十六人；闽三十一人）妻子六十七人

       马六甲二十九人（内粤二十二人；闽七人）妻子二十六人

       森美兰三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十人）妻子十二人

       雪兰莪一百零七人（内粤七十七人；闽三十人）妻子六十七人

       霹雳二百三十七人（内粤一百七十三人；闽六十人）妻子一百四十九人

       彭亨二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四人）妻子十六人

       吉兰丹一人

       槟城一百二十一人（内粤六十五人；闽五十六人）妻子五十二人

       吉打五十一人（内粤三十六人；闽十五人）妻子三十一人

       暹罗二十三人妻子十二人

       苏门答腊二十九人妻子十六人

       婆罗洲三十八人妻子十人

       以上共计机工一千一百二十人，其妻子六百三十五人。

**（附载一）致伍总领事函**

       伯胜总领事先生大鉴。敬启者：本坡昨日晚报及本日早报均载贵领馆电请政府遣送机工南返事，该稿闻系贵领事馆发出云。贵领馆系政府代表，对于机工复员事既肯负责，自系最好之事。不但机工，即庚亦甚感荷。惟尊稿言“中央曾设法救济，并办理遣送事务，惟因交通工具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潘国渠及诸机工来函与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报告，并所举来渝昆诸文件，则情形甚有不同。兹将最近在渝机工十九名来函及庄明理报告转陈于下，以供参考。自民国卅二年缅甸失陷后，机工失业颇多，由赈济会许世英拨出廿五万元，其后未有再获一文。去年秋日寇败后，国渠明理等除口头向政府各机关交涉要求外，再用公文呈送行政院，侨务委员会，海外部，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军事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等机关。十一月中旬侨委会召集上列各机关联席会议，无结果。十二月底在海外部再开会通过议案，（一）请行政院拨专款救济；（二）呈请行政院会同公路局、交通部、后方勤务部，安插失业侨工；（三）由外交部与有关方面，洽商办理侨工出国手续；（四）函善后总署，筹办遣送工作；（五）其他有关事项，由侨委会斟酌情形与各有关机关洽商办理。尊稿上文所云，或尚有为庚所未知者。除上文所述未实行者外，中央尚有其他实行者否？如有，请将负责机关，在何处救济，自日寇败降后，发出救济费若干次，数目若干，交何团体收去，请列明示知，不但可以安慰机工之家属，庚亦可在吉隆坡开会时作极好之报告材料，至荷至慰。尊稿又云“办理遣送，因交通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客年潘国渠报告，向政府交涉时曾由郑介民先生应承将在昆机工五百名免费运送至缅甸，然口惠而实不至。按由昆至缅仅七百英里，货车最迟七日可到，每辆车如运载卅人，十余辆车作一次便完。若作一两月运去，有五辆车专运已足。就昆明一处政府之货车客车，即不下数千辆，何困难之有？南洋各属沦陷时，逃往祖国者，以缅侨最多，不下数千人，现几已完全回缅矣。以政府之权力，迄今多月不能遣返机工一人，其谁信之？又如政府人员以及个人免费或自费由国内到印度及南洋者，何止千人以上。其他如由政府运往广州香港上海南京者，则以数万计。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夹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

陈嘉庚

三十五年六月八日

**（附载二）再致伍总领事函**

       敬启者：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为商讨华侨机工复员南返事，曾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开会。佥以前日各报所载总领事发表援助华侨机工南返办法，极为妥善，甚为感佩。用特成立决议，即依据总领事馆所提办法，请求总领事阁下专责办理，使在国内欲南返之全部华侨机工及其家属，并于两月内由中央政府饬令下，尽数遣回。其中失业流落昆明之数百名，尤希提前遣送。在遣送之前，生活困苦或疾病者，请先予以救济。此外或有少数机工，因故羁陷囹圄，情实可悯，亦请谅其当年回国服务热诚，分别予以减刑，或即省释。以上决议，与日前总领事馆所示大旨，原无异致。故即席推举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暨各区筹赈总会代表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等五人面达公意，请即迅赐办理。倘在两月之后，未见端兆，为显示总领事阁下肯负责任，受信侨众，更望躬回南京，切实向我政府请求，以去就力争，务期必达遣返机工之目的而后已。兹据前由，除五代表趋前谒见外，相应备函奉达，敬烦查照并希赐予面洽为荷。专此渎陈。

       即致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

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

复员代表大会主席陈嘉庚

卅五年六月十七日

**关于机工复员事**

**新加坡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一号**

       敬启者：本总会为回国机工复员事，经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亚各区筹赈代表会议，议决各案列下：

       一、机工南返事，本总会拟在吉隆坡开会发表后三日，新加坡总领事馆即投稿各日报，对机工南返表示愿负全责办理，于是各代表开会时，全体一致议决托由总领事切实负责妥善办理。

       二、代表大会推举代表五名，持函送新加坡总领事馆，并面述各议案，请切实有效办理，及用大会名义电请蒋委员长宋行政院长速遣机工南返。

       三、机工南返事，请总领事求政府两个月内办理完竣，其中流落昆明及他处失业之数百人，提早遣送，在未遣送之前，一切生活费无着者应先救济。

       四、少数机工因故尚在狱中者，请政府减刑或释放，机工有家属者，请准予随同出国。

       五、在两个月满后，政府遣送机工如未见端兆，应请伍总领事躬回南京交涉，并以去就力争，以示决意负起发言之责，取信侨胞。

       六、以后发出函电及办理其他会务主持者之名称，定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此布。

主席陈嘉庚

民国卅五年六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四号**

       为通告事，本总会系于民国廿七年秋由行政院命令南洋各属筹赈会举派代表来星开会组织，其任务在领导筹赈支援抗战，故凡当时政府所有关于筹赈抗战各项命令，本总会当然奉行，至各属会举行与否，系各属会之自由，本总会未便干涉。有如义捐公债，不拘所募多少，均由各属会自行汇交行政院，本总会概未接收款项，亦未向何处募捐，故新加坡沦陷时，本总会无存款，即以此故。

       查民廿八年滇缅路将通车时，政府电本总会，需要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即通告各属会征求爱国机工自动参加，当时并无附带任何复员条件，盖此为政府责任，毋须预有规定也。抗战胜利后，在国机工久未复员，历经潘国渠，庄明理诸君交涉无效。本年五月间，庄君回洋，本总会据报，乃于六月三日，发出通告，订六月十六日请马来亚各区筹赈会，推派代表，赴吉隆坡开会，商议捐资援助机工南返。讵两日后，新加坡总领事馆忽投函各报，谓救济机工及复员事件，政府已负责办理。言外之意，不问可知。由是吉隆坡开会时，马来亚各区会，除新加坡、槟城、彭亨、峇株巴辖，巴生有正式代表到会外，雪兰莪及霹雳两区，以依据报载总领事馆消息，该区要自行设法，使其区内机工复员，拒绝参加会议。其他各地咸多以是为词。到会诸代表，于审度当前事象之余，佥谓新加坡总领事馆，既谓政府要负责遣送，故决议此案应完全信赖及督促政府全责办理，并派举代表五人备函送达新加坡伍总领事，请其力求政府于两月内办妥救济及设法遣送全部机工南返。否则请伍总领事亲往南京，以去就力争，务达目的，吉隆坡会议迄今五阅月，本总会除依案执行外，别无他道。兹闻政府已托联总机关办理，运送机工到新加坡，上岸后并备食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之目的既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筹赈会商量。本会对于机工责任，于焉幸告完毕，曷胜欣慰。合将办理经过，普告侨胞，以明真相。此布。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为通告事，自本年六月，新加坡总领事馆发表华侨机工救济及复员事均由我政府完全负责之后，近日华侨机工将陆续南返，余乃查询总领事馆，关于机工抵星后状况及处置，据谓香港救济联总署已托本坡福利部负责一切，迩邝领事告知福利部来函如下：

       嘉庚先生大鉴：昨日余接香港联总来电，谓另一批计四百二十名之机工，乘丰庆轮将于本月廿八日抵星。此批机工目的地系星洲及马来联邦，但每地若干名则尚未得详讯。常例凡由联总遣送之机工，其所乘轮抵岸后，在未各归其家前，一切膳宿均由福利部免费供给。此致并颂 大安

新嘉城政府福利部秘书TPF尼密士上

十一月廿一日

       查华侨机工之复员，既由我政府与救济联总合作，到新加坡则由福利部招待膳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目的已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之筹赈会商量，方为适合也。此布。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为荷兰惨杀华侨并夺船**

**货封锁贸易事**

**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通告**

       巨港为苏门答腊南部物产最盛之出口商埠。日寇败降后，荷兰与印尼分区管理。新旧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多属华侨经营。不意竟遭荷兰忌妒，于新年一月初，藉词对印尼军事行动，专向华侨市区炮击、轰炸、扫射、焚烧、惨绝人道，连续五日，致引起印尼暴徒乘机劫杀，死伤华侨千余人，烧毁店屋数百座。损失物资千余万元，而荷兰及印尼人双方死伤只数人而已，别无其他损失。由此而观，可知此种惨案完全为荷兰军有计划之行动所造成。其居心恶毒，路人皆见之矣。近乃复变本加厉，颁布其荷印进出口法令，封锁进出口货物，虽由印尼政府辖境运出，亦在中途拘押没收。这种政策，直是完全以华侨为对象。查爪哇与苏门答腊进出口贸易，大半为华侨所经营，关系重大，毋待絮述。故前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侨团大会，组织保侨会，公举李光前君为代表与荷兰交涉。荷兰欺我海外孤儿，四无援应，置诸不理。

       一月廿九日，诸侨团函请本总会召开侨民大会公议对付办法。本月三日保侨会诸委员复联袂辱临，请本总会主席出面主持。本总会念保侨护商，义难坐视，复以我国政府鞭长莫及，若不团结自救，任人鱼肉，后患奚堪设想。用是勉徇公意，起而负责。

       兹订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假中华总商会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共议进行。事关马来亚与荷印四百万华侨生机命脉，幸勿漠视。侨团代表，社会贤达，希均依时玉临。此布。

**附议程如下**

       一、此次大会，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夺船货，讨论对付案。

       二、仍托保侨会，限日再与荷兰交涉，如无效，则推行以下本日通过之各案。

       三、交涉既无效，本大会将用何项方法以资对付案。

       四、应否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案。

       五、本大会对外名义是否用本总会，抑另议别名称案。

       六、大会职员如何推举案。

       七、大会可否授全权与会中实际负责职员案。

       八、如何募捐款项以应进行等需要案。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四日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附载）新加坡侨民大会开会情形**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

       昨日下午，天气阴沉，凄雨霏霏，我“海国孤儿”满腔热血，敌忾同仇，齐赴中华总商会，参加侨民大会，为被难同胞伸冤，为货物船只被扣留者声援，为华侨今后生存而奋斗。这中间，已由集体力量，结成坚强之国民外交，以挽救华侨经济之危机，提高华侨地位。昨日之侨民大会，为一转折点。

       是日出席者共百余人，包括各帮商业团体，各社团代表。

       大会开始，先请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致开会词。陈主席首先说明南侨总会召集此侨民大会，系应各社团及保侨会之要求，因群情愤激，义无容辞，故勉力而为。次述荷兰弱而无能，竟不自量，违背大西洋宪章，统治印尼，摧残我侨生命财产之种种暴行。最后强调如发动抵制，可使荷兰每月损失五六百万元叻币，我侨必可获得最后胜利。全体代表，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演说者有周献瑞等多人。

       嗣因时间关系，即进行讨论提案。关于抗议荷兰暴行，决议仍由保侨会进行交涉，限一星期，荷方如无完满答复，即实行经济制裁，有如以前对付日本，关于对荷交涉对外名称，是否仍用南侨总会名义，抑另定名称案，全体赞成仍用南侨总会名义，得因经费来源不同，决议：在南侨总会之下，设立对荷交涉委员会，推各有关社团为委员，对于支持抵制运动之经费，亦经妥议具体办法。会议至下午五时一刻，在融洽空气中闭会。兹将大会演词及决议案志之如下：

       主席陈嘉庚演词云：

       “自日寇南进，我华侨在荷印人命财产，损失惨重。及日寇败后，印尼政府独立，印荷双方战争，有意及无意波及众侨之战祸，不可胜计。近乃变本加厉，如巨港之惨案，完全为荷兰所造成。近日来复在海面捕船劫货，枪毙船员，并颁布法令，封锁出入口货物，竟以华侨为唯一对象。前日报载印尼政府，宣布美国派一艘九千吨轮船到井里汶运出橡胶及白糖，至其入口何物，虽无宣布，当然是其所需要之供应品，试问荷兰对此，敢否过问。”

       “东印度为印尼领土，昔被荷兰占作殖民地，吸尽土人脂膏，养尊处优，日寇入境，论其守土有责，理宜悉力抵抗，以卫民众。凡享权利者，应负此义务，况其拥有完整之海陆空军数十万人，实力雄厚，竟乃闻风奔逃，争先恐后，为余亲闻亲见者。日寇登陆，兵不血刃，不数日间，荷兰全部文武官员屈膝投降。其卑怯懦弱，贪生怕死有如是者。”

       “此次世界大战，乃法西斯帝国主义与民主阵线二者之战争。故大西洋宪章，规定战后各殖民地应得解放，而东亚各民族，应有独立自治权，今日荷兰既怯弱无能，丧失领土，论事论理，皆无统治殖民地之资格。而印尼政府之独立，乃为恢复失地之光荣，适符大西洋宪章民族独立之规定。乃荷兰野心不死，妄藉其自订之殖民地法律，硬指印尼辖内某种货物，系其旧存，故在海面横行，肆意劫夺没收。今举一例，试问如台湾前被日本占领，今为我国收复，所有日人货物，权属伊谁？日本人得藉口抢回否耶？物资附于领土，有如毛之附皮，皮既不存，毛将焉附？况东印度自日寇入据，物资转卖民众，几番易手，现在货主，多非当年直接承买之人。”

       “查荷兰人口，不上五百万人，而印尼则多至六千左右万人，与日本相差无几，较之朝鲜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宾及暹罗缅甸，则各多四分之三。现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履行大西洋宪章，亦即此次民主主义胜利之目的。”

       “蕞尔小国如荷兰，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地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何不自量乃尔！查在其势力范围内，如婆罗洲及他处，莫不极力剥削，垄断独占，如树胶一物，每百斤还价不上叻币十五元，比较新加坡价，廉宜过半。由此可见其剥削之凶，其他各物可以想见。”

       “荷兰夺船劫货，谓苏岛出产之苧麻葛丝，系荷人独有产业。然如树胶一项，则各色人都有，本坡新业公司被劫之树胶，乃竟于劫取搬运时重印其唛头，冒认为荷兰之出产。此外如爪哇所出产之树胶，亦各色人都有。余前年避难爪哇，匿居陈泽海君树胶园内时，陈君已拥有千余英亩胶园。至茶园糖厂，华侨亦所在多有，非纯为荷人所有之业。”

       “假定如荷兰所言，苧麻葛丝为其园内出产，然自他弃守苏岛之后，已属印尼经营，所有货品，新旧都有。至在爪哇之树胶及糖茶，既为各色人出产，何从分别谁家之物？就现下存货估计，苧麻葛丝约二万粒，每粒值八十元（出口费除外）计值叻币一百六十万元。”

       “爪哇之树胶，在地用途甚广。如鞋类、幔裤、脚车轮、马车轮等，除幔裤须配料制造外，其他概系生用，故消耗特多。按所存不外一万余吨，若荷兰有权以半价强买，每吨廉宜叻银四百元，虽作一万吨算，计四百万元也。”

       “至于茶糖均在内地，由印尼政府管辖。若华侨不能经营出口，彼除一部份可售与美国外，其余印尼留以自用，荷兰虽为此垂涎亦不能染指。准此推算，荷兰封锁华侨之上言两项贸易，任其独占利权，亦不过可得五六百万而已。”

       “现下荷兰川走我国轮船四艘，客货每月至少可收叻币二三百万元；川走南洋之轮船十余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万元，共五六百万元。其他由欧美来之巨轮，尚未计及。我侨若能一致对付，荷兰所得不足偿其一月之损失，不患彼不屈服也。”

       大会决议案：

       一、此次大会，系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船夺货，讨论对付方法。

       二、全体通过再由保侨会于一星期内继续交涉，逾期不能解决，则推行以下通过之各案。

       三、全体通过保侨会交涉无效。应即实行对荷兰经济绝交。

       四、全体通过应行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

       五、全体通过对外用南侨总会名义，对内用南侨总会对荷交涉委员会名义。

       六、对荷兰交涉委员会职员由海星协进社，米业运输工友会，沿海部工人联合总会，海员联合会，机动船业联合总会，摩多舢舨联合社，轮船落起货工友会，驳业工友联合会、职工联合总会、巨港华侨筹赈会、星华保侨会、总商会，福和客栈商务会、海员工会、码头工友会、土炭工友会、出入口商公会，暨被夺船货人之代表一人，连同福、广、潮、客、琼、三江，各代表二人组织之。

       七、大会应授权与会中实际负责之职员。

       八、所有进行用款，巨港方面担任十分之三，被劫夺船货主人方面担任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四由大会筹捐补足之。

**宣布独裁政府罪状**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自我国抗战以迄南洋各属沦陷，华侨为爱国故，牺牲生命财产，不可胜计。然果能博取最后胜利，永固国基，而贻子孙无穷之福，则薄海讴歌卡舞之不暇，尚何足惜。

       日寇夹强大兵力，志在鲸吞我国，蚕食全球，于是激起我英美苏友邦公愤，组成联军，而终召覆败，此盖联军共御之力也。

       战争胜败之义，质言之，即领土及人民财物三项之得失。人民财物附在领土，虽遭一时之牺牲，乃可逐渐恢复生产。唯领土则有限定，领土失，不但居民为奴，财物为夺，而他省份子孙，亦乏移植发展之余地。故古今中外战争之后，一方面为领土扩大，一方面则为领土削减。扩大者，主权膨胀，削减者，或至于沦亡，无有例外焉。

       此次，我国战后，收复台湾土地三万余方公里，割弃外蒙一百五六十万方公里，对抵之后，土地损失，相差五十倍之多。我国领土不过一千万方公里，竟损失百分之十五。其他旅顺大连之形同割弃，及与美国所订若干丧权条约，尚不在此。此种战后牺牲，不但我国历史所未有，亦古今各国历史所绝无，而国人称曰胜利，岂不误哉？

       以我联军胜利国言，苏美英之扩大领土及主权，几遍及全球，独我国反无限损失，表面上同为胜利，而实际上则为失败。今以失败为胜利，以耻辱为光荣，崇名黜实，欺人欺己，贻患将来，可胜言乎？

       国父孙先生推倒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主权属民，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今不幸权操独裁者，与苏美妄立非法条约不知取消，领土主权，无志收回，国家前途，尚何堪设想。

       惟有痛定思痛，追究事实，万众一心，卧薪尝胆，以候政治实行民主化，凡非法条约，一律取消，届时方有胜利可言，而免愧对我后代子孙。

       战后世界，民生困苦，饿殍载道，疾病死亡之数，我国不但首屈一指，即合各国统计，恐亦不及我国之多，论者往往归罪于抗战太久，及国家太贫，实则二者关系非大。若政治修明，内战不生，虽富庶不及他国，亦断不至惨酷如此。兹分析其因，约有三点：

       一、官僚资本，除现金逃存欧美外，国内所积不动产及货物，数量之巨，不可胜计。

       二、自政协失败，内战发生，城市乡村，咸知纸币日贱，终成废纸，稍有资力者，莫不贮积货物，黄金及外国钞票，以大众之力，储蓄之多，更难计算。

       三、水陆交通阻滞，运费奇昂，统制居奇，种种阻挠，有无不能相通，出口不能便利。

       以上事实，凡稍留心国事者，类能知之，至现政府所辖省份，民众不过三万万人，而饥寒无告者约十分之一二。上举三因，如得其一，以为救济，则饥者尽饱，寒者尽衣，准此而言，我国民今日之悲惨实乃人为，而非天生也。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迫我国民转死沟壑者，皆贪官污吏。

       若一旦独裁政府崩溃，政府实行民主，贪污官吏财产，概予没收，移救饥饿濒死之民众，已绰有余裕。至于商民积存货物，以及交通运输，自能立随政治而改善。诚如斯，则我地大物博人众之国，五年十年后，必一趴而为东亚之模范矣。

主席陈嘉庚

卅六年六月九日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六号**

       本总会成立于抗战初期，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千万华侨为援救祖国，以求抗战胜利，领土完整，不惜牺牲金钱与人力，以尽侨民天职，所以成立本总会，领导吾侨救国之运动。及南洋各属沦陷，敌寇痛恨华侨之爱国工作，屠杀酷虐，抢夺洗劫，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然华侨为救国而牺牲，若能达到所期之目的，固无所悔恨。迨敌寇失败，胜利属我，华侨牺牲救国之目的，果达到否？凡我爱国侨胞，关怀时局，恐不免于痛哭流涕。本总会爱为申诉如下：

       战争之胜败，除人与金钱之得失外，尤有关领土之增减。甲午战败，失去台湾三万余方公里，而此次战胜，反损失外蒙古百余万方公里，及旅顺大连之主权，继复与美国订立商业，航空，及其他各项辱国丧权条约，甚至允许美国驻军，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夫失土丧权，惟战败国有此义务，绝未闻战胜国之失地丧权有如此者。战败国之丧权失地，系出于敌人威胁，不得已屈服忍受之。兹次我为战胜国，绝不受任何国之威胁，何以如此狼狈牺牲？我海外华侨闻之，岂但痛哭流涕而已耶？

       为因一党专制，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本总会前曾发出第八号通告，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件，为将来取消之预告。兹者x国大代表，所举x总统，所立x宪法，与前专制独裁之作为诈欺，毫无二致。此后再有与任何国成立任何丧权卖国条约，仍属无效。特此通告。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七年五月一日

**关于建立华侨死难纪念碑**

**致新加坡民政长官麦加伦函**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槟城现代日报载］关于请拨武吉智马前日军“忠灵塔”地址，建筑吾侨死难者纪念碑事，前日陈嘉庚氏已获麦克伦旅长复函，各情经志前报。兹悉，陈氏昨复上书当局，文云：

       来书敬悉，尊意拟立诸民族死难公共纪念碑，余原甚赞成，但窃以为尚须顾及两事：

       一、死难最多者为华侨，将来移骨骸往葬其地，除无处寻觅者外，或有二千人左右。

       二、华人习例，对死者纪念，每年至少有四次，即死日、清明节、阴历七月半、冬至日，各有特殊哀吊之手续。今若联为一纪念碑，则华人之上言习例，与他族大相悬殊，必致两者不便。先生必明白，毋庸多赘。兹惟祈折衷办理，除华侨死难者埋骨地址外，并请于该山适当地点，另划一处为华侨自建纪念碑之地位，较为适合也。

       此致

       新加坡区民政长官麦加伦旅长公鉴

陈嘉庚敬启

卅五年三月五日

**电请杜鲁曼停止援蒋**

       ［现代日报讯］陈嘉庚先生因痛愤国内独裁专政，凭藉外力进行内战，故特电美国杜鲁曼总统，美参众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自取败亡的复辙，该电由路透社合众社于九月十一日在新加坡发表，兹从英文转译如下：

       华盛顿白宫杜鲁曼总统，美国国会参众两议院议长，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鉴：中国人民一向信奉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不幸军阀内讧，加以日本乘隙而入，以借款军火助长中国分裂，卒致有世界大战之惨祸。日本此种损人利己之企图，征服世界之野心，最后仍遭失败，可见上帝有灵，报应不爽。查蒋政府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内戚及吴铁城、陈立夫、蒋鼎文、陈仪等，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为中外所咸知，贵国人士亦了如指掌。抑蒋政府要人，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贵国传统政策，对各国人民公允友爱，不事侵略，信誉昭然。今乃一反其道，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此于中美两国人民之感情，大有损害。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府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职是之故，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则贵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拥护，而上帝必佑贵国矣。

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一九四六年九月

**电参政会响应学生运动**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最近国内学生运动日形扩大，情形至为热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昨特致电国民参政会吁请响应学生正义主张。原电如次：

       “南京国民参政会，并转全国同胞公鉴：国民党当局，假宪政之名，行独裁之实，任用贪污，滥发纸币，加以发动内战，更使民不聊生。京沪平津各地青年学子，迫于义愤，呼吁和平，竟遭惨杀，甚至以军法镇压学潮，封闭报馆，侨情愤激，特向钧会及各界同胞吁请响应全国学生正义主张，认为惟有恢复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方足以平民愤，以挽危机，临电不胜迫切待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叩”。

       另讯：星洲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特于昨日（廿八日）假座怡和轩，开执行委员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由陈嘉庚主席，结果议决：于本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假座维多利亚纪念堂（即大钟楼会堂）召开星洲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届时陈嘉庚将亲临主持大会。华侨各社团及各界之欲参加者，可于本日（廿九日）下午一时起至三十日下午六时止，向该会办事人领取入场证。领证地点为怡和轩，南侨日报社，及密驼律一四九号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三处。

**抗议白思华报告书**

**致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南侨日报载］自马来亚前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关于马来亚战役之报告书发表以后，本报社论首先加以批评，认为对华人部份殊欠公允。其后中华总商会亦决定组织小组会，加以研究批评。昨日侨生领袖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亦投函本报，表示意见。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在战时曾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各项抗日工作，对于白思华报告书，尤极感不满，特搜集各项事实，于本日向英国陆军部提出备忘录。用航邮迳寄伦敦，该备忘录对白思华报告书中关于华人各节，提出事实，加以纠正，并要求修改道歉。本报兹向陈嘉庚氏抄录备忘录原稿，发表于下：

**为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马来亚后，鄙人曾受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抗战工作。至十二月廿八日，复奉总督命组织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欧人领导，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始停止工作。光复以后，鄙人缄口不提此事。惟读英国陆军部发表之白思华报告书，对于战争中华人援英抗日之若干事迹，竟加以抹煞，且对当地华人作极不公允，甚至错误之批评，显然欲藉此推诿战之责任。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不得不提出下列各项事实，以对该报告书，作重要补充和纠正，并对报告书及白思华中将本人，表示不满与抗议。

       事实如下：

       一、一九三七年欧战爆发前，政府为预防安南暹罗米不能运来，即鼓励当地人种稻，但不允许华人参加。政府以法令限制华人汇款国内，援助其祖国对日抗战。政府又禁止华校教师学生参加筹赈工作，禁止华人抵制日货并将华人抗日爱国重要干部多人驱逐出境，其最著者如新加坡侯西反，槟城庄明理等。此等事实，说明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英政府对日采绥靖政策，故设法制止华人抗日行动，此为后来马来亚防卫战失败之一重要原因。

       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争爆发后，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动员新加坡华侨，开掘防空壕，在全市动员华人数千，于一星期内完竣。

       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组织华侨抗敌动员会，当时华侨各党派无党无派及侨生领袖，均参加工作。其中较为重要之工作为：（一）组织华侨义勇警察，以维持治安及消极防空，日夜服务者三千余人；（二）征募劳工，每日集二三千人，从无短缺，其工资先由华人方面筹垫，政府然后偿还；（三）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及工厂宣传援英抗日。

       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决定弃守槟城，当时在城英人男妇六七百人，悉数平安撤退。新加坡总督且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慰问。但当地华人及各族人士，则被当局拒绝使用交通工具，不能撤退。对政府此种不公允之措置，华人方面曾表示不满与愤慨。

       五、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英军炸断柔佛桥，在军港内施行破坏，并将市中心高射炮撤移，保护退聚后方诸军兵，可见当时英军已无意死守新加坡，政府在平时，并未给予华人以普通服兵役之机会。但至二月一日，英政府突然发给步枪一千枝，交华侨青年（即所谓“打里军”）执中国旗帜，开往林厝港，防守海岸。此外又令新加坡华人义勇军三百余人苦守前线，英军于准备新加坡弃守时，始将防卫工作委诸临时草草编成华人队伍，因此使敌人更痛恨华人。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令华人分区集中，加以屠杀，新加坡柔佛各地，华人因此遭惨杀者数万人。

       六、吉隆坡未沦陷时，华人青年即组织游击队，在山林里阻挠日军行进，其后扩大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敌，光复前始行复员。此为众所周知之事，兹姑从略。

       七、战前政府对于华人加入义勇军，限制綦严，对欧亚籍义勇军之间，显有差别待遇。华人义勇军建立历时五十载，而华人几无一人升至连长者，由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在本年三月二日马来西报所发表之投函，可以作证。政府对华人义勇军之政策，说明政府从未信任华人以令其担负当地之防卫责任。

       查白思华报告书，对于上开各项事实，均未有所指陈，对于当时政府对华人政策措置错误所引起之责任，故意加以掩蔽。反之，白思华中将竟认为亚洲人“趋向较有力之方面，深恐战线后方之破坏现象促使彼等协助敌人多过于协助我等”。所谓亚洲人者，其中当然包括华人在内。就我华人观点，认为此种见解，不仅全不正确，且系恶意之诬蔑。华人尚确系“趋向强有力之方面”则中国能有八年之抗战，马来亚在沦陷时间，有成千成万之人民抗日军以与强敌周旋，其又将如何解释乎？

       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一般之意见，对白思华报告书中有关华人之各节，表示严重之抗议，并要求在其报告书中作忠实之修正与道歉，以平息华人之愤慨。否则华人为保留马来亚战争之真相，亦必作一部报告书，以纠正白思华之错误。要之，已往之失败，即未来之教训。战争虽早结束，和平尚待努力。而欲保卫国土，首先当重视人民力量。若平时加之重重桎梏，一旦有事，始释其缚，而驱之赴前线，则未有不遭惨败者。今日马来亚，政制变更，聚讼未已。甚愿殖民地当局，惩前毖后，放大眼光，与民更始，勿使复辙相寻，噬脐莫及，则鄙人所厚望焉。

**（附载）白思华之答复**

       ［民国七年三月廿四日南侨日报载］白思华将军之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华人有诬蔑之批评，与事实不符，故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曾列举华侨援英抗日之种种事实，予以驳斥，并郑重提出抗议。其他侨生界领袖，如林汉河爵士，陈振传，叶平玉，叶玉堆等，均相继发表声明，指摘白思华报告书歪曲事实，抹煞华人抗日卫马之功绩。兹据本坡海峡时报伦敦电讯，白思华将军对华侨之抗议，曾发表书面谈话，一面承认华侨之抗议，其内容乃千真万确者，一面则推诿抗议各点，不包括在报告书之范围内。白思华称：“关于华侨领袖所提出的抗议，我的唯一的批评，就是他们的争辩，毫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但这些争辩的课题，并不包括在我所撰的报告书范围内。”

       白思华将军阅读本坡海峡时报刊载华人之批评，及该报社论后，以书面答复该报伦敦通讯员称：“诚如贵报所言，余撰述此报告书之时，欲试图将其超越纯军事报告之普通标准之上，而欲引述在英国领土内作战所得之教训，以为未来之警惕。余认为在既往吾人不幸对此事之经验甚为肤浅，吾人应乘此机会对吾人目前所得之经验，善为利用。”

       “余必须声明，吾人所得之教训，不但仅实施于马来亚，亦同时可实施于不列颠各民族联邦之内。”

       “关于报告书应分民事及军事两部之提议，余赞成此项建议，亦宜以在吾人领土内之战役为限。”

**向白思华质问三点**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南侨日报载］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近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于吾侨之协助英政府参加抗战种种事实不但未提只字，且诬蔑亚洲人“趋炎附势”，站在敌人方面；并谓吾侨缺乏中心领导者，抹煞一切，是以引起吾侨愤愤不平。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特上书英陆军部提出严重抗议。日前白思华中将致海峡时报驻伦敦记者之书面意见，答复陈氏之抗议。各情迭见前报。顷悉，陈氏对白中将所答，仍认为不满，爰致函海峡时报，请其转向白中将质询，如白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兹录原函如下：

       海峡时报主笔大鉴。顷读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贵报登载白思华中将致贵报伦敦通讯员之书面意见，就鄙人前送英国陆军部之抗议书，有所答辩。其中对于鄙人抗议书所陈事实，认为“多数系属真情，无可置疑”，但白思华报告书系属军事性质，而鄙人所陈事实则属民政，故不在该报告书范围之内云云。

       兹鄙人拟再向白思华中将质询三点：

       （一）以下事实为鄙人所忆及者。即（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事爆发后，鄙人奉总督之命，逐日代雇工人二千余至三千人，到飞机场，军港及前方，挖掘战壕及任其他劳作，屡遭敌军轰炸，仍冒险工作不辍。（乙）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华中将命令素受政府训练之华人义勇军守最前线，嗣后伤亡逾六十巴仙。（丙）英军当局于二月一日以步枪一千枝发给华人青年，令防守林厝港海岸，嗣后死伤过半。（丁）英军投降前，华人即在吉隆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森林中作战，参加者成千成万人，后为人民抗日军，冒千辛万苦，不屈不挠，三年余如一日，至敌降后始止。以上事实果属于军事范围否乎？何以白思华报告书竟加以抹煞乎？

       （二）白思华报告书内称：“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彼恐亚洲人“见到后方受破坏，彼等帮助敌人更多于帮助我等。”试问亚洲人究在何处助敌，其人数有若干？是何种族？且助敌有何种事实？应请白思华中将明白说出，断不能以莫须有之说，诿败降之责于亚洲人士，并以欺蒙全世界人士也。

       （三）日军抵占新加坡岛时，作战二三日中，华人青年及义勇军，在前方伤亡已近千人。英军投降后，新加坡华人遭敌屠杀约万人左右。白思华中将或以为此种牺牲尚不算多，则请宣布英军在新加坡防卫战中死伤究有若干，投降后英人遭屠杀者究有若干。就余所知，恐尚不及被难华人十分之一也。

       以上希望贵报驻伦敦通讯员转向白思华中将质询。如白思华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也。

陈嘉庚启

**与毛泽东主席来往电四件**

       ［民国卅八年二月十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氏于本月八日致一电与中共主席毛泽东氏，主张严办订立卖国条约之战犯。在此以前，陈氏曾接到毛氏一电，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陈氏复电自言为政治门外汉，“冒名尸位，殊非素志”云云。兹将来往电文披露于次：

       毛泽东来电：“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毛泽东，一月二十日”

       陈嘉庚复电：“毛主席钧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府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陈嘉庚”

       主严办卖国战犯：“剑英将军转中共毛主席钧鉴，阔别十年，时切驰念。革命大功，瞬将完成，欣庆何似。敬祝新民主政府百事顺利，公等政躬康泰。战争罪犯中，卖国贼当为首恶。史书记载，虽有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一字。如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孙科、张群等，订立卖国条约，及求美国军事援助，罪大恶极，绝对无可宽恕也。陈嘉庚叩齐。”

       四月九日陈氏又致毛氏电如下：“毛主席钧鉴：南洋各属华侨失业日多，不景气日重，前途悲观，今后回乡者必众。日寇侵陷时，侨汇断绝，加之内战三征，苛政百出，闽民贫惨，莫可言喻。抵选择贤能闽人，训练多士，俾福建解放迅速，兴利除弊。庚万十恳切盼祷之至。陈嘉庚叩”

**与朱绍良等来往电**

**致闽朱绍良电**

       朱主席台鉴：兰州厚待，感激难忘。闽民经陈仪虐政，及抗战内战，征拿壮丁，有去无回。日寇侵陷南洋，侨汇断绝，生计艰困，悽惨莫可言喻。近闻先生征丁征粮，更形严厉。然内战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助纣为虐，等于自杀，请以陈仪为鉴。造惠桑梓，亦可为自家善后计，敬为闽民请命，祈卓裁！陈嘉庚叩佳。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致何应钦电**

       应钦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背叛国父主义，狡诈无信，神人共愤，惨败当然。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勿误再误，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李宗仁电**

       宗仁先生台鉴：老河口厚待，感激难忘。而示蒋介石作事甚偏，偏则无是非，损人格。先生竟与同流，良可婉惜！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国，先生等将逃何处乎，一误安可再误，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千古，后悔不及矣！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白崇禧电**

       崇禧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无是非，惨败当然。先生一误安可再误？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朱绍良复电**

       新加坡中国领事馆，请转陈嘉庚先生，佳电奉悉。密。暌违有日，驰念素殷，载拜佳言，钦迟曷极！吾兄爱乡情切，至希时锡周行，藉匡不逮。特电布复。弟朱绍良。

**电悼冯玉祥将军**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南侨日报载］冯玉祥将军在黑海船上遇难逝世，各方多表示悼惜，顷陈嘉庚氏探悉冯夫人尚暂居于莫斯科，特发出一电托塔斯社转交冯夫人，以表吊唁之意。原电如下：

       莫斯科塔斯社转

       冯玉祥夫人礼鉴：惊闻冯玉祥将军及令爱噩耗，至深悼惜！冯将军爱国爱民，对于革命事业多所贡献。不幸遽尔云亡，实为中国人民之损失。尚望节哀顺变，共同完成冯将军之遗志。

陈嘉庚叩咸

**评蒋鼎文之谈话**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南侨日报载］蒋鼎文在美发表谈话，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为中国伟大人物，希望此三人合作云云。记者偶赴怡和轩向陈嘉庚先生叩询对于蒋鼎文谈话作何感想，陈先生答称：

       人生大病在不自知，我虽年老尚有自知之明，安敢与蒋毛二公相提并论？第人之品性往往不同。二公所能者，我则绝对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行与否耳。我自信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其他军事政治则全不谙。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若毛主席与蒋委员长，更大不相同。其为人言信行果，经纬才干，我国无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至谓蒋毛合作，便可使国事安定，为此说者，其眼光思想，可谓十分简单。缘蒋毛二人存心各不同，思想互相参差，意见甚于水火。我早断协商无结果，内战难避免，虽有美国最新式武器之援助，大量物资之供给，以为种种利诱威胁，蒋亦必终归失败，岂待今日而后知耶。

**辞谢行总协修集美校舍**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先生创办之集美学校校舍，抗战时期被敌寇炮击，飞机猛炸，致数十座屋宇，无一完好。加以多年荒废，自然损坏不堪。去年八月敌寇投降后，即从易于修理之一部分赶修。至本年去秋，费去八千余万元。若现下工料昂贵，非数万万元莫办。计修竣诸校舍，仅可容中学学生千余名而已。其他破坏较重之部份，若要修竣，须工料费二万万元。又延平楼及其他数座，倒塌更甚，几需完全重建，按费须三四万万元。陈氏昨接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来函云：行政院救济总署厦门办事处，近决用工赈办法，补助修理受敌炸毁小学校舍；其办法，材料费学校自行筹措，工费则由行总拨发面粉补助；集美校舍应修理一部份之费二万万元，其中工资占八千五百万元，由行总补助之，其他材料费，则由本校自理。各条件经与厦门行总办事人议妥，故来函征询可否接受。据记者探悉，陈嘉庚先生已复函辞谢。该函大意谓：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立，以图强盛，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是耶！号称胜利国五强之一，人民之众，居世界第一位，列强中谁如此卑劣？素称“礼义廉”者，果如是乎？可哀也已！

**与美记者谈我国新局势**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廿三日南侨日报载］美联社星洲分社主任马斯特逊氏，昨日赴怡和轩俱乐部，访问陈嘉庚氏，畅谈中国问题。陈嘉庚即席对马氏表示：只要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新中国人民，将会原谅美国人民的，因为中国人民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

       马斯特逊为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在中国居住达三年时间，对中国情形有深刻之观察。彼对华所见蒋介石统治下中国人民之饥饿痛苦，极表同情。当其于数月前离华来星时，即对记者及友人断言蒋介石政府两个月必倒，而今此种预言已成为事实。

       马氏密切注意新中国政府对外通商问题。并认中共在握有政权之后，应以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且应有对社会之责任感，如果仿国民党之腐化政策，即将重蹈国民党之覆辙。

       兹将席间有关中国问题之谈话录下：

       马氏问：“陈先生准备回中国吗？”

       陈氏答：“上海解放后，就要回去。”

       问：“依陈先生看法，预料上海何时可解放？”

       陈氏笑答：“这，你比我看得更清楚了。”

       问：“陈先生曾经会过毛泽东吗？”

       答：“是的。一九四〇年回国时，曾会过毛泽东。”

       问：“毛泽东是个好人吗？”

       答：“是。”

       问：“他是一个好领袖吗？”

       答：“是的，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

       问：“陈先生认为中国的政局，将来应该如何处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济深等各方面人士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

       答：“是的。”

       问：“在这联合政府中间，国民党可以参加吗？”

       答：“除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当然可以参加。”

       问：“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间，谁将握有控制之权力？是中共，民盟，或是某一其他方面？”

       答：“当为中共。因为他们具有十数年之丰富经验，对中国实际情况有充分之了解，而且拥有甚多优秀的人才。”

       问：“中共在获得胜利以后，是否有办法将中国目前之残局改善？如果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答：“这在我看来并不难，相信中共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

       问：“陈先生对中国复兴，有何计划？是否准备参与一部分工作？”

       答：“我对政治问题，素为门外汉。”

       马斯特逊氏说：“这并不是单单政治问题。中国目前最主要者，乃经济问题，而商人对经济复兴工作诚可出一部分力量。”

       陈氏答称：“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在中共胜利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必不成问题，只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衣食住问题能得妥善解决，中国即能步上复兴之道。”

       马氏问：“照陈先生看，中共可在几个月内肃清国民党残余？”

       陈氏答：“除散布在台湾，以及新疆、西康、西藏等边僻地区之部份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份反动武力，相信在今年内肃清。在四五个月中间，解放军将可解放中国之大部份重要地区。”

       问：“在国民党反动分子肃清之后，新的中国联合政府，如留有职位请陈先生回去协助建立工作，先生准备接受吗？”

       陈氏又简单的答：“政治我不懂。”

       问：“那么，陈先生对新中国政府的兴趣，主要者在哪一点？”

       答：“我准备回到祖国各地游历，看看新政府如何谋新中国的发展，如何改善新中国。”

       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曾经协助蒋介石，为其筹募赈款，协助抗战工作，后来为什么又反对他呢？”

       答：“因为在我回国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真象。有几次，我在意见上和蒋介石抵触。第一次，余亲赴延安之后，曾在重庆称赞中共地区之良好政治，蒋介石当然不满。第二次，余在福建，见陈仪政治败坏，提出反对，并电告蒋介石，促其改革，但蒋竟偏袒陈仪，对余反对陈仪之举，表示不满。其后余经国内各地，到处号召反对陈仪暴政。返南洋时，又到处召开福建会馆会议，斥责陈仪。抵星之后，亦屡次对陈仪治闽劣迹，提出攻击。”

       问：“照陈先生看法，蒋介石有再登台的机会吗？”

       答：“余早已见及蒋介石无可能保持其政权。前年余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曾指出蒋介石政府乃无希望之政府，盖蒋介石乃一不顾信义，经常不遵守诺言者。即余个人亦曾数次受其骗。”

       马斯特逊氏继称：“余在中国，曾与中共方面人士接触，而今，仍有一问题未能彻底清楚，即中共控制中国以后，中国是否将继续与英美及欧亚各国通商？”

       陈氏称：“如果欧亚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

       问：“新中国不致只跟苏联来往，而不跟其他国家发生商业关系吧？”

       答：“中国是不会如此的。”

       问：“有许多人说，中共受莫斯科指挥，先生以为然乎？”

       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般人所说的。可是，我到延安时，即未见到有苏联帮忙中共的证据，迄今，亦未尝见有苏联帮忙中共之迹象，只是，根据当时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曾经以三万万美元之巨量物资，帮助中国抗战。却未闻苏联曾以军器私下帮助中共。”

       马斯特逊对于此点，表示颇有同感。渠称：有名的美国记者，如《西游漫记》作者史诺氏等亦如是报导。而他个人，亦未尝见到有任何苏联个别帮助中共之迹象。

       陈嘉庚说：“以毛泽东之为人，不但不愿与友邦发生恶感，就是他个人对于蒋介石，本亦无特殊恶感存在。当余将离延安返重庆时，毛氏即曾嘱余对蒋介石表示态度，强调其本意纯为造就中国之良好局面与光明之前途。”

       马氏问：“在中国抗战期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为中国政府筹募之款额，共有多少？”

       陈氏答：“共达当时国币四万万元，占华侨汇回祖国款额总数之十分一。其时汇率平均为叻币十六元折合国币一百元。根据财政部之报告，一九三九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总额，达国币十二万万元，其中十巴仙即为侨胞捐款。而根据何应钦报告，同年所用战费，共达国币十八万万元。”

       问：“陈先生对李宗仁之看法如何？”

       答：“李宗仁前与蒋介石一样，亦曾在我面前大骂中共，但现在，也许‘变了’。他不满意蒋介石。”

       问：“照你的看法，李宗仁参加在联合政府之中吗？”

       答：“我想，中共不让其参加。”

       问：“孙科如何？”

       答：“孙科根本是个庸材，是一个愚夫。”

       马氏问：“照我的看法，中共要攻占南京上海，是随时可以办到的，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进攻呢？”

       陈氏答：“这一方面也许是看看局面是否可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许是渡江的准备工作，如船只等等，还没筹备妥善，相信再过三数星期，这种渡江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作大规模进攻，那时，渡江的解放军，将不仅是数千数万，而是成百万浩浩荡荡开到江南各地来的。”

       这时，马斯特逊停一会儿，大家喝一口咖啡，转变话题，谈起陈嘉庚氏过去曾资助厦大，及至今赞助集美学校的事情来。接着问道：“陈先生目前在中国有事业吗？”陈氏说“无”。马氏继而问起陈氏的年纪，陈氏告诉他今年七十六岁了。马氏闻言，对陈氏精神，表示格外钦敬，自谓他如果到了这种年纪，将远不如陈氏对一般问题之清楚了解矣。

       陈氏继请马氏根据其居住中国数年之观察，发表对中国前途之看法。马氏首先声明其所发表之意见，系与各方人士谈论后汇集之结论。继称：

       “余认为：中国要繁荣起来的。而中国的繁荣，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分不开的。”

       “中共如果把握了中国政权，就应该有一种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应该以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而不应该为了自己，或为了其他小部份人的利益着想，如果象国民党那样只是自顾私囊，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必将重蹈国民党失败之复辙。”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得到中国人民之拥护，如果能保持过去的荣誉，走向为国为民的正当道路，当可备受中国人之敬佩。可是，他却和一般右派的极端分子搞在一起，造成无可挽救的大错。于是，跑上失败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要求，实际上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有一锅饭，一碟菜干，就可以过日子。执政权的，就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这种起码的合理要求。”

       陈嘉庚对马氏上述见解，认为正确。并称“中国局面之艰难，实由于执政领袖之败坏，如有良好贤明领袖，起而领导，中国实不致陷入苦境。”

       马斯特逊说：“余曾走过中国甚多地方，会见国共双方人士，知国共双方，均有甚多好人，如果他们能抱定为人民谋利益宗旨，破除一切政治成见，真诚相见，团结一致，则中国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陈嘉庚说：“照余所知，国共双方握有权柄之领袖，绝无合作之可能。因两边领袖之性质，根本完全不同。一方真实做事，而另一方面却是欺骗人民，所以，我几年前就认定，双方要打，决无妥协之余地。中国今后，已不可能有如过去军阀割据，像阎锡山、傅作义，自拥地盘而后谋联合之现象。”

       陈氏继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这充分表现在西安事件之释放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却充分表现其一惯不守信义之作风，如果毛泽东落入蒋介石之手，恐怕就没有保全性命之希望了。”

       “西安事变，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只附以五项条件：一、以西北廿一县为自治边区；二、允许中共练兵三万名；三、每月发给中共军政费用六十八万国币；四、如在对日抗战时期，每月须供中共枪弹八百万粒；五、日本占领华北，须即发动抗战。最后，言明上述五条，须正式提交行政院通过，并向全国公开宣布。”

       陈氏指出：“但蒋介石对最后一点，却不守诺言。所有五条件虽曾交由行政院通过，但全未公开宣布。这事情直到朱德将军对我当面提起，我才知道。”

       马斯特逊继问：“现在中共方面，充满热烈之反美情绪，将来如果中共控制中国之后，这种情绪，是否将继续存在？”

       陈嘉庚答：“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中国人民会对美国人民加以原谅。”

       马氏听过了这种话，也对陈嘉庚说：“是的，我与军调部叶剑英，曾有多次之来往，也发觉了中共一般领袖，与美国实仍保有良好之感情。”马氏继称赞一般中共领袖，如周恩来等为好人，只是表示对李立三印象不好。他也称赞吴国桢，可是陈嘉庚不同意对吴国桢的称赞，谓：吴国桢是一丘之貉。（下略）